

目录

[理想國譯叢序 7](#_Toc54793375)

[登場人物 16](#_Toc54793376)

[報刊與組織名錄 20](#_Toc54793377)

[報刊 20](#_Toc54793378)

[組織 20](#_Toc54793379)

[序言 24](#_Toc54793380)

[第一部分 教宗與獨裁者 27](#_Toc54793381)

[第一章 新任教宗 27](#_Toc54793382)

[第二章 進軍羅馬 36](#_Toc54793383)

[在1904年的洛桑，墨索里尼同意就天主是否存在的問題與當地一位新教牧師進行辯論。為了說服聽眾，他上引伽利略，下引羅伯斯庇爾，之后又爬到桌子上去掏出一塊懷表，大聲喊叫，如果天主真的存在，那么祂就應該在接下來的五分鐘里將他擊斃。貝尼托在同一年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天主并不存在》（“God Does Not Exist”）。他堅持不懈地攻擊教會，將神父貶作“黑色的細菌，他們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堪比結核桿菌”。 [3] 37](#_Toc54793384)

[[3] Bosworth 2002, p. 62.墨索里尼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天主并不存在》的英語譯文收于Seldes 1935, pp. 387–390。1908年的文章被下文引用：Gentile 2010, p. 84。 47](#_Toc54793385)

[第三章 命運攸關的結盟 49](#_Toc54793386)

[第四章 天生教宗 62](#_Toc54793387)

[第五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68](#_Toc54793388)

[第六章 獨裁統治 75](#_Toc54793389)

[第七章 刺客、孌童者與間諜 81](#_Toc54793390)

[第八章 《拉特蘭條約》 87](#_Toc54793391)

[第二部分 共同的敵人 101](#_Toc54793392)

[第九章 救世主 101](#_Toc54793393)

[第十章 步步緊逼 114](#_Toc54793394)

[第十一章 土生子歸來 121](#_Toc54793395)

[第十二章 帕切利苦苦支撐 128](#_Toc54793396)

[第十三章 墨索里尼永遠正確 133](#_Toc54793397)

[第十四章 新教敵人與猶太人 143](#_Toc54793398)

[第十五章 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教宗 156](#_Toc54793399)

[第十六章 逾越雷池 164](#_Toc54793400)

[第十七章 共同的敵人 173](#_Toc54793401)

[第十八章 光榮之夢 184](#_Toc54793402)

[第三部分 墨索里尼、希特勒與猶太人 195](#_Toc54793403)

[第十九章 討伐希特勒 195](#_Toc54793404)

[第二十章 領袖萬歲！ 202](#_Toc54793405)

[第二十一章 希特勒訪問羅馬 212](#_Toc54793406)

[第二十二章 驚人的任務 220](#_Toc54793407)

[第二十三章 秘密協議 230](#_Toc54793408)

[第二十四章 種族法案 237](#_Toc54793409)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戰役 247](#_Toc54793410)

[第二十六章 相信國王 252](#_Toc54793411)

[第二十七章 死得正好 260](#_Toc54793412)

[第二十八章 烏云消散 269](#_Toc54793413)

[第二十九章 奔向災難 278](#_Toc54793414)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理想國譯叢主編

梁文道 劉瑜 熊培云 許知遠

[美] 大衛·I . 科澤 著　陶澤慧 譯

教宗與墨索里尼： 庇護十一世與法西斯崛起秘史

David I. Kertzer

THE POPE AND MUSSOLINI: THE SECRET HISTORY OF PIUS XI AND THE RISE OF FASCISM IN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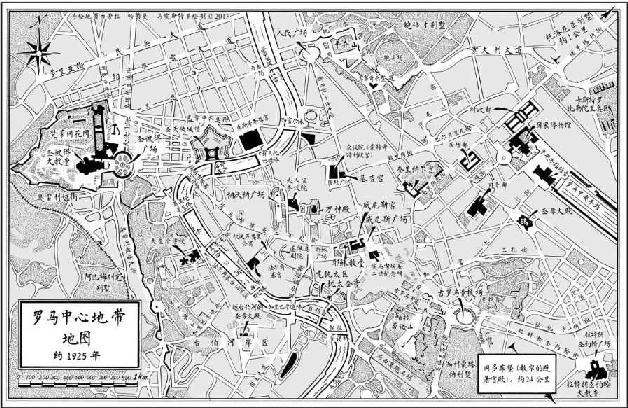
扎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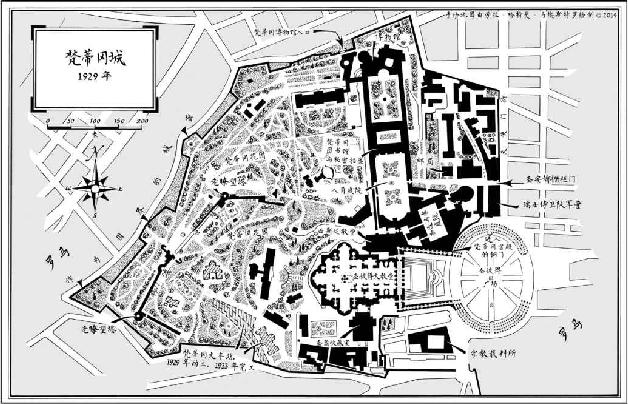
獻給三只小熊

薩姆、杰克和查理

我了不起的孫兒們

羅馬城與梵蒂岡地圖





# 登場人物

伊塔洛·巴爾博 （Italo Balbo，1896—1940）：恃強凌弱，是費拉拉市的法西斯首領，也是1922年“進軍羅馬事件”（March on Rome）的領導人之一。1933年，他帶領二十四架水上飛機長途跋涉來到美國，被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授予飛行優異十字勛章。他英雄般的空軍事業令他在大西洋兩岸享有盛譽，卻在墨索里尼心中點燃了嫉恨之火。

教宗本篤十五世 （Pope Benedict XV）[賈科莫·德拉·基耶薩（Giacomo Della Chiesa），1854—1922］：賈科莫·德拉·基耶薩生于熱那亞的一個貴族家庭，并在1913年晉升博洛尼亞大主教。盡管樣貌并不合宜，他還是在1914年被推舉為教宗，接替庇護十世的位置。他改弦更張，撤銷了前任教宗的反現代主義改革運動，解散了教會的神父間諜組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后，他試圖出面調解局勢，帶來和平，卻品嘗到了失敗的滋味。

阿爾弗雷德·博德里亞 （Alfred Baudrillart，1859—1942）：天主教學者，長期擔任巴黎天主教大學校長，他在1921年晉升主教，并在1935年晉升樞機。隨著墨索里尼日益鞏固與希特勒的結盟，博德里亞擔心日漸體衰的教宗庇護十一世會被陰謀詭計所縛；博德里亞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貴的日記。

弗朗切斯科·博爾貢吉尼—杜卡 （Francesco Borgongini-Duca，1884—1954）：生于羅馬，1921年被任命為非常教務部部長，此乃梵蒂岡國務院里最關鍵的兩個職位之一。盡管他一生從未離開羅馬，卻處理著各種國際事務。1929年，教宗將他任命為首任梵蒂岡駐意大利大使，此后他擔任這一職務長達二十年。虔誠的博爾貢吉尼天真而不通世事，免不了要受到墨索里尼的欺侮。

圭多·布法里尼·圭迪 （Guido Buffarini Guidi，1895—1945）：法西斯黨人，年僅二十八歲便當選比薩市市長，并在十年后成為墨索里尼手下的內務部副部長，負責管理國家警察系統。大腹便便、腐敗成性、橫行霸道的布法里尼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撈取到更大的權力，使得墨索里尼有更多余裕專心于擴張他新近收入囊中的意大利帝國。

卡米洛·卡恰·多米尼奧尼 （Camillo Caccia Dominioni，1877—1946）：1921年，本篤十五世命卡恰領導教廷內務管理處；早在20世紀初，他就已經與下任教宗阿契爾·拉蒂在米蘭相識。庇護十一世繼續任用他，他每日都立于教宗身邊，安排教宗的日程，并決定誰能夠晉見教宗。卡恰有個非常可怕的秘密，在梵蒂岡和法西斯警察局盡人皆知，這個秘密威脅著他，要令他尊嚴掃地。

博納文圖拉·切雷蒂 （Bonaventura Cerretti，1872—1933）：名列梵蒂岡最為顯赫的外交官行列，當庇護十一世在1926年將他晉升為樞機時，他時任教宗駐法國大使。他對教宗與墨索里尼的合作關系持批評意見，因此，在1930年，教宗直接略過他，將他的競爭對手任命為國務卿，這使得他對教宗的怒火愈演愈烈。

加萊亞佐·齊亞諾 （Galeazzo Ciano，1903—1944）：政府高官之子，并在1930年與墨索里尼的長女埃達結為連理。墨索里尼的妻子極其厭惡這位自封為大眾情人的女婿，他卻很快成了岳父的法定繼位人，這令其他法西斯領導人心灰意冷。在擔任媒體和宣傳部部長一小段時間后，墨索里尼竟在1936年將其任命為外交部部長，令整個外交界頗為震動。

查爾斯·考夫林 （Charles Coughlin，1891—1979）：生于加拿大，并在此晉鐸。在20世紀30年代，他身居底特律教區，卻通過廣播節目影響了數千萬美國人。他一開始支持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社會改革，后來突然轉向右翼，將總統指控為共產黨特工。考夫林不僅為希特勒殘忍的反猶行徑辯護，還非常渴望能夠為意大利獨裁者效勞。

切薩雷·德·維基 （Cesare De Vecchi，1884—1959）：一位生于都靈的君主主義者，也是“進軍羅馬事件”的四位領導人之一。1929年至1935年，他出任意大利首位駐圣座（Holy See）大使。德·維基自命不凡、小肚雞腸，卻又蠢笨不堪，嘴上怪異的髭須令他十分顯眼；他受到百般嘲弄，其中以墨索里尼為甚。盡管庇護十一世多次對德·維基拍桌大怒，最后反倒對他青眼有加。

彼得羅·加斯帕里 （Pietro Gasparri，1852—1934）：生于意大利中部一戶貧窮的山區牧民之家，長大后卻變成了一位研習教會法規的學者，并且名列梵蒂岡最具影響力的外交官行列。作為梵蒂岡國務卿，他先后服務了本篤十五世和庇護十一世；矮胖的加斯帕里將他敏銳的政治直覺隱藏在社交場合的談笑風生中。

赫爾曼·戈林 （Hermann Göring，1893—1946）：與希特勒關系最親密的納粹領導人之一，他組建了蓋世太保（Gestapo），并且占據著納粹德國政府的許多高級職位。他一開始被墨索里尼視作瘋子。

迪諾·格蘭迪 （Dino Grandi，1895—1988）：本是內務部副部長，后在1929年至1932年間擔任了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部長。一臉山羊胡子的格蘭迪一開始位列最為激進的法西斯黨人行列，然而擔任意大利駐倫敦大使的生涯（1932—1939）更符合他的心意，并改變了他對墨索里尼投奔納粹德國的看法。

阿道夫·希特勒 （Adolf Hitler，1889—1945）：多年以來，貝尼托·墨索里尼都是希特勒心目中的英雄，他將一尊巨大的墨索里尼半身像放在慕尼黑的辦公室里。1933年1月當選德國總理之后，他向梵蒂岡拋出橄欖枝，試圖獲得天主教會的支持。盡管對他抱有疑慮，教宗一開始還是被他強烈的反共立場所蒙蔽。

沃齊米日·萊多霍夫斯基 （Włodzimierz Ledóchowski，1866—1942）：波蘭伯爵之子，樞機之侄，他在1915年當選耶穌會總會長，任職二十七年，直到壽終為止。他是一位惡毒的反猶分子，對法西斯主義抱有好感，墨索里尼將在后來向他尋求幫助。

喬瓦尼·蒙蒂尼 （Giovanni Montini，1897—1978）：1922年，身為神父的他加入了國務院，在此任職多年。1933年，庇護十一世免除了他作為意大利公教進行會國家司鐸的副業，但又在1937年將他任命為副國務卿。1963年，他登上圣彼得寶座，號教宗保祿六世。

喬治·芒德萊恩 （George Mundelein，1872—1939）：先于1915年晉升芝加哥大主教，后于1924年晉升樞機，在他的主持之下，天主教會得以不斷擴張；他同富蘭克林·羅斯福成為好友，并在政治上對他予以支持。1937年，他對阿道夫·希特勒的言語攻擊激怒了元首。

阿納爾多·墨索里尼 （Arnaldo Mussolini，1885—1931）：他同貝尼托一起長大，兩人同睡過一張玉米殼鋪成的床；1922年，貝尼托成為總理，阿納爾多則成為兄長手下《意大利人民報》的主編。每天晚上，貝尼托都會跟他通電話，討論第二天報紙的內容以及他擔心的事情。阿納爾多盡管與兄長不同，自認為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卻得到了兄長完全的信任。

貝尼托·墨索里尼 （Benito Mussolini，1883—1945）：生于羅馬涅（意大利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中心）一座小鎮上的中等家庭，并在20世紀初期躋身本國最杰出的激進社會黨人行列。1912年，他被任命為社會黨黨報《前進！》（Avanti! ，總部設在米蘭）編輯。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他同社會黨人決裂，并在1919年發起法西斯運動。他原本是天主教會的激烈反對者，但后來他認識到，和教會達成妥協能夠為他的政治野心謀求利益。

埃達·墨索里尼 （Edda Mussolini，1910—1995）：墨索里尼的長女，也是他最疼愛的孩子。埃達任性、沖動、喜怒無常，喜歡騎馬和開快車，很像她的父親。1930年嫁給加萊亞佐·齊亞諾后，她才稍微安定下來。

雷切爾·墨索里尼 （Rachele Mussolini，1890—1979）：雷切爾的老家同墨索里尼一家相距不遠，父母卻是貧苦的農民；她八歲便輟學，干起了女仆的行當。雷切爾的母親是貝尼托父親的情婦，而貝尼托自己也被金發藍眼的雷切爾所吸引。兩人的女兒埃達曾表示雷切爾才是“家里真正的獨裁者”，這位意志堅定的半文盲女性從未在名門望族和商賈巨富的交際圈里感到過自在，而且她也從未放棄過對教會和神父的深刻厭惡。

切薩雷·奧爾塞尼戈 （Cesare Orsenigo，1873—1946）：才智有限，眼界更是有限，他原本是位神父，卻在1922年被庇護十一世任命為教宗駐荷蘭大使，又在1925年被任命為教宗駐匈牙利大使。1930年，教宗繞過了梵蒂岡外交使節團許多更有資質的前輩，將他任命為教宗駐德國大使，取代了歐金尼奧·帕切利的位置。

歐金尼奧·帕切利 （Eugenio Pacelli，1876—1958）：天資聰穎但體弱多病，出生于一個羅馬家族，與世代教宗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晉鐸不久后，他便加入梵蒂岡國務院。1917年他先是作為教宗大使常駐慕尼黑，其后又被派往柏林，前后在德國居住了十二載。1929年，教宗將他召回，并將他晉升為樞機，1930年初，教宗又將他任命為國務卿，取代了彼得羅·加斯帕里的位置。小心翼翼、細聲軟語的帕切利和大權獨攬、喜怒無常的庇護十一世發展出一種特別的關系。當教宗在1939年過世后，他被推舉為教宗，號庇護十二世。

弗朗切斯科·帕切利 （Francesco Pacelli，1872—1935）：歐金尼奧的兄長，他遵從其父的腳步，躋身梵蒂岡最杰出的律師行列。1926年，為了結束意大利王國自1861年建國以來便與圣座保持的敵對關系，庇護十一世與法西斯政府進行了秘密協商，并向他征求意見。

克拉拉·佩塔奇 （Clara Petacci，1912—1945）：魅力非凡、卷發碧眼，是梵蒂岡一位醫生的女兒，當同已經五十三歲的墨索里尼發生風流韻事時，她年方二十四歲。她生活的全部便是等候墨索里尼的電話，召喚她前往他們的愛巢，也即墨索里尼位于羅馬中心威尼斯宮的辦公室。她洋洋灑灑數千頁的日記非常寶貴，使我們得以洞悉墨索里尼的諸多方面。

博尼法喬·皮尼亞蒂 （Bonifacio Pignatti，1877—1957）：一位伯爵之子，也是一位頗受當局看重的職業外交家；他原先是意大利駐法國大使，在1935年代替切薩雷·德·維基擔任駐圣座大使。正如前任政府的大多數外交使節團成員那樣，法西斯獨裁者前腳剛把持住政權，皮尼亞蒂后腳就開始為他們效勞。

教宗庇護十一世 （Pope Pius XI）[阿契爾·拉蒂（Achille Ratti），1857—1939］：生于米蘭北部的一個小鎮，父親是一位絲綢廠的主管；自小便立志要成為一名神父。他年僅二十五歲便任教于米蘭大修院，并很快就在米蘭著名的安波羅修圖書館求得一席職位，最終成為這座圖書館的館長。1914年，拉蒂被任命為梵蒂岡圖書館館長，他本以為自己會在這個職位上終老，可在1918年，本篤十五世出人意表地將他選作教宗大使出使波蘭，他在那里遭遇了緊隨俄國革命而來的蘇俄紅軍，由此對共產主義生出一股終生的憎恨。1921年被召回羅馬后，他晉升為樞機和米蘭大主教。他還沒在新的位置上把屁股坐熱，本篤十五世就匆匆過世，他的樞機同儕便在1922年2月的第十四輪投票中，將他推舉為新任教宗。

教宗庇護十二世 （Pope Pius XII）（參見歐金尼奧·帕切利）

朱塞佩·皮扎爾多 （Giuseppe Pizzardo，1877—1970）：生于熱那亞附近，晉鐸之后加入梵蒂岡的國務院。1909年至1912年間，他前往慕尼黑的梵蒂岡大使館任職，這是他僅有的離開羅馬的歲月。皮扎爾多在1921年被任命為替補國務卿，并在1929年接替博爾貢吉尼成為非常教務部部長，此后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直到1937年晉升樞機。從1923年到1939年（直到教宗庇護十二世找人代替了他），他還擔任意大利公教進行會國家司鐸，這使他常常落在法西斯運動反教會派系的準星上。皮扎爾多深受庇護十一世的喜愛，在梵蒂岡卻不得人心，人們認為他的影響力源于他對美國天主教會資金的掌控。

阿契爾·拉蒂 （Achille Ratti）（參見庇護十一世）

恩里科·羅薩，耶穌會士 （Enrico Rosa，S.J.，1870—1938）：自1905年起，羅薩便是耶穌會半月刊《公教文明》編輯委員會的成員，并在1915年成為該刊主編。他是庇護十一世的親信顧問，曾被教宗召去解釋教會在猶太問題上的立場。盡管一開始羅薩對法西斯主義持敵對立場，但在接受梵蒂岡上層指示后，他竟通過手下的刊物警告天主教徒不要背離獨裁者。

瑪格麗塔·薩爾法蒂 （Margherita Sarfatti，1880—1961）：生于威尼斯一戶富裕的猶太家庭，對文學和藝術都抱有極大的熱情。她在十八歲時嫁給一位猶太律師，同丈夫一起搬至米蘭，被牽涉進社會黨運動，并在那里邂逅了剛剛抵達米蘭的墨索里尼。1917年，待到墨索里尼卸下戎裝時，他們已經難舍難分。她不僅是墨索里尼的親密愛人，還在長達十年的時間里一直為他排憂解難。到20世紀20年代后期，她的魅力開始漸漸消退。

弗朗西斯·斯佩爾曼 （Francis Spellman，1889—1967）：斯佩爾曼的父親是馬薩諸塞州的愛爾蘭移民，1925年，他成為第一位進駐梵蒂岡國務院的美國神父。他在那里同弗朗切斯科·博爾貢吉尼成為密友，后來又成了歐金尼奧·帕切利的朋友。1939年，他晉升為紐約大主教。

阿契爾·斯塔拉切 （Achille Starace，1889—1945）：法西斯領導人中少有的南方人，他在1931年成為意大利法西斯黨總書記。腦袋不靈光又缺乏教養的斯塔拉切在品位敗壞方面可謂大師，他阿諛奉承的本事，把對墨索里尼的個人崇拜推至令人驚恐的新高度。

彼得羅·塔基·文圖里，耶穌會士 （Pietro Tacchi Venturi，S.J.，1861—1956）：生于意大利中部一個望族，他在羅馬研習司鐸之道，并在此地加入耶穌會。1923年初，當庇護十一世和墨索里尼需要一個人來穿針引線時，他們選擇了他。在接下來的十六年里，他將攜帶教宗的要求，私底下與墨索里尼會面多達一百余次。

多梅尼科·塔爾迪尼 （Domenico Tardini，1881—1961）：身為一名羅馬神職人員之子，塔爾迪尼在1921年加入梵蒂岡國務院，并把自己的半生奉獻給了國務院。他在1929年被任命為非常教務部副部長，接受皮扎爾多的領導，然后在1935年成為替補國務卿，接著在1937年接掌了非常教務部部長的職務。塔爾迪尼是一個中間派，他把教會與法西斯政權的摩擦怪罪到墨索里尼周圍的反教會分子頭上，而沒有怪罪領袖本人。

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 （Victor Emmanuel III，1869—1947）：1900年，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的父親遇刺，三十歲的他登上了意大利的王座，可是自登基起他就沒有坐穩過王位。他博學聰穎，身體卻十分孱弱，他的五短身材廣受嘲弄。每周兩次，墨索里尼都要頭戴禮帽，前往羅馬的奎里納爾宮晉見國王，為所有新頒法律向他索取必要的御準。盡管他們的勾結乃是出于便利的需求，囂張的墨索里尼卻能夠與矮小的國王沆瀣一氣。他們對人性都非常悲觀，對神職人員都有著本能的厭惡。

# 報刊與組織名錄

## 報刊

《意大利未來報》 （L’Avvenire D’Italia ）：19世紀晚期，《意大利未來報》在利奧十三世（Pope Leo XIII）的降福下創辦于博洛尼亞；在法西斯時代，它將成為意大利唯一一份真正全國性質的天主教報紙。

《公教文明》 （La Civiltà Cattolica ）：在歐洲自由主義革命（1848—1849）結束后，教宗庇護九世重返羅馬，收復政權，在他的要求下，《公教文明》得以在1850年創辦，并由意大利的耶穌會士負責編輯工作。這份半月刊的主編由教宗直接委任。每期刊物出版前都須經過梵蒂岡國務院的審查和許可。在天主教界，這份刊物代表了教宗對各類事件的觀點。

《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 ）：首次出版于1861年的《羅馬觀察報》是梵蒂岡的日報，創辦之初的意圖乃是幫助教宗保衛余下領土，抵御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國的蠶食。盡管報紙內容受到教宗的密切審查，其正式立場卻抗辯說《羅馬觀察報》并非梵蒂岡的官方喉舌。當墨索里尼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鞏固獨裁統治時，它成了意大利境內唯一一份不受法西斯審查的報紙，然而一旦它刊登的文章為墨索里尼所不喜，所有在梵蒂岡城墻外販賣的該報都會被沒收。作為梵蒂岡的一份半官方報紙，《羅馬觀察報》通過報道教宗的重要會晤，刊登全球教會活動的新聞和評論，來履行它的職責。《公教文明》則與之有別，主要刊登時政問題的長篇社論、常規書評以及教會關切的意大利本國和國際重大政治事件的文摘。

《意大利人民報》 （Il Popolo D’Italia ）：1914年，在貝尼托·墨索里尼被逐出社會黨不久后，他在米蘭創辦了這份日報。五年后，《意大利人民報》成為他發起法西斯運動的言論喉舌。當他在1922年成為總理時，他將這份報紙的編輯工作移交給其弟阿納爾多。阿納爾多在1931年過世后，阿納爾多的兒子維托又從父親手里接過了主編的職務。

## 組織

公教進行會 （Catholic Action）：由庇護十世創建于1905年，初衷是為天主教平信徒提供一個組織活動的平臺。及至20世紀20年代，這個組織已經在意大利境內劃分出成年男女、男孩女孩乃至大學生的不同團體。公教進行會的領導層包括由教宗委任的平信徒主席，以及坐鎮梵蒂岡的神職監管人員，其組織形式上達主教管區，下至地方教區。墨索里尼始終對這一組織抱有疑慮，因為這是意大利國內唯一不受他控制的群眾性團體。在號稱“公教進行會教宗”的庇護十一世眼里，這個組織是他令意大利社會皈依天主教的關鍵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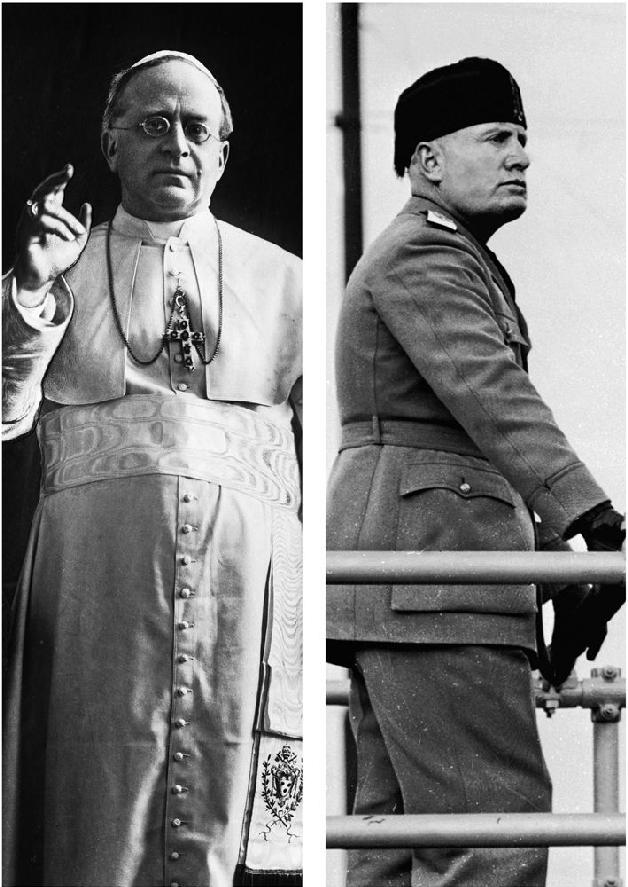
法西斯黨 （Fascist Party）：建立于1921年的意大利國家法西斯黨（PNF）是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智慧結晶。為了將原本松散的政治運動和暴力團伙的烏合之眾轉變成正式的政黨，墨索里尼拋棄了早期法西斯運動中的反教會和反君主的因素，毅然決然地轉向右翼。在執政早期，他仍需費力地約束地方法西斯頭目。到1928年，法西斯黨已然成為意大利唯一的合法政黨。

羅馬宗教裁判所 （Holy Office）：前身為教宗保祿三世成立于1542年的羅馬異端裁判所，成立之初旨在抵御宗教改革運動。1908年更名為至圣圣部。它以教宗為首腦，成員包括數位樞機以及從事輔助工作的各類高級教士。擔當其秘書長的樞機經常會在開庭前同教宗討論案情。羅馬宗教裁判所的職責在于主張正統教義和鏟除異端邪說。

國家巴利拉組織 （Opera Nazionale Balilla），又名國家青年組織，成立于1926年，旨在向意大利青年灌輸全新的法西斯意識形態。組織下分兩個年齡組，不同年齡組又下分不同性別。年幼男孩（8—13歲）組織名喚“巴利拉”，年長男孩（14—18歲）組織名喚“前衛軍”，相應年齡的女孩組織則分別名喚“意大利女孩”和“意大利女青年”。這些法西斯青年團體威脅著教會的青年組織；成立之初，政府便解散了天主教童子軍。不過一個龐大的教士網絡也應運而生，給所有地方巴利拉組織都配備了天主教司鐸，使得他們在接受法西斯教導和準軍事訓練的同時，不忘宗教崇拜。

人民黨 （Popular Party）：1919年，西西里神父路易吉·斯圖爾佐（Luigi Sturzo）得到教宗本篤十五世的首肯，成立了這個全國性質的天主教政黨，名為意大利人民黨。在1921年的議會選舉中，人民黨獲得了超過20%的席位。人民黨是阻止法西斯獨裁上位的最大絆腳石，可是當庇護十一世明確支持墨索里尼時，它受到了重創。該黨最終于1926年11月解散，然而墨索里尼一直都懷疑，人民黨的某些殘余分子仍然隱秘地在公教進行會中重新集結。

社會黨 （Socialist Party）：意大利社會黨成立于1892年，勢力范圍包括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是意大利最主要的左翼力量。由于內部分化成改良主義分支和支持徹底革命的分支（墨索里尼乃后一分支的領導人），該黨在1912年清洗改良主義分子時分裂為兩黨。社會黨在1919年的議會選舉中達到巔峰，贏得近三分之一的選票，并且控制了許多城鎮。1921年，一個政見相左的派系獨立出來，組成了共產黨。1922年，改良主義分子再次出走，成立聯合社會黨，使得社會黨再次分裂。1924年，幾名法西斯暴徒在一位意裔美國人的帶領下，謀殺了該黨黨魁賈科莫·馬泰奧蒂（Giacomo Matteotti）。1926年，墨索里尼宣布社會黨及其諸多派生政黨均為非法組織。



# 序言

羅馬，1939年

教宗庇護十一世年事已高、疾病纏身，上一年差點因為循環衰竭而作古，如今他只求天主能夠再給他些許時日。他身穿白袍，坐在梵蒂岡三樓辦公室的書桌前，手杖倚在就近的墻上。旁邊還有銹跡斑斑的指南針和氣壓計，都是他攀登阿爾卑斯各座山峰時用過的舊物，令他回想起那些遙遠的歲月。抽屜里有一支老舊的音叉，可是上一次取出已經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他對自己的歌喉非常自豪，深信音準沒有棄他而去，他曾一有機會就練習，不過總要先確定沒人能聽見他的聲音。如今，知道自己大限將至，他查看了每一個抽屜，確保所有文件秩序井然。

多年以來，教宗都身體安康，而旁人則驚嘆于他繁重的日程。他曾經堅持過問梵蒂岡事務的所有細節，對或大或小的事務都親自裁斷，可如今每一天都猶如挑戰，每一步都會招致疼痛。到了夜晚，他每每無法入眠，雙腿因靜脈曲張而顫動，哮喘則令呼吸費力，最糟糕的是，他的心頭總是彌漫著一種感受，覺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出了差錯。

白天的時候，日光會從俯瞰圣彼得廣場的三扇窗戶涌入他的辦公室。可現在正值夜晚，他那盞小小的臺燈正將黃色的燈光投射在面前的紙張上。他思索著，天主讓他活著，一定是有原因的。他是天主在這世間的代理人，在把應當說的話說出口之前，他還不能死。

教宗將意大利所有的主教都召集到羅馬，聆聽他最后的話語。集會將于一周半后（即1939年2月11日）在圣彼得大教堂舉行。這個日子正好也是《拉特蘭條約》（Lateran Accords）簽訂十周年紀念日。這項由庇護十一世與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達成的歷史性條約，結束了意大利和羅馬天主教會長達數十年的敵對關系。在六十八年前，意大利王國建國時曾實行政教分離，這標志著意大利正式成為一個現代國家，這項條約卻意味著這個現代國家已然壽終正寢。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到來，教會積極地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開展合作。

在十七年前的1922年，剛剛晉升樞機的阿契爾·拉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接掌了教宗本篤十五世的寶座，取名號為庇護十一世。下半年，各地暴亂四起，三十九歲的法西斯領導人貝尼托·墨索里尼當選意大利總理。從那個時候開始，這兩人就相互依靠。獨裁者依靠教宗，為政權謀求教會的支持，由此獲取他們亟須的道德正統。而教宗也要指望墨索里尼的幫助，才能夠恢復教會在意大利的權勢。現如今，手中執筆的庇護回想那些年，心中感到深深的悔恨。他竟然聽信讒言、誤入歧途。墨索里尼似乎視自己為天主，而且還和希特勒勾結在一起，希特勒則深受教宗鄙夷，他不僅破壞教會在德國的勢力，而且還自立一門異端宗教。在去年春天，羅馬見證的那幅慘痛景象還縈繞在他的腦海里：德國元首在凱旋游行中穿過這座城市歷史悠久的街道，紅黑的納粹旗幟猶如海洋覆蓋了整個羅馬。

希特勒造訪梵蒂岡兩個月后，墨索里尼發表的聲明震驚了世界，他宣稱意大利人是純正高貴的種族。盡管猶太人早在耶穌之前就已經定居羅馬，如今卻被官方認定為一個道德敗壞的異族。教宗震驚了。他在一處公眾場合質問，意大利領導人為何要對德國元首這般亦步亦趨？這個問題令墨索里尼怒不可遏，因為最令他憤懣的事情，莫過于被喊作希特勒的跟班。教宗核心集團的成員趕忙出來修復這段受損的關系。相比起民主社會，他們顯然在獨裁體制中更為自在，而且他們也害怕失去墨索里尼許給教會的各項特權，由此，他們覺得教宗肯定是老糊涂了。他已經疏遠了納粹領導人，而他們擔心，現在他又要將梵蒂岡和法西斯政權的和睦關系置于險境。

在羅馬臺伯河另一側的總部，墨索里尼正對教宗的言論發火。意大利人現在還去參加彌撒，完全是因為他告訴他們要去，要不是因為他，那些反教會分子早就失控了，他們會穿梭在意大利的街巷里，洗劫教堂，把蓖麻油灌到那些畏首畏尾的教士喉嚨里。意大利法庭和學校教室的墻上還掛著耶穌受難像，教士們還在意大利的公立學校布道，這一切完全是因為得到了墨索里尼的命令。而國家之所以還慷慨地撥出資金支持教會，那也是出于他的授意，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在法西斯政府和梵蒂岡之間達成互惠互助的關系。

1月31日晚上，庇護熬到很晚，一直在起草他將于主教集會上發表的講話。教宗原本也算是個登山家，曾經精神飽滿，體格健壯，可如今已經憔悴而瘦弱，原先飽滿的面容已經消沉下去，布滿了深深的皺紋。但無論是誰見到他，都能明顯地感受到，他有極大的決心要發表這番演講。法西斯的密探無處不在，甚至包括教會的廳堂。在警醒各位主教之前，他還不想死。這是他最后的機會，他一定要譴責墨索里尼對納粹種族主義的皈依。

在演講前的最后一周里，教宗剩余的生命力逐漸離他遠去。他站不住了，只好躺在床上。歐金尼奧·帕切利樞機在梵蒂岡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務卿，他懇求教宗將集會推遲舉行。教宗拒不聽從，并且命令梵蒂岡的日報報道他健康狀況良好的消息。2月8日，他擔心自己在三天后可能沒有足夠的力氣發表演講，便命令梵蒂岡印刷廠為每一位主教打印了一份演講稿。第二天晚上，他的健康狀況愈發堪憂，午夜過后，他的呼吸變得越來越吃力。服侍人員小心翼翼地將氧氣面罩系到他的嘴上，以免碰歪頭上的白色小瓜帽。凌晨4點，他們叫醒了帕切利樞機。樞機趕到教宗床邊，雙膝跪地開始祈禱。他紅腫的雙眼里噙著眼淚。

庇護十一世躺在那張簡易鐵床上，生命力迅速地枯竭下去，很快就咽下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氣息。天主沒能允諾他最后的請求。明天，主教們晉見他的地點將不再是圣彼得大教堂，而是近旁的西斯廷教堂。2月10日的下午，他枯槁的遺體擺在西斯廷教堂高高的平臺上。那些曾在他全盛時期見過其風采的人，現在已經無法辨認他的遺體，仿佛躺在米開朗基羅穹頂畫下、身穿教宗絲質白色教士服、頭戴紅絨帽的，是其他什么人。

臺伯河對岸，墨索里尼聽到教宗死訊時，吐出一聲安慰的嘆息，不過他也非常不愿意讓教宗的守靈儀式干擾他和克拉拉·佩塔奇的下一次幽會，這位擁有碧綠眼眸的年輕女子乃是他的情婦。不過除此之外還有最后一件要緊事。多年以來，他在梵蒂岡安插了一個無孔不入的密探網絡，并且密切地關注他們提供的報告。近幾天來，他們提醒他說，教宗準備要做一場極具煽動性的周年演講以譴責墨索里尼的反猶運動以及他和德國元首愈發緊密的關系。他擔心，如果這份講稿現在泄露出去，仍將有可能對自己造成傷害，這將是教宗來自墳墓的控訴。

獨裁者思索著，還有一個人能夠幫得上忙。他聯系了帕切利樞機，身為教宗名譽侍從的他如今將負責處理庇護遺留下來的一切事務，包括堆積在他書桌上的手寫文件，以及剛剛印刷出來、準備發放給各位主教的那疊演講稿小冊子。墨索里尼要把所有的演講稿都銷毀掉。

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帕切利會順從他。帕切利生于羅馬一個顯赫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和歷任教宗有著密切的聯系，在過去幾個月里，他一直都活得膽戰心驚，害怕教宗會與墨索里尼為敵。他思索著，這狀況真是危機四伏，不確定的因素實在是太多了。是的，他虧欠教宗很多，教宗將他提拔至國務卿的位置，在很多方面都幫助過他，但他感覺自己肩負著更大的責任，他要保護教會。于是他下令清理教宗的書桌，把所有演講稿小冊子都收繳起來。

三天后，大批民眾在圣彼得廣場不耐煩地等候著，而樞機們則在進行教宗選舉會議。當使徒宮飄出一道白色的煙霧時，人群中爆發出歡呼聲。樞機執事站在高居圣彼得教堂大門上方的陽臺上宣布：“教宗誕生（Habemus papam）。”很快，一位高大瘦削、戴著眼鏡、身著教宗白長袍、頭戴鑲滿寶石的三重冕的人物，大步流星地走了出來，降福眾人。歐金尼奧·帕切利取名號為庇護十二世，以此向那個他近來陪侍床邊、為之抹淚的人致敬。

# 第一部分 教宗與獨裁者

## 第一章 新任教宗

梵蒂岡城門外聚集著一小群人，他們向駛來的黑色轎車鼓掌示意，直到它們緩慢地駛進中世紀的城墻。為表回應或致意，又或是習慣使然，每一位抵達的樞機都在轎車后排揮手祝福眾人。城門兩旁各站著一位衣著猶如小丑的瑞士侍衛兵（Swiss Guards），他們將戴著白手套的手掌舉到閃亮的頭盔處，向樞機致敬。沒過多久，當最后一位樞機抵達使徒宮時，六位官員小跑著穿過狹長陰冷的大廳，每個人手里都搖著一枚鈴鐺，一個聲音喊著：“閑雜人等速速離開（Extra omnes）！”直到所有無關人員都離開教堂。教宗選舉會議的典禮官是來自基吉家族的親王，他手里攥著一串巨大的古舊鑰匙，從門外鎖住了沉重的大門。身為教宗名譽侍從的彼得羅·加斯帕里樞機則從里面把門鎖上。窗戶也一扇扇緊閉起來。這一天是1922年2月2日，周四。直到新任教宗誕生，大門才會重新打開。

\* \* \* \* \*

教宗本篤十五世開始久咳不止，不過是兩周前的事情。盡管教宗個頭不高、身體虛弱，從小走路就有點跛（梵蒂岡的閑話中他被喊作“小矮子”），但他并不顯老，而且在他端坐圣彼得寶座的七年間，身體一直都很健康。然而一開始的支氣管炎很快就惡化成肺結核，六十八歲的本篤接受了臨終圣禮，第二天下午，躺在簡易鐵床上的他失去了意識。次日上午，他與世長辭。  [[1]](#_1__Salvatorelli_1939__p__9__Piz)

當為人和藹可親、反對現代主義的庇護十世在1914年過世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打響，而彼時的賈科莫·德拉·基耶薩是個不太尋常的教宗人選。因為在五十二位樞機共聚梵蒂岡推舉教宗繼任人的時候，德拉·基耶薩才當了三個月的樞機。他出身貴族，家庭卻一點都不富裕，他極高的天資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受到人們的尊敬，但他的外表和教宗的形象相去甚遠。盡管儀態雍容、舉止文雅，但他身材矮小、膚色灰黃，一頭烏黑濃密的頭發，牙齒還翹露出來。從鼻子、嘴巴、眼睛到肩膀，他外形的方方面面都顯得有點扭曲。  [[2]](#_2__Pollard_1999__p__16__Mei_Guo)

當德拉·基耶薩還是一位年輕的神父時，他曾供職于梵蒂岡國務院，這個機構負責處理教宗與世界各國政府的關系。他在國務院里逐步高升，并于1913年被派往博洛尼亞擔任大主教。

有些人認為，德拉·基耶薩之所以被調離梵蒂岡，是拉斐爾·梅里·德爾瓦爾（Rafael Merry del Val）樞機在從中作梗。他是庇護十世的國務卿，也是教宗在教士中鏟除一切“現代主義”跡象的得力助手。庇護十世擔心現代主義觀念會取代教會傳承數百年的教義。在他看來，最為道德淪喪的莫過于個人權利和宗教自由的信念，此外還有一些異端邪說非常可憎，比如政教分離，比如信仰應當與科學達成妥協。梅里·德爾瓦爾認為德拉·基耶薩為人過于溫和，就想要遠遠地將他排擠到教會權力的寶座之外。  [[3]](#_3__ASV__AESS__pos__515__fasc__5)

在第十輪投票中，德拉·基耶薩勉強達到了當選教宗所需的三分之二票數。梅里·德爾瓦爾陣線的一位強硬分子，加埃塔諾·德·拉伊（Gaetano De Lai）樞機試圖羞辱新任教宗，要求檢查他的選票，看看德拉·基耶薩有沒有投給自己。

庇護十世過世時，意大利已然人人自危，可當他的繼任者在1922年過世時，意大利則陷入了更為深重的動蕩之中。許多人害怕革命隨時會爆發，盡管在點燃革命的是社會黨人還是法西斯黨人的問題上，他們可能存在分歧。精英階層原本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戰能夠將分裂無助的意大利人團結起來，將民眾緊密地團結在政府周圍，但是這兩個希望都落空了。意大利陣亡人數超過五十萬，傷員數目則更加龐大。這些復員的軍人卸甲還鄉，可是工作機會卻少得可憐。這個國家的政界領袖似已無力走出這場危機。

此時的社會黨經歷了長達幾十年的擴張期，他們希望借眾怒的東風，登上權力的寶座。工人們占領了都靈、米蘭和熱那亞的工廠。農業勞作者則發起了罷工，威脅到守舊的農村地主階級。僅僅在兩年前，也就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通過一場共產主義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統治，奪取了俄國的政權。受到蘇共榜樣的激勵，意大利的抗議者夢想未來有一天，工人和農民也會在意大利奪得統治地位。  [[4]](#_4__1919Nian_12Yue_1Ri__Zai_Xin)

然而社會黨人還需面對從自身分裂出來的武裝威脅。戰后不久，時年三十九歲、曾經位列意大利最杰出社會黨人的貝尼托·墨索里尼，發起了一項全新的法西斯運動。這項運動借重那些憤憤不平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開始在全國上下各個城市萌芽壯大。它最先招募的成員與墨索里尼本人類似，都是些左翼分子，而且跟他一樣敵視教會和教士。但墨索里尼很快就轉變方向，不再詆毀教士和那些發戰爭財的資本家，轉而譴責社會黨人是反對意大利參戰的罪人，此后流入的成員便都是極端的右翼分子。

在位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城市的總部，這些身著黑衫的法西斯分子鉆進車輛，橫掃鄉村，燒毀工會大廳、社會黨會議室以及左翼報紙的辦公場所。墨索里尼并不直接控制這些黑衫軍（Squadrismo），他們的行動受到地方法西斯頭目的指使。這些團體從1919年開始攻擊社會黨官員和活躍分子，對他們實施毆打，并把蓖麻油灌到他們的喉嚨里，這樣的暴力行徑在接下來的三年里愈演愈烈，無論是在規模上還是頻率上都不斷升級。黑衫軍喜歡用蓖麻油施虐，因為它不僅令受虐者惡心，還會導致無法控制的腹瀉，給受虐者帶來極端的羞辱。社會黨市長和市議員們都給嚇怕了，全都跑路了，令意大利的大片領土落入了法西斯惡棍的掌控之中。  [[5]](#_5__Fornari_1971__p__50)

這些“施虐暴行”還瞄準了意大利天主教政黨的成員。新成立的人民黨是意大利天主教徒試圖對政界施加影響的創舉。此外，梵蒂岡竟然喜聞意大利天主教政黨的創建，這本身也是一種新事態。多年以前，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Victor Emmanuel II）原本是意大利西北部撒丁王國的君主，首都定在都靈，1861年，當他吞并了意大利半島的多數領土后，他宣布意大利王國從此建國。那些憑借策動叛亂和武力征服打下的領土中，絕大多數是歷任教宗的領土，如今卻僅余羅馬及其腹地仍然歸屬于教宗國（Papal States）。1870年，意大利軍隊攻占羅馬，宣布意大利王國從此定都羅馬。庇護九世只得撤退到梵蒂岡，發誓除非教宗國能夠復國，否則他一輩子都不會踏出梵蒂岡城墻一步。

教宗將國王逐出教會，禁止天主教徒參與全國大選投票，也禁止他們去競選議員；他希望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重返羅馬，恢復教宗的統治地位。然而隨著19世紀漸漸步入尾聲，這一希望越來越渺茫，反倒是社會黨運動的急劇擴張，給教會帶來了新的威脅。從19世紀中期的庇護九世開始，歷任教宗都曾出言譴責社會主義。1891年，利奧十三世在其著名的《勞工通諭》（Rerum novarum ）中控訴社會黨人，認為他們“將窮人教唆出仇富心理”。他還言辭激烈地批評了他們廢除私有財產的提議。待到19、20世紀之交，梵蒂岡已然明確表態，社會主義乃是教會不共戴天的敵人。

20世紀初，當選舉權在意大利逐漸普及開來，梵蒂岡對于選舉投票的禁令變得愈發難以維系。除非教會采取實際行動，否則社會黨人很有可能就會上臺掌權。1918年11月，西西里神父路易吉·斯圖爾佐會見了梵蒂岡國務卿彼得羅·加斯帕里樞機，同他討論籌備天主教政黨的計劃。他們把這個政黨稱作意大利人民黨，它要跟社會黨人拼搶農民和工人，給他們一個能夠不斷得到進步的平臺。第二年初，在本篤十五世的降福下，政黨正式成立。待到1922年，它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政黨之一。  [[6]](#_6__Tiao_Jian_Shi_Gai_Dang_Xu_Xi)

\* \* \* \* \*

1922年的教宗選舉會議變成了兩大派系間的一決雌雄。一派樞機拒絕同現代社會妥協，因而號稱“狂熱派”（zelanti）。他們對庇護十世的年代懷有鄉愁，希望教會能夠重拾對現代之惡的征戰。另一派則較為溫和，他們號稱“政治家派”（politicians），希望能夠繼續本篤十五世相對中庸的路線，并且延續外向的政策。領導狂熱派的是庇護十世的國務卿拉斐爾·梅里·德爾瓦爾，而本篤十五世的國務卿彼得羅·加斯帕里則是溫和派的擁護者。教宗選舉會議逐漸變成一場史詩大戰，交戰的核心在于天主教會在20世紀應當采取什么樣的路線，而結果的不確定性更為這場大戰增添了不少戲劇性。雙方都很難獲得當選所需的三分之二選票，而且也沒有哪個候選人能夠令雙方達成妥協。  [[7]](#_7__Yi_Da_Li_Wai_Jiao_Bu_De_Dang)

加斯帕里樞機有時被稱作牧羊人（pecoraio），然而這個綽號并沒有宗教的意味。時年六十九歲的他出生于意大利中部亞平寧山脈的一個小村落，家里是實實在在的牧民。這個綽號在意大利語中包含鄉巴佬的含義，他自己倒是非常中意，因為這意味著，在那些梵蒂岡樞機團的老油條里，他是個冉冉升起的新貴。在他尚且年幼的時候，每個春天全家人都要跟隨羊群進山，然后在秋天返回山谷，每當這個時候，他們就會把彼得羅送到當地的教區神父那里修習課業。他非常聰明，后來進入教會的神學院深造，和梵蒂岡外交系統的其他官員不同，他沒有上過羅馬久負盛名的宗座外交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Noble Ecclesiastics），因為這所學校通常只招收貴族子嗣。

加斯帕里長大后成了一位又矮又胖的神父，挪動步履時雙足似乎從不離開地面。他的著裝“展現出對整潔的毫不在意”。然而他用和藹可親填補了儀表上的不足，并深受外交使節團的喜愛。他比劃起手勢時手舞足蹈，眼睛閃爍著光芒，常常笑得前俯后仰，需要用手把笑翻的紅色小瓜帽推回原位。無論在他自己眼里，還是在其他人眼里，加斯帕里有著山區牧民的精明、直覺、韌性和吃苦耐勞。“他那雙烏黑聰敏的眼睛，”一位觀察者記述道，“將他的巧智顯露無遺。”  [[8]](#_8__Hou_Yi_Tiao_Ping_Yu_Chu_Zi_B)

教宗選舉會議于2月2日晚上在西斯廷教堂開幕，五十三位樞機各有一張小桌和一個席位。兩位美國樞機仍舊航行在大西洋上，因而缺席了這場會議。三十一位意大利樞機占據了大半席位，因而只有得到意大利人的強烈支持，才有可能當選。教堂前廳的祭壇上立有一根巨大的十字架和六根燃燒的蠟燭。每次遞交選票的時候，樞機們就會依據資歷一個個向祭壇靠近。每一位都會跪在祭壇的底部位置，禱告上片刻，然后以拉丁文發誓，自己所投之人乃是他相信天主希望當選之人，之后把疊好的選票投入票箱，向十字架鞠躬，再退回到自己的席位上。

每天上午和下午各進行兩輪投票。通過抓鬮選出的三位樞機負責清點票數。在接下來的幾天里，這一莊重的儀式重復了十四次，只出過一次洋相，一位道明會樞機從椅子起身時不小心撞到了桌子，碰翻了一瓶墨水，弄臟了他白色的教士服。  [[9]](#_9__Aubert_2000__p__230_Ji_Yu_Me)

總共有十二位樞機獲得選票。第二天，梅里·德爾瓦爾達到他最高的十七票。加斯帕里則在第六輪獲得了二十四票，可這一票數在第七輪和第八輪都裹足不前。梵蒂岡城外，一大群既好奇又虔誠的羅馬人焦躁地等候著。“我們能夠確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法國報紙《費加羅報》（Le Figaro ）報道說，“那就是大家都對結果一無所知。”  [[10]](#_10__Vavasseur__Desperriers_1996)  第八輪投票后，加斯帕里樞機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他意識到自己這輩子都不可能成為教宗了。次日，在第三天的投票開始前，他前去拜訪了教宗選舉會議最年輕的成員阿契爾·拉蒂。拉蒂在幾個月前剛剛晉升樞機，而加斯帕里的一番話語令他十分驚訝，加斯帕里說，他會敦促他的支持者把票都投給拉蒂。

\* \* \* \* \*

1857年，在米蘭北部的布里安扎區（Brianza），拉蒂降生在代西奧（Desio）的一座小鎮上，當地有著很深的天主教信仰，他的父親在此地管理著一座絲綢廠。他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做事井井有條，令人望而生畏，經營家庭似乎有點大材小用。晚年的時候，拉蒂常常提起她，口吻中帶著深深的愛意和敬意，卻從來不曾談論自己的父親。代西奧和米蘭都下轄于奧匈帝國，而拉蒂最早的記憶，是他父親在他兩歲的時候曾告訴他，法國和撒丁王國的部隊正在附近同奧地利人作戰。  [[11]](#_11__Venini_2004__p__128)  幾周后，意大利半島長期分治的各個公國和王國悉數消失，變成了一個全新的意大利聯合王國。

由于代西奧當地沒有學校，阿契爾在十歲的時候被送到叔叔家生活，此人是一位教區神父，在科莫湖旁一座名喚阿索的小鎮上布道。他叔叔家算是個社交場所，近旁的神父們常常過來聚會，給這里帶來了特別溫馨的氛圍。這讓阿契爾決定以后也要成為一名神父，于是很快就前去神學院讀書。他每個夏天都要回到叔叔家，卻從來不回父母家。那所神學院的紀律嚴苛至極，學生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神父，規章制度必須一字一句得到遵守，然而這些都沒有令這位刻苦的男孩感到困擾。  [[12]](#_12__Chiron_2006__pp__20_25)  他的同學把他叫作“小老頭”，因為阿契爾寧愿獨自思索，也不愿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  [[13]](#_13__Puricelli_1996__pp__28__36)

1875年，阿契爾進入米蘭神學院，準備晉鐸。他的閱讀涉獵廣泛，不僅嗜好但丁等意大利經典作家之作，還閱讀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他關注吉姆（出自馬克·吐溫筆下，哈克貝利·費恩的黑奴伙伴）在人生中面臨的挑戰，他的同學因此把他叫作非洲人。盡管這個綽號并沒有流傳開來，但是阿契爾對它頗為自得，還告訴同學說，以后要前往非洲傳教。拉蒂最喜歡的是偉大的米蘭作家亞歷山德羅·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多年以后的一天，當他已經貴為教宗，他的典禮官來到他的書房，按照慣例雙膝跪下等待指示。教宗則在房間里來回踱步，沉醉地念誦著曼佐尼小說《約婚夫婦》（The Betrothed ）中的一個段落。過了二十分鐘，直到停下來時，他才注意到這位雙膝跪地的下屬。教宗為自己的耽誤而致歉，不過微笑著補充道：“蒙席，這些文字難道不值得跪地聆聽么！”  [[14]](#_14__Aradi_1958__p__43__Jiao_Zon)

在米蘭求學四年之后，拉蒂奔赴羅馬，在剛剛建校的倫巴第神學院繼續他的學業。羅馬被歷任教宗統治了一千多年，然而九年前，它卻被攻陷了，如今成了新建的意大利聯合王國的都城。

拉蒂身高五英尺八英寸  [[15]](#_15__Yue_Deng_Yu_1_73Mi_______Ch)  ，胸膛寬闊，一頭金發越來越稀疏，此時的他已經戴上了標志性的圓框眼鏡，看起來像是一位青年學者。1879年11月，他在羅馬恢宏的拉特蘭圣約翰大教堂晉鐸，然后又在這座不朽之城待了三年，繼續在宗座額我略大學進修，這里的耶穌會教師用拉丁文授課。

1882年，拉蒂回到米蘭，很快被任命為米蘭大修院圣語與神學教師。盡管帶有圣語的頭銜，他本人卻沒有很好的口才。他決心要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到無比清晰的程度，所以講話速度非常緩慢，總是奮力尋找著恰切的詞語；每當他覺得自己說得不對時，就常常自我糾正。  [[16]](#_16__Aradi_1958__pp__65_66)  他從來都不愛好社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拉蒂待在書堆里要比待在人堆里顯得更為自在。執教六年后，他在米蘭安波羅修圖書館謀得館員一職，這座圖書館在古董手稿收藏方面無可匹敵，藏品中珍寶甚多，其中就包括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大西洋古抄本》（Codice atlantico ）。他不僅懂得拉丁語，還掌握了希臘語、法語和德語。

然而拉蒂絕不僅僅是個書呆子。作為一位米蘭小伙，他還發展出登山的愛好，并且加入了意大利阿爾卑斯俱樂部設在當地的分部。每到冬天，他就會同登山伙伴（一位神父同儕）一起研究登山材料，探索登山路徑，以便第二年夏天能夠予以攀登。他堅信成功完全可以通過細致的規劃達成。從1885年到1911年，他攀登阿爾卑斯山脈達一百次，每次跋涉超過八千英尺。  [[17]](#_17__Zai_Ta_Dang_Xuan_Jiao_Zong)  冷空氣的沖擊、阿爾卑斯山脈懸崖的力度以及一覽眾山小的風景，都向他展現了天主造物的榮耀。  [[18]](#_18__Fa_Guo_Zhu_Sheng_Zuo_Da_Shi)

\* \* \* \* \*

安波羅修圖書館館長于1907年過世，五十歲的拉蒂接替了他的崗位。四年后，梵蒂岡圖書館館長決心要尋找一位繼任者。由于阿契爾·拉蒂領導的安波羅修圖書館在聲譽上僅次于梵蒂岡圖書館，所以他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人選。米蘭報紙在報道這一委任新聞時配了一幅照片，照片里的高級教士頭發正漸漸稀疏，然而拉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貌特征仍然是他那副小小的圓框眼鏡。這些特征令他顯得嚴肅（有些人會說是憂郁），讓他看起來像是一位陰沉的教會學者，然而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卻體會到他慈父般的關懷。為了幫助館員，令他們的家人不至挨餓，他得到本篤十五世的許可，在梵蒂岡圖書館辟出一片菜園供他們耕種。而每當有人生病時，他都會親自送去糖果禮物，或是一瓶好酒。  [[19]](#_19__Tisserant_1939__pp__393_394)

拉蒂原以為自己會在梵蒂岡圖書館的職位上退休，要真是如此，那他也就不會在1922年成為教宗了。然而在1918年3月，他卻收到了一份出人意料的委任：本篤十五世命他以教宗大使的身份奔赴華沙。我們現在還不清楚教宗為什么要選擇他來完成這項棘手的任務。他沒有外交經驗，對波蘭也談不上任何獨到的見解，不過奇怪的是，當非常教務部的樞機談論他的任命時，他們都錯以為他懂波蘭語。  [[20]](#_20__Duo_Mei_Ni_Ke__Ta_Er_Di_Ni)  拉蒂時年六十一歲，對自己的新使命感到非常焦躁，但他順從了教宗的命令，并在5月出發。他錯以為自己的出使使命只有短短幾個月，他還錯以為自己的任務不過是準備好材料，向教宗報告波蘭的處境。

當拉蒂抵達華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屠戮才剛剛結束。波蘭人正在籌備國家的獨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波蘭的多數領土受到俄國人的統治，余下領土則落入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的掌控之中。拉蒂的使命非常棘手，因為新波蘭的國界還沒有確定下來，各方都劍拔弩張。

在波蘭境內四處游歷時，這位梵蒂岡圖書館館長最常聽聞的便是當地教士對猶太人的仇恨情緒，將他們視作波蘭天主教的敵人。意大利人口中猶太人的比例非常低，只有千分之一，而波蘭人口中的猶太人卻占到了十分之一。早在十年前，拉蒂曾向米蘭的首席拉比（rabbi）學習希伯來語，而他也從未關心過那些基本上被這座城市同化的猶太人口。  [[21]](#_21__Lazzarini_1937__pp__35_36)  可是當他和米蘭的猶太群體變得越來越熟絡時，他意識到梵蒂岡實際上對猶太人抱有相當負面的看法。

天主教將猶太人妖魔化的歷史非常悠長，可以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源頭，那時候它仍然是猶太人的一個教派。1555年，教宗保祿四世頒布一紙教宗詔書《因為如此荒謬》（Cum nimis absurdum ），命令但凡他國土上的猶太人都必須生活在猶太人區（ghetto）。猶太人和基督教徒的聯絡須受到嚴格的限制，而且他們只能從事最低微的職業。教宗認為，猶太人謀害耶穌，拒絕他的教誨，因而應受到天主的懲罰，“永世為奴”。直到1870年，意大利人攻陷羅馬，才將猶太人從這座城市的猶太人區徹底解放出來。  [[22]](#_22__Wo_Zai_Kertzer_2001Li_Jiang)

在19世紀的最后二十載，受到梵蒂岡密切審查的耶穌會半月刊《公教文明》對猶太人展開了無情的譴責。這份刊物的讀者并非廣大天主教徒，它的格調要遠遠高過他們；它實際上是一個上層窗口，讀者群體乃是天主教意見領袖、報紙編輯以及高級教士，方便他們了解梵蒂岡對于各種時事的看法。如果一個人像阿契爾·拉蒂那樣，擔任過安波羅修圖書館館長，那么他就會及時地閱讀每期刊物。

“猶太人，”這份刊物的一篇檄文這樣寫道，“是永遠粗野的孩子，他們頑固、骯臟，全都是些盜賊、騙子、無知的蠢人，對周邊遠近的人來說簡直是害蟲和災禍……他們想方設法染指……所有公共財產……他們不僅會控制所有的金錢……一旦允許他們擔任公職，他們還會掌控國家的法律。”這份接受梵蒂岡審查的雜志堅稱，教會長久以來都教導基督徒要遠離那些猶太人，否則他們就會令基督徒淪為他們的奴隸：“那些認為猶太教不過是一門宗教的人，錯得多么離譜，受到了多大的欺瞞……它實際上是一個種族、一類人民乃至一個民族！”《公教文明》控訴道，猶太人是道德敗壞的異族，他們永遠都不會向居住的國家效忠，而只會利用他人的慷慨。那些人也真夠蠢的，竟然把同等的權利賦予猶太人。  [[23]](#_23__CC_1880_IV__pp__108_112)  在拉蒂當選教宗幾個月后，這份刊物又向猶太人發起進攻，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不僅把俄國革命怪罪到猶太人頭上，還警告讀者，猶太人已經布下密謀的天羅地網，志在統治整個世界。  [[24]](#_24____You_Tai_Ren_De_Quan_Qiu_G)

浸淫在一個對猶太人抱有如此成見的教會里，拉蒂在波蘭遭遇的深入骨髓的反猶主義必然會對他造成影響。波蘭天主教精英階層遞交給他的書面報告都在向他訴說，他們對猶太人的威脅有多么憂心忡忡。他們控訴猶太人在最近一次戰爭中和德國入侵者茍合，而且在全國上下的鄉鎮里化身為貪得無厭的放貸人。他們還將傳播布爾什維克運動的罪狀蓋在了猶太人頭上，這尤其令拉蒂感到震驚。  [[25]](#_25__Morozzo_della_Rocca_1996__p)  1918年10月，他將波蘭最近的動亂歸結給“那些決心引發騷亂的極端政黨：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者、布爾什維克黨人……以及猶太人”  [[26]](#_26__ASV__ANI__b__192__6__534r_5)  。當時的波蘭發生了一系列有組織的屠殺慘案，許多猶太人遇難，他們的家被焚毀。本篤十五世（相較于他的前任而言，對反猶陰謀論不那么贊同）向他求證這些屠殺慘案是否確有其事，拉蒂回答說事件真相難以判斷。不過他堅稱猶太人是一個危險因素：盡管波蘭人民都是善良忠誠的天主教徒，可是他擔心“邪惡影響正布下陷阱，威脅著他們，甚至有可能將他們攝住”。這些敵人到底是誰，拉蒂一點都不含糊，他補充道：“這里最邪惡、最強大的影響之一，恐怕就是最強大、最邪惡的影響，正是來自猶太人。”  [[27]](#_27__A_Qi_Er__La_Di_Zhi_Bi_De_Lu)

1919年秋，梵蒂岡對新成立的波蘭予以官方認可。拉蒂的使命繼續延續，并被任命為教宗駐波蘭大使。第二年夏天，紅軍在波羅的海和烏克蘭同波蘭部隊多次交鋒之后，進軍波蘭，直搗華沙。男人、女人和小孩都武裝起來，準備保衛他們的城市。很多外國人都遁走了，然而拉蒂卻要鎮守此地。8月15日，全副武裝的居民們焦慮地等候著，波蘭的反擊總算擊退了布爾什維克部隊。對拉蒂來說，這次經歷是一種創傷。西方民主國家都沒有認真體會共產主義的威脅，在他的余生里，他將一直秉持這份信念。  [[28]](#_28__Pizzuti_1992__p__110__Chiro)

1921年，本篤十五世將拉蒂召回到意大利，并將他晉升為米蘭大主教。拉蒂大半輩子都待在圖書館里，幾乎沒有擔任教士的經驗，所以教宗的這個選擇非常出人意料，然而拉蒂的能力、對教會的無私奉獻以及他的大公無私似乎感染了本篤。  [[29]](#_29__Le_Wei_Lan__1996__p__8_Xie)  而拉蒂的大半生都生活在米蘭，毫無疑問，這肯定也對任命起到了作用。這一任命之后，樞機之冠也隨之而來，對于意大利這塊最龐大、最富庶的大主教管區而言，這一榮耀乃是慣例使然。  [[30]](#_30__La_Di_Li_Kai_Bo_Lan__Fan_Hu)

\* \* \* \* \*

在教宗選舉會議中途，狂熱派意識到，無論是梅里·德爾瓦爾，還是他們其他的候選人都不可能當選了，于是他們也決定同阿契爾·拉蒂進行秘密會談。他們的想法似乎是，拉蒂跟兩方派系都不沾邊，有可能成為折中的人選。他們還認為，拉蒂是教會高層中資歷比較淺的一位，尤其是如果他把自己當選的功勞歸到他們頭上時，他們就能輕易對他施加影響。德·拉伊樞機是梵蒂岡負責遴選主教的圣會負責人，他代表他那個團體的十二位樞機，帶著這項提議去找了拉蒂。



阿契爾·拉蒂，米蘭大主教，1921年

“我們會把票投給閣下，”德·拉伊告訴他說，“只要閣下答應您不將加斯帕里樞機任命為您的國務卿。”

“我希望并為此祈禱，”拉蒂回答說，“圣靈能夠在這么多實至名歸的樞機中選擇其他人。”不過他補充道：“如果它選擇了我，那么我確實會將加斯帕里樞機任命為我的國務卿。”  [[31]](#_31__Jia_Si_Pa_Li_Dui_Yu_Zhe_Dua)  我們并不清楚拉蒂是否已經對加斯帕里做出承諾，不過這種可能性很高。由于他在梵蒂岡的事務上缺乏經驗，他可能無論如何都要把這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官留在身邊。或者他可能遠比他們想象的明智，明白這位國務卿具有很大的價值，能夠幫他推擋狂熱派的要求。

“閣下有可能犯下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德·拉伊樞機警告道。

“如果我坐上圣彼得寶座的話，那肯定不會是我犯下的唯一一個錯誤，但必將是第一個。”

待到第十二輪投票，也即第三天的最后一輪投票時，有二十七位樞機將他們贊同的一票投給了米蘭大主教。  [[32]](#_32__Pizzuti_1992__pp__12_13)  第二天一早，樞機們再度聚集在西斯廷教堂。上午10點鐘，他們開始投出第十三輪選票，最后同樣沒有取得有效結果。而在下一輪投票中，阿契爾·拉蒂獲得的票數將會超過三分之二的基準線。

這位不知所措的樞機筆直地坐在座椅上，頭向下斜，仿佛肩膀上承擔了新的重量，其他五十二位樞機圍成一圈將他包圍在中心。樞機執事開口問出了那個必要的問題，他的聲音洪亮，即便是耳朵再背的人也能夠聽清：“選舉依據教規，將你選為至高教宗，你是否接受這一結果？”拉蒂沒有馬上回答，個別樞機開始緊張起來。過去整整兩分鐘，他才抬起頭，用拉丁語做出回答。他的聲音因情緒激動而顫動著：“我深刻地意識到自己和這一高位并不相稱。”樞機們明白新任教宗已然誕生。  [[33]](#_33__Bu_Tong_De_Zi_Liao_Lai_Yuan)

隨著教宗選舉塵埃落定，一輛從那不勒斯駛來的火車停在了臺伯河對岸的羅馬火車站。兩位美國樞機，即波士頓的威廉·奧康奈爾（William O’Connell）以及費城的丹尼斯·多爾蒂（Dennis Dougherty）從火車上走了下來。他們乘坐“伍德羅·威爾遜號”遠渡重洋，又從那不勒斯匆忙趕到羅馬，卻發現自己已經來遲了，這令他們非常不快。奧康奈爾的不悅有其特殊的緣由，他一路晉升至樞機，很大程度上有賴梅里·德爾瓦爾的提攜。如果他能夠及時到場，將他和多爾蒂的選票投給他，那么結局也許會大為不同。更令他怒火中燒的是，同樣的事情在七年半前庇護十世過世時已經發生過一次：他們根本不給美國人足夠的時間趕來羅馬。那一次也是直到新任教宗已經選舉出來，奧康奈爾才抵達羅馬。  [[34]](#_34__Fogarty_1996__p__549__You_Y)

拉蒂被護送著從西斯廷教堂來到了近旁的更衣室，他在那里第一次穿上了教宗的白色長袍。更衣室里一共備有三件長袍，一件小號、一件中號、一件大號，足以應對任何選舉結果。中號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適。他現在穿著一件白色的教士服、一雙絲質的白色長襪，腳穿紅色絲質拖鞋，肩披紅色絨布披風，邊上鑲著白鼬皮。他在白色小瓜帽上還戴著一頂紅絨帽，下邊沿是教宗特有的白鼬皮邊，一直蓋到耳朵的位置。當他回到西斯廷教堂，走向祭壇前面的寶座時，樞機們紛紛雙膝跪地，隨后每個人都走上前去，親吻他的足，懇求他的降福。那個曾經熱愛漫步群山的人，如果要遵從四位先人的慣例，那么他就永遠都不會離開梵蒂岡這座令人感到逼仄的圍城。  [[35]](#_35__Aubert_2000__p__200)

全世界都在密切關注，到底誰會從選舉會議中脫穎而出。意大利的四千萬人口中99%都是天主教徒，他們的關注最為密切，不過意大利境外的兩億六千萬羅馬天主教徒也同樣企盼著最終消息的到來。  [[36]](#_36__Ben_Du_Shi_Wu_Shi_Huan_Bing)

自從教宗選舉會議開始，人群便在圣彼得廣場等候，他們眼睛盯著煙囪，那里出現的煙是用選票燒出來的，它會告訴民眾教宗何時誕生。  [[37]](#_37__Na_Xie_Yu_2Yue_5Ri__Bi_Hu_S)  在那四天里，煙囪噴出了十三次黑煙，在第四天臨近中午的時候，當落雨的天空下復又積著潮濕的云時，幾只手臂開始指向使徒宮里飄蕩出來的一縷白煙。五十四分鐘后，一位樞機出現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央陽臺，面朝廣場，緩緩地舉起了他的右臂：“教宗誕生。”阿契爾·拉蒂自號庇護十一世，他解釋說這是因為庇護九世是他年輕時的教宗，而庇護十世將他召來羅馬，擔任梵蒂岡圖書館館長。  [[38]](#_38__Aradi_1958__p__128)  幾年之前，這位只負責領導幾位圖書館館員的人，如今肩負起引領全球三億天主教徒的責任。

歡呼的人群開始擠向圣彼得大教堂的大門。自從1879年意大利部隊攻占羅馬，而教宗們開始自稱“梵蒂岡囚徒”起，就再也沒有哪位教宗向外界展示過他的面容，哪怕只是通過面向圣彼得廣場的那幾扇窗戶。自從庇護九世過世后，三位當選的教宗都在教堂里面降福信徒。

可是這一次，人們被一件不尋常的事情攝住了目光。圣彼得教堂中央巨門正上方的陽臺出現了幾位貴族衛兵（Noble Guards），他們面朝廣場，將縫有教宗牧徽的紅色掛毯懸掛到陽臺的扶手上。當身穿白袍的教宗出現在陽臺上降福眾人時，龐大的廣場上彌漫著一片肅穆，人們紛紛跪倒在地。沒有人會忘記那些意大利士兵的身影，當時他們被安置在廣場上維持秩序，也站在教宗的瑞士侍衛隊旁舉槍致敬。所有人一同向教宗敬禮。  [[39]](#_39__Dao_Di_La_Di_Shi_Zi_Xing_Ju)  在這座愈發被恐慌攝住的城市里，這是少有的一個平和時刻。是時，暴力和混亂彌漫全國，政府陷入癱瘓。在這一年結束之前，教宗將面臨一個抉擇，他的決定將具有無比重大的意義。

[[1]](#filepos44827) Salvatorelli 1939, p. 9; Pizzuti 1992, p. 99; Pollard 1999, p. 14.

[[2]](#filepos45661) Pollard 1999, p. 16. 美國記者安妮·麥考密克（1957，p. 17）對于教宗德拉·基耶薩也有類似的觀察：“本篤十五世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反派教宗，他的位高權重更令他顯得矮小，而戰火紛飛的時勢則將他壓得死死的。曾有人在梵蒂岡見他參與公共儀式，頭上的三重冕令他萎靡不堪，莊嚴的刺繡長袍令他更顯消瘦，他顯然是不堪自身威嚴的重負。”

[[3]](#filepos46733) ASV, AESS, pos. 515, fasc. 529, ff. 59r–94r.

[[4]](#filepos48424) 1919年12月1日，在新一輪議會的第一場會議上，當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致開幕詞時，社會黨代表起身走出會議室，高喊“社會主義共和國萬歲！”Milza 2000, pp. 284–285.

[[5]](#filepos50100) Fornari 1971, p. 50.

[[6]](#filepos52595) 條件是該黨須向公眾明示，梵蒂岡并未介入該黨的管理。有關卡洛·斯福爾扎對這場會面的描述，見Scoppola 1976, pp.22–23。另見De Rosa 1958; De Rosa 1959; Molony 1977。斯圖爾佐在他的余生里，每逢本篤十五世的忌日，都會為了紀念他而舉行彌撒。Pollard 1999, pp. 172–174.

[[7]](#filepos53706) 意大利外交部的檔案中包含一個文件夾，里面裝有許多加密電報，發自世界各地的大使館，報告各國樞機的投票意向。其中包含許多個名字。ASMAE, APIN, b. 1268.

[[8]](#filepos55370) 后一條評語出自比利時大使。Beyens 1934, pp. 102–103. 而有關加斯帕里不在意著裝的評語則出自英國大使亞歷克·蘭德爾爵士，轉引自Pollard 1999, p. 70。我對加斯帕里的描述參考了后來英國大使的報告，出自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 1935, R 402/402/22, in Hachey 1972, pp. 15, 285–287, sections 126–136, and Roberti 1960, pp. 6–7; Morgan 1944, pp. 15, 136–137; and De Vecchi 1983, p. 143。

[[9]](#filepos56585) Aubert 2000, p. 230[基于梅爾切爾（Mercier）樞機的日記]；Lazzarini 1937, pp. 160–161; Beyens 1934, pp. 83–84。

[[10]](#filepos57179) Vavasseur- Desperriers 1996, p. 141.

[[11]](#filepos58438) Venini 2004, p. 128.

[[12]](#filepos59344) Chiron 2006, pp. 20–25.

[[13]](#filepos59576) Puricelli 1996, pp. 28, 36; Durand 2010, p. 4; Aradi 1958, p. 21.

[[14]](#filepos60750) Aradi 1958, p. 43. 教宗深信，終有一天，曼佐尼會受到認可，成為像但丁一樣偉大的作家；Venini 2004, p. 181。

[[15]](#filepos61205) 約等于1.73米。——除特殊說明外，本書腳注均為譯注

[[16]](#filepos62043) Aradi 1958, pp. 65–66.

[[17]](#filepos63111) 在他當選教宗之后，阿爾卑斯俱樂部將他一系列登山見聞編纂成一本小冊子（Ratti 1923）。1923年2月，這本小冊子的英文版分三期刊登在《大西洋憲法報》上，題為《登山家神父》（3月4日、11日、18日）。拉扎里尼（1937, pp. 69–71）給出了一份他的登山詳單。

[[18]](#filepos63355) 法國駐圣座大使弗朗索瓦·夏爾——魯（1947, pp.21–22）報告說，拉蒂教宗在和他對話時提過他攀登阿爾卑斯的過往。

[[19]](#filepos64482) Tisserant 1939, pp. 393–394; Chiron 2006, p. 86.

[[20]](#filepos65148) 多梅尼科·塔爾迪尼曾寫信給孔法洛涅里，談及他關于庇護十一世的回憶錄的出版工作，并在信中提及這一誤解。Confalonieri 1993, p. 276.

[[21]](#filepos66407) Lazzarini 1937, pp. 35–36

[[22]](#filepos67353) 我在Kertzer 2001里講過這個故事。

[[23]](#filepos68985) CC 1880 IV, pp. 108–112.

[[24]](#filepos69343) 《猶太人的全球革命》，CC 1922 IV, pp. 111–121;《猶太—共濟會的社會主義運動要統治奧地利》，CC 1922 IV, pp. 369–371。

[[25]](#filepos70006) Morozzo della Rocca 1996, p. 108; 另見Kertzer 2004, pp. 247–249。

[[26]](#filepos70295) ASV, ANI, b. 192, 6. 534r–538r, Achille Ratti a Pietro Gasparri, 24 ottobre 1918.

[[27]](#filepos71091) 阿契爾·拉蒂致彼得羅·加斯帕里的信，1919年1月9日，載Wilk 1997, pp. 3:250–261。就拉蒂出使波蘭時對猶太人的看法，可在下文中找到更為全面的描述：Kertzer 2004, pp.245–262.

[[28]](#filepos71899) Pizzuti 1992, p. 110; Chiron 2006, pp. 111–112.

[[29]](#filepos72359) 勒維蘭（1996, p. 8）寫道：“拉蒂先生晉升至圣安波羅修主教教座，乃是羅馬對整個動亂大環境的一種反饋。”

[[30]](#filepos72723) 拉蒂離開波蘭，返回羅馬，究竟有著怎樣的背景故事，可在如下文獻中找到更為全面的描述：Morozzo della Rocco 1996。加斯帕里本人對這起事件有過描述，并留下了一份打印稿，收于ASV, AESS, pos. 515, fasc. 530, 6. 35r–36r。關于拉蒂在波蘭的履歷，如下文獻頗為詳細，參見Pease 2009, chap. 2。

[[31]](#filepos74245) 加斯帕里對于這段對話的回憶，收于Spadolini 1972, pp. 259–260。加斯帕里寫道，告訴他這件事情的正是拉蒂教宗本人。

[[32]](#filepos75157) Pizzuti 1992, pp. 12–13.

[[33]](#filepos76202) 不同的資料來源對于投票的輪數給出了不同的數字。我使用的是目前最完整的版本，收于Aradi 1958, p. 127。據說拉蒂當選，背后有加斯帕里在起作用，這方面的論述參見Falconi 1967, pp. 152–154。法爾科尼以及其他資料還詳細記載了狂熱派將原本投給梅里·德爾瓦爾的選票，轉投給守舊的威尼斯大主教彼得羅·拉封丹（Pietro La Fontaine），他在第十一輪投票中獲得了二十四票，而拉蒂則獲得了二十五票。梅爾切爾樞機當天的日記也提供了有用的信息，收于Aubert 2000, and Lazzarini 1937, pp. 160–163。

[[34]](#filepos77259) Fogarty 1996, p. 549. 由于這次的教訓，庇護十一世更改了主持教宗選舉會議的規則，給予歐洲之外的樞機更多時間趕來參加會議，當他在1939年過世時，這些主教也確實享受了這一待遇。

[[35]](#filepos78273) Aubert 2000, p. 200.

[[36]](#filepos78678) 本篤十五世患病的消息在天主教界引發了廣泛的擔憂。在紐約城，在天主教區學校里上學的96000個孩子都在1月20日被帶去當地的教堂，為本篤的健康祈禱。許多人在迅速康復的禱告之外還加上了一段“或者蒙受恩典，在幸福中死去”，這一情況表明他們對教宗的病情并不是很樂觀。《96,803個孩子為教宗祈禱》，NYT, January 21, 1922, p. 1。第二天，教宗逝世的消息就傳到了正在開會的德國國會主席耳中，議程中斷，全體成員起立，主席則即興發表了一番悼詞。《國會主席悼念教宗》，NYT, January 22, 1922, p. 2。

[[37]](#filepos79005) 那些于2月5日（庇護十一世當選前一天）在圣彼得廣場守候白煙的人群中就有貝尼托·墨索里尼。Gentile 2010, p. 95.

[[38]](#filepos79644) Aradi 1958, p. 128.

[[39]](#filepos80862) 到底拉蒂是自行決定來到陽臺上將首次祝福施予信徒，抑或這一行動出自更通世故的加斯帕里樞機之建言，這一問題尚存爭議。博洛尼亞大主教馬里奧·納薩利·羅卡樞機認為這是加斯帕里的主意（Chiron 2006 , P.138n），然而孔法洛涅里（1957,P.24)堅持認為這是拉蒂自己的主意。這些事件的描述收于Aradi 1985 , P146-147,and cc 1922 1, pp.371-372。

## 第二章 進軍羅馬

貝尼托·墨索里尼生于普雷達皮奧（Predappio），這個小鎮位于羅馬涅（Romagna），與阿契爾·拉蒂位于倫巴第大區的家鄉相隔不到兩百英里，然而他們的童年經歷卻有著天壤之別。差別并不體現在拉蒂的家境更為優渥，而是這家人保守而又虔誠，另一家人則浸淫在羅馬涅暴動的氛圍之中。拉蒂家族崇拜圣人和教宗，墨索里尼的家人卻崇拜煽動暴民的政客和革命分子。

當墨索里尼于1883年出生時，阿契爾·拉蒂已是一位二十六歲的神父。羅馬涅是意大利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而貝尼托的父親亞歷山德羅·墨索里尼（Alessandro Mussolini）則是個話多的鐵匠，總是熱情地向旁人抒發他的革命信仰。他用貝尼托·胡亞雷斯（Benito Juárez）的名字給自己的孩子命名，出身貧寒的胡亞雷斯是第一位擔任墨西哥總統的印第安人，他是歐洲殖民者的夢魘，也是教會的敵人。他還用布雷西亞的阿納爾多（Arnaldo of Brescia）給貝尼托的弟弟命名，布雷西亞的阿納爾多是一位神父，1146年，他領導起義將教宗趕出羅馬，后來被處以絞刑。兩位男孩吃苦耐勞的母親羅莎（Rosa Mussolini）則沒有丈夫那份革命熱忱，她是個虔誠的教徒，在當地小學教書育人。每天晚上，當兩個孩子躺下睡覺時，她都會在他們的頭上劃一個十字。  [[1]](#_1__E__Mussolini_1957__p__135)

墨索里尼一家住在一棟三層高的住宅里，他們的公寓只有兩個房間。貝尼托和阿納爾多睡在廚房里，父親給他們打了一張鐵床，上面鋪了一大袋谷殼。父親、母親和姐姐埃德維杰（Edvige Mussolini）則睡在另一個房間。要進入這間公寓，他們必須先穿過母親的教室，它占據了這層樓的余下空間。

亞歷山德羅和羅莎的婚姻爭吵不斷。亞歷山德羅不僅有外遇，晚上還常常在當地酒吧醉酒后回家，同他的妻子斗氣打架。不過她總算是吵贏了一次，隨后就把十歲的貝尼托送到鄰近由慈幼會修士主持的寄宿學校上學，但他沒有在那里待上多久。在與同學的一次口角中，貝尼托從口袋里抽出一把刀，捅穿了那個男孩的手掌，慈幼會于是將他驅逐出校。雖然貝尼托依舊痞性不改，不過他是個聰明的孩子，所以還是升上了中學。1901年，他和一位已婚女性有染的丑事曝光，丟掉了第一份工作，之后他又找到一份代課教師的兼職。

由于無法謀得新的崗位，他遠赴瑞士求職。在那里，他加入了當地社會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圈子，被他們激昂的革命話語所吸引。瑞士警察很快就撰寫了關于他的報告，為我們描述了青年時期的墨索里尼：身高五英尺半，健壯結實，頭發和胡須呈棕色，臉龐瘦長蒼白，黑色的雙眼，一道鷹鉤鼻以及一張大嘴巴。  [[2]](#_2__Bao_Gao_Zui_Hou_Gei_Chu_De_Z)

## 在1904年的洛桑，墨索里尼同意就天主是否存在的問題與當地一位新教牧師進行辯論。為了說服聽眾，他上引伽利略，下引羅伯斯庇爾，之后又爬到桌子上去掏出一塊懷表，大聲喊叫，如果天主真的存在，那么祂就應該在接下來的五分鐘里將他擊斃。貝尼托在同一年發表了第一篇文章《天主并不存在》（“God Does Not Exist”）。他堅持不懈地攻擊教會，將神父貶作“黑色的細菌，他們給人類帶來的災難堪比結核桿菌”。 [[3]](#_3__Bosworth_2002__p__62_Mo_Suo)

墨索里尼熱心于爭論和政治，很快就把全部時間投入到這兩件事情中去。1910年，他回到靠近羅馬涅老家的弗利，在那擔任當地社會黨周刊的編輯以及該鎮社會黨的秘書長。同一年，他又在虛構作品方面試手，出版了一本色情小說《樞機的情人》（The Cardinal’s Mistress ）。  [[4]](#_4__Rhodes_1974__p__27)

在從政生涯的最初幾年，墨索里尼嶄露頭角、出盡風頭，一半因為他是極端左翼分子，一半則猶如唐璜。他臉上的髭須將伴隨他度過接下來的十年，他似乎總是知道怎樣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像他這種違法亂紀的斗毆分子和煽動者，你寧愿讓他做你的同伙，也不樂意讓他做你的對手。此時，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點已經顯現出來：鋼鐵般堅定的凝視。墨索里尼的凝視能夠穿透聽眾，既令人生畏，又令人著迷。他的雙眼仿佛要凸出來。1910年，當地的一位工會組織者談到自己的體會：“他注視我的時候眉毛挑起，露出了大片眼白，仿佛要捕捉遠方一幕短暫的景色，令他的雙眼和面容都呈現出使徒正在深思的神色。”  [[5]](#_5__Baima_Bollone_2007__pp__23)

1912年，只有二十多歲的墨索里尼開始擔任社會黨最重要的職位之一：設在米蘭、全國發行的《前進！》黨報主編，令他從外省邊陲之地弗利（Forli）來到了意大利欣欣向榮的經濟和文化之都。

作為主編，墨索里尼帶領《前進！》站到了社會黨革命派的一邊。他堅稱，只有革命運動才能帶來新的秩序，議會政治在這方面則一無是處。1913年，當羅馬南區的警察在一場抗議游行中殺害了七名農場工人時，他號召大家為他們復仇。他在米蘭的一場集會上大聲疾呼：“屠殺人民之人必死！革命萬歲！”在他主管的報紙中，他寫道：“人民的聲音是戰吼。那些屠殺者心里明白，他們也有可能遭到屠殺。”  [[6]](#_6__Ta_Yin_Wei___Qian_Jin_____De)

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打響時，社會黨人出言譴責，直斥這場戰爭的幕后黑手是好戰的帝國主義分子和資本家，他們樂于將無產階級視作炮灰。全世界的工人要聯合起來，不要以天主之名或國家之名相互屠殺。可是在戰爭爆發兩個月后，墨索里尼發表的一篇文章卻令他的同仁大吃一驚，他竟然質問意大利保持中立是否明智。黨內分子認為意大利應該袖手旁觀，任由歐洲戰火紛飛，墨索里尼對此非常憤慨，因為和平主義并非他的風格。我們并不清楚墨索里尼是否自覺能夠說服社會黨同仁跟從他的領導。如果他真的這么認為，那么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大錯特錯：不到一個月，他不僅被逐出《前進！》，還被社會黨除了名。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這位曾經的社會黨領導者搖身一變，成為社會黨最大的敵人，這其中的變故在他過去的同仁眼里完全無法解釋，簡直就是一種背叛。他保留了革命思想中對議會民主的鄙夷，深信暴力運動具有無比強大的潛能，然而他摒棄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其他內容。他意識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的混亂留出了一大片空白，而他將填補這片空白。他始終都把自己擺在首要的位置，始終相信自己有能力攀上權力的巔峰。如今他開始看到一條新的通衢，能夠令他實現這些夢想。

四年前，也就是1910年，墨索里尼同故鄉的戀人同時也是未來的妻子雷切爾·圭迪生下了長女埃達。他們當時仍然待在弗利，公寓只有兩個房間，而且到處都是跳蚤。貝尼托早年的愛情生活便是如此慘淡，但關于雷切爾并非埃達生母的謠言卻流傳了幾十年。埃達后來惱火地寫道，謠言說她真正的母親應該是安杰莉卡·巴拉巴諾夫（Angelica Balabanoff，一位俄國猶太社會黨人，后來擔任共產國際的秘書），她當時就在意大利，乃是墨索里尼的情婦和他政治決策的良師益友。“我非常了解我的母親，”埃達在她的回憶錄里寫道，“我很清楚如果我是巴拉巴諾夫的女兒的話，那她連五分鐘都忍受不了我。”  [[7]](#_7__E__Mussolini_1957__pp__31_32)

雷切爾生于一個貧寒的農家，第一次邂逅貝尼托時還只有七歲，而當時的貝尼托代替母親成了當地的小學老師。雷切爾沒有正經讀過書，況且她父親在她八歲時就過世了，因此她很快就被送到弗利，干起了女傭的行當。盡管她后來極具母儀，但年輕時的她金發藍眼、小巧纖細，具有非常迷人的氣質。

雷切爾以為埃達是墨索里尼的第一個孩子，可早在埃達出生的幾個月前，一位咖啡館侍女就替他誕下了一個名叫貝尼托的男嬰。這個小貝尼托很小就夭折了，但除此之外墨索里尼還有其他私生子，其中就至少包括另一個小貝尼托。  [[8]](#_8__Motti_2003__p__198)  墨索里尼風流韻事纏身，怎么還有時間兼顧他的新聞和政治生涯呢，任何人這么想都不奇怪，而他的那些女人多半也是這么想的。1913年，他和幾年前邂逅的另一位俄國猶太人生下一名嬰兒，盡管他從來沒有承認過那是自己的子嗣。  [[9]](#_9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9)  同一年，誰也沒想到，他竟然對萊達·拉法內利（Leda Rafanelli）著了迷：拉法內利時年三十二歲，是米蘭一位挺出名的無政府主義作家，幾年前在埃及住了幾個月，因此皈依了伊斯蘭教，這令她頗有些與眾不同。貝尼托常常溜出辦公室，拜訪拉法內利那間煙熏霧繞的公寓。他們的幽會一直持續到1914年秋。幾十年后，已是一位老婦的拉法內利，把年輕的墨索里尼在那幾個熱烈的月份里寫給她的四十封情書出版成冊。  [[10]](#_10__Rafanelli_1975)

1915年11月，第二位小貝尼托誕生了，生母是墨索里尼的另一位情婦伊達·達爾塞（Ida Dalser），她對墨索里尼懷有深深的崇拜之情。達爾塞越來越堅持自己才是墨索里尼真正的妻子，也許墨索里尼就是為了回絕她，才同雷切爾結婚的。這場世俗婚禮在小貝尼托（Benito Dalser）誕生一個月后就匆匆舉行，盡管墨索里尼當時身體不適，還住在傷寒病房里。當他拒絕給達爾塞回信時，她通過法院命令扣押了他的全部家具。她于憤恨中將他為數不多的桌椅收攏在她的酒店房間里，并將它們付之一炬。  [[11]](#_11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

早在1914年11月，當剛剛被撤去《前進！》的主編職務時，他宣布要創辦自己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  [[12]](#_12__Mo_Suo_Li_Ni_Shi_Zen_Yao_Zh)  這份報紙最先從意大利工業黨手中得到資助，這些人想要發意大利的戰爭財，從此以后的三十年里，它便一直是墨索里尼手中的喉舌。  [[13]](#_13__Bosworth_2002__pp__106_107)

在他創辦報紙的同時，墨索里尼還拉扯出一個名叫“革命運動法西斯”（Fasci d’azione rivoluzionaria）的組織，他稱這個組織是“顛覆分子的自由聯盟”，他們支持意大利參戰，并且呼吁推翻君主制。  [[14]](#_14____Ge_Ming_Yun_Dong_Fa_Xi_Si)  1915年1月這個組織舉行了第一次會議，此時離意大利參戰并加入英法陣營還有四個月。很快，墨索里尼就被征召入伍，并被派往意大利東北部的山區前線。1917年2月23日，他的軍旅生涯提前結束，因為他試射迫擊炮時，引發炮管爆炸，炸死了五位戰友，而他自己也被彈片打傷。雖然經過手術，或許正是因為手術，他的傷口發生感染，進而發起了高燒，不過他活了下來，返回米蘭，他最重要的情人和從政密友正在那里等候他歸來。

1880年，瑪格麗塔·薩爾法蒂生于威尼斯一戶富裕的猶太家庭，并在家里跟從家庭教師學習知識。十四歲時，她已經掌握了法語、德語和英語。她閱讀哲學著作，背誦雪萊的詩歌，研習藝術批評，并且培養出對文學的愛好。她有一雙綠色的眼眸，一頭赭紅色的頭發，模樣十分迷人；十八歲時，她嫁給了一位大她十四歲的猶太律師。

這對新婚夫婦很快遷至米蘭，瑪格麗塔被社會黨理念所吸引，開始為該黨報紙撰寫文化文章。當墨索里尼于1912年末抵達米蘭時，他邂逅了瑪格麗塔。她立即被他的雙眼攝住心魂。那雙大大的眼睛非常明亮，在他演說時似乎更顯熱忱。當她后來有機會觀摩他組織社會黨集會時，他憑借精煉辯才吸引聽眾的才能更令她嘆為觀止。在她心里，墨索里尼就是一位舊時的傳奇英雄，身穿銹跡斑斑、凹凸不平的鎧甲，一次又一次將宮廷里衣著光鮮的騎士刺翻于馬下。他還令她聯想起15世紀的道明會修士薩伏那洛拉（Savonarola）。墨索里尼和這位昂揚的修士一樣，“眼睛里閃爍著奇異、狂熱的光彩，鼻子劃出一道孤傲的曲線”。  [[15]](#_15__Festorazzi_2010__p__37__Can)

他們在1913年開始交往。當墨索里尼在1917年卸下戎裝、返回米蘭時，他們變得如膠似漆，不肯分離。  [[16]](#_16__Milza_2000__p__257__Ran_Er)  1918年11月，貝尼托的姐姐埃德維杰來到米蘭參加停戰慶祝儀式，驚訝地發現弟弟已經將髭須給剃掉了。他身穿高檔西裝，翻著潔白無瑕的高領，甚至在西裝的翻領上別了一朵鮮花。她思忖，他這樣衣冠楚楚，肯定是陷入愛河了。  [[17]](#_17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

不過墨索里尼愛情生活的大背景，卻是意大利戰后殘酷的動蕩年代。在幾個北方城市，工人們占領了工廠。近來的俄國革命牽動人心，向全世界倡議推翻“資本主義”民主政權，到處都在討論要建立工人階級的國家。在意大利鄉村，左翼農民社團發起罷工。那些習慣對農民頤指氣使的地主，發現自己只能負隅頑抗。數十萬退伍軍人沒法找到工作。政府財政危急，并且因為政治爭端和個人不和而陷入了癱瘓。社會黨人正在這個國家廣大的北部地區組建國中國，取代地方市政府，建立工人合作社，從西北部阿爾卑斯山腳一直延伸到東邊的亞得里亞海。

墨索里尼在返鄉的退伍軍人里找到了天然的擁躉，他們有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覺得國家虧欠自己，不愿意拋棄從軍隊里收獲的戰友情誼，墨索里尼將這些特性統統利用起來。他把矛頭指向了發戰爭財的人、鼓吹失敗主義的人、無能的將軍以及腐敗的政客，這一罪人的名單令人醍醐灌頂。1919年3月23日，他召集了法西斯運動的第一場會議、羅馬教會跟其他機構一樣，是法西斯黨早期的攻擊目標。墨索里尼呼吁沒收教會財產，呼吁國家停止給教會發放補貼。1919年11月，他在《意大利人民報》上發表文章，戲邀教宗離開羅馬，一個月后，他又表達了對各類基督教的厭惡之情。  [[18]](#_18__Margiotta_Broglio_1966__pp)

同一個月，法西斯黨人第一次獲得了競選國會議員的機會，結果卻是自取其辱。  [[19]](#_19__Mo_Suo_Li_Ni_Cheng_Gong_Di)  在米蘭，他們只爭取了不到2%的選票，沒能讓任何黨員當選。在全國范圍，他們最終只選上了一位議員。  [[20]](#_20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

盡管運動暫時還沒有得到很多選票，但墨索里尼吸引到了警方的極大關注。在選舉不久前，官方為他準備了一份機密檔案，將其描繪作一個儀表堂堂卻患有梅毒的人。梅毒在當時是一種常見疾病，考慮到他為數眾多的性伴侶，這一描述并不令我們感到奇怪。直到他去世，人們一直都對此竊竊私語，有的人認為正是梅毒導致他后期智力下降。不過他的尸檢報告顯示他沒有染上過這種疾病。

墨索里尼每天很晚起床，臨近中午才出發前往報社，但每天要直到午夜之后才會回家。警察還描述道，墨索里尼情感豐富、性格沖動，他感性的一面解釋了為什么那么多人都覺得他魅力非凡。他天資聰穎、足智多謀，看人的眼光非常獨到，能夠利用他人的弱點。他是一個良好的組織者，能夠迅速做出決定，忠于盟友，對那些輕視自己的人懷恨在心。他并不遵奉任何信念，隨時準備拋棄過時的想法，擁抱時新的觀念。最重要的是，他極具野心，深信自己命中注定要改變意大利的未來。  [[21]](#_21__Galeotti_2000__pp__20_23)

到1920年初，墨索里尼已經基本上將他過去大力鼓吹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摒棄掉了。他意識到，要想走上成功的道路，必須把握時機，利用好這個國家目前混亂的狀況，于是他改頭換面，轉而支持法律、秩序以及民族自豪感。

1920年春，社會黨聯會在波河河谷舉行了一次農業罷工。當政府完全不作為也不出手調停的時候，地主轉向了法西斯黨。秋天，武裝法西斯團伙穿著標志性的黑衫襲擊了社會黨勞工會以及其他左翼目標。現代意大利從未耳聞目睹過此等事件。墨索里尼對這些法西斯暴徒組織的管理方式非常松散，他并不直接出手組織行動，而是讓地方法西斯頭目來替他操辦骯臟的事情。11月21日，當新近當選的社會黨市政府在博洛尼亞宣誓就職時，法西斯團伙攻入了市政大廳。十人在爭斗中喪生，而國家政府也延后了新一屆市政府的上臺。隨著法西斯團伙對左翼市政府、社會黨總部以及工會大廳發起進攻，暴力不斷地蔓延開來。

墨索里尼名下的這場新運動幾乎沒有組織結構可言，而且隨著地方法西斯頭目開始確立各自的大本營，每人控制住一座城市，墨索里尼也在盡力控制這些好斗的徒子徒孫。他面前的戰役是要將一系列沒有規矩、基于地方的暴力封地轉變成一個遍及全國、自上而下、運作良好的政治組織，而這場戰役將要耗費他余下幾年的時間。  [[22]](#_22__De_Felice_1966__pp__115_116)

\* \* \* \* \*

由于政府已經癱瘓，國王解散了舊議會，并且安排在1921年5月15日進行新一輪選舉，它離上一輪僅僅隔了一年半。法西斯暴力的狂歡裹挾著競選活動，吞沒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區域以及南部零散的幾個地區。這些團伙如今配備了農場地主提供給他們的卡車，他們燒毀社會黨俱樂部和工會大廳，并且攻擊社會黨領導人。  [[23]](#_23__Lyttleton_1987__p__53__Ebne)

在1921年議會選舉前的五周里，共有一百人遇害，數百人受傷。然而社會黨人保住了他們絕大多數席位，當選一百二十二席，此外還要算上共產黨的十六席，他們原先是社會黨的一個派系，年初剛剛從社會黨分裂出去。法西斯黨的另一攻擊對象，即天主教人民黨，獲得了一百零七席。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黨人則和守舊的精英階層結成同盟，其中最顯赫的莫過于當時的總理喬瓦尼·喬利蒂（Giovanni Giolitti），他把法西斯黨人看作是一根大棒，用來控制社會黨人，與他們相互制衡。他們贏得了多數席位，一共當選二百七十五席，其中包括法西斯黨的三十五席。  [[24]](#_24__De_Felice_1966__pp__87__92)

新一屆議會的第一次會議剛剛開幕，墨索里尼便起身發表演講，它將被與會眾人銘記在心間。他說道，全世界數億天主教徒都將羅馬視為精神家園，這一力量的源泉是意大利所不能忽視的。他的一番宣誓令那些了解他的人大為震驚，他表示法西斯黨將會為恢復基督教社會而貢獻一份力量。它會建設一個適合天主教民族的天主教國度。  [[25]](#_25__De_Felice_1966__p__128__Sco)

墨索里尼出人意料地轉投教會懷抱，可他事先并未同梵蒂岡高層有過任何接觸。如果他要將自己塑造成這個國家最有希望掃清社會黨的人選，那么天主教人民黨就是他面前的主要障礙。想要讓教宗拋棄人民黨，他必須要向教宗證明，他能給教會提供的幫助是人民黨無法匹敵的。11月，法西斯運動正式轉變成法西斯政黨，并且采取了一套全新的方針。沒收教會財產、實行政教分離的口號從此一去不復返。  [[26]](#_26__Gentile_2010__p__92)

為了獲取梵蒂岡的支持，墨索里尼既準備了胡蘿卜（結束自由民主政權，建立天主教專制國家），也準備了大棒。他確確實實有一根大棒，即黑衫軍手中飛揚跋扈、令人聞風喪膽的木棍（manganello）。在法西斯黨人眼里，人民黨是天主教體系的一部分，這一龐大的網絡遍布鄉村，可以阻礙他們的行動。而在地方層面，教會方面的絆腳石還包括公教進行會團體（這些天主教平信徒團體在教士的監督下進行宗教活動）以及各種天主教福利會。所有這些團體，在殘忍的黑衫軍眼里都是夜襲的狩獵對象。

1922年3月，意大利北部曼托瓦（Mantua）地區的神父給政府當局發去一封抗議信，譴責法西斯黨人毆打當地神父和公教進行會成員。4月，博洛尼亞的法西斯黨人襲擊了人民黨的兩位市議員。剛剛擔任教宗才幾個月的拉蒂，聽聞家鄉布里安扎的公教進行會總部被法西斯惡棍劫掠，感到尤為震怒。  [[27]](#_27__Venini_2004__p__22)  由此在5月，《公教文明》（這份設在羅馬的耶穌會刊物刊登過許多披露法西斯暴力的文章）報道了一起法西斯暴力事件：一天晚上，在阿雷佐（Arezzo）的天主教青年會會議結束后，一幫年輕人起身打算離開，一隊法西斯分子現身用棍棒和皮鞭對他們施以毆打。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梵蒂岡日報《羅馬觀察報》將連篇累牘地刊登類似新聞，均是法西斯黨人對人民黨活動分子、地方天主教會以及神父的肆意攻擊。然而所有報道均未提及墨索里尼，深謀遠慮的他刻意在公眾場合同暴力行動保持距離。  [[28]](#_28__CC_1922_I__p__558__CC_1922)

在充當法西斯大棒和威懾教會方面，沒有人比羅伯托·法里納奇（Roberto Farinacci）更稱職。他出身中產階級下層，曾經是一位社會黨人，也是一位年輕的退伍軍人，現在擔任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納（Cremona）的法西斯頭目，正是這些人主導了早期的法西斯運動。人們稱他是“最法西斯的法西斯黨人”，而法里納奇欣然接受了這一頭銜，他隨身攜帶手槍，用皮帶綁在褲腿里面。他不僅體現了法西斯運動的躁動、暴力、褊狹和獨裁，還表現出它反教會的本質。后來，當墨索里尼需要約束梵蒂岡時，他就倚仗法里納奇。同時，墨索里尼傳達的信息也非常明確：在這個國家，只有他能夠將法里納奇這等反教會暴力分子牢牢控制住。  [[29]](#_29__Fa_Li_Na_Qi_De_Chuan_Ji_You)

肆虐的法西斯團體放火燒了社會黨的地方總部，毆打其領導人，而警察卻坐視不管，于是社會黨人決定采取行動。7月29日，他們發起了一場全國性質的罷工，以此要挾政府，如果不阻止暴力的蔓延，他們就不回到工作崗位上去。然而這場罷工卻自食其果。法西斯團體燒毀了工會大廳，強迫工人們返回到工作崗位上去。8月3日，黑衫軍占領了米蘭的市政大廳。墨索里尼宣稱，只有法西斯黨能夠幫助意大利避免重蹈俄國的覆轍。  [[30]](#_30__Milza_2000__p__326__De_Feli)

由于國家騷亂四起、政府陷入癱瘓，警察和軍隊系統開始向法西斯黨人拋出橄欖枝，而新任教宗和他最親密的顧問開始懷疑，如果他們反對墨索里尼的改革運動，可能并非明智之舉。庇護十一世其實從不認可人民黨，盡管它在本篤的降福下組建起來，卻驕傲地公開宣稱自己是個獨立政黨，并沒有受到梵蒂岡的控制。此外，無論是從意識形態還是從性格方面來說，庇護十一世都對議會政府沒有任何熱情。他相信意大利需要由一個強人來引領，這位強人能夠摒除多黨議政的雜音。如果墨索里尼能夠保證恢復教會在意大利的影響力，那么他就不會揪著墨索里尼反教會的黑歷史不放。除了這份審慎的愿景，教宗心中其實還藏著一份恐懼：如果他反對法西斯黨，并讓教會支持人民黨，那么一旦墨索里尼上臺，他是否有可能施行恐怖統治，放任法西斯黨的反教會分子和教會作對？教宗擔心墨索里尼身后還有許許多多法里納奇。教宗從來不曾抱有幻想，他不認為墨索里尼會認同天主教的價值觀，也不認為他會關心任何與他的大權獨攬無關的事情，不過只要墨索里尼能夠兌現他的承諾，那么教宗就愿意考慮和他簽訂一項務實的協議。  [[31]](#_31__Chiron_2006__pp__256_257)

1922年10月2日，梵蒂岡國務卿加斯帕里樞機向意大利所有主教發出一份通知，告知他們神職人員不得與任何政黨有瓜葛。隨著法西斯黨一步步鋪平通往權力的道路，教宗開始讓教會疏遠天主教政黨。

也就是在10月份，意大利發生了一起重大的歷史事件。10月16日，墨索里尼召開會議，同法西斯黑衫軍頭目進行協商，最終確定了暴動的計劃。黑衫軍將占領大城市的政府大樓，而其他法西斯部隊則會在不同的地點集結起來，分別進軍羅馬，意在奪取中央政府的各個部門。

作為意大利政府的未來領導人，墨索里尼此時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不僅能夠跟進來自全國各地的報告，還能在羅馬淪陷后大張旗鼓地進城。四位法西斯領導人（他們注定要成為法西斯神話的“四人組”）：切薩雷·德·維基、伊塔洛·巴爾博、米凱萊·比昂基（Michele Bianchi）、埃米利奧·德·博諾（Emilio De Bono）負責帶領部隊進軍首都。其他法西斯頭領將回到各自的城市，組織暴動，占領當地的政府大樓。

法西斯暴亂四起之時，墨索里尼究竟身在何處，做些什么，這兩個問題始終存在爭議。在法西斯官方公布的版本中，10月27日當晚，他同妻子在米蘭歌劇院觀摩演出，給當局造成假象，讓他們誤以為自身處境尚且安全。在另一個稍許不同的版本里，陪伴墨索里尼現身歌劇院的并非雷切爾，而是薩爾法蒂。在另一個不那么光彩的版本里，墨索里尼躲藏在薩爾法蒂位于科莫湖的避暑別墅里，一旦暴動失敗，他就準備穿越鄰近的瑞士邊境，抵達安全的場所。  [[32]](#_32__Hou_Yi_Ge_Ban_Ben__Ji_Dan_J)

如果說墨索里尼在當時有點分心旁騖的話，那么這一狀況是可以得到諒解的，因為僅僅在一周前，他又多了一個女兒，名喚埃萊娜（Elena Curti）。他與埃萊娜的母親安杰拉·庫爾蒂·庫奇亞蒂（Angela Curti Cucciati）的風流韻事始于一年前，盡管當時他也正和瑪格麗塔·薩爾法蒂打得火熱。埃萊娜深受墨索里尼的疼愛，這令她在其私生子女中鶴立雞群。多年以后，當墨索里尼迎來悲慘的結局時，埃萊娜將會陪伴在他的身邊。  [[33]](#_33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



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四人組，那不勒斯，1922年10月24日 前排從左到右：埃米利奧·德·博諾、米凱萊·比昂基、伊塔洛·巴爾博、貝尼托·墨索里尼、切薩雷·德·維基

無論他當時是否擔心降生不久的女兒，墨索里尼確實在進軍羅馬的緊要關頭，對這場軍事行動產生了疑慮，因為他意識到，一旦意大利軍隊受命狙擊這幫由流氓惡棍組成的烏合之眾，那么他們將不堪一擊。就在幾周前，意大利的一位最高將領就曾自信滿滿地預測說，只要軍隊一聲槍響，“一切的法西斯都將土崩瓦解”。  [[34]](#_34__Bi_De_Luo__Ba_Duo_Ge_Li_Ao)

有可能是瑪格麗塔·薩爾法蒂打消了墨索里尼的疑慮。傳言說她曾告訴墨索里尼，“要么進軍，要么坐以待斃”。無論如何，現在放棄都已經為時過晚。法西斯部隊已經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城市里展開行動。  [[35]](#_35__Milza_2000__pp__332_333)

盡管后來法西斯黨煞費苦心地把10月28日的“進軍羅馬事件”打造成一個神話，然而前一夜里對地方政府的進攻，在局勢上其實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佩魯賈省（Perugia）省督已經向法西斯部隊屈膝投降。法里納奇的部隊切斷了克雷莫納的供電線路，占領了警察局、市政府以及其他戰略要地。  [[36]](#_36__Lyttleton_1987__p__89)  在其他地區，法西斯黑衫軍占領陣地，包圍了警局總部、火車站以及通訊中心。意大利軍人和黑衫軍形成對峙，卻沒有向他們開火，這些軍人等候著來自羅馬的軍令。

抵達羅馬外圍的法西斯部隊不超過兩萬六千人，他們裝備著老式軍用步槍，有些人甚至只配備了棍棒，而且此時已經被瓢潑大雨澆得心灰意冷。法西斯黨后來宣稱他們集結了三十萬人。對抗這些法西斯暴徒的是兩萬八千名意大利軍人，他們的機關槍和裝甲車都已經準備就緒。

總理路易吉·法克塔（Luigi Facta）意識到只有軍事行動才能阻止這群法西斯暴徒，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緊急狀態公告。全國上下的軍隊將收到指令，驅散黑衫軍，逮捕法西斯領導人。28日上午6點，法克塔緊急召開內閣會議，提出了這項軍事命令。在得到各位部長的一致通過后，各省省督將在上午7點45分接到通知，國家即將進入緊急狀態。上午8點30分，通告緊急狀態的海報已經貼上了羅馬的城墻。法克塔在接近9點時趕到奎里納爾宮，將命令呈給國王讓他簽字。然而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卻拒絕簽字。法克塔驚呆了。他們剛剛在前一天討論過應對措施，而國王當時似乎下定決心要保衛羅馬，抵御法西斯黨的進攻。  [[37]](#_37__De_Felice_1966__p__359)

國王是個性情古怪的人物。他的祖父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是他名號的源頭，這位現代意大利的開國元勛名聲卓著。他的撒丁王國部隊協助法國人在北方擊敗了奧地利人，又在意大利半島中部擊潰了保衛教宗國的軍隊。由于奪走了教宗的領土，這位意大利國父被逐出教會。他的兒子翁貝托一世在1900年遇刺，兇手是來自新澤西的意裔美籍無政府主義者，這使得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年僅三十歲便登上了王座。他矮小的身材總是受人嘲弄，這位一把大胡子的君主身高只有五英尺多一點  [[38]](#_38__Wu_Ying_Chi_Xiang_Dang_Yu_1)  ，他從來都覺得自己的王位并不安穩。博學聰穎的他厭惡同政黨和議會打交道。他對教宗和梵蒂岡也沒有任何好感可言。他認為神職人員最應該服侍的對象是國王。這座都城明明就是他的，竟然有另一個人宣稱羅馬為其所有，這番滋味令國王感到深深厭惡。

正如美國記者安妮·麥考密克（Anne McCormick）所言，國王是整個意大利最懂得韜光養晦的人，他回避一切媒體宣傳和曝光，不干涉政府的運作，只有在別無選擇時才會在公眾場合露面。必須有他到場的議會開幕式是少數幾個他在羅馬露面的場合。麥考密克便是通過這樣的契機在1921年見到了他。他乘坐著水晶戰車，前頭是幾匹披掛著珠寶馬具的白馬，還有一群喇叭手開道。他進入議會大廳落座后，“被巨大的王座襯得特別矮小……而當他踢開紅絲絨腳凳時……他簡直就像一個悶悶不樂的男孩在一張過于龐大的椅子上晃蕩著雙腿”。  [[39]](#_39__McCormick_1957__pp__7_9)

國王有著很強烈的責任感，可又十分謹慎、憂慮重重。當他在10月28日上午審視自己手頭的選項時，他擔心同法西斯分子作戰會令殺戮愈演愈烈。他心里明白，自己的聲望是靠不住的，因為他既沒有不可一世的自信，令臣民對他敬畏有加，也沒有仁慈溫暖的一面，令臣民對他抱有好感。作為一個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他還擔心軍隊的忠誠也靠不住。他認為，與其跟墨索里尼在羅馬城外鏖戰，不如讓他進駐政府，恐怕還更為謹慎一些。經歷過多年社會動蕩的軍隊高層以及各個產業的領頭人物里，已經有很多人開始認為，墨索里尼最有可能終結社會黨人的威脅，恢復意大利的社會秩序。  [[40]](#_40__CC_1922_IV__pp__354_3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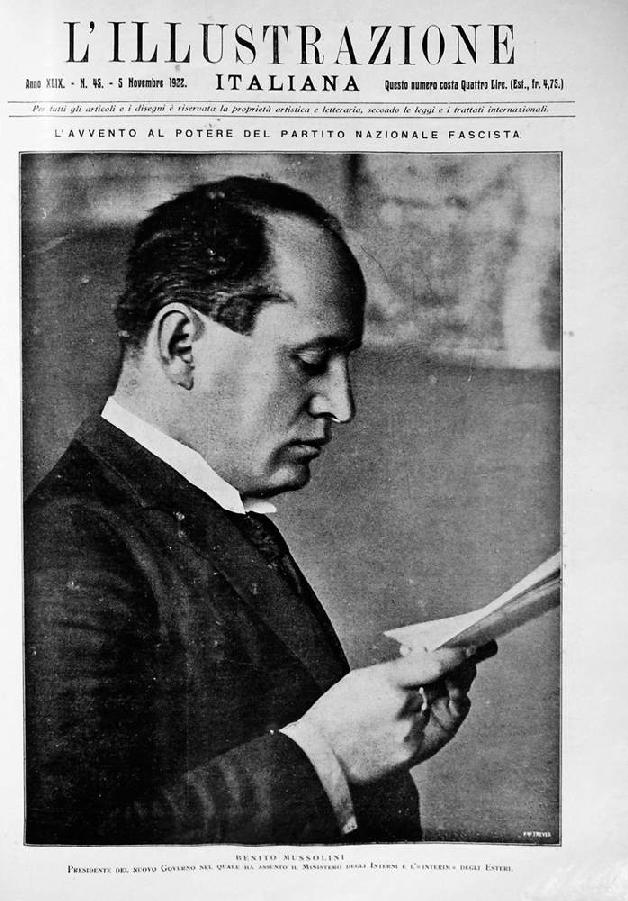
不堪羞辱的法克塔辭去了總理職務。國王先是試圖將政府首腦的職務托付給一位保守派前總理，并將幾個內閣職務分配給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同仁，然而法西斯部隊已經占領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絕大多數戰略要地，況且國王還決定不啟用軍隊，于是墨索里尼毫不猶豫地回絕了這項提議。國王別無選擇，只好向墨索里尼屈服。最終他邀請這位法西斯領導人蒞臨羅馬，組建新一屆政府。

墨索里尼搭乘火車從米蘭南下，于30日的上午步下臥鋪車廂，來到了首都。他穿著黑色襯衫來到皇宮，據說他告訴國王：“陛下，我從戰場趕來，幸而滴血不沾。”直到領導人抵達羅馬，那些又濕又乏的黑衫軍才被允許入城。他們昂首闊步地走過街道，一路高歌慶祝，時或洗劫道旁出現的社會黨總部。

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墨索里尼組建了內閣，將最重要的兩個職務（管轄省督和警察系統的內務部部長以及外交部部長）留給了自己。內閣包含兩名人民黨人士、三名法西斯黨人士以及一批老自由黨精英分子。自他將內閣方案呈遞給國王起，他們兩人便開啟了一段長達二十多年的復雜關系。溫文爾雅的國王看似跟這位暴力的擁躉，這位自稱“缺乏社會教養”  [[41]](#_41__Bosworth_2002__p__172)  的法西斯領導人沒有多少共同點，況且這位鼓動暴民的鐵匠之子多年以來都鼓吹推翻君主制，這也令國王感到極度不安。然而，墨索里尼的魄力、他結束國家混亂無序的能力、絕不收受賄賂以及復興意大利的夢想，卻漸漸地令國王對他生出一份敬佩之情。  [[42]](#_42__De_Felice_1966__p__311)

擔任總理后，墨索里尼最先做出的幾項舉措里，有一項是帶領內閣成員到羅馬維托里奧紀念碑的無名戰士祭壇參加彌撒。在那里，他命令所有人跪下做一分鐘的禱告。梵蒂岡國務卿加斯帕里譏諷道，對其中許多人來說，這一分鐘“必定無比漫長”。墨索里尼迫切地想要向教宗證明，他將積極地恢復教會的特權。“墨索里尼想要告訴我們，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加斯帕里向比利時大使解釋道。  [[43]](#_43__Ta_Men_De_Tan_Hua_Fa_Sheng)

11月中旬，墨索里尼在眾議院接受了信任投票。盡管當時的眾議院只有三十五名法西斯代表，然而卻有三百一十六名議員給他投了信任票。前總理喬瓦尼·喬利蒂以及政府其他成員仍舊相信，他們可以一邊利用墨索里尼摧毀社會黨的勢力，一邊又將最終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人民黨成員也投了信任票，盡管有許多人是不情不愿的。這便是墨索里尼掌權的經過，自由選舉產生的議會用合法的投票程序將他送上了意大利權力的巔峰。



貝尼托·墨索里尼，新任意大利總理，1922年11月

他呈現給眾人的形象多少有些古怪，散發出強大的能量。盡管他后來喜歡在相機前顯露他厚實的胸膛——要么是站在一個高高的平臺上，要么是跨坐在馬匹上，要么手里握著一把鋤頭，不過現在的他胸膛還沒有變得那么厚實。他的發際線已經后退，露出了大片額頭，他將稀疏的頭發都往后梳理；他的髭須早已不見，鬢角剪得干干凈凈，從太陽穴到耳朵上方修成了一條直線。但是最令旁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超凡的生氣和那雙銳利的眼睛。

在擔任政府首腦的最初幾個月里，墨索里尼穿著一件黑色短西服，一條緊身褲，膝蓋正下方有一道深深的折痕。“他肯定是個窮鬼，”總理府基吉宮的一位門房評論道，“都沒有專人給他熨褲子。”他跟那些自由黨精英出身的前政府首腦（這些遠為年長、胡須灰白的紳士身穿剪裁講究的深色西服，過著考究精致的生活）有著鴻溝一般的差距。“墨索里尼是個不同尋常的總理，”他的長期助理昆托·納瓦拉（Quinto Navarra）回憶道，“你會以為面前站著的是一位流浪漢，一位袖管沾著墨漬、鞋跟已然磨平的記者。”  [[44]](#_44__Navarra_2004__p__15)

前總理安東尼奧·薩蘭德拉（Antonio Salandra）如是評價墨索里尼的神秘形象：親切與粗俗的怪異混雜；誠摯地表露出高貴情操后，緊跟著便是報復仇殺的卑劣本能；直率而又乖張；堅持己見又善于改變路線；口才驚人，效果斐然，還引經據典，結果又用底層的粗俗話語吐出一番放肆無知的言論。然而最令這位前總理印象深刻的，同時也是在他眼里墨索里尼的首要動機，是后者對個人崇拜全心全意的追求。他展現了超出常人的能量和鋼鐵般的意志，而且出于直覺地彌補自身在運作政府上的經驗不足。他猶如“一股來自大自然的無窮力量”。  [[45]](#_45__Chu_Zi_Salandra_Memorie_pol)

成為總理不久后，墨索里尼出席了西班牙皇室的官方接待儀式，他自己其實很討厭這種場合。像往常一樣，他到場時臉上留著兩天沒刮的胡須，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的妻子海倫王后（Queen Helen）非常注重儀表，因此對他怒目而視。此后，她還將多次注意到，墨索里尼在很多場合都不修邊幅。而墨索里尼本人也從來都適應不了上層階級每天洗澡的習慣，于是他頻繁地噴灑廉價香水，過猶不及地彌補自己差勁的衛生習慣。

任職之初他也參加了許多外交宴會，其中有一場安排在英國大使館，他赴宴前參考了魯索男爵（Baron Russo）的意見，這位總理助理乃是上屆政府的舊人。

“非常簡單，閣下，”男爵解釋道，“您只需坐在英國大使夫人邊上。留心觀察她的每一個舉動。跟她使用相同的湯勺、相同的餐刀和相同的叉子。無論她做什么，你照做即可。”

墨索里尼到達大使館的禮堂時，立即成了眾人的焦點，可他感到十分拘束。他的怒容和鼓起的雙眼在法西斯集會前具有極佳的效果，可是一對上這些身著燕尾服的外交官，它們的效用就大打折扣。這場晚宴的主人是英國大使羅納德·格雷厄姆爵士（Sir Ronald Graham），他很早就注意到墨索里尼這人有點裝模作樣。向倫敦匯報他對這位意大利新任總理的第一印象時，格雷厄姆承認自己一開始有些反感墨索里尼，因為他“在姿態和禮儀方面講究得太過了，簡直老套到拿破侖時代去了”。他還詳細說道：“他四處走動時，雙手抱在胸前，插在外套的翻領下面；他的目光過分凝重；他從來都不笑，整個人好像包裹在一層濃厚的陰郁之中。”  [[46]](#_46__Lamb_1997__pp__59_60)

在格雷厄姆的晚宴上，墨索里尼留心觀察大使夫人西比爾（Sybil）女士，小心翼翼地吃完了宴席上的八道菜。夫人很快意識到墨索里尼在干什么，因為他運用刀叉的每一個動作都緊緊跟隨著她。喝湯時，她舉起了小小的湯杯，沒有使用手邊不計其數的湯匙，墨索里尼吃了一驚，不過他還是原樣照做了。

終于要告辭了，墨索里尼向她表示了謝意，而她也將自己提供的幫助隱含帶過。

“我只有一件事情比較困惑。”墨索里尼說道。

“那么是什么事情呢？”她問道。

“我從來都不知道，英國人喝湯竟然跟喝啤酒一樣。”  [[47]](#_47__Zhe_Duan_Miao_Shu_Chu_Zi_Mo)

\* \* \* \* \*

當選國會議員還不滿一年，被社會黨開除黨籍已有八年，這位三十九歲的鐵匠之子如今已成為意大利最具權勢的人物。在過去的一年里，最具標志性的莫過于令人揪心的暴力事件和令人驚恐的不確定性。對有些人來說，法西斯領導人意味著復歸常態的可能性。對其他人來說，他卻可能引發另一種社會斗爭。在那個時候，誰也無法想象，墨索里尼究竟要將意大利人民帶向何方。

[[1]](#filepos94591) E. Mussolini 1957, p. 135.

[[2]](#filepos96294) 報告最后給出的總結頗令我們感到吃驚：他的面相非常和善。Baima Bollone 2007, p. 22；另參見Ludwig 1933, p. 37。

## [[3]](#filepos96993) Bosworth 2002, p. 62.墨索里尼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天主并不存在》的英語譯文收于Seldes 1935, pp. 387–390。1908年的文章被下文引用：Gentile 2010, p. 84。

[[4]](#filepos97503) Rhodes 1974, p. 27.

[[5]](#filepos98466) Baima Bollone 2007, pp. 23, 27.

[[6]](#filepos99434) 他因為《前進！》的這篇文章被起訴，后來以煽動暴力的罪名接受審訊。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96–97.

[[7]](#filepos101913) E. Mussolini 1957, pp. 31–32.

[[8]](#filepos102790) Motti 2003, p. 198.

[[9]](#filepos103208)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97. 很多文獻都遺漏了墨索里尼的這個孩子。盡管在某些情況下，緋聞、婚生子和現實之間的分隔線非常模糊，但我沒有任何理由懷疑坎尼斯特拉羅和蘇利文在這方面出現了判斷失誤。他們還談及墨索里尼在1918年同另一個女人生下的兒子。這個女人叫比安卡·韋內齊安娜（Bianca Veneziana），墨索里尼斷斷續續地跟她私通了好些年（1993, p. 275）。

[[10]](#filepos103870) Rafanelli 1975.

[[11]](#filepos104666)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137. 雷切爾·墨索里尼在她自己的回憶錄里（1974, pp. 74–75）寫下了自己對這場婚禮的回憶。后來，達爾塞不斷公開要求墨索里尼承認她是他的妻子，并且想盡辦法要讓全世界知道小貝尼托是他的兒子，這些事情令墨索里尼非常難堪。他在位高權重之后，便把伊達送進了瘋人院，她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37年去世。小貝尼托的命運則更為慘淡。自從他母親被帶走，他就受到密切監視，后來他實在給墨索里尼帶來太多隱患，于是也被送去了療養院，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42年去世，死時年僅26歲。Rafanelli 1975；Festorazzi 2010, p. 49。

[[12]](#filepos104948) 墨索里尼是怎么找到資金，野心勃勃地創辦這份報紙的，這個問題仍然爭議不斷。部分資金似乎來自墨索里尼的諸位情婦，其中包括伊達·達爾塞，她顯然賣掉了自己的美容院，兌換成現金資助墨索里尼。除此之外，盡管墨索里尼宣稱自己與金錢不共戴天，宣稱要鏟除資產階級，他卻從那些想讓意大利參戰從而發戰爭財的人手里接受金錢資助。他還秘密地從法國政府以及英國政府處得到資金，這兩個國家都迫切想讓意大利參戰。Bosworth 2002, pp. 105–107.

[[13]](#filepos105240) Bosworth 2002, pp. 106–107。

[[14]](#filepos105646) 《革命運動法西斯組織向意大利工人發出呼吁》，《意大利人民報》，1916年1月6日，第1版。

[[15]](#filepos107644) Festorazzi 2010, p. 37;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96.

[[16]](#filepos107922) Milza 2000, p. 257. 然而在1918年2月，瑪格麗塔遭遇了第一樁人生悲劇，她的第一個孩子羅伯托盡管只有十七歲，卻堅持要入伍，并在前線陣亡。當墨索里尼叛出社會黨，譴責他們對意大利戰事的破壞，以及對意大利士兵的不敬時，瑪格麗塔心中也有一條深深的傷口，敦促她與墨索里尼一同前行。Urso 2003, p. 119. 他們會親密合作，在意大利部隊的犧牲和英雄主義上打造一個新的神話。

[[17]](#filepos108337)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178.

[[18]](#filepos110005) Margiotta Broglio 1966, pp. 79–81; Gentile 2010, p. 87.

[[19]](#filepos110257) 墨索里尼成功地說服了米蘭的兩位文化名人，同他一起代表法西斯黨參選，一位是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他是斯卡拉大劇院的總經理，他不久就對這一決定感到后悔；另一位是菲利波·馬里內蒂（Filippo Marinetti），他是未來主義運動的領航先鋒。

[[20]](#filepos110509)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215–216.

[[21]](#filepos111843) Galeotti 2000, pp. 20–23.

[[22]](#filepos113593) De Felice 1966, pp. 115–116.

[[23]](#filepos114232) Lyttleton 1987, p. 53; Ebner 2011, pp. 23, 30–31.

[[24]](#filepos115116) De Felice 1966, pp. 87, 92.

[[25]](#filepos115704) De Felice 1966, p. 128; Scoppola 1996, p. 186; Kent 1981, pp. 5–6.

[[26]](#filepos116384) Gentile 2010, p. 92.

[[27]](#filepos117605) Venini 2004, p. 22.

[[28]](#filepos118378) CC 1922 I, p. 558; CC 1922 II, pp. 178, 372. 在這個時期，《羅馬觀察報》刊登的法西斯分子攻擊神父、意大利人民黨總部、天主教團體的事例包括：《人民黨黨員受到法西斯分子棒打》，1922年3月29日，第4版；《一位神父和一位律師被法西斯分子襲擊》，1922年4月27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襲擊了格雷戈里神父》，1922年6月6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和人民黨黨員發生沖突》，1922年6月21日，第4版；《仇恨爆發》1922年7月26日，第4版；《天主教團體遭受打擊》，1922年8月20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襲擊了一位神父》1922年8月22日，第2版；《米蘭天主教團體遭法西斯分子縱火》，1922年9月2日，第4版；《卡塔尼亞天主教徒遭法西斯分子攻擊》1922年9月12日，第4版；《天主教徒遭法西斯分子襲擊》，1922年9月14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和天主教徒在維羅納發生對峙》，1922年9月23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再度于維羅納襲擊天主教徒》，1922年9月24日，第4版；《下諾切拉人民黨總部遭法西斯分子破壞》，1922年10月4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要挾神父，令其在48小時內扔掉教士袍》，1922年10月8日，第4版；《兩位神職人員受法西斯黨人辱罵》，1922年10月10日，第4版；《佛羅倫薩的法西斯分子集會對G姓教區主教以及當地人民黨黨員展開敵對行動》，1922年10月14日，第4版；《佛羅倫薩教區青年會發起抗議》，1922年10月17日，第4版；《法西斯分子與天主教團體發生沖突》，1922年10月18日，第4版。

[[29]](#filepos119355) 法里納奇的傳記有很多，包括Fornari 1971，Festorazzi 2004，and Pardini 2007。因諾琴蒂（1992, pp. 147–150）的講述通俗易懂又面面俱到，很好地把握了法里納奇的一生。

[[30]](#filepos120065) Milza 2000, p. 326; De Felice 1966, pp. 222–223.

[[31]](#filepos121574) Chiron 2006, pp. 256–257.

[[32]](#filepos123567) 后一個版本，即擔驚受怕的墨索里尼和情婦一同藏在瑞士邊境，見于Festorazzi (2010, pp. 69–70)。德·費利切所著的多卷本墨索里尼權威傳記（1966, pp. 373–374）認為當時他和他的妻子身在米蘭的歌劇院。

[[33]](#filepos124268)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76; Festorazzi 2010, p. 78.

[[34]](#filepos125281) 彼得羅·巴多格里奧，轉引自Milza 2000, p. 332。

[[35]](#filepos125703) Milza 2000, pp. 332–333.

[[36]](#filepos126233) Lyttleton 1987, p. 89.

[[37]](#filepos127808) De Felice 1966, p. 359.

[[38]](#filepos128605) 五英尺相當于1.524米。

[[39]](#filepos129795) McCormick 1957, pp. 7–9.

[[40]](#filepos130720) CC 1922 IV, pp. 354–355.

[[41]](#filepos132307) Bosworth 2002, p. 172.

[[42]](#filepos132758) De Felice 1966, p. 311.

[[43]](#filepos133433) 他們的談話發生在1922年11月初。Beyens 1934, pp. 136-137.

[[44]](#filepos135738) Navarra 2004, p. 15.

[[45]](#filepos136599) 出自Salandra，Memorie politiche, 轉引自De Felice 1966, p. 462。

[[46]](#filepos138673) Lamb 1997, pp. 59–60.

[[47]](#filepos139631) 這段描述出自Morgan (1941, pp. 81–85)，他也參加了這次晚宴。

## 第三章 命運攸關的結盟

無論是加斯帕里樞機，還是德·拉伊樞機，如果他們以為能輕易擺布新任教宗，那么都將大失所望。庇護十一世絕不是一個孱弱的教宗。他對秩序的熱愛以及對服從權威的深刻直覺，很快就為其統治定下了基調。“他連睡覺的時候都戴著三重冕”，梵蒂岡的一位神父這么開他的玩笑。教宗喜歡說，他的指令“不僅要立即得到執行，而且要比立即更立即”。曾有幾位教士懇求他能解除教會法規中的一條禁令，然而他拒不同意。“制定法規就是為了讓人服從”，他這么告訴他們。早在拉蒂還是米蘭的圖書館館長時，法國高級教士歐仁·蒂斯朗（Eugène Tisserant）便和他結識了，蒂斯朗發現拉蒂前后簡直判若兩人。他們曾經十分親密，蒂斯朗見過拉蒂親切可人的一面。1918年，在法國軍隊任職的蒂斯朗休假出游，來到梵蒂岡圖書館拜訪拉蒂，拉蒂將他帶到本篤十五世面前，介紹道：“圣父，這位是我部署在軍隊的專員。”可如今，他已不再是曾經的他。他“已經被身上全新的使命徹底淹沒”，蒂斯朗評論道，“這使得他在我們眼里顯得特別遙遠”。  [[1]](#_1__Tisserant_1939__pp__389__397)

當選兩周后，新任教宗請來各國駐圣座大使，在這場會談中，教宗第一次表現出對尊卑禮儀的重視。當大使、代表以及眾多助手抵達時，他們發現圣彼得寶座遠遠地坐落于寬闊大廳的另一頭，寶座前只擺放了六張椅子。只有那些具有完全外交身份的大使才被允許落座；其他所有人都只能站著。  [[2]](#_2__Beyens_1934__p__102)

拉蒂對教宗寶座的尊嚴感，甚至強烈到把自己的家庭成員都疏遠了。當謙遜的庇護十世在1903年成為教宗時，他將兩位未婚的姐姐接到羅馬，安置在圣彼得廣場一爿商店上方的小公寓里。她們常常拜訪他，一同談天、飲酒，念誦玫瑰經。拉蒂也曾和他的胞親十分親密，可如今他已經貴為教宗，他們必須先跟他的秘書預約見面時間，并在接待室里耐心等候，才能見到拉蒂。在這些場合下，他還堅持讓哥哥們稱呼他為“圣父”或者“教宗陛下”。而且他還明確地告訴他們，自己不想要頻繁地接見他們，因為他已是一個更大家庭的圣父，這些人都需要他的關注。多年以后，當教宗身患絕癥躺在病榻上，他的姐姐懇求去他的床邊陪侍，卻被拉蒂拒絕了。  [[3]](#_3__Confalonieri_1957__pp__116_1)

拉蒂信守承諾，將加斯帕里任命為國務卿，令狂熱派十分憤怒，然而教會的現代派并不抱持樂觀態度。事實上，他選擇了一個紀念庇護九世和庇護十世的名號，這本身便是不祥之兆。羅馬的一位評論員寫道，在一個國際態勢如此緊張的年代，教會需要一個能夠審時度勢的領袖，而不是“一個極端保守，將一生都奉獻給古文書，幾十年來只知道躲在安波羅修和梵蒂岡閱覽室里的人”。英國駐梵蒂岡大使也對拉蒂印象不佳。他寫道，新任教宗給人的印象就像一個迂腐的老學究：“只需將他的小瓜帽和教士袍替換成中世紀的四角帽和長袍，馬上就會變成維多利亞時代校園故事里的校長。”大使還補充道，教宗為人非常誠懇，此話不假，但他好像把所有的平信徒都當作需要教導的孩子，而不是他也能夠虛心向其學習的人。革命正時時威脅著歐洲，而意大利舊日的秩序已岌岌可危，這個人真的有辦法應對前路上的挑戰嗎？  [[4]](#_4__Zhuan_Yin_Zi_Rhodes_1974__p)

新任教宗為了把自己信任的人布置在周圍，于是把他擔任米蘭大主教時任用的助手都召到了羅馬。他還指定泰奧多林達·班菲（Teodolinda Banfi，或者簡稱作林達）打理他的房間，替他做飯：她已經照顧他三十六年，在此之前還服侍他母親十四年。  [[5]](#_5__Aradi_1958__pp__65_66__Venin)  他還將年輕的米蘭教士卡洛·孔法洛涅里（Carlo Confalonieri）調到羅馬，擔任他的私人秘書。除他以外還有其他幾位米蘭時期的助手，包括迭戈·韋尼尼（Diego Venini）以及姓氏特別不相稱的喬瓦尼·馬爾韋斯蒂蒂（Giovanni Malvestiti，該姓氏的字面意義是“衣衫破爛”），他們負責教宗的衣著儀表。  [[6]](#_6__Chiron_2006__p__126)  盡管拉蒂吃得很簡單，但他偏好林達的廚藝。1926年，當他決定林達退休的時候，他告訴接替她的德國方濟會修士：“盡管我不想多說，但我還是得提醒你，可以有德國人的精確、德國人的沉默，但不能有德國人的菜肴。”  [[7]](#_7__Chiron_2006__p__141)

每天早上6點，鬧鐘會將他叫醒。在做完最早的禱告之后，他會在私人的禮拜堂里做彌撒，然后吃一頓清淡的早餐。他位于四樓  [[8]](#_8__Yi_Da_Li_Ren_Ba_Si_Lou_Jiao)  的公寓一共有三個房間，位于U型使徒宮的左翼，整棟樓包裹著圣達馬索庭院。居于貝尼尼設計的柱廊之上，這座公寓可以將圣彼得廣場納入眼底。拉蒂的臥室十分簡潔，和普通鄉村神父的臥室無甚區別，只有一張黃銅床、一個老式五斗柜，上面蓋著白色的桌布，墻上掛著他父母、他哥哥的照片以及一些宗教畫。

早餐之后，教宗會下一層樓來到他的辦公室（或者用他的話來說，是他的“書房”），開始閱讀每天的書信，以及意大利、德國、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報紙。這間辦公室十分寬敞，家具倒是很少，地板上只鋪了一張不大的地毯，壓在他的辦公桌下面。墻上掛著幾幅古老的畫作。教宗坐在一張路易十五風格的華麗座椅上，書桌上擺放著成堆的圖書和一個大十字架，還有指南針和氣壓計，訴說著他對阿爾卑斯登山往事的懷念。他背后的三扇窗戶對著圣彼得廣場，白天時會把窗簾拉開，好讓陽光進來。拜訪者進來時，會在書桌后面看到一個背靠陽光的白色身影。他的書桌前擺著三張座椅。辦公室里具有教宗個人風格的東西并不多，其中一件便是閱覽架，上面總是打開著一本他喜歡的書。  [[9]](#_9__Dan_Ding_He_Man_Zuo_Ni_Shi_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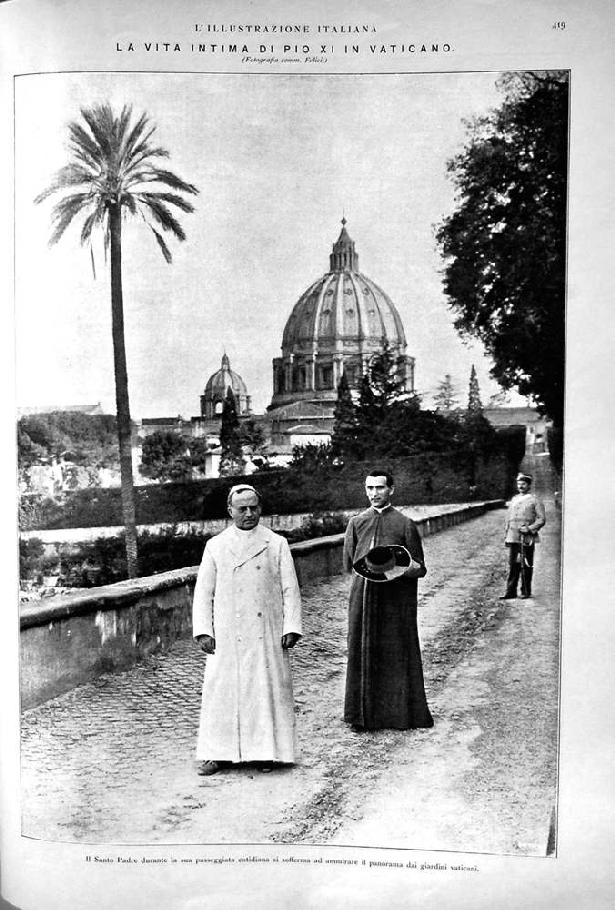
書桌前的庇護十一世，1922年

庇護十一世每天上午9點開始例行的會面，通常先會見他的國務卿。拜訪者進入辦公室時，總會屈膝跪地，其實很多人進來的時候，膝蓋已經開始顫抖了，既因為教宗威權的本質，他莊嚴的舉止，也因為教宗堅持要求自己的命令得到百分之百的服從，所以他的訪客很少能感到輕松自在。這些訪客站起身，向前走幾步，再次行禮，向前再走最后兩步，然后第三次行跪拜禮。由于辦公室的狹窄以及訪客的緊張程度，他們有時候會弄錯禮節。名列最高等級樞機的路易吉·辛塞羅（Luigi Sincero）評論道，準備晉見教宗就好比學生準備考試。其他高級教士也承認自己在穿過教宗的辦公室房門時，會因為緊張而念誦一段禱文。當訪客離開時，他們會再度屈膝跪地，將進來時行的三次跪拜禮反著再做一遍。  [[10]](#_10__Confalonieri_1969__p__36__C)

直到最后一個訪客離開（常常要持續到下午2點），教宗才會去吃午餐。他喜歡吃米蘭風味的調味飯，搭配上藏紅花，或者是熟菜肉排，搭配上一碗濃稠的意大利蔬菜湯，然后再吃點水果。除了幾杯水之外，他還會再喝半杯葡萄酒。他總是堅持一個人吃飯，大概沒有什么別的事情比這更能反映出教宗對于自身威嚴的重視程度了。無論是庇護十世還是本篤十五世，都會跟助手一起吃飯，或者邀請貴賓同他們一起進餐，然而庇護十一世不允許別人在他面前吃飯，盡管他吃飯的時候總會有助手站在他的身邊，為他誦讀報告，并記下他的命令。在他當選幾周后的一天，疲憊的助手不想要在未來的幾年里都只能站著看他吃飯，卻又不敢開口請求，于是就偷偷地把小凳子帶了進來，放到墻邊。當讀完報告后，他們就會坐在小凳子上。從餐盤前抬起頭的教宗盡管面露驚訝的神色，卻沒說什么，于是這些凳子就保留了下來。  [[11]](#_11__Aradi_1958__p__138)

短暫的午覺后，教宗會在下午4點來到外面的庭院，瑞士侍衛隊正在那里等候著他，見到他時，他們會屈膝跪地，右手放在貝雷帽上，左手攥著他們的瑞士長戟。  [[12]](#_12__Lazzarini_1937__p__319)  最開始的幾周里，有一位馬車夫右手舉著長鞭，高高地坐在兩匹神氣的黑馬上方。幾個月后，馬車就換成了教宗的第一輛汽車。短短一程之后，教宗會在梵蒂岡花園里散一個多小時的步，他的雙手反握在身后，頭頂的小瓜帽上還要再扣上一頂黑色軟呢帽。當天氣更為涼爽時，他會穿上一件白色的雙排扣外套，長度一直蓋到他的雙足。教宗會一直環繞著公園行走，這種散步可一點都不閑情逸致，它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強度正適合這位“登山家教宗”。一位身穿褐色長袍、脖頸處露出硬白領的助手會努力跟住他，通常落在幾步之后。

散步結束之后，教宗會花一個小時進行個人禱告，然后才會返回辦公室。晚上6點或者7點，他又要開始新一輪的會面，對象主要是教廷（即圣座的中央政府）成員。會見完最后一位后，他會同秘書一起念誦玫瑰經，然后在晚上10點吃晚餐。他每晚最后一項事務便是返回辦公室，取出一本帶封皮的巨大登記冊。他會把當天收到的所有禮物以及當天產生的所有開銷都登記在上面。直到午夜時分，他才上床睡覺。  [[13]](#_13__Confalonieri_1957__pp__71_7)



在梵蒂岡花園散步的庇護十一世，身后跟隨的是卡洛·孔法洛涅里蒙席

\* \* \* \* \*

由于新生事物的周圍仍然遍布古代、中世紀和早期現代的建筑，所以那些年月的羅馬猶如一鍋大雜燴。自從意大利軍隊在1870年攻占這座城市，整個社會景觀已經徹底改變。修道院被改造成政府大樓和學校。北方人蜂擁而至，在新首都謀求政府職務，而貧窮的農民則把全部家當裝上牛車，從中部和南部趕來。欣欣向榮的建筑行業以及膨脹的公務員人口，創造了許多工作機會。

盡管教會不再管理這座城市，羅馬的每一個街區似乎仍然有一座教堂。身穿黑色教士服的神父，身穿修女服的修女，頭頂削發、身穿白袍的道明會修士，身穿深栗色袍的方濟會修士，身穿藍色教士服、腰纏紅色腰帶的希臘正教神學院學生，以及各色其他修士和神學院學生，在街頭熙熙攘攘。教宗憲兵（Papal Gendarmes）頭戴“拿破侖”帽，下穿紅邊紋褲子，混在士兵和警察之間。而奶媽（雇傭她們的都是中產階級）則懷抱小孩，盡其所能地在擁擠的大街上穿梭。

盡管許多羅馬人對新生事物感到好奇（尤其是電車，其軌道在卵石街道上交錯往來，還有越來越多的汽車，雖然只能行駛在狹窄、蜿蜒、顛簸的道路上），但是這里遍布的跡象表明，這個國家的國民多半是半文盲的農民。馬拉的運酒車從農村駛來，將貨物運往城市里繁多的旅店和客棧。較為豪華的食肆外懸掛著廣告牌，承諾店里供應高級葡萄酒和高檔菜肴。在它們周邊，更為普通的店鋪則僅僅宣傳它們供應面包和面條。果蔬小店遍布路邊，被店里擺放的水果和蔬菜渲染出繽紛的色彩，而這種小店同時也是店主的住處。早春時，葡萄般大小的圣女果會從南方運達羅馬。果蔬商人巧妙地將胡蘿卜、大白蘿卜和西蘭花擺在門市上。羅馬人還習慣在這座城市每天清晨涌現的小市場上采購食品。食品商用橙子、蘋果和無花果壘出壯觀的金字塔。面條商則將剛做出來的通心粉和細面條成堆地擺放出來。脫了毛的雞，雙爪倒掛在貨攤的遮雨棚下。一排排滿滿當當、閃閃發光的魚則吸引著那些買得起的顧客。

更龐大的露天市場（他們的貨攤靠寬大的傘來遮陽擋雨）則吸引著更多樣的顧客。親王府的管家穿著毛皮大衣，從披著編織圍巾的貧苦農婦身邊擠過。經過討價還價之后，婦女將買到的便宜貨包進寬大的方格手帕里。花販將巨大的籃子頂在頭上，里面裝滿了水仙花、含羞草、康乃馨以及紫羅蘭。其他商販則大聲吹噓著他們販賣的衣物、折疊刀和洋蔥，他們把攜帶的器皿扛在肩頭，或者把商品放在托盤上再掛在脖子下面。

小市場中央的桌子邊上，時而會出現一名與眾不同、衣著精致的人物。他四周的板凳上坐著顧客（主要是些老漢和老婦），等著什么時候輪到自己。他的桌上擺著墨水瓶、幾張書寫紙以及一張吸墨紙。他幫文盲撰寫書信、填寫表格。神父們知道哪條街上有商店販賣教士服飾。神學院學生知道哪里有二手書報攤。游客們倚仗旅行手冊，尋找販賣古董和珠寶的商鋪，也不是每一家都賣假貨。時而有老婦人在街旁樸素的神龕前停步，對著灰泥墻上褪色的圣母瑪利亞像和幼年耶穌像吐露一番禱告。

騾子和驢載著磚塊和木桶，頭上的挽具掛下紅纓，背上則搭著紅布。洗好的衣物掛在晾衣繩上，穿過狹窄的街道上空。補鞋匠敲打著鞋子，石匠在狹小陰暗的店鋪里鑿著石塊。窗戶里的女人高聲叫喊，和下方的商販討價還價。她們把錢款裝在籃子里，并用繩索放下去。商販把錢款換成貨物，女人們再把籃子收回去。當灼人的烈日被雨和云遮蔽，羅馬就激蕩出雨傘的海洋，從清道夫破爛的綠色雨傘到身穿制服的仆人們撐在城市精英頭上閃亮的黑色雨傘，不一而足。汽車自是不需要雨傘，除它們之外，幾乎所有交通工具上也都撐起一把傘。“馬車車夫，疲憊而又頸部塌陷的馬匹，還有搖搖晃晃的馬車，就像老蘑菇一樣縮在雨傘下面，”20世紀初的一位評論員寫道，“整個羅馬也找不出幾處比這更怪的景象了。”  [[14]](#_14__Potter_1925__pp__9__242_247)

教宗完全看不到這些生活場景，因為他拒絕踏出梵蒂岡的城墻。幾十年來，每一任教宗都只能忍辱負重，活在這片狹小的天地里，而包裹住它的正是那個當年搶奪教會領土、極大縮減教宗國政治力量的國度。梵蒂岡城外鄰近的區域是一條條破敗擁擠的小街小巷，夾在梵蒂岡宮殿和臺伯河之間，仍然保留著舊政權的氣味、聲音和感覺。只有當游客繞過售賣宗教紀念品的成群小販，向西穿過擁擠的街道，圣彼得大教堂和貝尼尼柱廊的宏偉景象才會突然顯現在眼前。  [[15]](#_15__Potter_1925__p__164)

\* \* \* \* \*

教宗考慮要支持墨索里尼，這一決定令許多教會人士感到吃驚。最難堪的莫過于《公教文明》的主編恩里科·羅薩神父，直到墨索里尼上臺的時候，他還在用這份刊物譴責法西斯主義，認為它是教會最可怕的敵人之一。“進軍羅馬事件”的幾天前，羅薩曾發出警告，表示法西斯運動“是一場與教會作對的暴力事件，領導人都是惡徒……是老自由黨、共濟會、農村地主、富有工廠主、記者和徒有虛名的政客，這場運動是他們失敗后試圖卷土重來的陰謀詭計”。  [[16]](#_16__En_Li_Ke__Luo_Sa____Yi_Da_L)

1848年的自由主義革命將庇護九世驅逐出羅馬，他復歸羅馬不久后就于1850年授意創辦了《公教文明》。每月兩次，主編會帶著即將付梓的校樣來到梵蒂岡國務院，獲取出版的許可。  [[17]](#_17__De_Rosa_1999)

年高五十二歲的羅薩在十七年前加入了耶穌會的這個編輯委員會，并在1915年被教宗本篤十五世任命為該雜志的主編。盡管他從業經驗豐富，卻沒有察覺教宗已然改變了路線。當耶穌會總會長（此人同法西斯主義臭味相投）讀到羅薩最新的反法西斯檄文時，他非常憤怒。他指示羅薩要改變報道方向。  [[18]](#_18__Sale_2007__p__26__Lai_Duo_H)  更糟糕的是，羅薩后知后覺地發現，庇護十一世竟然也改變了心意。教宗似乎和墨索里尼產生了共鳴。盡管他們有著如此巨大的差異，但似乎在許多重要的價值觀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他們都不認同議會民主制。他們都不相信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他們都認為共產主義將帶來極大的威脅。  [[19]](#_19__Ying_Guo_Zhu_Fan_Di_Gang_Da)  他們都認為意大利正深陷泥淖之中，而當前的政治制度已經無藥可救。

教宗與阿戈斯蒂諾·杰梅利（Agostino Gemelli，教宗心腹，圣心天主教大學創始人）的談話，為我們披露了新政府成立之初的幾周內，庇護十一世對墨索里尼有了怎樣的改觀。“贊賞肯定不行”，教宗對他說道。但是，“公開組織反對意見也不是個好辦法，因為我們有多方利益需要保護”。必須小心謹慎。“睜大眼睛看仔細了！”他告誡道。  [[20]](#_20__Zhuan_Yin_Zi_Sale_2007__p)

在即將付梓的那一期刊物中，教宗命羅薩撤掉那篇批判法西斯的文章，轉而刊登一篇更為友好的社論。  [[21]](#_21__Sa_Lai_Zai___Gong_Jiao_Wen)  “當政府以合法的程序建立時，”羅薩改頭換面的文章這么寫道，“即便它一開始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甚至非常可疑……如今我們也有義務去支持它，因為這是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訴求。任何個人或政黨都不可以用非正義的手段，謀劃顛覆政權、改朝換代的詭計。”  [[22]](#_22__En_Li_Ke__Luo_Sa____Zheng_F)

盡管《公教文明》仍然會繼續譴責個別針對天主教組織的法西斯暴行，但它再也不會將矛頭直接指向墨索里尼或者法西斯主義了。它實則扮演了完全相反的角色，將代表梵蒂岡幫助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國內外的天主教界取得合法地位。  [[23]](#_23__Sale_2007__pp__27_28Yong_Ch)

\* \* \* \* \*

當墨索里尼第一次以總理身份在國會上發表講話時，他懇求天主的幫助，并以此結束了演講，這一舉動進一步提升了教宗對這位總理新生出來的希冀。自從現代意大利建國以來，從來沒有哪位政府首腦讓“天主”一詞出現在講話中。國務卿加斯帕里也為這份希冀找到了根據。他告訴比利時大使，“天主利用奇怪的器皿將順境帶給意大利”，而墨索里尼不僅僅是一位“出色的組織者”，還是一位“偉大的人物”。盡管我們得承認，新任總理對宗教一無所知，加斯帕里笑著補充道，墨索里尼以為所有天主教節慶日都定在周日。  [[24]](#_24__Beyens_1934__pp__136_139)

1922年12月，庇護十一世在他題為《奧秘何在》（Ubi Arcano ）的第一則通諭中為自己的任期制定了目標。  [[25]](#_25__Tong_Yu_Shi_Jiao_Zong_Dui_Z)  這個世界正試圖將耶穌基督趕出學校，趕出政府大廳，他對此扼腕嘆息。他悲悼婦女的“衣著和談吐越來越不端莊，參加不體面的舞會”，這是禮儀的崩壞。有觀念認為，社會將教會推開，就能取得進步，他警告說這絕對大錯特錯：“面對廣受贊譽的進步時，我們悲傷地發現，這個社會正緩慢但確定地退回到蠻夷狀態之中。”他強調了服從恰當權威的重要性，并且搬出庇護十世與“現代主義”作斗爭的事業。他輕視新成立的國際聯盟  [[26]](#_26__League_of_Nations___Fan_Er)  ，這個組織寄托了許多歐洲人對和平的希望：“在當今世界，沒有任何世俗機構能夠成功制定國際法，使世界達到和諧；真正的和諧只在中世紀存在過，那個時候的基督教才是主宰世界的國際聯盟。”教宗的規劃是讓基督國降臨到這個世界上。這種觀念本質上已是中世紀的迂腐思想。  [[27]](#_27____Ao_Mi_He_Zai____De_Ying_Y)

與此同時，墨索里尼也在草擬自己的獨裁計劃。“我認為革命有理，”他在國會的開幕致辭里說道，“在這里，我要為黑衫軍的革命辯護，并允許它擴張到最大的限度……我有三十萬具備武裝的年輕人，部署在這個國家的每個角落，準備好執行任何行動，以某種近乎神秘的方式準備好執行我的命令，只要有任何人膽敢中傷法西斯之名，我就能予以懲罰。”  [[28]](#_28__Milza_2000__p__343)

12月下旬，墨索里尼召開了第一屆法西斯大議會，這一會議負責商討政策，處理政黨組織最重要的議題。1月，大議會通過決議，將各色法西斯民兵組織改編為國家安全志愿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這些民兵部隊原先是各地法西斯頭目的武裝力量，如今的墨索里尼急于從他們手中奪取這些部隊的控制權。他們不像常規部隊那樣宣誓向國王效忠，志愿民兵的效忠對象是墨索里尼。  [[29]](#_29__Milza_2000__pp__345_346)

他迅速地行動起來，兌現他對梵蒂岡的承諾，迫切地想要表明，很多人民黨做不到的事情，他全都能辦妥。他能夠幫助教會，重獲意大利統一前所享有的特權。他命令將十字架掛在意大利所有教室的墻上，然后又把它掛進了法庭和醫院病房。他將辱罵神父和詆毀天主教定為犯罪。他重新給軍隊配備了隨軍神父，提高了發給神父和主教的國家津貼。最令梵蒂岡高興的是，他要求小學必須包含天主教課程。他給教會劃撥了大量經費，三百萬里拉用于修復因戰爭而受損的教堂，還給教堂設在國外的意大利人學校發放補貼。當墨索里尼以勝利的姿態巡視全國上下的城市和鄉鎮時，他鼓勵各地主教和教區神父積極申請經費，用于修復教堂。為了進一步凸顯對天主教的支持，他還同雷切爾以及三個孩子（埃達、維托里奧和布魯諾）于1923年正式受洗。比起丈夫，雷切爾的反教會信念更為堅定，但在此等形勢之下，她也只能不情不愿地受洗。她生長于羅馬涅中部的鄉村，年幼時就對教會的神父、財富和權力投去鄙夷的目光。  [[30]](#_30__Motti_2003__Falconi_1967__p)

由于當時意大利國內外的許多媒體評論員還不確定該怎么評價意大利這位新任領袖以及他暴力的法西斯運動，所以梵蒂岡的認可舉足輕重，能幫助新政權取得合法地位。樞機團團長溫琴佐·萬努泰利（Vincenzo Vannutelli）對墨索里尼的評語傳布甚廣，他夸獎墨索里尼“已是意大利人人喝彩的人物，因為他根據意大利的宗教和民間傳統，重塑了這個國家的命運”。  [[31]](#_31__Zhuan_Yin_Zi_Molony_1977__p)

墨索里尼想要快馬加鞭，進一步鞏固與梵蒂岡的關系，于是他會見了梵蒂岡國務卿加斯帕里樞機。加斯帕里和他一樣出身貧寒。“我在1852年5月生于烏西塔鎮（Ussita）的一個小村卡波瓦拉薩（Capovallazza），”加斯帕里在回憶錄里寫道，“村子位于錫比利尼山（Sibillini）中，海拔約七百五十米。清新的空氣，迷人的景色，人民健壯、勤奮、誠實，都生在大家族里，而加斯帕里家族人丁最為興旺。”他的父母育有十個孩子，最年幼的他自然也就成了最受人疼愛的孩子。他的九個哥哥姐姐都“特別健康活潑”，他回憶道，“我卻很虛弱，病怏怏的，所以有人預測，也可能是做了占卜，說我會短命，令媽媽特別難過”。他的父親常常要跟隨羊群在牧場過夜，小彼得羅則給家族帶來了歡樂。當他們都擠在溫暖的壁爐旁取暖時，他便給大家朗讀圣徒的故事。當他講到教會的殉道者面臨可怕的磨難時，他們一起痛苦。“母親是個愛哭鬼，這種性格傳給了所有子女，尤其是我。”  [[32]](#_32__ASV__AESS__pos__515__fasc)



彼得羅·加斯帕里樞機，梵蒂岡國務卿，1914—1930

加斯帕里必須謹慎安排與墨索里尼的會面，因為梵蒂岡國務卿和政府首腦進行會面的事情還不能曝光——圣座尚未承認意大利的合法性。這一秘密會面由加斯帕里的老朋友卡洛·圣圖奇（Carlo Santucci）出面安排。圣圖奇乃是貴族出身，家族同歷任教宗來往密切，他也是人民黨中最先審時度勢的人，很快就轉而支持法西斯黨。他的寓所是一座街角樓，朝兩條不同的街道開有兩扇不同的門，特別適合這種秘密會面。

1月19日，墨索里尼和他的首席幕僚乘坐汽車抵達會面地點，總理進屋會面時，幕僚便在寓所外面等候。墨索里尼從一扇門進屋后，迎接他的是圣圖奇的父親；樞機則從另一扇門進屋，圣圖奇的母親正恭候他的光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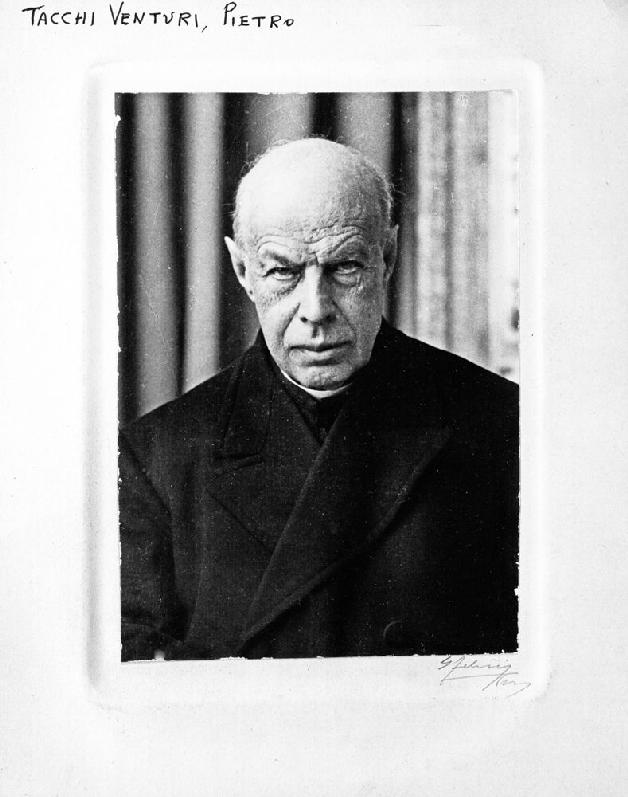
那一天，縈繞在加斯帕里樞機心頭的關鍵問題，并非梵蒂岡愿不愿意幫助墨索里尼結束意大利的民主體制，因為梵蒂岡本身便對民主政府無甚好感，而是墨索里尼是否值得信任，是否會兌現他的承諾，幫助教會恢復在意大利的影響力，以及如果教會予以他支持，他有多大的可能坐穩政權。  [[33]](#_33__Molony_1977__pp__190_191__F)

雖然早年的墨索里尼曾是個出名的“食神父者”（mangiaprete），但是對于現在的他來說，和教會合作將帶來極為豐厚的回報。如果他能夠重建教會和政府之間的和諧關系，為政府贏得教宗的降福，結束雙方之間的沖突，那么他就能在所有前任倒下的地方成功突圍。他就會成為整個天主教界的英雄。

兩人的單獨會面持續了一個半小時。加斯帕里離開時，告訴圣圖奇他對這場會面十分滿意，并稱贊墨索里尼是“第一等的人物”。墨索里尼快步出門時則一言不發。回到車里后，他的幕僚很想知道會面的經過。“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墨索里尼告訴他說，“因為這些教會高層都非常精明。他們先要確定我們政府的穩定性，才肯在初步探討中進一步推進下去。”  [[34]](#_34__Sheng_Tu_Qi_He_A_Qie_Er_Bo)

當天兩人確實達成了一項決議：他們選定了一位秘密的中間人，一個教宗和墨索里尼都能信任的人，兩人都能夠把各自關于最敏感事宜的意見囑托給他。

我們現在還不完全清楚，為什么他們會把這個人選定為六十一歲的耶穌會士彼得羅·塔基·文圖里。  [[35]](#_35__Sa_Lai__2007__pp__36__54_55)  他在1861年生于意大利中部一個興盛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擁有一件令他自己感到驕傲的收藏品，那是一把他在1849年用過的步槍，當時他拿著這把槍幫助教宗擊敗了朱塞佩·加里巴爾迪（Giuseppe Garibaldi）的部隊，最終收復了羅馬。彼得羅年幼時就開始在羅馬研習司鐸之道，當時這個城市剛剛被納入意大利王國的版圖。1896年，他開始為耶穌會撰史，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他把絕大多數時間都花在調研上，走遍了歐洲各地的圖書館、檔案館和修道院。他在1910年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生于奧匈帝國的波蘭裔耶穌會總會長沃齊米日·萊多霍夫斯基被當作敵國子嗣趕出了意大利。塔基·文圖里在1914年被任命為耶穌會秘書長，萊多霍夫斯基走后便由他來負責耶穌會在羅馬的各項活動和事宜。  [[36]](#_36__Scaduto_1956__p__47__Maryks)



耶穌會士彼得羅·塔基·文圖里

“瘦削且嚴肅”，塔基·文圖里的一位同仁這么形容他的外貌。他長著一副簡樸的耶穌會士的面容。謝頂給他造成了圓臉的效果，尖尖的耳朵兜起頭部兩側的白發。他身穿黑色教士袍，脖頸處露出硬白領，渾身散發出嚴厲肅穆的氣息。  [[37]](#_37__Yi_Fen_You_Fa_Xi_Si_Jing_Fa)

阿契爾·拉蒂和這位耶穌會學者相識于1899年，當時塔基·文圖里的一趟調研之旅將他帶到了安波羅修圖書館。  [[38]](#_38__Zai_Ta_Ji__Wen_Tu_Li_Shen_H)  墨索里尼顯然是從弟弟阿納爾多那里聽說了此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阿納爾多曾在羅馬逗留過幾個月，他正是在那時和這位耶穌會士成為朋友的。  [[39]](#_39__Ju_Bei_Ni_Tuo__Mo_Suo_Li_Ni)  在這場秘密會面之前，墨索里尼還親自見過塔基·文圖里。掌權幾周后，墨索里尼意識到他通過一件簡單的事情就可討好教宗，這件事便是把基吉圖書館送給梵蒂岡。政府在1918年買下了基吉宮，作為總理府一直沿用至今。隨基吉宮買下的還有里面的私人圖書館，收藏始于17世紀教宗亞歷山大七世，包含三千部古舊手稿和三萬本藏書。當阿契爾·拉蒂還在擔任梵蒂岡圖書館館長的時候，他聽說政府要買下基吉宮，就試圖通過圖書館的力量強買，卻沒能成功。墨索里尼把這個圖書館捐給教會，拉蒂便派出塔基·文圖里來評估藏書的價值。有一天，墨索里尼聽說這位耶穌會士正好也在基吉宮，大概是想起了他弟弟對塔基·文圖里的美譽，便派人傳話，讓塔基·文圖里前來見他。此后的歷史表明，1922年末的初次會面后，這位耶穌會士還將在余下的二十年間同墨索里尼進行許多次會面。  [[40]](#_40__Tisserant_1939__pp__398_399)

\* \* \* \* \*

然而，初期的探討沒能阻止法西斯分子繼續使用暴力對付神職人員以及被懷疑和人民黨有瓜葛的天主教活動分子。墨索里尼當選總理三周后，意大利東北部城市維琴察（Vicenza）的主教公開譴責他們對當地神父的襲擊，并聲稱行兇者將被驅逐出教會。  [[41]](#_41____Wei_Qin_Cha_Zhu_Jiao_Jiu)  在羅馬以東的阿斯科利皮切諾省（Ascoli Piceno）山區，一群法西斯分子對負責編輯一份當地報紙的神父進行拷問，并強迫他喝下一升蓖麻油。  [[42]](#_42____Zhen_Dui_Shen_Zhi_Bian_Ji)

12月，在西北部的奧斯塔鎮（Aosta），四十名揮舞棍棒的法西斯分子沖入教會場所，打斷了正在進行的天主教青年會會議。他們砸壞了門窗，損毀了臺球桌，用棍棒破壞了墻上的十字架和圣像。當一個憤怒的旁觀者試圖出手阻止時，他們毆打了他。  [[43]](#_43____Ao_Si_Ta_Tian_Zhu_Jiao_Tu)  同一周，帕多瓦（Padua）的幾名法西斯暴徒命令一位年輕人摘下身上的天主教青年會徽章，當他勇敢地拒絕時，一名暴徒拿槍頂著他的頭，而另一名則扯下了那枚徽章。  [[44]](#_44____Qing_Nian_Tian_Zhu_Jiao_T)  此外，12月的一個夜晚，在維琴察附近，一輛汽車停在當地天主教青年會總部門外。七名黑衫軍拿著步槍從車上下來。三人沖入屋內，而其他同黨則守在外面。這些人以步槍威脅屋內二十名受驚的青年，并命令他們保持安靜，然后他們把槍指向了主持會議的兩位神父，強迫他們喝下了幾瓶蓖麻油。  [[45]](#_45____Zhen_Dui_Wei_Qin_Cha_Fu_J)  這樣的暴行持續不斷，貫穿了整個1923年，天主教日報予以充分的報道，并表達了惋惜之情。然而，盡管此后暴行依然時有發生，天主教媒體卻開始對批評尺度有所克制：這些暴行是個別極端分子的行為，并沒有得到墨索里尼的授意。  [[46]](#_46__Ji_Ze_Li_Zi____Fa_Bu_Li_Ya)

各個地方的公教進行會團體（由庇護十世在1905年組建，旨在為組織天主教平信徒提供平臺）是這些破壞行動最頻繁的目標。  [[47]](#_47__Sale_2007__pp__92_94__Polla)  它是庇護十一世最為珍視的團體，他因此也被稱作“公教進行會教宗”。成年男女以及男孩女孩都有各自的團體。大學生也有團體，在各所大學設有分會。公教進行會的活動本是出于宗教和教育的目的，然而實際上遠遠不止這些，因為其成員在教宗眼里是天主教的地面部隊，負責重新教化意大利社會，而這種目的要求他們更加激進，不只是禱告和上課那么簡單。為了密切關注這個組織，教宗委任加斯帕里的兩位副國務卿之一兼替補國務卿朱塞佩·皮扎爾多蒙席，擔任其國家司鐸。組織受到了教會高層的掌控。“你只需聽從來自上層的建議和指令即可”，教宗曾這么向公教進行會領導人解釋過。  [[48]](#_48__Poggi_1967__p__21__Casella)

那些針對地方教區神父以及公教進行會的暴行，令教宗非常不滿、憤怒，但墨索里尼非常善于利用這些暴行，他令教宗相信，他是意大利唯一能夠約束這些暴徒的人。《羅馬觀察報》盡管常常報道法西斯暴徒揮舞大棒以及強灌蓖麻油的惡行，結尾處卻總是畢恭畢敬地懇求墨索里尼，希望他確保這些罪人受到懲罰。有時候，地方情緒會特別高漲，墨索里尼便逮捕幾個人，但是罪犯很少會接受審訊，被判刑的更是少之又少。

及至1923年初，墨索里尼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的策略已經取得成功。他和教宗的協議正在醞釀之中。然而他絕不會放棄自己的暴力手段，因為它能夠行之有效地震懾敵人，不過他也不想過分激怒教宗。他將繼續幫助教會，恢復失卻了幾十年的特權；而作為交換，教宗須鏟除教會內部反對墨索里尼的勢力，為領袖的統治掃清障礙。

[[1]](#filepos154616) Tisserant 1939, pp. 389, 397; Chiron 2006, p. 151.

[[2]](#filepos155149) Beyens 1934, p. 102.

[[3]](#filepos156154) Confalonieri 1957, pp. 116–117. 關于庇護十世，參見Pollard 1999, p. 78。

[[4]](#filepos157386) 轉引自Rhodes 1974, p. 19; Biffi 1997, p. 74。

[[5]](#filepos157853) Aradi 1958, pp. 65–66; Venini 2004, p. 23.

[[6]](#filepos158352) Chiron 2006, p. 126.

[[7]](#filepos158758) Chiron 2006, p. 141。

[[8]](#filepos159070) 意大利人把四樓叫作三樓，把一樓叫作底樓。

[[9]](#filepos160537) 但丁和曼佐尼是這個閱覽架上的常客。Confalonieri 1957, pp. 173, 270–271.

[[10]](#filepos161833) Confalonieri 1969, p. 36; Charles- Roux 1947, p. 10.

[[11]](#filepos163058) Aradi 1958, p. 138.

[[12]](#filepos163416) Lazzarini 1937, p. 319.

[[13]](#filepos164806) Confalonieri 1957, pp. 71–72; Chiron 2006, pp. 141–146. 還有幾張教宗在公園里散步，旁邊停著座駕馬車的照片，收于《意大利畫報》，1922年10月8日，第2–3版。

[[14]](#filepos169925) Potter 1925, pp. 9, 242–247, 254–255; MacKinnon 1927, pp. 44–45, 189–190.

[[15]](#filepos170684) Potter 1925, p. 164.

[[16]](#filepos171513) 恩里科·羅薩，《意大利的統一與意大利人的分裂》，CC 1922 IV, p. 106。

[[17]](#filepos171896) De Rosa 1999.

[[18]](#filepos172437) Sale 2007, p. 26. 萊多霍夫斯基在1922年10月31日寫給羅薩的信，收于《公教文明》檔案，而作為編輯委員會成員的薩萊可以查閱這份檔案。

[[19]](#filepos172930) 英國駐梵蒂岡大使在他的年度報告（寫于1922年10月25日）中寫道：“教宗對俄國共產主義的恐懼似乎主宰了梵蒂岡的一切。”Rhodes 1974, p. 18.

[[20]](#filepos173617) 轉引自Sale 2007, p. 25。

[[21]](#filepos173899) 薩萊在《公教文明》總部查看過羅薩的檔案，然后總結道，教宗似乎就是那個命令羅薩刊登那篇更為友好的社論的人，盡管他沒有提供文字細節。Sale 2007, p. 27。

[[22]](#filepos174371) 恩里科·羅薩，《政府危機與權威危機》，CC 1922 IV, p. 204。

[[23]](#filepos174827) Sale 2007, pp. 27–28用充分的證據得出這一結論。

[[24]](#filepos175744) Beyens 1934, pp. 136–139. “進軍羅馬事件”幾天后，國務卿加斯帕里向法國大使解釋道，國王拒絕動用軍隊是一個正確的決策。他說，法西斯主義“已經成為一種必需品”。Sale 2007, p. 10.

[[25]](#filepos176032) 通諭是教宗對重要事項的高調聲明，通常寫給一個特定國家的主教，而這一篇通諭則寫給全世界所有主教。

[[26]](#filepos176723) League of Nations，《凡爾賽條約》簽訂后組成的國際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被聯合國所取代。

[[27]](#filepos177213) 《奧秘何在》的英語譯文刊登在梵蒂岡的官方網站：http://w2.vatican.va/content/pius-x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23121922\_ubi-arcano-dei-consilio.html。

[[28]](#filepos177831) Milza 2000, p. 343.

[[29]](#filepos178503) Milza 2000, pp. 345–346。

[[30]](#filepos179866) Motti 2003; Falconi 1967, p. 185; Sale 2007, p. 37; Milza 2000, pp. 354, 401. 關于宗教課本需要得到教會許可的規定，參見DDI, series 7, vol. 2, n.155, 1 agosto 1923。關于墨索里尼的巡視以及給地方神職人員發放經費，參見Morgan 1941, p. 239。

[[31]](#filepos180487) 轉引自Molony 1977, p. 152。樞機在參加一場婚禮時說出了這句評語，而墨索里尼當時在場。墨索里尼特別中意這些話，于是將其發送給意大利所有外國大使館。第二天意大利駐英國大使傳來電報，報告說英國的許多報紙都報道了萬努泰利的評語。倫敦的《泰晤士報》宣稱樞機的評語絕不僅僅是他的個人觀點，而是忠實地傳達了圣座的意見。DDI, series 7, vol. 1, n. 535, 22 febbraio1923; DDI, series 7, vol. 1, n. 544, 23 febbraio 1923.

[[32]](#filepos181788) ASV, AESS, pos. 515, fasc. 523, 6. 8r–9r.

[[33]](#filepos183464) Molony 1977, pp. 190–191; Falconi 1967, p. 187.

[[34]](#filepos184512) 圣圖奇和阿切爾博的描述轉載于Pirri 1960。

[[35]](#filepos185022) 薩萊（2007, pp. 36, 54–55）指出，盡管許多歷史學家決定將塔基·文圖里被指定為雙方的秘密中間人的時間認定為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在1月舉行的這次秘密會面，然而并沒有檔案證據證明這種觀點。不過2月初時，塔基·文圖里確實已經開始行使這項職責。

[[36]](#filepos186078) Scaduto 1956, p. 47; Maryks 2012, pp. 302–305; Martina 2003, pp. 234–235; Tramontin1982, p. 63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塔基·文圖里時常和警方接觸，以獲取前往瑞士的許可，而萊多霍夫斯基的辦公室便設在瑞士。戰爭剛剛結束，他就反復在意大利政府當局走動，試圖為萊多霍夫斯基以及其他被放逐的耶穌會士獲取返回羅馬的許可。塔基·文圖里在戰時和戰后同警方的聯絡信息收于ACS, MI, PS,1919, b. 1, “Curia Generaliz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37]](#filepos186767) 一份由法西斯警方安插在梵蒂岡內部的線人撰寫的簡報認為他是一個反改革分子，不過他的主要目標在于為耶穌會謀求利益。ACS, MI,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Città del Vaticano, 23 aprile 1930.

[[38]](#filepos187057) 在塔基·文圖里身后留下的浩瀚材料里有一張小小的明信片。正面是圣母瑪利亞和幼年耶穌的畫像。另一面的鋼筆字跡顯示出這張明信片來自當時出使華沙的拉蒂，內容是感謝塔基·文圖里在他晉牧時發來了恭賀的消息，日期是1919年10月28日。ARSI, TV, b. 29.關于1899年的相逢，參見Maryks 2012, p. 305。

[[39]](#filepos187370) 據貝尼托·墨索里尼所言，阿納爾多的妻子曾經向塔基·文圖里告解。DeBegnac 1990, p. 591.

[[40]](#filepos188519) Tisserant 1939, pp. 398–399; Martina 2003, p. 236.

[[41]](#filepos189068) 《維琴察主教就針對神職人員的暴力行為發表聲明》，OR, 21 novembre 1922,p. 4。然而似乎從未有任何法西斯分子因為對教會人士施暴而被驅逐出教會。

[[42]](#filepos189367) 《針對神職編輯人員的暴行》，OR, 24 novembre 1922, p. 4。

[[43]](#filepos189839) 《奧斯塔天主教團體遭遇破壞行動》，OR, 13 dicembre 1922, p. 4。

[[44]](#filepos190175) 《青年天主教徒慘遭暴力》，OR, 15 dicembre 1922, p. 4。

[[45]](#filepos190682) 《針對維琴察附近神職人員的暴行》，OR, 20 dicembre 1922, p. 4.

[[46]](#filepos191104) 幾則例子：《法布里亞諾的法西斯暴行》，OR, 10 aprile 1923, p. 4；《皮亞琴蒂諾宗教節日受法西斯分子干擾》，OR, 19 aprile 1923, p. 2；《皮亞琴察教區委員會出言抗議》，OR, 20 aprile 1923, p. 2；《法西斯黨要挾破壞圣體大會》，OR, 16 maggio 1923, p. 4；《塞孔迪利亞諾天主教團體遭法西斯黨破壞》，OR, 26 maggio 1923, p. 4。在佩林（2011, p. 183）對韋內托教區每周新聞的分析中，她發現這些報紙都不認為墨索里尼應當對這些暴行負責。在梵蒂岡認可墨索里尼政府的合法地位之后，這種報道形式變得越來越明顯。

[[47]](#filepos191414) Sale 2007, pp. 92–94; Pollard 1985, p. 24.

[[48]](#filepos192320) Poggi 1967, p. 21; Casella 1996, pp. 606–607, 620. 教宗說出這句話的時間是1922年9月。而公教進行會新任國家主席路易吉·科隆博（Luigi Colombo）也非常清楚他的職責，“我不會遵從自己的意見，我會服從圣父威嚴的指令”，Zambarbieri 1982b, p. 114。

## 第四章 天生教宗

1923年春，人民黨發覺自己已經身陷窮途末路。這個政黨主要倚仗的教會支持，現在教宗卻決定要予以收回。4月，梵蒂岡報紙在教宗的授意下告訴讀者，鑒于墨索里尼已經在為教會爭取權益，天主教政黨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當月晚些時候，《公教文明》也緊跟教宗的最新姿態，開始歌頌法西斯政府。“墨索里尼部隊的口號：‘打倒布爾什維克主義！’”這份期刊慷慨激昂道，“正吸引著來自意大利東南西北的支持者和贊同聲……法西斯的一切思想、情感和行動都是對社會主義的抗議和反抗。”它還贊揚了墨索里尼為重建秩序、等級制度以及紀律而做出的努力。這份期刊宣稱：“法西斯主義試圖令精神價值重返它們曾經占據的高位，它們對反擊自由主義至關重要，在法西斯主義試圖復興的精神價值中，最顯著的莫過于宗教教養以及這個國家的天主教情懷。”  [[1]](#_1__OR__17_marzo_1923_Zhuan_Yin)  教宗顯然認為人民黨已經可有可無，在這些跡象的鼓舞之下，墨索里尼發出了一封最后通牒：除非該黨毫無保留地支持他，否則他將撤除該黨的兩位政府部長，并將該黨逐出他的政黨聯盟。人民黨創始人路易吉·斯圖爾佐神父及其同仁拒絕了這一要求，于是兩位部長便被撤職了。  [[2]](#_2____Zi_You_Zhu_Yi_Zhi_Tong)  到這個時候，教宗已經無法再忍受讓斯圖爾佐神父擔任人民黨的負責人了。教宗手下的國內教長在羅馬的一份天主教報紙《意大利郵報》（Corriere d’Italia ）上刊登文章，要求斯圖爾佐立即引退，而讀者都認為這一吁求代表的是教宗本人的意志。  [[3]](#_3__Jin_Guan_Fan_Di_Gang_Gong_Ka)

在幕后，庇護確實提出要求斯圖爾佐引退，這位神父則磨磨蹭蹭，不肯順從。教宗對這種拖延很不耐煩，于是便將他和墨索里尼之間的特使塔基·文圖里派去充當說客。  [[4]](#_4__Jiao_Zong_Tong_Guo_Jia_Si_Pa)  斯圖爾佐抱怨說，這般讓他下臺，教宗實際上摧毀了唯一一個“真正受到基督教教義感召……并且能夠限制……獨裁者專橫統治”的政黨。這番辯解完全無法動搖庇護十一世。  [[5]](#_5__Zhuan_Yin_Zi_Sale_2007__p__8)

斯圖爾佐神父只好不情不愿地順從了教宗的命令。教宗派遣塔基·文圖里和墨索里尼商議公開這一消息的時機，并讓墨索里尼示意媒體低調處理這則消息。教宗表示，政府絕不能將這件事“吹噓成一場勝利”。  [[6]](#_6__Shou_Dao_Jiao_Zong_Ming_Ling)  在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里，這位耶穌會士和墨索里尼密切合作，詳細安排了斯圖爾佐的引退。  [[7]](#_7__Xiang_Xi_Dao_Si_Tu_Er_Zuo_Yi)

庇護原本希望以此緩和人民黨和墨索里尼之間的沖突，有助于止息當前針對人民黨活動分子和神職人員的暴行，但是他的這番行動造成了完全相反的效果。人民黨黨員發現，當教宗清楚明白地收回教會對人民黨的支持之后，他們就越發受到孤立，越發容易受到地方黑衫軍的迫害。8月末，一份法西斯報紙宣稱，政府最大的敵人不再是社會主義，而是人民黨。法西斯分子很快就會出門狩獵。

費拉拉市（Ferrara）郊外的一座小鎮上，有一位名喚喬瓦尼·明佐尼（Giovanni Minzoni）的年輕教區神父。他曾經擔任隨軍神父，因為英勇地奮戰在前線，在當地非常出名；他深受當地青年愛戴，并且忠于人民黨，這些都給當地法西斯黨招募新人造成了阻礙。有一天晚上，當這位神父走在一條黑暗的小巷里前往教區的活動室時，他意識到自己被人跟蹤了。他還沒來得及轉身，就被兩個人撲倒在地，他們用棍棒猛擊他的頭部后逃走了。神父頭上的傷口鮮血直流，掙扎著爬起來又倒下去。后來他勉強站起身，跌跌撞撞地向教堂走去，卻沒能堅持到底，倒在離教堂不遠的地方，失去了意識。驚恐的教區居民發現他倒在那里，腦袋開了瓢卻還活著，就把他抬了進去，但他還是沒有挨過午夜就死掉了。

墨索里尼按照慣例，將這次襲擊怪罪到身份不明的“暗殺者”頭上，表示將毫不留情地追捕他們，并將他們繩之以法。但結果是，雖然襲擊者被找到了，卻沒有受到懲罰。  [[8]](#_8__Sale_2007__pp__69_70)  費拉拉的大主教決定不去參加明佐尼的葬禮，而是派了一位法西斯神父代他前往。梵蒂岡的報紙對這起謀殺作了簡短的報道，評論說這則新聞令墨索里尼感到痛心。  [[9]](#_9__Molony_1977__pp__172_173__Be)  庇護則不予置評，他接受了墨索里尼的說辭，把這場暴行當作是“白癡”和“毫無紀律的同志”的所作所為。  [[10]](#_10__Sale_2007__pp__74_75)

8月中旬，最近的暴力風波還沒有過去，比利時駐圣座大使歐仁·貝恩（Eugène Beyens）晉見了教宗，他發現教宗對共產主義威脅的關心程度，遠勝于法西斯暴行所帶來的威脅。“人類文明之中，”庇護告訴他說，“再也沒有比共產主義更致命的東西了。它只需花去幾天時間，就能摧毀幾個世紀的文化傳承。”只有讓法國、比利時和德國組成聯軍（盡管他們近些年來恩怨不斷）才能阻止共產主義的前進。“墨索里尼可不是拿破侖，他的功勛可能連加富爾（Cavour）  [[11]](#_11__Yi_Da_Li_Wang_Guo_Shou_Ren)  都比不上，”教宗評論道，“不過只有他懂得如何將國家從混亂無序中挽救下來，而這一切都是孱弱的議會體系和三年戰爭導致的。”他還補充道：“你看看他是如何讓整個國家追隨他的腳步的。愿他能振興意大利！只有命中注定成就偉業的人，才能夠為我們帶來如此稀缺的和平。愿天主能夠盡快為我們帶來幾座這樣的燈塔，好讓他們為人類引領前路、啟迪智慧!”  [[12]](#_12__Beyens_1934__pp__167_169)

\* \* \* \* \*

即便在墨索里尼執政早期，還在擔任聯合政府總理時，他就試圖搞個人崇拜。他現身公眾場合時，開始愈發頻繁地身穿法西斯民兵首長的制服，里面穿著黑色的襯衫，腳下踩著騎兵靴。  [[13]](#_13__Navarra_2004__p__42)  他從小的成長環境讓他覺得，體育運動是精英階層的消遣，不適合像他這樣的人，可如今他卻玩起了滑雪、擊劍、賽車、劃船、騎馬和網球。他還曾學習駕駛飛機，只不過因為在1920年墜機而受挫中斷；他僅僅受了一些輕傷，算是非常僥幸。他的擊劍技術不錯，但他怎么也學不好網球，盡管他的私人教練是一位世界冠軍。他在滑雪場拍過不少照片，照片上的他握著滑雪杖，上身光著膀子，腳下也沒有滑雪板，顯示出他對這項運動多么自信。  [[14]](#_14__Baima_Bollone_2007__pp__24)

隨著家人逐漸發胖，墨索里尼也開始擔心自己的體重。他只吃少量的肉，不喝酒，每天都要稱重。他姐姐日漸增長的腰圍令他擔心，于是他強硬地要求她節食，但顯然沒能取得任何效果。“我看過你最近的照片了，”他在1925年給她寫信道，“你簡直胖得有點嚇人。你必須馬上開始減肥。我現在每天只補充基本的營養，你也得跟我一樣，因為肥胖不止有害，還能要了你的命。”  [[15]](#_15__E__Mussolini_1957__p__121)  日漸稀疏的頭發和逐漸后退的發際線也令他煩惱，于是他開始往頭上涂抹各種藥膏，每個早晨都要焦急地查看它們有沒有生效。幾年后，他放棄了這場戰役，給自己剃了個光頭，好讓自己看起來像是一位羅馬皇帝。  [[16]](#_16__R__Mussolini_1974__p__96)

他習慣每天早上往臉上和身體上噴大量的古龍香水，當雷切爾拿他的這個習慣開玩笑時，他回答說，對女人沒有吸引力的男人一文不值。  [[17]](#_17__R__Mussolini_1974__p__96)  雷切爾和他們的三個孩子（埃達、維托里奧以及布魯諾）并沒有隨他來到羅馬，而且墨索里尼也不急著讓他們過來。他一開始住在薩沃亞酒店，然后又搬到了羅馬大酒店，因為瑪格麗塔·薩爾法蒂就住在離這不遠的歐陸酒店。當墨索里尼第一次溜出酒店去和薩爾法蒂幽會時，他的司機便通知了安全部門。很快，歐陸酒店的大廳里出現了形似便衣警察的侍者，他們要對墨索里尼的暗中出訪進行監視。  [[18]](#_18__Milza_2000__pp__354_355)

“我的摯愛，深深的摯愛！”1923年1月1日，也就是墨索里尼上臺的兩個月后，薩爾法蒂攤開旅館信紙，在開頭這么寫道，“我想把你的名字寫在紙上，以此開始我的新年：貝尼托，我的愛，我的愛人，我的摯愛。我屬于你，我要對屋頂大喊，我熱切地、全然地、忠誠地、無可救藥地屬于你，我以此為榮。”只要能抽出時間，墨索里尼就會和薩爾法蒂一起來到她位于米蘭北部科莫湖旁山間的避暑別墅，他們會在那里散步、騎馬，而保鏢會在足夠遠的地方跟隨他們。墨索里尼還喜歡飆車，常常開著他的阿爾法羅密歐帶瑪格麗塔和她十四歲的女兒出去兜風，這種情況會令他的警衛更加頭疼。  [[19]](#_19__Festorazzi_2010__pp__74_77)

瑪格麗塔很快在羅馬給墨索里尼找了一間公寓，他們在那里可以擁有更多私密空間。她還給他找了一名女管家，名叫切西拉·卡羅奇（Cesira Carocci），她是個很能吃苦的短發女人，身材高挑細瘦，基本上沒什么社會教養，人們很快就給她取了個綽號叫老鴇（la ruffiana）。她對墨索里尼非常忠誠，不僅幫他安排和瑪格麗塔的幽會，后來還幫他和其他女人牽線搭橋。

墨索里尼對奢華毫無興趣，他樸素的公寓連廚房都沒有。訪客都說他的客廳總是彌漫著一股廉價古龍香水惡心的香甜氣味，客廳里最顯眼的是一張桌子，墨索里尼將好幾把小提琴都擺在上面。當埃達還在襁褓里的時候，他總是站在她的搖籃邊上陪她玩耍，直到她睡著。在后來的年月里，當他在公寓里等候司機載他前往辦公室的時候，他有時會打開自動鋼琴，然后拉一曲小提琴伴奏曲。  [[20]](#_20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_1)

考慮到墨索里尼一邊有那么多長期的情婦，一邊還時不時地搞搞一夜情（一下午情或許更準確一些），我們不得不佩服他不僅能找出時間執掌政府，還堅持過問哪怕最為瑣碎的細節。他只信任一個人，那就是他的弟弟阿納爾多。如今阿爾納多主管著《意大利人民報》。他每天都要跟阿納爾多通電話，跟薩爾法蒂的聯絡倒要少一些。他每天都要查看一大堆警察報告和政府報告，同許多人會面，并且瀏覽一大堆報紙。他告訴一位副官：“我習慣于瀏覽意大利所有的報紙，甚至包括那些根本不值得一讀的東西。”  [[21]](#_21__Zhuan_Yin_Zi_De_Felice_1966)

過去的總理要么出身貴族，要么是職業精英，他們并沒有群眾基礎，也沒有真正的政黨背景，并且對民意支持毫不關心。要讓他們去到全國各地組織公眾集會，肯定會令他們感到厭惡，他們很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要做這種事情。

如今坐上這個位置的卻是一位來自米蘭的鐵匠之子，他是一個煽動暴民的前社會黨人，他炫耀著自己卑微的出身，渾身散發著男子氣概，深受大眾歡迎。很快，墨索里尼就開始前往各個城鎮，去到那些從來都沒有人見過國家元首的地方，用他蠱惑人心的長篇大論，忠告那些出于好奇心而前來聽講的民眾。他很快就要成為集體催眠的大師。他深諳一個所有前任都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民眾首先受到情感的驅使，而他們對現實的認知很容易被他塑造的象征世界所歪曲，反倒和真實的外部世界沒有太多關聯。

在克雷莫納，他用一套近乎儀式的方法呼喚大眾的回應，這將成為他最具力量的演講技巧。

“勝利屬于誰？”他大聲呼喊道。

“屬于我們！”他們大聲回應。

“榮耀屬于誰？”

“屬于我們！”

“意大利屬于誰？”

“屬于我們！”  [[22]](#_22__Ke_Lei_Mo_Na_De_Zhe_Fan_Mia)

1923年5月到10月，墨索里尼走訪了意大利的許多鄉鎮和城市，從北部的威尼斯、倫巴第和皮埃蒙特（Piedmont），到中部的艾米利亞（Emilia）、托斯卡納（Tuscany）和阿布魯佐（Abruzzo），再到南部的那不勒斯（Naples），以及意大利的兩大島嶼：西西里島和撒丁島。撒丁島成為意大利領土的六十年以來，從來沒有哪位意大利總理正式訪問過那里。第二年，墨索里尼又將行程重復了一遍。人們都非常渴求強勢的領導人，一個能夠帶來穩定、秩序和美好未來的救世主。社會上層認為他消除了共產主義的威脅，而在其他人眼里，他是人民之子（figlio del popolo），是普羅大眾的一員。  [[23]](#_23__Gentile_1993__pp__281_282)

羅馬的各國使節認為墨索里尼是一個頗為有趣又高深莫測的人物。比利時駐圣座大使在參加過一場外交接待會之后，記錄下自己的觀察：墨索里尼穩穩地站在房間中央，下巴高高抬起，對于那些上前問好的人，他只是簡短地回答幾句。“他嚴肅、傲慢的臉龐，他的沉默寡言，讓人完全看不透。從他這副青銅面具上，從他堅毅的雙眼中，我們只能讀出一種少見的精氣神。”大使回憶道，他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晚上，他留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面若寒冰之人，完全不受恐懼的侵擾，完全不受情感的支配”。  [[24]](#_24__Beyens_1934__p__245)

墨索里尼還繼續通過施壓和回報并用的方式，拿捏得當地處理他和教宗的關系。由于法西斯暴徒仍然在攻擊人民黨地方領袖，入侵他們的總部，墨索里尼便把自己塑造成唯一能夠控制這些狂熱法西斯分子的人。同時他還慷慨解囊，撥給教會大量經費，給予其很多特權。他還推動國會通過了一項新法律，如果有任何一家報紙的編輯敢于貶損教宗抑或天主教，那么警察就可以依據這條法律將其解雇。他還順應梵蒂岡的請求，規定只有經過教會許可的圖書，才能用于學校的宗教課程。他還同意關閉賭場。他令圣心天主教大學得到國家的認可。他發表聲明反對離婚。他出手挽救了羅馬銀行，這家瀕臨倒閉的銀行與梵蒂岡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十字架又回到了這個國家的教室，宗教節日也被納入民歷之中。他還拿出豐厚的資金，用來修復那些在戰爭中損毀的教堂。這份清單還有很長很長。  [[25]](#_25__DDI__series_7__vol__2__n__1)

教宗自己也很清楚，教會回報給墨索里尼的支持是無價的。1923年9月，梵蒂岡在《天主教與墨索里尼政府合作項目》（Program of Collaboration of the Catholics with the Mussolini Government）中將這一玄機道明了，這份文件指出，墨索里尼已經意識到，盡管法西斯黨將他推上權力的頂峰，但他如今最好不要過分依賴它。這些人混亂無紀，連墨索里尼也沒法完全控制住他們。他需要得到“一群新民眾”的支持，而這些人最好是天主教徒，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自上而下的統治。教會高層中，一開始曾有人對墨索里尼抱有疑心，如今卻坦言他們之前判斷失誤了。“他們不得不承認，沒有哪屆意大利政府，可能整個世界都不會有這樣的政府，可以在一年之內給天主教會帶來這么多好處。”

這也不是梵蒂岡支持墨索里尼的唯一緣由：“如果顛覆分子通過暴動推翻了墨索里尼閣下的政府，那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么樣的事情，天主教徒能夠想到的只有恐懼，所以他們與墨索里尼休戚相關，必須要支持他。”總而言之，梵蒂岡的文件在結尾處寫道：“從任何方面來說，讓天主教眾支持墨索里尼閣下的政府，將會是整個意大利能夠想象得到的最可靠、最令人安心的組合。”  [[26]](#_26__ASV__AESI__pos__573__fasc)

\* \* \* \* \*

11月，在墨索里尼的指使下，法西斯黨洗劫了前總理弗朗切斯科·尼蒂（Francesco Nitti）位于羅馬中心的住宅。教宗沒有出手阻止，而那些搶奪者則耀武揚威地穿過城市街道。12月的一個上午，內閣前任部長、廣受尊敬的國會自由黨反對派喬瓦尼·阿門多拉（Giovanni Amendola），也在他位于羅馬市區的住宅附近遭人毆打。四名法西斯分子用棍棒毆打他的脖頸和面部，施暴完畢就跳進在旁等候的汽車，揚長而去。墨索里尼手下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在報道這起事件時評論說，阿門多拉不過是罪有應得。我們并不清楚這起攻擊是否由墨索里尼親自下令，然而它顯然是法西斯黨威懾策略的一部分，而這種策略受到墨索里尼的大力鼓動。  [[27]](#_27__CC_1924_I__p__175__Huan_Bao)

意大利北方是巴伐利亞的首府慕尼黑，這里也有墨索里尼的信徒在法西斯革命的激勵下發起暴動。11月8日，阿道夫·希特勒試圖模仿墨索里尼去年進軍羅馬的事跡，在當地一家大型啤酒酒肆宣布要發起革命，時年三十四歲的他唇上已經留起了髭須，一直想通過煽動群情幫助自己上位。此次納粹革命運動已經采取了意大利法西斯黨的羅馬式直臂軍禮。希特勒的信徒嘴里聲嘶力竭地喊著“勝利萬歲（Sieg Heil）！”，成功占據了地方警察局，卻在攻打巴伐利亞陸軍部隊時遭遇了失利。最終，十人喪命，希特勒則遭到逮捕。他在監獄里蹲了一年，并利用這段時間寫出了《我的奮斗》（Mein Kampf ），這本書后來成了他所向披靡的動員令。當時，墨索里尼可想不到，有一天他的命運會跟這個鋃鐺入獄的德國極端分子連到一起。

意大利將在1924年4月進行新一輪全國大選，這是墨索里尼掌權后的第一次大選。法西斯暴行在全國肆虐開來。墨索里尼一邊指揮法西斯黨人對政敵進行毆打乃至動用更加惡劣的手段，卻一邊又繼續引入各種措施為教會謀求利益。新一批官方節日中包括了好幾個天主教節日，在此之前，它們從未受到政府的認可。墨索里尼還開始將矛頭指向新教組織，因為他知道這樣能夠討好教宗：墨索里尼不僅否決了衛理公會在羅馬修建大教堂的請求，還駁回了基督教青年會在意大利修建活動中心的提案。天主教神學院的學生不必服兵役。大選三天前，他還大幅增加了國家發給主教和神父的酬金，令他們十分高興。  [[28]](#_28__Sale_2007__p__333__CC_1924)

4月初，梵蒂岡半官方刊物《公教文明》發行了大選之前的最后一期，它為墨索里尼辯護，認為法西斯黨內盡管有個別反教會成員行為不端，但這種現象不應該模糊以下事實，即墨索里尼總是不知疲倦地改善政府和教會的關系。雜志提醒讀者，法西斯黨為教會帶來了如此多的利益，相形之下人民黨做成的事情簡直少得可憐。  [[29]](#_29__Bao_Kuo_Jiang_Zheng_Fu_Fa_F)

選舉安排在4月6日。“進軍羅馬事件”四人組之一的伊塔洛·巴爾博，在位于費拉拉市的總部給黑衫軍下達命令。他們到每一個投票站抓住第一個上前投票的人，一邊毆打他，一邊叫道，“混賬東西，你竟然給社會黨人投票”。當然了，這個可憐的家伙可能原本打算把票投給法西斯黨人，要是真是如此，“那也只能算他倒霉了”，巴爾博說道。  [[30]](#_30__Ebner_2011__p__38)

通過毆打反對黨候選人，燒毀反對黨報社以及破壞反對黨的拉票活動，法西斯一派（包括支持他們的法西斯黨外人士）一共贏得了三分之二的選票；法西斯黨人贏得了二百七十五席，即便不算他們的同盟，也已經占據了絕對的多數。在反對黨中，人民黨占得三十九席，社會黨占得四十六席，而共產黨占得十九席。余下的少量席位則被共和黨、自由黨以及其他小黨派瓜分了。墨索里尼嘗到了勝利的滋味。“以后再也不會有這樣的選舉了。下一次，我的選票將代表所有人的意志。”  [[31]](#_31__Zhuan_Yin_Zi_Sale_2007__p)

次日，那些在大選中表現出色的人民黨活動家和地方神職人員就遭到了法西斯黨人的攻擊。在威尼斯城外的一座小鎮上，武裝的法西斯黨在夜里來到了一位教區神父的家中。家里只有他的姐姐，法西斯黨對她進行一番毆打后，感覺還不過癮，又毆打了助理神父。

此番對神職人員和天主教組織的攻擊激怒了梵蒂岡國務院的某位人士，于是他印制了一批傳單，準備寄給意大利的所有主教，告訴他們不要參加法西斯勝利慶典，并尤其禁止他們為了向法西斯黨表示感謝而舉行特殊的彌撒。然而盡管這些傳單都印出來了，但它們還是沒能離開梵蒂岡。傳單原稿（如今收于檔案之中）的邊緣寫有一行批示：“這份傳單不能寄送出去。奉國務卿蒙席之命。”毫無疑問，加斯帕里顯然跟教宗商討過這件事情，決定最好不要做任何可能激怒墨索里尼的事情。  [[32]](#_32__Zhuan_Yin_Zi_Sale_2007__pp)

\* \* \* \* \*

庇護十一世如今已經形成了固定的行為習慣。他的下屬擔心受他責罵，天天都活在緊張害怕之中。他粗暴地對待那些令他不快的人，而即便是最位高權重的國家首腦，也無法威嚇他分毫。當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來梵蒂岡拜訪教宗時，他犯了一個錯誤，要求教宗給南美任命更多樞機。當時整個南美大陸只有一名樞機。教宗不滿國王的這番請求，認為他試圖以不當的方式對自己施加影響，于是一怒之下決定不再按照原計劃提拔管家里卡多·桑斯·德·桑佩爾（Ricardo Sanz de Samper）蒙席，就因為他來自哥倫比亞。教宗不想顯露出任何向國王屈服的姿態。  [[33]](#_33__Chiron_2006__p__152__Confal)

然而，一些特別的訪客卻能令他重新煥發早年熱情的光彩。庇護曾邀請法國知識分子讓·卡雷爾（Jean Carrère）私下會談，詢問他對諸多法國和意大利文人有何見解。在他回答教宗的問題時，教宗（據卡雷爾描述）面帶“禮貌的優越感”注視著他。然后卡雷爾提到了曼佐尼，并把《約婚夫婦》稱為一本世界級名著。當他說出這些話時，“在我看來，”這位法國人回憶道，“這位令人敬畏的談話人神情完全改變。他臉上原本帶著禮貌的仁慈，卻突然變得笑意滿面、和藹可親。”教宗告訴他說，曼佐尼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還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而卡雷爾高興地看到，這位身穿白袍的教宗開始憑借記憶背誦曼佐尼的詩句，聲音輕柔而抑揚頓挫。  [[34]](#_34__Lazzarini_1937__pp__309_310)

本篤十五世似乎被教宗繁重的事務所壓垮，庇護十一世卻表現出登山者的充沛精力。“他天生就是個王者”，孔法洛涅里說道，此人乃是教宗從米蘭調到梵蒂岡的私人秘書。法國大使后來也觀察到，他渾身散發出當權者的氣息。  [[35]](#_35__Confalonieri_1957__p__172)  教宗還在遵循正當程序方面頗為偏執。一天下午，在梵蒂岡花園里散步時，他看到面前的道路上躺著一封信，上面用大寫字母寫著“致教宗陛下”。當天陪他散步的是博洛尼亞大主教，大主教不假思索地彎下腰撿起了那封信，把信遞給了教宗。

“在哪里看到的，就放回到哪里去，”教宗厲聲說道，“這不是正確的送信方式。”

大主教于是便把信放回到路上，然后他們繼續散步。  [[36]](#_36__Chiron_2006__p__151)

盡管教宗在圖書館工作了許多年，但在孔法洛涅里蒙席眼中，他的性格與其說像是一位圖書館館員，倒不如說更像是一位小商販。這位年輕的神父將教宗的性格歸于他的出身，因為他的家鄉是工業區，那里的人正是以這種性格聞名的。庇護十一世總是用確切的語言思考，而對即席演說感到不適應。他堅持對一切事物進行理性思考，并事無巨細地考察所有呈遞給他的報告。他一旦做出決定，就會非常堅持，批評只能令他越發固執己見。前任國務卿梅里·德爾瓦爾樞機抱怨道，教宗簡直“固執得像一頭騾子”。  [[37]](#_37__Durand_2010__Mei_Li__De_Er)

盡管教宗和墨索里尼在表面上相差甚遠，實際上卻有很多相同點。兩人都沒有真正的朋友，因為友誼意味著平等。兩人都堅持要別人順從自己，而他們身邊的人一想到自己可能說錯話，惹得他們不高興，都要膽戰心驚。他們是一對奇怪的組合，但教宗很快就知道，和這位曾經的“食神父者”共進退能給他帶來很多好處。結果，在“進軍羅馬事件”一年后，法西斯革命轉變成了教會法西斯革命。一對新的合作關系已然成形。不過這對關系馬上就要面臨一場意料之外的威脅，很快就要發生一件事情，差點讓墨索里尼下臺。

[[1]](#filepos207519) OR, 17 marzo 1923,轉引自Coppa 1999, p. 89;《自由主義之痛》，CC 1923 II pp.209–218。

[[2]](#filepos208001) 《自由主義之痛》，CC 1923 II pp. 209–218。我們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羅馬觀察報》的報道乃是順從教宗的意愿，但是考慮到梵蒂岡立場的急劇轉變，任何其他解釋都站不住陣腳。

[[3]](#filepos208445) 盡管梵蒂岡公開否認了這一猜測，表示恩里科·普奇蒙席的文章僅僅代表他的個人意志，但后來一份法西斯警察的秘密簡報則認為普奇當時發表這篇文章，“不過是在嚴格按照國務卿的指示行事”。ACS, MI, FP “Pucci,” f. 19, n.d.教會曾發表過一份半公開的聲明，否認普奇呼吁斯圖爾佐引退跟教會有任何關系，參見CC 1923 III,p. 184。

[[4]](#filepos208812) 教宗通過加斯帕里傳達了這項旨意，后者在7月5日致信塔基·文圖里，開篇就寫道：“出于某些不必坦言的原因，圣父允許斯圖爾佐神父推遲他的答復……現下，在天主面前長久深思之后，圣父認為在意大利當前的局勢之下，由一位神父領導一個政黨（尤其是反對當前政府的政黨），必然會給教會帶來損害，只會令共濟會竊喜。”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f. 5, Gasparri a Tacchi Venturi, 5 luglio 1923.這些文檔轉引自Sale 2007, pp. 80–84，并附有深入的討論。

[[5]](#filepos209157) 轉引自Sale 2007, p. 82。

[[6]](#filepos209578) 收到教宗命令后，斯圖爾佐安排了一場人民黨理事會緊急會議，時間定在7月10日，他不希望在自己告知理事會成員之前，就讓教宗的命令泄露出去。

[[7]](#filepos209815) 詳細到斯圖爾佐引退消息公開的確切時間。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6. 14–15. 而且，塔基·文圖里也迫切地想要墨索里尼做出承諾，不去傷害斯圖爾佐神父。

[[8]](#filepos211680) Sale 2007, pp. 69–70.

[[9]](#filepos212010) Molony 1977, pp. 172–173; Bedeschi 1973.

[[10]](#filepos212268) Sale 2007, pp. 74–75.

[[11]](#filepos213023) 意大利王國首任總理，開國三杰之一，他是意大利獨立和推行君主立憲制的一大功臣。

[[12]](#filepos213622) Beyens 1934, pp. 167–169.

[[13]](#filepos214086) Navarra 2004, p. 42.

[[14]](#filepos214784) Baima Bollone 2007, pp. 24–26.

[[15]](#filepos215430) E. Mussolini 1957, p. 121.

[[16]](#filepos215827) R. Mussolini 1974, p. 96.

[[17]](#filepos216154) R. Mussolini 1974, p. 96.

[[18]](#filepos216796) Milza 2000, pp. 354–355.

[[19]](#filepos217723) Festorazzi 2010, pp. 74–77.

[[20]](#filepos218889)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273–274; E. Mussolini 1957, p. 32; Navarra 2004, p.48.

[[21]](#filepos219711) 轉引自De Felice 1966, pp. 472–473。

[[22]](#filepos221380) 克雷莫納的這番描述出自莫內利（1953, p. 102）。在法西斯政府運用的象征、儀式和神話方面，秦梯利（1993, pp. 160–172; 2001）是最具影響力的學者。儀式對于政治運動來說非常重要，關于其中的原因以及儀式起作用的方式，參見Kertzer 1988。

[[23]](#filepos222284) Gentile 1993, pp. 281–282.

[[24]](#filepos223109) Beyens 1934, p. 245.

[[25]](#filepos224297) DDI, series 7, vol. 2, n. 155, Mussolini a Gentile, 1 agosto 1923; Talbot 2007, p. 27; Sale2007, pp. 37, 96; Gentile 2010, p. 107; Milza 2000, p. 432.

[[26]](#filepos225866) ASV, AESI, pos. 573, fasc. 22, 15, 25 settembre 1923, 轉引自Sale 2007, pp. 320–322。

[[27]](#filepos226919) CC 1924 I, p. 175, 還包含一段來自《意大利人民報》的節選。

[[28]](#filepos228854) Sale 2007, p. 333; CC 1924 I, p. 80.

[[29]](#filepos229428) 包括將政府發放給主教的酬金從每年6 000里拉提高到每年12 000里拉，將發放給教區神父的報酬從每年1 500里拉提高到每年2 500里拉。CC 1924 II, p. 82.

[[30]](#filepos230029) Ebner 2011, p. 38.

[[31]](#filepos230812) 轉引自Sale 2007, p. 130。

[[32]](#filepos231978) 轉引自Sale 2007, pp. 134–137。這份印刷傳單收于ASV, AESI, pos. 617, fasc. 50, 6. 30r,30v; 命其不得寄送的批示寫在f. 47r。

[[33]](#filepos232947) Chiron 2006, p. 152; Confalonieri 1957, p. 172.

[[34]](#filepos233952) Lazzarini 1937, pp. 309–310.拉扎里尼并沒給出教宗約見卡雷爾的時間，但表示這次約見發生在他的作品《教宗》（1924）付梓不久之后。

[[35]](#filepos234399) Confalonieri 1957, p. 172; Charles- Roux 1947, p. 14.

[[36]](#filepos235079) Chiron 2006, p. 151.

[[37]](#filepos235900) Durand 2010. 梅里·德爾瓦爾在1927年如此評價教宗，這句話后來又傳回到教宗耳朵里，教宗把他召到面前，用叱責的話語羞辱了他。他描述這次召見時寫道：“教宗罵我的方式簡直像是在訓斥年幼的學生。”Durand 2010, pp. 48–49.

## 第五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1924年5月30日，新一屆國會會議進行到第三天，賈科莫·馬泰奧蒂在法西斯代表的嘲諷和要挾聲中大步走向眾議院的主席臺。兩年前，社會黨清洗溫和派，馬泰奧蒂因此被驅逐出黨，此后他創建了秉持改良主義的統一社會黨。今天他將向眾人傳達一個信息：剛剛結束的國會選舉摻雜了太多暴力因素，其結果應該被推翻。他詳細地講述著發生在全國各地的選民恐嚇事件，而法西斯代表則不斷地出言打斷他。“說謊!”他們喊道，“滾回俄羅斯去！”一位法西斯黨人大叫道：“已經夠了！我們還待在這里干什么？難道我們還要忍受這番侮辱？”一排怒不可遏的法西斯代表以脅迫的姿態逼近會議廳前部。“你這種人怎么能進國會！”一人叫道，“你這種人應該被軟禁起來！”  [[1]](#_1__Jia_Ke_Mo__Ma_Tai_Ao_Di____Q)  在被打斷了幾十次后，他只好放棄演說，而法西斯黨喝倒彩的聲音蓋過了反對黨的鼓掌聲。“現在你們得準備幫我寫訃告了”，馬泰奧蒂在走出會議廳后，對他的一位同仁說道。

墨索里尼也出席了這場會議，他的憤怒有如雷霆。他對新聞秘書切薩雷·羅西（Cesare Rossi）說道：“我們不能再讓這個人在社會上活動。”



賈科莫·馬泰奧蒂（左三）

6月10日，馬泰奧蒂將再度在國會會議上發言，這一次，他要譴責墨索里尼政府的貪污腐敗。他家住在人民廣場附近，午餐過后，他動身向眾議院走去，路上突然冒出兩個人，一把抓住他，想要將他拽進旁邊的一輛轎車。盡管三十九歲的馬泰奧蒂并不高大也不魁梧，但勇敢而敏捷，他將一位來襲者摔倒在地，正要掙脫另一位來襲者時，出現了一個戴著指節銅環的人，一拳正中他的面部。三人將半昏過去的議員拖到汽車里，他又起身掙扎，雙拳砸在兩排座位間的玻璃隔板上，而那些綁架者則殘酷地對他拳腳相加。

汽車駛過羅馬的街道，司機不斷按響喇叭以便蓋過馬泰奧蒂求救的呼喊。呼救聲很快就停止了，因為馬泰奧蒂死掉了。他們是否受命將他殺死，這個問題還有待討論，然而現在倒在他們膝蓋上的，已經是一具尸體。這些人立即動身尋找拋尸的地點。他們駛到羅馬城外約十五英里處，在離公路不遠的一片樹林里將他草草埋下。  [[2]](#_2__Milza_2000__pp__365_367__De)

當天傍晚，馬泰奧蒂的妻子沒等到丈夫回家吃晚飯，經過一番問詢，她才發現馬泰奧蒂根本沒有出現在國會。她很快報了警。次日晚上，便有目擊證人聲稱，目睹了這位前社會黨人被粗暴地劫持，塞進汽車，然后瘋狂逃逸的場景。

一位杰出的國會議員，只因批評了法西斯黨，就在次日遭受暴力劫持，除了那些鐵石心腸的法西斯分子外，這一事件令所有人都感到震驚。群情激昂之下，墨索里尼試圖和這起謀殺案撇清關系。6月14日，他解除了警察部門負責人以及內務部副部長的職務。眾人的疑心又落到了切薩雷·羅西頭上，他不僅僅是墨索里尼的新聞秘書，手下還有一幫法西斯秘密打手。羅西只好躲藏起來。其他法西斯高層也很快落入了調查的大網。

從劫持用車取得的證據，幫助警方瞄準了殺害社會黨議員的兇手。他們的首領阿梅里戈·杜米尼（Amerigo Dumini）曾向同黨夸口，說自己已經根據政府最高層的指令，取了十幾個人的性命。杜米尼是個美國人，1894年生于圣路易斯，他的父親是一位意大利移民，母親則是個英國人。他十幾歲時回遷至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軍入伍，后來成了墨索里尼最信任的心腹之一，在羅西的門下做事。

五個月前，墨索里尼曾和羅西以及數位法西斯巨頭碰面，商議創建一支秘密隊伍用于執行各種暴力使命，杜米尼便受托組建這支隊伍。6月，他很可能是受到羅西的指使，劫持了馬泰奧蒂。  [[3]](#_3__Milza_2000__p__370__CC_1924)

整個國家頓時陷入了騷亂。因為毆打煽動群情的社會黨人、把蓖麻油灌進他們嘴里是一回事，而謀殺國會反對黨領導人且所有證據表明幕后黑手來自法西斯政權最高層則是另一回事，兩者不能同日而語。而且這起兇案于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在羅馬中心地帶，這種肆無忌憚令公眾怒不可遏。一年半前，墨索里尼從一場暴力革命的首領一躍成為廣受尊敬的政府首腦，他的許多擁躉都以為（或至少希望），他已經將殘忍的過往拋在身后。然而馬泰奧蒂慘案表明，這種想法顯然太過天真。墨索里尼小心翼翼地從各方（老一輩民族主義者和自由黨，以及大量的實業家和小商店主）獲得支持，所有這些即將土崩瓦解。  [[4]](#_4__De_Felice_1966__p__630)

6月底，馬泰奧蒂的尸首依然下落不明。反對黨議員經過會面后宣誓，除非墨索里尼解散法西斯民兵以及其他用于恐嚇反對黨的秘密組織，否則他們就不參加下一次會議。

保守派的報紙開始轉變方向，將矛頭指向了墨索里尼。原先還支持他的《意大利日報》（Il Giornale d’Italia ）表示，犯下謀殺罪行的兇手必須被徹底曝光。那些支持墨索里尼的中產階級多數派也開始轉變觀念：他們想要的是保守的民族主義政府，而不是一個嗜血的獨裁者。人們開始撕毀法西斯黨員證，而當議會反對派走過羅馬街頭時，路人開始向他們致以掌聲。在部分地區，法西斯民兵曾驕傲地走過街頭，如今他們卻不敢身穿制服在公眾場合露面。  [[5]](#_5__Milza_2000__p__378)  政府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刻，它的垮臺似乎已經難以挽回。

曾經的一連串成功令墨索里尼自我膨脹，可如今他憂心忡忡，更加讓人不敢接近。他的心情極度抑郁，即便最親近的助理也不敢前去見他。“基吉宮里彌漫著一股墓穴的氣息”，他的助理昆托·納瓦拉說道。  [[6]](#_6__De_Felice_1966__p__644__Hou)

這里的寂靜尤其刺耳。過去，每當這位喧鬧的暴君教訓或者威嚇下屬時，他的叫喊聲通常會穿透辦公室的大門，可如今門板的另一頭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在危機最深重的那天，納瓦拉來到總理的辦公室：“說起那天的墨索里尼，我早上打開門時，有點嚇到他，他只是顯得有些心煩，跟平日簡直判若兩人。”這個沮喪的人坐在那里不停地左右搖頭，來回撞著高靠背椅的鍍金木邊框的兩側，睜圓了雙眼，又是鼻子里哼氣，又是嘴里喃喃自語。  [[7]](#_7__Navarra_2004__pp__25_27)

竊聽裝置（他顯然命令警察竊聽他情婦的電話）捕捉到墨索里尼在電話里跟瑪格麗塔·薩爾法蒂訴苦。

“你怎么樣？”她問道。

“你指望我能怎么樣？”

“有沒有什么進展？”

“什么也沒有……到這個地步，任何事情都不會讓我吃驚了……我那些所謂的朋友都背叛了我，最令我不快的是，我甚至不知道這些家伙都在想些什么。”

瑪格麗塔警醒他，不要讓怒火蒙蔽了他的判斷力。

“根本就不是發火的問題，”墨索里尼回答道，“很不幸的是，命運顯然把好牌發到了敵人手里。如果我輸了，那么基本可以確定的是，我沒有機會保住自己的顏面！”  [[8]](#_8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9)

盡管墨索里尼試圖和這起謀殺案撇清干系，那些罪犯的身份卻將他暴露了出來，因為其中包含他最親近的人。法西斯政權似乎要走到盡頭了。

參議院（其成員由國王選擇，而非通過選舉產生）在謀殺案兩周后重新開幕。墨索里尼在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他表示自己跟所有人一樣，迫切地想要將這起案件查個水落石出，他表明一定要將殺人犯繩之以法。他還說對某些政府高層官員非常失望。他所說的這一切都是為了表明自己的誠摯與清白。  [[9]](#_9__CC_1924_III__pp__85_87)  盡管大部分人都認為，這番演說沒法替他開脫，卻有一個人稱贊了他。教宗特使塔基·文圖里神父給墨索里尼寫了一封言辭華麗的信，告訴墨索里尼，這番演講令他深受觸動。他毫不吝惜溢美之詞，稱贊墨索里尼出色的工作，并祈求天主保佑他在將來取得成功。  [[10]](#_10__ASMAE__Gab___b__32__Tacchi)

法西斯領導人深受打擊。這消息傳出去后，各地法西斯頭目都非常擔心，從各省趕到羅馬，希望他能振奮起來，然而他迷茫的狀態令他們感到害怕。墨索里尼猶如感染熱病的樣貌令博洛尼亞的法西斯頭目萊安德羅·阿爾皮納蒂（Leandro Arpinati）心有余悸，“他雙眼通紅，仿佛剛剛哭過”。阿爾皮納蒂評論說，墨索里尼就像一個即將宣布破產的商人。  [[11]](#_11__Baima_Bollone_2007__p__96)

馬泰奧蒂遇害，對教宗來說也是一樁災難。梵蒂岡原以為墨索里尼的出現，讓他們找到了可以合作的意大利領導人，然而現在反對力量正聯合起來抵制國會，呼吁讓憲法權利回歸民眾，墨索里尼對權力的把持已經岌岌可危。教宗決定傾盡全力挽救他。他首先從人民黨入手，因為該黨決定加入反對黨聯盟，呼吁選舉新一屆政府。盡管在官方層面上，人民黨并不依賴教會高層，但如果教宗公開譴責它，它就不能宣稱自己是天主教政黨了。  [[12]](#_12__Sale_2007__p__162)

6月末，意大利人已經民心渙散，墨索里尼也前途未卜，于是梵蒂岡日報《羅馬觀察報》針對這場危機刊登了一則社論，提醒天主教徒牢記教會的諄諄教導，要服從政府當局，并且警醒他們不要“躍入黑暗之中”。受梵蒂岡監督的耶穌會刊物《公教文明》則緊跟著刊登了一則由主編羅薩神父撰寫的文章，提醒讀者牢記教會的教誨，要服從政府當局。他認為任何顛覆當前政府的行為，都可能讓整個社會墮入無政府狀態。他還特別將矛頭指向了人民黨反對派，警告說虔誠的天主教徒絕不會和社會黨人合作。  [[13]](#_13__Sale_2007__pp__162_168)

梵蒂岡向天主教政黨領導人明確表示，他們試圖顛覆法西斯政權的各種舉措為教宗所不喜，然而他們依然和其他反對黨合作，試圖將意大利重新帶回到議會民主制的道路上。  [[14]](#_14__6Yue_Mo__Yi_Wei_Ren_Min_Dan)

庇護也試圖振奮墨索里尼日漸低落的精神。7月20日，這個周日上午，教宗讓塔基·文圖里向這位沮喪的領導人轉達，教宗依然支持他。那天下午，這位耶穌會士交給墨索里尼一張紙條：“閣下，今天上午，教宗陛下似乎心情愉悅，他跟我談起閣下的語氣，令我確信這些話語必然會令您高興、寬慰。”他給最后幾個詞加了下劃線，并告訴墨索里尼，最好能跟他聊聊教宗的想法，希望能盡快同他會面。兩天后，心煩意亂的政府首腦才打開這張紙條，他直接用彩色鉛筆把答復寫在上面，“周四上午12點”。這些時日是墨索里尼上臺后最為灰暗的時日，教宗特使正是在這個時候向他傳達了教宗對他的支持。  [[15]](#_15__ASMAE__Gab___b__32__Tacchi)

庇護十一世向墨索里尼提供的幫助，不僅限于寬慰的話語，他還讓羅薩神父給予幫忙。教宗在書房里會見了耶穌會主編，命他再準備一篇論述當前危機的文章。兩天后，也就是在7月末，加斯帕里樞機親自來到《公教文明》羅馬總部，取走了羅薩的稿件。在接下來的幾天里，這份稿件會在梵蒂岡和期刊辦公室之間來來去去，上面出現了庇護十一世的黑色鉛筆字跡。在得到教宗的最終首肯后，這篇不署名的文章將刊登在這份刊物上。  [[16]](#_16__Jiao_Zong_Mi_Qie_Di_Shen_Ch)

在褒獎墨索里尼為教會所做的一切，并且暗示他和馬泰奧蒂遇害沒有關系之后，這篇文章警告說，任何針對政府的暴力行動都是不正當的。即便是合法手段（比如通過新一輪選舉推翻政府）也應該避免，因為它將帶來“嚴重的災禍”。最重要的是，人民黨永遠不得和社會黨結盟。  [[17]](#_17____Tian_Zhu_Jiao_Dang_Pai_Bu)

馬泰奧蒂的妻子和母親不斷地要求同教宗會面，這令庇護感到尷尬。教宗懷疑她們的目的是讓墨索里尼進一步失勢，于是拒絕了她們的請求。但是他也不想讓自己顯得鐵石心腸，于是安排加斯帕里接待了兩位婦女，給她們各送了一串受庇護降福的念珠。  [[18]](#_18__Hou_Lai__Jia_Si_Pa_Li_Xiang)

教宗對墨索里尼的支持從始至終，就算任何人對此抱有疑慮，教宗在9月初給一群大學生做的演講也足以打消它。庇護告訴他們，意大利天主教徒永遠都不可以和社會黨人合作。  [[19]](#_19__Zhuan_Yin_Zi_Sale_2007__p)

\* \* \* \* \*

墨索里尼非常清楚，在這場生死攸關的戰役中，教宗的支持有多么關鍵。在危機中，他安排孩子們學習宗教課程。十二歲的埃達、八歲的維托里奧以及六歲的布魯諾都在同一天舉行了首次圣餐禮和堅信禮。  [[20]](#_20__Zhe_Xie_Ke_Cheng_An_Pai_Zai)

當教宗聽聞這條喜訊時，另一個問題找上門來。盡管斯圖爾佐神父辭去了人民黨首腦的職務，他卻仍然撰寫文章批評政府。這件事令墨索里尼頗為煩惱，因為它意味著斯圖爾佐仍然是反對派一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于是，庇護十一世命令斯圖爾佐停止對政府的攻擊。  [[21]](#_21__You_Qu_De_Shi__Jiao_Zong_Me)

這位西西里神父回答說，他可以離開這個國家，而教宗對這項提議感到滿意。這不僅能讓他離開意大利的政治舞臺，還能為教會免去一樁麻煩事。因為只要他還待在意大利，法西斯暴徒就可能將他列入謀殺清單，一旦發生這種事情，教宗就更加難以支持法西斯政府了。10月末，斯圖爾佐離開了意大利，他原以為這將是一趟短暫的出國旅行，可這次流放整整持續了二十二年。  [[22]](#_22__Fan_Di_Gang_Guo_Wu_Yuan_Dan)

與此同時，墨索里尼也另有幾樁頭疼的事情，各省的法西斯頭目越發質疑他的決心和意志力。1924年末，一篇題作《法西斯與墨索里尼反目》（Fascism Against Mussolini）的文章認為，只有地方法西斯黨人才真正支持墨索里尼，并且譴責他搜捕殺害馬泰奧蒂兇手的決定。三天后，由切薩雷·羅西籌備的一篇文章刊登在法國的刊物上，詳細描述了謀殺的經過，直接暗示了墨索里尼和兇殺案的關系。米蘭的《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 ）是意大利最有威望的報紙，它建議墨索里尼引咎辭職。各種各樣的流言也傳布開來，一面說意大利有可能發生軍事政變，一面又猜測國王有可能任命一位新的總理。  [[23]](#_23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

墨索里尼最后沒有因為馬泰奧蒂危機被免職，主要原因在于，反對派的解決方案也無法服眾，而教宗不斷地出手破壞反對派結盟，阻止他們顛覆法西斯統治，也起了尤為突出的效果。在缺乏合適出路的情況下，無論是國王還是軍方都不愿意采取行動。  [[24]](#_24__Ci_Chu_Shi_Wo_Dui_De_Felice)

墨索里尼把握到這番現實情況后，慢慢恢復了自信。如今他確信，法西斯垮臺的可能性已經不復存在。1925年1月3日，在法西斯暴徒殺害馬泰奧蒂不到七個月后，墨索里尼又在國會發表演說。這將會是他從政生涯最具戲劇性的一場演講。

“在全體眾議員和所有意大利人民面前，我要宣布，”墨索里尼說道，“對于過去發生的一切，我將獨自承擔所有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歷史責任。”

“我們與你同在！”法西斯代表叫嚷道。

“如果所有這些暴力事件，是特定歷史、政治和道德氣候的產物，”墨索里尼說道，“那么我將承擔起這一份責任，因為正是我造成了這種歷史、政治和道德氣候。”

“各位先生！你們在自欺欺人！你們以為法西斯氣數已盡……但是你會發現……各位先生，意大利需要和平，需要安定，需要平穩。我們會給意大利帶來這份安定和平穩，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

這番宣言之下，法西斯黨對意大利殘存的民主勢力發動了最后的進攻。

[[1]](#filepos246665) 賈科莫·馬泰奧蒂，《譴責選舉騙局的眾議院演說》(1924)，http://it.wikisource.org/wiki/Italia\_-\_30\_maggio\_1924,\_Discorso\_alla\_Camera\_dei\_Deputati\_di\_denuncia\_di\_brogli\_elettorali。

[[2]](#filepos248627) Milza 2000, pp. 365–367; De Felice 1966, p. 620. 有關謀殺馬泰奧蒂事件及其余波的詳盡考量，參見Canali 2004b。

[[3]](#filepos250503) Milza 2000, p. 370; CC 1924 III, pp. 80–89.

[[4]](#filepos251453) De Felice 1966, p. 630.

[[5]](#filepos252457) Milza 2000, p. 378.

[[6]](#filepos252953) De Felice 1966, p. 644. 后來，當墨索里尼回想馬泰奧蒂遇害后的幾周時，他說道：“那些時日，我有一種孤絕的感受，因為基吉宮通常都人滿為患，現在卻如此冷清，仿佛暴風雨剛剛肆虐過。”

[[7]](#filepos253681) Navarra 2004, pp. 25–27.

[[8]](#filepos254741)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95.

[[9]](#filepos255498) CC 1924 III, pp. 85–87.

[[10]](#filepos255956) 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7 giugno 1924.

[[11]](#filepos256562) Baima Bollone 2007, p. 96.

[[12]](#filepos257285) Sale 2007, p. 162.

[[13]](#filepos258099) Sale 2007, pp. 162–168。

[[14]](#filepos258474) 6月末，一位人民黨反對派議員代表呼吁國王重新任命一位總理，以恢復民主自由，并且禁止私人組建武裝部隊；CC 1924 III, pp. 179–180。7月中旬，人民黨省級領導在羅馬舉行會議，通過了一項計劃。他們堅稱，推翻法西斯黨統治，不會像墨索里尼的支持者所說的那樣，讓意大利退回到1922年的政府癱瘓和社會混亂，而是會建成一個由人民黨，不滿現狀的自由黨，以及懷有民主思想的社會黨組成的穩固聯盟。參見Ferrari 1957, p. 70; Sale 2007, pp. 169–171。

[[15]](#filepos259417) 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0 luglio, 1924；ASMAE, Gab., b. 32, Paulucci de’Calboli a Tacchi Venturi, 22 luglio 1924。墨索里尼手寫的便條字跡就蓋在塔基·文圖里寫給他秘書保盧奇·德·卡爾博利男爵（Baron Paulucci de’ Calboli）的附信上。ASMAE, 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Paulucci de’ Calboli, 20 luglio 1924。

[[16]](#filepos260135) 教宗密切地審查了這篇文章，有關這一情況，有一份詳細且不多見的描述，收于耶穌會士費利切·里納爾迪，《記〈天主教黨派不應參與意大利政黨紛爭〉一文的寫作》，1924年8月11日，藏于《公教文明》檔案，刊于Sale 2007, pp. 477–478。另參見薩萊在pp.172–182的討論。

[[17]](#filepos260651) 《天主教黨派不應參與意大利政黨紛爭》，CC 1924 III, pp.297–306。

[[18]](#filepos261131) 后來，加斯帕里向比利時大使透露，他根本不知道這些念珠對她們來說有什么用。Beyens 1934, pp. 235–236.

[[19]](#filepos261510) 轉引自Sale 2007, p. 182–183。教宗的這番言論，令國內外反法西斯人士都十分憤慨。有些人稱，庇護在這樣的政治議題上發表的觀點僅代表他個人，而不是教宗絕無錯誤的觀點。一周后，《羅馬觀察報》刊文反擊了這種觀點。這份梵蒂岡日報向天主教界宣告，教宗的話語代表的是一種“絕對的命令”。有些人聲稱天主教徒可以在這件事上遵從自己的良知，他們的觀點大錯特錯；轉引自Sale 2007, p. 184。

[[20]](#filepos262001) 這些課程安排在卡爾莫德希修道院，和墨索里尼位于羅馬涅的避暑別墅隔著一條托斯卡納大區邊界，碰巧的是，當時年事已高的萬努泰利樞機正在那里避暑。沒過多久，墨索里尼就去修道院拜訪，并且求見了萬努泰利。在修道院主事神父為孩子們舉行首次圣餐禮后，他立即詢問樞機，后者是否愿意親自主持他們的堅信禮。所以在9月8日，墨索里尼的孩子們在上午舉行了首次圣餐禮，又在中午由樞機主持了堅信禮。萬努泰利的書信收于梵蒂岡秘密檔案，轉載于Sale 2007, pp. 345–346。

[[21]](#filepos262496) 有趣的是，教宗沒有直接將這一決定告訴斯圖爾佐。9月16日，加斯帕里致信斯圖爾佐的哥哥（西西里的一位主教），告訴他此乃“圣父的意愿，不對，是命令”，并且讓他向斯圖爾佐神父轉達教宗的決定。斯圖爾佐的哥哥非常憤怒，拒絕了加斯帕里，使得他只好另尋門道，將這一決定傳至前任人民黨首領的耳中。

[[22]](#filepos263137) 梵蒂岡國務院檔案中包含一張由斯圖爾佐的律師開出的手寫收據，日期為10月17日，確認從皮扎爾多蒙席處收到一萬里拉，用于斯圖爾佐出國的開銷。盡管斯圖爾佐對這些經費心懷感激，卻認為如果換成英鎊會更好用一些。此外還有一張由斯圖爾佐親自手寫的紙條，日期為10月20日，告知皮扎爾多，明天他會派同一個人過來兌換英鎊。ASV, AESI, pos. 617,fasc. 50, 6. 26r, 27r; Molony 1977, p. 192.

[[23]](#filepos264071)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96; Monelli 1953, p. 109; De Felice 1966, p. 716.

[[24]](#filepos264548) 此處是我對De Felice 1966, p. 717；1968, pp. 50–51解讀的展開。

## 第六章 獨裁統治

墨索里尼在國會發表演說的當天，法西斯民兵部隊攻占了余下反對派及其報紙的總部。  [[1]](#_1__You_Xie_Ren_Zai_Min_Bing_Bu)  反對派領導人遭到圍捕，被投入監獄  [[2]](#_2__Milza_2000__pp__386_387)  ，而對他們的毆打也卷土重來。及至夏天，這一事態發展到頂峰，法西斯黨人毒打了國會自由黨領導人喬瓦尼·阿門多拉，而此前他就曾經遭受法西斯黨的毆打。幾個月后他因傷去世。  [[3]](#_3__Fornari_1971__pp__101_111)

墨索里尼明白，梵蒂岡持續不斷的強力支持對自己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所以他繼續尋找途徑，鞏固和教宗的盟友關系。他已經安排孩子和妻子受洗，還給孩子舉行了首次圣餐禮和堅信禮，現在他已經快要沒有儀式可以用來證明自己心向天主教了。不過他實際上還有一項儀式可辦。7月，他告訴塔基·文圖里，他要和雷切爾辦一場宗教婚禮，時間大概定在9月。

耶穌會士非常高興，因為他知道這個消息能夠取悅庇護十一世。可是當9月過半，仍然沒有聽到任何風吹草動時，他詢問墨索里尼到底出了什么狀況。“我絕非懷疑您真誠的善意，”他在寫給墨索里尼的紙條上解釋道，但如果婚禮能夠安排在之后的幾周里，他建議道，“那么它肯定能給圣父以及許多真心投靠閣下的杰出人物帶來特別的寬慰。”

延遲的原因很可能出在雷切爾身上，因為她對教會的厭惡深入骨髓。幾年前，墨索里尼堅持讓雷切爾受洗，就幾乎是拖著她來到儀式現場的。墨索里尼在任何地方都主宰大權，唯獨在家里是個例外，于是墨索里尼決定先斬后奏。1925年12月29日，雷切爾正在米蘭寓所的廚房里烹制干面條，女傭告訴她，貝尼托將弟弟阿納爾多以及一位神父帶到家中。他們希望她能去客廳聊一聊。她丈夫通常不和神職人員共進出，這一反常現象使雷切爾提高了警惕，她說待她忙完的時候，自會去客廳。墨索里尼等到不耐煩，終于沖進了廚房。“我們要出發了，雷切爾。你已經折騰夠了。別逼我用強力。”雷切爾可不會輕易受人脅迫，她選擇無視丈夫的話語。墨索里尼只好鼓起勇氣走到她身后，脫掉她的圍裙，把她架到水槽前洗了手，然后又將她領進客廳。趁她逃跑之前，神父趕緊為他們舉行了婚禮儀式。  [[4]](#_4__Ta_Ji__Wen_Tu_Li_Gei_Mo_Suo)

局勢的進展再一次回到墨索里尼的掌控之中。他又開始巡視全國，所到之處均受到民眾熱情的歡迎。墨索里尼的演講總是強勁有力，充滿軍事隱喻，洋溢著犧牲和信仰的感觸。  [[5]](#_5__Ta_Yu_1925Nian_6Yue_21Ri_Zai)  他有一種神秘的天賦，懂得在恰當的時機提高音量，而且有人指出，他演講時音域很廣，“小到蟒蛇的嘶嘶聲，大到獅子的咆哮聲”。  [[6]](#_6__Zhuan_Yin_Zi_Baima_Bollone_2)

可是墨索里尼很快就要處理自身隊伍的問題。那個號稱“最法西斯的法西斯黨人”羅伯托·法里納奇正在給他制造麻煩。一年前，當墨索里尼宣布獨裁不久后，他曾打過一個老謀深算的賭，為了監視法里納奇，墨索里尼將他任命為法西斯黨總書記。

法里納奇可不是一個易于馴服的人。1926年3月，當殺害馬泰奧蒂的兇手接受審判時，法里納奇執意要高調處理這起案件，使得兩人之間的角力達到了頂峰。此時離這起兇殺案已經過去兩年，墨索里尼絕對不想提醒人們，這起暴行曾經發生過。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新聞報道，他將審判安排在羅馬東北方的一座小鎮基耶蒂（Chieti）。在審判幾天前，墨索里尼在一份指示中寫道：“審判期間，我們必須避免任何戲劇性的因素，因為它可能會引起國內外輿情的波動，所以不可以吵鬧，也不可以有任何政治引申。”

令墨索里尼頗為驚慌的是，法里納奇決定加入辯護律師團隊，并且命令基耶蒂的法西斯黨頭目給自己安排一場盛大的接待儀式。他這番嘩眾取寵的姿態令墨索里尼憤怒，因而隨即給他發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在我看來，你拋開了曾經的所有承諾，令這場審判……變成一個政治事件。我要非常嚴肅地批判你，而且黨內正彌漫著極大的不安情緒……我警告你，審判結束后，不能有任何集會和慶祝活動，我絕不會容忍這種行為。”  [[7]](#_7__Qiang_Shi_De_Ling_Xiu_Bing_M)

這場審判的法官是個法西斯黨人，而辯護律師中又有法西斯黨總書記，在他們的幫助下，五名被告中有兩名被無罪釋放。杜米尼（墨索里尼的親信）和兩位同仁被判過失殺人，不出兩個月便重獲自由。墨索里尼盡管對判決結果感到滿意，卻對法里納奇非常憤怒，很快就撤掉了他黨總書記的職務。  [[8]](#_8__Fornari_1971__pp__119_125__1)

墨索里尼想要提升自己的公眾形象，越發將自己打造成新時代的愷撒大帝，似乎注定要讓意大利重返古代的榮光。在這番宣傳行動中，他的情婦瑪格麗塔·薩爾法蒂充當了重要的搭檔。她幫墨索里尼撰寫的準官方傳記在1926年出版，書名毫不避諱地用拉丁文題作《領袖》（Dux ）。  [[9]](#_9__Wu_Er_Suo__2003__pp__160_165)  這個拉丁詞的意大利文變體“Duce”意思也是領袖，它會越發頻繁地在媒體和公眾場合中同墨索里尼聯系在一起。  [[10]](#_10__DuceDu_Zuo__Du_Qie)

墨索里尼還混合了法西斯和天主教的形象，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近似于基督的人物。在突尼斯（法國殖民地）的意大利學校，學生們念誦的禱告詞將會以各種形式回響在意大利半島上：

我相信偉大的領袖，他是黑衫軍創始者，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他唯一的守護人，我們的救世主由一位善良的教師和一位勤勞的鐵匠所哺育……他已經降臨羅馬……  [[11]](#_11__Zhuan_Yin_Zi_Falasca__Zampo)

墨索里尼盡管沐浴在阿諛奉承之中，卻仍然保持著警惕心理。朱塞佩·博塔伊（Giuseppe Bottai）長期擔任法西斯大議會（Fascist Grand Council）的議員，曾經談及墨索里尼的兩副面目。一副面目下的墨索里尼豪爽而沖動，聽憑本能的指引，另一副面目下的他則“卑鄙而小氣，跟常人一樣有嫉妒心，很會撒謊和欺騙，隨意做出根本無意信守的承諾，為人卑劣，奸詐不忠，情感冷漠，無法對他人保持忠誠和愛意，會輕而易舉地拋棄最忠誠的追隨者”。  [[12]](#_12__Zhuan_Yin_Zi_Baima_Bollone)  事實上，在整個政府里，博塔伊是少數沒有被墨索里尼撤換的要員。即便是在執政早期，墨索里尼也不能容忍任何人對他構成威脅，與他形成競爭關系；一旦他身邊的大臣出現受民眾歡迎的跡象，他們便會很快被委派他職，遠赴非洲或者巴爾干半島。

\* \* \* \* \*

對于墨索里尼而言，1925年是凱旋之年，它對教宗來說也是一段值得驕傲的時日。為了將天主教徒更加緊密地團結在教會四周，他宣布1925年為圣年；自從教宗博義八世（Boniface VIII）宣布1300年為首個圣年以來，這已是第二十三個圣年了。圣年期間，教會鼓勵天主教徒向羅馬的圣地朝圣；教區神父和主教（無論是來自美洲抑或歐洲中部）也會帶領信徒來到梵蒂岡和不朽之城的各座教堂。庇護十一世對這個圣年的成果十分滿意，以致后來他又宣布了兩個圣年：分別是1929年和1933年至1934年，前者是為了慶祝他晉鐸五十周年，后者則是紀念耶穌復活一千九百周年。

1924年圣誕夜，教宗出現在圣彼得廣場上，取下了圣門上的封條，令其在接下來的一年里向四方敞開，這一舉措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義。在接下來的十二個月里，超過百萬的天主教朝圣者從世界各地趕來，而教宗也進行了三百八十次演講。他演講時通常都不帶稿件，有時候會大致寫下演講的主題，卻鮮少會將演講的具體內容寫下來。他獨具特色的演講依然語速緩慢、用詞審慎，時不時地停下來，從右到左俯視面前的教眾。考慮好接下來要說的話時，他又會抬起頭，稍稍偏向右側，然后繼續演講，通常都會重復剛剛說過的最后一句話，仿佛是要確認那句話確實說得很好。  [[13]](#_13__O__Russell__Annual_Report_1)



庇護十一世，1925年

這一繁重的日程確實令教宗不堪重負。圣年才開始幾周，羅馬的警察局局長便收到一份機密報告。報告表示，盡管教宗現在健康狀況良好，但是教宗的生活令他感到窒息。他曾經是一個沉醉于戶外項目、熱愛體育運動的人，如今卻只能困守于梵蒂岡狹小的天地里，而每天頻繁的會面、接見以及儀式都給他施加了沉重的負擔。教宗尤其想念山林間新鮮的空氣，所以即便在冬日里，也堅持讓臥室的窗戶敞開著。教宗助手韋尼尼神父認為教宗常常面露疲憊的神色。也許他晚上總是睡不好覺，因為他常常跟韋尼尼說，夜里有老鼠在他的臥室里橫沖直撞。  [[14]](#_14__ACS__MI__DAGRA__b__129__Vic)

庇護認為，羅馬朝圣之行是天主教徒最虔誠的一種表現。  [[15]](#_15__Jiao_Zong_Ceng_Zai_Luo_Ma_J)  使徒宮的大廳里,每天都有數百人雙膝跪地等候著，希望能夠在教宗走過時親吻到他的戒指，如果特別幸運的話，還能夠從他手中獲贈一枚紀念章。  [[16]](#_16__Shu_Yi_Qian_Ji_De_Zhao_Shen)  身穿紅袍的樞機、各色教宗侍從，以及頸戴輪狀皺領、肩披披風、下穿及膝短褲、手持長劍的憲兵隊，將身穿白袍的教宗簇擁在中間，這番景象很容易令人生出敬畏之心。  [[17]](#_17__Jiao_Zong_Xian_Bing_Dui_Gon)  巨大無比的房間上方是繪有穹頂壁畫的天花板，四周的墻面裝裱著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作品，此外還有衣著古雅的教宗侍從，令訪客感到仿佛時光倒流，回到了幾個世紀以前。

教宗通常每天都要接見幾百位朝圣者，他們之中既有神職人員，也有平信徒。男性穿著禮服，沒有禮服的人則穿著樸素的深色西裝。女性穿著黑色帶袖長裙，頭上包著黑色的蕾絲紗巾。教宗在貴族衛隊、教宗侍從以及典禮長卡恰·多米尼奧尼蒙席的護送下進入大廳，走到高出地面的寶座前，面對人群坐下來。朝圣者的領頭人首先開口，發表一番奉獻贊美之辭。教宗用他緩慢、審慎、精確的方式予以回應，通常都會提及朝圣者美麗的故鄉以及當地天主教眾的虔誠。然后他又稱贊一番領導朝圣隊伍的高級神職人員。最后，當他以降福收尾時，所有朝圣者都會雙膝跪地。

英國通俗作家愛德華·盧卡斯（Edward Lucas）是貴格會的教徒，曾于1925年的圣誕夜在圣彼得廣場經歷了圣年的閉幕儀式，他的一番描述記錄了這個圣年在情感上給人們帶來的震撼。他寫道，梵蒂岡城的宗教儀式在世上絕無僅有，最壯觀的莫過于跟隨教宗的隊列。教宗的貴族衛兵穿著中世紀的服飾，腰上的劍柄光彩奪目，他們就像引座員一樣忙前忙后。盧卡斯感覺自己穿越回中世紀，不僅僅是因為樞機、高級教士、神父和修士的服裝，更是因為他們的面容和表情。他感到這些事物似乎都沒有改變。

“有些神父穿著紫衣，有的穿著黑衣，有的穿著帶帽的修士服；有那么一兩個人蓄有胡須；有些人則身裹樸素的白衣……很多人老得讓人難以置信；幾乎沒有人面露歡快、無憂無慮的神色；許多人都顯得很焦慮。然后是樞機……然后是高高在上的圣父，他的座椅由兩名紅衣仆人抬著，兩旁還跟著兩位手執高級羽毛扇的仆從，教宗尊貴的頭上戴著一頂華麗的教宗冠，他動作輕柔、從右到左地揮著手，將福祉賜給眾人。”  [[18]](#_18__Bosworth_2011__p__180)

教宗發布通諭《那些首先的》（Quas primas ），為這個圣年完成了收尾工作。他講道，只有皈依羅馬天主教這一唯一真正的宗教，人類才能得救。就像所有在他之前的教宗一樣，他譴責了法國大革命，認為它是諸惡之源，散播了“人權”這一極為有害的觀念。  [[19]](#_19__Ma_Ding_Na__Martina_Shen_Fu)  他以如下忠告結束了這篇通諭：“統治者與君主一定要將公眾的榮耀與服從供奉給基督。”任何不遵從這句話的人都將面臨可怕的結局，因為基督“將會對這些瀆神的無禮行為予以最嚴厲的報復”。  [[20]](#_20____Na_Xie_Shou_Xian_De____Yi)

教宗還通過這篇通諭宣布了一個新的天主教節日“基督君王日”，意在與不斷傳播的世俗主義作斗爭，這種思想在他看來是現代社會的一大瘟疫。天主教徒以極大的熱忱接納了這篇通諭以及由它帶來的這個新節日，新教徒卻對此做出了不同的反應。美國路德會（Lutheran Council）對這篇通諭大加鞭撻，認為它是“最糟糕的宗派主義”，并且“與相當多的基督徒群體為敵”。該會呼吁世界各地的新教徒抵制教宗的新節日。  [[21]](#_21____Lu_De_Hui_Jiao_Tu_Fan_Dui)

\* \* \* \* \*

教宗對自身職責的威嚴有著獨特的理解，他拒絕用電話同人交談，也拒絕跟任何賓客合影。他非常頻繁地接見公眾，日程非常緊湊，卻不總是愿意接受私人的會面請求。有一次，當國務卿告訴他，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希望得到他的接見，他直言自己并不樂意。當時他心情還算愉悅，便補充了一句：“不過有一個大家常用的借口我沒法用，你總不能跟他說我不在家吧。”  [[22]](#_22__Sai_Er_Di_Si__1934__p__128)

在羅馬的神職人員眼里，與庇護十世和本篤十五世相比，庇護十一世為人冷漠而又粗率。  [[23]](#_23__Bi_A_Te_Li_Si__Ba_Si_Ke_Wei)  在教宗的一次日常散步中，離他不遠的地方，一位年事已高的園丁因心臟病發作跌倒在地，其他園丁和教宗的一位護衛都趕忙上前幫忙。有人告訴庇護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庇護卻自顧自地繼續散步。這一事件使得梵蒂岡各界都對教宗議論紛紛。  [[24]](#_24__Zhe_Yi_Shi_Jian_De_Miao_Shu)

秘密警察的線人從梵蒂岡發來了卷帙浩繁的報告，為圍繞教宗的諸多暗斗提供了珍貴的洞見。自掌權以來，墨索里尼便組建起一個龐大的線人網絡。由于線人們各懷私心，所以他們提供的報告必須謹慎閱讀；即便如此，他們的報告仍然為那些年間梵蒂岡城內的事務提供了無可比擬的深刻見解。  [[25]](#_25__Zhe_Xie_You_Mo_Suo_Li_Ni_De)

庇護十一世大發雷霆的情況越來越頻繁。一位蒙席曾向一位線人透露，每當必須要去晉見教宗時，他都會顫抖，“他要遭受的屈辱如此深重”，以至于不得不始終雙膝跪地。這位線人還寫道，教宗對加斯帕里的態度也十分惡劣，不過幸運的是，這位樞機“臉皮很厚，總是假裝沒有注意到教宗對他的羞辱”。  [[26]](#_26__ACS__MCPG__b__155__n_d___19)

比利時大使道出了他對教宗的看法，在各國駐梵蒂岡大使之間差不多算是一種共識。庇護十一世是一位學術淵博的人，但比起因為間諜活動而臭名昭著的庇護十世，他并沒有那么癡迷于教理和戒律。不過他在固執方面卻完完整整地繼承了庇護十世，連一點外交手腕都欠奉：“他這人做事總是一以貫之。他致力于最崇高、最恢宏的理念，卻不理會那些規勸他更為耐心的意見。”這位大使記述道，庇護十一世最為突出的個人特質便是，他堅持要求別人絕對服從自己。  [[27]](#_27__Da_Shi_Ou_Ren__Bei_En__1925)

梵蒂岡官方報紙近幾年曾報道過一封發現不久的信函，它對教宗堅韌性格的印證如果說不上令人瞠目結舌，也足夠讓人驚訝了。1919年，當他作為本篤十五世的大使被外派華沙時，阿契爾·拉蒂曾經寫信給梵蒂岡圖書館的助理，要求助理派人將他遺忘在書桌上的文件帶給他，“順便捎上放在那里的小型左輪手槍和子彈”。當米蘭陷入混亂之中，革命的威脅迫在眉睫之時，拉蒂買來了這把槍，并放在安波羅修圖書館的書桌里。當他升任梵蒂岡圖書館館長之時，這把槍也跟隨他來到羅馬。當華沙面臨紅軍入侵的威脅時，他不希望自己手無寸鐵。  [[28]](#_28__Qie_Sa_Lei__Pa_Xi_Ni____Pei)

\* \* \* \* \*

在一場國際外科醫生大會上發表過歡迎辭之后，墨索里尼現身于羅馬的陽光下。一群激動的法西斯黨人看到他們的領袖如此出人意表地現身，便舉起他們的臂膀行法西斯禮，而墨索里尼也不假思索地將頭稍稍后傾，舉臂回應。突然間，人群中傳來一聲槍響。一位精神異常的愛爾蘭中年婦女維奧萊特·吉布森（Violet Gibson）舉著手槍向他頭部射擊。幸虧他向黨人回禮，沒有將額頭前傾，才讓子彈只是擦過了他的鼻子，流了些鮮血而已。

這一事件之后，墨索里尼仍然堅持要按原計劃，于當天（1926年4月7日）晚些時候在一場法西斯黨集會上發表講話，于是他出現時鼻梁上便綁著厚厚的白色繃帶。他在結束語中影射了這次刺殺事件，成就了他的傳奇語錄：“假如我向前，你們要跟隨我；假如我后退，你們就殺死我；假如我被刺身亡，你們就替我報仇。”  [[29]](#_29__De_Felice_1968__pp__200_201)  第二天，他飛赴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據說動身離開時，他開玩笑說自己去非洲之前就已經給鼻子打過孔了。  [[30]](#_30__Baima_Bollone_2007__p__53)

意大利全國各地的神職人員引領著信徒做感恩禱告，他們告訴這些信徒，天主會保護他們國家領導人的安危。在這起刺殺事件幾天之前，庇護十世的姐姐曾將她弟弟的小瓜帽當作禮物送給領袖。很多人都相信，這位后來位列圣品的教宗再度創造了一個奇跡。  [[31]](#_31____Mo_Suo_Li_Ni_Bei_Qi_Ji_Su)

墨索里尼需要許多個奇跡才能夠熬過那一年，因為他鞏固了獨裁統治，使得反法西斯人士心灰意冷，認為只有置他于死地才有希望結束這種局面。9月時，一位二十六歲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將一枚自制的炸彈拋向了墨索里尼的汽車，而這位領袖又一次如有神助，保全了自身的平安。炸彈被右側車門彈開后引爆，炸傷了幾人，而它的襲擊目標卻毫發無損。  [[32]](#_32__Zhe_Ci_Xi_Ji_Ji_Xiao_Shi_Ho)

最具有戲劇性的刺殺事件發生在10月31日，當時墨索里尼正在博洛尼亞為一座新建的體育館主持落成典禮，當他乘坐汽車駛過市內人潮涌動的街道時，突然響起了一聲槍響。這發子彈差一點點就打中它的目標，它擊中了領袖為了儀式而專門掛在胸前的飾帶。人群中好幾人撲向殺手，并當場將這位十六歲的男孩殺死。意大利全國上下的法西斯黨人十分憤慨，他們將余下的反對派媒體夷為平地，并且毆打那些支持反法西斯派的人士。  [[33]](#_33__De_Felice_1968__pp__204_208)

得知墨索里尼沒有受傷，教宗算是松了口氣，他馬上告知墨索里尼，領袖“由于耶穌基督的特殊保護而安然無恙”的消息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喜悅”。  [[34]](#_34__Zhuan_Da_Zhe_Yi_Xiao_Xi_De)  獨裁統治的時機現在已然成熟。11月5日，一項新的法律規定，批評政府的人士將被流放到國內偏遠地區。許多人將離開他們位于城市的家，被流放到偏遠的小島和山村，受到警察的監視。這條新法頒布四天后，余下的反對派代表都被逐出了國會，只有法西斯黨成員能夠繼續持有政府職務。到1926年末，只有法西斯黨工會見容于意大利法律，而任何性質的罷工都遭到了禁止。市長不再由選舉產生，而是直接由中央政府委任；媒體審查愈發嚴格；政府專門設立了一處特別法庭，用于根除余下的反對力量，死刑也得到了恢復。  [[35]](#_35__Shen_Cha_Zai_Ci_Zhi_Qian_Bi)  意大利王國從教宗手中搶走羅馬時廢除了死刑，半個多世紀后，這一刑法再度回到了這座城市。  [[36]](#_36____Gong_Jiao_Wen_Ming____Dui)

[[1]](#filepos274109) 有些人在民兵部隊里十分活躍，很有組織性，而有些人則只是遞交了加入民兵部隊的書面申請，考慮到這些人之間的區別，法西斯民兵（即國家安全志愿民兵）的確切數據目前還無法獲知，不過活躍成員應該遠遠超過十萬人，而總數也許是活躍人數的兩到三倍。

[[2]](#filepos274271) Milza 2000, pp. 386–387.

[[3]](#filepos274627) Fornari 1971, pp. 101–111.

[[4]](#filepos276812) 塔基·文圖里給墨索里尼寫信時打的草稿，日期標注為1925年9月18日，收于《公教文明》檔案中一系列未經整理列出的文檔中，發表于Sale 2007, pp. 364–365。在國家中央檔案館的墨索里尼檔案中，我并沒有找到這封信的原件或者任何復印件，所以我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證明這封信確實送到了墨索里尼手里。弗蘭齊內利（1998, p. 45）給出了婚禮的日期。米爾扎（2000, p. 401）表示雷切爾·墨索里尼對于遲來的受洗儀式毫無熱情。婚禮的描述出自R. Mussolini 1974, pp. 123–124。

[[5]](#filepos277189) 他于1925年6月21日在法西斯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所做的演講就非常典型：“那些領導革命的人，他們肩負的責任猶如那些指揮戰爭的將軍”，《1925年6月21日講話》，http://www.dittatori.it/discorso21giugno1925.htm。

[[6]](#filepos277480) 轉引自Baima Bollone 2007, p. 28。

[[7]](#filepos279254) 強勢的領袖并沒有嚇住法里納奇，這一點在這位法西斯頭目第二天的回信中就可以看出來：“今天上午，您的信使為我送來了您日常的‘發火信’，”法里納奇寫道，“我兌現了我在羅馬做出的承諾，可是您卻說我將它們都拋開了，這令我非常震驚……這場審判已經變成政治事件了嗎？它早就是一場政治事件了，不然我怎么會來到基耶蒂。”

[[8]](#filepos279790) Fornari 1971, pp. 119–125, 135. 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國務院文件中包含一批1934年的文檔，為馬泰奧蒂一案提供了十分有趣的事后觀。這起兇殺案的罪魁禍首阿梅里戈·杜米尼曾給圣安東尼奧市的一位律師發去一個加密包裹，他告訴這位律師，自己正有生命危險，他點名意大利警察總長阿爾圖羅·博基尼正是威脅他性命的首要敵人。他表示，他必須讓他的敵人們知道，一旦他有生命危險，那么這個包裹里的文檔就會被公之于眾，有了這個籌碼，他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這位律師根本就不知道杜米尼是誰，于是就詢問了他的一位朋友，這位朋友是當時得克薩斯州的參議院議員。在這位議員的請求之下，美國駐佛羅倫薩領事給國務院發回了一份報告，寫明了杜米尼在馬泰奧蒂謀殺案中的身份。國務院認為領事的這封信函過于敏感，不可以轉發給那位得州律師。于是國務院跟議員簡要說明了情況，并讓他謹慎地告知這位律師他所面對的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NARA, M1423, reel 1, Arnold Cozey, San Antonio, to Joseph Haven, U.S. Consul in Florence, March 1, 1934; et seq.

[[9]](#filepos280310) 烏爾索（2003, pp. 160–165）認為，薩爾法蒂在引入羅馬帝國英雄和大搞領袖崇拜方面都起到了作用。在國內出版一年前，這本書曾用另一個標題在國外出版。

[[10]](#filepos280572) Duce讀作“杜切”。

[[11]](#filepos281352) 轉引自Falasca- Zamponi 1997, pp. 64–65。

[[12]](#filepos281993) 轉引自Baima Bollone 2007, p. 78。

[[13]](#filepos284072) O. Russell, Annual Report 1925, April 21, 1926, C 5004/5004/22, in Hachey 1972, pp.74, 77–78, sections 3, 14–18; Chaline 1996, p. 162; Agostino 1991, pp. 44–45; Morgan 1939, p. 205.

[[14]](#filepos285164) ACS, MI, DAGRA, b. 129, Vice Questore, Borgo, al Signor Questore, 21 gennaio 1925;Venini 2004, pp. 24–25.

[[15]](#filepos285386) 教宗曾在羅馬建城日（4月21日）宣告：“除非你是一名天主教徒，否則你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基督徒；除非你是一個羅馬人，否則你就不是一個完整的天主教徒。”參見Baxa 2006, p. 116。

[[16]](#filepos285694) 數以千計的朝圣者得以親吻教宗的手，于是在圣年年中，梅里·德爾瓦爾樞機擔心教宗會因此染上傳染病，就建議他以后佩戴手套，教宗則應允了這項提議。A.C.雅各布森，醫學博士，《保護被虔誠朝圣者親吻的雙手》，《華盛頓郵報》，1925年11月15日，第8版。

[[17]](#filepos286034) 教宗憲兵隊共有一百人，其中有五名士官，他們同瑞士侍衛兵一同掌管梵蒂岡的治安。

[[18]](#filepos288440) Bosworth 2011, p. 180.

[[19]](#filepos288933) 馬丁納（Martina）神父是天主教會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之一，他（1978, pp. 226–227）認為教宗在《那些首先的》中表達的觀念過分抱殘守缺。另參見Bouthillon1996; Verucci 1988, pp. 35–37; Chiron 2006, pp. 233–234。

[[20]](#filepos289309) 《那些首先的》英語譯文收于：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11121925\_quas-primas\_en.html。正文引語引自第33段（一共有34段）。

[[21]](#filepos290009) 《路德會教徒反對教宗的節日通諭》，NYT, March 21, 1926, p. 12。

[[22]](#filepos290716) 塞爾迪斯（1934, p. 128）表示教宗確實說過這番話，盡管它聽起來像是由他人捏造的。

[[23]](#filepos290980) 比阿特麗斯·巴斯克維爾，《教宗如何度過他的24小時》，BG, November 1, 1925, p.C5。

[[24]](#filepos291425) 這一事件的描述來自“梵蒂岡一位出名的線人”，他還補充說，教宗是個“麻木的自我主義者”。ACS, MCPG, b. 155, 20 marzo 1926. 《波士頓環球報》登過一篇對庇護十一世充滿溢美之詞的文章，但是該文作者同樣指出，“在那些更親近本篤十五世的教士眼中，庇護十一世多少有一點冷漠”。巴斯克維爾，《教宗如何度過他的24小時》，p. C5。

[[25]](#filepos291959) 這些由墨索里尼的線人撰寫的報告，現今收于羅馬的國家中央檔案館。這些線人中，有很多都會提供未經證實的傳言，或者因為個人恩怨而抹黑仇人。這一法西斯情報網所提供的訊息，為我們展示出一幅關于梵蒂岡權力斗爭、背后中傷、個人沖突和丑聞的龐大圖景，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為豐富多彩。在新近增加的警察機構中，最令人聞風喪膽的莫過于“監視和鎮壓反法西斯組織”（OVRA，奧夫拉），這一組織是一種精英型的政治間諜機構。Fiorentino 1999; Canali 2004a. 有關1925年至1926年間引入的其他鎮壓措施，有很多文獻，尤其參見Milza 2000, pp. 394–396; Gentile 2002, p. 153–154; CC1926 IV, pp. 459–465, 560。

[[26]](#filepos292511) ACS, MCPG, b. 155, n.d. [1926]. 這位“梵蒂岡出名的線人”的報告里寫滿了各種抱怨，都是高級教士們抱怨教宗專橫的性格，以及受到的粗魯對待。1927年10月28日的一則報告非常典型：“一位經常有機會晉見教宗的蒙席告訴我，日子一天天過去，教宗變得越來越可怕，越來越強橫，令人不敢跟他說話。” ACS, MCPG, b.156.

[[27]](#filepos293273) 大使歐仁·貝恩，1925年2月10日，轉引自Ruysschaert 1996, pp. 252–253;Beyens 1934, pp. 286–287。

[[28]](#filepos294137) 切薩雷·帕西尼，《配槍的圖書館館長》，OR, 19–20 novembre 2007, p. 5。

[[29]](#filepos295383) De Felice 1968, pp. 200–201;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326–327. 吉布森雖然試圖刺殺墨索里尼，但她原先的刺殺對象顯然是教宗。

[[30]](#filepos295642) Baima Bollone 2007, p. 53.

[[31]](#filepos296128) 《墨索里尼被奇跡所挽救！》，《法西斯政府報》，1926年4月9日，第1版。

[[32]](#filepos296744) 這次襲擊幾小時后，塔基·文圖里便來到基吉宮，向墨索里尼遞交了教宗恭喜他身體安康的私人信件。ARSI, TV, b. 7, fasc. 431, Tacchi Venturi a Monsignor Pizzardo, 11 settembre 1926; De Felice 1968, p. 202.

[[33]](#filepos297459) De Felice 1968, pp. 204–208.

[[34]](#filepos297804) 轉達這一消息的是塔基·文圖里。DDI, series 1, vol. 4, n. 473, Grandi, Roma, a Mussolini, a Forlì, 1 novembre 1926.

[[35]](#filepos298610) 審查在此之前便開始了，但是力度沒有這么大。1923年7月15日通過的法律規定，如果報紙出版的內容破壞了意大利、國王、教宗或者天主教的聲譽，那么警察就有權力開除報紙的主編，并且沒收付梓的報紙。參見Talbot 2007, p. 27。

[[36]](#filepos298851) 《公教文明》對這一舉措表示了贊許，盡管《羅馬觀察報》沒有對此做出評論，它卻報道了司法部長在國會上發表的講話，在這段講話中，該部長表示天主教會對這一舉措持贊成態度。CC 1926 IV, pp. 459–462; Rogari 1977,p. 174.

## 第七章 刺客、孌童者與間諜

作為教宗和墨索里尼之間的特使，整個羅馬城幾乎沒有幾人能在影響力上超過塔基·文圖里。他是政府各大廳的常客，常常在各部辦公地點間往來穿梭，猶如一位非凡的權力掮客。那些年里，他造訪各個政府部長及其下屬達數百次，不僅代表教宗向他們尋求援助，還代表了許許多多其他人，這些人都懂得，想要獲取法西斯政府的援助，最佳途徑便是將事情托付給塔基·文圖里。  [[1]](#_1__Zhe_Yi_Xi_Lie_Wei_Tuo_Zhong)

這位耶穌會士行事十分謹慎，但是他和墨索里尼的密切關系還是被人注意到了。羅馬人戲稱他是“墨索里尼的告解神父”，并認為這位在幕后掌握實權的人每天都要同墨索里尼會面  [[2]](#_2__ACS__MI__DAGR__b__1320__info)  ，一份德國報紙則將他稱作是墨索里尼的拉斯普京  [[3]](#_3__Rasputin_Dong_Zheng_Jiao_She)  。  [[4]](#_4__Maryks_2012__p__308)

雖然在庇護十一世眼里，塔基·文圖里不過是將他的請求和關切傳達給墨索里尼的一個角色，這位耶穌會士對自己的使命卻有著更為寬闊的視野。就像梵蒂岡其他人士一樣，他認為教宗不夠關心意大利猶太人所帶來的威脅，于是他便自作主張，多年以來反復警告墨索里尼這一所謂的隱患。

在他于1926年夏天起草的一份檔案里，塔基·文圖里認為，“遍及全球的猶太—共濟會財閥”是教會面臨的最強大的敵人。  [[5]](#_5__Chu_Ci_Zhi_Wai__Ta_Huan_Ti_J)  他呼吁政府采取嚴厲措施，包括組建“秘密警察”，用于監視意大利的猶太銀行家。政府還應當禁止證券交易，因為在他眼里，證券交易是“神秘主義帝國最強力的手段”。此外，由于全世界的媒體幾乎都掌握在猶太人和共濟會手里，政府也就需要在所有牽涉商業和金融的話題上限制媒體的自由。他們必須意識到猶太—共濟會財閥是全世界所有經濟和政治問題的根源所在。  [[6]](#_6__ARSI__TV__b__7__fasc__430a)

盡管教宗和梵蒂岡的普遍觀點是站在同一陣線上，認為中歐和東歐的大量猶太人對基督教社會造成了威脅，但他總是將意大利稀少的猶太人口排除在這份擔憂之外。然而他的耶穌會特使卻對這三個地區的猶太人一視同仁。1926年，塔基·文圖里將一本別人題獻給他的手冊送給了領袖，這本近期出版的十五頁手冊題作《猶太復國運動和天主教》（Zionism and Catholicism ）。這本手冊先是回顧了基督教對待猶太人的歷史態度：猶太人背叛了基督，于是天主懲罰他們，令他們永世流浪，還對他們施加了詛咒；接著這本手冊談起了猶太人帶來的更直接的威脅，其作者警告道：“沒有人能夠懷疑，猶太教徒在全世界開展可怕、邪惡和毀滅性的運動。”猶太人試圖掀起激進的革命，“摧毀當前的社會，并由他們自己主宰世界，這一行徑正是出于《塔木德》（Talmud ）的教導”。  [[7]](#_7__Zhe_Ben_Shou_Ce_Ji_Filippo_M)  墨索里尼收下了這本手冊，不過我們并不清楚他有沒有閱讀它。

基本上，每個月塔基·文圖里都會單獨面見領袖，這一狀況定然會引人嫉妒，乃至引人憤恨。1927年的一個周六，他進入了羅馬的耶穌教堂，這個他每周聆聽教徒告解的地方。這棟龐大的16世紀巴洛克建筑矗立在城市的中央，是羅馬最重要的耶穌會教堂。那天，當他走過光線昏暗的教堂走進他的告解室時，被一塊寬大的寫字板嚇了一跳。他查看了寫字板上的印刷字體：

文圖里，文圖里，文圖里——

如果他們干掉了你的貝尼托——

你的帝國也將徹底陷落

趕緊向天主禱告，愿他們不著急動手。  [[8]](#_8__Xian_Ren_Biao_Shi__Ta_Mei_Fa)

這位耶穌會神父并非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匿名警告，可他不會輕易被嚇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刺客的刀下一輪對準的竟然不是墨索里尼，而是塔基·文圖里。

\* \* \* \* \*

消息很快就散布開來。六十七歲的彼得羅·塔基·文圖里神父，那個同時深受教宗與墨索里尼信任的人，險象環生，逃過一劫。根據他后來的講述，當聽到一位小伙子想要見他時，他正在耶穌教堂近旁一棟建筑的辦公桌前辦公。他告訴門房讓小伙子進來。這個小伙子進門后從外套里抽出一把刀，一言不發地舉刀刺向這位耶穌會士的脖頸。這位神父本能地向后一縮，并全靠這番條件反射才得救，傷口差一點就開在頸靜脈上。這位刺客隨即逃了出去。滿身是血的耶穌會士不知所措，跌跌撞撞地走到門廳，他的同仁趕忙上前對其進行救助，刺刀仍舊插在他的脖子里。

第二天，也就是1928年2月29日，《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報道了這則新聞：“塔基·文圖里神父是一位耶穌會學者，也是教宗與墨索里尼總理之間為‘羅馬問題’尋求解決方案而安排的聯絡人，昨日一位小伙子出于未知的緣由試圖傷害他的性命，最終導致他受傷。這位小伙子行刺的原因尚不明確，他進入神父的宅邸，用裁紙刀刺入了神父的脖頸。”報紙還補充道：“梵蒂岡圈內不樂于談論這起事件。”  [[9]](#_9____Fan_Di_Gang_Ye_Su_Hui_Shi)

這個刺殺塔基·文圖里的人到底是誰？這一行動背后又有什么樣的原因？米蘭的《晚郵報》猜測這一陰謀的背后人物試圖打擊法西斯黨的耶穌會一翼，而塔基·文圖里曾任耶穌會總會長，人們猜測他正是這股勢力的實際領導人。其他人則認為，這番暴力的背后人物是耶穌會異見人士，他們對塔基·文圖里以及他不斷鞏固梵蒂岡—法西斯聯盟的活動感到不滿。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塔基·文圖里竭盡全力說服警方，讓他們相信自己已經成為國際刺殺行動的刺殺對象。當警方提出疑慮時，他出示了自己的證據，而這一證據也很快被媒體捕捉到。3月1日，《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刊出一則新聞，題作《羅馬刺殺事件暴露反墨索里尼陰謀》（Anti-Mussolini Plot Seen in Rome Stabbing），報道指出，這一陰謀中包含一份“黑名單”，列出了計劃刺殺的對象，而這位耶穌會士在其中名列前茅。  [[10]](#_10____Luo_Ma_Ci_Sha_Shi_Jian_Ba)

塔基·文圖里告訴警方，他最近從一個信息靈通、非常可靠的來源處收到了一份機密報告，這份報告顯示，流亡巴黎的著名反法西斯人士加埃塔諾·薩爾韋米尼（Gaetano Salvemini）列出了一張法西斯政府的領導人名單，準備對他們進行刺殺。名單上位列第一的是墨索里尼，而位列第二的便是塔基·文圖里。塔基·文圖里所指控的幕后黑手足以引起警察的警惕，因為在那些批評墨索里尼的人士當中，薩爾韋米尼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薩爾韋米尼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學者，曾在佛羅倫薩大學歷史系擔任教授一職，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他作為社會黨代表進入國會。他撰寫了許多著作，譴責獨裁統治，并在1925年短暫入獄，隨后逃離出境。  [[11]](#_11__Yi_Wei_Jing_Fang_Xian_Ren_Z)

警方對塔基·文圖里的斷言持有疑慮，他們不認為像加埃塔諾·薩爾韋米尼這樣享譽國際的學者會組織一系列刺殺行動。這種事情令人難以置信。即便這樣的陰謀確實存在，那么它將塔基·文圖里列為墨索里尼之后第一重要的刺殺對象，也讓人覺得牽強。

警方并沒有將塔基·文圖里的說法當真，反而想要調查他的私人生活，這令他十分焦躁。為了阻止這一進展，他試圖讓墨索里尼介入調停。3月19日，他前去同領袖會面，迫切地想向墨索里尼證明，自己已經成了反法西斯陰謀的刺殺對象。他把這份陰謀的介紹材料交給墨索里尼，而后者早已從線人手里獲知了這一情報。

羅馬的警察局局長在后來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即便只是粗略地瀏覽一番，也能看出這份材料的可信度不高。消息來源聲稱，他曾在巴黎安排與薩爾韋米尼見面，提出為這位流亡教授提供援助。這位五十四歲的教授不僅在不清楚對方身份的情況下答應同他見面，而且還直截了當地將刺殺陰謀的所有細節透露給他。  [[12]](#_12__Jing_Fang_Bing_Bu_Xiang_Xin)  警察局局長認為，像塔基·文圖里這樣聰明且深具城府的人，竟然會相信這種東西，真讓人覺得難以置信，更別說他居然認為自己能說服別人相信，更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對于警察局局長來說，唯一的問題在于，到底是別人給他準備的這番說辭，還是他自己捏造出來的。  [[13]](#_13__Jing_Cha_Ju_Ju_Chang_Xie_Da)

警方不停地要求這位耶穌會士透露這份報告的原作者身份，然而塔基·文圖里拒絕了這個要求。警方最終還是查明了原作者的身份：他確實是一位臭名昭著的陰謀家，曾經因散布荒誕不經的傳聞而觸犯法律。  [[14]](#_14__Liang_Nian_Qian__Dang_Wei_A)

警察局局長認為，塔基·文圖里的實際動機是想要擺脫警方的調查。3月20日，一位警方線人的報告證實了他的懷疑。“我們從梵蒂岡得到確認，”這位線人寫道，“不想查明襲擊者（他很清楚這人是誰，所以也很清楚受襲的原因）身份的正是塔基·文圖里本人。”  [[15]](#_15__ACS__MI__DAGR__b__1320__Rom)

十天后，秘密警察負責人在一份機密備忘錄中寫道，本案件的最新情報解釋了塔基·文圖里的怪異行為。這同樣解釋了，為什么耶穌教堂的耶穌會士沒有聲援塔基·文圖里，而是選擇對這一切緘口不言，因為他們并不打算配合塔基·文圖里的行動：那個襲擊塔基·文圖里的小伙子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他們發生了“不正當的關系”。  [[16]](#_16__ACS__MI__DAGR__b__1320__Rom)  這便是塔基·文圖里拼命想要保守的秘密。

6月，警察局局長給出了他的最終報告，給這項調查畫上了句號。塔基·文圖里本人對事件的描述前后矛盾。如果他當真遭到刺客的刺殺，那他為什么不出聲呼救，反而讓刺客逃走了？為什么沒有一個耶穌會士向警方報告這起襲擊？受傷的神父去醫院包扎傷口，而警方是從醫院獲知了襲擊的事情。

那個襲擊塔基·文圖里的小伙子在接待室里坐了很久，久到已經被人記住了樣貌。據事發隔壁房間的一位神父說，他進入塔基·文圖里房間不久后，里面傳出了怒吼聲。塔基·文圖里卻說，那位身份不明的訪客剛剛進來就發動攻擊，并且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此外，刺客使用的武器也存疑。那把武器是一把沉重的開信刀，設計別致，由黑色的木手柄和鋒利的金屬刀刃構成。警察檢視這把不同尋常的武器時，驚訝地發現它和塔基·文圖里自己使用的開信刀一模一樣，而這位耶穌會士則聲稱武器是刺客隨身攜帶的。警察認為，一個國際政治刺殺隊伍竟然會將開信刀選作他們的武器，就算它很沉重、很鋒利，也實在是太奇怪了。

此外，傷口的狀況也引發了疑問。據塔基·文圖里所言，這位所謂的刺客持開信刀的方式類似使用匕首的方式，并且試圖刺入他的脖頸。盡管它沒有刺中頸靜脈，卻還是扎進了脖子，流出了大量血液。但是醫生的檢查報告卻顯示塔基·文圖里的脖子上并沒有很深的刺傷，反而有一道又淺又長的傷口。舉刀刺殺的動作不太可能造成這樣的傷口，更別提一把刺入脖頸的刀。對耶穌會士當天服裝的檢查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盡管衣服上沾有血跡，但是出血量并不大。雖然塔基·文圖里聲稱耶穌會同仁們看見了刺入脖頸的那把開信刀，但是沒有任何人確認這一情況。

2月的那一天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警察局局長能夠確認的就是，這起襲擊肯定跟反法西斯陰謀沒有任何關系。神父之所以受傷，是因為他和某人發生了口角，而且這個某人跟他非常熟絡，盛怒之下從塔基·文圖里的書桌上撿起一把開信刀，將它拋向了神父。這場襲擊完全出于個人原因，并不牽涉政治因素，而這也正是這位耶穌會士想盡一切辦法阻止警方找出襲擊者的原因。  [[17]](#_17__Jing_Cha_Ju_Ju_Chang_Ren_We)

在這起案件中，有一條調查路徑是警察局局長沒有深究的。在最終報告中，他承認自己沒有探究神父和這位小伙子有不正當關系的可能性。警方并不愿意深究這位耶穌會士的私生活，更別提他同這位男孩或者小伙子之間的不正當關系了，畢竟他同教宗和墨索里尼都有著密切的關系。  [[18]](#_18__Jing_Cha_Ju_Ju_Chang_Zai_Ji)  一旦排除掉政治刺殺陰謀的可能性，他們就樂于給案件畫上一個句號。襲擊者最后也沒有被逮捕歸案。  [[19]](#_19__Ta_Ji__Wen_Tu_Li_Shi_Fou_Zh)

警方線人稱，塔基·文圖里干擾警方調查的諸多舉動，教宗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但這一事件絲毫沒有影響教宗和墨索里尼對耶穌會士的重視。不久之后，他又將代表教宗同領袖會面。也許，這一事件引發的猜疑反倒使得塔基·文圖里做出了過度的補救，因為他急于贏回領袖的信任。5月，在一封寫給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向領袖保證自己“既是稱職的耶穌會士，又是稱職的法西斯黨人”。  [[20]](#_20__ACS__CR__b__68__4_maggio_19)

\* \* \* \* \*

警方線人從梵蒂岡源源不斷地發來報告，表明教宗當時正在處理好幾起孌童指控，受到指控的乃是他最親近的幾位神職人員。  [[21]](#_21__Zai_Na_Ge_Shi_Dai__Luan_Ton)  在教宗年輕的時候，卡恰·多米尼奧尼蒙席就在米蘭同他相識了，此人如今主掌教宗平日的各種儀式，經常伴隨在庇護左右。政府當局安插在梵蒂岡的線人呈遞過許多報告，詳細描述了這位蒙席遭到的指控，他同許多男孩和小伙子保持著不正當關系。

在1926年的一份報告中，線人稱教宗曾下令對這些指控進行秘密調查。在梵蒂岡調查員的審問下，一位小伙子透露卡恰曾經將自己誘騙到梵蒂岡的一個房間里，發生了性行為。當這起事件在梵蒂岡傳開時，教宗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談論。然而此事并非教宗處理的第一批類似事件。教宗管家里卡多·桑斯·德·桑佩爾蒙席也曾被指控同少年發生性關系。梵蒂岡內部人士會在教宗背后開他玩笑，說當教宗在公眾場合露面時，他的“身邊跟著兩個孌童者，分別就是卡恰和桑佩爾”。庇護接待公眾時，卡恰和桑佩爾確確實實站在他的兩側。  [[22]](#_22__Ju_Mo_Suo_Li_Ni__Yi_Wei_Chu)

雖然兩人都遭到指控，他們各自的命運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來自南美的桑佩爾不像米蘭人卡恰那樣，早年就和教宗攀上了交情。到最后，他將因為丑聞身敗名裂。庇護十一世不但沒有將桑佩爾晉升為樞機，還突然于1928年末在沒有給出任何公開解釋的情形下解除了他的職務。由此往后，這個曾經在梵蒂岡最惹人矚目的桑佩爾，便從公眾的視線中徹底消失了。  [[23]](#_23__ACS__MCPG__b__157__noto_inf)

而在接下來的許多年里，卡恰將面臨滿城的流言，風傳他喜歡將男孩帶進臥室。數位警方線人也就此問題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秘密報告，詳細地描述了其中骯臟的細節。  [[24]](#_24___Fan_Di_Gang_Chu_Ming_De_Xi)

如果沒有墨索里尼布下的間諜網絡，這些梵蒂岡的秘密就永遠不會曝光。即便是今天，圣座已經向學者開放了藏于梵蒂岡秘密檔案館的部分歷史資料，教會官員仍舊收走了那些涉及敏感“人物”的資料。所幸，墨索里尼布置在梵蒂岡的間諜網絡實在是太扎實了。這些間諜不僅包括三到四位德高望重的神職人員，還包括梵蒂岡平信徒，以及能夠獲取梵蒂岡高層資料的天主教徒，比如埃馬努埃利·布魯納托（Emanuele Brunatto），這位實業家同加斯帕里樞機來往密切，布魯納托也確實曾向墨索里尼報告過卡恰的不端行為。  [[25]](#_25__Canali_2004a__p__288)

1926年，墨索里尼的性命屢屢遭到威脅，于是他撤掉了國家警察總長，讓時年四十六歲的阿爾圖羅·博基尼（Arturo Bocchini）取而代之。博基尼一生參政，上位之前擔任過地方省督。他原本并不是一個法西斯狂熱分子，但像很多其他人一樣，他審時度勢，很快就向新政府投誠。在接下來的年歲里，他悄無聲息卻非常嫻熟地組織起一個龐大的監視網絡，既為警方提供情報，也為墨索里尼提供情報，很快就成了領袖麾下最有價值的人物。

博基尼每天上午都會同墨索里尼會面，向他展示自己認為最有價值的線人報告。博基尼聰穎、高效，并且將所有精力都獻給了他的職業，然而他生性并不殘忍，只是做事求全責備罷了。  [[26]](#_26__Zhe_Yi_Jie_Lun_Chu_Zi_De__F)  到1927年底，他已經將警方所有的監視力量都集中到自己手里，長期監視對象超過十萬人。他的工作并非監視個別人物，而是時刻掌握全體意大利人的脈搏。他的報告使得領袖能夠獲知社會公眾的情緒，沒有他，領袖身邊就全是一堆溜須拍馬的人。  [[27]](#_27__De_Felice_1968__p__465)

博基尼組織間諜網絡的方法是選拔線人頭目，由他們負責管理各自的情報子網絡，而這些子網絡頭目也會頻繁地發展下線。博基尼有位高挑、迷人的情婦，名叫比切·普佩斯基（Bice Pupeschi），便掌管著最為重要的一個子網絡，這位已婚但和丈夫分居的少婦足足比博基尼小了十四歲。博基尼將她安排在羅馬的一間公寓里，這里不僅是他們兩人的愛巢，也是她同幾位重要線人交接的地點。  [[28]](#_28__Canali_2004a__pp__283_284)

恩里科·普奇（Enrico Pucci）蒙席于1927年被這位警察總長收買，算得上他手下最有價值的情報來源之一。  [[29]](#_29__Canali_2004a__p__766n840__P)  普奇從庇護十世任期開始在梵蒂岡供職，后來他負責主持特拉斯提弗列（Trastevere）的圣瑪利亞教堂，離梵蒂岡并不太遠。1919年，他返回梵蒂岡，在教宗手下擔任國內教長以及羅馬天主教報紙《意大利郵報》的主編。1923年，正是普奇撰寫文章，公開了教宗希望斯圖爾佐神父從人民黨主席位置上引退的意愿。普奇會定期發表時事通訊，報道梵蒂岡的各種新聞。他有著非常廣的人脈關系，于是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人們普遍認為他就是梵蒂岡的首席新聞官。普奇雖然沒有太多機會晉見教宗，卻常常同加斯帕里樞機會面；此外他同樞機和地方主教共飲咖啡或者共進晚餐的身影，也常常能在羅馬的餐廳和咖啡館里見到。  [[30]](#_30__Zhe_Wei_Gao_Da___Ying_Jun_D)

墨索里尼正是通過這個情報網絡，獲知了卡恰那些見不得人的秘密。1928年，墨索里尼的線人發現有兩個男孩從這位蒙席的房間里出來。當他們被這位線人逮住并遭受質問時，兩人詳細地講出了他們與卡恰的不正當關系，乃至細致地描述了他的臥室。墨索里尼獲知這一情報最初便是通過一個特殊人物，他在警方文件中被標識為“梵蒂岡出名的線人”。此人顯然在梵蒂岡位高權重，但是其真實身份至今無法探明。在1925年至1934年間，他提交了大量機密報告，許多都直接送到墨索里尼的私人秘書處，而領袖則以極大的熱忱翻閱了這些報告。  [[31]](#_31__You_Yu_Zhe_Xie_Bao_Gao_De_Z)

1928年，在報告卡恰近期的不端行為時，這位“梵蒂岡出名的線人”補充道，博爾格（負責梵蒂岡的羅馬警察片區）的警察局局長和梵蒂岡官員相互勾結，阻止這些指控傳到外界。  [[32]](#_32__ACS__MCPG__b__157__noto_inf)  而這絕不會是羅馬警察最后一次幫助梵蒂岡隱瞞卡恰蒙席同小伙子們的不正當關系。

[[1]](#filepos312572) 這一系列委托中較為出名的一次發生在1928年7月。阿爾契德·加斯貝利（Alcide De Gasperi，他取代斯圖爾佐神父擔任人民黨主席，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意大利總理）因為在未取得許可的情況下試圖離開意大利，而在1927年被捕，并被投入監獄。第二年的大赦令他重獲自由，他卻被告知不能離開羅馬。他很想前往意大利東北部和妻兒團聚，于是準備向墨索里尼求取許可。由于加斯貝利是一位出名的反法西斯人士，他的朋友勸告他說，墨索里尼絕對不會同意他的請求，除非他能夠說動塔基·文圖里親自幫他轉達。加斯貝利盡管并不情愿，但還是向耶穌會士求助，然而這位教宗的特使拒絕向他伸出援手。在加斯貝利打算呈交給領袖的請求書上，頁邊沿寫了一行字：“塔基神父沒有接受，因為這份請求書沒有向大赦表示感激，用詞也缺乏足夠的敬意！”參見De Gasperi 2004, p. 94。

[[2]](#filepos312955) ACS, MI,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n. 204, Roma, 28 ottobre 1928.

[[3]](#filepos313135) Rasputin，東正教神父，神秘主義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寵臣。

[[4]](#filepos313252) Maryks 2012, p. 308.

[[5]](#filepos313969) 除此之外，他還提及了所謂“內部解體”的威脅。

[[6]](#filepos314578) ARSI, TV, b. 7, fasc. 430a, no date.

[[7]](#filepos315750) 這本手冊即Filippo Maria Tinti，Sionismo e Cattolicismo (Bari, 1926)。ASMAE,Gab., b. 32, Tacchi Venturi a Marchese Giacomo Balucci, capo di gabinetto, 6 settembre1926. 巴魯奇答復說，墨索里尼收到書后表達了感謝。ASMAE, Gab., b. 32. 一方面，猶太人帶來了許多威脅，開展了許多陰謀活動；另一方面，教會在推行其道德準則時遭遇到很多困難，塔基·文圖里認為這兩個方面存在聯系。在一份和加斯帕里有關的建議書（12月1日）里，他提出了好幾種方法，來應對意大利“反宗教”活動所帶來的威脅。他告訴加斯帕里，每一個天主教徒，在看到法西斯政府努力為天主教會謀求福利，將教會和國家更加緊密地綁在一起時，都應該感到高興。然而墨索里尼的努力卻在各個省份遭到抵制，地方官員常常會無視他的指令。這位耶穌會士忠告說，這場宗教情感的復興運動所面臨的絆腳石是“猶太人、新教徒、共濟會和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他們常常強有力地聯合起來，抵抗宗教、抵抗教會、抵抗國家政府”。在這份建議書里，塔基·文圖里再一次指出，這些共謀活動不僅針對梵蒂岡，還針對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塔基·文圖里知道墨索里尼非常忌憚英國的力量，他還補充說，猶太人及其盟友正殘忍地削弱天主教會，他們代表的是“盎格魯—撒克遜霸權”。他警告道，“他們正在實施一項征服意大利的計劃，今天看似只關乎宗教，明天就要踏入政治的領域”。ARSI, TV, b. 8, fasc. 446,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1 dicembre 1926, lettera con allegati.

[[8]](#filepos317034) 線人表示，他沒法擔保詩句的準確用詞，甚至沒法肯定整個故事是不是捏造的，但這個事情確實傳開了。實際上其他地方也出現了這個事情的其他版本，每一版的語句措辭都稍有不同。ACS, MI, DAGRA, b. 1320, 1927.

[[9]](#filepos318728) 《梵蒂岡耶穌會士遇刺》，NYT, February 29, 1928。

[[10]](#filepos319946) 《羅馬刺殺事件暴露反墨索里尼陰謀》，WP, March 1, 1928, p. 3。

[[11]](#filepos320926) 一位警方線人在報告里寫道：“塔基·文圖里神父認為這起針對他的刺殺，同幾個月前的一份名單有關，在那份刺殺名單上，他的名字緊跟在領袖后面。據說這份名單由法國的共濟會成員和意大利流亡人士草擬。他們譴責過他，明明身為耶穌會成員，卻建議領袖采取措施，鎮壓共濟會，于是他們就此給他判了死刑。”ACS, MI,DAGR, b. 1320, informatore, Roma, n.d.

[[12]](#filepos322300) 警方并不相信耶穌會士的名字會高居刺殺榜第二位，而在此之后，塔基·文圖里提交的秘密報告則給出了一種解釋：薩爾韋米尼告訴這位線人，“耶穌會完全就是法西斯黨，而且他們是法西斯主義得以存在的一大支柱”，這番話令警方感到頗為有趣。

[[13]](#filepos322774) 警察局局長寫道：“這份文件陳述的內容異想天開、非常粗糙、自相矛盾，顯示出杜撰者連最基本的政治形勢都不懂。”ACS, MI, DAGR, b. 59, pp. 15–16.薩爾韋米尼后來移居美國，并于1934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教職。

[[14]](#filepos323193) 兩年前，當維奧萊特·吉布森企圖刺殺墨索里尼的時候，此人就試圖欺騙警方，說這位愛爾蘭婦女是整個陰謀的一個環節，而他對這個陰謀了如指掌。當時他正因為詐騙罪被關在佛羅倫薩的監獄，而警方也確確實實懷疑他有可能為了重獲自由，而捏造了這個故事。可是在這樣一樁嚴重的案件中，任何可能的線索都不能放過。在與警方的談話中，他聲稱這起刺殺事件由一個愛爾蘭女性政治團體策劃，她們之前一直在地下秘密活動，并且與流亡法國的意大利反法西斯分子勾結在一起。警察并沒有相信這一套說辭。后來，他又因為向法國軍方兜售秘密武器而惹上了麻煩。他聲稱這種武器可以讓敵方的飛機引擎在半空中停轉。這所謂的武器自然也是假的。

[[15]](#filepos323686) ACS, MI, DAGR, b. 1320, Roma, 20 marzo 1928.

[[16]](#filepos324270) ACS, MI, DAGR, b. 1320, Roma, dal direttore, Capo Divisione Polizia Politica, 30 marzo 1928, p. 29。

[[17]](#filepos327051) 警察局局長認為，為了阻止警方找出襲擊者，塔基·文圖里給警方提供了錯誤的外貌描述，跟門房的版本相差甚遠。耶穌會士表示，兩者的不吻合，是因為門房年事已高，頭腦也不清楚了。“盡管塔基·文圖里神父一再表示門房非常糊涂，注意力一點都不集中”，但是警察局局長認為，此人沒有他說得那么不堪。ACS, MI,DAGR, b. 1320, informatore, n.d.

[[18]](#filepos327570) 警察局局長在結項報告中寫道：“考慮到這位先生尊崇的地位，我自然拒絕相信那些即便算不得非常可鄙，也十分荒謬的意見，即那些聲稱受害人和襲擊者存在不正當關系的意見。” ACS, MI, DAGR, b. 59, p. 13.

[[19]](#filepos327820) 塔基·文圖里是否真的同男孩或者小伙子有戀愛關系，進行性行為，或者對他們進行性虐待，我們目前還只能猜測。盡管我們持有的證據非常誘人，但是遠遠不能蓋棺定論。幾年后，一位警方的長期線人發來一份報告，稱塔基·文圖里“對一位小伙子親切有加，而此人并非他的親屬。那人也許是他的年輕秘書……但有人向我確證說，那人是他的真愛”。ACS, MI,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n. 590 (=Eduardo Drago), Roma, maggio 1936.我依靠Canali 2004a，得以通過線人的代碼來識別他們的身份。

[[20]](#filepos328476) ACS, CR, b. 68, 4 maggio 1928.

[[21]](#filepos328862) 在那個時代，孌童（pederast）意指一位男性同男孩或者小伙子發生性關系。

[[22]](#filepos330038) 據墨索里尼“一位出名的線人”稱，這兩個人都覬覦哪一天能晉升樞機，并且他們都利用自己的職務之便抹黑加斯帕里樞機，因為他們認為正是加斯帕里令教宗反感他們。教宗最終將這位老國務卿排除在最重要的決策之外，卡恰和桑佩爾都起到了一部分作用。ACS, MCPG,b. 155,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1926.這張便條很有可能是在6月末寫下的，因為它提到，新近任命的樞機中沒有桑佩爾，這令他感到非常失望，而樞機會議的召開日期是1926年6月21日。

[[23]](#filepos330666)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23 luglio 1928.桑佩爾甚至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哥倫比亞人。有位線人曾在6月22日和30日的報告中提到過教宗的秘密調查。而桑佩爾的突然撤職在下文中有提及：The Cardinals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902–2012)，可以在如下網址上找到：http://www2.fiu.edu/~mirandas/bios-s.htm。夏爾·盧瓦索（1960，p.102）曾在1914年至1918年間擔任法國非官方的駐梵蒂岡使節，他在回憶錄中帶著深情回憶起桑佩爾（當時他還是本篤十五世的管家），說他“是一位年輕、富有、英俊的高級教士，深受本篤十五世的喜愛”。很久之后，他才得知桑佩爾“尊嚴掃地，他們因為某些微妙的原因將他趕出了梵蒂岡……不管是什么原因”，盧瓦索補充道，“我仍然對他懷有美好的記憶”。法國大使豐特奈（Fontenay）也曾在1928年12月17日發回巴黎的報告上談到過這一神秘的撤職，轉引自Chiron 2006, p. 152n57。

[[24]](#filepos331032) “梵蒂岡出名的線人”還報告說，卡恰還請出了教宗的談判專家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幫他開脫。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30 giugno 1928.

[[25]](#filepos331861) Canali 2004a, p. 288.

[[26]](#filepos332853) 這一結論出自德·費利切（1968, p. 464），他將博基尼同殘酷成性的納粹黨黨衛隊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和萊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相比較。這兩個納粹黨人都非常尊重博基尼，并曾就技術問題向博基尼取過經。美國記者托馬斯·摩根（Thomas Morgan）和博基尼有過私交，據他所言，墨索里尼和納粹黨走得越來越近，這令博基尼非常失望；他在1940年11月過世，當時仍舊是意大利的警察總長，并且身體非常健康，摩根懷疑很有可能是德國人使了什么骯臟的手段。Morgan1941, p. 236.

[[27]](#filepos333293) De Felice 1968, p. 465.

[[28]](#filepos333950) Canali 2004a, pp. 283–284.

[[29]](#filepos334232) Canali 2004a, p. 766n840。普奇提交的大多數情報都由普佩斯基經手轉交，而她在秘密報告中的代碼是35號。1929年，普佩斯基報告說，曾有一位樞機懇求教宗把普奇趕出梵蒂岡，然而教宗回答道，他在媒體方面是把好手，而且自己不會給他委派任何機密任務，教宗還進一步說道，“而且我們知道該怎么監視住他”。ACS,MI, FP “Cerretti,” informatore n. 35 (=Bice Pupeschi), Roma, 25 ottobre 1929.

[[30]](#filepos335161) 這位高大、英俊的神父常常身穿華麗的蒙席長袍，嘴里吐露輕柔的話語，令他顯得尊貴非凡；他在那些報道梵蒂岡新聞的國外記者圈里也非常有名，他會向他們提供有償的情報，并且他那里總有各種講不完的傳聞逸事。參見Alvarez 2002, pp. 156–157; Canali 2004a, p. 195;Franzinelli 2000, pp. 259–260, 701–703。摩根（1944, pp. 31–36）曾用很長的篇幅描寫過脾氣溫厚、受人歡迎的普奇，他總有辦法讓美國新聞機構爭相向他購買情報，由此獲得了頗為豐厚的收入。

[[31]](#filepos336019) 由于這些報告的作者明顯別有用心，所以這些內容勁爆、滿篇閑話的報告非常不可靠，解讀它們的時候要特別留心。正如我在上文提及，這位“梵蒂岡出名的線人”的真實身份仍舊是一個謎。有人猜測說他就是梵蒂岡的非正式新聞官恩里科·普奇蒙席本人，他能夠在梵蒂岡自由出入，并且同許多梵蒂岡高層關系密切。但我對此持有疑慮。來自他的第一份報告早在博基尼擔任警察總長之前，從那時起一直到1934年，這位線人連續不斷地提供了大量長篇報告，內容直指梵蒂岡最高層。他有時候也會談論普奇，如果他談論的是自己，那么其中的措辭方式就太過奇怪了；譬如ACS, MCPG, b. 155, 20 marzo 1926，以及ACS, MCPG, ca. aprile 1926，報告了哥倫布騎士會的相關內容。這位“梵蒂岡出名的線人”常常詆毀加斯帕里樞機。在1927年4月的一份報告中，他頗為傳神地引用了加斯帕里責罵墨索里尼的話語，不斷地說墨索里尼“應該去拉泡屎”。ACS, MCPG, b. 156, 12 aprile 1927.然后加斯帕里卻在回憶錄中表達了他對普奇的喜愛，普奇如果這么迫切地想破壞墨索里尼對加斯帕里的印象，那未免有點奇怪。

[[32]](#filepos336401)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22 e 30 giugno 1928. 在丑聞平息之前，為了讓卡恰出去躲上一陣子，教宗讓他代表自己出席奧地利的圣體大會。但是幾個月后，這位蒙席回到羅馬，各種流言就再次死灰復燃；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35, Roma, 27 settembre 1929。這份報告還包含一張手寫便條，表明這份報告的復件還抄送給時任外交部部長的迪諾·格蘭迪。

## 第八章 《拉特蘭條約》

1861年，意大利王國建立在教宗國的亡國之土上，九年后，它又將羅馬收入囊中；從此以后，“羅馬問題”便一直是這個國家領導人的心頭大患。千年以來，歷任教宗統治著意大利半島的大片領土，從羅馬向北通向翁布里亞（Umbria），一直延伸到費拉拉和博洛尼亞。1860年，教宗國一點點被蠶食，庇護九世將意大利國王驅逐出教，宣布任何天主教徒都不能承認他的政府。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里，庇護九世和他的繼任者利奧十三世想方設法重新奪回這座不朽之城。到19世紀末，即便是教宗最狂熱的支持者也已經意識到這些努力完全是徒勞的。在國際政治方面，這一延綿不絕的沖突也給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國帶來了麻煩，天主教國家的領導人都不愿意訪問意大利的首都。因為如果他們和意大利領導人會面，教宗就不會接見他們。這樣一來，訪問羅馬就不能晉見教宗，這種局面將有可能在本國引發負面結果。

待到19、20世紀之交，這一狀況終于出現了變局。社會主義運動飛速發展，對此警覺的庇護十世解除禁令，允許天主教徒參加選舉及進駐國家政府機構，但圣座仍然拒絕承認意大利政府，而梵蒂岡的法定地位仍舊模糊不清。  [[1]](#_1__Wo_Zai_Kertzer_2004Zhong_Jia)

1924年夏，馬泰奧蒂謀殺案所引發的危機正值最深重的時刻，墨索里尼組建了一個特別委員會，重新審視那些和教會相關的法律，其目的在于減少教會和國家之間的矛盾沖突。由于圣座依然沒有正式認可意大利，所以教宗不能表現出同意大利政府合作的跡象，但是通過塔基·文圖里的溝通工作，庇護在幕后將三位高級教士安插在這個特別委員會中。  [[2]](#_2__Hou_Lai_Zhe_Yi_Te_Bie_Wei_Yu)

這個委員會在1925年召開了三十五次會議。1926年2月，當它準備宣布新修的征兵法時，教宗手寫了一封長長的公開信，發表了自己對這個委員會的看法。這封公開信刊登在梵蒂岡的報紙上，收信人是梵蒂岡國務卿。

教宗寫道，在教會權利的事宜上，任何由國會投票達成的一致意見，都是教會無法茍同的。只有經過政府和圣座的直接協商，新的共識才有可能達成。  [[3]](#_3__Jiao_Zong_Zhe_Feng_Shou_Xie)

墨索里尼對此非常激動。他告訴司法部部長和宗教部部長，教宗的這封公開信“至關重要”。領袖解釋道，法西斯政府拋卻了“自由主義的偏見”，“批判了政府對宗教持不可知論的原則與政教分離的原則”，法西斯政府正努力“將意大利恢復成一個天主教國家，將其人民恢復成一個天主教民族”。現在，兩邊進行協商的時機已經成熟。墨索里尼非常敏銳地捕捉到了庇護十一世的意思，教宗正向他拋出橄欖枝，要跟他簽訂一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協約，而這將極大地鞏固教會對法西斯政府的支持，其力度將是此前完全無法想象的。  [[4]](#_4__DDI__series_7__vol__4__n__30)

教宗難道真的會終止梵蒂岡和意大利的敵對狀態嗎？一些外交官對此表示懷疑。梵蒂岡正是通過和意大利政府勢不兩立，才避開了它幾乎完全受制于意大利的尷尬問題。美國駐意大利使節思索道，教宗幾乎完全被意大利人圍困在梵蒂岡孤島上，他難道會冒著被人們視作專事國王之神父的風險，同意和意大利和解嗎？這么做的話，這個普世的宗教機構將染上濃重的意大利色彩。大使向華盛頓報告道：“教會認為，如果同奎里納爾宮（意大利王宮）正式和解，不僅不會減弱自身影響力，反倒會增強它；要說這一和解要花上數個世紀，也未必見得，但若只需幾年時間，倒真的會讓我吃上一驚。”  [[5]](#_5__NARA__M530__reel_2__U_S__amb)

各方疑慮并沒有令墨索里尼感到氣餒，他竭盡全力協助意大利王國和天主教會達成共識。  [[6]](#_6__Dui_Ta_Lai_Shuo__Ji_Bian_Zai)  他先是宣布亞西西的圣方濟各（Saint Francis of Assisi）是“所有意大利人中最圣潔的一位，也是所有圣人中最具有意大利人風骨的一位”，然后為了紀念這位圣人，他宣布將10月4日列為國家法定假日。他還為代表教宗出席亞西西儀式的梅里·德爾瓦爾樞機準備了一輛專列，沿途配備了軍方的儀仗隊；此等殊榮在“進軍羅馬事件”之前是絕對無法想象的。樞機也報答了他的好意：他告訴亞西西的群眾，墨索里尼“顯然受到了天主的保佑”。  [[7]](#_7____Mei_Li__De_Er_Wa_Er_De_Jia)  在這位獨裁者看來，這個國家不僅要在糧食生產上自給自足，還要在奇跡生產上自給自足。許多意大利人都被位于法國盧爾德（Lourdes）的朝圣地所吸引，這令墨索里尼非常不快，于是他安排建造了洛雷托圣母像，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8]](#_8__Franzinelli_1998__p__68)

1926年8月，教宗啟動了這一系列談判，并將平信徒弗朗切斯科·帕切利選作他的個人代表。他沒有將這一任務委派給國務卿或任何一位神職人員，最大的原因在于梵蒂岡仍然沒有正式承認意大利王國的合法性。1872年，弗朗切斯科·帕切利生于一個世世代代都和歷任教宗關系密切的羅馬家族，比名氣更大、后來成為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弟弟歐金尼奧·帕切利年長四歲。當意大利軍隊于1870年攻陷羅馬的時候，這座城市的精英階層分裂成兩個派系：那些歡迎新王國的派系被稱作白色貴族，而那個仍舊忠于教宗的派系則被稱作黑色貴族。帕切利家族便屬于黑色貴族。  [[9]](#_9____Hei_Se_Gui_Zu_______20Shi)  弗朗切斯科追隨其父的腳步，成為梵蒂岡一位杰出的律師。

墨索里尼則派政府律師多梅尼科·巴羅內（Domenico Barone）代表自己出席協商會談。盡管教宗和墨索里尼都希望能夠對協商事宜保密，但紙是包不住火的。消息甚至傳到了芝加哥，當地一份報紙刊出報道，稱領袖非常愿意建立“一座教宗之城”。對這些流言非常敏感的羅馬人開始調查房地產的銷售情況，因為有傳言稱教宗正悄悄地購買房地產，目標是要建立一個從圣彼得廣場一直延伸到海邊的教宗國。  [[10]](#_10__Wen_Zhong_Ti_Ji_De_Zhi_Jia)

整個協商談判的過程非常曲折，其中最大的障礙便是教宗保護公教進行會的強硬態度。這樣一個無法控制的群體令墨索里尼感到極不舒服。由于墨索里尼無法掌控這個群眾性組織，所以公教進行會常常引起他的懷疑。他非常確信這個組織是人民黨殘黨的庇護所，但是庇護十一世認為，這個組織是他向意大利人民傳播天主教福音的主要媒介。

當法西斯分子將暴力行動對準公教進行會團體時，這樣的新聞報道常常引起教宗的怒火。1925年6月，當帕多瓦的公教進行會總部遭到黑衫軍的洗劫時，教宗派出塔基·文圖里對該案進行調查和處理。此案的警方調查則詳細地揭示出，該市的公教進行會和人民黨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  [[11]](#_11__Zhe_Wei_Ye_Su_Hui_Shi_Wei_C)  在本案以及類似案件中，教宗的這位耶穌會特使都盡其所能地平息教宗的怒火。他提醒教宗說，公教進行會的領導人反復受到勸誡，要求他們在做活動時和人民黨保持距離。這些公教進行會團體的行為在本質上是惹火上身。他還提出疑問，梵蒂岡怎么能允許一個教會組織批評法西斯政府？這可是一屆“非常親天主教的政府”。  [[12]](#_12__Ta_Huan_Bu_Chong_Dao__Chu_F)

1926年初，公教進行會總部遭遇暴行的最新報告（這一次發生在北方城市布雷西亞）再度令教宗震怒，他囑咐塔基·文圖里向法西斯黨人提出抗議。在同政府官員會面后，這位耶穌會士又一次試圖讓教宗和加斯帕里站在墨索里尼的立場看待這起事件。塔基·文圖里的報告指出，布雷西亞公教進行會的多數活躍分子同時也是名聲在外的人民黨活動家：“這令政府感到非常迷惑，一經鑒定，發現兩邊的人員相當吻合。”他繼續說道：“[布雷西亞的]公教進行會及其半官方報紙《公民報》（Il Cittadino ）均是反政府政黨避人耳目的偽裝，政府在這方面有確鑿的證據。”  [[13]](#_13__ASV__AESI__pos__734__fasc)

盡管地方法西斯黨人對準的都是成年公教進行會團體，但是墨索里尼更關心青年團體的作用。在鞏固獨裁統治的過程中，他意識到，將孩子們塑造成忠誠的法西斯分子乃是重中之重。在同梵蒂岡開啟協商的幾個月前，他宣布成立了國家巴利拉組織，下轄四個分部：由八至十四歲男孩組成的“巴利拉”，由十四至十八歲男孩組成的“前衛軍”，而相應年齡的女孩組織則分別叫作“意大利女孩”和“意大利女青年”。組織成員的制服都類似軍裝。  [[14]](#_14__Ba_Li_La_Shi_Yi_Wei_Xiao_Yi)

在墨索里尼看來，教會遍布全國的青年團體網絡（從天主教童子軍到各種由大孩子組成的公教進行會組織）給他帶來了惡性的競爭。控制青年的重要性如此迫切，為此他不惜冒險激怒教宗。他首先宣布童子軍團體是非法組織。教宗被這個消息激怒了，派塔基·文圖里向他提出警告，讓他不要得寸進尺。

1927年初，不僅天主教童子軍遭解散，這一禁令似乎還要擴展到公教進行會的青年團體，對此感到氣憤的教宗命令中止雙方的協商。新的管理辦法規定非法西斯青年團體“只能進行宗教活動”，而教宗要求這一管理辦法對公教進行會網開一面。畢竟吸引年輕人參加這些天主教團體的乃是其娛樂活動。教宗擔心如果這些團體只能提供禱告活動和宗教訓導，那么它的成員數量將很快減少。他派塔基·文圖里給墨索里尼發去了最后通牒：除非他在這個管理辦法上松口，否則羅馬問題就不會再有解決之道。墨索里尼意識到自己做得有點過火了，于是在1927年2月末給各位省督傳達了消息，讓他們放過公教進行會的青年團體。心滿意足之后，教宗便讓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將協商繼續進行下去。  [[15]](#_15__SV__AESI__pos__667__fasc__1)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隨著協商的進行，教宗每周都會同帕切利見幾次面。地方天主教團體遭受法西斯暴行的最新報道時不時會傳入梵蒂岡，而教宗則會再度要挾中止協商談判。然而到這個時候，他在這些協商談判以及對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的支持上，已經投入了太多籌碼，承受不起失敗的風險。他將這些暴力怪罪于墨索里尼周圍的反教會人士，他們的這些行為旨在挫敗這位獨裁者的意志。其他方面的沖突也顯現出來。1928年4月，教宗抱怨政府在近期成立了法西斯女孩組織。她們列隊齊步時把步槍扛在肩膀上的做法尤其令他不快。但這一次，錯又不出在墨索里尼身上。教宗說道：“墨索里尼對這個國家發生的許多事情都不知情。”  [[16]](#_16__ACS__MCPG__b__157__noto_inf)

早些時候，教宗曾經告訴教廷的諸位樞機，教會與政府的協商正在按部就班地進行，但是他擔心遭到這些人的反對，于是決定直到達成最初的協議，才將具體消息知會他們。他尤其擔心博納文圖拉·切雷蒂樞機提出反對意見，他有著鮮明的反法西斯立場，而且在國際事務方面發表的觀點具有很強的影響力。1928年，當協商進入到最關鍵的幾個月，教宗為了支開切雷蒂，將他派往澳大利亞的悉尼，作為教宗特使出席國際圣體大會。直到雙方達成最后協議，這位樞機才會從悉尼返回羅馬。  [[17]](#_17__Coco_2009__pp__164_165)

1928年10月，最終的協議已經近在眼前，教宗卻再度聽聞令他不快的消息：國王改變了主意，可能不會簽署這份條約。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的名號源自那個奪走教宗領土的人，教宗很清楚，他絕對不是天主教會的朋友。國王母后素有善行和敬奉天主教會之名，兩年前，當她過世時，庇護十一世曾進一步疏遠過國王。國王想讓教宗主持母親的葬禮，或者至少以公開的形式悼念她，可是教宗什么都沒有做。梵蒂岡日報主編達拉·托雷（Dalla Torre）伯爵曾為國王母后準備了一篇充滿溢美之詞的訃告，卻因沒有得到教宗的首肯最終沒有刊發。  [[18]](#_18__Rhodes_1974__p__41__Zhe_Fan)

庇護如今擔心，這么多年的艱苦協商有可能全部化為烏有。他拼命地想要找到出路，贏取國王的同意，于是他找出了自己所知的國王最擔憂的問題：他擔心實際受教宗控制的領土可能會逐漸擴張。于是庇護放棄了早先提出的一個要求，不再要求將梵蒂岡以南賈尼科洛山（Janiculum Hill）上多里亞·潘菲利別墅（Villa Doria Pamphili）的廣袤花園納入梵蒂岡的版圖。  [[19]](#_19__Pacelli_1959__p__99__Jiu_Za)

“如果這樣的條件他們都不接受，”墨索里尼的協商代表多梅尼科·巴羅內在聽聞這一消息后，告訴帕切利，“那他們就是傻子了。”  [[20]](#_20__Ba_Luo_Nei_Bu_Chong_Dao___B)

\* \* \* \* \*

墨索里尼和國王在性格和成長環境上都有著天壤之別，卻在20世紀20年代末形成了一段怪異而穩定的關系。墨索里尼甚至說過，他們兩人仿佛在一間臥室分床同住。只要周圍有神父在場，他們都會感到不自在，而除此之外，他們還有不少別的共同點。國王曾經評價過意大利總參謀長彼得羅·巴多格里奧（Pietro Badoglio）的為人，說他是“一副大象皮囊里裹了一個麻雀的大腦”。墨索里尼也常常在私下里諷刺國王。他會發牢騷說，個頭矮小的國王給人印象不佳，沒法代表這個偉大的國度。他是個“尖酸、狡詐的小矮個”。他還多次將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稱作是“一輛空蕩蕩的馬車”、一顆“枯樹”以及一頭“應該拔光毛的老母雞”。但他不允許別人嘲笑國王，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子。雷切爾同她的丈夫一樣出身于反君主環境之中，不喜歡同富有和教養良好的人相處，王親貴族更是令她感到不自在。墨索里尼無疑明白這一點，所以每當她提起自己最喜歡的那個笑話，說國王得要個梯子才能爬上他的馬匹時，墨索里尼總會讓她閉嘴。  [[21]](#_21__R__Mussolini_1974__p__154)

每到周一和周四上午10點，領袖都會穿上禮服大衣，戴起高高的禮帽，前去宏偉壯觀的奎里納爾宮，晉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殿下；而國王總是在這里簽署大量政令，安排各種人員會面。據昆托·納瓦拉觀察，在這些早晨，墨索里尼就像變了個人一樣。在一周余下的時間里，這位至高無上、獨攬大權的領袖常常身穿法西斯民兵制服，不停歇地組織著各種閱兵和集會，超絕地領導著整個政體復雜的權力運作，令各位部長都對他十分忌憚。唯獨在這些奔赴王宮的早晨，墨索里尼卻扮演著畢恭畢敬的總理角色，他懂得尊重國王的各項特權，畢竟在臺面上，意大利仍然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  [[22]](#_22__Navarra_2004__p__16)

\* \* \* \* \*

1929年2月7日，加斯帕里樞機召集了所有駐圣座大使，告訴他們有一項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條約即將公布，它會結束教會和意大利政府之間持續了數十年的爭議。這位樞機將出席簽署這份條約，一經公布，他會受到全世界教會人士的稱贊。但對他本人來說，這個時刻喜憂參半。近些年來，加斯帕里越來越清楚地感受到，教宗不再看重他的工作，盡管他相當現實，他也有他的尊嚴。1927年，在加斯帕里晉鐸五十周年的典禮上，他受到了教宗的冷落，令他整個心都涼了。當時，他的手下為他準備了一場慶祝晚宴，并以他的名義在西斯廷教堂舉行了一場由教宗主持的彌撒。教廷的所有樞機以及所有駐梵蒂岡使節都將到場，教宗卻沒有出席，而這些高層人士也確實對這出人意料的缺席議論紛紛。  [[23]](#_23___Fan_Di_Gang_Chu_Ming_De_Xi)

1928年初，加斯帕里已經不再年輕。他患有糖尿病和心臟病，晚上總是睡不好覺。這位曾經慈眉善目的國務卿變得越發憂郁，越發容易傷感。當別人指出他面色蒼白，而且他的雙手也確實開始顫抖時，他卻告訴別人自己身體感覺良好。教宗敦促他休息一段時間，可是加斯帕里擔心教宗會趁自己休息之機，讓別人取代他的地位，于是只好堅稱自己不需要休息。  [[24]](#_24__ACS__MCPG__b__157__noto_inf)  他并不知道自己還能堅持多久，然而意大利很快就要和圣座結束長達七十年的敵對關系，他希望自己能夠在場，沐浴這一歷史性時刻的榮光。

在加斯帕里召集各國駐梵蒂岡大使并向他們宣布消息的第二天，墨索里尼用電報給所有駐意大利大使發去了同樣的消息。國外報紙紛紛刊出消息，表示雙方即將舉行簽約儀式，但意大利本土的報紙卻對此只字不提，也很少有意大利人意識到即將會發生什么。  [[25]](#_25__DDI__series_7__vol__7__n__2)

“現下真是美好的時日，”2月8日，弗朗西斯·斯佩爾曼蒙席從羅馬給身在波士頓的母親寫信，他是國務院中唯一一位美國人，“能活在這樣的日子里真是太美好了，能在這樣的日子活在羅馬真是太美好了！”他還繼續寫道：“這里的每一個人都散發出幸福的光芒，而他們的幸福也確確實實。圣父、加斯帕里樞機以及博爾貢吉尼必將名留青史。當然了，墨索里尼也必定如此。”  [[26]](#_26__Zhuan_Yin_Zi_Gannon_1962__p)

梵蒂岡和意大利簽訂《拉特蘭條約》的最終細節，由墨索里尼和帕切利在1929年2月9日周六晚上最終敲定。  [[27]](#_27__Zui_Hou_Yi_Xiang_Zheng_Yi_S)  條約的第一條規定，天主教乃是“意大利唯一的宗教”。整份條約一共包含三個文件，其中第一個文件為政治條約，它將梵蒂岡城確立為一個由教宗統治的主權國家，意大利政府無權對其進行干涉。（在此之前，盡管梵蒂岡的宮殿、園林以及圣彼得大教堂都由教宗實際控制，但是意大利政府始終都認為它們坐落于意大利的領土上，因此它們的法定地位十分模糊。  [[28]](#_28__Zhe_Yi_Tiao_Kuan_Jian_Yu_Sa)  ）梵蒂岡城的國界大致便是現存的中世紀城墻；圣彼得廣場并沒有被包裹在城墻內，但它也是這個城邦國家的一部分，此外它還將向公眾開放，并且受到意大利警察的監管。梵蒂岡國的總領土面積為一百零九英畝。冒犯教宗的尊嚴等同于冒犯國王的尊嚴，將是非常嚴重的一項罪名。所有駐圣座大使將和駐意大利大使一樣享有各種特權和豁免權。除了對梵蒂岡城擁有主權外，圣座還擁有特權，掌管羅馬的眾多教堂以及鄰近的阿爾巴諾山（Alban Hills）上岡多菲堡（Castel Gandolfo）的避暑宮殿。羅馬的所有樞機都將被視作這個新國家的國民。  [[29]](#_29__Toschi_1931)

《拉特蘭條約》的第二個文件是宗教事務協約（concordat），它規定了圣座和意大利的法定關系。意大利政府不允許羅馬的任何事務危害到梵蒂岡作為天主教界神圣中心的地位。這個文件還將一系列天主教節日列為國家法定假日，而意大利也首次認可了宗教婚禮。（在此之前，如果一對夫妻只在教堂舉行過婚禮，他們并不算是締結了法定的婚姻關系。）宗教事務協約還將原先便在小學強制教授的宗教課程擴展到所有中學。盡管在當時的意大利，只有五分之一的兒童在小學畢業后繼續進修，然而這些人將是下一代精英分子，給他們灌輸宗教思想對教會來說非常重要。  [[30]](#_30__Bosworth_2011__p__171)  在另外一條教宗看重的條款中，意大利政府認可了公教進行會的合法地位，允許它在意大利自由活動。

條約的第三個文件也即最后一個文件乃是一份金融公約。意大利將向圣座支付7.4億里拉以及10億里拉的意大利債券（換算成2013年的貨幣價值，總共相當于10億美元），作為交換，圣座則同意放棄追究教宗國的所有損失問題。  [[31]](#_31__Ji_Yu_Nenovsky_et_al__2007Z)

2月11日周一上午9點，外交部副部長迪諾·格蘭迪抵達墨索里尼家中。這一天，領袖的情緒非常激昂。在趕赴簽約儀式的路上，他在車里唱起了一首羅馬涅民歌。與領袖的高興形成對比的是，格蘭迪現下卻非常緊張。

“我應該親吻樞機的戒指么？”他問道。

加斯帕里樞機肯定希望如此，墨索里尼回答道。他興致高昂地告訴格蘭迪，他知道該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他把手伸進口袋，掏出了一枚硬幣，用手指把它彈了起來。這位獨裁者看了一眼結果后宣布道：“我們待會兒要親吻戒指！”  [[32]](#_32__Grandi_1985__pp__254_255)

那天清晨的梵蒂岡，加斯帕里和他手下的副國務卿博爾貢吉尼蒙席一同前往教宗的私人書房向教宗稟報，簽約儀式的所有準備工作都已經就緒。他們把剛剛從梵蒂岡印刷廠印出來的條約文件以及反映最終改變的地圖呈交給教宗。在細致查看文件之后，教宗點頭許可。加斯帕里和博爾貢吉尼必須馬上動身了，不過在離開之前，他們還是要跪下祈求教宗的降福。他們都感覺到即將發生的事情將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離開房間時，淚水模糊了加斯帕里樞機的雙眼。  [[33]](#_33__Martini_1960b__p__113__Hou)



簽署《拉特蘭條約》，1929年2月11日。從左到右：弗朗切斯科·博爾貢吉尼—杜卡蒙席、彼得羅·加斯帕里樞機、弗朗切斯科·帕切利、貝尼托·墨索里尼、迪諾·格蘭迪



簽署條約之后，拉特蘭宮，1929年2月11日。前排中央，加斯帕里樞機和墨索里尼；最左，皮扎爾多蒙席；加斯帕里左側是戴著禮帽的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墨索里尼右側是博爾貢吉尼蒙席，再右邊是迪諾·格蘭迪

簽約儀式的舉行地點安排在拉特蘭宮的教宗廳，位于羅馬城的另一側，和梵蒂岡城遙相呼應。教宗同時身兼羅馬主教一職，然而這個職位的駐地并非圣彼得大教堂，而是拉特朗圣約翰大教堂。從4世紀[此地原本建有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的宮殿，但被大帝送給了教宗]起，歷任教宗便一直居住在拉特朗圣約翰大教堂，前后延續了千年之久。  [[34]](#_34__Reese_1996__p__11)  它曾在5世紀時被汪達爾人（Vandals）摧毀，并在14世紀毀于大火，但它總會得到重建，變得愈發宏偉。不過，自從意大利的部隊在1870年攻下羅馬，令教宗變成“梵蒂岡的囚徒”之后，便再也沒有哪位教宗曾踏足此處。

當墨索里尼的汽車停靠在門口時，加斯帕里和博爾貢吉尼已經乘坐一輛嶄新的克萊斯勒（由一位富有的美國教友捐贈）抵達拉特蘭宮了。當時的天空正下著小雨。  [[35]](#_35__Si_Pei_Er_Man_Yu_1929Nian_2)  領袖從車里出來，左手攥著他的白色手套。他身穿一套晨禮服，從燕尾服到高筒禮帽一應俱全。  [[36]](#_36__Mo_Suo_Li_Ni_Cong_Che_Li_Ch)  樞機上前向墨索里尼和格蘭迪問好，兩人身邊還跟著司法部部長阿爾弗雷多·羅科（Alfredo Rocco）以及墨索里尼手下的副總理弗朗切斯科·瓊塔（Francesco Giunta），樞機邀請他們沿著宮殿門口壯觀的階梯一同拾級而上。他們緩緩地走過展示教會在世界各地傳教的展廳，在格蘭迪看來，這些裝飾華麗的展廳多到沒有盡頭。熱情洋溢的加斯帕里每認出一個國家就要招手示意，從新幾內亞和斐濟群島到蒙古、印度以及尼加拉瓜。“全都是些奇怪的名字和遙遠的土地，”格蘭迪回憶道，“樞機面帶笑容地說出這些地名，仿佛想要向我們強調天主教會在這個世界上有著多么強大的力量，有著多么廣闊的勢力范圍。”

最后他們到達了目的地。這個寬大房間的盡頭擺放著一張十六英尺長四英尺寬的玫瑰紅桌子；八張沉重的黑色木雕扶手椅在桌子另一側擺成一排。  [[37]](#_37____Zai_Jun_Shi_Tan_Ding_Da_D)  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在長桌的中央位置落座。在他們準備簽署文件的時候，原先看起來如此放松的獨裁者，突然變得面色蒼白，頗有些不自在的神色，反倒是樞機顯得輕松自如，臉上保持著微笑。  [[38]](#_38____Si_Te_Fan_Ni_Lun__La_Te_L)

當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從拉特蘭宮出來的時候，不斷聚集的人群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這場簽約儀式并沒有提前公布信息，然而教堂外布置的眾多警察和民兵以及領袖的到場引發了人們的猜測，記者和攝影師紛紛趕到現場。盡管當時下著小雨，但是人群的心情卻非常明媚。神父和神學院的學生們一齊念誦著感恩禱告，其中夾雜著“庇護萬歲，我們的教宗和國王”的呼喊聲，而聚集在教堂前方廣場上的人群則高喊“墨索里尼萬歲！意大利萬歲！”，其中還摻雜著法西斯黨人的吼聲。皮扎爾多蒙席在離開的時候，受到群情感染，竟然舉手行法西斯禮，回應人群的呼喊聲。  [[39]](#_39__A_Na_Er_Duo__Ke_Te_Xi____Fa)

墨索里尼的情緒則相對克制，他在回辦公室的路上保持著沉默。盡管這個條約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勝利，但只要身邊有神父或者身處教堂之中，他就會感到不自在。  [[40]](#_40__Grandi_1985__p__255)

教宗對這份條約的重視，可能再怎么夸張都不為過。意大利最重要的教會歷史學家之一雷納托·莫羅（Renato Moro）認為，盡管意大利政府在19世紀組建時致力于政教分離和自由民主制，然而教宗從未拋棄過自家的理念。教會眼中理想的意大利社會應當采取獨裁統治，具有森嚴的等級結構，并且根據教會原則運作。多年以來，回歸教宗一度擁有的威權地位仿佛變成了一場不切實際的白日夢，然而法西斯黨的出現卻帶來了新的希望。  [[41]](#_41__Zai_Guo_Qu_De_Ji_Nian_Li__M)

在條約簽訂之前，那些不滿獨裁統治的天主教徒還可以辯稱說，教宗對法西斯政府并不熱心，可如今這種借口已經無法成立。意大利天主教徒都非常清楚，如果他們要遵從教宗的意愿，就必須支持墨索里尼。僅在條約簽訂兩天后，教宗在向一群大學生發表講話時，就親自解釋了這一歷史性條約是如何成為現實的。他告訴這些學生，一邊的領導人是位圖書館館長，在梳理歷史文檔方面堪稱專家，這也許促成了條約的簽訂，而“神意讓另一邊的領導人并不茍同自由黨的觀點，恐怕也對這份條約有所幫助”。教宗將墨索里尼稱作是由天主派來的人，這番說辭將在接下來的一年里，被主教、神父以及天主教平信徒重復千千萬萬遍。  [[42]](#_42__Zhuan_Yin_Zi_Confalonieri_1)

在博洛尼亞，當地日報的特刊很快就銷售一空。當地的大主教宣布將于第二天舉行一場特別的感恩彌撒，并邀請了政府和軍方的官員。基耶蒂大主教都沒法把儀式拖到第二天，激動的群眾在簽約儀式當晚便聚集到教堂里，要求舉行特別的感恩彌撒。當地的法西斯官員舉著旗幟，驕傲地參加了這些儀式，絲毫沒有受到教堂外暴風雪的阻撓。  [[43]](#_43__Sheng_Du_Bao_Gao_Shou_Yu_AC)  全國上下的報紙（其中包括梵蒂岡的報紙）都在重復如下主題：如果意大利仍舊采納民主體制，那么這一歷史事件就絕無可能發生。只有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黨，才使它成為可能。  [[44]](#_44__Yi_Fen_Za_Zhi_Kan_Wen_Gong)

羅馬的政府建筑和私人住宅上出現了此前完全無法想象的組合：黃白雙色的梵蒂岡旗幟同意大利三色國旗并排懸掛在一起。碰巧的是，當時正值教宗加冕七周年，教宗本人在圣彼得大教堂主持一場慶祝彌撒。十二名身穿紅色制服的侍從分兩列將教宗御座（sedia gestatoria）抬進了宏偉的大教堂。數萬名虔誠的信徒，在肩并肩地等候了幾個小時之后，終于見到了教宗的真容。羅馬的法西斯黨部號召法西斯黨員前往圣彼得廣場，表達他們對天主教會的熱忱。瓢潑大雨中，共有二十多萬人佇立在大教堂外。后來，當教宗走上陽臺向他們降福時，人群爆發出喜悅的歡呼聲。教宗的身下站著羅馬各支法西斯民兵隊伍的代表，手里高舉著旗幟，而無窮無盡的信徒以及看熱鬧的人則一直延伸到廣場的遠端。那天傍晚，在法西斯黨和民兵官員的指揮下，這些參與慶典的人士又聚集在奎里納爾宮外，國王出現在宮殿的陽臺上，右邊站著王后，左邊則站著法西斯黨總書記。  [[45]](#_45__A_Na_Er_Duo__Ke_Te_Xi____Er)

全世界都稱贊領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  [[46]](#_46____Niu_Yue_Shi_Bao____De_Tou)  梵蒂岡高層的一位助手就描述過這一事件引發的轟動效應。甚至連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慶祝都無法與意大利當天的狂喜相媲美：“這份喜悅徹頭徹尾，連一片遮蔽的云彩都沒有。每個人都感覺到，意大利即將在偉大和榮耀上達到新的高度。”從都靈到西西里，全國上下的主教和神父都下令撞響教堂的鐘聲，慶祝這一偉大的時刻，向那個終于為教會和國家帶來和諧的偉人致敬。  [[47]](#_47__Zhe_Xie_Hua_Yu_Chu_Zi_Duo_M)  對絕大多數意大利人來說，這段維系了數十年的敵對關系終于結束，給他們帶來了巨大的解脫。忠誠的意大利國民和虔誠的天主教徒之間總算不再有任何矛盾。

美國駐羅馬代辦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這份條約“對墨索里尼而言是一場勝利，因為他結束了爭端，為法西斯黨贏得了神職人員的支持”。恩里科·卡維利亞（Enrico Caviglia）將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英雄，也是國王的親信，他當天的日記為這一事件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這些通過政變執掌政權的人，需要通過梵蒂岡來取得合法地位。”他問道，如果二十年后，人們開始仇視這種奪取人民自由的獨裁統治，那將會怎么樣？他思索道：“梵蒂岡對這種政權給予道德上的支持，人們會怎么看待它？”  [[48]](#_48__NARA__M530__reel_2__n__2140)

墨索里尼遍布全國的間諜網絡只給他傳來了一條負面情報。羅馬線人在2月13日的報告開頭都是好話：“和解的消息給幾乎所有人都帶來了喜悅和不可言表的熱忱……人們說這一歷史事件所取得的成功無可匹敵，多虧了領袖的天才創舉……極大地提升了法西斯黨的聲望和權勢。”但也有一些不滿的聲音，“零星地來自一些尖酸的老自由黨人，以及共濟會和猶太人的殘黨”。對于意大利境內的猶太人來說，《拉特蘭條約》只能帶來恐懼和緊張情緒。半個多世紀之前，教宗國壽終正寢，他們終于得到解放，離開了教宗規定的猶太人區。政教分離和意大利統一曾經令他們得到拯救。可如今，他們開始擔憂未來的生活。  [[49]](#_49__ACS__CR__b__6__13_febbraio)

[[1]](#filepos354796) 我在Kertzer 2004中講述過歷任教宗試圖收復羅馬的故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本篤十五世試圖和意大利政府達成一項協議，卻因為時運不濟而沒能成功。參加巴黎和會的意大利總理曾經記述過這件事情，參見Orlando1937, pp. 140–146。教宗代表也曾提及這件事情，Orlando1937, pp. 177–186。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對這項協議的反對意見，記錄在Margiotta 1966, pp. 56–58。

[[2]](#filepos355401) 后來這一特別委員會的情況被報紙披露出來，教宗命《羅馬觀察報》刊文聲明，“這個特別委員會的運作及其三名教會法律顧問的任命和選拔，都同教會高層沒有任何關系”。然而一份由墨索里尼簽署、寫給司法部部長的指令的復件卻道出了真相。“關于之前的協議，”墨索里尼這樣下筆寫道，“我要告訴閣下，圣座指定如下人士參加教會立法改革委員會。”在兩位梵蒂岡高層官員和一位羅馬宗座大學的法律教授的名字和職位后面，緊跟的是，“這跟圣座提供給我的指示一模一樣，其中還列出了幾個要點，乃是圣座希望能夠囊括在這次改革中的”。墨索里尼附上了一份由塔基·文圖里代表教宗轉達的指示，列出了六項教宗希望能夠得到采納的措施。ASV, AESI, pos. 628, fasc. 56, 6. 91r–93r, 3 agosto 1924.德·費利切（1995, p. 106–110）在梵蒂岡檔案對外公開之前，就寫過這些事件；他的描述同我們目前獲知的情形基本吻合。另參見Margiotta 1966, pp. 131–133。

[[3]](#filepos356056) 教宗這封手寫公開信收于ASV, AESI, pos. 702, vol. 1, 6. 14r–16v。

[[4]](#filepos356910) DDI, series 7, vol. 4, n. 308. 1926年5月16日，塔基·文圖里給墨索里尼寫信道，幾天前他同領袖會面之后又跟加斯帕里談了談，得知梵蒂岡已經做好準備，同墨索里尼直接對話，來解決羅馬問題；DDI, series 7, vol. 4, n. 312。

[[5]](#filepos357842) NARA, M530, reel 2, U.S. ambassador Henry F. Fletcher, Rome, to secretary of state,October 4, 1927, n. 1410.

[[6]](#filepos358105) 對他來說，即便再小的機遇也值得把握。在一位尊貴的神父下葬后，其家庭成員拜訪了墨索里尼，并將這位蒙席佩戴在胸前的十字架送給了他，解釋道，其中含有圣十字架的圣物。墨索里尼親吻了它，對這個煽動群情反對教會的羅馬涅土著來說，這絕不是一件能夠輕易做到的事情，然后他告訴神父親屬，他會始終將這個遺物帶在身邊。教宗聽聞這個故事，非常高興。“很好，很好”，他說道。ACS, MCPG, b. 155, 5 luglio 1926.

[[7]](#filepos358796) 《梅里·德爾瓦爾的講話》，《法西斯政府報》，1926年10月7日，第1版；Franzinelli 1998, p.54。

[[8]](#filepos359217) Franzinelli 1998, p. 68.

[[9]](#filepos360102) 《黑色貴族》，《20世紀報》，1929年2月20日，第11版刊登了一張弗朗切斯科·帕切利的照片，他是這一派系的代表人物。Bosworth 2011, p. 26.

[[10]](#filepos360856) 文中提及的芝加哥報紙即《芝加哥每日新聞報》。1926年11月的一份秘密警察報告稱，美國的哥倫布騎士會正在為購買土地籌集資金；ACS, MI, DAGRA, b. 113, n. 52199。

[[11]](#filepos361855) 這位耶穌會士為此聯絡了內務部部長路易吉·費代爾佐尼（Luigi Federzoni）。警方報告披露這兩個組織的總部位于同一棟建筑里，而且該地人民黨負責人曾經是一位神父。

[[12]](#filepos362402) 他還補充道，除反對法西斯黨以外，人民黨還愿意同社會黨人結盟，該黨可是“所有基督教原則不共戴天的敵人”，這尤其令人震怒。Tacchi Venturi to Gasparri, AESI, pos. 611, fasc. 46, 6. 23r–23v；警方報告位于6. 25r–30r。

[[13]](#filepos363299) ASV, AESI, pos. 734, fasc. 241, 6. 4r–5v,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8 gennaio 1926. 這位耶穌會士還補充了費代爾佐尼對布雷西亞主教的看法：“盡管他尊重加賈（Gaggia）蒙席的田園生活美德、宗教學識以及文化修養，然而他認為，正因為加賈蒙席年事已高，他沒能意識到有一大批人打著公教進行會的名頭，卻從事著顛覆政府的秘密活動，不擇手段地要將教會高層拖下水。”

[[14]](#filepos364034) 巴利拉是一位小英雄的姓氏，據說他曾經在1746年激發熱那亞人民反抗奧地利部隊。Gibelli 2003, p. 267.

[[15]](#filepos365515) SV, AESI, pos. 667, fasc. 129, 6. 68r–69r.

[[16]](#filepos366507)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29 aprile 1928.

[[17]](#filepos367296) Coco 2009, pp. 164–165.

[[18]](#filepos368157) Rhodes 1974, p. 41. 這番描述基于德國駐羅馬大使的證言。

[[19]](#filepos368775) Pacelli 1959, p. 99. 就在幾個月前（3月1日），當弗朗切斯科·帕切利轉達政府的意見，想讓教宗放棄將多里亞·潘菲利別墅納入梵蒂岡的版圖時，教宗大為光火。當時庇護十一世非常堅定，他寧愿不簽訂這項條約，也不愿將這片土地排除在條約之外。Pacelli 1959, p. 82。

[[20]](#filepos369098) 巴羅內補充道：“不接受這樣的條件，就相當于……他們不想結束兩方之間的沖突，但我可以向你保證，墨索里尼肯定不會這么想。”Pacelli 1959, p. 100。帕切利在日記中寫道：“巴羅內還向我透露，國王曾在多個場合表示自己對解決羅馬問題不是很有熱情。”

[[21]](#filepos370554) R. Mussolini 1974, p. 154; Bosworth 2002, pp. 347–349; Milza 2000, p. 537.

[[22]](#filepos371487) Navarra 2004, p. 16.

[[23]](#filepos372621) “梵蒂岡出名的線人”在其1927年的一連串報告中，談及教宗缺席加斯帕里的周年慶典，并由此產生的影響。ACS, MCPG, b. 155.

[[24]](#filepos373240)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1 gennaio 1928; 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5 gennaio 1928;ACS, MCPG, b. 157,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12 gennaio 1928。

[[25]](#filepos373912) DDI, series 7, vol. 7, n. 240; 阿納爾多·科特西，《明天僅有九人見證條約簽訂儀式》，NYT, February 11, 1929, p. 3。

[[26]](#filepos374558) 轉引自Gannon 1962, p. 62。兩天后，斯佩爾曼蒙席形容教宗“對任何事情都感到高興”。Gannon 1962, p. 63。博爾貢吉尼是加斯帕里手下的兩位部長之一，他在三年前將斯佩爾曼調來羅馬，幫忙處理英語文件以及美國教會的事務。當時墨索里尼安插在梵蒂岡的主要線人和博爾貢吉尼的關系不好，他聲稱這位教宗駐意大利大使想要討好美國的哥倫布騎士會，該會是梵蒂岡重要的資金來源。在1926年末，教宗早已聽說過這位年輕的美國神父，尤其是他看似無窮無盡地從美國籌集資金的能力，于是他便要求單獨接見斯佩爾曼。沒過多久，教宗就開始稱呼他為“珍貴蒙席”。ACS, MCPG, b.155,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1926 （沒有給出具體日期）；and MCPG, b. 155, noto informatore vaticano, 5 gennaio 1927. 斯佩爾曼非常高興地將教宗對自己的昵稱告訴了母親。Gannon 1962, pp. 57–59.

[[27]](#filepos374843) 最后一項爭議涉及宗教裁判所。這座宏偉的16世紀建筑位于梵蒂岡的城墻邊上，東邊是圣彼得廣場，前門開向一條公用街道。教宗想將這棟建筑以及正對面的街道都納入新梵蒂岡城的版圖。然而，國王反對劃更多的土地給教會，教宗最終只好做出了妥協。最后，這條街道仍然不受教宗掌控，但是這座宮殿就像羅馬的其他許多教會建筑一樣，盡管并非梵蒂岡的領土，卻被賦予特殊的法律地位。ASMAE, Gab., b. 718, Roma,10 febbraio 1929.

[[28]](#filepos375438) 這一條款見于撒丁王國1848年制定的法規，后來又被剛剛建國的意大利王國于1861年沿用，天主教也由此被看作是“自由國家的自由教會”。

[[29]](#filepos376263) Toschi 1931.

[[30]](#filepos377160) Bosworth 2011, p. 171.

[[31]](#filepos377735) 基于Nenovsky et al. 2007中1929年意大利里拉和美元的匯率。

[[32]](#filepos378585) Grandi 1985, pp. 254–255.

[[33]](#filepos379341) Martini 1960b, p. 113. 后來，加斯帕里告訴夏爾——魯，那一天他哭了五次：分別是進教宗書房和出來的時候，抵達簽約地點拉特蘭宮的時候，簽約儀式的過程中，以及向教宗報告當天情況的時候。Charles-Roux 1947, p. 48.

[[34]](#filepos380929) Reese 1996, p. 11.

[[35]](#filepos381573) 斯佩爾曼于1929年2月10日寫給母親的信，收于Gannon 1962, p. 63。

[[36]](#filepos381814) 墨索里尼從車里出來的照片刊登在《20世紀報》，1929年2月20日，第7版。

[[37]](#filepos382963) 《在君士坦丁大帝的宮殿中舉行簽約儀式》，NYT, February 11, 1929, p. 2。

[[38]](#filepos383336) 《斯特凡尼論〈拉特蘭條約〉和〈宗教事務協約〉》，OR, 13 febbraio 1929, p. 2。

[[39]](#filepos384236) 阿納爾多·科特西，《梵蒂岡和意大利簽署條約重建教宗國；六十年敵對關系結束》，NYT, February 12, 1929, p. 1; Casella 2005, p. 24. 皮扎爾多行法西斯禮一事記錄在NARA, M530, reel 2, n. 2140, February 15, 1929, Alexander Kirk, chargé d’affaires ad interim of the U.S. embassy in Rome, report to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in Washington, p. 5。

[[40]](#filepos384602) Grandi 1985, p. 255.

[[41]](#filepos385316) 在過去的幾年里，墨索里尼頻頻采取行動，為教會謀取福利，然而教宗的信心并非全部來自這些行動；莫羅認為，墨索里尼將教會當作統治工具的態度也給教宗增添了信心。這將回歸（至少教宗是這么希望的）教會在舊制度中和各種獨裁統治者曾經有過的共謀關系，那個時候，西歐還沒有經歷民主觀念和政教分離觀念所帶來的變革。此外同樣重要的是，墨索里尼認可的基本原則與教宗贊同的原則在很多方面非常契合，他們都尋求秩序、紀律以及自上而下的威權統治，他們都排斥人們應當依據良心進行自決的觀念。只有那些不為自身利益行動，而是為了更大的善而行動的人才具有美德。何謂更大的善，這將由最高的權威來決定。Moro 1981, pp. 192–193.莫羅的這些觀點是在Giovanni Miccoli (1973, 1988)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墨索里尼權威傳記作者德·費利切則認為，只有在簽訂《拉特蘭條約》之后，法西斯政府才真正確立了自身的地位。

[[42]](#filepos386294) 轉引自Confalonieri 1957, p. 215。

[[43]](#filepos386888) 省督報告收于ACS, MI, DAGRA, b. 187, 11 febbraio 1929。

[[44]](#filepos387237) 一份雜志刊文恭賀了這一歷史事件，它寫道，這項協約簡直是一個奇跡，“源自教會和法西斯政府在方針方面……完美的契合，提升了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水平。這項事業絕不可能由議會制政體達成”。朱塞佩·貝維奧內，《意大利和梵蒂岡達成具有極高價值的條約》，《20世紀報》，1929年2月15日，第7版。梵蒂岡日報《羅馬觀察報》轉載了《人民期刊》對這個事件的報道，認為“法西斯政府之所以能夠解決‘羅馬問題’，原因在于它將意大利從民主派的議會制謊言以及反教會謊言中解放出來”。《寫在圣座與意大利簽訂條約之后》，OR, 15 febbraio 1929, p. 1。

[[45]](#filepos388519) 阿納爾多·科特西，《二十八萬人恭賀教宗》，NYT, February 13, 1929, p. 1；H. G. Chilton,Annual Report 1929, March 27, 1930, C 2470/2470/22, in Hachey 1972, p. 165, section99; 《奎里納爾宮外的集會》，OR, 14 febbraio 1929, p. 1。羅馬之外類似歡慶集會的報道可見《意大利城市為這一喜慶的和解事件而狂喜》，《意大利未來報》（博洛尼亞的天主教報紙），1929年2月12日，第4版，以及接下來數日的《羅馬觀察報》。

[[46]](#filepos388720) 《紐約時報》的頭版頭條就非常典型：“六十年敵對狀態結束……人群走上街頭高聲歡呼”，阿納爾多·科特西，《梵蒂岡和意大利簽署條約重建教宗國》，NYT, February 12, 1929, p. 1。

[[47]](#filepos389336) 這些話語出自多梅尼科·塔爾迪尼（1988, p. 294），當時他在梵蒂岡國務院供職，在弗朗切斯科·博爾貢吉尼手下工作。

[[48]](#filepos390358) NARA, M530, reel 2, n. 2140, February 15, 1929, p. 8; Caviglia 2009, p. 94.

[[49]](#filepos391318) ACS, CR, b. 6, 13 febbraio VII [1929]. 這份長達三頁的報告上留有手寫鉛筆記號“達·羅薩蒂”。

# 第二部分 共同的敵人

## 第九章 救世主

電報如潮水般涌來，恭賀庇護十一世達成了這一歷史性的條約。在條約簽訂不久后，一位美國記者晉見教宗時，發現他笑容滿面、渾身散發著活力，“像他當選教宗那天一樣如沐新生、活力四射”。  [[1]](#_1__Morgan_1939__p__174)  2月17日，教宗的貴族衛隊在梵蒂岡城內組織了一場盛大的招待會，讓羅馬的黑色貴族和教廷的高級教士得以互通感情。他們關掉燈光，圍坐在電影銀幕前，觀看了紀念簽約儀式的新聞影片。當領袖出現時，掌聲和歡呼聲響徹整個房間。  [[2]](#_2__A_Na_Er_Duo__Ke_Te_Xi____Jia)

獨裁者也急于達成這樁買賣，因為他即將面臨一場重要的選舉。如今的意大利僅剩下一個政黨，也就需要以全新的方式選舉國會議員。墨索里尼曾在1924年不經意間說過的話，竟然在多年之后成為現實：那年的選舉將是他最后一次忍受和他人競選的侮辱。在全新的體制下，眾議院四百個席位的候選人將全部由法西斯大議會推選。投票人只能對整個推選結果表示贊成或反對。墨索里尼自己便不把這種形式叫作國會選舉，而是針對整個政府的公民表決。  [[3]](#_3__Guo_Hui_Zai_1928Nian_Tong_Gu)

梵蒂岡幾乎傾盡全力，幫助墨索里尼順利度過這次選舉。1929年3月17日，即選舉日的一周前，《羅馬觀察報》刊登文章，呼吁所有的天主教徒投贊成票。這篇文章對墨索里尼來說可不只是幫個小忙，因為99%的意大利人都是天主教徒。其他天主教媒體以及全國上下的神父也都積極地幫助墨索里尼贏得這次選舉。  [[4]](#_4__Fan_Di_Gang_Zhe_Pian_Hu_Xu_W)

對大部分旁觀者來說，教宗感激墨索里尼為他做的一切，所以便毫不猶豫地發動整個教會支持這份全部由忠誠的法西斯黨人構成的議員名單，但是幕后的故事實則沒有那么簡單。教宗并不愿意直截了當地同意墨索里尼的人選。  [[5]](#_5__2Yue_17Ri__Jia_Si_Pa_Li_Shu)  在這份由各個法西斯組織與政府組織提交給大議會的千人名單中，教宗認為有四分之三的人選都稱不上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教宗認為宗教事務協約規定意大利如今已是一個“懂得懺悔的國度”，那么國會議員就應該反映出這一新的現實。

教宗要求領袖撕毀他的名單，替換成一個“隔絕共濟會，隔絕猶太人，簡而言之，隔絕任何反教會組織”的名單。那封表達教宗意愿的信件在結尾處寫道：“這樣，領袖才能將……最美麗、最必要的皇冠戴在這份偉大條約和宗教事務協約的頭上。他將再一次顯示出，他乃是天主派來的人（與圣父近來對他的稱呼相一致）。”  [[6]](#_6__Jiao_Zong_Gei_Jia_Si_Pa_Li_S)

幾天后，塔基·文圖里給墨索里尼送去了一份新名單，在教宗看來，上面的人物“足以代表這個懺悔的國度”。  [[7]](#_7__Zhuan_Yin_Zi_Ta_Ji__Wen_Tu_L)  歷任教宗都持之以恒地譴責共濟會。為了討好梵蒂岡，墨索里尼曾經宣布共濟會成員不得加入法西斯黨，這是他上臺后做出的第一批舉措之一。  [[8]](#_8__1923Nian_2Yue__Fa_Xi_Si_Da_Y)  如今，教宗要求墨索里尼清除候選人名單里的猶太人和共濟會成員，并且將具有堅定天主教信仰的法西斯黨人添入其中。直到墨索里尼調整過名單之后，梵蒂岡才開始大面積動員天主教徒為墨索里尼投贊成票。  [[9]](#_9__Yi_Da_Li_Zhong_Bu_Di_Qu_De_Y)  選舉當天恰逢周日，全國上下的教區神父直接帶領教區居民來到投票箱前。  [[10]](#_10__Binchy_1970__p__199)  墨索里尼大獲全勝，支持率高達98.3%。  [[11]](#_11__CC_1929_II__pp__184_185)

公民表決后的第二天，教宗過去的一名學生前來拜見他。斯特凡諾·亞奇尼（Stefano Jacini）出身于米蘭貴族，拉蒂早年曾經擔任過他的精神導師。亞奇尼穿過圣彼得大教堂右側貝尼尼柱廊的一扇黃銅大門，迎面便看見那些身穿亮色條紋制服的瑞士侍衛兵。他們檢查了他的邀請函，允許他踏上通往梵蒂岡宮殿的長長階梯，接著，從意大利貴族家庭選拔出來的貴族衛隊成員護送亞奇尼穿過一個個龐大而奢華的大廳。他途經的一切仿佛是一場文藝復興古裝劇。當穿過那些富麗堂皇的大廳時，他看到一列列教宗憲兵（這些意大利人的穿著嚴格地復制了拿破侖麾下擲彈兵的制服）站崗守望。最后，教宗的國內教長將四十二歲的亞奇尼帶到了教宗的辦公室，而在亞奇尼的記憶中，過去的教宗只不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神父而已。

他進門時，庇護十一世微笑著迎接他的到來。在前后七十分鐘的談話中，教宗常常從他慣用的“我們”主語，變換成第一人稱單數的“我”。他們還用了很長時間來談論《拉特蘭條約》。

“問題終于解決了！”教宗開心地告訴他，“是的，我很滿意，不過如今也到了最困難的階段，我們要確保這些條款全部得到實施。如今，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祈禱，然而未來會怎樣，完全要看天主的旨意。我可沒有辦法預測未來的走向。”他提醒亞奇尼領會18世紀意大利詩人梅塔斯塔西奧（Metastasio）的詩句。“‘從來沒有過去，過去來自記憶的描繪，’”教宗朗誦道，“‘從來沒有未來，未來來自希望的塑造。我們擁有的只有現在，而它卻始終離我們遠去。’”  [[12]](#_12__Zhe_Shou_Shi_Si_Hu_Ji_Yu_Sh)

教宗知道亞奇尼曾是人民黨的一個小領導，所以他非常急切地想要證明自己和領袖的交易是正當合理的。他表示自己沒法眼睜睜地看著這個機會溜走，如果他真這么做了，那么歷史可能會給予他非常苛刻的評價。“天主幫我完成了這一切。”有些人因為他和法西斯政府的密切關系而對他提出了批評，教宗抱怨說這些批評并不公平。“這就好比說，如果你身處的房間空氣受到了污染，那么你就應該停止呼吸。”他解釋道，“對于教會來說，世界上總是無休止地發生革命，它摧毀權威，破壞現存的秩序，令其徹底改變。意大利的這場革命獲得了國王和首相的首肯，我們沒法要求更多。”

教宗試圖令這位年輕人相信他決策的正當性，繼續說道：“這也許并非一場真正的革命，而應該說是一場動亂。我們需要審視它將帶來的結果。”他的腦海中又浮現出他最愛的作家曼佐尼的話語：“‘昏沉的天色既非光明亦非黑暗。接下來的將是什么？白天抑或黑夜？稍稍等候你就會知道結果。’”

隨著談話的深入，教宗越發富有生氣，不停地在座位上變換著坐姿，把手肘撐在書桌上，不時地把他的白色小瓜帽推回原位。亞奇尼回憶道：“他的頭發依舊金黃，金邊眼鏡下是笑容滿溢的臉龐，他的表情十分生動，話語中常常穿插著咯咯的笑聲，仿佛又回到了過去還是阿契爾神父的時候。”  [[13]](#_13__Ya_Qi_Ni_Dui_Jin_Jian_Jiao)

\* \* \* \* \*

對于墨索里尼來說，他同教宗達成的交易，盡管在公共關系方面是一項巨大的成功，但是也有其負面效應。最令他感到憤怒的莫過于被稱作是一個被教宗騙得團團轉的人，而現在就有人這么指控他。墨索里尼是個驕傲乃至傲慢的人，他的自負與日俱增，所以當有人竊竊私語，說他背叛了自己的原則且一手創造了一個由神父而非法西斯黨統治的國家時，他實際上是非常敏感的。此外，當《公教文明》贊揚墨索里尼，說公民表決的大獲全勝將意大利“社會引領至一個復興基督教的時代”時，它幾乎是在火上澆油。

對于墨索里尼來說，這段時間同樣非常微妙。那些一度進入國會名單，最后又被替換掉的人有著很強烈的不滿情緒。那些最早的法西斯黨人（他們從法西斯運動初期就加入進來了）把這項條約看作是對真正的法西斯主義的背叛，他們不愿意便宜教宗，白白給他增添影響力。而領袖廢止政教分離的原則，也令一些老自由黨人感到非常失望。



墨索里尼和加斯帕里，批準《拉特蘭條約》之后，梵蒂岡，1929年7月7日。加斯帕里樞機（前排五）和墨索里尼（前排中）坐在座位上；博爾貢吉尼蒙席站在兩人中間，他的右側是弗朗切斯科·帕切利和皮扎爾多蒙席

5月13日，墨索里尼在眾議院起身講話，終結了眾議院在批準《拉特蘭條約》一事上存在的爭執。這次演講將成為他最著名的演講之一。

“尊敬的各位同志”，他對人頭攢動的聽眾席發起了演講。近來的條約引發了諸多困惑和不解。他向各位保證，“教會既沒有獨立，也沒有自由”。它依然受到這片土地上的法律的管轄。意大利作為一門普世宗教的故鄉，占據了極大的便利。天主教會的成就要歸功于意大利：“這門宗教誕生于巴勒斯坦，卻在羅馬變成了如今的天主教。”他接著補充道（這番話語必然會激怒教宗），如果早期的基督教群體留在了巴勒斯坦，“那么它可能跟那個炎熱環境中興盛起來的其他教派沒有多大區別……它很有可能會中途夭折，留不下哪怕一點點蹤影”。  [[14]](#_14____Gong_Jiao_Wen_Ming_____19)  他總結道，意大利“既是一個天主教國，也是一個法西斯國，不過它首先是一個法西斯國，本質上也是一個法西斯國”。  [[15]](#_15__Mo_Suo_Li_Ni_Zai_Zhong_Yi_Y)

第二天，庇護派遣律師弗朗西斯科·帕切利前去面見獨裁者。他帶去了一份要挾：教宗怒氣沖天，有可能會中止有關實施《拉特蘭條約》的談話。墨索里尼試圖令教宗冷靜下來。他表示，他會利用即將到來的參議院講話，消除雙方之間的所有誤解。

三天后，參議院也啟動議程批準《拉特蘭條約》。帕切利坐在聽眾席里，打算聽聽墨索里尼的演講，然而他聽到的內容卻和他之前在眾議院中聽到的演講大同小異。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感覺[那番演講]沒法令圣父感到滿意。”

盡管公眾對此幾乎一無所知，但在接下來的兩周里，墨索里尼和教宗都輪番威脅對方，要撕毀他們之前謹慎談妥的《拉特蘭條約》。帕切利來回活動，拼命想要避免這場災難的發生。最終，雙方都意識到他們所要付出的代價太過沉重了，于是7月7日，墨索里尼前往梵蒂岡，來到加斯帕里樞機的房間，兩人坐下來簽署了最后的文件。  [[16]](#_16__Qian_Zi_Wan_Cheng_Zhi_Hou)

正式批準《拉特蘭條約》后，教宗和領袖便結成了一對奇特的合作關系。他們分享了一個共同的原則，即都把自己視作是一個“極權”組織的頭領。然而真正的頭領只能有一個，他勢必要求絕對的忠誠。教宗迫切地想要利用法西斯黨的權力來復興天主教國，但他也不至于愚蠢到認為他能夠令墨索里尼“皈依天主教”。領袖也迫切地想要利用教會的權力鞏固自身的統治，然而在他看來，天主教教士以后要成為法西斯政府的仆役，成為確保公眾支持政權的工具。

雙方都能從這樁交易中獲得許多好處，然而無論墨索里尼還是教宗都沒法對這份條約完全滿意。教宗并不滿意，除非墨索里尼能夠尊重由天主授予教會的神圣特權。而只要教宗不和墨索里尼的獨裁統治以及光榮之夢發生沖突，領袖也愿意把教宗想要的一切都送給他。從今往后，教宗會發現，即便他態度強硬，也無法過分左右墨索里尼。雙方都小心戒備地保護著自身的權力。他們兩人都很容易大發雷霆。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懷疑，這對合作伙伴走不了太遠。

\* \* \* \* \*

圣座同意大利建立了外交關系，墨索里尼委任時年四十四歲的切薩雷·德·維基擔任意大利首任駐圣座大使。德·維基出身于皮埃蒙特的一個中產家庭，曾經修習律師之道，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指揮過一支突擊部隊。后來，他成了都靈黑衫軍的頭領，并于1921年代表法西斯黨當選議員，而位列法西斯四人組，引領一眾黨人進軍羅馬，則是他一生中最巔峰的勝利時刻。

為什么領袖唯獨選中了德·維基來出任這一微妙的外交職務，這其中的緣由始終是一個謎團。墨索里尼常常拿德·維基的愚蠢和自負行為開玩笑，并且指責他一點政治意識都沒有。1923年5月，他解除了德·維基財政部副部長的職務，表示這家伙除了當兵打仗外簡直一無是處。  [[17]](#_17__ACS__CR__b__4__Roma__1_magg)  他把德·維基派到意大利殖民地索馬里，負責統領當地事務，德·維基一共在那里待了五年時間。然而德·維基具備一些優秀的品質，能夠令他脫穎而出。他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同王室家族以及軍隊高層都有深厚的關系，這兩個圈子一直都抵制法西斯黨的控制。國王為了獎賞德·維基對王室的忠誠，授予他瓦爾西斯蒙伯爵（Count of Val Cismon）爵位，他對此非常自豪。據迪諾·格蘭迪稱，每當有人向德·維基提及國王的名號時，他的身體都會不自覺地一陣顫抖，仿佛一位士兵被長官命令立正。  [[18]](#_18__Grandi_1985__p__175__25_ott)  然而他的傲慢自大、糟糕的判斷力、大嗓門、剃光的腦袋、小眼睛、大鼻子以及古怪的髭須（有點像松鼠），令他頻頻受到本國國民的嘲笑。  [[19]](#_19___Yao_Shuo_De__Wei_Ji_Shi_Ge)

6月25日上午，兩匹裝飾富麗的駿馬拉著一輛皇家御用馬車，將新任大使送到了梵蒂岡城。馬車車夫以及馬車后部的三位侍從都衣著華麗，仿佛要出席路易十六的宮廷典禮。德·維基身上穿著的外交制服，令人想起喜歌劇《皮納福號軍艦》（H.M.S. Pinafore ）  [[20]](#_20__Ji_Er_Bo_Te__W__S__Gilbert)  里的海軍上將，他要將自己的委任狀呈交給教宗。他被引入了那個布置著小型寶座的房間，教宗被一眾教廷人員包圍在中間。這位新任大使根據習俗鞠了三次躬，在雙方正式相互問候之后，庇護十一世邀請德·維基去書房進行私下談話。德·維基并沒有說太多話，也許是因為這位新任大使來自意大利北部，教宗便高興地回憶起了自己在阿爾卑斯山的登山經歷。然后他又回憶起，自己還是一位年輕神父時，在這座不朽之城經歷的那幾年時光，這個時候，庇護的情緒有一些低落。他告訴德·維基，那個時候的年輕人會在羅馬的大街上追著他跑，一邊向他扔石頭，一邊嘲諷地把他喊作“蟑螂！”



切薩雷·德·維基，意大利駐圣座大使，1929-1935

德·維基向他保證，這樣的日子已經成為歷史。法西斯黨掌權之后，人們都非常尊重神父。  [[21]](#_21__NARA__M530__reel_2__n__2362)

一個月之后，德·維基再一次晉見教宗，然而這一次會面卻遠沒有上一次那么愉快。他心中懷著膽怯，踏入了教宗的書房，他知道墨索里尼最近發表的國會講話多么令教宗感到震怒。他走進書房時，從窗戶透進來的一縷陽光仿佛教宗眼鏡里射出的一道光線。教宗用來責罵這位大使的話語，在后者看來“非常嚴厲、充滿憤恨，常常粗魯并且刻薄”。“事情不能這樣下去，”他一邊搖頭一邊警告道，“事情絕對不能這樣下去。你們的行為，”教宗意指政府發表這兩次演講，“冒犯了教會及其首腦。我敞開心扉同意大利暢談未來，而我們忠誠的墨索里尼先生卻朝著我們后背開了一槍。”教宗快速地翻閱著書桌上的文件，從中抽出了公教進行會地方分會成員近來遭受虐待的報告。在一些地區，分會的人員甚至遭到了毆打，而意大利人民被告知，善良的意大利人不應該加入公教進行會。

德·維基試圖為政府辯護。他說反法西斯分子仍然潛藏在天主教團體背后，法西斯黨人對此無法袖手旁觀。

教宗的反應仿佛被黃蜂蜇了一下，手掌大力地拍在桌子上。“我不想聽到這種說辭！”他已經下達明確的指令，禁止公教進行會從事政治活動，而政府沒有權力騷擾其成員。

那當然沒錯，德·維基回答道，但是下達命令是一回事，遵守命令卻是另一回事。

在他們長達兩個半小時的會面結束后，夜幕已然降臨。在德·維基準備離開的時候，冷靜下來的教宗說道：“以我的名義告訴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將朋友與敵人混淆，反之亦然，因為如此這般的混淆將會限制他在歷史上能夠擁有的地位……以及……”教宗補充道：“請告訴他，在我每一天的禱告中，我都請求主保佑他。”  [[22]](#_22__De_Vecchi_1998__pp__14_16)

9月中旬，教宗向一大群意大利青年天主教徒發表了演講。公教進行會遭受的不公正對待仍然令他憤懣，他在演講中哀嘆了他們的“殉難”。不久之后，德·維基便告訴教宗，墨索里尼聽到這番言論非常生氣。他建議，教宗最好能對公教進行會的問題保持沉默，這樣一來，德·維基與其他人才能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些問題。

這位大使應該要有點自知之明才對。教宗用手大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憤怒地質問道：“所以你是不想讓我開口說話了？說出這些言論是我的職責所在，你還不想讓我說話了？”

“這絕對不是我想表達的意思，圣父，”德·維基回答道，“我對我那一頭的人非常了解，而我的建議只是為了促成雙方的共同利益。”

“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教宗重復了德·維基的話語，“我來告訴你，今后再碰到這樣的狀況，我會怎么做好讓你滿意。我會打開這扇窗戶。”說到這里，教宗抬高了他的嗓門，用手指指著他書桌后面的那扇窗戶，“然后我會大聲說話，好讓圣彼得廣場的每一個人都能聽到我的聲音！”

德·維基一時失語，不知道該怎么回答。“到時候我就這么做，”教宗重復道，“不管你喜不喜歡，大使先生！”  [[23]](#_23__Zhuan_Yin_Zi_Casella_2010)

那年秋天晚些時候，教宗又一次對這位倒霉的德·維基大發雷霆。國王的兒子兼繼承人翁貝托親王想要在羅馬的大教堂里舉行婚禮，要么在拉特蘭圣約翰大教堂，要么在圣母大殿，然而教宗卻拒絕了這番請求。他表示，這么多年來，撒丁王國的國王將歷任教宗變成了梵蒂岡的囚徒，這兩座教堂連他自己都沒去過，讓那個奪走教宗領土之人的曾孫在任何一座教堂里結婚，都不合適。  [[24]](#_24__De_Vecchi_1998__pp__23_25)

德·維基前往梵蒂岡，請求教宗再做考量。在他進去之前，加斯帕里警告大使說：“他現在心情非常糟糕。”  [[25]](#_25__Shi_Ji_De_Yi_Da_Li_Yu_Biao)  不過這位留著髭須的君主主義者的肩頭有著來自王室家族的壓力，他還是向教宗提出了這個請求。

德·維基回憶道，教宗答復時“勃然大怒，聲音提得很高，在我想要開口說話時常常打斷我”。德·維基根本插不進一句話，只好筆直坐著一動不動，等待這番長篇大論的結束。他盡全力讓自己面無表情，卻發現很難收起自己臉上緊張的笑容。

教宗的手勢非常夸張。“我很生氣，我非常生氣，”他不斷地重復著這些話，他氣得一直搖頭，坐在座椅里的身體都扭曲了，“你張開嘴，你的呼吸就會冒犯教宗；你動一動，你就會讓我蒙羞；你一開動你那陰險的大腦，你就在搞陰謀詭計試圖羞辱教會……夠了！夠了！”

然后教宗又回頭繼續控訴公教進行會成員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已然完敗的大使再次試圖為他的領袖辯護，然而教宗怒氣更盛，氣得站了起來。他臉上的肌肉抽動著，嘴唇緊閉。教宗伸拳狠狠地砸在他的辦公桌上，上面沉重的耶穌受難像也隨之晃動。“謊言！謊言！”他大聲呵斥道。

庇護在房間里來回踱步，他憤怒的聲音仿佛在自言自語。他時而停下腳步，伸拳砸向他的辦公桌。“這就是你們做出來的事情，”他呼喊道，聲音再次拔高，“你們欺騙了教宗！每個人都這么說，每個人都心知肚明，他們到處都在寫這件事情，不僅是意大利國內，還有國外！”

德·維基默默忍受了所有氣話，可是當教宗說“羅馬是我的”，這位大使再也無法自控。

“羅馬，”他急切地說道，“是意大利的首都，是國王殿下的家，是政府所在地。”

“羅馬，”教宗回答道，“是我的教區。”

“當然了，”大使贊同道，“從宗教的角度來說……”

“當然了，”教宗打斷他說道，“除了宗教，其他的事務不過是保持街道整潔而已。”  [[26]](#_26__Zhe_Ci_Jie_Jian_De_Ri_Qi_Sh)

\* \* \* \* \*

教廷的樞機被排擠在重要的教會事務之外，而且他們也對教宗的怒火感到厭倦，于是便開始對他竊竊私語。不過最令他們生氣的，還是教宗在與墨索里尼協商的兩年半里從來都不覺得有必要咨詢各位樞機的意見。  [[27]](#_27__De_Vecchi_1983__p__141_Zai)  1928年下半年，在教宗的指示下，加斯帕里告訴自己片區的所有樞機，他們即將與墨索里尼達成一項條約。他們紛紛要求加斯帕里透露更多細節，他回答說教宗會在適當的時機告訴他們。結果，直到1929年2月11日，雙方簽署《拉特蘭條約》并且公之于眾，他們才讀到了這份條約的具體條款。當時正坐船從澳大利亞返航的切雷蒂樞機完全沒有掩飾他的怒火，他譏諷道，墨索里尼令教宗唯他馬首是瞻。  [[28]](#_28__Jing_Fang_Xian_Ren_Bao_Gao)

在那些對這樁交易感到不滿的樞機里，最直言不諱的莫過于從1916年起便擔任羅馬樞機副主教（Cardinal Vicar）的巴西利奧·蓬皮利（Basilio Pompili）。就像羅馬的許多樞機一樣，七十歲的蓬皮利認為墨索里尼算不上是一名基督徒，也不比他的各位前任更值得信任。自意大利軍隊在1870年攻下羅馬后，教會就一直堅稱這座不朽之城只能接受教宗的統治。在這位樞機看來，庇護十一世放棄這一宣言而只獲得了如此寒酸的回報，簡直就是一樁丑聞。他不僅將這番態度告訴了他的核心圈子，還告訴了很多熟人。尤其令他憤憤不平的是，教宗從來沒有想過要咨詢他，畢竟他是羅馬的樞機副主教。  [[29]](#_29__ASMAE__AISS__b__2__fasc__6)  “他們放棄了羅馬，放棄了它的威望、歷史重要性、不朽的功業和無數教堂，”他控訴道，“仿佛他們放手的是阿比西尼亞的（Abyssinian）  [[30]](#_30__Ai_Sai_E_Bi_Ya_Jiu_Cheng)  一個小村莊。”  [[31]](#_31__De_Vecchi_1983__p__141)  教宗“無能、孱弱，是教會的災難和毀滅，他背叛了教會，任由政府擺布，這個政府根本配不上天主的名號”。

教宗屢次要求蓬皮利尊重他作為教宗的權力，然而蓬皮利嚴詞譴責的消息仍然不斷地傳來，教宗失去了耐心，要求他引退。  [[32]](#_32__ASMAE__AISS__b__2__fasc__6)  這位樞機副主教出身羅馬最顯赫的貴族家庭，完全沒有被教宗恐嚇住。蓬皮利回應道：“圣父，你有權力解除我的職務，如果你樂意的話，只管這么做就是了。然而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我都不會心甘情愿地放棄這個職位，我堅守這個崗位這么多年，從來沒有過配不上它的作為。”  [[33]](#_33__ACS__MI__FP__Pompili___Citt)

幾個月后，當教宗再度要求他引退時，蓬皮利還是不肯妥協。“我會反復大聲地給予你同樣的回答，直到你再也沒法忍受：‘我不會動搖，我不會動搖，我不會動搖！’”  [[34]](#_34__ACS__MI__FP__Pompili___info)  結果有趣的是，教宗的這個問題被一個自然因素解決了。蓬皮利在1931年過世了。  [[35]](#_35__Gen_Ju_Xian_Ren_Ti_Gong_De)

\* \* \* \* \*

墨索里尼將德·維基任命為意大利首任駐梵蒂岡大使，庇護十一世則將加斯帕里的門徒弗朗切斯科·博爾貢吉尼——杜卡任命為圣座首任駐意大利大使。博爾貢吉尼本是非常教務部部長，也是加斯帕里手下的兩位副國務卿之一。

在博爾貢吉尼的任命儀式上，教宗讓另一位副國務卿，即時年五十一歲的替補國務卿朱塞佩·皮扎爾多接替博爾貢吉尼，擔任非常教務部部長一職。皮扎爾多出身于熱那亞的一個普通家庭，卻通過努力進入了羅馬的宗座外交學院，這個學校向來是上層階級將子嗣訓練成梵蒂岡外交官的傳統院校。在晉鐸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梵蒂岡國務院。1909年，他被派往德國，擔任教宗駐慕尼黑大使的秘書，但他很快便發現，這一職務并不利于自己的發展，于是便想方設法在三年之后返回了梵蒂岡。在同警方線人的交談中，皮扎爾多的朋友認為他如此迫切想要回歸羅馬，源自他“對權力和官僚職務病態且強烈的渴求”。  [[36]](#_36__ACS__MI__FP__Pizzardo___inf)



朱塞佩·皮扎爾多蒙席

待到《拉特蘭條約》簽訂后，皮扎爾多已是國務院最核心的成員，與教宗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1929年夏天，曾有一位警方線人稱他是最有可能在未來取代加斯帕里的人物。這份報告寫道，皮扎爾多矮小瘦弱，黑色的雙眼里迸發出強大的能量，他是“教宗心儀的真正仲裁人，能夠掌控梵蒂岡的所有局面”。梵蒂岡有很多人都嫉妒他巨大的影響力。他的對手將他稱作變色龍，一個沒有個性和尊嚴的人，他在下屬面前作威作福，卻在上司面前膽小懦弱。人們懷疑他中飽私囊，懷有陰謀詭計，所以并不愛戴他，尤其是那些在他手下做事的人。  [[37]](#_37__Si_Nian_Zhi_Hou__Ling_Yi_We)  根據這些描述，皮扎爾多最受教宗看重的品質，便是他的諂媚，他在教宗頻繁的責罵下“像頭小狗一樣卑躬屈膝”。  [[38]](#_38__ACS__MI__FP__Pizzardo___inf)

作為哥倫布騎士會的國家司鐸，皮扎爾多能夠從美國獲取大量資金。1924年，庇護十一世意識到教會在美國的分支已變得越來越重要，于是增加了美國樞機的數量，多出的兩人分別為紐約大主教帕特里克·約瑟夫·海耶斯（Patrick Joseph Hayes）和芝加哥大主教喬治·芒德萊恩。英國駐圣座大使奧多·羅素（Odo Russell）當時發表評論說：“從美國而來的黃金同這兩位大主教晉牧有著很大的關聯。”  [[39]](#_39__O__Russell__Annual_Report_1)

晉牧之后，兩位美國大主教完全不避諱羅素的指責。1927年，芒德萊恩在芝加哥舉辦了國際圣體大會，其奢華與鋪張的程度，即便是那些坐擁梵蒂岡榮華的人也忍不住要感慨。為了接送那些遠渡大洋前來赴會的樞機，他安排了一輛從紐約城出發的專列，這輛專列不僅被他涂上了樞機的紅色，還以教宗的名號命名。6月11日，這輛專列抵達芝加哥站，送來了十位樞機、眾多主教與大主教，還有為這次大會提供贊助的捐助人。兩位資歷更深的美國樞機都不愿意搭乘芒德萊恩的“庇護十一世專列”。費城的多爾蒂樞機搭乘他自己的有軌電車抵達芝加哥，而波士頓的奧康奈爾樞機則同五百名朝圣者一起搭乘一艘私人游艇登陸芝加哥。一眾儀式之后，芒德萊恩樞機還贈送了教宗一百萬美元，作為整個大會的壓軸大禮。  [[40]](#_40__Fogarty_1996__p__556)

皮扎爾多便成了教宗獲取這些美國資金的主要渠道。當有人通過他將一輛豪華汽車送給教宗時，有謠言稱皮扎爾多從美國汽車商處收受了五萬里拉的好處費。皮扎爾多的兩個妹妹同他一起住在梵蒂岡，她們坐著自己的凱迪拉克穿越羅馬的街巷，這輛汽車也是美國人送的禮物。一位不是特別敢說話的線人報告說：“這輛汽車載著兩位丑陋的未婚女性，她們的臉上敷著濃重的化妝品，到處尋找如意郎君。”  [[41]](#_41__ACS__MI__FP__Pizzardo___inf)

五十四歲的博爾貢吉尼一輩子都待在羅馬，他和切薩雷·德·維基有一個共同點，即兩人對這個世界都所知有限。教宗將這個職位委派給他，很有可能是因為教宗賞識他的正統、順從，不老于世故。至于更為復雜微妙的問題，教宗則會囑托給他的特使塔基·文圖里，如今的特使已經挺過了去年的刺殺丑聞。  [[42]](#_42__Bo_Er_Gong_Ji_Ni_Zi_Ji_Dui)  其他國家的大使欣賞博爾貢吉尼的禮貌與助人為樂，然而他卻難以適應外交界的各種社交場合。他拒絕參加外交晚宴，解釋說這些活動持續時間太長，會讓他錯過自己的睡覺時間。  [[43]](#_43__FCRSE__part_XIV__p__72__Per)  這位頗為壯碩、虔誠、剛強的博爾貢吉尼和短小精悍、曾經擔任過炮兵指揮官的法西斯黨大使相映成趣，不過他們后來卻頗為相惜。教宗大使評價德·維基說：“他本質上是個好人。他到哪里都要佩戴著自己的榮譽標志和大獎章，只要別人不在這方面干涉他，他就挺好的！”  [[44]](#_44__ACS__MI__PP__b__154__inform)



墨索里尼（右三）會見首任教宗大使弗朗切斯科·博爾貢吉尼——杜卡蒙席（右二），1929年8月

8月初，這位新大使第一次同墨索里尼會面，而這也恰巧是墨索里尼議會演講剛剛發表，并令教宗大為火光的那段時間。墨索里尼接見他時面帶微笑，并且禮貌地詢問他最近如何。

“不好不壞”，他回答道，并且解釋說教宗對領袖的行為非常生氣，暗示他很可能會“做出一些嚴厲的舉措”。

“他可能會做出什么事情？”墨索里尼問道。

“如果狀況沒有任何改變，我們最終可能會以決裂收尾，這樣的后果將非常嚴重，它離雙方建立外交關系才幾周時間，離條約的批準也沒過去多久。”

墨索里尼很不開心：“天主呀！這個國家明明才認可了宗教婚禮，引進了宗教教育，在司法上認可了教會制度……”

本來所有事情都進展得非常平穩，博爾貢吉尼解釋道，直到領袖在眾議院發表了他的演講：“每一個人都震驚了。圣父質問到底是什么人導致領袖做出了這樣的演說。可是沒有人明白閣下為什么說那樣的話。”大使表示，教宗非常生氣，差點就召集樞機團宣布自己不會批準條約的消息。領袖的這兩次演講令教宗非常不快，而就在這份記憶快要淡去的時候，教宗得知墨索里尼還會將這兩次演講出版成冊，他簡直怒不可遏。

墨索里尼回答道：“啊，可是教宗并不知道我面臨的困難有多么嚴峻。很多評論家都對我提出了批評，說加富爾、馬志尼（Mazzini）  [[45]](#_45__Yi_Da_Li_Ge_Ming_Jia__Min_Z)  和加里巴爾迪（統一意大利的英雄以及政教分離的支持者）都死不瞑目。”墨索里尼告訴博爾貢吉尼說，他別無選擇，只能表明自己不會讓國家聽憑教會的控制。

他還補充說，在條約簽訂的最初幾天里，大家總會沉浸在愉悅之中，之后便會出現爭論。“就好像新婚夫婦度完蜜月之后，最開始的那幾次吵架一樣。”  [[46]](#_46__Ran_Er_Bo_Er_Gong_Ji_Ni_Bu)

[[1]](#filepos410160) Morgan 1939, p. 174.

[[2]](#filepos410583) 阿納爾多·科特西，《教宗接待會為墨索里尼歡呼》，NYT, February 18, 1920, p. 5.羅馬貴族似乎沒有經歷任何困難就適應了法西斯黨的統治。此外墨索里尼的一系列行動也很說明問題，從1926年到1943年倒臺，領袖前后將四位親王任命為羅馬市長，這個由貴族把持的職位只在1935年至1936年間短暫地中斷過，當時擔任這一職務的是朱塞佩·博塔伊。Insolera 1976, p. 119.

[[3]](#filepos411324) 國會在1928年通過了新的選舉系統；Milza 2000, p. 415。流程的第一步，先由法西斯大議會從各種由政府控制的團體中收集一千個提名，每一位被提名人須有“無可置疑的法西斯信仰”；最終的候選人將由大議會決定，它還能將未被提名的人直接納入候選人名單。德菲利斯（1995，p. 437）討論了政府使用“公民表決”時所指代的具體含義。

[[4]](#filepos411876) 梵蒂岡這篇呼吁文章的署名人是公教進行會全國執行委員會，轉引自Scoppola 1976, pp. 195–196。另參見De Felice 1995, p.445。

[[5]](#filepos412319) 2月17日，加斯帕里樞機通過弗朗切斯科·帕切利轉交給墨索里尼一份最后通牒，令領袖頗為驚詫：“圣座非常贊賞和滿意墨索里尼閣下為教會贏得的極大好處，同時也非常強烈地感到，即將到來的選舉將具有重大的價值，這場公民表決將表明民眾是多么支持與贊賞領袖以及由他組建并體現他意志的政權。”圣座非常迫切地希望，這次選舉能夠提供“真正莊嚴和具有說服力的證據，表明意大利天主教徒和墨索里尼閣下的政府志同道合”。帕切利轉交這封信時，在信封上表明它來自加斯帕里，但實際上是帕切利自己“忠實”的轉述。ACS, CR, b. 68, Roma, 17 febbraio 1929.

[[6]](#filepos413206) 教宗給加斯帕里樞機說明了自己的指示，然后加斯帕里將這封信口述給弗朗切斯科·帕切利，最后再由帕切利把信轉交給墨索里尼。ACS, CR, b. 68.

[[7]](#filepos413498) 轉引自塔基·文圖里的親口描述。ASV, AESI, pos. 630a, fasc. 63, 6. 88r–89v,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Roma, 21 febbraio 1929.顯然，教宗的這位耶穌會特使有權力把虔誠的基督教徒加入墨索里尼候選人名單的消息不脛而走。他的這些文檔中還包含來自各色人士的信件，吹噓自己乃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央求塔基·文圖里將他們添加到候選人名單里。加斯帕里交給塔基·文圖里幾個人名，讓他添加到名單里。ARSI, TV, fasc. 1037.

[[8]](#filepos413801) 1923年2月，法西斯大議會將共濟會確認為一個威脅法西斯黨的組織，并宣布其成員不得參加法西斯黨。黑衫軍洗劫并燒毀了全國各地的共濟會場所。《公教文明》刊文贊揚了法西斯大議會的行動，并且警示道，教會長期責難的猶太—共濟會陰謀如今不僅僅把矛頭指向天主教會，它的敵人還包括墨索里尼。它還進一步指出，政府還應該對意大利猶太人采取行動，他們人數雖然不多，卻產生了極為巨大的惡劣影響。CC 1923 I p. 464，轉引自Sale 2007, pp. 42–43。另參見Molony 1977, p. 152。

[[9]](#filepos414191) 意大利中部地區的一位主教給他教區的所有神父都發放了通知，這則通知反映了教會高層對整個天主教會的動員。他教導道，“所有天主教徒，無一例外都肩負神圣的職責”為“天主派來的人”投出他們的贊成票，這個人不僅密切地和教宗合作，“還將天主歸還給意大利，將意大利歸還給天主”。主教寫道，所有神父必須盡全力說服他們的教區居民前往投票站投票。坎波巴索主教阿爾貝托·羅米塔（Alberto Romita）蒙席，轉引自Piccardi 1995, p. 50。公教進行會全國主席路易吉·科隆博也下發了類似指令，公開地呼吁該組織成員給政府投贊成票。《科隆博主席的講話》，OR, 13 marzo 1929, p. 4。

[[10]](#filepos414404) Binchy 1970, p. 199.

[[11]](#filepos414569) CC 1929 II, pp. 184–185.

[[12]](#filepos416605) 這首詩似乎基于圣奧古斯丁《懺悔錄》的第十一章。

[[13]](#filepos418376) 亞奇尼對晉見教宗的這番描述記錄在Fonzi 1979, pp. 676–678。有關亞奇尼的更多內容，參見Ignesti 2004。

[[14]](#filepos421192) 《公教文明》（1929 II, p. 473）就這次演講刊登了一篇短評，并以批評的口吻引用了這個段落。

[[15]](#filepos421466) 墨索里尼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發表的兩篇演講稿集結成書（Mussolini 1929）。

[[16]](#filepos422739) 簽字完成之后，加斯帕里宣讀了教宗發來的電報，收信人是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我們從梵蒂岡城發來的第一封電報是要告訴您，感謝天主，雙方批準《拉特蘭條約》的手續剛剛完成……這封電報還想給陛下、您可敬的配偶、所有王室成員、意大利乃至整個世界，送去一份真誠、深切的教宗降福。庇護十一世。”歷史在這一瞬間改變了。庇護九世曾經將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驅逐出教；從此往后，再也沒有哪位教宗曾給意大利國王降福，甚至連書信都不曾有過，Pacelli 1959, pp.144–154；《圣座與意大利簽訂了〈拉特蘭條約〉》，CC 1929 II, pp. 544–545。

[[17]](#filepos425111) ACS, CR, b. 4, Roma, 1 maggio 1923, Mussolini a De Vecchi. 在墨索里尼私人秘書的文件里，收有德·維基的服役記錄復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的長官都給予他最高的評價，贊揚他的軍旅精神以及作為炮兵長官的作戰技巧。ACS,CR, b. 4.

[[18]](#filepos425881) Grandi 1985, p. 175 (25 ottobre 1922).

[[19]](#filepos426182) “要說德·維基是個傻瓜可不對，”其中一個笑話這么講道，“恰恰相反，他是個非常早熟的孩子。他五歲的時候已經具備了他五十歲時擁有的思想。”在他擔任駐圣座大使十年之后，恩里科·卡維利亞將軍（他是持有意大利最高軍階的意大利陸軍元帥，并且長期擔任參議院議員）精辟地指出，德·維基是個“自負的怪胎”。De Begnac 1990, pp. 232, 469; Bosworth 2002, pp.182–183; Innocenti 1992, p. 154; Caviglia 2009, p. 301; Romersa 1983, p. 5.

[[20]](#filepos426669) 吉爾伯特（W. S. Gilbert）與薩利文（Arthur Sullivan）合作編排的音樂劇，他們改變了歌劇一貫的嚴肅風格，容納了許多現實的荒誕元素，在19世紀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1]](#filepos427973) NARA, M530, reel 2, n. 2362, Rome, June 27, 1929, Henry P. Fletcher, U.S. Embassy,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CC 1929 III, pp. 170–172; De Vecchi 1983, pp. 136–137。

[[22]](#filepos430185) De Vecchi 1998, pp. 14–16.

[[23]](#filepos431824) 轉引自Casella 2010, pp. 74–75。

[[24]](#filepos432474) De Vecchi 1998, pp. 23–25.

[[25]](#filepos432764) 實際的意大利語表達更為生動：aveva un diavolo per capello，意思是教宗的“頭發里有一個惡魔”；Casella 2010, p. 82。

[[26]](#filepos435183) 這次接見的日期是1929年11月15日。ASMAE, APNSS, b. 7, De Vecchi a Dino Grandi, Minstro per gli Affari Esteri, 22 novembre 1929. 另參見下文的描述： De Vecchi 1983, pp. 162–164。

[[27]](#filepos435683) De Vecchi 1983, p. 141.在教宗和墨索里尼開始協商的時候，他曾經將這件事情告知教廷的樞機，然而直到協商結束，卻再也沒有知會過他們一聲。法典條文解釋委員會秘書朱塞佩·布魯諾（Giuseppe Bruno）蒙席比起他的同仁來說更有勇氣，卻少了一些審慎，他決定直接向庇護十一世表達他的不滿。在一次私下的接見中，他告訴教宗，如果在宗教事務協約協商過程中教宗曾經咨詢過他的建議，那么他肯定會向教宗提出一系列條約中完全沒有提及但是非常重要的擔保條款。教宗簡短地回答說，為了解決羅馬問題，他們不得不忽略了許多事情。布魯諾仍然不滿意，于是便拜訪了教廷中具有很大影響力的多納托·斯巴雷蒂樞機，希望能夠贏得他的支持。然而斯巴雷蒂很懂得審時度勢，明白不應該站錯隊和教宗作對，于是便建議布魯諾不要再管這件事情。誰都對此無能為力。那個向警方報告這一切細節的線人說道：“沒有人膽敢真的對拉蒂教宗提出反對意見，因為他們害怕失去他的青睞。”ASMAE, AISS, b. 2, fasc. 6, Roma, 14 luglio 1929.

[[28]](#filepos436322) 警方線人報告，轉引自Coco (2009, p. 168)。切雷蒂樞機使用的措辭并不容易翻譯：“il papa si è fatto mangare da Mussolini la pappa in testa.”

[[29]](#filepos437240) ASMAE, AISS, b. 2, fasc. 6, Roma, 14 luglio 1929. 關于蓬皮利以及這番爭論，參見Fiorentino 1999, pp. 131–133。

[[30]](#filepos437536) 埃塞俄比亞舊稱。1935年秋，墨索里尼率領的意大利軍隊入侵阿比西尼亞。——編注

[[31]](#filepos437672) De Vecchi 1983, p. 141.

[[32]](#filepos438128) ASMAE, AISS, b. 2, fasc. 6, Roma, 10 agosto 1929. 復本收于ACS, MI, FP“Pompili.” 這個線人被標成39號，并且附有一張字條：“抄送給格蘭迪閣下和大使”ASMAE, AISS, b. 2, f. 6, Roma, 12 novembre 1929。

[[33]](#filepos438615) ACS, MI, FP “Pompili,” Città del Vaticano, 19 novembre 1929. 根據警方線人提供的情報，這番說辭的來源是蓬皮利的私人秘書帕斯庫奇（Pascucci）蒙席。

[[34]](#filepos438987) ACS, MI, FP “Pompili,”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30 marzo 1930.

[[35]](#filepos439208) 根據線人提供的消息，在蓬皮利過世之前，當這位羅馬神父擔心自己的健康狀況時，教宗卻感到寬慰，認為他很快就能擺脫掉一個噩夢。ACS, MI, FP “Pompili,” informatore n. 40 (=Virginio Troiani di Merfa), Città del Vaticano, 25 aprile 1931. 另參見Fiorentino 1999, pp. 131–138。

[[36]](#filepos440566) 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40, Città del Vaticano, 9 luglio 1931.

[[37]](#filepos441648) 四年之后，另一位線人報告說，皮扎爾多在梵蒂岡有一個非常出名的綽號，喚作“拉斯普京”。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35, Roma, 13agosto 1929; 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390, Milano, 6 giugno 1933. 我在上文提過，這些警方線人的報告必須審慎對待。

[[38]](#filepos441916) 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52 (=Filippo Tagliavacche), Roma, 21 luglio1933; Casella 2000, pp. 176–177.

[[39]](#filepos442577) O. Russell, Annual Report 1924, February 28, 1925, C 3342/3342/22, in Hachey 1972,p. 71, section 60. 當時的英國只有兩名樞機。波拉德（2012）詳細說明了那些年間，美國資金對于梵蒂岡的重要意義。芒德萊恩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教區不在東海岸的樞機，關于其任命的緣由和意義，參見Kantowicz 1983, pp. 165–166。

[[40]](#filepos443664) Fogarty 1996, p. 556.

[[41]](#filepos444345) ACS, MI, FP “Pizzardo,” informatore n. 40, Roma 14 novembre 1929.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梵蒂岡常常有流言說皮扎爾多即將被教宗任命為大使。德國、美國和波蘭都曾作為出使國家出現在這些流言之中。參見ACS, MI, FP “Pizzardo”。但是每一次，皮扎爾多都說服教宗，令自己留在了梵蒂岡。

[[42]](#filepos444894) 博爾貢吉尼自己對這份新工作的描述為我們披露了更多內容：“在外交界，人們靠口述撰寫文書。圣父口述給樞機[國務卿]，樞機口述給我，而我則口述給我的助手。”轉引自Guasco 2012。馬丁納神父（2003, p. 237）同樣認為博爾貢吉尼的個人能力“中規中矩”，并且指出，當教宗需要向墨索里尼派出更為“權威”的信使時，他會派遣塔基·文圖里。

[[43]](#filepos445246) FCRSE, part XIV, p. 72, Perth to Halifax, April 26, 1938, R 4359/280/22.

[[44]](#filepos445723) ACS, MI, PP, b. 154, informatore n. 40, Città del Vaticano, 20 ottobre 1930. 在1930年6月同皮扎爾多蒙席的一場會面中，德·維基抱怨說他已經擔任大使整整一年了，然而教宗仍然沒有賜給他任何名號。他還曾在日記中記到，自己第二天要向博爾貢吉尼提出這個問題；參見De Vecchi 1998, pp. 216–217。

[[45]](#filepos447902) 意大利革命家，民族解放運動領袖，是意大利建國三杰之一。——編注

[[46]](#filepos448463) 然而博爾貢吉尼不會這么就被糊弄過去，他進一步提出，政府近期沒收了一大批教會報紙，教宗對此也感到不滿。他用來和墨索里尼對質的觀點正是塔基·文圖里長期以來一直使用的。大使告訴領袖，他曾“多次聽圣父談及，教會的敵人恰恰也是法西斯黨的敵人，那些同教會作對的人不可能是法西斯黨的朋友”。ASV, ANI, pos. 23, fasc. 1, 6. 8r–18r.在《拉特蘭條約》宣布不久之后，教會的高層人員曾發出警告，表示各種邪惡的“教派”致力于毀壞羅馬天主教會以及法西斯政權。條約簽訂時間是2月11日，不到兩周內，帕多瓦主教埃利亞·達拉·科斯塔（他將在兩年之后被庇護十一世晉升為樞機）感謝天主賦予墨索里尼“極大的智慧和極大的勇氣”。2月24日，他在帕多瓦教堂里做了布道，其間他告訴教民墨索里尼需要全力以赴，“才能夠抵擋住所有教派、天主的敵人以及意大利的敵人的陰謀詭計”。轉引自Perin 2010, p. 152。

## 第十章 步步緊逼

羅馬最重要的愛國節日莫過于9月20日，1870年的意大利部隊正是在這一天攻克羅馬的。然而當愛國者們歡慶這個節日的時候，梵蒂岡的忠誠擁護者則會舉行特別的哀悼彌撒。1929年9月初，教宗派遣他的大使面見墨索里尼。他希望能夠取消這個節日，并將2月11日增設為一個全新的節日，用來紀念《拉特蘭條約》的簽署。  [[1]](#_1__ASV__ANI__pos__22__fasc__10)

墨索里尼并不贊同這個建議。“坦白地說，”他回答道，“我必須告訴你，意大利人不能放棄歡慶9月20日的傳統。”宗教事務協約并沒有約定要廢除這個節日。歷史已經證明，這個節日所代表的事件對所有人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其中也包括教會。它是天主旨意的一部分。  [[2]](#_2__ASMAE__AISS__b__2__Mussolini)

墨索里尼竟然在天主的旨意方面對教宗說教，庇護十一世被他的這番傲慢所惹惱，幾天之后通過他的大使回答說：如果說宗教事務協約沒有非常明確地提及要廢除這個節日，那只是因為這一要求“再明顯不過了”。  [[3]](#_3__Dang_Mo_Suo_Li_Ni_Biao_Shi_Z)

雙方的協商幾乎進行到9月19日的最后一分鐘，然而那一年，意大利依然慶祝了這個節日，盡管沒有往年那么喧鬧。然而，教宗不想他的努力全部白費，他仍然想要一個結果。領袖為了同教宗和解，便向他承諾意大利以后再也不會慶祝這個節日了。

\* \* \* \* \*

七年以來，墨索里尼一直勸阻雷切爾和他的幾個孩子，不讓他們來到羅馬，然而1929年11月，他的妻子還是帶著五個孩子抵達首都，其中還包括兩個月前剛剛出生的安娜·瑪麗亞（Anna Maria）。他們搬進了宏偉的托洛尼亞別墅，這座建于19世紀早期的豪華建筑有著寬敞的庭院，剛好坐落在老城墻的外面。  [[4]](#_4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9)

墨索里尼一直同瑪格麗塔·薩爾法蒂維系著關系，而她在羅馬的寓所已然成為藝術界和作家同法西斯要員社交的場所，這些因素使得墨索里尼的家庭生活變得格外復雜。在瑪格麗塔眼里，雷切爾是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農婦。她不涂口紅，不敷脂粉，也從來不上美容院。她平日總是換穿她僅有的兩件體面外衣：一件短海豹皮衣和一件銀狐皮衣，有觀察者稱，后者“乃是她在女性奢侈品上花費最高的物件”。她堅持要在用餐后洗刷盤碟，并且拒絕參加國家典禮，這對她丈夫來說無疑是一種寬慰。她在豪宅花園的一角搭起了一間雞舍、一座豬欄（養著兩頭豬）和一座爐子（用來烤面包）。

盡管雷切爾一心只管家務，但她卻一點都沒有放松對丈夫和孩子的管束。埃達表示：“我家中真正的獨裁者乃是我的母親。”在她孩提時代，當她犯錯的時候，她需要躲的人是她的母親，因為她害怕母親揮舞的手背。她指望父親回到家中來拯救她。父親是她的偶像，和母親不同，他具有詩意、寬容溺愛且充滿深情。然而為這個家庭帶來穩定的卻是雷切爾。埃達回憶道：“即便在我最早的記憶中，她在我眼里都顯得非常固執，不為他人所動搖。”雷切爾還是一個非常記仇的人。幾十年來她堅決不跟她的姐姐說話，因為她曾經想要利用自己跟獨裁者的關系。只要這位母親在場，墨索里尼的幾個孩子便沒有一個敢提起這位姨媽的名字。



墨索里尼與妻兒，1930年

在他女兒半開玩笑的話語中，墨索里尼投身政治，乃是為了盡可能少地待在妻子身邊。在還年輕的時候，他“寧愿身受警察和政敵棍棒的毆打，也不愿耳聞他妻子的刻薄言語”。墨索里尼自己的房間在托洛尼亞別墅的另一側。他偶爾會在這里同情人幽會，但在他眼里，辦公室才是更為安全的愛巢。  [[5]](#_5__E__Mussolini_1957__pp__40_50)

\* \* \* \* \*

1929年12月，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和海倫王后以非常壯觀的排場來到梵蒂岡，拜訪教宗以示王室的敬意。意大利王國成立六十八年后，教宗終于和王室會面。士兵們在街上排成一字長龍，將圍觀的人群擋在身后。瑞士侍衛隊身穿中世紀華麗的護身鎧甲和新月冠銀盔，排成兩行供這對王室夫婦通過。當隨行人員也進入梵蒂岡城的中心時，教廷儀隊（Palatine Guards）也緊跟這一王室隊伍前進。國王身穿軍服，他身邊的王后則身穿白色蕾絲長裙，戴著白色面紗，披著白色王室披風，被簇擁著，沿著階梯一直向使徒宮行進。他們穿過幾個富麗堂皇的接待大廳，來到那個布置著小型寶座的房間，教宗正坐在紫色的華蓋下等候他們的光臨。



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和海倫王后拜訪教宗，1929年12月

在二十分鐘的交談以及禮物交換之后，國王與王后又前去加斯帕里樞機的住處拜訪。在那里這些訪客才拍了合照，因為庇護十一世認為跟訪客合影是有失威嚴的事情，即便是王室也不例外；而他也不會向意大利政府的施壓屈服，絕不親自拜訪奎里納爾宮。統治者必須上門晉見他。拍完合照之后，國務卿將王室夫婦護送到圣彼得大教堂，他們在使徒墓前屈膝行禮。  [[6]](#_6__CC_1929_IV__pp__548_552____Y)  那一天對這位反教會國王來說，是異常難熬的一天，這一點被討厭國王的埃德維杰（墨索里尼的姐姐）記錄了下來。她評論道，在拜訪梵蒂岡的整個過程中，國王“臉上的表情比平常嚴厲，更為惡意”。  [[7]](#_7__E__Mussolini_1957__p__135)

這段時間對庇護十一世來說也有諸多變化。那個月稍晚幾天，身為教宗的他第一次走出了圣彼得廣場。12月20日6點過后，在沒有任何公告的情況下，一個車隊從梵蒂岡出發，前往羅馬另一頭的拉特蘭圣約翰大教堂。這個教堂是五十年前教宗晉鐸的地方，他現在非常迫切地想要在這里舉行一場彌撒。自從庇護九世1870年宣布自己已是梵蒂岡的囚徒之后，這是羅馬主教第一次踏入他的主教教座。  [[8]](#_8__Confalonieri_1957__p__160__C)

一位法國主教認為，庇護十一世是“天底下最神秘的人，他不信任任何人，哪怕是他最親密的顧問。他非常敏感，有點情緒化，但是他通過堅強的意志控制自己，不向任何人屈服。任何人都不可能預測他接下來將做出什么決定”。  [[9]](#_9__Baudrillart_2003__pp__381_38)

\* \* \* \* \*

幾個月后，墨索里尼的愛女埃達舉行了婚禮。他希望她成婚之后能夠令他稍感輕松。盡管他非常溺愛這個女兒，但是她卻似乎喜歡折磨自己的父親。在所有的孩子里，就數她與自己最相像：任性、沖動、喜怒無常、喜歡冒險、容易激動，并且固執己見，嘴里隨時會冒出尖酸的話語，臉上總擺出一副諷刺的神色。此外，她也很喜歡騎馬和游泳。她完全忽視習俗，衣著暴露，抽煙，還喜歡飆車。她棱角分明，體格強健，跟她那些胖乎乎的弟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弟弟反倒更像母親。  [[10]](#_10__R__Mussolini_2006__p__97)

盡管埃達才十九歲，卻已經有了頗為豐富的情史，這令她父親感到十分惱怒。1929年7月，她宣布自己同一位猶太人墜入愛河，這令她的父親非常惶恐。他剛剛因為同教會達成協約，從天主教界贏得首肯，如今他的女兒竟然要嫁給一個猶太人，這實在太可怕了，令人不敢細想。他妻子對這對情侶大加責罵，然而沒有什么效果，于是墨索里尼請求他姐姐埃德維杰來曉之以理。埃達后來表示，父親為了懲罰她，決定要收走她的汽車，這一舉動最令她忌憚。不過墨索里尼本不必擔心，因為輕浮、任性的埃達很快就會甩掉這個猶太男朋友，轉投他人的懷抱。她的新男友是個實業家的兒子，這位放蕩子不僅沉迷于可卡因，還感染了梅毒。  [[11]](#_11__Moseley_1999__p__5)  幾個月后，“這頭瘋狂的小母馬”（家人背地里這么叫她）終于走上正途，宣布自己已經和二十七歲的加萊亞佐·齊亞諾結下了婚約。  [[12]](#_12__E__Mussolini_1957__pp__122)

加萊亞佐的父親科斯坦佐·齊亞諾（Costanzo Ciano）是墨索里尼核心集團的成員，擔任郵政與電報部部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海軍的一名船長；1925年，由于墨索里尼意欲組建一個全新的法西斯貴族階層，迫于他的意愿，國王只好授予科斯坦佐伯爵爵位。人們都懷疑齊亞諾從自己掌管的大型合同中收受回扣，而他也確實發家致富，他的兒子加萊亞佐因此從小在優渥的環境中長大。加萊亞佐溫文爾雅，深受女性青睞（或者只是他自視如此），一頭背頭黑發打理得非常精致。雷切爾抱怨說：“我不喜歡他，他跟我們不是一路人。他是個上流社會的紳士。”

加萊亞佐來到墨索里尼家中，正式向埃達求婚，而墨索里尼則領著他走出書房，向全家人宣布了這個消息。雷切爾盡可能地想要勸阻加萊亞佐。“你可要知道，”她告訴他說，“埃達什么都不會。她不會做飯，連雞蛋都不會煎，也不懂得怎么打理房子。至于她的品格，最好是提都不要去提。我是她的母親，我必須嚴正地警告你。”  [[13]](#_13__E__Mussolini_1975__p__64__C)

1930年4月，他們在鄰近教區的教堂里舉行了婚禮。婚禮之后，數百名賓客（身穿毛領大衣的女士和身著黑色西裝的男士）聚集到托洛尼亞別墅中參加宴會。別墅的前門是一排寬闊的長階梯，在一張攝于此地的新聞照片上，教宗大使博爾貢吉尼正同法西斯權貴迪諾·格蘭迪親切交談。待會兒在花園舉行的宴會上，這位教宗大使將榮幸地與幾近禿頂的墨索里尼一同坐在一張圓形餐桌上。身穿白色長裙、脖子上佩戴白色大蝴蝶結的羅馬女學生將為他們表演齊聲合唱。埃達的幾個弟弟也都出席了婚禮，他們穿著黑色短褲和白色開領襯衫，頭發也都梳成背頭。在演唱完畢后，女學生們從新婚夫婦身邊踏步走過。埃達高舉右手行法西斯禮，而加萊亞佐則雙手在背后反扣，抓著他的黑色禮帽。

之后，這對新婚夫婦和他們的父母來到了圣彼得大教堂。加萊亞佐和埃達（她身穿白色婚紗，頭上戴著白色蕾絲頭飾，這番打扮令人覺得她就是個二十多歲的輕佻女子）踏上了教堂威風凜凜的階梯，兩個小孩捧著她又長又飄逸的裙擺末端。墨索里尼和他的新女婿相仿，穿著燕尾服，頭上戴著禮帽。教堂外，情緒激昂的人群紛紛舉起手臂行法西斯禮。教堂里面，博爾貢吉尼向這對新人傳達了庇護十一世的降福，并將教宗的禮物送給埃達，那是一串用黃金和孔雀石打造的極品念珠。  [[14]](#_14__CC__1930_II__p__284___Jiao)  然后，這對新人又來到加萊亞佐雙親的家中，不過他們沒有待很久，因為從來都不受拘束的埃達沒法忍受她那個非常肥胖的婆婆，后來埃達習慣將她稱作“la bertuccia”，即猿猴。  [[15]](#_15__Moseley_1999__p__15)

\* \* \* \* \*

隨著1930年的秋天逐漸迫近，教宗通過他的大使不斷地提醒墨索里尼，他在去年承諾過要取消意大利的愛國節日。然而領袖已經改變了主意，因為他擔心廢除這個節日會給人以孱弱的印象。教宗顯然不會做出任何讓步。他警告道，如果意大利再度歡慶9月20日，那么他就會將自己的反對意見公之于眾。  [[16]](#_16__DDI__series_7__vol__9__n__2)

領袖無法忽略這番威脅。于是，他將教宗大使召至威尼斯宮（他在一年前將自己的辦公室搬到了這座宏偉的中世紀宮殿）。威尼斯宮由教宗保祿二世（Pope Paul II）建于15世紀，坐落在威尼斯廣場上，同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的紀念碑（人們譏諷它狀如一個碩大畸形的白色婚禮蛋糕）呈對角線遙相呼應。1924年，墨索里尼發起了復興古羅馬城的項目，拆除了占據圖拉真市場和古羅馬城市廣場的房屋和教堂，其中有很多都建于文藝復興時期。接下來，他將拆毀更多建筑，疏通出一條壯觀的通衢大道，路面和人行道總共三十米寬，從威尼斯廣場經過一些歷史遺跡直通到古羅馬競技場。  [[17]](#_17__Ling_Xiu_Xia_Ling_Chai_Hui)

這位教宗大使臉上架著一副眼鏡，黑色的教士服下顯出微微隆起的肚腩。當他在9月1日踏入墨索里尼的辦公室時，領袖以其慣常的粗糙笑意接待了他的光臨。他的辦公室安排在龐大的世界地圖廳。這個房間足足有六十英尺長五十英尺寬，畫滿壁畫的天花板則有四十英尺高，整面西墻上裝飾著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圖。墨索里尼心情正好，面色也不錯，然而他被太陽曬黑的皮膚和白色的羊毛西裝并不是十分協調。

當大使問及他曬黑的皮膚時，墨索里尼表示自己每天都會去海灘游泳，并且接受他所謂的葡萄療法。墨索里尼向一頭霧水的大使解釋道：“葡萄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良藥，盡管大部分人并沒有意識到它寶貴的價值。空腹吃下一串葡萄能夠激活肝臟，令人排便通暢，并且一整天都有飽腹之感。”

獨裁者的胃一直都不太好。在壓力較大的狀況下，難忍的疼痛通常會加倍襲來，令他不得不上床休息。好幾年前，剛剛宣布要獨裁統治之后，他便胃疼發作，咳出一口鮮血。盡管好多位醫療專家對他進行過會診，然而沒人能夠做出確切的診斷。所以這位曾經喜歡雙份濃縮咖啡的人，現在的食譜主要是甘菊茶、水果和蔬菜。在深夜的法西斯大議會會議上，與會人員為了保持清醒一杯又一杯地灌下濃縮咖啡，領袖卻只能喝鮮榨橙汁。他要杜絕所有咖啡和酒精飲品。  [[18]](#_18__Navarra_2004__pp__17__44__D)

“您知道我為何而來”，博爾貢吉尼說道。墨索里尼抽出大使最近給他寄來的信件，其中包含教宗對他的威脅，接著他指著自己用藍色鉛筆劃出的那個段落。墨索里尼總是不厭其煩地用紅色鉛筆或藍色鉛筆在自己瀏覽的文檔頁邊做筆記，并且一直用到它們被削成鉛筆頭時才換新的鉛筆。  [[19]](#_19__R__Mussolini_1974__p__97)

領袖搖了搖頭。9月20日的節日由法律規定，他說道，只有通過國會投票才能做出更改。“所以今年我們可以進一步壓縮節慶的活動和規模，”他試圖同教宗達成妥協，“往年我們會在公共建筑上張燈結彩，懸掛國旗，今年我們可以把這些安排都取消掉。下一輪內閣會議中，我們將做出決定，是否要取消這個節日，而我會在國會中投贊成票。”  [[20]](#_20___Cong_Luo_Ji_Shang_Lai_Shuo)

“不行，閣下，”堅忍不拔的博爾貢吉尼回答道，“這些可算不上解決方案。官方必須在9月20日之前禁止這個節日，否則圣父的良知將迫使他公開發表抗議……而整個世界都會嘲笑我們：‘他們真是簽署了一份偉大的條約！’”他提出，《拉特蘭條約》第六條規定，但凡此前立下并且和條約相違背的法案，政府必須全部廢除，所以墨索里尼完全可以根據條約條款，宣布廢除這個節日。

墨索里尼思考了一會兒，同意說這也不失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不過他得先跟法律顧問談一談，很快就能給大使一個答復。

博爾貢吉尼起身離開的時候，向墨索里尼表達了他的悼念之情，因為墨索里尼的侄子（阿納爾多的兒子）最近英年早逝。這番話令領袖陷入了憂思，因為他想起了這個男孩臨終前的苦痛以及他弟弟深切的天主教信仰。

“我也是一個信徒，”領袖仿佛言之鑿鑿，“別以為我不是！”

“只是，”他補充道，“人類令我墮落。”  [[21]](#_21___Bu_Shi_De__Nin_Shi_Yi_Ge_X)

\* \* \* \* \*

領袖很快就召集大使再次會面。他表示，盡管正式廢除9月20日的節日得先通過一項法案，不過這樣的提案將會被提上下一屆內閣會議的日程。它將被一個新的節日所取代，而這個新的節日定在10月28日，用來紀念“進軍羅馬事件”。

博爾貢吉尼回答道，教宗也許能夠接受這樣的折中處理，但是用紀念“進軍羅馬事件”的節日，而不是紀念條約簽訂的2月11日來替換舊的節日，這樣的提案可能會令教宗感到不滿。

“這件事不要再繼續說下去了，”墨索里尼提高嗓門說道，“你想讓我廢除9月20日的節日，我給你辦妥了。已經夠了！我不想聽到你現在又讓我變更九二零大街的名字，又或者抱怨小學課本上寫著意大利人在9月20日進入羅馬城。”

墨索里尼站起身來。“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擔心”，他這樣說著，讓大使回去了。  [[22]](#_22__ASV__ANI__pos__23__fasc__10)

教宗可不是一個能夠被嚇倒的人，他對墨索里尼步步緊逼。盡管博爾貢吉尼已經告訴過他，墨索里尼拒絕變更街道的名字，然而他依然堅持墨索里尼應該給九二零大街換個新名字，它畢竟是羅馬的一條主干道。教宗提議道，這條街道應該叫作二一一大道，以紀念《拉特蘭條約》的簽訂日期。

當墨索里尼聽聞教宗的最新要求時，他叫來了大使。“你們肯定是想招致一輪兇殘的反教會行動，”憤怒的領袖告訴他說，“我已經后悔在節日上做出的妥協了……我剛剛答應一件事情，新的要求就緊跟而來，內閣會議都還沒召開，法案甚至都還沒通過，更何況我還特地跟你說過，更改街名的事情不準跟我提。”

領袖說道，上次會面他提及更改街名是有原因的。“我很了解你們，我也預料到你們讓我廢除節日后，還會要求廢除街名；廢除街名后，誰知道你們又會要求什么別的事情呢？”你們接下來還想要什么？他問道。意大利總共有九千個鎮，誰知道有多少街道名會令教宗不滿呢？

送大使出門的時候，墨索里尼稍微冷靜了一點。“政策制定有既定的程序，你們不能步步緊逼，”他解釋道，“我有自己的做事風格。不節外生枝，不做任何不必要的事情。而且我必須尊重法律條文。我不想壞了規矩。”  [[23]](#_23__Guan_Yu_Bo_Er_Gong_Ji_Ni_He)

\* \* \* \* \*

歷史學家認為，在《拉特蘭條約》簽訂之后，墨索里尼進入了一段共識期，再也沒有人對他提出反對意見，于是他對個人崇拜的渴求與日俱增。  [[24]](#_24__Xu_Duo_Li_Shi_Xue_Jia_Ren_W)  他不僅要求新聞報紙稱呼他為領袖，而且堅持DUCE這四個字母必須大寫。  [[25]](#_25__Mack_Smith_1982__p__168__19)  無論是公共建筑、人民家中或者商店，到處都掛著他的肖像。報紙和雜志上刊登著他英氣勃發的照片，出版之前都必須經過他細致的審查。他深信修女、修士和神父會給他帶來壞運氣，所以不允許刊登和此類人物的合照。  [[26]](#_26__Gentile_1995__pp__144_145)

墨索里尼還很注重培養他在熒幕上的形象。羅馬有許多電影院（其中一家甚至有用于通風的可移動屋頂），人們也熱衷于觀看新近上映的影片。  [[27]](#_27__MacKinnon_1927__p__81)  領袖同新成立的國家電影機構密切合作，1927年，一項法案要求意大利的所有影院都必須播放領袖的宣傳短片。

于是影院便充斥著有關領袖的各種新聞電影——他在新項目上的致辭、向法西斯青年團體發表的講話、給法西斯烈士獻花圈，以及將獎章授給衣著亮麗的農夫。在有些短片里，他還身穿白色西服，視察市政工程項目，或者是在托洛尼亞別墅的庭院里，穿著開領襯衫，騎著一匹栗色大馬跳過臨時擺放的障礙物。有些新聞影片的內容則相對輕松隨意，拍攝的是意大利民眾的日常生活。有的影片則記錄意大利著名拳擊手和自行車運動員奪取勝利的場景。有一部影片記錄了在羅馬的特拉斯提弗列舉行的大眾節慶，此處離梵蒂岡很近，在這部電影中，觀影人將看到人們扛著粗麻袋，把袋口攥在胸前，一蹦一跳地沖向街道另一頭的終點線。緊接著還有一場湯匙盛蛋賽跑，每一位參賽者（其中沒有女性）在街道上跑動時，都要努力地將雞蛋平衡在一把湯匙上，賽跑結束之后，攝像頭又對準了那些砸在鵝卵石路面上的雞蛋，表明有許多參賽者并沒能成功抵達終點。當墨索里尼出現在熒幕上時，影院里的笑聲很快就平息下去，人們紛紛起立。

并不是每一個人都心甘情愿地接受這種強迫向獨裁者致意的形式。曾有一個四處流傳的故事，說有一天墨索里尼決定喬裝打扮去電影院看電影，當他的身影出現在熒幕上時，每個人都起立了，只有他一人坐在座位上。在這間昏暗的電影院里，他身后的一個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對著他的耳朵悄聲說道：“先生，雖然我跟您有同樣的感受，但是我會建議您最好站起來，否則這些暴徒有可能把你腦袋打開瓢。”  [[28]](#_28__MacKinnon_1927__p__xv)

在公眾場合露面時，領袖的助手們會確保圍在領袖身邊的都是那些愛戴他的人，即便有時候這意味著必須出動便衣警察來假扮群眾。墨索里尼的私人助理納瓦拉回憶往事時提及，曾有一張刊登在媒體上的照片，拍攝了領袖和一位農婦跳華爾茲的場景，而到處瘋傳的流言則稱他的舞伴實際上是一個喬裝打扮的警察。

墨索里尼有時候自己都會忘記，那些跟他合影的工人、農民和工匠實際上是他自己麾下的警察，然而在為一棟新建筑的落成儀式致辭的時候，他確實意識到了這件事情。當時他轉向站在他身邊的一名“砌磚匠”悄聲地問，他是不是一位警察。

“不是的，領袖！”那人回答道。

“啊，太棒了！”墨索里尼高興地回復道，“所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呢，熟練的石匠？”

“不是的，領袖，”他回答道，“我是一名陸軍中士。”  [[29]](#_29__Navarra_2004__p__65)

[[1]](#filepos467916) ASV, ANI, pos. 22, fasc. 10, 6. 2r–3r, Borgongini a Mussolini, 12 settembre 1929.

[[2]](#filepos468419) ASMAE, AISS, b. 2, Mussolini a Borgongini, 15 settembre 1929.

[[3]](#filepos468847) 當墨索里尼表示這個節日對所有人都有重大的意義時，博爾貢吉尼辯稱，“所有教宗，從庇護九世到庇護十一世，他們的看法都與您的觀點背道而馳，而所有天主教徒也是這么認為的”。ASMAE, AISS, b. 2, Borgongini a Mussolini, 18 settembre 1929.

[[4]](#filepos469818)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328.

[[5]](#filepos472261) E. Mussolini 1957, pp. 40–50, 103; De Felice 1974, pp. 19–20; De Felice 1981, p.274n38; Morgan 1941, pp. 109–111, 138–139; Festorazzi 2010, pp. 80–81; Motti 2003, pp.198–199; E. Mussolini 1957, p. 39.

[[6]](#filepos474108) CC 1929 IV, pp. 548–552; 《意大利國王和王后莊嚴地拜訪圣父》，OR, 6dicembre 1929, p. 1。梅里·德爾瓦爾樞機曾擔心博爾貢吉尼（“此人什么事都做得出來”）會向政府的施壓低頭，說服教宗拜訪王室成員，在這位前任國務卿看來，這樣的行為有損教宗的尊嚴。Tardini 1988, p. 450n32. 接下來的一周將迎來《拉特蘭條約》的周年紀念日，《羅馬觀察報》追述起這一事件，稱其是“圣父的仁慈、國王的智慧，以及政治家的天才”的產物。《2月11日》，OR, 11 dicembre 1929, p. 1。

[[7]](#filepos474489) E. Mussolini 1957, p. 135.

[[8]](#filepos475151) Confalonieri 1957, p. 160; CC 1930 I, pp. 80–81. 盡管許多樞機（包括兩名美國樞機）為了參加圣年的閉幕慶典而來到羅馬，但是他們對這場出行活動均不知情，也就沒有親眼看見。NARA, M561, reel 1, JohnW. Garrett, U.S. embassy in Rome,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0, 1929; 《475 000人來到羅馬慶祝教宗晉鐸五十周年》，CDT, December 19, 1929, p. 35。

[[9]](#filepos475600) Baudrillart 2003, pp. 381–383 (6 décembre 1929), 轉引自Durand 2010, p. 44。

[[10]](#filepos476462) R. Mussolini 2006, p. 97.

[[11]](#filepos477442) Moseley 1999, p. 5.

[[12]](#filepos477733) E. Mussolini 1957, pp. 122–124.

[[13]](#filepos479090) E. Mussolini 1975, p. 64; Caracciolo 1982, pp. 102–105; Innocenti 1992, p. 14; Moseley 1999, pp. 4, 7, 11; Morgan 1941, p. 114.

[[14]](#filepos480809) CC, 1930 II, p. 284. “教宗送給這對新人的禮物，”德·維基（1998, pp. 147–148）在那一天的日記里寫道，“不僅在意大利國內產生了非常良好的輿論影響，而且在全世界都產生了不小的震動。”之后，加萊亞佐于同年被任命為意大利駐中國大使，在他和埃達動身趕赴中國之前，教宗親自接見了他們，并送給他們一本托馬斯·肯皮斯（Thomas Kempis）的《效仿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 ），這本皮面裝訂的書上還有教宗的親筆簽名。《領袖的女婿和女兒與教宗親切交談》，CDT, September 9, 1930, p. 31。

[[15]](#filepos481158) Moseley 1999, p. 15.

[[16]](#filepos481773) DDI, series 7, vol. 9, n. 231, 26 agosto 1930. 博爾貢吉尼這封書信的手稿帶有修改痕跡，收于ASV, ANI, pos. 23, fasc. 2, 6. 165r–169r。

[[17]](#filepos482693) 領袖下令拆毀了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宮殿和教堂，用一位歷史學家的話來說，“這些建筑猶如覆蓋羅馬城的火山熔巖，令這座鼎盛時期的龐貝城毀于一旦”。De Felice 1974, pp. 52–53; Insolera 1976, pp. 128, 132–133; Painter 2005, pp. 22–23.

[[18]](#filepos484442) Navarra 2004, pp. 17, 44; De Felice 1968, pp. 55–56; Festorazzi 2010, p. 94;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298.

[[19]](#filepos484967) R. Mussolini 1974, p. 97.

[[20]](#filepos485567) “從邏輯上來說，您完全正確，”墨索里尼告訴大使，大使的觀點是《拉特蘭條約》要求政府廢除這個具有爭議的節日，“可是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說，我也不是完全錯誤的。”

[[21]](#filepos486943) “不是的，您是一個信徒，”大使回答道，“主很明顯在幫助閣下。”參見博爾貢吉尼對這場會面的描述，收于他寫給新國務卿歐金尼奧·帕切利的信。ASV, ANI, pos. 22, fasc. 10, 6. 23r–34r, 4 settembre 1930.

[[22]](#filepos488215) ASV, ANI, pos. 23, fasc. 10, 6. 53r–62r, Borgongini a Pacelli, 15 settembre 1930.

[[23]](#filepos489910) 關于博爾貢吉尼和墨索里尼的兩次會晤，描述資料收于ASV, ANI, pos. 23,fasc. 2, 6. 204r–213r, Borgongini a Eugenio Pacelli, segretario di stato, 15 settembre 1930。

[[24]](#filepos490320)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此時的墨索里尼正在意大利打造一種公民宗教。法西斯分子便使用這一術語：1930年，墨索里尼的一位親信便將法西斯主義稱作是一種“公民和政治的宗教……意大利的宗教”。到20世紀20年代末，法西斯黨總書記奧古斯托·圖拉蒂（Augusto Turati）仿照天主教會，設計出一套儀式和神話的體系。他號召所有意大利人“就像信仰神靈一樣”，無條件信任領袖和法西斯主義。在《拉特蘭條約》之后，圖拉蒂出版了一本法西斯教義書；其主要的信仰條款中，有一條規定“每一個人都要順從領袖的意志”。這種個人崇拜將墨索里尼視作教宗一般的存在，他絕不可能會在判斷和信仰的事宜上出錯，他就像教宗一樣是不容置疑的。這位“神選之人”明白什么樣的事情對他的人民最有利。Gentile 1995, pp. 144–145; Gentile 1993, pp.124, 293–294.

[[25]](#filepos490529) Mack Smith 1982, p. 168. 1933年2月，法西斯黨總書記阿契爾·斯塔拉切宣布，從今往后，所有政府法案包含的領袖字眼都必須大寫。Falasca- Zamponi 1997, p. 61.

[[26]](#filepos490935) Gentile 1995, pp. 144–145; Gentile 1993, pp. 124, 293–294. 《意大利人民報》（墨索里尼手下的報紙）一位駐中國的記者曾經代為傳達一項特殊的請求，Wei Chou（不明確，可能指汶川縣威州鎮，也可能是溫州的筆誤）的幾位天主教傳教士想要一張領袖的親筆簽名照。這位記者解釋道：“這些人面對著聞所未聞的困難和危險，他們同中國人談起墨索里尼時，仿佛他就是天主，由此提高了意大利的聲望。”收到簽名照后，傳教士隊伍中的領頭人感恩戴德，以如下話語表達了他的謝意，“我們的領袖乃是天主所選，引領著祖國奔向偉大的前程”。Franzinelli and Marino, 2003, p. xii.

[[27]](#filepos491271) MacKinnon 1927, p. 81

[[28]](#filepos493371) MacKinnon 1927, p. xv。

[[29]](#filepos494615) Navarra 2004, p. 65.

## 第十一章 土生子歸來

待到《拉特蘭條約》最終獲批時，年高七十七歲的加斯帕里樞機已經服侍兩任教宗，擔任國務卿長達十五年了。1922年，在幫助拉蒂當選教宗之后，他還能倚仗教宗的支持，因為庇護非常看重他作為國務卿的經驗。隨著時間的流逝，兩人之間必定會出現沖突，因為教宗絕不能容忍梵蒂岡有人另起爐灶，跟他分庭抗禮。  [[1]](#_1__Yi_Wei_Ying_Guo_Da_Shi_Zai_H)

除了回山區老家（在首都東北方向）避暑以外，加斯帕里很少離開羅馬。在家鄉，整個大家族視他為社會名流，是山溝里飛出的金鳳凰。在羅馬時，他每天都在辦公室里跟下屬打交道——他坐在一張寬大的圓桌旁，桌上擺著一堆又一堆的文檔，每位下屬進來時，加斯帕里都會讓他領走一疊。當他回老家度假時，助手則輪流給他送去文件。在這里，身材短小精悍的樞機坐在一棵大樹下，身穿簡易的黑色教士袍，大大的圓邊黑色布帽躺在他的身邊，享受著陰涼、新鮮空氣和美景。  [[2]](#_2__Ottaviani_1969__pp__502_503)

加斯帕里頗具鄉土氣息的幽默感總是能令別人放松，然而各國駐圣座大使卻覺得他說話不太坦誠。英國大使在報告中表示，他“一點都不坦誠……直說的話，他是個撒謊的好手”。有一天，法國大使指責他沒有道出真相，加斯帕里回答說，他只不過是做了外交官必須做的事情，隨后還兩眼放光地補充道，如果有必要的話教宗會赦免他的謊言。  [[3]](#_3__Rhodes_1974__p__40)

美國記者托馬斯·摩根（Thomas Morgan）曾講述自己在20世紀20年代拜訪加斯帕里辦公室的情景。當時，基督戰爭正處于危機最為深重的階段，墨西哥政府關閉了大量教堂和神學院。摩根發現加斯帕里非常冷靜，談話時“就像一位偉大的圣賢”。他說道，教會存續了這么多個世紀，也經歷過更為嚴重的危機，必然會挺過這個階段，比敵人走得更遠。

“他們不會得勝（Non prevalebunt）”，他重復著這句拉丁文。

樞機將記者領至門口，房間里的幾只鸚鵡學舌道：“他們不會得勝！他們不會得勝！”顯然國務卿花了好些工夫，將教會的歷史經驗教給它們。  [[4]](#_4__Morgan_1944__p__137__Zhe_Ge)

早在1926年，就有傳聞表示教宗對國務卿感到不滿。據說為了迫使他引退，教宗曾經在接見他之前命他在前廳等候，并用非常惡劣的言語羞辱他。用一位警方線人的話來說，即便是仆人也絕對無法忍受。  [[5]](#_5__ACS__MI__DAGRA__b__113__8_no)

1929年簽訂的《拉特蘭條約》乃是加斯帕里最廣為人知的成就。他最出名的照片莫過于手里握著鋼筆和墨索里尼并排而坐的那一張，然而這份條約給他帶來的結果卻喜憂參半。盡管墨索里尼在國會上發表的講話令庇護十分憤怒，但教宗畢竟希望建立教宗國，所以他很擔心獨裁者會拒絕繼續合作，于是決定替換人選，提拔一個新的國務卿。首先，他在7月將國務卿換屆的消息告知加斯帕里，并讓他好好想想這件事情。加斯帕里從山區避暑地回信給教宗說：“我并沒有忘記（我怎么可能忘記）教宗陛下曾在7月份告訴過我，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尤其考慮到教會為了保護公教進行會，很有可能跟法西斯政府發生沖突，因此教宗陛下認為讓別人取代我的職務的時機已經成熟。”他補充道，他自己也考慮過放下這個他擔任了多年的職務，“盡管我考慮的緣由跟教宗陛下提出的不盡相同”。他表示，到了這個年紀，他已經沒有當年的記憶力和精氣神了。  [[6]](#_6__Zhe_Feng_Xin_Kan_Yu_Martini)

教宗又等了好幾個月才換掉了國務卿。他同加斯帕里的會面越來越少，轉而倚仗他人，尤其是副國務卿皮扎爾多蒙席。  [[7]](#_7__ACS__MI__FP__Pietro_Gasparri)  離職之前漫長的等待十分煎熬，它消磨了這位國務卿余下的策略和手腕。有一次，在同教宗會面之后，加斯帕里嘆道：“我這一輩子真是不容易。”他告訴意大利大使，庇護十一世有許多優點，但他常常“冰冷得猶如一塊大理石”。  [[8]](#_8__De_Vecchi_1983__p__144__10Yu)

國務卿換屆的事情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9]](#_9__Zao_Zai_1928Nian_11Yue____Ni)  加斯帕里希望教宗能夠將這一職務委任給他的弟子博納文圖拉·切雷蒂，并且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教宗會采納這個建議。早在1925年，當切雷蒂剛剛從駐巴黎大使一職卸任，并且晉升為樞機時，教宗曾暗示過，有一天他將會提拔切雷蒂，讓他接任加斯帕里的職務。切雷蒂名列梵蒂岡最出色的外交家行列，曾經出使過墨西哥、美國和澳大利亞，并且代表教宗本篤十五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巴黎和會，但是在1929年秋，切雷蒂告訴一位記者，他并不想要這個職位。“如果教宗是庇護十一世的話，”他解釋道，“國務卿能夠發揮的余地就很小，基本上就是個擺設，并沒有實權，也沒有獨立性可言。他無法承擔任何直接、嚴肅的責任，也沒有辦法自作主張，簽署任何教廷文件。換句話說，你可以認為他就是一個上層命令的執行者。”  [[10]](#_10__Informatore_n__35__Rome__2)

切雷蒂這番評論的真實性存疑，因為很多人都認為他是最可能的人選，他有理由擔心教宗會略過他，轉而將其他人任命為國務卿。切雷蒂支持那些民主制國家和意大利人民黨，他的這些傾向眾所周知，而且教宗也很清楚地意識到，切雷蒂反對庇護和墨索里尼達成的條約。  [[11]](#_11__Coco_2009__pp__176_177_Zai)  12月，教宗最終將駐德國大使歐金尼奧·帕切利提拔為新任國務卿。切雷蒂對此非常憤怒。他確信，一定是弗朗切斯科·帕切利這個平信徒，利用他和庇護十一世頻繁的會面為他的弟弟說了好話。

“我為他做了這么多事情，對他有著如此堅定的忠心，我有三十年的外交經驗，庇護十一世竟然看不到，反倒偏愛帕切利……想到這些我就怒火中燒，簡直沒法接受這個現實。”切雷蒂憤怒地說道，“帕切利和他的兄長不過是法西斯黨的奴仆，是被墨索里尼收買的共謀犯，終將令圣座蒙羞。他們會令教宗受辱，削弱其力量，降低他在天主教國家眼中的道德水準和教育權威。”  [[12]](#_12__ACS__MI__FP__Cerretti___inf)

相比之下，墨索里尼麾下的駐德國大使路易吉·阿爾德羅萬迪（Luigi Aldrovandi）則更贊同這一委任結果。他表示歐金尼奧·帕切利是個水平極高的人，不僅有高深的智慧，還能夠隨時保持鎮靜。他身上既有莊嚴高貴，也有深切的宗教信仰。大使思索著，也許最重要的是，他能夠同法西斯政府成為朋友。“早在《拉特蘭條約》之前，”他在報告中寫道，“帕切利蒙席就表達過對墨索里尼閣下的景仰之情。”  [[13]](#_13__Da_Shi_Zong_Jie_Shuo__Yao_Z)

帕切利在許多方面都跟加斯帕里大相徑庭。他的祖父曾在庇護九世的教廷中擔任部長。當1848年革命將教宗驅逐出羅馬時，他也追隨教宗，并在回歸羅馬后，協助創辦了《羅馬觀察報》。帕切利的父親是梵蒂岡資歷最老的律師，并于1886年至1905年在羅馬市議會任職。歐金尼奧1876年出生于羅馬，兒時的他靦腆而體弱，很小就戴起了眼鏡，并且喜歡拉小提琴，對體育運動和兒童游戲都沒有任何興趣。  [[14]](#_14__Coppa_2011__pp__20_21__O_Sh)

18歲時，帕切利進入了羅馬最古老的神學院卡普拉尼卡公學（Almo Collegio Capranica），幾個世紀以來，這所學校都是梵蒂岡外交高官職業生涯的踏腳石。盡管帕切利在學業方面非常出色，但他不喜歡宿舍生活，并且非常思念家人，由于他巨大的家庭勢力，學校便開了特例，允許他在余下的學生生涯中住在家里。  [[15]](#_15__Coppa_2011__p__1__O_Shea_20)

在晉鐸兩年后的1901年，帕切利取得了教會法及民法博士學位，并且在梵蒂岡國務院的非常教務部謀得了一個職位。如果不是因為參加了反現代主義運動（這在教宗庇護十世治下是升職的必備條件），接下來的幾年中，他的仕途絕不可能這么順暢。  [[16]](#_16__Wo_Er_Fu__2010__p__36_Fa_Ju)  不過帕切利的言談謹慎有度，在國務院任職的時候，他還熱情地幫助過同事賈科莫·德拉·基耶薩。1914年，德拉·基耶薩成為教宗本篤十五世的時候，便將帕切利提拔為副國務卿。

三年后，教宗將帕切利任命為駐巴伐利亞大使。對于這位四十一歲的神父來說，這是他第一次離開母親，離開父母家。幾年后，他又被任命為駐德國大使，于是便從慕尼黑搬到了柏林。

第一次前往慕尼黑時，帕切利一個人就占了兩節火車車廂，一節給他自己，另一節放著六十箱食物。  [[17]](#_17__Coppa_2011__p__30)  抵達目的地后，他立即要求安排修女照顧他的起居。在這些修女中，時年二十四歲的帕斯卡利娜·萊納特（Pascalina Lehnert）注定要在他的人生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她被這位大使迷得神魂顛倒。“他個頭高大、身形單薄，他的臉龐特別瘦削和蒼白，”她寫下了自己對他的第一印象，“他的雙眼映出他的靈魂，賦予他一種獨特的美。”后來她覺得，帕切利一旦離開了她，就會在日常生活中束手無策。

1919年，帕切利經歷的一場精神創傷，影響了他此后的人生。那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混亂還沒有過去，一支蘇俄軍隊宣布暫時接管慕尼黑。一位共產黨司令官帶領著一隊倉促之下武裝起來配有步槍、手槍和手榴彈的民兵，敲響了教宗大使宅邸的大門。當受到驚嚇的工作人員打開大門的時候，指揮官表示他這次上門是要征用大使的豪華轎車。帕切利被喊下樓來應對這些闖入者。這次闖入已經令他受到驚嚇，而他們還要求征用汽車，這令他尤為難受，因為那輛梅賽德斯—奔馳是他的心頭肉，他將其愛稱為一輛“配有教宗徽章的華麗四輪馬車”。帕切利拒絕了指揮官的要求，表示這種行為乃是對國際法的公然冒犯，他還試圖向他們出示外交豁免權證書，然而這位指揮官（被帕切利形容為“那可怕的違法者”）不以為然，他帶領的一名民兵還用步槍對準了他的胸口。這些入侵者推開大使進入車庫，然而司機對汽車動了手腳，令其不能發動。受挫之后，他們告訴帕切利，如果他不能在明天修好這輛豪華轎車，他們就會逮捕大使館的所有人，并且炸掉這棟建筑。

關于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各方描述有極大的差異。在帕切利發給加斯帕里的報告中，他表示在這些人離開之后，他立即感染了極為嚴重的流感，而“腸胃不適”更是令他的身體狀況雪上加霜，于是他離開慕尼黑到一座療養院修養。但是事實似乎是，在這隊人馬離開之后，帕切利失去了鎮定，精神徹底崩潰。他急匆匆地離開了慕尼黑，在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家療養院里等待康復。第二天，當這隊人馬卷土重來的時候，他已經不在那里了。  [[18]](#_18__Noel_2008__pp__38_39)

出使德國期間，帕切利盡全力想要貫徹梵蒂岡自上而下的統治，然而這個國家的主教非常重視自身的權威，所以帕切利想要實現的絕非一件簡單的事情。在帕切利出使德國期間，胡貝特·沃爾夫（Hubert Wolf）神父是當地地位最高的權威之一，他曾這么形容帕切利在德國的大使生涯：“對于帕切利來說，這些主教簡直就是些戴著主教冠的輔祭，只有收到教宗的指令時才肯行動……羅馬想要的是那種唯唯諾諾、對圣父懷著孩童般虔誠的人。這也是帕切利眼中優秀主教的核心標準，他也盡最大的努力任命這樣的人物，并盡量撲滅德國教會的獨立意志。”  [[19]](#_19__Wolf_2010__p__74__De_Guo_Ji)

德國人的準時、可靠和職業道德都令帕切利印象深刻。盡管他到最后也沒能克服對飛行的恐懼，但是他對德國的技術實力非常稱道。

他在德國學到了許多經驗，其中影響他最深的便是德國人對猶太人不斷加深的敵視。在剛到慕尼黑的那段時間里，他曾記述過“嚴峻的沙俄—猶太革命暴行”，在駐守德國的十多年里，他經常提到那些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有猶太背景。  [[20]](#_20__Wolf_2010__pp__75_79)  在1919年的一份報告中，他將慕尼黑曇花一現的革命委員會的共產黨頭目描述為一個“來自俄國的年輕猶太人……蒼白而骯臟，雙眼毫無神采，聲音嘶啞而粗糲：是令人反感的那類人，卻有一副聰明狡猾的面容”。  [[21]](#_21__Ventresca_2013__p__55__1929)

\* \* \* \* \*

1929年12月，教宗將帕切利從柏林召回，并且將其晉升為樞機。兩個月后，帕切利又晉升國務卿。法國大使對他的形容如下：“高個頭、瘦身材、膚色暗沉、頭發灰白，一副苦行者的面容，卻有著生動的五官和仁慈的表情，他尊貴的小腦袋上戴著一頂紅色小瓜帽，肩頭披著紫色綢緞披肩，同色腰帶綁住的教士袍上掛著飾帶，釘著閃閃發光的紐扣，胸前掛著一個金色的十字架。”那位身材矮小、健壯、自稱是“牧羊人”的前國務卿，如今被一位又高又瘦、戴著眼鏡的羅馬貴族所代替。想象帕切利像前任那樣坐在山邊的樹蔭下，顯然非常困難了。  [[22]](#_22__Papin_1977__p__42)  帕切利在羅馬上流社會中頗受歡迎，而他體貼周到的做事方式也為他在駐梵蒂岡的外交官圈子中贏得了眾人的稱贊。他們尤其贊賞他總是能用對方的語言進行溝通的能力，帕切利精通法語、德語、英語和意大利語。  [[23]](#_23__Charles_Roux_1947__pp__74_7)

與鮮少在公開場合講話的加斯帕里不同，帕切利擁有出色的演講能力，并且代表庇護十一世出席了許多教會高層的國際集會。他的記憶能力也非常驚人。“只要我寫過或者用打字機打過一篇布道或者演講稿，”他曾經說過，“在演講的時候，那些文字就能從我的眼前掠過，仿佛我是照著文字朗讀一樣。”  [[24]](#_24__Charles_Roux_1947__p__77)  他堅持過問一切事務，即便是最微小的細節也要謹慎地查看，比如等待寄送的信封上的地址。每天晚上，他的副國務卿都要給他準備一疊需要他簽名的文件和書信，有時候甚至有一百多份。第二天早晨，他會把這些文件裝進兩個文件夾返回給他們。一個文件夾里是他簽過字的文檔，而另一個文件夾里的文檔都被他找出了錯誤，必須全部重打一遍。后來，助手們將第二個文件夾稱作“醫務室”，并且每天早晨都要祈禱里面不要有太多病號。  [[25]](#_25__Papin_1977__pp__42_43)

《紐約時報》的一位通訊員寫道，教宗庇護十一世“與其說嚴苛，不如說是習慣性地嚴肅……他很少笑，也很少放松”。  [[26]](#_26__McCormick_1957__p__75)  其他人則認為教宗顯得很“憂郁”。他之所以選擇帕切利，是因為他同樣是一個緘默冷淡的人，他和教宗一樣體現出自身職責的沉重。然而帕切利是個很懂得自控的人，他并沒有教宗的易怒，也不像他那樣容易激動。他還是一個特別念舊的人，他把帕斯卡利娜修女帶回了羅馬，打理他的梵蒂岡公寓。這一行為引得某些人側目，畢竟她年齡很輕，然而她一直陪伴他到他過世那一天。說他們兩人有點不清不白，恐怕有點無的放矢，更準確地說，她代替了他母親的角色，照顧他的起居。她確實跟很多母親一樣，對他有著過分的保護欲，而梵蒂岡將會有很多人嫉妒她對帕切利的影響力。  [[27]](#_27__Pa_Qie_Li_Yao_Qiu_Pa_Si_Qia)

這位新國務卿在上午6點15分起床，早餐前，他會同一群修女和神父一起做彌撒。然后，他將等候教宗的召喚，例行在上午同他會面。學究氣十足但不擅外交的教宗（他畢竟出身于小鎮的普通家庭）和具有國際視野、在政壇人脈很廣的羅馬人帕切利之間，漸漸發展出一段雖然正式卻又十分密切的關系。在他們上午的會面中，這位新國務卿會帶來一份日程表、一疊大使報告以及需要教宗查看的其他材料。

會面結束時，這位樞機的手里會捏著厚厚的一疊方形卡片，卡片上是他用微小、端正的字跡記下的教宗指令。  [[28]](#_28__You_Guan_Pa_Qie_Li__Ting_Xi)  國務卿那間巨大的辦公室位于使徒宮的二樓。帕切利先要路過建筑外面站崗的憲兵，彩色的制服和黑色毛皮高帽顯得他們仿佛是拿破侖時代的人。當帕切利接近自己的辦公室時，他會碰到身穿黑色教士服的私人秘書以及在門口站崗的貴族衛兵。然后，帕切利會喊來兩位副國務卿，讓他們查看教宗的指令，并安排一天的工作。

這位樞機每周會留出兩個上午，接見來自各國的三十名駐圣座大使。他們在一間富麗堂皇、墻面玫紅的大房間里等候，輪流同國務卿會面。在這樣的上午，國務卿辦公室隔壁的豪華房間里，時或能見到返回羅馬的教宗大使，出使東方尚未建交國家、留有長須卻身穿教士服飾的宗座代表以及其他教會高層人士。他們坐在十一張鑲金扶手椅上，中間是一張蓋著大紅色桌布的沉重議事桌。職位較低的神職人員（神父、修士和修女）則坐在相對簡易的扶手椅上，他們的位置被安排在通往國務卿辦公室的入口通道上。在同國務卿談話的時候，如果有領導哪個教廷分部的樞機不期而至，那么他們就必須先行退出。  [[29]](#_29__Charles__Roux_1947__pp__74)

在下午1點鐘用半個小時吃過午飯之后，帕切利會抽出一個小時的時間散步，有時候會去鮑格才別墅的花園，有時候則會去臺伯河畔。他的身邊常常伴有一位助手，手里拿著一疊需要國務卿查看的文件，像警察一樣跟在身后，保持著畢恭畢敬的距離。  [[30]](#_30__Tornielli_2007__p__164)  回到梵蒂岡后，國務卿還需接見許多人士，然后才有時間獨自查看當天的文件。晚上8點30分，他停下手頭的工作去吃晚飯，晚飯后去禮拜堂念誦玫瑰經，然后再度投入工作之中，直到深夜。  [[31]](#_31__Tornielli_2007__pp__164_165)

帕切利出任國務卿之初，梵蒂岡外交界普遍的感受是，他同和藹而又自信的加斯帕里相反。后者十分呆板，不愿意表達自己的想法，而前者總是彬彬有禮。不過每當有疑難問題出現時，帕切利總會回答說，他需要詢問教宗的意見。  [[32]](#_32__ACS__MI__PP__b__154__inform)  英國大使在1930年的年度報告中寫道：“這位國務卿的職責已經差不多被削減成一個辦事員了。”  [[33]](#_33__O__Forbes__Annual_Report_19)

法國主教兼學者阿爾弗雷德·博德里亞也記錄下了類似的印象，他認為加斯帕里樞機“病怏怏的，不太有影響力”。博德里亞回憶起1931年4月他同帕切利和教宗之間的一場尷尬會面，當時的庇護十一世正因為墨索里尼對公教進行會的攻擊而生氣。他最近聽聞有一位意大利樞機為一面法西斯旗幟祝福，憤怒的庇護問帕切利是否知情。當不安的帕切利回答說他知道這件事情時，教宗質問他是不是預先許可這位樞機做出此等行為。這番提問正中要害，帕切利只好承認他確實許可過，然后補充道：“圣父，我告訴過您，我沒法稱職地履行國務卿的職責。”  [[34]](#_34__Zhuan_Yin_Zi_Ventresca_2012)

然而教宗非常贊賞帕切利的聰明才智和外交手腕，在他任職初期，教宗對他的忠心也沒有絲毫懷疑。“我們的國務卿啊，”教宗曾經說過，“工作出色、努力、高效。”  [[35]](#_35__Martin_1996__pp__18_19)  帕切利的脾氣很能夠化解教宗沖動的性格，當教宗因為教會原則遭受攻擊而打算發火時，帕切利總是能夠為他踩下剎車。  [[36]](#_36__Zheng_Ru_Wo_Er_Fu__2010__p)

至于加斯帕里，他可沒打算讓帕切利輕易接過他的職務。“你竟然奪走了我的職位！”他向抵達羅馬不久的帕切利咆哮道，“你不應該接受的！他們利用了我，如今卻要趕我走！你會看明白，教宗是什么樣的人！”帕切利心里很煩，但還是盡全力讓加斯帕里冷靜下來，不過這番對話還是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記。  [[37]](#_37__ACS__MI__FP__Gasparri___inf)

這位前國務卿向一位樞機同儕抱怨說，在他和教宗最后一次會面中，教宗連一句感謝的話都沒有說。他不斷地重復道：“他們像轟一條狗一樣把我趕走了。”  [[38]](#_38__ACS__MI__FP__Gasparri___inf)  當他和另一位朋友談話時，他憤怒地質問教宗為什么對他如此惡劣。“讓這個圖書館館長成為教宗和最高統治者的人是我，而他就這樣把我趕走了，還不如一條癩皮狗！他要為此付出代價！相信我，他要為此付出代價！”  [[39]](#_39__ACS__MI__FP__Gasparri___inf)

加斯帕里還將矛頭對準了副國務卿皮扎爾多蒙席，控訴他在教宗面前說自己壞話，以此推銷歐金尼奧·帕切利。錯失晉升機會的切雷蒂樞機也責怪皮扎爾多，他認為帕切利奴顏婢膝、沒有決斷力，“不過是皮扎爾多的奴仆，像木偶一樣受他操控”。  [[40]](#_40__ACS__MI__FP__Cerretti___inf)

\* \* \* \* \*

帕切利拍馬上任正值《拉特蘭條約》簽訂一周年，他新官上任的喜悅馬上便被各種慶祝活動所淹沒。墨索里尼將大量禮物與榮譽贈予教宗以及他身邊的人，一度緩和了由其國會講話導致的緊張關系。周年慶當天，意大利大使送給教宗一件用白色布魯諾（Bruno）蕾絲織成的華美教士袍。教宗龍顏大悅，告訴德·維基，第二天他將身穿這件長袍在西斯廷教堂參加自己加冕教宗八周年的慶祝儀式。與此同時，國王將意大利最高獎章“圣天使報喜最高勛章”（Supreme Order of the Most Holy Annunciation）授予加斯帕里。  [[41]](#_41____Yi_Da_Li_Jiang_Bai_Se_Jia)

意大利駐梵蒂岡大使切薩雷·德·維基認為，帕切利是個容易合作的對象。德·維基在他的日記里寫道：“在我看來，這位樞機國務卿基本上是個好人，假以時日，我們將會達成完全的和諧，贏得雙方的真正支持。如果教宗不是那么焦慮，事情完全可以進展得更順利。”  [[42]](#_42__De_Vecchi_1998__pp__182_183)  一周半后，德·維基又抱怨教宗這人是多么難對付，他發現蓬皮利樞機也持有相同的觀點。“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真的博覽群書，”羅馬樞機副主教這么評價這位前任圖書館長，“但他顯然不懂得如何與人相處。”德·維基記錄下這番評語，并且補充道：“我每一天都親眼看到，即便是教宗身邊最親近的人，對他的感情也十分淡薄。”  [[43]](#_43__De_Vecchi_1998__pp__194_195)

一個月后，在周五慣常的會面中，德·維基和帕切利討論了歐洲當下劍拔弩張的形勢。德·維基觀察說：“我再次發現，他顯然偏向德國，而不喜歡法國。”這位意大利大使顯然清楚帕切利和德國保守派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他表示正是自己幫助法西斯政府和德國右翼勢力建立了良好關系。“我非常肯定，”德·維基寫道，“加斯帕里樞機在這個方面會給我們幫上大忙。而我希望，一方面通過訴諸他的愛國心，一方面通過利用他對德國的好感，我們最終能夠說服他。他對德國的情感真的非常深刻。”  [[44]](#_44__De_Vecchi_1998__pp__212_214)

德國很快就會進入每一個人的視野，因為在1930年9月的全國大選中，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收獲了超過六百萬張選票，成了這個國家的第二大政黨。德國處于嚴重的經濟蕭條之中，民眾大量失業，政府陷入癱瘓，社會黨和共產黨發起了強有力的社會運動，使得之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納粹黨當權）成了當前的現實。教宗將納粹運動視作德國天主教會面臨的異教威脅，他密切地關注著德國政壇的進展。

很快，各種跡象表明歐洲即將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但是令教宗對墨索里尼感到失望的并不是希特勒，而是發生在國內的事件。德·維基曾相信新任國務卿能夠約束情緒化的教宗，他的這份信念將受到極大的考驗。教宗可能已經后悔同意大利獨裁者做出的交易，在如今的形勢下，他甚至可能出言譴責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

[[1]](#filepos505237) 一位英國大使在回顧這些年時，表示經驗豐富的加斯帕里能夠非常良好地適應教宗“專橫的做事方式”，這令他感到非常驚訝。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 1935, R 402/402/22, in Hachey 1972, p. 286,section 133.

[[2]](#filepos506016) Ottaviani 1969, pp. 502–503.

[[3]](#filepos506615) Rhodes 1974, p. 40.

[[4]](#filepos507546) Morgan 1944, p. 137. 這個出名的句子（也印在《羅馬觀察報》報頭）改自《馬太福音》16：18，耶穌曾說“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5]](#filepos507957) ACS, MI, DAGRA, b. 113, 8 novembre 1926; ACS, MCPG, b. 155. 這些報告要謹慎閱讀，因為這位“梵蒂岡出名的線人”顯然非常討厭加斯帕里。根據秘密警察1927年12月的報告，加斯帕里同樣不信任塔基·文圖里，他指責耶穌會士是個兩面派，將梵蒂岡的機密信息透露給領袖；ACS, MI, DAGR, b. 1320。當所謂針對塔基·文圖里的假刺殺案引發騷動時，加斯帕里曾試圖令教宗同耶穌會士反目，他告訴教宗，這一事件是耶穌會士捏造出來的，背后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ACS, MI, DAGR, b. 1320, 5 settembre 1928.加斯帕里排擠塔基·文圖里的進一步證據還出現在1928年提交給墨索里尼的警方報告中，這份報告告訴領袖，加斯帕里反對讓耶穌會士插手羅馬問題的協商過程； ACS, CR, “Appunto,”關于皮尼亞泰利親王的報告，未標明日期。警方線人還報告說，卡恰蒙席和德·桑佩爾蒙席（分別是教宗的內務管理處總長典禮長和教宗管家）都將自己沒有晉升樞機的原因怪罪給加斯帕里，并且常常在教宗面前詆毀他。

[[6]](#filepos509225) 這封信刊于Martini 1960b, pp. 129–130。

[[7]](#filepos509527) ACS, MI, FP “Pietro Gasparri,” Città del Vaticano, 8 ottobre 1929. 近來，由于博爾貢吉尼被任命為教宗駐意大利大使，皮扎爾多也就取代了他原先的位置，被任命為非常教務部部長。

[[8]](#filepos509947) De Vecchi 1983, p. 144. 10月，當葡萄牙駐圣座大使來看望他時，加斯帕里透露說自己已經提出了引退申請，然而教宗還沒有接受它。他補充道，墨索里尼已經成為教宗心頭“可怕的夢魘”，他對公教進行會青年團體受到的壓迫非常憤怒，并將領袖稱作是“天主教青年的迫害者”。ACS, MI, FP “Pietro Gasparri,” Città del Vaticano, 23 ottobre 1929.

[[9]](#filepos510147) 早在1928年11月，《紐約時報》就曾經報道過，不僅僅有傳言稱加斯帕里將會卸任，而且取代他的會是歐金尼奧·帕切利。《據稱教宗大使將得到提拔》，NYT, November 19, 1928, p. 2。

[[10]](#filepos511237) Informatore n. 35, Rome, 2 ottobre 1929, in Fiorentino 1999, p. 238.

[[11]](#filepos511741) Coco 2009, pp. 176–177.在這輪決策中，教宗可能也考慮過其他因素。有傳言稱，當切雷蒂擔任駐巴黎大使的時候，他身邊常常有女人陪伴。

[[12]](#filepos512641) ACS, MI, FP “Cerretti,” informatore n. 35, Roma, 14 dicembre 1929.

[[13]](#filepos513321) 大使總結說，要找到一個與他相當的人來接任教宗駐柏林大使的職位可不容易。ASMAE, AISS, b. 4, n. 6361, Berlino, 10 dicembre 1929.

[[14]](#filepos513991) Coppa 2011, pp. 20–21; O’Shea 2011, p. 81.

[[15]](#filepos514544) Coppa 2011, p. 1; O’Shea 2011, pp. 74–80.

[[16]](#filepos515016) 沃爾夫（2010, p. 36）發掘出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在這些年間，帕切利同翁貝托·貝尼尼（Umberto Benigni）的情報網絡有關系，但是他非常機智，并沒有令“自己同貝尼尼及其‘情報系統’的關系暴露出來，由此保全了自己的名聲”。

[[17]](#filepos515805) Coppa 2011, p. 30.

[[18]](#filepos518372) Noel 2008, pp. 38–39.

[[19]](#filepos519246) Wolf 2010, p. 74. 德國教會許多不正統的做法是帕切利想要廢除掉的，比如說舉行大彌撒時，他們允許女性參加教堂唱詩班；Noel 2008, p. 61。

[[20]](#filepos519908) Wolf 2010, pp. 75–79。

[[21]](#filepos520303) Ventresca 2013, p. 55. 1929年9月，斯佩爾曼蒙席訪問倫敦；歐金尼奧·帕切利去火車站接他，并且安排了他的飲食起居。這位美國神父對他的魅力印象深刻，他在9月8日寄給母親的信件里寫道：“每十個人里面，有七個人覺得他最有可能是下一任圣父。”這個預見非常引人注目，因為當時已經五十二歲的帕切利甚至還不是樞機。Gannon 1962, pp. 66–67.

[[22]](#filepos521244) Papin 1977, p. 42.

[[23]](#filepos521641) Charles-Roux 1947, pp. 74–77.

[[24]](#filepos522190) Charles-Roux 1947, p. 77。

[[25]](#filepos522887) Papin 1977, pp. 42–43.

[[26]](#filepos523193) McCormick 1957, p. 75.

[[27]](#filepos524079) 帕切利要求帕斯卡利娜盡最大的努力，將他已經習慣的德國居住環境復制到羅馬。當他聽聞，德國主教為了恭賀他當選國務卿，打算給他送一個新的胸前十字架時，他便告訴他們，他更想要德國家具。然后帕斯卡利娜負責挑選了家具，并安排將它們從德國寄送過來。在這位新國務卿的辦公桌上，拜訪者將會看到一方小銀牌，上面刻著所有為這張辦公桌出錢的德國主教的姓名；Schad 2008, pp. 53, 62–65。

[[28]](#filepos524933) 有關帕切利“聽寫卡片”的更多內容，參見Pagano 2010。

[[29]](#filepos526310) Charles- Roux 1947, pp. 74–75, 197; Ottaviani 1969, pp. 502–504.

[[30]](#filepos526785) Tornielli 2007, p. 164.

[[31]](#filepos527149) Tornielli 2007, pp. 164–165。

[[32]](#filepos527599) ACS, MI, PP, b. 154, informatore n. 35 (=Bice Pupeschi), Città del Vaticano, 5 marzo1930.

[[33]](#filepos527841) O. Forbes, Annual Report 1930, February 13, 1931, C 1077/1077/22, in Hachey 1972, p.196, section 147.

[[34]](#filepos528715) 轉引自Ventresca 2012, p. 288。

[[35]](#filepos529084) Martin 1996, pp. 18–19.

[[36]](#filepos529358) 正如沃爾夫（2010, p. 138）所說：“教宗生性沖動易怒，有時會毫不顧忌地中傷他人。他的國務卿則是個完美的外交官，他總是能夠予以制衡，他主要致力于避免火上澆油。”

[[37]](#filepos529913) ACS, MI, FP “Gasparri,” informatore n. 42 (=Bianca D’Ambrosio), Roma, 21 gennaio1930.

[[38]](#filepos530267) ACS, MI, FP “Gasparri,”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15 febbraio 1930.

[[39]](#filepos530673) ACS, MI, FP “Gasparri,”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4 marzo 1930.

[[40]](#filepos531146) ACS, MI, FP “Cerretti,”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29 maggio 1930. 1929年秋天，斯佩爾曼蒙席在柏林給母親寫信，提到帕切利和皮扎爾多互為好友；參見Gannon 1962, pp. 66–67。梵蒂岡的一位警方線人在1929年秋天報告說：“皮扎爾多的手腕，令人想起黎塞留（Richelieu）樞機，他通過教宗的寬厚仁慈，用阿諛奉承贏得了教宗的青睞，可以用任何他愿意的方式操控教宗。”據這位線人所言，皮扎爾多深諳梵蒂岡的處世之道，通過“逢迎和陰險的狡猾”贏得了最重要的幾位樞機的保護；參見Fiorentino 1999, pp. 89, 224–225。然而他的手下并沒有完全臣服于他。1934年，梵蒂岡國務院所有主要人物都受邀前往羅馬大酒店，參加為來訪美國主教接風洗塵的午宴。皮扎爾多的首席助手多梅尼科·塔爾迪尼出席了午宴，而奧塔維亞尼和博爾貢吉尼也都在場。然而皮扎爾多卻沒有出現，他實際上忙于給公教進行會的一批教會助理做演講。塔爾迪尼寫道：“如果他不去做演講，而是參加午宴，可能對他和……這些公教進行會助理來說會更有好處。”塔爾迪尼日記，ca. 1934，轉引自Casula 1988；省略號為原文所有。

[[41]](#filepos532032) 《意大利將白色教士袍贈予教宗》，NYT, February 12, 1930, p. 5。

[[42]](#filepos532533) De Vecchi 1998, pp. 182–183 (30–31 maggio 1930).

[[43]](#filepos533087) De Vecchi 1998, pp. 194–195 (11 giugno 1930)。6月24日周二，墨索里尼在參議院會議上碰到了德·維基，并詢問最近在梵蒂岡的工作是否順利。大使回答說，總體來說一切順利，但是“教宗一如既往，還是非常難相處”。墨索里尼詢問了教宗的健康狀況，德·維基回答說，法國大使曾透露，教宗的前列腺給他造成了一定困擾，但是醫生認為即便動手術也很難改善病情。當墨索里尼表示自己為這個消息感到難過時，德·維基告訴他說，如果真是如此，教宗發生點變故也許不是壞事。墨索里尼顯然已經從報告中獲知教宗前列腺有恙，他沒有理會德·維基的那番議論，轉而詢問教宗是不是真的要求為他準備一個裝置，好讓他在西斯廷教堂的漫長儀式中能夠放松自己。De Vecchi 1998, pp.209–210。

[[44]](#filepos533897) De Vecchi 1998, pp. 212–214 (27 giugno 1930)。

## 第十二章 帕切利苦苦支撐

1931年5月末的一期《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如下新聞：《教宗肖像遭法西斯黨人踐踏》，稱“暴民將教宗貶作叛徒，并且燒毀圖書，而《羅馬觀察報》的銷售也遭到暴民的阻止”。  [[1]](#_1____Jiao_Zong_Xiao_Xiang_Zao_F)

公教進行會乃是教宗令意大利民眾再度皈依大公教的關鍵組織，而近幾個月來，它所面臨的壓力變得越來越大。公教進行會設有全國性質的領導機構，其平信徒主席由教宗委任。根據其組織結構，皮扎爾多蒙席是公教進行會的“教會助理”，但由于他是教宗的親信，于是教宗便通過他緊密地控制了這個組織。國家層面的指令會下達到每一個主教教區，而地方公教進行會組織通常由當地主教管轄，其委員會則包含平信徒。在教會影響力最為深厚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方教區為成年男性、成年女性、男孩、女孩分別設立了不同的公教進行會組織。

墨索里尼清楚公教進行會對庇護十一世來說有多么珍貴，但他決定要讓教宗看清自己的處境，好有點自知之明。意大利的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刊登控訴文章，指責公教進行會藏納人民黨活動分子以及政府的其他敵人，數百名法西斯黨大學生受到這些文章的煽動，砸壞了羅馬大學公教進行會中心的窗戶。還有人用石頭砸開《公教文明》所在大樓的窗戶，破窗而入，將書本從窗戶里拋擲出來。他們一邊高喊著“打倒神父！打倒教宗！”，一邊將庇護十一世的肖像丟到大馬路上。  [[2]](#_2__A_Na_Er_Duo__Ke_Te_Xi____Fa)

教宗無比憤怒，命令帕切利暫停同意大利大使的例行會晤。  [[3]](#_3__ASV__AESS__b__430a__fasc__34)  然而墨索里尼的自負和火氣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已經受夠了來自教宗的壓力，于是下令關停意大利境內所有的公教進行會青年團體。  [[4]](#_4__De_Vecchi_1998__p__225__Zai)

當庇護十一世接見羅馬尼亞大使時，后者犯了一個錯誤，他建議教宗安排一位值得信賴的調停人，來處理他和墨索里尼之間的分歧問題，由此向全世界示范該如何和平地解決爭端。教宗毫不客氣地反駁說，他的權能由天主授予，俗世的臨時統治者是不能夠和他相比的。“我已經做好應對任何情況的準備，”他說道，“我相信我的事業乃是我的使命，我永遠都不會放棄，永遠，永遠，永遠都不會放棄！”

大使回憶道，庇護十一世“變得越來越激動，用雙手拍著桌子。最后他站起身來，幾乎用他最大的聲音喊出了對墨索里尼的不滿。當時的他氣喘吁吁，憤怒的神情溢于言表，可是突然，他大約是意識到自己這番激動的講話給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于是他開始控制言行，又坐了下來。盡管仍舊氣喘吁吁，他還是補充道，‘但是大使先生，如你所見，我仍舊保持冷靜’”。  [[5]](#_5__Falconi_1967__pp__201_202)

《紐約時報》6月1日的頭條新聞報道了墨索里尼關停公教進行會青年團體的決定，并認為墨索里尼和教宗的關系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意大利共有一萬五千多個這樣的團體，涉及的成員超過五十萬人，而它們都將在接下來的一天里遭到關停。  [[6]](#_6__A_Na_Er_Duo__Ke_Te_Xi____Bi)  6月4日即將迎來基督圣體圣血節，為了表示抗議，庇護十一世禁止意大利教會為大眾舉行傳統的游行活動。  [[7]](#_7__Dang_Yi_Da_Li_Nan_Bu_De_Ge_B)

諸位樞機擔心沖突會走向失控。他們認為新任國務卿太過孱弱，無法阻止災難結局的到來，于是他們聯絡了彼得羅·加斯帕里，提議由他出面同墨索里尼進行會晤。自危機伊始，教廷中便滋生出不滿情緒，因為教宗完全沒有征求他們的意見；與此同時，他們認為帕切利已經手足無措了，這種不滿情緒也就愈演愈烈。加斯帕里認為教宗缺乏外交意識，庇護以為自己能夠用對待各位大主教的方法（“責罵比討論更有效”）對待墨索里尼。  [[8]](#_8__ASMAE__AISS__b__2__fasc__6)  加斯帕里還沒有從退位的失落中走出來，如今當然愿意出面調停，不過他告訴諸位樞機，只有得到教宗的許可，他才會答應這份差事。然而教宗拒絕了。  [[9]](#_9__Martini_1960a__pp__578_579)

4月就已經有謠言稱帕切利將要引退。  [[10]](#_10__Coco_2009__pp__214_215)  5月下旬，法西斯日報《羅馬人報》（Il Popolo di Roma ）的報道稱教宗計劃解除他的職務。  [[11]](#_11__Gai_Bao_Huan_Sheng_Cheng_Yo)  6月初，領導宗教裁判所的多納托·斯巴雷蒂（Donato Sbarretti）樞機告訴教宗，裁判所的樞機一致認為代表教廷與政府展開協商的人應該是加斯帕里，而不是帕切利。帕切利受到了孤立。那些親法西斯黨的樞機認為他太過孱弱，沒法讓固執的教宗退讓；而反法西斯派系又認為他過于迫切地想要保護梵蒂岡與墨索里尼的同盟關系。  [[12]](#_12__Coco_2009__pp__222__242_243)

6月9日，切薩雷·德·維基面見帕切利，并且心滿意足地發現他“完全站在我們這邊”。  [[13]](#_13__Ta_Huan_Jin_Yi_Bu_Shuo_Dao)  教宗曾告誡帕切利，不要同意大利大使談論這場危機，然而帕切利沮喪地將教宗的這番指示透露給法國駐圣座大使，并表示教宗的不信任令他感到深深的失望。教宗在應對這場危機時如此徹底地將國務卿排除在外，這番做派也令法國大使感到訝異。帕切利大約意識到自己不應該這么多嘴，于是便懇求法國大使替他保守秘密。  [[14]](#_14__MAESI__vol__266__80_81__10)

梵蒂岡內部的意見分裂也傳到了意大利外交部部長迪諾·格蘭迪的耳中，他希望對此加以利用，于是敦促墨索里尼進一步施加壓力。他建議領袖召回意大利大使，并威脅廢除宗教事務協約。“我堅信，”他寫道，“如果我們把矛頭僅僅對準教宗，一面宣稱我們是大公教最為熱忱的支持者，一面指出教宗作為大公教的首腦有頗多失職之處，我們就能令圣座陷入尷尬難堪的境地。”  [[15]](#_15__Coco_2009__pp__241_242)

6月晚些時候，德·維基的副手、意大利駐圣座代辦朱塞佩·塔拉莫（Guiseppe Talamo）前往帕切利的辦公室與他會面。塔拉莫形容道，這位國務卿“既油腔滑調又有些尷尬”地告訴他，教宗正準備就這場沖突發表聲明。帕切利還補充道，他希望這番聲明不致讓情況繼續惡化下去。  [[16]](#_16__DDI__series_7__vol__10__n)

實際上，教宗決定要用更為嚴厲的話語譴責法西斯黨，并且準備了長篇通諭，目標直指領袖。他擔心法西斯黨審查官會阻礙其傳播，于是便將復件交給美國神父弗朗西斯·斯佩爾曼，由他偷偷地帶過法國邊境。這篇題作《我們不需要》（Non abbiamo bisogno）的通諭先是刊登在國外的報紙上，然后才在7月初登上《羅馬觀察報》的。  [[17]](#_17__Zhe_Yi_Qi_Bao_Zhi_De_Fa_Xin)

教宗在這篇通諭中否認意大利公教進行會同反法西斯運動有任何瓜葛，并且在青年教育方面，他反對將教會的正當職責局限于提供宗教指導。“對于一位天主教徒而言，遵奉教條意味著教會以及教宗不能佯裝給自己設限，使得我們僅僅從事宗教的外在實踐（彌撒和圣禮），而將余下的教育拱手讓給國家。”

盡管教宗發起猛攻，但仍然小心翼翼地將好法西斯（承認教會的權能并且遵從教會的訓誡）區別于壞法西斯。教宗一邊對國內天主教會受到的迫害提出抗議，一邊又表示：“我們相信，我們既為[法西斯]黨，也為政府做了一件好事。”  [[18]](#_18__Zhuan_Yin_Zi_Kan_Deng_Zai_C)  他先是譴責了那些壞法西斯黨人，這些人將法西斯引入歧途，變成了崇拜國家的異教，最后他又以和解的話語收尾：“盡管說了這么多，但我們從未說過要譴責黨和政府。我們的目的是指出黨的程序和活動中所有背離天主教教義和天主教實踐的內容，并且對其提出譴責。”  [[19]](#_19__Jiao_Zong_Bi_Hu_Shi_Yi_Shi)

教宗還有其他手段，可以進一步給墨索里尼施加壓力。米蘭新火車站盛大的落成儀式原定于7月1日舉行，國王將出面主持這場儀式。由于近來的沖突，米蘭大主教向公眾透露消息，表示自己不會參加儀式。國王不肯忍受由低階神職人員陪侍的窘境，于是也退出了這場儀式。近些年來，法西斯政府主持活動卻沒有受到高階神職人員的祝福，這算是第一次。  [[20]](#_20__Garzonio_1996__pp__58_59)

不過令人驚奇的是，教宗的這篇通諭并沒有令沖突愈演愈烈，反倒標志著沖突開始落幕。發布通諭之后，教宗已然發泄完怒火。如今的他似乎已經做好準備，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拋到腦后。也許是他的顧問終于將他說服，令他明白需要同墨索里尼和解，又或許是他們不斷的游說終于令他筋疲力盡。這場沖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因為雙方的利害關系已經太深了。  [[21]](#_21__Mo_Suo_Li_Ni_Tong_Yang_Po_Q)

在7月中旬的一場儀式上，教宗祈禱奇跡降臨，“幫助那些盲目的人”。  [[22]](#_22__Fa_Guo_Zhu_Fan_Di_Gang_Dai)  他命塔基·文圖里互通有無，幫助雙方走出僵局。墨索里尼告訴這位耶穌會特使，他也迫切想要結束這場沖突。  [[23]](#_23__ASV__AESI__pos__849__vol__3)  塔基·文圖里趕忙將這些振奮人心的話語報告給梵蒂岡。“如果我沒有領會錯的話，”他向帕切利寫道，“圣父上周日做的祈禱已經開始應驗了。天主點亮了圣光，令盲目的人得以看見！”  [[24]](#_24__ASV__AESI__pos__849__vol__3)

教宗倚仗這位耶穌會特使，同獨裁者談妥了解決沖突的辦法。7月25日，他明確地提出了解決爭端的兩個條件。  [[25]](#_25__ACS__CR__b__68__Tacchi_Vent)  首先，他希望墨索里尼承認，教會在兒童教育方面占據重要的地位，并且有權為了“正當的宗教目標和神圣目標”組建公教進行會團體。當天晚些時候，當耶穌會士面見領袖的時候，墨索里尼表示可以答應這項請求。帶來分歧的是教宗的第二個條件。庇護十一世不僅要求墨索里尼重新開放公教進行會青年團體，而且要求他承認，關停這些團體的命令違背了法律。對于這樣的要求，領袖不愿意做出讓步。他表示要求他道歉等同于羞辱他。

塔基·文圖里深信除非教宗做出讓步，否則這場危機就無法結束，于是他向加斯帕里尋求幫助。這兩人向來走得不太近，如今卻背負起共同的使命。

在這場會面之后，加斯帕里致信帕切利。“我現在懷著極端憂慮的心情給你寫這封信”，他這么告訴帕切利，還給自己的這行話加了下劃線。加斯帕里認為，墨索里尼對教宗做出的讓步已經“非常巨大”。僅僅為了“程序”（即要求領袖做出道歉）問題，教宗“要繼續譴責法西斯，并且終止雙方的宗教事務協約”，這簡直荒謬透頂。身為國務卿，帕切利現在應該站出來說服教宗改變主意。  [[26]](#_26__Jia_Si_Pa_Li_Xian_Ran_Ren_W)

“根據最近幾周到處瘋傳的謠言，”法國駐梵蒂岡代辦在報告里寫道，“教會正準備同意大利政府繼續商談，而帕切利樞機則被教宗排擠在外……本次商談將僅僅遵從教宗的意志，他不會采納任何人的建議。”  [[27]](#_27__You_Qu_De_Shi__Fa_Guo_Da_Sh)

最后教宗做出了讓步。8月中旬，在教宗和墨索里尼之間反復奔波后，塔基·文圖里開始起草雙方的協約，并由雙方在9月2日簽署。  [[28]](#_28__Mo_Suo_Li_Ni_Si_Ren_Wen_Jia)  這份協約規定公教進行會的組織形式須以主教教區為基礎，由當地主教直接管轄。任何公開批評政府的人都不得擔任該組織的領導人，并且公教進行會的活動只能限定在宗教領域內。  [[29]](#_29____Sheng_Zuo_He_Yi_Da_Li_Zhe)

教宗不得不做出讓步。他雖已發表了一篇出人意料的通諭，希望將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召至他的麾下，然而這些年來，無論是教宗抑或教區神父，都教導這些天主教信徒：墨索里尼是天主派來的人。在這場紛爭中，教徒已經失去了方向，他們希望一切能夠盡快塵埃落定。教宗發現自己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如今的他只好收回部分要求。  [[30]](#_30__De_Felice_1974__p__263)

并非所有的意大利神父和主教都對這份協約感到滿意。流放到倫敦的人民黨創始人斯圖爾佐神父認為，教宗想要維系與政府的同盟關系，這一點并未令他吃驚，但是教宗簽訂的協約卻為墨索里尼帶來了一場徹底的勝利，此情此景令人不忍直視。另一位流亡海外的人民黨前主席更直言不諱：“教宗屈服了，他退卻了，害怕了。他向法西斯摩洛神  [[31]](#_31__Gu_Dai_Jia_Nan_Ren_Suo_Ji_B)  的祭壇彎腰鞠躬……自從9月2日簽訂不祥的協約后，意大利國內外便風行這樣的說法。”  [[32]](#_32__Fu_Lang_Qie_Si_Ke__Fei_La_L)

一些樞機也發出怨言，抱怨教會進一步受限。據法國代辦所言，他們認為“是帕切利樞機的綏靖傾向掌控了整個協商的過程”。法國大使猜測教宗年事已高，一開始的怒火平息后，最終被帕切利和周圍的其他人消磨了最初的斗志。  [[33]](#_33__MAEI__vol__266__153_155__Ge)  這種看法包含一定的真實性，盡管在這個過程中起重大作用的人是塔基·文圖里，而非帕切利。

一向固執且堅守原則的教宗突然就向壓力屈服，這令各國駐圣座大使感到驚訝。那篇既譴責法西斯政府壟斷青年教育，又對國家崇拜提出警告的通諭才發表了兩個月，這份協約卻對此只字不提；此外它也不包括教宗長久以來就想從墨索里尼那里求得的東西，即為天主教團體遭受的暴行以及教宗受到的侮辱做出道歉。  [[34]](#_34__MAEI__vol__266__167_169__Ge)

\* \* \* \* \*

在墨索里尼和塔基·文圖里簽署最終協約的第二天，庇護十一世召來大使，為沒有讓他參與這輪協商表示道歉。他令博爾貢吉尼做好同領袖會面的安排，如今是時候令雙方的關系重回正常的軌道了。

“你最近過得怎么樣？”幾天之后，墨索里尼微笑著和他打招呼，“暴風雨過后總是特別平靜。”

“這也是我前來拜訪的原因，”大使回答道，“我以為，既然兩邊已經復歸和平，那么現在正應該同閣下重新建立聯系。”

“請拭目以待，”獨裁者說完又補充了一句解釋，“一段漫長的平靜期將從現在開始。”

“贊美天主！”

“來，我們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清楚。”領袖指著桌上一堆由塔基·文圖里遞交的紙條，上面寫著教宗提出的要求。有很多書要禁，還有新教徒的傳教活動要撲滅。“我會立即下達命令，執行你們想要得到的一切。”

大使另有一事相求。盡管領袖已經主持政府長達十年，但他仍未晉見教宗。博爾貢吉尼說：“教宗想讓我告訴您，您是梵蒂岡最受歡迎的客人。”自雙方簽訂《拉特蘭條約》之后，教宗就一直希望領袖能夠來晉見他，但是這位獨裁者卻始終拖延了事，不斷找借口推遲行程。梵蒂岡到處都是神父，他肯定會不自在，而其富麗堂皇定會讓他顯得渺小，也就愈發令他不自在。贏得最近的勝利之后，墨索里尼感到自己的優勢地位已經穩固，在教宗面前也不會顯得俯首帖耳。如今，危機已經過去，他深信偉大的事業即將來臨。  [[35]](#_35__ASV__ANI__pos__23__fasc__3)

[[1]](#filepos549363) 《教宗肖像遭法西斯黨人踐踏；梵蒂岡進入警戒狀態》，NYT, May 28, 1931, p. 1。第二天，《紐約時報》繼續在頭版發表文章，報道此次危機，文章題作《墨索里尼制止反天主教暴動》。

[[2]](#filepos550927) 阿納爾多·科特西，《法西斯黨人控訴天主教干涉世俗事務》，NYT, May 27, 1931, p. 1;Casella 2010, p. 137。

[[3]](#filepos551151) ASV, AESS, b. 430a, fasc. 342, 6. 37, 23 maggio 1931.教宗心頭還有另一件煩心事。5月初，帕切利告訴教宗，赫爾曼·戈林即將訪問羅馬，他想趁這個機會拜見教宗。當時，戈林是納粹議會代表團的團長。教宗拒絕了這一請求，并告誡帕切利，他也不得同戈林會面，然而帕切利仍然安排了副國務卿皮扎爾多與戈林會面。Wolf 2010, pp. 148–149.

[[4]](#filepos551439) De Vecchi 1998, p. 225. 在接下來的幾天里，來自各地省督的報告記錄了公教進行會青年團體被關停的情況，以及來自地方主教的抗議聲音。ACS, CR, b. 33.

[[5]](#filepos552640) Falconi 1967, pp. 201–202.

[[6]](#filepos553103) 阿納爾多·科特西，《庇護十一世控訴法西斯黨的憎恨和暴力；博洛尼亞發生四起爆炸事件》，NYT, June 1, 1931, p. 1。后來，梵蒂岡日報報道說，被關停的公教進行會男性青年組織有五千多個，而被關停的女性組織則高達一萬個，此舉一共影響了八十萬人。《爭議旁記》，OR, 10 luglio1931, p. 1。

[[7]](#filepos553357) 當意大利南部的個別教區不顧教宗的命令，仍舊舉行慶祝儀式時，教宗命其神父中斷教會的所有公共職能，直到獲得進一步的指示。阿納爾多·科特西，《教宗變更公教進行會地方領導人，并懲罰了數個教區》，NYT, June 11, 1931, p. 1。

[[8]](#filepos554078) ASMAE, AISS, b. 2, fasc. 6, Il segretario particolare di S.E. Il Capo del Governo a De Vecchi, 13 aprile 1931. 配套的“前期記錄”日期為1931年4月9日。

[[9]](#filepos554393) Martini 1960a, pp. 578–579.

[[10]](#filepos554588) Coco 2009, pp. 214–215.

[[11]](#filepos554825) 該報還聲稱有數位樞機反對教宗的一些近期行動，它列出了四位樞機的姓名，其中便有彼得羅·加斯帕里。教宗對此十分憤怒。他讓塔爾迪尼蒙席立即乘車拜訪四位樞機。每個人都必須公開否認該報的聲明，并刊登在梵蒂岡的報紙上。加斯帕里樞機寫道：“我一直都擁護教宗，并將永遠擁護教宗。”Coco 2009, pp. 217–218.

[[12]](#filepos555370) Coco 2009, pp. 222, 242–243。

[[13]](#filepos555631) 他還進一步說道：“顯然，會晤時同樣在場的博爾貢吉尼蒙席站在另一邊。”

[[14]](#filepos556175) MAESI, vol. 266, 80–81, 10 juillet 1931.

[[15]](#filepos556822) Coco 2009, pp. 241–242.

[[16]](#filepos557331) DDI, series 7, vol. 10, n. 322.“我不希望發生這樣的狀況，”德·維基（1998, pp. 267–268，1931年7月11日）后來引用了帕切利就教宗與墨索里尼之間的危機升級所說的話，“那是我上級的意愿。”迪諾·格蘭迪的日記提到帕切利和塔拉莫進行了會面。Coco 2009, p. 239.

[[17]](#filepos557908) 這一期報紙的發行比平日早了五個小時，當政府官員發覺這期報紙刊登了通諭的時候，報紙已經賣得差不多了，他們只能沒收余下的一小部分；Binchy 1970, pp. 522–523。賓奇指出數百份通諭復本通過一架飛機偷偷運到巴黎，其飛行員正是未來的紐約大主教弗朗西斯·斯佩爾曼。我們尚不清楚賓奇何以認為這架飛機的駕駛員是斯佩爾曼，因為這種可能性非常低。摩根（1939, pp. 186–187）就此事采訪了斯佩爾曼。他的描述確證了教宗曾經將斯佩爾曼喊到他的書房，將通諭的復本交給他，并指示他確保讓這份通諭在國外刊行，而斯佩爾曼也確實將它們帶過法國邊境，帶到巴黎，然后將這些復本交給美國的各家通訊社。德·維基的日記（1998, p. 257）指出，據皮扎爾多蒙席所言，“教宗近來非常痛苦，他吃不下東西，也很少睡覺；每天都生活在焦慮和擔憂中”。

[[18]](#filepos558800) 轉引自刊登在CC, 9 luglio 1931 III, pp. 97–122上的通諭。

[[19]](#filepos559275) 教宗庇護十一世通諭《我們不需要》的英語譯文可以參見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29061931\_non-abbiamo-bisogno\_en.html.這篇譯文漏掉了原文中包含的“也為政府”，而我已經在正文中將它補充回去。方括號內起說明作用的“法西斯”出現在梵蒂岡官方的譯文中。有關教宗努力澄清他并不反對法西斯政府，另參見Moro 2008, p. 423。

[[20]](#filepos559889) Garzonio 1996, pp. 58–59.

[[21]](#filepos560510) 墨索里尼同樣迫切地想要把這場爭執拋到身后。除了個別情況外，法西斯報紙基本上以克制和敬重的口吻回應了這篇通諭。《法西斯勞動報》是法西斯黨極端反教會的一派，它就屬于例外情況，控訴教宗為國際反法西斯運動服務。它還為一則廣為傳播的謠言背書，認為這場危機源于皮扎爾多蒙席想要取代帕切利國務卿一職的野心。依據這種觀點，皮扎爾多（負責監督公教進行會的梵蒂岡官員）與《羅馬觀察報》主編朱塞佩·達拉·托雷狼狽為奸，他們代表了反法西斯力量，而帕切利則擁護教宗和法西斯政府的合作關系；MAESI, vol.266, ff. 64–66。

[[22]](#filepos560751) 法國駐梵蒂岡代辦讓蒂（Gentil）當時在場，他向法國外交部長報告了這場儀式的情況，收錄于MAEI, vol. 266, 110–112, 20 juillet 1931。

[[23]](#filepos561012) ASV, AESI, pos. 849, vol. 3, fasc. 519, f. 79r. 7月中旬，雙方都在努力結束這場爭執。在7月17日凌晨2點鐘，一枚炸彈在梵蒂岡引爆，驚醒了梵蒂岡城里的許多人（盡管教宗沒有被驚醒）以及羅馬靠近梵蒂岡區域的數千人。據說炸彈爆炸時，聽到爆炸聲的帕切利仍然在辦公室工作。爆炸前夕，梵蒂岡的一位侍者曾在圣彼得大教堂中發現了這枚藏在布道壇里的簡易炸彈，教宗憲兵檢查了這個金屬圓筒，但由于沒聽到嘀嗒聲，便以為這可能是個惡作劇。在決定怎么處置這枚“假”炸彈之前，為了保險起見，他們將它放在梵蒂岡內的一處林地上。它在那里發生爆炸，將樹木連根拔起，炸到二十碼外的地方。法西斯媒體將這枚炸彈歸咎給反法西斯人士，認為他們想要令政府和梵蒂岡之間的沖突進一步惡化，梵蒂岡則沒有反對這個觀點。阿納爾多·科特西，《炸彈在夜間爆炸，驚醒梵蒂岡》，NYT, July 18, 1931, p.1。

[[24]](#filepos561375) ASV, AESI, pos. 849, vol. 3, fasc. 519, 6. 80r–80v.

[[25]](#filepos561666) ACS, CR, b. 68,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5 luglio 1931.前一天，教宗已經告訴帕切利，他通過塔基·文圖里給墨索里尼傳達了信息，提醒領袖教宗非常克制，沒有譴責他本人以及法西斯本身，他只想從僵局中尋求一條令他滿意的出路。教宗告訴帕切利，即便在共濟會當道的法國，那里的天主教徒也比在意大利享有更多的自由。ASV,APAC, b. 430a, fasc. 343, ff. 21.

[[26]](#filepos563134) 加斯帕里顯然認為他的繼任者無法勝任這項任務，于是還在信中附了一張字條，幫助他游說教宗。上面寫著：“最有福的神父，我是您最謙卑的子孫，來到您面前，希望讓您知道我良知的感受。我們同墨索里尼的協商陷入僵局，這令我感到極度難過。圣父曾經說過，他不愿意令任何人受辱，在我看來他可以像慈父一般命令塔基·文圖里神父不要再堅持那個不可欠缺之條件，您照我這張字條說的去做，就能夠一勞永逸地結束這場沖突。” ASV, AESI, pos.849, vol. 3, fasc. 519, 6. 91r–92v. 加斯帕里一方面試圖讓教宗對自己提出的要求松口，另一方面也自作主張地向墨索里尼提出了不少建議。7月14日，加斯帕里自稱是領袖的“朋友和崇拜者”（他把這幾個字寫在了署名的前面），他請求墨索里尼不要再給沖突煽風點火。ASV, AESS, pos. 515, fasc. 530, p. 83r, Gasparri a Mussolini, 14 luglio 1931.然后，在一封明顯是他見過塔基·文圖里之后寫給領袖的信中，加斯帕里告訴墨索里尼他剛剛獲知耶穌會士接下來肩負著什么樣的任務。他自稱是“閣下的崇拜者和朋友”，懇求墨索里尼抓住這個新的機會結束教會和政府之間的沖突。ASV, AESS, pos.515, fasc.530, pp. 80r–80v, Gasparri a Mussolini, n.d.多梅尼科·塔爾迪尼的注釋表明這封信的日期是7月末或者8月初，至于它有沒有被寄送給墨索里尼，我們則沒有證據。

[[27]](#filepos563557) 有趣的是，法國大使認為，帕切利難以對教宗施加影響，是因為教宗對他的兄長不滿。宗教事務協約沒有預見政府會對公教進行會采取行動，也就沒有列出明確的條款來保護這個組織，教宗將這一疏忽怪罪到弗朗切斯科·帕切利頭上。MAEI, vol. 266, 122–124, 6 août 1931, Gentil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還有四處流傳的謠言稱這場公教進行會的危機一結束，國務卿的位置馬上就要換人。《梵蒂岡有人稱帕切利很快就要出局》，NYT, August 13, 1931, p. 8。

[[28]](#filepos563874) 墨索里尼私人文件中這份協約的打印版將“庇護十一世”稱作“庇護九世”，也許只是一個無心之失。ACS, CR, b. 68, Roma, 2 settembre 1931.

[[29]](#filepos564229) 《圣座和意大利政府就公教進行會簽訂協約》，CC 1931 III, pp.549–552。協約的第二段照顧的是墨索里尼的反對意見，許多公教進行會團體與特定的行業有關，他們有可能會跟法西斯行業協會形成競爭關系，由此破壞了該協會對勞動力組織的壟斷。這些行業公教進行會團體必須將他們的活動限制在宗教范圍內，并且全力支持本行業的法西斯政府行業組織。最后一點規定地方公教進行會團體不得參與任何體育活動，這并不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因為體育活動是將男孩吸引入地方公教進行會團體的重要籌碼；參見De Felice 1974, p. 275。

[[30]](#filepos564817) De Felice 1974, p. 263.

[[31]](#filepos565417) 古代迦南人所祭拜的神。父母把子女作為祭品獻上，放到火里焚燒，祈求神明保佑。——編注

[[32]](#filepos565648) 弗朗切斯科·費拉里（Francesco Ferrari），轉引自Malgeri 1994, p. 57。意大利最權威的法西斯史學家也得出了相近的結論。“在我們看來，”倫佐·德·費利切（1974, pp. 270–271）寫道，“在當時，這一協約對教會來說毫無疑問是一場失利。”

[[33]](#filepos566098) MAEI, vol. 266, 153–155, Gentil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8 septembre 1931.不過從避暑歸來之后，豐特奈在報告里寫道，在9月3日，教宗召集十一位樞機開了一場秘密會議，并將加斯帕里從山區避暑地召回到羅馬，而這十一位樞機中，有十位對這份協約表示支持。MAEI, vol. 266, 174–180, Fontena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29 septembre 1931.考慮到教宗強勢的個性，以及當一位樞機惹怒教宗時將引起多么嚴重的后果，我們尚不明確這一“站隊”結果能夠揭露出多少真相。

[[34]](#filepos566787) MAEI, vol. 266, 167–169, Gentil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7 septembre 1931.

[[35]](#filepos568860) ASV, ANI, pos. 23, fasc. 3, 6. 46r–48r, Borgongini- Duca, handwritten memorandum,“Dopo il conflitto,” n.d.

## 第十三章 墨索里尼永遠正確

公教進行會危機解除之后，教會與法西斯政府之間的聯系變得愈發緊密，雙方的合作也更加深入和廣泛。墨索里尼如今受到意大利天主教神父的熱忱支持，擁有了一副幾近神明的形象。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1931年的公教進行會紛爭代表了教宗對法西斯的反抗，但如果我們細查這個組織在20世紀30年代的實際作為，就會明白這種觀點有多么荒謬。教宗試圖通過公教進行會令意大利人民全部皈依天主教，在這個過程中，法西斯政府并不是攔路虎，而是不可或缺的盟友。如果公教進行會不和法西斯當局密切合作，那么它就不可能取得成功。該組織的平信徒主席奧古斯托·奇里亞奇（Augusto Ciriaci）是領袖的狂熱擁躉；德·維基告訴墨索里尼，此人“差不多算是我安插在梵蒂岡的臥底，因此也是您的臥底”。  [[1]](#_1__De_Vecchi_to_Mussolini__Janu)

庇護十一世將公教進行會的成員看作士兵，為他發起的“道德戰役”沖鋒陷陣。在每一個主教教區，公教進行會都設立了“道德秘書處”，用于鑒定一切不道德活動的跡象，并予以揭發。它列出了許多應當被抵制的戲劇和電影清單，而其成員則不斷地騷擾警方，令他們叫停這些戲劇和電影的演出和播放。公教進行會成員還被告知，要徹底探訪鄉鎮的每個角落，尋找那些冒犯教會的事物和活動，并向當局檢舉揭發。  [[2]](#_2__Moro_1981__pp__289_291_Mo_Lu)

在道德衰退的諸多跡象中，最令教宗感到心煩的莫過于女性的大膽著裝。從1926年起，塔基·文圖里便開始與警方高層頻繁接觸，試圖讓他們禁止意大利女性著裝露腿、露背以及胸部半露。  [[3]](#_3__Fa_Xi_Si_Mei_Ti_Zhu_Yi_Ci_Sh)  那年6月，內務部部長對教會的施壓做出反饋，命令各省省督禁止女性穿著過分暴露的泳衣。部長還下達命令，禁止人們在跳舞時穿著泳衣（這一行為尤其令教宗反感）。  [[4]](#_4__Zhe_Xie_Kong_Zhi_Cuo_Shi_Bei)

教宗對禁止女性在公眾場合裸露身體一事關心到什么程度呢？即便在簽署《拉特蘭條約》之前最為緊張的那幾日，當教宗聽聞有幾位衣著暴露的舞者現身羅馬，他也立即派遣塔基·文圖里前去敦促領袖處理這起“傷風敗俗”的事情。

在這一歷史性條約簽署的八天前，塔基·文圖里面見了墨索里尼。他首先告訴領袖，教宗對他禁止羅馬一切艷舞表演的舉措感到滿意，但是這些糟粕剛剛被從前門清掃出去，就又從窗戶溜了回來。電影院業主發現，如果他們雇傭女孩子在幕間休息時搞點跳舞表演，就能吸引到更多顧客。耶穌會士告訴墨索里尼，這些年輕女性的“穿著就像夏天時的夏娃，除了私處上纏著一條薄薄的布條或腰帶外，幾乎一絲不掛；她們只會刺激色欲的骯臟念想，而沒有任何抑制作用”。他希望有一天，政府能夠下令取締這一可怕的表演，而他就能夠向教宗傳達這一喜訊。  [[5]](#_5__ACS__CR__b__68__Tacchi_Ventu)

教宗反對女性以任何形式在公眾場合裸露肉體，而其中有一種形式尤其令他頭疼，那便是女孩子們參加體育競賽。1928年，當他得知法西斯黨計劃在羅馬舉辦這樣的賽事時，梵蒂岡日報以及《公教文明》都刊登了他譴責此事的公開信。他批評道，即便是在異教時代的羅馬，這等敗壞女性優雅的荒謬事都聞所未聞。  [[6]](#_6____Gong_Jiao_Wen_Ming_____192)

1930年初，國家法西斯青年組織主席回應了教宗一方施加的壓力，發布了女生體育教育的全新指導方針。這一群體的目標不再是鍛煉體育技能，而是確保“這些未來的母親學會指導她們的孩子接受體育教育所需的必要知識”。《公教文明》贊揚了這一指導方針，將其樹立為楷模，表明法西斯政府能夠多么高效地與梵蒂岡通力合作，一同提高國家的精神福祉。  [[7]](#_7__CC_1930_I__pp__460_461_Zai_1)

然而教宗從未放松過警惕。第二年，有消息稱國際女生體育競賽計劃在威尼斯舉行，令教宗感到非常不安。這一次他派出博爾貢吉尼游說墨索里尼取締這一活動。

墨索里尼沒有教宗的這些顧慮，他解釋道，組織這些體育競賽的乃是國際體育組織，并非意大利政府。為了表明這些女生體育競賽對他個人來說沒有任何好處，這位獨裁者還進一步表示（或者他說這些話，只是因為他總是喜歡讓這位拘謹的大使難堪）：“女人就兩種用途，生兒育女和挨打挨揍。”博爾貢吉尼的尷尬令他更加興奮，在這個話題上更加起勁。“女人就像毛皮大衣，”他解釋道，“你時不時就要撣掉上面的灰塵。”  [[8]](#_8___Ru_Guo_Wo_Jin_Zhi_Le_Zhe_Xi)

地方公教進行會團體在向地方政府官員提出類似請求時，也常常面臨類似的冷遇。在這種情況下，受挫的主教只好轉而向梵蒂岡求助。

1932年，教宗收到了一封不同尋常的來信，其中包含一組模糊的快照。寫信的主教譴責了卡普里島（Capri）女性暴露肉體的現象。許多女性的“后背基本上完全裸露，而胸部也常常只是勉強蓋住，有些人上身泳衣的材質甚至是透明的”。他進一步說道，這番景象主要是由外地人導致的，這座島上的大部分良民都對其表示厭惡。他要求梵蒂岡去游說警方，讓他們對這種現象采取行動。他隨信附上的四張照片都是從背后拍攝，照片上那些裸露后背的女性都穿著非常時髦的晚禮服。  [[9]](#_9__ASV__AESI__pos__902__fasc__5)

歐金尼奧·帕切利代教宗回復了這封信。他向這位主教保證，宣揚女性端莊的運動一向都是公教進行會的核心項目。這一組織“不會放過任何敦促當局的恰當機會，讓他們提高警惕并且更為嚴格地運用法律”。  [[10]](#_10__ASV__AESI__pos__902__fasc)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停下來考慮一下帕切利這封信的日期：1932年9月16日。塔基·文圖里和墨索里尼達成協議，結束公教進行會沖突，是不到一年之前的事情。  [[11]](#_11__Zhe_Wei_Zhu_Jiao_Di_Er_Ci_X)  現如今，全國上下的地方公教進行會團體已經在和法西斯警察密切合作了。  [[12]](#_12__1933Nian_2Yue_23Ri__Gong_Ji)

教宗不斷推進自己的行動，反對女性在意大利的海灘上袒露身體。教會也不斷地敦促墨索里尼，然而這種行為有時候會逾越界限，1934年3月便有這樣一個事例。那個月，佛羅倫薩大主教埃利亞·達拉·科斯塔（Elia Dalla Costa）炮轟法西斯青年組織，因為它支持成員去沙灘游玩。墨索里尼被這番批評惹怒，給帕切利寫了一封信。

“那位名頭不小（也許名頭太盛）的埃利亞·達拉·科斯塔蒙席向教區教眾發去一封信，”領袖說道，“他和藹地將我們稱作異教徒和野蠻人。請告訴他上頭的人，我們既不是異教徒，也不是野蠻人；我們也不想成為此等貨色，盡管達拉·科斯塔寫給教眾的信里是這么稱呼我們的。”

意大利大使德·維基親手將領袖的信轉交給帕切利。他告訴帕切利，這樣的言語攻擊最后只能事與愿違。德·維基接著提起了一個禁忌話題，他表示這位大主教譴責法西斯黨人都是野蠻人，而政府卻要對天主教神父非常普遍的不道德行為保持沉默，這會越來越難辦。大使警告道，如果有一天教宗做得太過火了，最后的結果恐怕會令他不高興。  [[13]](#_13__ASV__AESS__pos__430b__fasc)

教宗還給當局施加壓力，令其禁止那些教會認為有悖道德的圖書。比如一本在性方面提供指導意見的書，在歐洲頗為暢銷，這本由荷蘭婦科醫生所著的《理想婚姻》（Ideal Marriage ）囊括了生殖方面的生理學知識，鼓吹性快感，并且在節育方面提供了有用的信息。1930年，梵蒂岡將其列入了“禁書名錄”。一段時間后，當這本書即將出意大利語版時，教宗得知消息后讓墨索里尼禁止該書的銷售，領袖向他保證他會予以禁止。  [[14]](#_14__Jiao_Zong_Tong_Guo_Ta_Ji__W)

庇護還給墨索里尼施加壓力，讓他禁止那些為教會所不喜的電影和戲劇。早在雙方簽署《拉特蘭條約》之前，教宗就曾派遣塔基·文圖里同墨索里尼商討雙方該如何在這個方面進行合作。在1929年的一次會面中，兩人討論了美國電影。塔基·文圖里認為它們是罪惡和猥褻的糞坑；墨索里尼表示贊同，并將美國影院貶作是一所“墮落的學校，如果不予以阻止，最終會毀掉這個國家”。塔基·文圖里非常滿意，于是便要求這位獨裁者“研究一下如何讓審查系統高效地運作”。  [[15]](#_15__ASV__AESI__pos__669__fasc)

1931年3月20日的《洛杉磯時報》頭版刊登文章《意大利禁止包含性意味的電影……電影審查規則因教宗抗議而愈發嚴格》，報道了墨索里尼對教宗怨言的回應。  [[16]](#_16____Yi_Da_Li_Jin_Zhi_Bao_Han)

教宗對墨索里尼提出的諸多要求，有時候會多到讓人覺得難以應付。他向領袖提出各種各樣的抱怨，從惹人厭惡的女性著裝、書籍、新教傳教到電影和戲劇。他還常常要求墨索里尼解決離教神父  [[17]](#_17__Zhi_Ceng_Jing_Dan_Ren_Shen)  的問題。在教宗國被攻陷之前，教會尚且能阻止這些異端分子在公眾場合露面，然而意大利王國建國之后，它就無力再控制這些人了。在他們所行的事跡之中，最令梵蒂岡憤慨的是他們會在公立學校中擔任教職，在教宗看來，這簡直是一種可恥的行徑。  [[18]](#_18__Jin_Guan_Wo_Zai_Xia_Wen_Zho)

早在雙方簽訂宗教事務協約之前，庇護就開始敦促領袖采取各種行動。1925年1月，教宗要求墨索里尼解除羅馬大學知名教會歷史學家和離教神父埃內斯托·博納尤蒂（Ernesto Buonaiuti）的教授職務。長久以來，博納尤蒂都是梵蒂岡的眼中釘肉中刺。這位現代主義者鼓吹政教分離，早年任教于羅馬最好的一所神學院，后來離開了這個崗位。1921年，他質疑圣餐中是否真的包含耶穌的圣體，導致被教會驅逐出教。  [[19]](#_19__Zai_Duan_Zan_De_Hui_Gui_Zhi)

對于教宗的這一訴求，墨索里尼的回應是對這位教授做停職處理，然而博納尤蒂的同事到處游說，幫他恢復了教職。  [[20]](#_20__Zao_Zai_1924Nian__Ta_Ji__We)  1927年初，教宗舊事重提，這次他派出塔基·文圖里敦促領袖解雇這位大學教授。墨索里尼回答說，盡管他很想事事令教宗滿意，但也不能為了令教宗滿意而讓自己陷入蔑視法律的不義之境。他建議另找辦法，讓博納尤蒂不能再教書育人。  [[21]](#_21__ARSI__TV__b__9__fasc__527)  三天之后，塔基·文圖里想要碰碰運氣，便拜訪了教育部部長彼得羅·費代萊（Pietro Fedele）。費代萊見到教宗的這位特使并不開心，但他深知此人和領袖有著不同尋常的關系。“從今往后，”他第二天給墨索里尼寫信道，“只要塔基·文圖里神父前來拜訪我或者我手下的人員，我覺得最好還是將談話的內容報告給你。”

費代萊向特使保證，教育部會勒令博納尤蒂停止教學。塔基·文圖里對這番承諾表示滿意，但仍然代表教宗提出了警告。如果政府再次允許這位離教神父走上講壇，那么庇護將禁止天主教徒進入羅馬大學深造。  [[22]](#_22__Xiang_Mo_Suo_Li_Ni_Bao_Gao)

博納尤蒂在羅馬大學的教職工隊伍中一直待到了1931年，而諷刺的是，最終和他發生沖突的并非教宗，而是墨索里尼。當時出臺了一項新法律，規定意大利所有大學教授都必須發誓向法西斯政府效忠。意大利總共有一千兩百多名大學老師，拒絕效忠的只有十幾個人，其中便有離教神父埃內斯托·博納尤蒂。政府于是將這些人全部解雇。  [[23]](#_23__Bo_Na_You_Di_Ceng_Peng_Ji_F)

宗教事務協約簽訂之后，也曾發生過一起類似事件。教宗要求政府開除朱塞佩·薩伊塔（Giuseppe Saitta），這位離教神父當時是比薩大學的中世紀哲學教授。墨索里尼對這一請求特別敏感，因為薩伊塔在離開神父一職后變成了一名熱忱的法西斯黨人。他還是《新生活》（Vita Nuova ）的主編，而這份雜志是法西斯黨博洛尼亞黨部的刊物。他還是墨索里尼御用哲學家喬瓦尼·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的門徒，薩伊塔也確實曾在巴勒莫大學師從秦梯利。

1930年6月2日，教宗大使博爾貢吉尼面見墨索里尼，向他提出了教宗的要求。他認為教宗的要求受到了宗教事務協約第五條款的支持，它明確規定：“離教神父不得被委任教職，不得持有教職，不得擔任任何與公眾有直接接觸的政府職務。”

“對您來說，把薩伊塔隨便打發到一所博物館去，簡直易如反掌。”教宗大使建議道。

“要不就打發到古生物博物館好了！”獨裁者戲謔地回答道。當領袖情緒不錯的時候，他很少會放過機會，一定要戲弄這位總是一板一眼的教宗大使。但是他對這次的要求不太熱心。“Vedreme（等著瞧吧）。”他說道。

幾個月后，薩伊塔仍然安穩地待在崗位上。1931年4月，教宗再次提醒墨索里尼，卻依然沒見到任何進展。墨索里尼表示，薩伊塔早在宗教事務協約簽訂之前就被委以大學教職，而協約條款并不具有追溯效力。兩年后，薩伊塔不僅沒有被打發到偏遠的古生物博物館，反而高升到博洛尼亞大學擔任哲學系教授。這是一場教宗沒能打贏的戰役。  [[24]](#_24__1931Nian__Bo_Er_Gong_Ji_Ni)

\* \* \* \* \*

當教宗特使向墨索里尼投訴美國電影時，墨索里尼曾表示自己同意他們的觀點。可實際上，墨索里尼非常喜歡美國電影，盡管他偏好的是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勞雷爾和哈代（Laurel and Hardy）、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而不是珍·哈露（Jean Harlow）或者梅·韋斯特（Mae West）。獨裁者甚至還在托洛尼亞別墅搭建了一個小電影院，晚餐過后，他們一家子就可以在熒幕前看電影了。“它可以讓我放松身心。”他解釋道。不過就算電影能夠予以他寬慰，這種寬慰也非常短暫：家人都能看到電影的結尾，而這位一家之長卻很少能看二十分鐘以上。  [[25]](#_25__Petacci_2010__pp__129_130)

這些在家里一起看電影的夜晚是墨索里尼一家最快樂的時光。獨裁者討厭家庭聚餐，即便他很少參加。那少數幾次聚餐也被深深的沉默所籠罩，他總是緊張地擺弄著餐叉，用手指將面包屑碾成粉末。  [[26]](#_26__Navarra_2004__p__52)  雷切爾的統治范圍不僅包括廚房，還包括餐桌。孩子要是吃不完食物，就會惹她發火。

盡管家里有雷切爾與他抗衡，但是在這座別墅的圍墻之外，墨索里尼就不同于其他凡人了。“Mussolini ha sempre ragione”（“墨索里尼永遠正確”）的口號被無休止地重復著。全國上下，各種建筑的墻面上都刷有這行巨大的字母，政府還用這個句子教兒童識字。  [[27]](#_27__Mack_Smith_1983__p__6)

為了令自己的美名遠播海外，墨索里尼還找時間同絡繹不絕趕來的國外記者會面。那些年里，但凡采訪過領袖的記者，鮮少有人不為他粗獷的魅力所折服。一位法國記者在休息時間說道，墨索里尼就像是一尊出自米開朗基羅之手的大理石雕像。他敏銳的黑色雙眼能夠奪人心魂，他寬大的嘴巴里裝點著整齊的牙齒。  [[28]](#_28__C__Drexel_interview__Decemb)  另一位法國記者評論道，但凡經受領袖雙眼凝視的人，都無法忘記那種感覺：“一雙具有洞見和明判的雙眼，從高高在上的位置洞察，從置身事外的立場判斷。”就像其他人一樣，這個法國人對墨索里尼在公眾場合和私下會面之間的反差印象深刻：在廣場上，他總是向敬仰他的群眾慷慨陳詞，而私下接受采訪時，孑然一身的墨索里尼總是顯得那么深思熟慮，他的回答充滿了歷史和哲學的典故。  [[29]](#_29__H__Massis_interview__Septem)

曾有一位杰出的德國猶太記者采訪過這位意大利獨裁者，他所發表的采訪不僅篇幅最長，也得到最廣泛的閱讀。  [[30]](#_30__1932Nian_3Yue__Shi_Nian_Wu)  1933年  [[31]](#_31__Zhu_Shi_Zhong_Shuo_Shi_1932)  ，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在墨索里尼寬敞的辦公室中對他進行了數次采訪。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墨索里尼會十指并攏，或者用手托著下巴，手肘撐在桌子上。他會先低頭看看桌子，然后一邊抬頭直視路德維希，一邊回答問題。他特別喜歡引用統計數字，并且精確到小數點后三位。路德維希還注意到，領袖不喜歡浪費，他并不用筆記本，而是將筆記寫在日程卡片的背后。

路德維希也曾親眼見過領袖公開演講的場景，他軍旅式的嗓音令路德維希想起蘇俄革命家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向人群慷慨陳詞的景象。可是在這幾次采訪中，墨索里尼從未抬高他的嗓音。路德維希觀察到，盡管他好像聽不懂笑話，卻自有一種冷酷的幽默感。他說，自己祖先里只有一人令他感到驕傲，此人住在威尼斯，因為妻子的不忠而將其殺害。他之所以令墨索里尼感到驕傲，是因為在出逃之前，他豪氣地將兩枚威尼斯金幣放在她的胸膛前，算作是她的喪葬費。

盡管路德維希是個左派人士，但領袖的魅力令他折服。當墨索里尼表達自己對愷撒的敬仰時，路德維希問道，獨裁者有沒有可能受到人民的愛戴？

“當然可以，”墨索里尼回答道，“不過他同時也要令人民感到恐懼。群眾熱愛強人。群眾就像女人。”  [[32]](#_32__Ludwig_1933__p__62)

后來，領袖闡釋說：“于我而言，只要是沒有組織的群眾，就不過是羊群而已。”他們沒有辦法自治。他們不過是些情感和情緒的動物，沒有理智可言，理性的觀點無法令他們折服。“只有信念才能移動山巒，理性辦不到。群眾的動機永遠都不能是……理性。現代人在信念方面具有無限的潛能。群眾就如我手中的蠟，當我攪動他們的信仰，或者當我和他們相交融幾乎被他們淹沒時，我就感到自己成了他們的一部分。”

墨索里尼說到這里稍稍停頓了一會兒。他告訴路德維希，那些被他煽動的群眾有時候令他感到惡心。“雕塑家不也會因為沒法將大理石塑造成原先設想的模樣，而想將它砸個粉碎么？”歸根結底，意思就是：“一切的一切，都要看我們有沒有能力像藝術家一樣操控大眾。”  [[33]](#_33__Ludwig_1933__126_127)

到這個階段，墨索里尼已經在不斷地疏遠瑪格麗塔·薩爾法蒂了，因此他也就失去了和高雅文化的最大樞紐。他不再需要她的政治建議和鼓勵，而且她已經年過五十，身體發福，身患痛風，再也無法燃起他的激情了。  [[34]](#_34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  那些情報滯后的美國人還將她看作是領袖最親的親信。1934年，盡管薩爾法蒂在意大利的影響力已經日漸衰弱，羅斯福夫婦還是在白宮接見了她。她曾給墨索里尼寫過一本題為《領袖》的傳記，而加萊亞佐·齊亞諾擔任媒體和宣傳部副部長時曾將其收繳，禁止它在市面上流通。也許齊亞諾是被妻子埃達·墨索里尼逼迫的。她鄙視父親昔日的情人。在許多情況下，無論是《拉特蘭條約》之后，還是墨索里尼試圖給希特勒留下好印象的時候，這位不斷衰老的猶太女人都愈發令領袖感到難堪。1935年，他下令意大利媒體不得對她有任何提及。三年后，意大利頒布了反猶種族法案，她只好離開意大利，設法逃到了南美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她才返回意大利。  [[35]](#_35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

墨索里尼變得愈發孤獨。他告訴路德維希：“我在根本上始終是獨自一人。而如今，雖然我并沒有身陷囹圄，卻像是一名囚徒。”  [[36]](#_36__Ludwig_1933__pp__222_223)  也是在那時，他告訴一位崇拜者：“我只能接受孤獨……首領不可能與別人平起平坐。他注定沒有朋友。他得不到與人交心所帶來的卑微慰藉。他沒法敞開內心。永遠都不行。”  [[37]](#_37__Bosworth_2002__p__243)

墨索里尼的一位早期傳記作者寫道，1932年對領袖來說是完成轉型的一年，從人轉型為面具，從現實轉型為神話。他清楚該怎么顯得比實際身材（五英尺六英寸）高大，他模仿中世紀軍閥的形象。他的腰圍越來越寬；盡管已經吃得很少，卻還要與家族的肥胖基因戰斗，他每天都會稱量體重。不過愈發寬大的身形也令他的面部更為飽滿，讓他更像是晚期的愷撒大帝。  [[38]](#_38__Monelli_1953__pp__119_126_Z)

在打造領袖的個人崇拜上，政府與法西斯黨都耗費了巨大的精力。1929年，一位身居意大利的法國人驚嘆于領袖肖像的無處不在，他那副堅毅的面容“掛在新聞編輯室、面包糕點店、美容院、公共電話亭、香煙店……簡直就是一種執迷。你會不禁自問，他是不是連睡覺也擺出這樣一副面容”？  [[39]](#_39__Zhuan_Yin_Zi_Franzinelli_an)

庇護十一世對這番企圖有所警覺。有一天，在接見切薩雷·德·維基的時候，教宗提出了一個問題，令大使大為驚訝，他問能否請大使代勞，給墨索里尼帶去一些個人建議。德·維基有點不安又十分好奇，便答應了下來。

“請以我的名義告訴墨索里尼先生，”教宗開口說道，“我不喜歡這番造神運動，而且對他自己而言，這也沒有任何好處，反倒會造成截然相反的后果。他不應該試圖讓自己高于凡世……希望他能以我的名義反思，天主是唯一的神。”否則，墨索里尼也“只能淪落為一尊偶像、一位偽神，至多也就是一名假先知”。教宗表示，他應該要意識到，“人們遲早會砸爛他的偶像。請告訴他，如果不改變行為，他將不得善終”。

德·維基匆忙趕到威尼斯宮，然而依然身穿晨禮服的領袖打量了他一番，開口大笑。尷尬的大使解釋說，他從梵蒂岡直奔過來，要向他傳達一份教宗的私人訊息。

“鎮定點，”領袖說道，“把他的話都告訴我。”當德·維基盡最大努力復述教宗的話語時，一道介乎諷刺與不敢相信的笑容爬上了墨索里尼的臉龐。

“你確定這些話出自教宗之口？”獨裁者問道，“你有沒有添油加醋？”

德·維基非常激動，向領袖保證自己絕對沒有歪曲。

“那么你告訴我，”墨索里尼說道，“你怎么看？”

“我的想法和教宗如出一轍。”德·維基回答道，至少在他后來的回憶錄中他是這么聲稱的。  [[40]](#_40__De_Vecchi_1983__pp__223_224)

盡管教宗擔心領袖正逐漸被樹立為偶像，然而意大利的大部分神職人員卻沒有這種擔憂。1933年，在意大利東北部的貝加莫（Bergamo）發生過一起極端事例，令我們明白墨索里尼的個人崇拜有著多么強大的力量。當地的一位神父因其行為彰顯了對法西斯黨的忠誠，而收到了一張墨索里尼的親筆簽名照，他在回信致謝時寫道：“我親吻了您沉思的臉龐以及您手寫的文字……您的形象……對我來說十分神圣，在天主的幫助下，我絕不會做任何壞事，要令自己始終配得上它……領袖，我每天都會向萬能的天主祈禱，為您的雙親和阿納爾多的在天之靈祈禱……也為您和祖國祈禱。”  [[41]](#_41__Zhuan_Yin_Zi_Franzinelli_an)

這位神父諂媚地為墨索里尼弟弟的在天之靈祈禱，可這些話語觸碰了領袖心中一道未曾愈合的傷口。1931年的一個大霧天，身在米蘭的阿納爾多從火車站趕回家中，卻在路上突發心臟病倒地不起，過世時年僅四十六歲。他的辭世給墨索里尼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他們童年時曾同睡一張床，他是墨索里尼最親近的人，也是領袖最信任的人。  [[42]](#_42__Bosworth_2002__pp__44_46)

墨索里尼每晚10點都要同阿納爾多通電話，他們不僅談論第二天見報的內容，還談論領袖每天思索的事情。阿納爾多常常來羅馬看望貝尼托，而貝尼托時或也會發起火來，對他的弟弟大喊大叫。納瓦拉寫道，曾有一次，也許是為了避過怒火正旺的貝尼托，阿納爾多來到基吉宮，卻只跟哥哥的私人秘書談了談。當納瓦拉跟墨索里尼提及他的弟弟也在基吉宮卻沒有要求同他見面時，領袖十分生氣，要求阿納爾多立即到他的辦公室來。弟弟只好應允。納瓦拉從房間外面聽到墨索里尼對阿納爾多大罵不已。當弟弟從辦公室里出來的時候，納瓦拉上前向他道歉，表示自己不該提及他。

“不用擔心，”阿納爾多回答道，“只要像我那么了解他，任何人都不會太生氣。他只是叫得厲害，但他不咬人。”  [[43]](#_43__Zhuan_Yin_Zi_Navarra_2004)

在有些人看來，阿納爾多的病逝是墨索里尼一生的轉折點。這么突然、這么意外地失去自己唯一信任的人，他變得愈發封閉自己，愈發不相信身邊的人。在弟弟葬禮的那一天，他說道：“如今，任何事情都只能靠我自己了。”幾天后，他給姐姐埃德維杰寫信：“這打擊太出乎意料，又如此沉重，我需要花許多時間才能讓自己的精神復歸平靜。我哭了又哭。”  [[44]](#_44__De_Felice_1974__pp__174__30)

群眾的崇拜也令墨索里尼的自信水漲船高。這樣的場合為數不少，其中一次發生在阿納爾多過世三個月后，一場在羅馬舉辦的儀式令墨索里尼愈發相信自己命中注定要帶領意大利建成偉業。那是法西斯運動十三周年紀念日。源源不斷的黑衫軍隊伍中既有兒童又有老人，他們組成方陣向威尼斯宮進發。一隊飛機從頭頂飛過，地上為數眾多的樂隊則奏響法西斯黨歌。法西斯黨人的戰吼聲震徹云霄。到傍晚6點時，飛機已經返航，廣場上卻仍然擠滿了幾萬名搖旗吶喊、欣喜若狂的法西斯黨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進軍羅馬事件”的老兵、法西斯青年組織成員、工人、大學生，各個年齡和各種行業的人都擠向墨索里尼即將發表講話的那座陽臺。歡騰的群眾通過窗戶看到了獨裁者的身影，他舉起右臂向群眾行羅馬式直臂軍禮，樂隊奏起了法西斯黨歌《青年》（Giovinezza ），數千人伴著音樂一同高歌。

他們高喊著“領—袖！領—袖！”，墨索里尼的報紙《意大利人民報》用熱情洋溢的文字報道了這一慶祝活動，并且評論說游行隊伍猶如“一場盛大的宗教信仰儀式”。當“立正”的口令響起，廣場中猶如雷鳴的喧鬧聲徹底止息，隨之而來的是一片詭異而又滿懷期待的沉默。墨索里尼沒有戴軍帽，只穿著法西斯民兵制服，向群眾發表了演講。像往常一樣，他用那句標志性的喊話收尾：“誰是意大利的主人？”“是我們！”幾萬道聲音擰成一股回答道。他要離開的時候，群眾兩次三番地讓他又回到陽臺上，他于是高舉手臂，用羅馬式直臂軍禮向群眾賜福，這些耗盡了情緒卻洋溢著能量和自豪感的法西斯老少才終于心滿意足地回家去了。在接下來的年歲里，全國各地的意大利人將不斷地重復這一儀式。  [[45]](#_45__Qin_Ti_Li__1993__pp__283_28)

領袖的個人崇拜之所以具有宗教意味，天主教神職人員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他們輕率地將法西斯儀式和天主教儀式摻雜在一起。法西斯青年團體中都配備了神父。人數超過四百萬的青年團體成員受到兩千五百名專職神父的指導，而主持這些專職神父工作的則是一位全身心投入法西斯青年事業的主教。他們的職責是確保意大利未來的主人就像硬幣一樣具有兩面，一面效忠天主教會，另一面則效忠墨索里尼和法西斯黨。  [[46]](#_46__Franzinelli_1995__pp__171_1)

1933年10月便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一百五十二名法西斯民兵的專職神父被召集到威尼斯宮。在領袖的觀看下，他們演唱了一首專門為墨索里尼準備的頌歌，題作《為領袖歡呼》：

向不可戰勝的領袖歡呼

您是我們祖國的救世主

無論身處和平抑或征戰

我們都時刻準備跟從您的信號

您的指示和力量，您的指引和光芒

獻給意大利的新英雄，您是領導人

是我們的領袖，是我們的領袖。  [[47]](#_47__Fu_Lan_Qi_Nei_Li__1995__p)

主要的法西斯儀式都從清晨彌撒開始，由小鎮里的神父或者城市里的主教主持。彌撒之后舉行游行或者集會，并且朗讀領袖發來的指示。大大小小的教堂是這些儀式的重要場所，同時也為它們增添了感性的力量。1933年，在“進軍羅馬事件”的周年紀念日的夜晚，領袖的肖像被直接投影到米蘭主教座堂的正中央；這副幽靈般的面容矗立在群眾的頭頂。歐洲歷史學家皮爾斯·布倫登（Piers Brendon）認為：“教宗給人的印象是，意大利天主教會不過是一群做禱告的法西斯黨人；而且他似乎在暗示，市民應該像信徒一樣，最好屈膝跪地履行自己的職責。”  [[48]](#_48__Brendon_2000__p__133_Mi_Lan)

只有少數神父敢于提出反對意見，然而，無論他們對法西斯政府的批評多么委婉，都會立即被當地法西斯黨人舉報。許多批評意見在當地得到處理，這些不守規矩的神父會受到主教的管教，可是當主教包庇下屬時，事情就會鬧到羅馬。在意大利駐圣座大使的諸多職責中，有一項便是根據提交上來的這類報告敦促梵蒂岡采取行動。1932年便有一起典型事例，梵蒂岡收到投訴，犯事的是克雷莫納主教教區的一位教區神父。當局要求地方主教進行調查，而這位主教表示神父的冒犯之語不過是小事一樁，皮扎爾多蒙席告訴他這樣的回應沒法解決問題。“這位神父在11月4日發表的演說造成了不好的影響”，這位主教必須安排他利用最近的機會，“發表一番與原先相反的演講”。  [[49]](#_49__ASV__AESI__pos__812__fasc)

幾個月后，有人指控喬瓦尼·蒙蒂尼（公教進行會大學組織的專職神父）是反法西斯分子，于是教宗采取行動，解除了他的職務。蒙蒂尼的父親曾是人民黨的議會代表。他沒有將怒火瞄準教宗，而是指向了皮扎爾多，因為教宗的決議是由他傳達的。他抗議說，皮扎爾多沒有說“一句寬慰、尊重或贊揚的話”，就解除了他的職務。幾年后，當教宗和墨索里尼的蜜月期已然過去，庇護恢復了蒙蒂尼的職務。蒙蒂尼走過的這些彎路完全無損于他的前途，因為三十年后，他將登上圣彼得寶座，取名號為教宗保祿六世。  [[50]](#_50__Can_Jian_Wolff_1985__pp__23)

1932年，墨索里尼宣布，握手動作（此乃資產階級風俗）將被更具男子氣概的羅馬式直臂軍禮所取代。他不僅要求大學教授宣誓向法西斯效忠，還堅持讓他們在畢業典禮時身穿黑色襯衫。到1934年底，所有的小學老師在校期間都必須身著黑色襯衫和法西斯黨制服。  [[51]](#_51__Goetz_2000__Falasca__Zampon)

那年早些時候，意大利再度舉行全民公投。都靈教區周刊的文章代表了所有意大利神父和主教向天主教徒傳達的教誨：“都靈的天主教徒！請將你們的贊成票投給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政府……反法西斯時代已然結束。”  [[52]](#_52__Zhuan_Yin_Zi_Reineri_1978)  這是墨索里尼操辦的最后一屆選舉。一千萬意大利人投了贊成票，只有一萬五千人投了反對票。  [[53]](#_53__Zai_Fu_He_Zi_Ge_De_Xuan_Min)

[[1]](#filepos585911) De Vecchi to Mussolini, January 18, 1933，轉引自De Vecchi 1998, p. 53n60。一位線人認為奇里亞奇是“一個聰明、有能力的人，能夠適應并順從自己的工作，使得由他主持的大公教組織和法西斯國家機構互通有無”。ACS, MI, FP “Ciriaci,” informatore no. 390,“Orientamento in senso nazionale e verso il Regime da parte del Comm. Ciriaci,” 18 gennaio 1933.

[[2]](#filepos586606) Moro 1981, pp. 289–291.莫羅寫道，法西斯政府鼓勵這種道德教化的運動，但正如筆者在本章中所闡發的那樣，這種觀點只有片面的正確性。有幾次教會的道德教化運動便超出了政府想要控制的范圍。教會呼吁地方公教進行會成員向地方政府舉報冒犯教會的行為，這一舉措始于20世紀20年代。公教進行會中央道德秘書處出版了一本題作《為道德一辯》（Per la difesa della moralità ）的小冊子，篇幅達72頁，到1928年已修訂至第4版。“自由已然墮落為放縱”，它褒獎了法西斯政府與“自由的災難性后果”作斗爭的努力和行動，還提供了文字樣板，供地方團體用來向地方政府告發那些不道德的事物和行為。ASV, AESI, pos. 929, vol. 1, fasc. 615, f. 35.

[[3]](#filepos586998) 法西斯媒體注意此事后刊出報道，將其稱作是庇護十一世“對有違道德的女性時尚的神圣抗爭”。《教宗反對女性時尚》，《法西斯政府報》，1926年6月22日，第2版。

[[4]](#filepos587335) 這些控制措施被納入海濱設施的營業執照，得到強制執行。ARSI, TV, b. 7, fasc. 393, “Circolare per tutti i prefetti dal Ministero dell’Interno, 18 giugno 1926; Oggetto: bagni.” 6月27日，部長給塔基·文圖里寫信，附上了這道政令的復件，向他表明政府非常重視教宗關心的事情。當月，在接見一個天主教女孩團體時，教宗呼吁發起全國性質的改革運動，抵制女性的不道德著裝。在接見女性團體時，他每每譴責當前的女性時尚，6月，他警告一個女性團體，外面的世界正在盡全力誘騙女性，令她們將哪怕最基本的女性尊嚴感都拋到腦后。《教宗反對女性時尚》，《法西斯政府報》，1926年6月22日，第2版。1928年，在教宗的指示下，塔基·文圖里頻繁地游說政府的各位部長，要求他們將女孩著裝的限制擴展到學校以及公眾場合。他認為，不體面的女性著裝是墮落的一大源頭。如果政府通過立法程序，令法律禁止那些長度不超過膝蓋的女性服裝，“將會給基督的代理人帶來莫大的安慰”。ARSI, TV,b. 15, fasc. 1067, 26 novembre 1928. 塔基·文圖里的字條上帶有他自己的標注：“呈給S.E.（Sua Eccellenza，即閣下），1928年11月26日”，它可能是指墨索里尼，但也可能指某位部長。布雷桑（1980, pp.106–108）寫道，《羅馬觀察報》長篇累牘地探討“不道德”的問題，并給政府當局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采取更為激進的措施。

[[5]](#filepos588552) ACS, CR, b. 68,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3 febbraio 1929. 塔基·文圖里這封信的復件收錄在他自己的檔案中：ARSI, TV, b. 16, fasc. 1133。

[[6]](#filepos589110) 《公教文明》（1928 II, pp. 367–372）解釋道，培養健康的女性“不必訓練她們跳出四米遠”。美國駐羅馬大使和英國駐圣座大使都認為有必要向政府報告教宗反對女性參加體育競賽的事宜。NARA, M530, reel 2, Henry Fletcher to secretary of state, n. 1691, May 11, 1928; H. G. Chilton, Annual Report 1928, May 9, 1929, C 3397/3397/22, in Hachey 1972, p. 142, section 55.

[[7]](#filepos589728) CC 1930 I, pp. 460–461.在1932年下半年的一次會面中，博爾貢吉尼把最近一期《公教文明》交給墨索里尼，而領袖擺了擺手表示不必，他說自己知道上面寫了什么，還補充道：“這本雜志我總是讀得非常仔細。”ASV, ANI, pos.23, fasc. 4, 6. 47r–48r, Borgongini a Pacelli, 22 novembre 1932.

[[8]](#filepos590686) “如果我禁止了這項賽事，”墨索里尼回到原先的話題繼續說道，“然后人們發現我依據的是圣父的命令，那么這件事情就會鬧得不可收拾。”ASV, ANI, pos. 23, fasc. 3, 6. 28r–34r, Borgongini to Pacelli, 14 febbraio1931.他拒絕了教宗的這一要求。教宗之前對女生體育活動也有頗多反對，參見CC 1928 II, pp. 367–372; ASV, AESI, pos. 773, fasc. 317, 6.77r–85r, 28 settembre 1929; CC 1930 I, p. 460。實際上，法西斯政府對待女性的政策比較混雜；有的同教會的教導相一致，比如反對節育，以及阻攔女性離家工作的一些措施；其他一些措施則支持那些受到教會反對的女孩和女性娛樂活動。關于法西斯和女性的文獻有很多，其中可參見De Grazia 1992。

[[9]](#filepos591671) ASV, AESI, pos. 902, fasc. 596, 6. 49r–50r.

[[10]](#filepos592092) ASV, AESI, pos. 902, fasc. 596, 6. f. 51r, 16 settembre 1932。

[[11]](#filepos592446) 這位主教第二次寫信呼吁國家采取行動的時候，直接把信寄給了朱塞佩·皮扎爾多蒙席（教宗的親信）以及當時負責公教進行會的梵蒂岡官員：“今年比去年更糟糕。從白天到夜里，在每一條街上和每一個廣場上，有許多女性（尤其是外國人和意大利北方人）的穿著如此不體面，給本地帶來了非常惡心的景象……難道政府高層就不能對此有所作為嗎？”ASV, AESI, pos. 902, fasc. 596, f. 52r, 20 agosto 1933.

[[12]](#filepos592660) 1933年2月23日，公教進行會全國主席奧古斯托·奇里亞奇直接致信墨索里尼，贊揚他至今為止所做的一切，并且指出仍有一些區域需要貫徹更為嚴苛的措施。奇里亞奇寫道，公教進行會將繼續同政府合作，為祖國的偉大貢獻一份力量。政府應該禁止那些令人反感的電影和戲劇，沒收那些有違道德的雜志和書籍，并且要求女性穿著端莊的服飾。“我們不要求另立新法，”奇里亞奇在這封信的末尾寫道，“我們只要求現有的好法令（它們得以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閣下的智慧和力量）能夠得到尊重，并且得到有效的應用。”ASV,AESI pos. 929, vol. 1, fasc. 616, 6. 31r–36r.在20世紀30年代，教宗反對暴露著裝的抗爭同墨索里尼鼓勵生育的運動相吻合，領袖認為女性從傳統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來是造成生育率下滑的一個原因。例如在1933年7月11日，政府告知各家報紙，不得刊登裸體女性的照片，“因為它們會阻礙人口的增長”。兩年后，齊亞諾抱怨說，有很多雜志刊登了女性穿著暴露泳衣的照片，他這一怨言的根據也是它們會“阻礙人口的增長”。Tranfaglia 2005, pp.171, 177. 教宗為公眾場合的莊重體面所發起的抗爭，其準星還瞄向舞會所引發的“公憤”，這些男男女女在跳舞時常常有肢體接觸。1933年6月，在教宗的要求下，帕切利給意大利北方（教會認為這個區域的問題尤為嚴重）的所有主教寫信，要求他們報告各自主教教區的情況。米蘭大主教在回信中表示，他希望教會能夠說服內務部部長，讓他“聽到意大利北方的主教教區在這一事宜上的聲音”。為了表明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他附上了一封近期收到的信函，來自克雷莫納主教，報告說地方法西斯組織（尤其是那些組織業余活動的社會團體）令舞會活動成了“一項有組織的事業”。主教抱怨道，警方很少采取行動。他麾下的一位教區神父曾試圖說服這類組織的負責人，希望他們減少舞會的頻率，但是卻被告知，許多男人正是因為這些舞會活動才參加組織的。ASV, AESI, b. 935, fasc. 628, 6. 02r–03v.梵蒂岡反對舞會的行動一直持續到庇護十一世過世，令法西斯高層頗為煩惱。最為典型的哀嘆之言出自博尼法喬·皮尼亞蒂，他在1935年取代切薩雷·德·維基出任意大利駐圣座大使時說：“不幸的是，教會上下對舞會的態度毫不動搖，沒有任何改變的希望。”ASMAE, APSS, b. 42, Pignattia Starace, 10 settembre 1938.

[[13]](#filepos594121) ASV, AESS, pos. 430b, fasc. 360, f. 115, 14 marzo 1934.德·維基提及的政府對神父的不道德行為保持沉默，可能來自政府的間諜報告，其中涉及了數位樞機和男孩、男青年以及女孩的親密關系。裸露的皮膚下面不必有真實的血肉，就能吸引教宗的注意或引得他采取行動。1937年10月，教宗得知近來有一座博物館展出了一系列裸體雕像，于是派遣塔基·文圖里去處理它們。博物館館長得知教宗的反對意見后，向塔基·文圖里保證，“貴方所不喜的那四五尊男性雕像已經立即被撤掉，并蓋上了許多無花果葉”。

[[14]](#filepos594834) 教宗通過塔基·文圖里提出了他的要求。ACDF, S.O., 1930, 1413/30i, Tacchi Venturi a Cardinale Donato Sbarretti, S.O., 13 aprile 1933.之后（同年），塔基·文圖里給警察總長阿爾圖羅·博基尼遞交了一份由公教進行會中央辦公室整理出來的清單，上面列出的都是教宗想要禁掉的國外雜志。在查看清單之后，博基尼表示自己沒法禁止清單上的所有條目，但承諾會查禁其中一部分。在向皮扎爾多報告此事時，塔基·文圖里提醒他注意警察總長的承諾：如果塔基·文圖里繼續向他提交希望禁掉的雜志，警方會非常謹慎地考慮他在審查方面提出的要求。塔基·文圖里最后說道，他高昂的情緒令他一反常態地用上了感嘆號，“我們利用這句承諾的機會可有不少！”ESI, pos. 929, vol. I, fasc. 617, 6. 2r–3r.具有很大影響力的《意大利百科全書》（Enciclopedia italiana ）中有許多文章的主題牽涉教會的利益，塔基·文圖里居中調停，使其內容獲得了教會的認可，關于他起到的作用，參見Turi 2002。

[[15]](#filepos595603) ASV, AESI, pos. 669, fasc. 132, 6. 34r–35r,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23 gennaio 1929.梵蒂岡還給政府施加壓力，禁止在公立學校中出現性教育的內容，皮扎爾多曾在1935年4月25日給意大利駐圣座大使打過一通電話，內容被政府截取到，其談話內容就牽涉了上述話題。ACS, MCPG, b. 165, n. 3093.當時，戲劇作品如果冒犯教宗，或者鼓吹對“宗教情感”的鄙夷，就會遭禁。Talbot 2007, pp. 148–149.

[[16]](#filepos595958) 《意大利禁止包含性意味的電影》，LAT, March 20, 1931, p. 4。1月19日，博爾貢吉尼曾敦促墨索里尼，對電影和戲劇采取更為嚴苛的審查標準；不過他發現墨索里尼不太認同他的觀點。ASV, ANI, b. 23, fasc. 3, Borgongini a Pacelli, 20 gennaio 1931.

[[17]](#filepos596360) 指曾經擔任神父一職，后因各種原因脫離教會或被教會驅逐出教的人。

[[18]](#filepos596808) 盡管我在下文中談到的例子都是大學教授，但是那些在公立學校謀得教職，并且引起教宗注意，令其向墨索里尼抱怨的離教神父大多都任教于小學。教宗堅持要求學校將他們解雇。

[[19]](#filepos597490) 在短暫的回歸之后，他最終在1926年1月被徹底驅逐出教會。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前，羅馬宗教裁判所曾要求杰梅利神父考察博納尤蒂，并就此提出看法；參見Martina 2003, p. 238; Zambarbieri 1982a。杰梅利返回給梵蒂岡的報告上寫道，這位教授是個現代主義者，“教士之道已經無法將其療救，他需要的是那些救助精神病患者的專業人士”。轉引自Luzzatto 2010, p.142。

[[20]](#filepos597790) 早在1924年，塔基·文圖里就曾與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喬瓦尼·秦梯利會面，要求他開除博納尤蒂。Sale 2007, p. 335.

[[21]](#filepos598217) ARSI, TV, b. 9, fasc. 527, Tacchi Venturi a Gasparri.

[[22]](#filepos599060) 向墨索里尼報告會面情況的時候，費代萊向領袖建言，這樣屈從于教宗的壓力，并且任由他插手大學教職人員的委任，將會帶來一場災難。DDI, series 7, vol. 5, n. 11, Fedele a Mussolini, 11 febbraio 1927.在該年余下時間里，教宗不斷地通過塔基·文圖里施壓，費代萊只好將博納尤蒂喊來，向他解釋了具體情況，并要求他離開教職，轉而接受專職研究的任務。博納尤蒂非常生氣，他指出這般阻撓他開展教學是沒有法律依據的，但他還是勉為其難地接受了。費代萊向墨索里尼報告這件事情時寫道：“政府對圣座做出了巨大的讓步！” ACS, CR, b. 68, Fedele a Mussolini, 17ottobre 1927.

[[23]](#filepos599648) 博納尤蒂曾抨擊法西斯，認為他們推行的國家崇拜是一種異端。Zambarbieri 1982a, p. 64; Goetz 2000.

[[24]](#filepos601677) 1931年，博爾貢吉尼和時任外交部部長的迪諾·格蘭迪一同協商過這個問題。ASV, ANI, pos. 23, fasc. 2, 6. 99r–101r, Borgongini a Pacelli, 4 giugno 1930; ASMAE, APSS, b. 6, Borgongini a Grandi, 17 aprile 1931;格蘭迪沒有標明日期的回復也收錄于此。教育部部長就薩伊塔一事向格蘭迪提出的建議收錄并刊于DDI, series 7, vol. 10, n. 342, 19 giugno 1931。

[[25]](#filepos602626) Petacci 2010, pp. 129–130; R. Mussolini 2006, p. 88–89.

[[26]](#filepos603034) Navarra 2004, p. 52.

[[27]](#filepos603634) Mack Smith 1983, p. 6.

[[28]](#filepos604195) C. Drexel interview, December 1934, in De Felice 1974, p. 866.

[[29]](#filepos604832) H. Massis interview, September 1933,in De Felice 1974, p. 854。

[[30]](#filepos605126) 1932年3月，時年五十一歲的路德維希對領袖進行了一系列采訪，而在此之前，他就已經因為采訪其他國家領導人[從現代土耳其締造者穆斯塔法·阿塔土克（Mustafa Atatürk）到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而名聲卓著。

[[31]](#filepos605248) 注釋中說是1932年3月，不知道是有兩次還是作者筆誤了。

[[32]](#filepos606914) Ludwig 1933, p. 62.

[[33]](#filepos608008) Ludwig 1933, 126–127。

[[34]](#filepos608439)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383–384; Urso 2003, pp. 193–194.

[[35]](#filepos609433)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36]](#filepos609751) Ludwig 1933, pp. 222–223.

[[37]](#filepos610100) Bosworth 2002, p. 243.

[[38]](#filepos610728) Monelli 1953, pp. 119–126.這位獨裁者如今散發著這般神圣的力量，他的助手納瓦拉已經很難找到能夠為他理發的理發師了。負責墨索里尼安保工作的一位警衛透露道，曾有一位理發師答應接下這份差事，可當他把剃刀伸向領袖的臉時，他的手開始不受控制地顫抖。Navarra 2004, pp. 39–40.

[[39]](#filepos611260) 轉引自Franzinelli and Marino 2003, p. xi。

[[40]](#filepos613241) De Vecchi 1983, pp. 223–224.

[[41]](#filepos614149) 轉引自Franzinelli and Marino 2003, p. xii。

[[42]](#filepos614738) Bosworth 2002, pp. 44–46.

[[43]](#filepos615834) 轉引自Navarra 2004, p. 21。

[[44]](#filepos616455) De Felice 1974, pp. 174, 300–303.

[[45]](#filepos618636) 秦梯利（1993, pp. 283–285）從1932年3月24日的《意大利人民報》中摘錄了幾段節選。墨索里尼的演講近似于宗教儀式，關于其性質和影響的分析參見Galeotti 2000, pp. 49–50。

[[46]](#filepos619335) Franzinelli 1995, pp. 171–172.這一人數采用了1934年的數據。1928年4月，塔基·文圖里因近期頒布的用于指導所有法西斯女青年團體的八條戒律（第三條：熱愛領袖）而向法西斯黨總書記表示祝賀。但他指出這份戒律中有一項重大疏忽：它沒有提及天主；為了對此做出彌補，他提議增設第九條戒律：“敬畏并熱愛天主，祂是一切善的源泉。”ARSI, TV, b. 13, fasc. 878, Tacchi Venturi a Augusto Turati, 28 aprile 1928.圖拉蒂表示這條戒律沒有增設的必要，因為它已經包含在現有戒律之中：“所有準則以基督和大公精神為指引”。ARSI, TV, b. 13, fasc. 878, Turati a Tacchi Venturi, 2 maggio 1928。

[[47]](#filepos620610) 弗蘭齊內利（1995, p. 140）指出，如果不是因為這些神父的行為表明，他們對“神圣領袖”的卑躬屈膝到了什么樣的程度，這些事情本該非常好笑。

[[48]](#filepos621394) Brendon 2000, p. 133.米蘭主教座堂的領袖肖像一事參見Gentile 1993, p. 173。

[[49]](#filepos622430) ASV, AESI, pos. 812, fasc. 444, 6. 7r–13r, Pizzardo a Cazzani, 21 novembre 1932.在這一事件中，主教喬瓦尼·卡扎尼堅持了自己的立場，他在信中表示，讓這位神父按照梵蒂岡吩咐的去做，會令他受到莫大的羞辱。

[[50]](#filepos623254) 參見Wolff 1985, pp. 239, 245; Bendiscioli 1982。

[[51]](#filepos623745) Goetz 2000; Falasca- Zamponi 1997, pp. 110, 203–204.

[[52]](#filepos624179) 轉引自Reineri 1978, p. 183。

[[53]](#filepos624420) 在符合資格的選民中，96%的人參與了投票。參見De Felice 1974, p. 313。

## 第十四章 新教敵人與猶太人

1932年2月11日的清晨迎來了《拉特蘭條約》的三周年紀念日，一列由四輛黑色豪華轎車組成的車隊行進至梵蒂岡，衣著喜慶的意大利憲兵騎馬穿插其間。車隊進入梵蒂岡城時接受了瑞士憲兵隊的致意，最終停在了圣達馬索（San Damaso）庭院，在那里迎接他們的是高舉教宗旗幟的教宗憲兵和教廷儀隊。身穿外交燕尾服的墨索里尼從車里下來。他的袖子上裝飾著奢華的金邊，兩條寬寬的金帶沿著褲管一直延伸到腳踝。他手里拿著一頂羽毛帽，腰間別著一柄儀仗劍。  [[1]](#_1__Ju_De__Wei_Ji_Suo_Shuo__Zhe)

幾個月來，各大媒體對這次訪問都提出了各自的猜測。1931年9月，在墨索里尼同塔基·文圖里簽訂協約并結束公教進行會紛爭后的第三天，《紐約時報》在頭版刊出文章，宣稱“墨索里尼將在下周訪問教宗”。  [[2]](#_2__Yi_Zhou_Hou__You_You_Yi_Pian)  從此以后，新聞報道和外交官報告也接連不斷地猜測：經過多年的等待，領袖終于要拜訪教宗了。然而每一次猜測都沒能帶來實際的會面  [[3]](#_3__MAEI__vol__266__209_211__Fon)  ，最終墨索里尼將訪問日期定在了次年2月。  [[4]](#_4__11Yue_27Ri__Pa_Qie_Li_Shu_Ji)

在訪問的準備階段，教宗給墨索里尼頒發了一枚特殊的教宗勛章。1月的一個上午，博爾貢吉尼將勛章送到了威尼斯宮。得意洋洋的領袖身穿正式的晨禮服，以驕傲的姿態迎接他的到來。教宗大使將教宗文書交給墨索里尼，而領袖則認真地閱讀了這份卷軸。他吹牛說：“能看懂拉丁文的意大利人可不多，我就是其中一個。”然后教宗大使將教宗的禮物金軍領環（the Collar of Golden Militia，中間掛著黃金十字架的金色領環）呈送給獨裁者。這位煽動暴民的反教會人士，如今竟成了教宗廷前的爵士。  [[5]](#_5__Ji_Tian_Qian__Bo_Er_Gong_Ji)

訪問教宗的這一天必將載入史冊。墨索里尼抵達梵蒂岡時胸前佩戴著教宗授予的十字架。他早到了十幾分鐘，而且令人尷尬的是，負責接待他的皮扎爾多蒙席完全不見身影。教廷儀隊不知所措，只好立正行禮。教宗的姐姐有幸站在門邊，最早見到了領袖的到來，可是她顯然不會出面說任何話。后來，皮扎爾多終于急匆匆地跑下階梯，他之所以遲到是因為教宗把他扣在自己的書房，給他下達最后的指示。在雙方憲兵、瑞士侍衛隊和教廷儀隊的護衛下，他們登上了階梯。

墨索里尼沿著寬闊、蜿蜒的階梯向克萊孟大廳走去。這座富麗的大廳有著高聳的墻壁，天花板和上三分之二的四壁都覆蓋著文藝復興時期的壁畫。一面墻上的雕帶刻畫的是四樞德，對面墻上的雕帶刻畫了神學三德，天花板上裝飾的則是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壁畫《圣克萊孟的神化》（The Apotheosis of St. Clement ）。這座四方形大廳的地板和墻壁的下三分之一則覆蓋著五彩斑斕的鑲嵌圖案。大廳中有二十名受邀賓客，他們前來見證領袖到訪的歷史性時刻，此刻似乎都迷失在這座大廳的壯麗之中。

不過當負責將領袖引導至教宗書房的典禮長卡恰·多米尼奧尼蒙席走進大廳準備迎接墨索里尼時，他突然大吃一驚。在這群衣著正式的男性中間，竟然有一名女性，她是一名外國記者。梵蒂岡的大門絕不能向她敞開，因為這樣的場合不允許任何女性的出現。而此時墨索里尼已經爬了大半截階梯了。



墨索里尼訪問教宗，他抵達梵蒂岡時，迎接他的是皮扎爾多蒙席，1932年2月11日

“小姐，”卡恰懇請道，“煩請您立即離開。”

尷尬的紅暈爬上了這位金發女子的臉龐，可是她堅決不讓步。“我完全有權利待在這里，蒙席。”她回答道。

“此地的決定權在我，”他答道，“您沒有權利待在這里，我的行為乃是出于圣父的命令。”

這位女性揮了揮邀請函，以示抗議。墨索里尼一行人越爬越高，卡恰越來越著急。“小姐，除了溫和的話語外，我不想采取任何其他手段。”他瞄了一眼在一旁站崗的憲兵，“但是如果您不立即離開，您將迫使我采取行動。”

這位女性盡管又氣又惱，卻也只得松口，由一名高級教士將她帶到后門出口。就在此時，墨索里尼進到大廳，卡恰熱情地迎了上去。瑞士侍衛隊將佩劍高高舉起，以示敬意。

卡恰帶領墨索里尼穿過一座又一座大廳，每一座都配備教宗憲兵、貴族衛隊和教會高層官員。他們來到小寶座室，領袖經由此處進入了教宗的書房，庇護正在那里等他。  [[6]](#_6____Wo_Fang_Xiao_Xi_____OR__12)  根據慣例，天主教國家首腦覲見教宗時須向他鞠躬并親吻他的戒指，然而領袖態度堅決地拒絕了這等安排。教宗拒絕任何人給他照相，然而在一份頗受歡迎的新聞周刊上，一位插畫師為公眾描繪了雙方會面的場景。插畫上的教宗身穿白袍，頭戴教宗帽，腳踏紅鞋子，與墨索里尼面對面地坐在風格繁復的紅色扶手椅上，而墨索里尼則上穿刺繡外交官上衣，下穿黃色條紋褲，脖子上掛著教宗授予他的十字架領環。  [[7]](#_7__Zhe_Fu_Cha_Hua_Kan_Deng_Zai)



墨索里尼和教宗，教宗書房，1932年2月11日

全世界的媒體爭相報道了這一歷史性的會面。《芝加哥論壇版》的頭版頭條是《教宗與領袖在友好條約下緊握雙手》。《紐約時報》的頭版頭條則是《教宗與墨索里尼在梵蒂岡會面，雙方氣氛友好》。  [[8]](#_8__Da_Wei__Da_La____Jiao_Zong_Y)  然而對這場僅此一次的會面，最好的描述出自墨索里尼本人，他親筆寫下自己的感受，并且上交給國王。

教宗邀請他坐下，詢問了他女兒埃達的近況，她的丈夫出任意大利駐中國大使，而她則隨夫去了上海。

在盡可能簡短的寒暄之后，庇護提到了他認為最為要緊的事宜。他的話語令墨索里尼頗為驚訝，他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會是此次會面的第一項議程：新教人士正勸說意大利民眾改宗，“并且在意大利所有主教教區取得了進展，這是我命各位主教所做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新教徒變得越來越大膽，他們還想在意大利組織‘布道會’”。宗教事務協約的用語有漏洞，將非天主教信仰稱作是“受到承認的”教派，他們正是利用了這一漏洞。教宗曾經反對過這種用語，更希望將它們稱作是“得到容忍的”教派。

墨索里尼指出意大利境內只有十三萬五千名新教徒，其中有三萬七千人是外國人，這一數字跟四千二百萬天主教徒相比幾乎微不足道。

教宗承認新教徒人數不多，但辯稱他們帶來的威脅很大。他把這一問題的長篇報告遞給領袖。他希望遏制新教徒數量的發展，接下來的幾年里，他會不斷地用這個要求對獨裁者進行轟炸。

然后話題一轉，他們又談論起最近的公教進行會紛爭。在這里，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看待那些經由墨索里尼轉述的教宗話語。教宗先表示，這一問題最終得到友好解決，令他非常高興，接著他又進一步說道（經由領袖轉述）：“整套法西斯信條強調秩序、權威和紀律的原則，在我看來它同天主教會的教導沒有任何沖突之處。”

教宗還進一步說道，他能夠領會“集權法西斯主義”的原則，但這只能限定在物質范圍內。他表示人們還有精神需求，在這方面就需要“天主教的極權主義”了。

“我同意圣父您的觀點，”墨索里尼評論道，“國家和教會各擅其長，所以一旦兩者確立了互惠互助的原則，即可通力合作。”



與教宗會面之后，墨索里尼在梵蒂岡，1932年2月11日 前排左起：卡恰·多米尼奧尼、切薩雷·德·維基、墨索里尼

最后，教宗對俄國發生的事情表達了悲痛，他說蘇俄共產黨人決心要摧毀基督教。“在這一事件背后，”庇護說道，“還有反基督教的猶太仇恨情結在作祟。”他回憶起自己作為教宗大使駐守波蘭的歲月，“我發現，在布爾什維克政權中，所有人民委員都是猶太人”。在教宗眼中，意大利的猶太人顯然是個例外。他慈祥地跟領袖提起，米蘭的一位猶太人曾給天主教會捐了一大筆錢，而米蘭也曾有一位拉比，為他講解了“希伯來語的一些微妙之處”，給他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會面就要結束時，教宗又贈予領袖三枚教宗勛章。  [[9]](#_9__Mo_Suo_Li_Ni_Qin_Bi_Zhuan_Xi)  然后，墨索里尼來到國務卿辦公室，與加斯帕里樞機聊了二十分鐘。之后他被護送到圣彼得大教堂，在圣母瑪利亞祭壇前跪地做禱告。當新聞攝影師想要給他拍照時，他突然起身，噓聲喝止住他們。他說道：“不可以拍照，不可以給做禱告的人拍照。”  [[10]](#_10____Mo_Suo_Li_Ni_Xian_Sheng_Y)  任何照片中都不可以出現跪在地上的領袖。

墨索里尼回到家中時情緒高漲。孩子們都想聽聽這場會面的細節，于是圍坐在父親的四周。雷切爾對此不太感冒，他正講得眉飛色舞時，她尖刻地提問道：“你有沒有親吻教宗的腳？”領袖被這么一嗆，講述也就戛然而止。  [[11]](#_11__E__Mussolini_1957__p__135)

在接下來的那個月，墨索里尼和國王也用溢美的褒獎將勛章回贈給梵蒂岡。他們將意大利最高獎章“圣天使報喜最高勛章”授給帕切利樞機，并將他列為國王的“堂親”。他們還將圣莫里斯和圣拉撒路大十字勛章（Grand Cross of Saint Maurice and Lazarus）授給帕切利手下的兩位副國務卿皮扎爾多蒙席和奧塔維亞尼（Alfredo Ottaviani）蒙席。然而最令教會人士感到驚愕的是，國王竟然還給一位在梵蒂岡沒有任何官職的人士頒發了大十字勛章，這個人就是塔基·文圖里神父。  [[12]](#_12__Ran_Er_Fa_Guo_Zhu_Sheng_Zuo)

如今的教宗進入了一段與意大利獨裁者通力合作的時期。當時，尼斯主教恰好來到羅馬，教宗向他表示，多虧了墨索里尼，天主教會在意大利的核心地位才得以收復。當主教提醒他注意，教會才剛剛就公教進行會和法西斯黨惡戰了一場時，教宗卻將這一事件怪罪給墨索里尼身邊的反教會人士。教宗說道：“那一天的會面景象浮現在我的眼前，他當時就坐在你現在坐的位置，告訴我說，‘我承認我們犯下了一些錯誤，但為了此事，我必須與手下全部人員抗爭，才能遏制住他們’。”  [[13]](#_13__Jiao_Zong_Zuo_Chu_Zhe_Fan_Y)

\* \* \* \* \*

這一年也是教宗的七十五歲大壽，世界各地的媒體紛紛借此機會向他表達景仰之情。《紐約時報雜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刊登了一篇長文，大談“他們的重大發現”，“在這位梵蒂岡圖書館館長文靜的學者派頭背后，竟然現出天生統治者的品質”。（《紐約時報雜志》的這番評論令我們不自覺地回想起切薩雷·德·維基三年前面見教宗后做出的評價：“在圣父的意愿面前，任何其他意愿只能靠邊讓路。”他還補充道，他可以很輕易地就把庇護十一世想象成一位政府首腦或軍隊領袖。“任何詭計碰上這塊冷酷的花崗巖都要徹底粉碎。”  [[14]](#_14__ASMAE__AISS__b__4__protocol)  ）庇護走起路來仍然輕快得像個年輕人，《紐約時報雜志》斷言他醒著的時候幾乎把所有時間都用在工作上。  [[15]](#_15__A_Na_Er_Duo__Ke_Te_Xi____Qi)

教宗的日程自然十分繁忙。此次圣年（1933年至1934年）共有兩百萬朝圣者抵達羅馬，而他接見了其中許多人，做了無數次演講，舉行了無數次彌撒。此次圣年是為了紀念耶穌受難一千九百周年，要從1933年的復活節一直持續到下一年的復活節。  [[16]](#_16__C__Wingfield__Annual_Report)

庇護十一世并不擅長演講。接見公眾時，他總是一邊構思一邊講話，語速緩慢，并且常常停下來思索接下來要講的內容。他常常談論“圣父之所”或者“信徒共有的圣父”。其他時候，他會利用圣節或者朝圣者的特征（比如國籍或者職業）來組織演講話題。他的演講出了名的冗長，考慮到這一點，再加上龐大的聽眾數量，現場令人窒息的悶熱時常讓人挨不到他講話結束就暈過去，也就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了。1934年的大齋節，他教導一群神父，布道要盡量簡短，可是他自己卻足足講了四十五分鐘才把話說完。  [[17]](#_17__Tardini_1988__p__296__entry)

教廷的樞機以及其他高級教士在他面前依然擔驚受怕。巴黎大主教觀察到，教宗永遠都不會承認錯誤，并且習慣使用精煉有力的措辭表達自己認為不容置疑的真理。受人尊敬的加埃塔諾·比斯萊蒂（Gaetano Bisleti）樞機曾在1922年為拉蒂戴上了教宗的三重冕，他準備演講時都要前往自己鐘愛的那個梵蒂岡禮拜堂，雙膝跪在大理石地板上，祈禱教宗不會在他的演講內容中挑出錯誤。阿爾貝托·梅拉（Alberto Mella）蒙席在卡恰之后被任命為典禮長，他在進入教宗的書房前總要對天堂里的圣徒祈禱，希望教宗不至于覺得他不夠盡職盡責。許多樞機都害怕接近教宗，擔心引起他的怒火，于是便委托帕切利，希望他能夠運用外交手腕說服教宗達到他們的目的。  [[18]](#_18__Papin_1977__pp__56__62__Con)

可是面對平信徒的時候，教宗卻懂得用話語去打動他們。通常來說，當拜訪者進入教宗所在的使徒宮時，需要行三次跪拜禮，非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一樣需要向教宗屈膝，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會輕易接受這種規矩。有一天，教宗接見了一群新教徒。所有人都單膝跪地，只有一人挑釁地（卻有點不太穩當地）站在那里。教宗的助手們都緊張起來，互相交換眼色，決定該由誰出面去解決這個問題。然而就在他們互使眼色的時候，教宗卻走向這位不肯屈膝的人，詢問他：“你是否愿意接受一位老人的降福？”這番關照已經令這位富有反抗精神的新教徒徹底折服，于是他也屈膝跪了下來。  [[19]](#_19__Pi_Ai_Er__Fan__Pa_Sen____Mi)

按照歐洲皇室的習俗，教宗在書房抽屜里放著幾袋錢幣，用來打賞那些合情合理的請愿人。皮扎爾多手下的副國務卿、非常教務部副部長多梅尼科·塔爾迪尼負責協調援助蘇俄的事宜，并且常常申請資金。這位身材矮小、留著一頭又粗又黑的凌亂頭發的羅馬高級教士長著一張方臉，對教宗的情緒非常敏感。“9點時，我跟隨教宗又聽了一個小時的請愿，”塔爾迪尼在1934年4月9日的日記中這么寫道，“今天，他興致高漲；我有一把絕不會出錯的標尺，那就是他批準的資助數額。”當塔爾迪尼詳細地講述他的請求時，教宗心不在焉，從抽屜里拿出金幣，按照大小重新分類，在書桌上碼出了整齊的幾堆。

盡管教宗的幽默感不為人知，但是當他心情好的時候，確實會說一些詼諧的話。那年早些時候，他曾急切地召來法國大使，討論一些他想到的問題。大使抵達時并沒有穿著正式的服裝，他就此向教宗表示歉意。教宗只是笑了笑。“我懂的，”他說道，“平常你來的時候，都是皮面精裝本，今天你卻是個平裝本。”  [[20]](#_20__Tardini_1988__p__313__Charl)

但是教宗心情不好的時候極易發怒。“今天，”塔爾迪尼在10月5日寫道，“教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傾向于提出異議。這完全倚仗他的情緒，倚仗過去痛苦的經歷，倚仗……他是否消化不良，我真是不懂。但可以肯定的是，教宗總是疑心很重，他的行為傾向于同別人的建議相左。”塔爾迪尼很了解教宗，于是想出了一個解決辦法。當教宗心情不好的時候，他定然會拒絕任何請求，所以在這種日子，塔爾迪尼提出的請求就會跟他實際想要達成的效果相反，這樣他就能確保達成自己的目的，至少他自己是這么聲稱的。“我今天就是這么辦事的，”塔爾迪尼在某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并且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21]](#_21__Tardini_1988__p__355)

盡管教宗的日程十分繁重，但他也會適度消遣。他熱愛秩序井然，所以謹慎地將書桌里的每一樣東西都放在恰當的位置，并且從不浪費任何東西。他甚至有一堆擺放整齊的綁帶，都來自他打開的包裹。他是絲綢廠總管的兒子，所以喜歡小巧的機械制品。多年來，他的書桌抽屜里都放著一柄小螺絲刀，用來修理鬧鐘等物件。當他的白背心被油污或者墨跡弄臟時，他會趁沒人注意的時候想辦法把它擦干凈。  [[22]](#_22__Confalonieri_1969__pp__42_4)

如今，教宗沒有必要再自稱“梵蒂岡囚徒”了，他已經有了新的消遣可以享受。1933年7月10日，他坐上了一輛拉著布簾的馬車，第一次離開羅馬，前往位于阿爾巴諾山岡多菲堡的教宗府邸。這個地區涼爽沁人的空氣、馳名的葡萄酒與自然風光，自古以來便吸引著地位崇高的羅馬人。那里的教宗府邸自1869年起便荒廢不用。庇護十一世第一次前往時，審視了仍在進行的修復工作。從下一年開始，他將在那里避暑。1934年和1935年，他在那里待了兩個月，后來還會待更久。在避暑山莊的每一天，他的助手都會呈上文件供他審閱，他也在那里接見民眾。但在那里，他的生活步調不再那么緊湊。當教宗在寬闊的花園中漫步時，他可以向下俯瞰一百多米，欣賞那個在死火山口積水而成的湖泊。呼吸新鮮的空氣并且感受自然的親近令教宗感到非常愉悅，他不由得回想起那段被他遠遠拋在身后的小鎮生活。  [[23]](#_23__R__H__Clive__Annual_Report)

\* \* \* \* \*

庇護自然希望墨索里尼能夠幫他對抗新教帶來的威脅，領袖本不該對此感到驚訝。  [[24]](#_24__ARSI__TV__b__8__fasc__442)  在簽訂宗教事務協約之后，政府發布了一些指示，明確了政府對非天主教宗教的態度，而這些指示令教宗頗為不快。“我曾經告訴政府首腦，”教宗大使回憶道，正是他向墨索里尼轉達了教宗的不滿，“新教這等異教信仰不過是天主教的寄生蟲，它通過破壞真正的教會才得以生存，你們讓兩者平起平坐的意圖不僅完全不公平，而且是對我方莫大的侮辱。”  [[25]](#_25__ASV__ANI__pos__23__fasc__2)  在接下來的那一年，也即1931年，教宗又派大使重提了他的要求。他告訴墨索里尼，新教的傳教活動給這個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危險。政府必須更嚴厲地管束他們。  [[26]](#_26__Pi_Zha_Er_Duo_Meng_Xi_Zai_1)

為了敦促政府鎮壓新教徒，教宗也動用了在他看來能令墨索里尼受益的理由，其中最有希望達成他目的的，莫過于如下理由：對天主教會的忠誠與對法西斯的忠誠是一致的。教宗堅稱新教是一股反意大利的外族勢力，對教會和墨索里尼都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公教進行會的成員時刻戒備著，留心觀察周圍有沒有新教活動的跡象。在1931年5月的一個典型案例中，意大利中部一個城鎮的公教進行會負責人致信墨索里尼，譴責當地發放新教傳教材料。他們要求領袖確保“禁止任何形式的新教傳教活動”。  [[27]](#_27__ASV__ANI__pos__49__fasc__2)

就墨索里尼而言，他并不情愿解散新教徒的集會，也不樂意沒收他們的傳教材料。1932年11月，當教宗再次派遣大使要求政府采取行動時，領袖突然就翻臉了。“最好不要這么夸大事實。”獨裁者不耐煩地回答道。這些政府行為給新教國家的領導人帶來了負面印象，他還補充說，梵蒂岡的報紙歇斯底里地刊登長文抨擊新教，這樣的宣傳令他們感到驚恐。  [[28]](#_28__ASV__ANI_pos__23__fasc__4)

然而教宗根本不懼怕這番說辭，幾個月后他又舊事重提，表示意大利的新教徒乃是他背上“最為沉重的十字架”。從教宗大使嘴里聽到這番話，墨索里尼再度指出意大利的新教人口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這番解釋還是沒能給教宗造成任何影響。  [[29]](#_29__ASV__ANI__pos__23__fasc__5)

盡管這些訴求主要由教宗大使博爾貢吉尼負責傳達，但塔基·文圖里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多年以來，他一直嘗試說服墨索里尼，新教徒和猶太人正策劃一個龐大且邪惡的陰謀，而瞄準的目標不僅有天主教會，還有法西斯獨裁者。  [[30]](#_30__Zhe_Xie_Nian_Jian__Tian_Zhu)  耶穌會士倚仗一套情報網絡來獲取邪教陰謀的最新消息。1933年6月，他給帕切利樞機送去了一份報告。

“我相信我所遞交的這份報告，絕對會令您感興趣。”塔基·文圖里在報告的封面寫道。至于這份報告的準確性，他告訴帕切利說：“我不認為這份報告存有任何可疑之處，其作者不僅誠實地記錄了內容，而且他具有相當的地位，很清楚自己記錄的東西具有怎樣的意義。”

塔基·文圖里的秘密情報人表示，他最近看到了一份出自內務部的通知，下達給意大利所有省督，要他們留意神父的政治活動。他覺得這件事情非常奇怪，因為“整個世界都知道，所有教會人士、所有意大利天主教組織以及所有意大利天主教徒都以極大的熱忱愛戴領袖和法西斯政權”。

政府在這樣的監視活動上浪費資源，其原因只可能有一個：“在政府的核心，即各大部委之中，有一些高級官員要么是猶太人，要么是共濟會成員，他們希望各地省督永遠將神職人員和天主教徒看作……敵人！！！”  [[31]](#_31__Sheng_Lue_Hao_Wei_Yuan_Wen)  他表示，與其浪費時間調查神父，政府當局應該探查“猶太人、共濟會成員和新教徒組織可怕而卑鄙的顛覆性活動，他們假扮成法西斯的擁護者，實際上是意大利的封建地主”。墨索里尼必須被警醒。  [[32]](#_32__ASV__AESI__pos__855__fasc)

\* \* \* \* \*

猶太人是一股邪惡的力量，是幕后黑手，推動著一場反對基督教、反對歐洲文明的陰謀，波及整個世界——這番說辭對梵蒂岡而言可謂老生常談，而《公教文明》的那些耶穌會士是這類言論最狂熱的支持者。

一篇題為《世界革命和猶太人》的專題文章曾于1922年10月下旬刊登在這本受到梵蒂岡監督的期刊上，而當時的法西斯黨人正“進軍羅馬”。文中的世界混亂四起，神秘力量組織工人罷工和動亂，希望能發動共產主義革命。參加這些反叛運動的盲信民眾不過是些棋子，而透露出來的跡象顯示，操縱這些民眾的隱秘力量源自“猶太區”。

這篇文章發出警告，當下發生在俄國的戰爭將會決定這個世界的未來走向。實施恐怖統治的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人并非“俄國本土人”，而是“猶太入侵者”，他們非常狡猾，用斯拉夫人的假名掩蓋了自己的真實身份。該文作者聲稱，布爾什維克政權最高官員的名單顯示，這五百四十五位官員中只有三十位是真正的俄國人。“猶太民族足足占據了四百四十七個職位”，其他民族則占據了余下的席位。簡而言之，盡管猶太人口的比例不到俄國總人口的5%，“如今這個少數族裔卻侵占了所有權力渠道，并在這個國家形成了獨裁統治”。  [[33]](#_33____Shi_Jie_Ge_Ming_He_You_Ta)

1922年的這篇文章影響深遠，因為它的觀點后來為納粹黨所用，為他們的反猶行徑提供了最核心的辯護。意大利國內外的天主教出版物都開始宣揚這一陰謀理論（俄國革命領導人基本上都是猶太人，而不是真正的“俄國人”），而這種宣傳也為政府反對歐洲猶太人提供了最重要、最致命的理論彈藥。  [[34]](#_34__Zai_Ben_Shu_Di_San_Bu_Fen)

接下來的那期《公教文明》是墨索里尼上臺后的第一期，它從奧地利帶回了一則新聞，題作《猶太—共濟會社會主義在奧地利施行暴政》。這份刊物的報道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維也納的十九個共濟會分會合并成一個總會。“其高層官員無一例外都是猶太人。”他們的目標是將這個世界“納入共濟會的統治，而共濟會則受到猶太人的主宰”。這份刊物發出警告，如果他們取得成功，“維也納就會成為一座猶太城市，所有房屋和財產都會歸屬他們，猶太人將成為主人，而基督徒則被貶作奴仆”。《公教文明》最后總結道，奧地利“毫無疑問將受到猶太人的統治和奴役，總之這便是秉持社會主義的猶太—共濟會領導人的指導思想”。  [[35]](#_35____You_Tai___Gong_Ji_Hui_She)

在那個時候，墨索里尼并不相信猶太人、共濟會成員以及新教徒在策劃一個聯動全世界的陰謀，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教宗的耶穌會特使塔基·文圖里會傾盡全力，說服他用這個理論去看待這個世界。  [[36]](#_36__Chang_Jiu_Yi_Lai__Fan_Di_Ga)

1925年，在墨索里尼的老家羅馬涅，公教進行會官方雜志《覺醒者》（La Risveglia ）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提醒讀者警惕猶太人帶來的威脅。這份刊物表示，猶太人和共濟會秘密地控制了國際金融，并且“懷著魔鬼的貪婪從基督精神吸取能量”。除非基督教徒反抗這些魔鬼的代言人，否則他們會繼續為非作歹。還有一篇文章很可能基于《公教文明》1922年那篇文章，將俄國革命和共產主義怪罪到猶太人頭上。它警醒道：“猶太人都是拜金狂，他們做夢都想要粉碎基督不屈不撓的靈魂。”《覺醒者》還援引中世紀的指控，認為猶太人是“瘋狂地吮吸基督圣血”的謀殺犯。  [[37]](#_37__Zui_Wei_Chang_Jian_De_Yi_Zh)  那一年登載的其他文章也重復了官方的虛假指控，稱蘇俄政府的絕大部分“委員”都是猶太人，并將他們形容為一個寄生蟲“種族”，其目標就是要折磨并奴役基督徒。  [[38]](#_38__Na_Er_Dai_Li__1996__pp__40)

啟蒙運動早已被妖魔化，但凡在這一運動中受益的人群，這幾十年來也都遭到了梵蒂岡的妖魔化，其中就有自由黨人、共濟會成員、猶太人以及新教徒。它斥責這些人在行魔鬼之業，千方百計要破壞人們對唯一真正宗教的信仰。意大利上下所有天主教媒體都在給這種恐懼煽風點火。  [[39]](#_39__Pa_Duo_Wa_Zhu_Jiao_Jiao_Qu)  庇護十一世大體上也持有這種世界觀。在1928年的通諭《現世可死亡的心靈》（Mortalium animos ）中，他禁止天主教徒參加任何宣揚跨信仰交流的團體。

1928年3月，由教宗領導的宗教裁判所發出命令，要求名叫“以色列之友”的國際天主教組織立即解散。這一組織始于兩年前，其宗旨是幫助猶太人皈依基督教，這也是天主教會公認的一大使命。這一組織的成員不僅包括數千名神父，還包括二百七十八名主教和十九名樞機。

然而這一組織的領導人很快就逾越了界限，超出了梵蒂岡能夠容忍的范圍。他們相信，尊重猶太人是令他們皈依天主教的重要手段。所以無論對教會官方的訓導（猶太人是殺害基督的兇手，受到天主的詛咒），抑或對公眾的信念（猶太人受命喝下信仰基督教的兒童的血液，這是逾越節儀式的一部分），他們都有所批判。

前國務卿、宗教裁判所所長梅里·德爾瓦爾樞機代表梵蒂岡訓斥了“以色列之友”。他們竟要求把“背信棄義的猶太人”從耶穌受難日禱告詞中刪掉，梅里·德爾瓦爾對此表達了出離的憤怒。1928年2月，他通知這一組織的官員，如果希望“以色列之友”繼續存續下去，就必須將活動局限于為猶太人的皈依做禱告。他警告說，他們已經上了猶太人的當，不自覺地成了猶太人的工具，幫助他們實施邪惡的陰謀，“滲透到現代社會的所有領域”，并且試圖“重建以色列國，反抗基督及其教會”。梅里·德爾瓦爾在3月初拜見教宗時，發現庇護與自己達成了共識，認為“在‘以色列之友’背后，可以看出猶太人的干涉和詭計”。  [[40]](#_40__Mei_Li__De_Er_Wa_Er_Fu_Shu)

教宗對采取行動的重要性表示了認同，但是他也有所顧慮。封禁一個名叫“以色列之友”的教會組織，可能會給他招致反猶的指控。他堅持要在解散該組織的教令中添加一個段落，表明教會反對任何反猶主義的立場。  [[41]](#_41__Hou_Xu_Fa_Zhan_Zheng_Ming_J)  為了確保信徒正確理解這份教令的含義，他要求親信顧問以及《公教文明》前主編恩里科·羅薩在這份刊物中發表文章，解釋這份教令的義理。

羅薩在《猶太人的威脅與“以色列之友”》中寫道，這份要求該組織解散的教令譴責了反猶主義的“反基督教形式和精神”。他解釋說：“在艱苦卓絕地抵御猶太威脅的過程中，《公教文明》始終如履薄冰地平衡著寬容與正義，避免……放任無度的反猶行徑，并且立場鮮明地同它作斗爭。”然而，教會也必須“用同樣的警惕保護自身，避免走向同樣危險的另一種極端”。天主教徒不能忽視猶太人帶來的重大威脅。在19世紀，盡管教會長久以來都反對如此，猶太人卻被賦予平等的權利；從那以后，他們就變得“大膽而強勢，利用平等的借口為自己取得了支配和特權地位，尤其是在經濟領域”。

羅薩的文章還將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怪罪到猶太人頭上。他警告說，如今猶太人帶來的威脅已迫在眉睫，歐洲各國政府的松懈令人感到費解，結果是，猶太人已經在“公共生活的諸多領域形成霸權，尤其是經濟和工業領域以及高端金融領域，據說在這方面他們已經大權獨攬。他們能夠命令各國及其政府在政治以及金融方面制定法律，沒有任何人膽敢與他們為敵”。他最后說道，歐洲各地的猶太人都在通力合作，“密謀在全世界達成霸權統治”。  [[42]](#_42____You_Tai_Ren_De_Wei_Xie_Yu)

\* \* \* \* \*

意大利的猶太人和新教徒有一種感受，他們感到自己不斷被邊緣化。墨索里尼情婦瑪格麗塔·薩爾法蒂的處境便是這一情況的晴雨表：她發覺政府已經緊密地同天主教會團結在一起，于是決定受洗。塔基·文圖里在1928年主持了這場儀式，并且她的兩個孩子也很快隨母親受洗。  [[43]](#_43__Zhe_Wei_Ye_Su_Hui_Shi_Sheng)

到了1933年，法西斯媒體已經同天主教媒體達成共識，認為猶太陰謀同時針對天主教會和法西斯政權。一份熱那亞報紙首先聲明自己并非針對任何猶太人個體，進而宣稱意大利需要“同猶太復國主義—共濟會—布爾什維克主義—國際宗派主義作斗爭，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且強有力的實體，其目標是要破壞基督教文明”。  [[44]](#_44____Li_Gu_Li_Ya_Ren_Min_Bao)

塔基·文圖里的憂患意識主要投射在猶太人身上，教宗則更關注共產主義傳播所造成的威脅。  [[45]](#_45__Kent_1981__pp__128_129)  1932年，在新任法國大使弗朗索瓦·夏爾—魯（François Charles-Roux）向法國外交部提交的報告中，他寫道，教宗不斷地警告眾人注意共產主義的威脅，顯得“十分狂熱”。在最近的德國選舉中，納粹黨（此時它已是德國最大的政黨）大獲成功，所以這位法國人迫切地想要討論希特勒給歐洲各國造成的威脅，然而庇護卻堅稱法國應該擔憂的是共產主義的威脅，而非納粹黨的崛起。  [[46]](#_46___Kuang_Re__Yi_Ci_Chu_Xian_Z)

那年下半年，富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教宗聽聞這位新任總統準備在外交上承認蘇聯的合法地位，擔心此舉會極大地促進共產主義在美國的傳播，于是讓帕切利聯絡了華盛頓的宗座代表。他表示最好由美國教會而非梵蒂岡來施加壓力，并授意紐約大主教帕特里克·約瑟夫·海耶斯樞機代表美國教會高層同羅斯福協商此事。  [[47]](#_47__ASV__AESS__pos__474__fasc)

與此同時，教宗還不斷給法西斯政府施壓，要求他們限制新教徒在意大利的權利。此前，意大利警方禁止他們舉行公開集會，但允許新教徒舉行非公開集會（多半是在家中），1934年，在教宗不斷的施壓下，政府最終答應禁止新教徒舉行以傳教為目標的非公開集會。

不過令教宗感到不悅的是，法官們并不愿意執行這道新禁令。他們認為這道禁令不僅違背了意大利憲法，也違背了宗教事務協約有關“得到容忍的”教派的條款。教宗派出大使向司法部部長提出抗議。部長對這一狀況深表同情，卻明言自己也無能為力。他解釋道，不幸的是，法官斷案有時候完全倚仗自己的判斷。  [[48]](#_48__Bo_Er_Gong_Ji_Ni_Xiang_Yao)

\* \* \* \* \*

在另一條前線上，庇護取得了更為輝煌的戰果。正如我們所見，墨索里尼上臺不久后，就決定將天主教的宗教教導普及到所有小學；而1929年的宗教事務協約則要求將之普及到中學。然而當教宗得知，政府計劃允許高中錄取一定數量的非天主教學生，并且給他們提供相應的宗教教導時，他非常不悅。1933年3月，都靈的學校負責人準備批準該市的首席拉比向猶太高中生傳授宗教課程。教宗將不滿之情轉達給墨索里尼。他的矛頭不僅針對猶太人，還指向了新教徒。“閣下必定能看明白這一事件的嚴重性，”帕切利樞機在教宗的命令下致信意大利大使，“您只要仔細想想這件事，允許這樣的先例出現，我們就會面臨如下風險：新教徒有可能會提出相同的要求。”  [[49]](#_49__Pa_Qie_Li_Jin_Yi_Bu_Bu_Chon)

收到教會的抗議后，政府撤銷了這份批給都靈拉比的許可，并且中止了另外一份打算批給米蘭拉比的許可。  [[50]](#_50__ASMAE__AISS__b__21__De_Vecc)  教宗告訴墨索里尼，聽聞這些消息，他感到“非常高興”。  [[51]](#_51__Qing_Gao_Su_De__Wei_Ji__Jia)

[[1]](#filepos648424) 據德·維基所說，這次訪問差點在最后關頭取消，因為訪問前一天的《羅馬觀察報》完全沒有提及這次訪問，令墨索里尼大為光火。皮扎爾多蒙席從中調停，安排這份梵蒂岡日報在當天下午發行了刊登這則新聞的特刊，才幫助德·維基安撫好墨索里尼，按照原定計劃繼續這次訪問。De Vecchi 1983, pp. 219–221.

[[2]](#filepos648844) 一周后，又有一篇報道稱這一訪問“幾乎確定”將安排在本周。阿納爾多·科特西，《墨索里尼訪問教宗安排確定……甚至可能就在今天》，NYT, September 17, 1931, p. 13。法國大使在報告中表示，這一訪問已經確定安排在9月19日，然而墨索里尼在最后關頭退出了，因為9月20日的節日近幾年才取消，而把訪問安排在這個節日的前夕，“可能會被看作是一種投降”。MAEI, vol. 266, 178, Fontena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9septembre 1931.

[[3]](#filepos649138) MAEI, vol. 266, 209–211, Fontenay au Président du Conseil,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7 janvier 1932.

[[4]](#filepos649310) 11月27日，帕切利樞機在跟塔基·文圖里談話之后，在自己的筆記中記錄了這一安排。ASV, AESS, pos. 430b, fasc. 357, f. 68. 1931年12月19日，一張標注為“由圣父復述給最顯赫的帕切利”的字條指示塔基·文圖里告知墨索里尼，教宗（“在經過沉思之后”）決定同意將訪問安排在2月11日。他還告訴墨索里尼，教宗將這一安排作如下解讀，即最近墨索里尼在對待公教進行會方面損害了宗教事務協約，領袖希望借此表達自己做出彌補的意愿。“我必須把這些話說出來，因為墨索里尼前來訪問的那天，教宗會接待他，讓他坐下，面帶笑容地告訴他，他很樂意接受這樣日期的安排……因為他認為[墨索里尼]秉著值得稱贊的目的，希望能夠改正錯誤，彌補對第43條和第44條（宗教事務協約的這兩條許可公教進行會自由地開展活動）的侵犯。”ARSI, TV, b. 20, fasc. 1524, Pacelli a Tacchi Venturi, 19 dicembre 1931.

[[5]](#filepos650109) 幾天前，博爾貢吉尼曾在教宗的命令下前去奎里納爾宮，將基督最高爵士領環（the Collar of the Supreme Order of Christ）授給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基督最高爵士領環授予意大利國王》，OR, 7–8 gennaio 1932,p. 1。然后為了一視同仁，教宗大使還將庇護大十字勛章（the Great Cross of the Piano Order）授給切薩雷·德·維基和外交部部長迪諾·格蘭迪。《庇護大十字勛章授予意大利部長格蘭迪和大使德·維基》，OR, 12 gennaio 1932, p. 2。法國駐圣座大使提前就知道教宗打算為國王、墨索里尼等人頒發勛章的消息。他誤以為教宗之所以授予他們這些勛章，是因為墨索里尼曾給帕切利、博爾貢吉尼和塔基·文圖里頒發過勛章，但是梵蒂岡卻沒有任何回饋，由此引發了政府的不滿。MAEI, vol.266,202–204, Fontenay au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8 janvier 1932.

[[6]](#filepos653589) 《我方消息》，OR, 12 febbraio 1932, p. 1。關于那名遭到驅趕的女性，參見摩根（1939, pp. 190–197）的描述，當時他受邀在場，目睹了發生的一切。但是梵蒂岡或意大利的媒體都沒有提及這件事。

[[7]](#filepos654246) 這幅插畫刊登在1932年2月21日《星期日郵報》的頭版。埃米爾·路德維希對墨索里尼的長篇采訪集結成冊，翻譯成意大利語出版，而這本書有好幾個段落都冒犯了教宗，其中一段是領袖談論他如何拒絕向教宗鞠躬以及親吻他的戒指。這一段以及其他令教宗反感的段落（墨索里尼在其中一段談到，他認為人民有權自行決定如何敬拜天主）都在意大利語版的新版中被刪除了。MAEI, vol. 266, 255, Charles- Roux à président du conseil, 29 juillet 1932；MAEI, vol. 291–292, 27 ottobre 1932; Chiron 2006, p. 293。7月，據意大利駐圣座大使館的德·維基副手所言，墨索里尼曾說，“這個老猶太人背叛了我”，竟然把他關于教會的評論都出版出來。ASV, AESI, pos. 887, fasc. 593, f.42r, 15 luglio 1932. 11月10日，塔基·文圖里高興地報告說，路德維希采訪的新版已經付梓了，篇幅縮減了五頁，“羅馬與天主教會”那一部分中所有令教會不快的內容都已經刪除了。ASV, AESI, pos. 667, fasc. 128, f. 48r.

[[8]](#filepos654905) 大衛·達拉，《教宗與領袖在友好條約下緊握雙手》， CDT, February 12,1932, p. 10；阿納爾多·科特西，《教宗與墨索里尼在梵蒂岡會面，雙方氣氛友好》，NYT, February 12, 1932, p. 1。

[[9]](#filepos658556) 墨索里尼親筆撰寫了與教宗會面的報告，并呈送給國王，這份報告收于ACS, CV, b. 1, fasc. 34；這一報告后來被刊登出來，復本收于DDI, series 7, vol. 11, n.205。關于這場會面的聲勢浩大，相關描寫參見CC 1932 I, pp. 480–481。

[[10]](#filepos659003) 《墨索里尼先生與教宗》，《泰晤士報》，1932年2月12日，第12版。

[[11]](#filepos659501) E. Mussolini 1957, p. 135.

[[12]](#filepos660259) 然而法國駐圣座大使豐特奈擔心，雙方這樣互贈勛章會給意大利天主教徒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讓他們以為“圣座已經認同了法西斯主義”。MAEI, vol. 266, 229–231, Fontenay à président du conseil,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4 mars 1932; and vol. 232–233, 10 mars 1932.塔基·文圖里曾致信墨索里尼，就勛章一事向他表示感謝，這封信收于ACS, CR, b. 68, 7 marzo 1932。在寫給耶穌會總會長的信中，塔基·文圖里寫道，德·維基曾告訴他，墨索里尼想要表彰整個耶穌會，感謝他們所做的一切，令意大利政府和天主教會增進了理解。ARSI, TV, b. 20, fasc. 1534, Tacchi Venturi a Ledóchowski, 3 marzo 1932.

[[13]](#filepos661045) 教宗做出這番言論是在1932年末。MAEI, vol. 266, 298–299, Charles- Roux à président du conseil, 15 decembre 1932.

[[14]](#filepos661992) ASMAE, AISS, b. 4, protocollo 24, De Vecchi a Mussolini, Roma, 21 luglio 1929; DeVecchi 1998, pp. 15–16.

[[15]](#filepos662251) 阿納爾多·科特西，《七十五歲的教宗庇護：學者與領導人》，NYT Magazine, May 29, 1932,p. 3。

[[16]](#filepos662716) 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 1935, R 402/402/22, in Hachey 1972, pp.287–288, sections 138–140.

[[17]](#filepos663545) Tardini 1988, p. 296 (entry for 13 febbraio 1934); Charles- Roux 1947, p. 62.

[[18]](#filepos664550) Papin 1977, pp. 56, 62; Confalonieri 1957, p. 188; Ottaviani 1969, pp. 504–505.

[[19]](#filepos665468) 皮埃爾·凡·帕森，《面見教宗的那一天》，BG, February 11, 1934, p. C5.

[[20]](#filepos666856) Tardini 1988, p. 313; Charles- Roux 1947, p. 23. On Tardini, see Riccardi 1982 and Casula 1988.

[[21]](#filepos667813) Tardini 1988, p. 355.

[[22]](#filepos668494) Confalonieri 1969, pp. 42–43.

[[23]](#filepos669692) R. H. Clive, Annual Report 1933, January 1, 1934, R 153/153/22, in Hachey 1972, p.259, sections 117, 118; Agostino 1991, p. 19.

[[24]](#filepos670021) ARSI, TV, b. 8, fasc. 442, 446.在簽訂《拉特蘭條約》之后，塔基·文圖里代表教宗不斷地在這一方面施加壓力。1930年5月，他給墨索里尼發去了一份清單，上面羅列了所有新教教堂的具體位置。ARSI, TV, b. 19, fasc. 1408, “Protestanti. Lasituazione in Italia nel 1930,” with draft of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3 maggio 1930.

[[25]](#filepos670607) ASV, ANI, pos. 23, fasc. 2, 6. 129r–130r, 4 giugno 1930.

[[26]](#filepos670933) 皮扎爾多蒙席在1931年2月告知教宗大使，“圣父向我透露，意大利人的宗教團結和民族團結正面臨著嚴重的威脅，它來自愈演愈烈的新教傳教活動，然而政府卻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威脅也危及他們自身”。教宗認為，墨索里尼“想要維護這個民族的精神團結”的熱忱值得贊揚，但是他應該“把足夠的精力拿來反對上述異端、異族的傳教活動”。博爾貢吉尼在與德·維基的會面中傳達了教宗的這一要求。ASV, ANI, pos. 49, fasc. 2, f. 21r,15 febbraio 1931.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梵蒂岡發起了猛烈的反新教運動。Moro 2003, p. 317.教宗在1928年主顯節發表的通諭《現世可死亡的心靈》為這一運動定下基調，它禁止天主教徒參加任何鼓勵不同基督教團體相互對話的組織或會議。“所以，可敬的教友們，羅馬教廷為何從來不允許信徒參加任何非天主教集會，原因已經再清楚不過：曾有一些教派在過去離開了唯一真正的基督教會，只有推動這些教派回歸唯一真正的基督教會，我們才能夠推動基督教徒的聯合。我們所有人都能夠得見，出于創世主的意愿，唯一真正的基督教會仍然是他創立之初的那個教會。”這篇通諭的英語譯文收錄在http://www.papalencyclicals.net/Pius11/P11MORTA.HTM。另參見Perin 2011, p. 151。

[[27]](#filepos671771) ASV, ANI, pos. 49, fasc. 2, 6. 122r–122v, 14 maggio 1931, Alanna.新教徒意圖在意大利設立教堂，然而此舉遭到了天主教會的公然抗議，它還給政府官員施壓，要求他們阻止新教教堂的建設。這方面的討論參見Rochat 1990, pp.218–222。1931年4月8日，公教進行會的沖突正愈演愈烈，博爾貢吉尼告訴德·維基，教宗希望政府能“積極地阻止這一瘋狂的傳教活動”。德·維基試圖讓大使冷靜下來，并提醒他注意宗教事務協約允許其他宗教的成員和平地開展宗教活動。但他也知道教宗對公教進行會近來遭受的暴行愈發惱火，所以大使想了個辦法平復教宗的怒火。他告訴教宗大使，一旦雙方關系回到“正常的軌道”，政府會想辦法滿足教宗，禁止新教在意大利開展傳教活動。ASV, AESI, pos.794, fasc. 389, f. 55r, 9 aprile 1931.幾個月后，《公教文明》刊登了一篇長文，題作《面對新教在意大利傳教時，天主教徒肩負何等責任》。它開篇首先提出問題，意大利是否真的面臨“新教的威脅”，并對這個問題做出了極其肯定的答復。這份由梵蒂岡監管的期刊告訴其讀者，新教意味著“去基督化”。它還將新教敵人同其他敵人（比如自由主義，該文稱它“完全出自新教的源頭”）聯系起來。這份期刊還呼吁讀者采取行動。在“撕下敵人的面具！”一節，它警告讀者，一場龐大的新教陰謀已然展開。這份期刊還告訴讀者，幸運的是領袖站在了羅馬天主教這一邊，因為他也意識到，如果意大利人背離了天主教，將會給民族團結造成巨大的風險。《面對新教在意大利傳教時，天主教徒肩負何等責任》，CC 1932 IV pp. 328–343。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中，《羅馬觀察報》將瓦勒度派（意大利最大的新教團體，主要集中在東北部）描述作一個犯罪團體（un’associazione a delinquere），這個詞如今主要用來形容黑手黨。Spini 2007, p. 133.

[[28]](#filepos672383) ASV, ANI pos. 23, fasc. 4, 6. 47r–47v,博爾貢吉尼，《給政府首腦的建言》，1932年11月22日。

[[29]](#filepos672851) ASV, ANI, pos. 23, fasc. 5, 6. 15r–19r, Borgongini a Pacelli, 18 marzo 1933. 博爾貢吉尼與墨索里尼的會面日期是3月14日。

[[30]](#filepos673297) 這些年間，天主教會到處推銷這套陰謀理論。1931年5月，由于梵蒂岡要求意大利各地主教報告當地的新教活動，于是莫諾波利（靠近意大利南部的巴里）主教便訴苦說，他的教區中有一群新教徒。他在報告里寫道，這些人受到了美國移民的指使。他全盤接受了教會的理論，認為新教徒企圖顛覆天主教會和法西斯政權，所以又呼吁政府當局出面阻止這些人的陰謀。但是他擔心政府會顧忌美國方面的感受，而不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動，畢竟美國掌控在猶太人和共濟會的手里，也正是他們主導了破壞天主教會的新教活動。Perin 2010, pp. 147–148.

[[31]](#filepos674663) 省略號為原文所有。

[[32]](#filepos675042) ASV, AESI, pos. 855, fasc. 548, 6. 38r–39r.

[[33]](#filepos676745) 《世界革命和猶太人》，CC 1922 IV, pp. 111–121。

[[34]](#filepos677286) 在本書第三部分，我會探討在意大利引入“種族法案”時，梵蒂岡如何為其奠定了基礎。

[[35]](#filepos678285) 《猶太—共濟會社會主義在奧地利施行暴政》，CC 1922 IV, pp. 369–371。

[[36]](#filepos678698) 長久以來，梵蒂岡一直把共濟會看作是它最危險的敵人。這個組織初創于倫敦，并于七年后（1724年）在羅馬成立了第一個小組。自1738年，也即教宗克雷芒十二世（Clement XII）起，歷任教宗都將那些加入共濟會的天主教徒驅逐出教，譴責他們令天主教徒墮落到跟新教徒、猶太人和非信徒同流合污的地步。共濟會被看作是世俗化運動的源頭，也跟以教會為中心的社會形態相違背。教會將法國大革命、意大利王國的統一以及教宗國的滅亡都怪罪到它的頭上。 教宗利奧十三世在1884年發表通諭《人類》（Humanum genus ），發起了一場全新的反共濟會運動，將其貶作是“魔鬼的猶太會堂”。在19世紀的最后二十年里，《公教文明》以及其他天主教出版物都不斷地發出警告，演繹這番猶太—共濟會陰謀論。很快它們又在這個魔鬼計劃中增添了第三個敵人：社會主義。它們表示，一場龐大的猶太—共濟會—社會主義陰謀企圖顛覆歐洲優秀的基督教傳統，并讓世界遵守由猶太人制定的秩序。1917年的新版教會法規確定將共濟會成員驅逐出教。Vian 2011, pp. 106–116.意大利第一個全國性質的共濟會組織與意大利王國的軍事力量同時興起，它建立于1859年，并且很快就在全國各地擁有了會所。在共濟會成員眼里，天主教會是反動政權的主要堡壘，它深深地扎根在腐朽的中世紀，于是共濟會十分堅定地支持取代教宗國的意大利新政府。他們呼吁宗教平等，于是發起運動要將神父趕出公辦學校。在當時，共濟會最具代表性的杰出會員是朱塞佩·加里巴爾迪，他不僅僅是統一意大利的大英雄，還是梵蒂岡和教會力量最尖銳的批評者。Conti 2006.19世紀末，意大利共濟會總會長阿德里亞諾·萊米（Adriano Lemmi）有一番非常出名的言論，他將教宗世俗權勢的終結看作是“世界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事件”。該組織的成員大多都是中產階級，但也包含意大利最顯赫的幾位政客。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意大利最大的共濟會組織在全國設有486個會所，共有兩萬名會員。盡管其成員大多來自天主教家庭，但考慮到意大利的新教徒和猶太人數量十分稀少，后兩者在該組織所占的比例相當高。Conti 2005.

[[37]](#filepos679602) 最為常見的一種人祭控訴，是《塔木德》要求猶太人殺害信仰基督教的兒童，用他們的鮮血制作逾越節薄餅。

[[38]](#filepos679939) 納爾代利（1996, pp. 40–50）研究了羅馬涅的這份公教進行會雜志，而我的描述則基于他的研究。

[[39]](#filepos680458) 帕多瓦主教教區的周刊在1927年也刊登了一篇這樣的文章，它斥責美國新教徒不再信仰真正的宗教，還進一步說道，新教牧師“不如學猶太人去崇拜金牛犢，反倒顯得更實誠一點”。Perin 2011, p. 185.

[[40]](#filepos682475) 梅里·德爾瓦爾復述了會面時教宗所說的話語，轉引自Deffayet 2010, p. 97。

[[41]](#filepos682907) 后續發展證明教宗確實有先見之明，因為替教宗辯護的那些人確實在后來援引這份要求“以色列之友”解散的教令，證明教宗具有反對反猶主義的立場。沃爾夫（2010, p. 121）表示教宗的這一策略“通過譴責現代反猶主義而達成了一種預防性防御”，然而沃爾夫認為“這是道德貧乏的體現，因為他很隨意地批判了其他人對猶太人的仇視，卻完全不改正自己的反猶行徑”。

[[42]](#filepos684656) 《猶太人的威脅與“以色列之友”》，CC 1928 II, pp. 335–344。

[[43]](#filepos685239) 這位耶穌會士生前收到的最后一批信件中，有一封來自薩爾法蒂，寫于他1956年逝世前一個月，她在這封信中署名為“對基督最虔誠的瑪格麗塔·薩爾法蒂”。馬里克斯（2011, pp. 309–310）在塔基·文圖里的檔案中找到了這封信，此外還有這位耶穌會士的檔案員寫下的字條，指出薩爾法蒂乃是“墨索里尼的情婦，由T.V.[塔基·文圖里]施洗皈依天主教，她的兒子[阿米迪奧]和女兒[菲亞梅塔]亦是如此”。另參見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344–345。

[[44]](#filepos685813) 《利古里亞人民報》，1933年7月1日，轉引自Starr 1939, p. 113。

[[45]](#filepos686082) Kent 1981, pp. 128–129.

[[46]](#filepos686693) “狂熱”一詞出現在MAESS, vol. 37, 36–38, Charles- Roux à Monsieur le Président du Conseil, 16 octobre 1932。夏爾——魯在7月19日（MAESS, vol. 37, 12–13）和7月23日（MAESS, vol. 36, 14–15）提交的報告中也提及了教宗針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

[[47]](#filepos687275) ASV, AESS, pos. 474, fasc. 476, 6. 58r–58v, Pacelli a Monsignor Pietro Fumasoni- Biondi,2 gennaio 1933.

[[48]](#filepos688217) 博爾貢吉尼想要說服部長，讓他明白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以及深遠的影響，于是他便將自己準備好的一本小冊子呈交給他，題作《意大利新教徒的傳教活動》。它解釋了為什么新教是天主教會與法西斯政權的共同敵人。它開篇寫道：“新教派別反對等級制度。他們的原則聲稱每個個體都可以解讀天主的啟示，因此都可以通過閱讀《圣經》自由地形成自己的解讀。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無政府主義，這一原則是所有這些民主錯誤的根基。”ASV, ANI, pos. 49, fasc. 2, 6. 281r–282r, Borgongini a Pacelli, 22 marzo 1935.這本小冊子收于ASV, ANI, pos. 49, fasc. 2, 6. 284r。引言出自p. 25。這本小冊子用二十頁的篇幅羅列了意大利境內的每一座新教教堂。

[[49]](#filepos689311) 帕切利進一步補充道：“不過我全然相信，明智的貴方一定希望免除這等丑事。”ASMAE, AISS, b. 21, Pacelli a De Vecchi, 22 marzo 1933.

[[50]](#filepos689599) ASMAE, AISS, b. 21, De Vecchi a Pacelli, 7 aprile 1933.

[[51]](#filepos689792) 請告訴德·維基，教宗跟帕切利說道，“圣父得知這些新聞，感到十分高興”。ASV, AESS, pos. 430a, fasc. 348, f. 25, 8 aprile 1933.

## 第十五章 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教宗

墨索里尼的書房里擺著一尊拿破侖的半身像，而于1933年1月登上德國總理寶座的希特勒，則早早地在他的書房里擺上了一尊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半身像。  [[1]](#_1__E__Mussolini_1957__p__143__K)  這位意大利領袖是他的榜樣。希特勒宣誓就職不久后，就給墨索里尼發去一封公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有很多共同點，他希望能增進兩國之間的關系。  [[2]](#_2__DDI__series_7__vol__13__n__6)

這些奉承雖然令墨索里尼十分受用，但他卻對這位跟班抱有疑慮。希特勒是一位“夢想家”，比起統轄一個國家，他更適合做鼓動人心的演講。至于赫爾曼·戈林，則是個“曾經住過瘋人院的精神病患者”。而且墨索里尼相信，這兩人都有自卑情結。  [[3]](#_3__DBFP__1919_1939__series_2__v)

“希特勒是個煽動群情的天才，”帕切利樞機說道，“但要在管理政府方面給他下個定論，還為時過早。”  [[4]](#_4__Pa_Qie_Li_Tong_Fa_Guo_Da_Shi)

德國的教會領袖長久以來都對希特勒極端的國家主義保持警惕，他們認為這種思想和異端邪說相去不遠  [[5]](#_5__1931Nian____Gong_Jiao_Wen_Mi)  ，然而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所以這位納粹領袖迫切想要獲得梵蒂岡的支持。正如意大利的天主教人民黨曾經妨礙到墨索里尼掌權，德國的天主教中央黨如今也成了希特勒面前的攔路虎。希特勒掌權還不到一個月，德國大使就向帕切利保證，新任總理意欲和圣座結成良好的關系。大使明說道，畢竟嘛，希特勒本人便是個天主教徒。  [[6]](#_6__ASV__AESS__pos__430b__fasc)

教宗也對納粹分子抱有疑慮。在希特勒上臺之前的那個春天，庇護十一世曾經發出疑問：“希特勒一派要是大權在握，我們還能有什么指望？”  [[7]](#_7__Dang_Feng_Te_Nai_Zui_Hou_Yi)  可希特勒擔任總理還沒過幾周，他就開始看到希望了。“我對希特勒的態度改觀了，”他在3月初時對法國大使說道，令大使頗為驚訝，“第一次有政府敢于如此堅定地譴責布爾什維克主義，它與我們站在了同一戰線上。”

“這些話語態度堅定，頗有些魯莽，”法國大使夏爾——魯回憶道，“卻向我證實，這位新任德國總理，已然通過宣布同共產主義決一死戰而令庇護十一世對他青眼有加。”  [[8]](#_8__MAESS__vol__37__63_66__Charl)  英國駐梵蒂岡大使也同樣記述了教宗對于共產主義的威脅有多么心憂。他認為，不認識到這一點，就根本理解不了庇護的行為。  [[9]](#_9___Jiao_Zong_Ren_Wei__Jiao_Hui)

教宗出人意表地開始對希特勒持正面觀點，這令德國教會領袖感到驚愕和不解。在1933年3月的競選活動中，德國天主教會的各位主教紛紛譴責納粹黨，并對中央黨予以大力支持。然而在3月12日，教宗會見了慕尼黑大主教，即米夏埃爾·馮·法烏爾哈貝爾（Michael von Faulhaber）樞機，告知他注意調整路線。返回德國之后，大主教知會了他的同仁。“我們需要深思圣父的話語，”法烏爾哈貝爾說道，“他在召開樞機會議時，盡管沒有提及那人的姓名，卻已經向全世界指明，阿道夫·希特勒乃是繼教宗本人之后，第一位出聲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家。”3月23日，希特勒便報答了教宗的好意，他宣布基督教會“是維系本國國民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他發誓要保護“教會告解在學校和教育中理應享有的影響力”。兩天后，教宗與帕切利樞機談話，表達了他對希特勒發言的賞識，贊揚了他的“好意”。及至月底，德國各位主教宣布他們不再反對納粹領導人。  [[10]](#_10__Kent_1981__pp__154_155_Wo_E)

5月，夏爾——魯再度言及教宗對希特勒的好感。“教宗天性沖動，且執迷于對共產主義的憎惡，”這位法國大使觀察道，“竟一時間對納粹領導人產生了熱忱。”意大利政府的要員明白教會支持的重要意義，他們將自己贏取教會認可的成功“秘訣”分享給納粹友人。  [[11]](#_11__MAESS__vol__37__70_77__Char)

教宗也迫切地想要同納粹政府達成共識，以便確保教會在德國的影響力。帕切利樞機是一位磋商談判的能人，他將中央黨看作是圣座的一大談判籌碼。他相信，如果教會承諾收回對中央黨的支持，梵蒂岡就能夠令當局做出保證，保障天主教組織在德國的權利，但是他沒有預料到，諸位主教收回支持后，將給中央黨本身造成多么嚴峻的后果。在他同希特勒達成協約之前，中央黨就宣布自行瓦解了。  [[12]](#_12__Wolf_2010__pp__174_175)

7月，帕切利樞機陪同德國副總理弗朗茨·馮·巴本（Franz von Papen）來到國務卿位于梵蒂岡的公寓。他們簽訂的宗教事務協約保證德國教會有權利管理自身事務，還為牧師、宗教團體以及教會財產提供了諸多保護措施，但其中大部分用語含混，尤其是涉及天主教組織和學校的那些部分。  [[13]](#_13__Zuo_Wei_Yi_Wei_Jiao_Ao_De_T)

中央黨領導人海因里希·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曾在1930年至1932年擔任過德國總理一職，此時的他已經出離憤怒。他憤怒的原因在于，梵蒂岡出賣了天主教黨派，并同希特勒共進退。他責難帕切利樞機，指控他誤解了納粹主義的本質。布呂寧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帕切利對“宗教事務協約體系”的信心，“令他和梵蒂岡走上了輕視民主、輕視議會體系的道路”。  [[14]](#_14__Ventresca_2013__pp__75_79)

\* \* \* \* \*

教宗很快就意識到，他“同惡魔的協約”（語出教會歷史學家胡貝特·沃爾夫）將不會結出他所希望的果實。  [[15]](#_15__Wolf_2010__p__178)  就在他們簽署宗教事務協約的同時，納粹黨引入了《遺傳病病患后代防止法》，這一法律將對特定的遺傳病患者進行強制的絕育手術，而這顯然與教會的教義相悖。希特勒還采取措施，侵蝕密集的教區學校網絡。納粹黨想要的是一個完全受他們掌控的教會。初秋時，梵蒂岡國務院分析了這些舉措，并得出了一份令人擔憂的報告，其中提到希特勒青年團里傳唱的一首歌曲，其歌詞將希特勒稱作他們的“救世主”。  [[16]](#_16__Wolf_2010__pp__227_228)  意大利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報紙是《意大利未來報》，10月，這份報紙的編輯向讀者發出警告，指出納粹黨正在致力組建“德國國家教會，要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到一起”。  [[17]](#_17__ASMAE__AISS__b__77___Il_pun)  12月，在教宗的圣誕節講話中，庇護十一世向各位樞機表達了他對納粹政府的失望，而帕切利和馮·巴本簽署宗教事務協約不過是五個月前的事情。  [[18]](#_18__Ji_Lu_Zai_Pa_Qie_Li_De_Bi_J)

盡管教宗對希特勒的疑慮在一步步加深，他身邊最親近的人卻在盡可能地維系這段關系的和諧與平穩。1934年初，帕切利樞機和圣座駐德國大使切薩雷·奧爾塞尼戈蒙席都曾敦促教宗謹慎發言，不要激怒希特勒，進而動搖教會的地位。  [[19]](#_19__Ju_Yi_Da_Li_Zhu_Bai_Lin_Da)  在柏林，德國神父愛德華·耶爾曼（Eduard Gehrmann）能夠繼續擔任教宗大使（在奧爾塞尼戈之前擔任這一職務的是帕切利）的私人助理，也有賴奧爾塞尼戈出手相助。梵蒂岡的一位觀察者指出，耶爾曼“對希特勒的信仰勝過了他對基督的信仰”。  [[20]](#_20__Qiao_Zhi__An_Jie_Luo_Qi__Ji)

庇護十一世將切薩雷·奧爾塞尼戈選為梵蒂岡駐納粹德國大使，這一選擇可謂意味深長。盡管梵蒂岡其他外交崗位（除了駐意大利大使）都沒有那么復雜、那么關鍵，但奧爾塞尼戈是才智有限、眼界更有限的人。奧爾塞尼戈生于米蘭北部的科莫湖區（靠近教宗的家鄉），他跟教宗一樣，父親是一家絲綢廠的總管。他父親的兩個兄弟迎娶了他母親的兩個姐妹，她們也都是附近鎮上絲綢廠總管的女兒。這三對夫婦各育有一子，其中一位將成為神父。奧爾塞尼戈1896年晉鐸，在米蘭的一個教區擔任神父；1912年，他在米蘭主教座堂獲得誦經神父頭銜。

從此往后，奧爾塞尼戈的生活就圍繞著米蘭及周邊的教會。他沒有任何外交經驗，對國際事務也沒有明顯的興趣，然而僅僅在庇護成為教宗四個月后，他就被晉升為大主教，并被任命為梵蒂岡駐荷蘭大使。這一委任在教會高層引發了大量閑言碎語，他們認為這是教宗任人唯親的最新例證，因為他并沒有選擇教會高層最為專業的人士，而是從米蘭調人過來。加斯帕里樞機主持了奧爾塞尼戈的主教祝圣儀式。這位米蘭神父驕傲地將庇護送給他的十字架戴在胸前，來迎接這一光榮的時刻，但是除了幾位擔任祭壇侍者的羅馬倫巴第神學院學生外，教堂里幾乎空無一人。

在荷蘭待了兩年后，奧爾塞尼戈又成了圣座駐匈牙利大使。1928年，當奧爾塞尼戈回到羅馬時，墨索里尼的一位線人猜測，教宗可能會讓他代替加斯帕里樞機出任梵蒂岡國務卿一職。這位線人認為，教宗最看重的品質乃是不容置疑的忠誠。這樣的舉措對于政府來說是個好消息，線人補充道，因為奧爾塞尼戈比起狡猾的加斯帕里來說，沒有那么足智多謀，更容易被人牽著鼻子走。  [[21]](#_21__ACS__MCPG__b__157__19_maggi)

盡管教宗并沒有將奧爾塞尼戈任命為國務卿，卻讓他代替帕切利擔任梵蒂岡駐德國大使。無論是在希特勒還是在帕切利樞機眼里，奧爾塞尼戈都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帕切利原本便是駐德國大使，所以在處理與柏林的關系時，他從來都不覺得有必要向他咨詢建議。奧爾塞尼戈處事小心、盡職盡責，他一直都擔心惹怒希特勒。后來，當梵蒂岡與納粹德國的關系成為教宗面前的核心議題時，他更不會替換掉奧爾塞尼戈。教宗想要的正是一個既沒有獨立思考能力，又不會咄咄逼人的大使，來搭建他和希特勒之間的橋梁。待到教宗換屆，中庸的奧爾塞尼戈也依然堅守在他的崗位，熬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些多事之秋。  [[22]](#_22__Ao_Er_Sai_Ni_Ge_De_Sheng_Pi)

教宗擔心納粹運動中包含反天主教的元素。當納粹思想領袖阿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撰寫的《20世紀的神話》（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出版時，教宗感到尤其惱火。羅森堡認為，天主將人類創造成不同的種族，高等的雅利安人注定要統治其他種族。耶穌便是雅利安人，那些猶太使徒卻玷污了他的教導。天主教并非正宗的宗教，它源自猶太人施加的影響。1934年初，宗教裁判所將這本德國暢銷書列入了“禁書名錄”。  [[23]](#_23__Pa_Qie_Li_Fan_Dui_Zhe_Yi_Ju)  希特勒倒是同這種觀點保持了距離，所以有一段時間，梵蒂岡部分人士將納粹黨的反天主教傾向怪罪給這個政黨的反教會派系，并認為希特勒與此無關。梵蒂岡對這種觀點并不陌生，因為意大利的反教會行動就不怪墨索里尼，而要怪他身邊的反教會人士。

為了讓希特勒遵守宗教事務協約，庇護反復求助于墨索里尼。  [[24]](#_24__Mo_Suo_Li_Ni_Hao_Bu_Ju_Pa_Z)  1934年春，領袖正在為他與希特勒的第一次會面做準備，教宗派人傳達了他的指示。  [[25]](#_25__5Yue_25Ri__Jiao_Zong_Ming_P)  他希望墨索里尼能夠讓希特勒保證遵守宗教事務協約。盡管這份協約生效還不到一年，但是納粹黨人已經開始無視它的存在了。所以墨索里尼還須向對方提出警告：如果希特勒令德國主教過分難堪的話，這將不是一個明智之舉，因為“他們一方面能夠給他帶來很多好處，另一方面盡管不愿意訴諸這樣的手段，卻也能夠給他造成很大的困難，因為天主教徒將會站在他們一邊”。

庇護還要求墨索里尼去游說希特勒，讓他“擺脫那些給他抹黑的黨羽”，尤其是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和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教宗認為這兩位都在鼓吹與天主教會作對。慕尼黑大主教法烏爾哈貝爾樞機近來在報告里指出了戈培爾的斑斑劣跡，他有一本寫于20世紀20年代的小說，其中抒發了對天主和耶穌基督的堅定信仰，卻對教會和神職人員十分鄙夷。“我與基督促膝長談，”戈培爾在書中寫道，“我相信我已經克服了他，但我只是克服了他底下那些崇拜偶像的神父和虛假的仆人。基督為人嚴苛且無情。”更糟糕的是，依據大主教的報告，身為天主教徒的戈培爾最近還娶了一位離過婚的新教徒，并且對方還是個“臭名昭著的同性戀”。得知教宗的要求之后，領袖表示他很樂意擔當賢明政治家的角色，并且承諾一切都照教宗要求的去辦。  [[26]](#_26__ASMAE__AISS__b__35___Udienz)

墨索里尼對這場會面并不抱有美好的期待。納粹黨人的目標是要建立日耳曼帝國，將所有日耳曼人團結在一起，這番野心令他們不可避免要吞并奧地利。然而這與意大利的外交政策相悖，因為意大利認為奧地利處于自己的勢力范圍內，并且它還是一個緩沖區，可以用來對抗侵略性極強的德國。  [[27]](#_27__Mo_Suo_Li_Ni_De_Gu_Lu_Zhong)  墨索里尼是基督社會黨人、奧地利總理恩格爾貝特·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ss）的堅強后盾；1933年3月，為了應對納粹黨人引發的動蕩局面，陶爾斐斯暫停了議會政府的工作。那一年夏天，陶爾斐斯領著他的妻兒來到羅馬涅的亞德里亞海岸，在位于里喬內（Riccione）的避暑別墅里拜訪了墨索里尼，向他尋求幫助。  [[28]](#_28__DDI__series_7__vol__14__n)  陶爾斐斯返回維也納不久后，遭到一名奧地利納粹黨的刺殺，手臂和肋骨中彈受傷。  [[29]](#_29__DDI__series_7__vol__14__n)

元首坐機在1934年6月14日上午降落威尼斯機場，而曬得很黑的領袖在那里迎接他的到來。墨索里尼身穿一套氣宇軒昂的制服，胸膛上掛著一排勛章，頭戴一頂黑色法西斯氈帽，皮帶上掛著一把匕首，腳上穿著及膝高的黑色皮靴。希特勒則外面套著一件黃色軍用風衣，頭戴一頂松軟的棕色絲絨禮帽，里面穿著一套黑色的西裝，腳踩一雙簡約的黑色鞋子。一位目擊者評論說，他像是“一個已經把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的工人”。墨索里尼喜歡用各種各樣的姿勢擺出一副昂首挺胸的模樣，而此后很久，那位面色蒼白的德國人都要被人拿來跟男子氣概十足的領袖相比較。希特勒絕不允許別人見到自己衣著不整的形象，即便是20世紀20年代蹲監獄的那段歲月，他都堅持每天打領帶。墨索里尼陶醉于飆車和開飛機，希特勒則喜歡坐在那輛超大的梅賽德斯后座，周圍環繞著一堆保鏢，用他的傳記作者伊恩·克肖（Ian Kershaw）的話來說，就像一個“古怪的黑幫分子”。  [[30]](#_30__Kershaw_1999__p__282__Guan)

當元首從飛機里出來時，他遭遇了一件特別難堪的事情。自信滿滿的領袖大步向他走來，舉起手臂行法西斯直臂禮。后來有傳言說，希特勒也伸出手臂予以回應，而墨索里尼輕輕地說了聲：“Ave imitatore（歡迎你，模仿者）！”希特勒留給墨索里尼的印象增長了他的自信，讓他覺得自己不過是在接待一個仿制品，然而這種錯覺會在往后給他帶來危機。  [[31]](#_31__Rauscher_2004__pp__193_194)

領袖對自己的德語水平非常自信，堅持要單獨同希特勒會面。在會面即將來臨的那幾周里，他甚至還專門上課學習，提高德語水平。然而墨索里尼發現，要聽懂希特勒冗長的話語有點費勁，一方面是因為他語言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的談話空洞無物。  [[32]](#_32__De__Fei_Li_Qie__1974__p__49)  在他的印象里，希特勒有點瘋瘋癲癲的，而在接下來的兩天里，這種印象變得愈發強烈。他們的會面地點有很多蚊蟲，有人說它們“大得就跟鵪鶉一樣”，而希特勒還喜歡自夸，說相比南歐人的“黑人”血統，日耳曼民族具有先天的優越性，這些橋段都讓會面的雙方不太愉快。然而最令雙方氣氛緊張的仍然是奧地利問題，因為希特勒對自己的野心毫不隱瞞，他要把奧地利納入德國的版圖。

“真是個小丑！”當希特勒的飛機起飛時，墨索里尼譏諷道。  [[33]](#_33__Milza_2000__pp__694_696)  此人總是大談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所以墨索里尼喜歡對意大利民眾說，當愷撒、西塞羅（Cicero）、維吉爾（Virgil）和奧古斯都（Augustus）等先輩建造起羅馬的宏偉宮殿時，納粹黨的野人祖先還目不識丁，住在森林中那些污穢不堪的茅屋里。  [[34]](#_34__De_Felice_1974__p__505)

在威尼斯的會面之后，墨索里尼給駐圣座大使切薩雷·德·維基寫了封信，將會面的詳情向他一一道出。“希特勒說了好多蠢話，比如耶穌基督出身猶太種族，諸如此類，這些我就不跟你細說了。”  [[35]](#_35__ASV__AESS__pos__430b__fasc)  墨索里尼在幾天后告訴德·維基，每當希特勒談起天主教會，“就好比他為這個話題準備了一張唱片，每逢這種場合就從頭到尾播放十分鐘”。希特勒責罵教會不過是猶太人的故弄玄虛。“這個猶太人[耶穌基督]”，希特勒說道，用這種方法愚弄了整個西方世界。“謝天謝地，”他跟墨索里尼說道，“你們[意大利人]成功地[給天主教會]注入了不少異教信念，讓它把大本營設在羅馬，并且受到你們的掌控。”盡管自己是個天主教徒，希特勒進一步說道，但是他認為天主教在德國派不上任何用場。  [[36]](#_36__DDI__series_7__vol__15__n)

所有這些言論，墨索里尼都沒有轉達給教宗，而只是含糊地提及希特勒把耶穌基督當作猶太人的無稽之談。如果教宗得知希特勒的實際想法，局面肯定會變得更糟，于是對此感到擔心的墨索里尼便將面談概況的刪節版本交給德·維基，讓他向梵蒂岡交差。他想讓教宗知道，他已經傾盡全力，未來某一天，他也許可以讓這位納粹領導人接納更為折中的觀點。  [[37]](#_37__ASMAE__AISS__b__35__Mussoli)

一個月后，偽裝成奧地利軍人的武裝納粹黨人沖進了陶爾斐斯總理的辦公室，開槍將他射殺。那天早些時候，他的妻兒來到墨索里尼位于亞德里亞海岸的避暑別墅，而陶爾斐斯本也準備晚些時候前去和他們團聚。結果領袖卻落得要把這個噩耗告訴他們。  [[38]](#_38__Lamb_1997__pp__106_107)

庇護對此也非常失望。陶爾斐斯來到羅馬，簽訂奧地利和圣座的宗教事務協約，才不過是一年前的事情。教宗見過他，并且認為他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駭人聽聞！駭人聽聞！”他不斷重復著這句話。他坐在書桌前，手托著低垂的腦袋。當他最終抬起頭時，他問道：“我們能做些什么？我們能做些什么？”  [[39]](#_39__ACS__MCPG__b_158___Riservat)

帕切利樞機對這位奧地利領導人倒是沒有那么上心。1933年7月，陶爾斐斯得知梵蒂岡將同希特勒簽訂宗教事務協約時非常生氣，認為這損害了奧地利的利益，令它更加難以抵御納粹德國的侵吞企圖。在得知陶爾斐斯寫下一份文件表達了這種觀點之后，帕切利尋求奧地利駐圣座大使的幫助。帕切利說道，如果陶爾斐斯的這番話能夠從奧地利外交檔案中刪除掉，就再好不過了。  [[40]](#_40__Ventresca_2013__p__85)

\* \* \* \* \*

在這幾個月里，教宗常常收到各種報告，詳述納粹的反猶運動。1933年3月初，就在德國大選之前，希特勒向各位主教保證，他會保護教會以及各種教會學校和組織在德國的權利。希特勒顯然是想要爭取他們的選票，他進一步說道，雙方是同一場戰役中的同盟，共同的敵人乃是猶太人。“我對待猶太人的方式也曾遭到指責，”希特勒告訴他們，“一千五百年來，教會都將猶太人看作是有害的民族，并將他們驅逐到猶太人區……我的一切行動都是為基督教效勞。”  [[41]](#_41__Zhuan_Yin_Zi_Fattorini_2007)

4月，教宗收到了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的一封來信，這位居住在慕尼黑、時年四十一歲的德國哲學家在十一年前從猶太教改宗到天主教。施泰因乞求教宗幫猶太人發聲，反對納粹的反猶運動（這一由政府發起的運動用上了“基督教”的名頭，并以此為其正名）。她寫道：“幾周以來，不僅僅是猶太人，連那些虔誠的德國天主教徒，我相信甚至還有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在翹首企盼，希望天主教會能夠出言阻止他們這般濫用基督之名。廣播電臺每天都把這樣的種族崇拜和國家權力理念塞進民眾的腦袋，如果這還不是異端邪說，它能是什么？”她在信件末尾一語成讖地寫道：“我們所有人都是教會真正的孩子，我們都密切地觀察著德國的狀況，我們擔心如果教會繼續保持沉默，它的聲譽將會跌至谷底。”

帕切利樞機代表教宗答復了這封信，然而他沒有回給施泰因，而是回給了那位將她的信轉寄到梵蒂岡的大院牧。帕切利請他轉告施泰因，自己已經將她的信交給教宗過目。帕切利還附上一段祈禱，禱告天主會保佑教會度過艱難的時刻。僅此而已。  [[42]](#_42__ASV__AESG__pos__643__fasc)

也許令人感到驚訝的是，經過此事之后，埃迪特·施泰因的信仰仍然十分堅定。在這一年年末，她宣誓成為加爾默羅修會的修女。20世紀30年代末，她為了避難遠赴荷蘭。1942年8月2日，納粹黨人抓住了她和她的姊妹羅莎，畢竟她們在納粹黨人眼里都只是猶太人而已。她們最終被送去了奧斯維辛。她們咽下的最后一口氣是毒氣室里的毒氣。  [[43]](#_43__Wolf_2010__p__190)

大約在施泰因向教宗寫請愿書的那段時間，奧爾塞尼戈也給帕切利樞機發了一封電報。納粹黨已經將反猶主義列為政府的官方政策。猶太人因此發起了抵制運動。猶太人名下的店鋪都停止營業，所有猶太人醫生、律師以及各類專業人士也都發起了罷工。4月7日，一項新通過的法律禁止猶太人持有任何公職。奧爾塞尼戈在報告中提及了所有這些事情，卻建議教宗謹慎行事，不要出手干涉。這位教宗大使提醒道：“圣座代表的任何干涉行為都等同于向政府發起抗議。”

教宗聽取了大使的建議，對這一切保持沉默。  [[44]](#_44___Fan_You_Yun_Dong_Yi_Jing_Z)  所以令我們感到震驚的是，在納粹統治的最初幾個月，敦促希特勒停止迫害猶太人的并不是庇護十一世，反倒是墨索里尼。3月30日，墨索里尼給意大利駐柏林大使發去了一份機密文件，命令他立即面見希特勒，告訴他這場反猶運動是個徹頭徹尾的錯誤：它會“增加道德壓力，并使得國際上的猶太人采取經濟報復行為”。他希望希特勒能夠明白，他的這個建議是為了給元首幫忙。他表示：“每一個政權不僅僅有權力而且有責任將那些不足以取信的人從他們的崗位上驅走，但是如果將這樣的行為立基于猶太人和雅利安人的種族對立之上，只會帶來一場災難。”墨索里尼提醒道，不僅猶太人會反對納粹政府，如果這場運動愈演愈烈，“那么反猶問題將成為一聲集結號，令基督教的政敵都站出來反對希特勒”。第二天，意大利大使面見元首，并將領袖的忠告轉達給他。  [[45]](#_45__Da_Shi_Wei_Tuo_Li_Ao__Di_Lu)  教宗知道這件事情。梵蒂岡國務院文件的一張字條記錄道，墨索里尼給希特勒的忠告“被大使帶去，并向希特勒和戈培爾宣讀。半個小時后，納粹政府的部長會議通過了前述法律，開除了所有帶有猶太血統的政府職員”。  [[46]](#_46__ASV__AESG__pos__643__fasc)

希特勒沒有理會墨索里尼的建議，繼續踏上了這條反人類的道路。1935年，《紐倫堡法案》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并且剝奪了德國猶太人的公民身份。奧爾塞尼戈在報告中談到了那一年納粹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他告訴梵蒂岡，納粹黨人把共產主義怪罪到猶太人頭上，由此為自己的迫害正名。“我并不清楚俄國共產黨的事跡是否全部出自猶太人之手，”大使在報告里寫道，“但是他們想辦法讓民眾相信了這套理論，并且據此采取反猶行動。”他在結尾懷著不祥的預感寫道：“現狀表明，如果納粹政府長期把持政權，那么猶太人就注定要從這個國家里消失掉。”  [[47]](#_47__Wu_Lun_Shi_Fan_Di_Gang__Hua)

德國的天主教眾對于猶太陰謀的理論照單全收，這種現象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多年以來，受梵蒂岡審查的《公教文明》以及諸多教會出版物都在提出類似的警告，認為猶太人是一股邪惡力量，他們正在進行一場極為危險的陰謀活動。在這番說辭中，他們同時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幕后黑手，兩者的主旨都是要奴役基督徒。  [[48]](#_48__Zai_1935Nian_De_Niu_Lun_Bao)  除開納粹的偽種族優勢論，其反猶理論和天主教只有一處顯著區別，即沒有提及新教徒。

在位高權重的梵蒂岡人士中，最不遺余力推廣這一陰謀理論的是耶穌會總會長沃齊米日·萊多霍夫斯基。在1936年的一封親筆信中，萊多霍夫斯基敦促教宗向全世界發出警告，“可怕的危機正與日俱增”。這一危機來自莫斯科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宣傳（他認為這一運動完全是猶太人的產物），而“全世界絕大多數媒體都受到猶太人的控制，他們對此鮮少提及……”他建議教宗“在這一事宜上發表一篇通諭，不僅能夠給天主教徒提供指引，還能引發一場更為活躍、更有組織紀律的抵制運動”。  [[49]](#_49__Lai_Duo_Huo_Fu_Si_Ji_Ba_Zhe)

庇護十一世同意萊多霍夫斯基的觀點，認為共產主義正極大地威脅著西方文明，他答應就此事發表一篇通諭，并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準備了講話稿，多次將它寄給萊多霍夫斯基，征求他的意見與建議。但是這一講話稿沒有提及猶太人，萊多霍夫斯基對此感到不滿，不斷地敦促教宗將猶太人同共產主義威脅聯系起來。他在審讀過其中一篇演講稿后建議道：“在我們看來，這篇通諭有必要提及猶太人的影響，我們已經可以確定，所有共產主義理論作者（馬克思、拉薩爾  [[50]](#_50__Fei_Di_Nan__La_Sa_Er__Ferdi)  等）都是猶太人，而且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也是猶太人發動的。如今盡管不是每一個地區都那么明顯，但只要你深入查看，那些共產主義宣傳的主要擁躉都是猶太人。”

在萊多霍夫斯基認為猶太人應當為俄國共產主義運動負責的這段文字旁邊，教宗寫下了一個單詞：Verificare（待核實）。一個月后，他會發表題作《贖世主》（Divini redemptoris ）的通諭，譴責了共產主義，但是令耶穌會領導人感到失望的是，這篇通諭依然沒有提及猶太人。  [[51]](#_51__Fattorini_2007__pp__64_69)

《公教文明》就不像教宗通諭那樣有所顧忌了，它用盡一切辦法警醒天主教徒，讓他們留意猶太人的陰謀詭計。在教宗發表反共產主義通諭的幾個月后，這份刊物又刊登了一篇警世文，題作《猶太問題》。這篇文章開篇就直達主題，“兩種看似相互矛盾的事實已經在遍布現代世界的猶太人中確立起來：其一是對金錢的主宰，其二是他們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人數優勢”。不僅共產黨的創始人都是猶太人，這份耶穌會期刊這么寫道，而且“近來發動現代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革命的都是猶太人”。  [[52]](#_52__You_Tai_Ren_Zen_Yao_Neng_Ji)

當希特勒循著自己的計劃路線解決猶太威脅的時候，這份耶穌會期刊也考量了基督教應該對這種威脅做出怎樣的回應。它列出了三種可能性。最好是能令所有猶太人都皈依基督教，但很顯然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因為猶太人固執地要求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第二種可能性是將歐洲的猶太人轉移到巴勒斯坦。然而這片土地卻沒法容納這一千六百萬人口，即便可以，猶太人也絕不會花費力氣做好必要的工作，因為他們“全是天生的寄生蟲和破壞者，全然沒有體力勞動的天資和品性”。

所以只剩下第三種可能性，這一方法已經為教會所用，且幾個世紀以來都效果卓著，那便是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利。  [[53]](#_53____You_Tai_Wen_Ti_____CC_193)

同一期的《公教文明》還報道了近期（1936年9月）在紐倫堡召開的納粹全國代表大會。希特勒向與會群眾講道：“猶太人的革命大本營以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準備在全世界發起革命。”在引用這些言辭之后，這份期刊還引用了希特勒的一句斷言，卻對其真實性不置可否：俄國政府的高層職務有98%都“掌握在猶太人的手里”。在猶太大屠殺之前的這些年間，納粹黨和耶穌會期刊都不斷地提出這項指控。  [[54]](#_54__CC_1936_IV__pp__83_85)  然而實際情況是，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蘇聯最高領導層的四百一十七人中，僅有6%出身猶太家庭，而且這一數字在30年代急劇下降，特別是在斯大林的肅反運動以后，因為這場運動具有很強的反猶意味。1938年，《公教文明》和納粹政府依然在發出警告，稱蘇聯政府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猶太人；可是實際上蘇聯政府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治局的九名成員中只有一人出身猶太家庭，而蘇聯主席團的三十七名成員中，也只有一人擁有猶太背景。  [[55]](#_55__He_Er_Fu__2006__pp__95_96_Z)

教宗在1932年與墨索里尼會面時，就提到過自己對俄國共產主義威脅的擔憂，并且將它同“猶太人對基督教的敵視”聯系起來。但是在此之后還發生了許多事情。希特勒上臺后，不僅限制了德國天主教會的影響力，而且還傳播了一種與教會理念背道而馳的異端思想。庇護十一世越發清醒地認識到，基督教面臨的最大威脅實際上來自納粹黨。但是他的智囊卻提出了反對意見，認為如果要阻止共產主義的前進步伐，希特勒是最好的籌碼。他們敦促教宗不要出言冒犯希特勒。

[[1]](#filepos715105) E. Mussolini 1957, p. 143; Kershaw 1999, p. 343.“進軍羅馬事件”幾天后，希特勒手下的一位得力中尉赫爾曼·埃塞爾（Hermann Esser）面對人頭攢動的人群宣稱，“德國的墨索里尼名叫阿道夫·希特勒”。Kershaw 1999, p. 180.

[[2]](#filepos715429) DDI, series 7, vol. 13, n. 61, Renzetti a Chiavolini, 31 gennaio 1933.

[[3]](#filepos715904) DBFP, 1919–1939, series 2, vol. 5, n. 444, Graham to Wellesley, October 11, 1933; DDF,series 1, vol. 4, n. 293, Chambrun à Paul- Boncour, 11 octobre 1933.

[[4]](#filepos716191) 帕切利同法國大使夏爾——魯談話的筆記收于ASV,AESS, pos. 430b, fasc. 359, f. 35, “L’Ambasciatore di Francia.,” 1 febbraio 1933。墨索里尼的內閣大臣在一份報告中引用了一條二手消息，稱帕切利曾在談話中認為希特勒“為德國做出了巨大貢獻，因為他一手扶植了一個強大的政府”，但他又補充道，他認為希特勒不會掌權太久。DDI, series 7, vol.13, n. 13.

[[5]](#filepos716472) 1931年，《公教文明》曾刊出一篇文章，好幾位德國主教在文中對極端國家主義的納粹意識形態表示擔憂：《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CC 1931, II, pp.309–327。

[[6]](#filepos717042) ASV, AESS, pos. 430b, fasc. 359, f. 55, “L’Ambasciatore di Germania,” 24 febbraio 1933.

[[7]](#filepos717377) 當豐特奈最后一次以法國大使的身份拜見教宗時，后者對他說出了這番話語。MAESS,vol. 37, 3–4, Fontenay à président du conseil, 14 juin 1932.

[[8]](#filepos718043) MAESS, vol. 37, 63–66, Charles- Roux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7 mars 1933.

[[9]](#filepos718325) “教宗認為，教會當前面臨的最嚴峻、最直接的威脅來自共產主義的傳播。他最為關切的便是如何與這種惡勢力作斗爭，并且他已然盡全力在所有國家展開這一行動。”FCRSE, C2887/2887/22, Mr. Kirkpatrick, British legation to the Holy See, to Sir John Simon, London, March 20, 1933.

[[10]](#filepos719601) Kent 1981, pp. 154–155.沃爾夫（2010, pp. 155–168）檢視了教宗決策背后的證據，他正是通過這一決策令德國各位主教在1933年3月轉而支持希特勒的。

[[11]](#filepos720100) MAESS, vol. 37, 70–77, Charles- Roux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0 mai 1933.

[[12]](#filepos720772) Wolf 2010, pp. 174–175.

[[13]](#filepos721293) 作為一位驕傲的天主教徒，馮·巴本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同帕切利成為好友。他常常在衛兵騎士俱樂部招待帕切利，并且在那里將他引薦給數位德國保守黨領袖。CC 1933 IV, p. 89; Wolf 2010, pp. 174–175; Ventresca 2013,p. 62.

[[14]](#filepos721920) Ventresca 2013, pp. 75–79.

[[15]](#filepos722284) Wolf 2010, p. 178.

[[16]](#filepos722945) Wolf 2010, pp. 227–228。

[[17]](#filepos723290) ASMAE, AISS, b. 77, “Il punto di vista cattolico di fronte al sistema Tedesco di concepirela Chiesa,” 19 ottobre 1933.

[[18]](#filepos723598) 記錄在帕切利的筆記中。ASV, AESS, fasc. 430a, fasc. 349, 6. 27r–27v, 30 dicembre1933.意大利駐德國大使也在12月的報告中寫道，天主教會和德國政府之間的沖突不斷升級，尤其是在青年問題方面。ASMAE, APG, b. 13, “S. Sede e Governo germanico,” 27 dicembre 1933.

[[19]](#filepos724051) 據意大利駐柏林大使所言，奧爾塞尼戈已經同納粹領導人達成共識。他正傾盡全力，掃清梵蒂岡—納粹合作的障礙（既來自納粹高層，也來自梵蒂岡高層）。ASMAE, AISS, b. 35, 6. 70–71,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 De Vecchi, 25 gennaio 1934.

[[20]](#filepos724486) 喬治·安杰洛齊·加里博爾迪（Giorgio Angelozzi Gariboldi），轉引自Biffi 1997, p. 99。

[[21]](#filepos726664) ACS, MCPG, b. 157, 19 maggio 1928.

[[22]](#filepos727627) 奧爾塞尼戈的生平細節取自比菲（1997），另參見Godman 2004, pp.30–31。

[[23]](#filepos728352) 帕切利反對這一舉措，認為它弊大于利。Wolf 2010, pp.245–252; Godman 2004, pp. 48–50.

[[24]](#filepos728916) 墨索里尼毫不懼怕正面批評納粹黨人，1934年12月，他在接受《費加羅報》的采訪時大談自己同梵蒂岡的密切關系，并且就錯誤的宗教政策指責了納粹黨。MAESI, vol. 267, 49–53, Charles- Roux au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6 décembre 1934.

[[25]](#filepos729140) 5月25日，教宗命帕切利轉告領袖，他日夜都為墨索里尼祈禱。教宗希望墨索里尼能讓希特勒認可教會有權為年輕人提供道德和精神的教導。ASV, AESS, pos. 430a, fasc.350, f. 29.

[[26]](#filepos730792) ASMAE, AISS, b. 35, “Udienza dal Cardinale Segretario di Stato— Venerdì 1 giugno1934,” “Udienza da S.E. il Capo del governo— Lunedì 4 giugno 1934,” “Udienza dal Cardinale Pacelli— Martedì 5 giugno 1935.”那句戈培爾寫的文字取自他的小說《邁克爾》（Steigmann- Gall 2003, pp. 20–21）。法烏爾哈貝爾的報告轉引自Wolf 2010,pp. 162–163。6月15日，也即兩位獨裁者會面的那一天，德·維基拜訪了帕切利，向他確保墨索里尼定然會強有力地提出教宗的要求。ASV,AESS, pos. 430b, fasc. 361, 6. 32/33, “L’Ambasciatore d’Italia,” 15 giugno 1934.

[[27]](#filepos731326) 墨索里尼的顧慮中還包含上阿迪杰區那些講德語的國民，這個地區是意大利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得到的，這些人是否忠于意大利還要打上一個問號。

[[28]](#filepos731852) DDI, series 7, vol. 14, n. 112, “Colloqui fra il capo del governo,. Mussolini, e il cancelliere federale austriaco Dollfuss, Riccione, ”19–20 agosto 1933; Lamb 1997, pp. 100–101.

[[29]](#filepos732078) DDI, series 7, vol. 14, n. 246, “Appunto,” 3 ottobre 1933.

[[30]](#filepos733356) Kershaw 1999, p. 282. 關于墨索里尼如何在政治舞臺上運用他的身體，參見盧扎托（1998）那本特別出色的著作。

[[31]](#filepos733966) Rauscher 2004, pp. 193–194.

[[32]](#filepos734458) 德·費利切（1974, p. 494）反駁了一種通常的觀點，即認為墨索里尼的德語非常糟糕，聽不懂希特勒在講什么，他引用了希特勒的意大利語譯者的話：“領袖說德語時口音很重、語速很慢，總是小心謹慎地發出每一個音節，不過很明顯的是，他很愿意用德語溝通。”

[[33]](#filepos735202) Milza 2000, pp. 694–696.

[[34]](#filepos735634) De Felice 1974, p. 505.

[[35]](#filepos736040) ASV, AESS, pos. 430b, fasc. 361, 6.52/53, “L’Ambasciatore d’Italia,” 6 luglio 1934.

[[36]](#filepos736811) DDI, series 7, vol. 15, n. 469, “Colloquio fra il Capo del Governo… e… De Vecchi,” 2 luglio 1934.

[[37]](#filepos737428) ASMAE, AISS, b. 35, Mussolini a De Vecchi, 22 giugno 1934.

[[38]](#filepos737908) Lamb 1997, pp. 106–107.

[[39]](#filepos738463) ACS, MCPG, b.158, “Riservato, da fonte Vaticana,” Roma, 26 luglio 1934.

[[40]](#filepos739104) Ventresca 2013, p. 85.

[[41]](#filepos739936) 轉引自Fattorini 2007, p. 110n8。據奧爾塞尼戈所言，德國大主教并沒有對希特勒的這番宣言提出異議。Duce 2006, pp. 32–33，基于奧爾塞尼戈在1933年3月7日提交給帕切利的報告。奧斯納布呂克主教表示，希特勒在會上“完全沒有說過教會的壞話，他只表達了對各位主教的傾慕”。納粹黨人中傷猶太人的方法（Herf 2006, pp. 37–41）基本上跟梵蒂岡非官方期刊《公教文明》所用的方法如出一轍。自20世紀20年代起，希特勒和他的老同伙約瑟夫·戈培爾便警告世人，猶太人正醞釀著陰謀要顛覆西方文明，而且他們還控制了高端金融、媒體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他們的全部目標就是要讓基督徒向猶太人俯首稱臣。

[[42]](#filepos741383) ASV, AESG, pos. 643, fasc. 158, 6. 14r–19r.另參見胡貝特·沃爾夫（2010, pp. 184–190）對這起事件的討論。

[[43]](#filepos741974) Wolf 2010, p. 190.

[[44]](#filepos742830) “反猶運動已經沾染了政府的官方色彩。圣座代表的任何干涉行為都等同于向政府法律發起抗議。”ASV,AESG, pos. 643, fasc. 158, f. 5r.以及幾天后，“很不幸的是，反猶原則已經被整個政府接受和許可，而更不幸的是，這一事實將作為一塊很不光彩的污點留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盡管他們也有優點）正在書寫的歷史開篇上！”ASV, AESG, pos. 643, fasc. 158,6r–6v, 11 aprile 1933.

[[45]](#filepos743962) 大使維托里奧·翟錄第（Vittorio Cerruti）與墨索里尼在1933年3月底、4月初的一系列精彩通信為我們披露了這些瘋狂的事情。ASMAE, Gab., b.668.墨索里尼發給翟錄第的電報復件收于DDI, series 7, vol. 13, n. 327, Mussolini a Cerruti, 30 marzo 1933。包含領袖給希特勒建言的電報收于ASMAE文件，標簽為“絕對優先級，致翟錄第閣下的私人電報”。翟錄第的妻子是個匈牙利人，在維也納與他相知，盡管她從未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提及身世問題，但她顯然出身猶太家庭。Cerruti 1953.帕切利看在眼里，覺得教宗應該代領袖提出這些批評才對。

[[46]](#filepos744368) ASV, AESG, pos. 643, fasc. 158, f. 5r, Orsenigo a Pacelli, 9 aprile 1933.關于墨索里尼建言的那張（未標明日期的）字條收于AESG, pos. 643, fasc.158, f. 8r。墨索里尼在4月面見了猶太復國運動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魏茨曼向他講述了在希特勒統治的最初幾周，猶太人遭到了怎樣的迫害，他還道出了自己的計劃，想要獲得許可帶領大批德系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DDI, series 7, vol. 13, n. 480, “Colloqui fra il capo del governo…Mussolini e Chaim Weizmann,” 26 aprile 1933.接下來的那個月，意大利駐德國大使向墨索里尼發回報告，稱納粹領導人開始重新考慮反猶運動，因為它造成了極壞的公眾效果。他寫道：“無論是在過去還是最近，我都將領袖的思想清晰無誤地傳達給希特勒，而這一思想開始顯現出它的正確性。”他很可能認為希特勒會放松對猶太人的限制，如果情況確實如此，那么猶太人就應該感謝墨索里尼。DDI, series 7, vol. 13, n.595, Renzetti a Chiavolini, Berlino, 14 maggio 1933. 不過令人矚目的是，當德國副總理弗朗茨·馮·巴本于4月10日在羅馬和領袖會面時，他明確告訴墨索里尼，他承認“反猶運動是一場錯誤”。墨索里尼也利用此次會面機會，強調了新納粹政權同圣座保持良好關系的重要性。DDI, series 7, vol. 13, n. 401, “Colloquio fra il Capo del Governo e Ministo degli Esteri, Mussolini, e il Vice Cancelliere del Reich, Papen,” Roma, 10 aprile 1933.第二天，希特勒的親信、國會議長赫爾曼·戈林與巴本一起前往梵蒂岡拜見了教宗。這次會面雙方到底談了些什么，目前沒有任何記錄；《羅馬觀察報》只是簡短地報道說有這么一場會面發生，沒有任何評論也沒有任何解釋。《我方消息》，OR, 13 aprile 1933, p. 1。

[[47]](#filepos745266) 無論是梵蒂岡，還是德國主教的組織都沒有對《紐倫堡法案》提出反對意見；而納粹黨人對猶太人的新一輪妖魔化也沒有遭遇教會的任何反對。Wolf 2010, p. 217.

[[48]](#filepos745854) 在1935年的紐倫堡黨代會上，戈培爾提到這個話題，表示猶太人有一項秘密的計劃，“目的是使猶太人在全世界稱霸”。Herf 2006, pp. 41–42.

[[49]](#filepos746766) 萊多霍夫斯基把這封信寄給帕切利，希望他能說服教宗發表這篇通諭。在當時，納粹政府正高調審判一起耶穌會案件，指控他們非法地將資金轉移海外，但是令人吃驚的是，耶穌會領導人反倒為希特勒說話。萊多霍夫斯基在7月份與皮尼亞蒂談話時，就這一問題譴責了戈培爾和羅森堡（這兩人都立場鮮明地與天主教會為敵），然而他告訴這位意大利大使，他認為希特勒并沒有許可這起當時正在進行的、針對耶穌會的案件。ASMAE, APG, b. 33,fasc. 1, Pignatti a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Processi antireligiosi in Germania,” 14 luglio 1936.

[[50]](#filepos747531) 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是19世紀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發起人之一。

[[51]](#filepos748263) Fattorini 2007, pp. 64–69.

[[52]](#filepos749088) 猶太人怎么能既控制資本主義，又控制共產主義，這種明顯的悖論該如何解釋？這份耶穌會期刊給出的答案是，兩者產生的土壤“都是對這個世界作物質主義的經濟構想，都出自猶太—清教的源頭”。但是這一切的背后還有更為邪惡的機制在運作，撇開社會主義的表面，它實際上是猶太人的工具，“順從國際金融的謀劃，是一件具有毀滅力量的武器”。

[[53]](#filepos750062) 《猶太問題》，CC 1936 IV, pp. 37–46。

[[54]](#filepos750739) CC 1936 IV, pp. 83–85.

[[55]](#filepos751430) 赫爾夫（2006, pp. 95–96）在這個議題上引用了Pinkus 1988這本重要文獻。另參見AJC 1939, pp. 56–59。蘇聯政府成員名單收錄在1935年和1938年的《政治家年鑒》（The Statesman’s Year Book ）。1936年下半年，希特勒依然在對猶太—共產主義的威脅發動攻勢，《公教文明》則向其讀者推薦了阿爾弗雷多·羅斯馬尼尼（Alfredo Rosmanini）的《猶太人、基督教和法西斯》（Ebrei, cristianesimo, fascismo ），對其影響惡劣的反猶法西斯惡毒攻擊表示贊賞，認為它“筆觸真摯，透露出信仰的溫暖”。它“可以給民眾帶來好處”。這篇熱情洋溢的書評開篇寫道：“這是一本論述共產主義、無神論和滅頂之災的文章合集，其中猶太人占了很大的篇幅，它還贊揚了法西斯守衛宗教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功績。”它接著寫道：“我們注意到一小撮猶太剝削者有著非常強大的影響力，這一點幾乎眾所周知。”這篇文章還提及本刊曾在近期就這一議題刊登的另一篇文章。CC 1936 IV, p. 252.卡利馬尼（2007, p.235）認為羅斯馬尼尼的這本書是法西斯政府反猶運動所產生的第一本集大成的反猶作品。

## 第十六章 逾越雷池

墨索里尼的野心和自負都在與日俱增。他希望公眾能夠視他為偉人，令羅馬重獲古代的榮光，但是想要達成這個目標，他就必須締造一個帝國。他的目光轉向了埃塞俄比亞，整個非洲只有它和利比里亞還沒有落入歐洲的掌控之中，而且意大利還有區域優勢，它的兩塊殖民地——意屬索馬里蘭和厄立特里亞分別同它接壤。

領袖其實早已暗示過他的意圖。早在1934年末，埃塞俄比亞的武裝力量曾經在瓦爾瓦爾（Wal Wal）開槍襲擊一群越過邊境、從意屬索馬里蘭深入到埃塞俄比亞境內的意大利士兵。意大利的媒體稱這起事件是對意大利國家榮譽的挑釁。墨索里尼威脅道，除非埃塞俄比亞做出道歉和賠償，否則意大利將發起戰爭。  [[1]](#_1__Fa_Guo_Da_Shi_Fu_Lang_Suo_Wa)  墨索里尼大張旗鼓地將幾個師的部隊派遣到意屬索馬里蘭，并且將一支艦隊開進了紅海，囑咐他們聽候進一步的指示。  [[2]](#_2__3Yue__Mo_Suo_Li_Ni_Jiang_Lia)  庇護十一世對此非常不滿，他擔心意大利如果入侵埃塞俄比亞，會使得整個非洲的傳教士都陷入險境。

與此同時，教宗也越發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身體力行地主持剛剛過去的那個圣年（于1934年復活節結束）令他筋疲力盡。他已經不再去梵蒂岡花園散步了，甚至簡單的穿越大廳都令他喘不過氣來。炎熱的天氣也開始困擾他。  [[3]](#_3__ACS__MCPG__b__172__Zanetti)  在老城較為貧困的區域以及外圍不斷擴張的棚屋區，電力和自來水仍然十分少見，而肺結核病和沙眼病卻十分猖獗。  [[4]](#_4__Bosworth_2011__p__171)  在過去的一年里，羅馬爆發了斑疹傷寒癥的疫情。1934年夏天，老去的教宗期盼著回到位于阿爾巴諾山的避暑宮殿。“你能看得出來他有多高興，”在教宗出發的那一天，皮扎爾多的助手多梅尼科·塔爾迪尼觀察道，“他就像一個馬上要出門度假的男孩。”塔爾迪尼抓住教宗心情愉悅的機會，為救濟俄國人爭取到了三萬四千里拉的資金。塔爾迪尼寫道：“啊，要是教宗能常常出門度假就好了！”  [[5]](#_5__Tardini_1988__p_332__C__Wing)

一位線人報告說，如今的教宗“變得更加易怒、陰沉和多疑”。  [[6]](#_6__ACS__MCPG__b__172__Zanetti)  在執行公共職能的時候，身穿華麗白袍的他猶如帝王般巋然不動，令周圍所有人感到緊張和不安。他的發際點綴著絲絲白發，然而他的聲音依舊堅定且洪亮，至于厚鏡片背后的那雙眼睛，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警覺。盡管他行動已經有所遲緩，但是他仍然堅持過問一切事務，并親自做出決定。  [[7]](#_7__McCormick_1957__pp__69_76)

墨索里尼威脅要入侵埃塞俄比亞，這件事令教宗十分煩惱，但是其他教會人士對此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博洛尼亞的《意大利未來報》是意大利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報紙，它回應了法西斯媒體的主張，表示埃塞俄比亞人都是些信仰異教的野蠻人，戰爭能將文明（以及天主教）帶給他們。  [[8]](#_8__DDF__series_1__vol__11__n__3)

這場即將爆發的戰爭令教宗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它有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不僅波及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亞，還會貽害整個歐洲。許多人認為，只有教宗能夠阻止這場戰爭，來自世界各地的意見都敦促他警醒墨索里尼，讓他放棄入侵計劃。然而庇護心里明白，在這么重要的事情上違抗意大利獨裁者，將會給他們的盟約招致巨大的風險。

1935年8月27日，來自二十個國家的兩千名天主教護士登上了梵蒂岡的巴士。她們正趕赴會議的最后一幕，在岡多菲堡聆聽教宗的教誨。庇護在講話中褒獎了她們所做的工作，講話時長超過一個小時。然后他為這些護士送上了祝福。負責組織這場會議的皮扎爾多滿面光彩地站在教宗身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教宗并沒有就此離開，而是打開話匣子，突然提起了一個全新的話題。他告訴護士們，人民永遠都不會容忍侵略戰爭。那將是“一場不正義的戰爭，超出了所有想象……它的恐怖令人無法言說”。  [[9]](#_9__Ceci_2008__p__297__Ceci_2010)  皮扎爾多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塔爾迪尼蒙席在日記里寫道：“這些護士多半是外國人，她們興致盎然、饒有趣味地聽著。然而皮扎爾多蒙席膽戰心驚，一點都高興不起來。這簡直是一場災難！”在返程巴士上，為了防止護士們討論教宗最后的話語，皮扎爾多堅持要求她們念誦玫瑰經。當他回到梵蒂岡時，已然涕淚俱下，他看起來“垂頭喪氣、面色慘白、神情絕望”。他嘴里喃喃念叨著教宗的話語，這是“一場不正義的戰爭，一場不正義的戰爭”。  [[10]](#_10__Yi_Duan_Shi_Jian_Zhi_Hou__Y)

第二天上午，當教宗的演講傳進意大利駐梵蒂岡代理大使朱塞佩·塔拉莫的耳朵時，他急急忙忙來到梵蒂岡。  [[11]](#_11__Gong_Jiao_Jin_Xing_Hui_Quan)  這位意大利外交官回憶道：“皮扎爾多蒙席的臉上滿是驚慌失措的神色，他告訴我，教宗突然決定發表這番敏感言論之前，沒有表現出任何可疑跡象，他甚至沒有征求過國務卿的建議。”

塔拉莫向皮扎爾多提出了他的要求，梵蒂岡報紙在報道教宗的這番講話時，要盡量緩和其中的針鋒相對。皮扎爾多向他保證，他和他的同仁已經“竭盡全力，盡量弱化教宗這番評論的語氣”。記錄講話內容的《羅馬觀察報》記者在那天傍晚將教宗的演講打字稿提交到梵蒂岡，而塔爾迪尼則對其“動了一場手術”。塔爾迪尼回憶道：“我在這里刪去一個詞，在那里又增補一個。我在這里調整了一個句子，在那里又抹掉一句。簡而言之，通過細微而富有技巧的改動，我們成功地軟化了教宗演講中特別粗礪的內容。”  [[12]](#_12__Tardini_1988__p__385)  他們最后修改出來的文章和護士們聽到的那篇譴責侵略的檄文相差甚遠。最終版本只是一系列語義含混的話語，可以對其作出各種解讀。

第二天早上，棘手的問題出現了。塔爾迪尼必須讓教宗同意這篇大肆刪改的文章。當把打字稿遞給庇護時，他盡量讓自己顯得波瀾不驚，方正的臉龐上露出十分誠摯的表情。他解釋道，那位《羅馬觀察報》記者擔心自己沒能記錄下教宗的每一句話，希望能夠得到教宗的原諒，教宗整整講了一小時二十分鐘，到最后這位記者已經筋疲力盡了。他當時牙疼得厲害，所以也稍稍有些分心。而且在演講的最后，夕陽（這場接見安排在外面的院子里）的光芒逐漸消退，他也就更加難以準確地記錄下教宗最后的話語。

教宗開始閱讀文稿時，塔爾迪尼試圖告退，然而庇護抬手阻止了他。教宗把所有的文字都放到一邊，直奔最后的那幾段話。他一邊閱讀，嘴里一邊發出哼哼聲。教宗每次抬頭看他的時候，塔爾迪尼都試圖隱藏自己緊張的神情。那段關于戰爭的文字已經被改得面目全非，教宗把它大聲朗讀出來，而塔爾迪尼仍然假裝自己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我擺出的那副姿態，就好像是一個人在關心他毫不知情的事情。”他又在括號里寫道：“其實那部分被改成什么樣子，我完全心知肚明！”教宗不斷地低頭看看文稿，又抬頭看看塔爾迪尼。他每讀到一句被塔爾迪尼篡改的文字時都會重復道，“我真的沒有這樣說過”。每一次教宗提出異議，塔爾迪尼都會謙卑地表示要修正這些錯誤。不過到最后，教宗只是說道，“算了，這件事就這樣吧”。這個結果正是塔爾迪尼和他的上級（皮扎爾多和帕切利）所希望的。  [[13]](#_13__Tardini_1988__pp__385_386)

即便這份文稿的言辭已經大為緩和，然而代理大使仍然對它感到不滿。盡管法西斯媒體斷章取義地引用它的內容，證明教宗支持這場戰爭，但是在意大利國外，經過刪改的評論還是被用來證明教宗是反對這場戰爭的。  [[14]](#_14__Lun_Dun_De___Tai_Wu_Shi_Bao)  法西斯媒體的歪曲（它們聲稱教宗的這番話語明白無誤地支持意大利發動戰爭）令教宗感到氣憤，于是他命令梵蒂岡報紙在頭版刊登專文，就其歪曲表示不滿。塔拉莫非常不高興，他告訴墨索里尼：“教宗真是一個固執的老人，也許這番話有點冒犯，卻離真實情況相差不遠。”

在周五與帕切利的例行會面中，塔拉莫發現這位國務卿與他看法一致。他向墨索里尼報告說：“國務卿樞機也向我吐露了他的驚慌失措。”  [[15]](#_15__ASMAE__AISS__b__56__fasc__1)

事實上，盡管歐金尼奧·帕切利已經擔任國務卿達數年之久，但是他同教宗的關系仍然非常正式，在情感上保持了距離。那年早些時候，當巴黎大主教讓·韋迪耶（Jean Verdier）到訪羅馬，帕切利曾同他會面。帕切利得知，一場盛大的儀式將于4月在法國盧爾德的朝圣地舉行，這位國務卿很想參加這場儀式，但只有經過庇護首肯他才能夠參加，而他不敢開口提出這個請求。這位國務卿只好難為情地請求韋迪耶向教宗提起這一事宜。而教宗最后答應這次出行，正是通過這條間接的渠道。  [[16]](#_16__Wei_Di_Ye_De_Miao_Shu_Shou)  在韋迪耶眼里，這些年間，帕切利和教宗的關系還算是“友善，至少是這位老教宗的脾氣所能夠允許的友善”。  [[17]](#_17__Papin_1977__pp__56__62)

\* \* \* \* \*

9月初，國際聯盟召開會議，就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國際聯盟成員國）的可能性進行了探討。國際聯盟聲稱，如果墨索里尼敢這么做，那么它將對意大利施以嚴厲的經濟制裁。  [[18]](#_18__Bosworth_2002__pp__304_305)

自從公教進行會紛爭在四年前得到解決之后，教宗越來越公開地表達自己對法西斯政權的支持。1932年9月，數千名加入法西斯黨的海外青年來到羅馬朝圣，教宗在圣彼得大教堂為他們舉行了一場特殊的彌撒。同一個月，數萬名意大利法西斯青年團體成員在羅馬附近進行演習，大量神父陪同了這次演習，他們帽子的十字架下方是一個法西斯黨標志。教宗在梵蒂岡接見了數百名這類神父，并為他們的重要工作施以祝福。  [[19]](#_19__MAEI_vol_266_269_271_Charle)

梵蒂岡對領袖的熱忱在“進軍羅馬事件”十周年時也大放光彩。《羅馬觀察報》對領袖的熱愛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墨索里尼在“所有公共管理領域都取得了巨大、深刻和卓有成效的改進”，這份梵蒂岡日報報道說。從1921年第一次在國會發表演說起，他“就極力在全世界弘揚無比美妙的公教理念和教會使命”。這份報紙提醒讀者，讓十字架回到這個國家教室和法庭的人正是墨索里尼，也正是他將宗教教導重新引入學校，并且通過《拉特蘭條約》為教會和國家帶來了和諧友好的關系。  [[20]](#_20____Qing_Zhu_Yi_Da_Li__Jin_Ju)

\* \* \* \* \*

在教宗向護士們發表脫稿演講之后的那幾周里，帕切利樞機和皮扎爾多蒙席試圖說服教宗，讓他不要宣揚反對墨索里尼發動埃塞俄比亞戰爭的意見。9月13日，帕切利給墨索里尼發去消息，表示教宗將不會對侵略提出反對意見。  [[21]](#_21__ASMAE__AISS__b__56__fasc_1)

但是教宗仍然希望自己能夠說服墨索里尼，放棄這項入侵計劃。9月20日，他口述了一封寄給墨索里尼的書信，列舉了諸多理由表明這場戰爭何以是一個錯誤。他認為，盡管意大利在軍事力量上占據優勢，但是埃塞俄比亞部隊卻擁有地利，畢竟那邊的地形十分復雜。教宗未卜先知地預言道，即便意大利攻下這個國家，意軍也將面臨無止境的游擊戰，更別提高溫和疾病了。  [[22]](#_22__ASV__AESS__pos__430a__fasc)

帕切利擔心反戰言論若出現在教宗的正式書信中，很可能會惹怒墨索里尼，于是他說服教宗派遣塔基·文圖里以非正式的方式傳達了他的想法。庇護喊來了耶穌會士，遞給他一份文本，告誡他不要被墨索里尼拿去了。由帕切利準備的這份打字稿首先對侵略計劃的目標表示理解，意大利需要擴張，也需要行使自衛的權利；然后它列舉了教宗關心的幾件事情，并著重強調了其中最可能觸動領袖的一件：如果戰事進展得不順利，那么墨索里尼就很有可能受到指責。  [[23]](#_23__ASV__AESI__pos__967__vol__1)

然而這些話語絲毫無法動搖墨索里尼。10月2日晚，他來到威尼斯宮的陽臺上，將激動人心的消息傳達給公眾，他已經命令意大利軍隊向埃塞俄比亞進軍。四周的建筑隨著數十萬人富有節奏的口號聲而顫抖：“領袖！領袖！領袖！”

在廣場的另一端，瑪格麗塔·薩爾法蒂透過寬大的窗戶注視著這個場景。盡管她已經失去了情婦的光環，盡管近幾年來墨索里尼愈發疏遠她，但她仍然是他最忠誠、最得力的宣傳人員，尤其是在海外。但是近來，納粹在德國的崛起愈發令她感到恐懼，而無視埃塞俄比亞的國際聯盟成員國身份向其發動戰爭，并且挑釁英法的行為，她明白這只會讓意大利落入希特勒的掌控。這場侵略戰爭絕對是下下策。

薩爾法蒂轉向身旁的一位朋友，評論說：“這將是終結的序曲。”

“為什么這么說呢？”他問道，“你覺得我們會輸掉這場戰爭嗎？”

“不……我的意思是我們將不幸地贏得這場戰爭……而他將丟掉他的腦袋。”  [[24]](#_24__Zhuan_Yin_Zi_Milza_2000__p)

第二天，愈發熱心于維護庇護和領袖之間和睦關系的塔基·文圖里向墨索里尼保證教宗不會妨礙他的戰爭計劃。“在這個最為危急的時段，”他寫道，“圣父對于我傳達的消息都非常滿意，而且他告訴我要第一時間向您轉達他的意愿。”  [[25]](#_25__ACS__CR__b__68__Tacchi_Vent_1)

教宗其實也擔心這場戰爭會讓意大利遭到孤立，于是他特意給英國國王喬治五世（George V）發去了一封請求信。這其實也不是頭一回，早在8月份，他就通過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給國王發去了一份消息，而國王在得知大主教的會面請求包含怎樣的實際意味后，找個借口推掉了。  [[26]](#_26__DDF__series_1__vol__12__n)

帕切利樞機專門給國王準備了一封英文信。“國王陛下，”這封信如是開頭道，“圣父將這一非常特殊、非常個人的命令委托于我，要以非常機密的方式向陛下陳述如下事宜。”教宗“認為已經無法避免同埃塞俄比亞發生沖突，因為意大利拒絕僅僅將埃塞俄比亞帝國的周邊區域納為托管地區（而非保護地區，教宗認為根據條約意大利有權至少對其進行托管）”。帕切利表示，墨索里尼的要求合情合理，并解釋說此次牽涉到的埃塞俄比亞區域都被“奴隸制和混亂”所統治，而尼格斯[埃塞俄比亞統治者的尊稱，即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在這些區域并沒有多少影響力。

英國大使震驚地從帕切利手里接過信封，并用電報傳回倫敦等候指示。英國外交部部長拒絕接收此信。教宗的請求信被原封不動地退了回來。  [[27]](#_27__Pa_Qie_Li_Da_Suan_Jiao_Gei)

\* \* \* \* \*

10月3日凌晨，十一萬名士兵在埃米利奧·德·博諾將軍（“進軍羅馬事件”中那位蓄著山羊胡的領導人）的帶領下，從南邊穿過厄立特里亞進入埃塞俄比亞。這支軍隊不全是本國軍人，還包括意大利麾下的索馬里軍人和厄立特里亞軍人。參加這次侵略行動的還有各式各樣的法西斯民兵，他們訓練不精，卻異常驕傲和激動，因為他們終于有機會為領袖和祖國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這支軍隊的前陣寬達七十公里，配備兩千三百挺機關槍，兩百三十門大炮和一百五十六輛坦克。一百二十六架飛機在厄立特里亞機場隨時待命，為這支部隊提供空軍掩護。幾小時之內，便有一支部隊遭遇一處小型堡壘，而意大利第一位士兵陣亡也發生在這里。此前還興高采烈地高唱愛國主義歌曲的意大利人用恐懼的眼神看著醫療兵用布蓋住戰友鮮血淋漓的身體。“誰也沒有料想到死亡會如此之快地到來。”其中一人表示。很快，意大利飛機就開始用燃燒彈轟炸鄰近的阿多瓦鎮。墨索里尼的兩個兒子布魯諾和維托里奧分別駕駛一架卡普羅尼Ca.101轟炸機參與了這次空襲；意大利部隊將這座城鎮的絕大多數區域（包括醫院）夷為廢墟。數百名城鎮居民被炸死。意大利人繼續向前進軍。  [[28]](#_28__Del_Boca_2010__pp__104_107)

侵略發起的幾天后，國際聯盟以五十四票對四票通過對意大利的制裁行動，所有進口活動和有助于戰事的出口活動（盡管排除了石油）都被納入了制裁范圍。  [[29]](#_29__Federico_2003__p__590)

那周晚些時候，新任意大利駐圣座大使博尼法喬·皮尼亞蒂伯爵將他的委任書呈遞給教宗。那年早些時候，當意大利政府宣布切薩雷·德·維基將從大使一職卸任轉而擔任教育部部長時，梵蒂岡曾對此表示關切，因為他被看作梵蒂岡的友人。  [[30]](#_30__ACS__MCPG__b__159__1_febbra)

五十七歲的皮尼亞蒂曾經擔任過駐法國大使，并且在外交界擁有三十年的豐富經驗，他和他的前任形成了非常鮮明的反差。德·維基擔任大使一職時完全沒有外交經驗，而他的名聲來自都靈法西斯頭目和“進軍羅馬事件”領頭人這兩項履歷。皮尼亞蒂則與他大為不同，他駐守過意大利位于歐洲和南美各國的領事館，身高中等，頭發已灰白了大片，穿上正式的大使西服顯得非常合身。簡而言之，皮尼亞蒂和蠻橫無理的德·維基很不一樣，他看起來就是一副外交官的派頭。  [[31]](#_31__ASV__AESI__pos__985__fasc)

新任大使初次拜見庇護十一世時，教宗看起來有些疲勞和倦怠，可是當話題轉向戰爭時，他的談吐開始變得富有活力。當教宗表示他對法國的調停工作非常樂觀時，皮尼亞蒂則對此持懷疑態度。教宗并沒有出言反對最近發起的侵略行動，反而譴責了國際聯盟，這兩個方面都令皮尼亞蒂感到滿意。  [[32]](#_32__Zhe_Wei_Xin_Ren_Da_Shi_Zong)

英國駐梵蒂岡大使也注意到教宗的態度有所轉變，他對此提出了自己的解釋。教宗一度強烈反對這場近在咫尺的戰爭，并試圖勸阻墨索里尼，讓他放棄這個打算。不過在領袖發動侵略之后，他也不想破壞戰局，“因為他害怕戰事不利會導致法西斯黨失勢，而共產黨或反教會力量會趁此機會奪取大權，而這將會給教宗國帶來災難性的后果”。法國大使則看出教宗的處境也自有其苦楚：在意大利神職人員力主戰爭的狂熱面前，這位一度驕橫無比的教宗感到有心無力，而且對侵略行為的選擇性沉默也令他在國外遭受非議。  [[33]](#_33__H__Montgomery__Annual_Repor)

意大利的天主教神職人員盡其所能地煽動大眾對戰爭的熱望。10月28日，一場慶典在米蘭那座美麗的教堂中舉行，慶祝“進軍羅馬事件”十三周年；伊爾德方索·舒斯特（Ildefonso Schuster）發表了一通蠱惑人心的布道，吸引了世界各國媒體的注意。舒斯特出自本篤會，其嚴苛的苦行生活為眾人所知。他于1929年晉升米蘭大主教。舒斯特與教宗持有相同的觀點，認為西方文明永遠都身陷善與惡、神性與魔鬼的史詩般的戰爭之中。他將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權看作是天主教會的核心盟友。切薩雷·德·維基曾經評論道：“舒斯特樞機離我黨只差一件黑衫，因為他在各個方面都與我黨路線緊密結合，猶如一名最為勤奮的黨員。”  [[34]](#_34__Garzonio_1996__Rumi_1996__p)

在為紀念“進軍羅馬事件”而舉行彌撒的幾個月前，舒斯特樞機曾經在祭壇上擺放一束鮮花，祭奠犧牲的法西斯黨人，并且為他們的靈魂祈禱。米蘭的一位線人寫道：“樞機的行為受到諸多團體的好評，他們認為這是神職人員愈發法西斯化的一種表現。”  [[35]](#_35__Zhe_Wei_Xian_Ren_Jing_Gao_S)  在舉行慶祝彌撒的當天，米蘭主教座堂里的法西斯政府官員、民兵和黨內權貴包圍在樞機周圍，而樞機則向公眾解釋“進軍羅馬事件”的紀念活動并不僅僅是政治慶典，“本質上它還是一個天主教節日”。法西斯黨重煥天主教意大利國的榮光，而我們應當從這個角度看待埃塞俄比亞戰爭。此時此刻，“意大利國旗正勝利地將基督十字帶到埃塞俄比亞的土地上，砸爛奴隸制的鐐銬，并且為福音的傳布鋪平了道路”，因此天主教會和法西斯國家共同肩負著神圣的“國家使命和大公教使命”。  [[36]](#_36__Saresella_1990__p__460)

墨索里尼將這番演講轉播到意大利電臺，而這位樞機的照片也登上了暢銷周刊的封面。  [[37]](#_37__Ceci_2010__pp__86_87)  他的法國同仁則對此不太高興。阿爾弗雷德·博德里亞（他在1935年才晉升樞機）寫道：“舒斯特樞機就是個虔誠的法西斯。”  [[38]](#_38__Zhuan_Yin_Zi_Baudrillart_19)

在進行戰事那幾個緊張的月份里，領袖不僅在國內倚仗教會的支持，而且還需要它為政府尋求國際援助。政府需要阻止國際聯盟經濟制裁行動的擴散，在這一方面，墨索里尼尤其需要教宗的應援。  [[39]](#_39__Zai_10Yue_24Ri_De_Hui_Mian)

皮尼亞蒂在11月中旬頻頻與帕切利樞機促膝長談，敦促梵蒂岡號召各位教宗大使為戰事提供幫助。如今最關鍵的事情是說服世界各地的主教和天主教徒，讓他們認同意大利在這場戰爭中秉持正義的目標。樞機回答說，各位教宗大使已經發起這番努力，而梵蒂岡在這方面已經小有所成。帕切利甚至還進一步提出了一些建議。他告訴墨索里尼，贏取美國的支持至關重要。墨索里尼應當“用最符合北美民眾心態的方法和形式，在美國的報紙、雜志和大學中為意大利發起一場迅猛而精準的宣傳攻勢”。  [[40]](#_40__DDI__series_8__vol__2__n__6)

據帕切利所知，盡管美國并非國際聯盟的成員，但是墨索里尼還是擔心它可能會加入到國際抵制運動中。在此之前，無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都以正面的心態看待墨索里尼，他們認為漫無目的、舉止散漫的意大利人正好需要他這種強勢的領導人。羅斯福總統盡管私底下并不認同墨索里尼，卻曾經表示他相信領袖為意大利人民做了很多好事。美國媒體也發表過很多支持領袖的言論。但是這場侵略戰爭使得輿論形勢急轉直下。美國報紙愈發注意到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具有頗多相似之處。“無論他如何理性說教，無論他擺出怎樣一副笑容，專制者就是專制者。”《紐約時報》在社評中如是說道。羅斯福對此更不樂觀，早在1936年初，他就開始公開譴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了。  [[41]](#_41__Diggins_1972__pp__279_282)

法西斯政府和梵蒂岡通力合作，在意裔美國人群體中取得了不小的成功。意裔美國人把持的媒體依然支持墨索里尼。在費城，二十萬意裔美國人走上街頭，抗議國際聯盟的制裁行動。  [[42]](#_42__Shi_Wei_You_Xing_Yu_11Yue_1)  在其他擁有大量意大利移民的城市也發生了類似集會，請愿書猶如潮水一般涌向國會。其中最具影響力的莫過于每周日通過廣播電臺向數千萬美國人布道的查爾斯·考夫林神父，他接連幾周都在節目中炮轟制裁行動。  [[43]](#_43__Niu_Yue_Cheng_Mei_Guo_Yi_Da)

考夫林于1891年生于安大略省哈密爾頓市的一戶愛爾蘭移民家庭，之后在多倫多市晉鐸，并于20世紀20年代早期移居底特律，建立起一座簡易的教堂在此布道。他很快就建立起一座小型廣播電臺，致力于各種宗教話題。到1930年，這位年輕的神父開始拓展話題，關注貧苦大眾的悲慘處境。羅斯福在1932年初次競選總統時，他先是表示支持，但很快轉向反對，并在1934年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全國社會正義聯盟。當時間流轉到眼下這個時期，他開始譴責“猶太銀行家”，并且對墨索里尼投懷送抱。隨著教眾的捐款源源不斷地到來，考夫林（如今已是這個國家最顯赫的宗教人士）將原先簡易的木結構教堂推倒，重建了一座非常現代化的教堂。它最為奪目的標志性建筑要數那尊高高豎起的石塔，頂部有一臺強大的無線電廣播發射機。他的聲名鵲起令好多教會高層人士產生了警惕心理。  [[44]](#_44__1935Nian__Fei_Cheng_Da_Zhu)

呼吁美國加入制裁行動的皮特曼—麥克雷諾茲法案（Pittman-McReynolds Bill），在意裔美國人群體中引發了廣泛的抗議聲。意裔美國人用數千封抗議信淹沒了國會議員，用美國軍備控制機構負責人的話來說，他們“無法掩飾自己懼怕的心情”。這一法案最終慘敗。  [[45]](#_45__Luconi_2000__pp__11_12_Zai)

每一位趕赴埃塞俄比亞前線的意大利軍人都收到了一本全新的禱告合集《禱告吧！軍人》（Soldier, Pray !）。在這本手冊的引言中，不知疲倦的圣心天主教大學校長阿戈斯蒂諾·杰梅利敦促年輕的意大利人要英勇作戰：

聽從祖國的派遣，順從天主的召喚，去往你職責所在，準備好執行一切任務……

請相信，即便天主要求你犧牲生命……

意大利軍人，你的犧牲與凡人之間的天主耶穌基督的犧牲聯合在一起，將會達成救贖和祖國的偉業。  [[46]](#_46__Zhuan_Yin_Zi_Franzinelli_19)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意大利的各位主教競相熱忱地信奉法西斯信仰，并且傳布這場戰爭的背后有神圣的旨意在支持。位于羅馬附近的泰拉奇納（Terracina）主教納瓦拉蒙席便捕捉到了這一情緒：“哦，領袖！……如今的意大利乃是法西斯的國土，所有意大利人的心都化作一個節拍與您一同跳動……天主保佑您，噢，領袖！在您日常繁重的工作中，祂將維系您，并且確保……意大利軍隊取得勝利。”  [[47]](#_47__De_Felice_1974__p__761_Zhu)

\* \* \* \* \*

隨著意大利愈發被國際社會孤立，陰謀理論也就獲得了更加強大的能量。其中最為猖獗的便是教會責難已久的新教—猶太—共濟會—共產主義陰謀。11月初，阿馬爾菲（Amalfi）大主教給他麾下的各位主教發去通知，其中附有一份在周日布道中與教區教眾分享的信息：“國際聯盟的行為受到神秘力量的操控。”他進而給出了神秘力量的名單：“共濟會、布爾什維克黨、安立甘宗。”他們之所以與意大利作對，是因為他們不能容忍法西斯政權“與天主教會達成完美的合作關系”。  [[48]](#_48__De_Rossi_dell_Arno_1954__pp)

英國和法國都出言譴責這場侵略戰爭，這惹怒了領袖，然而他也害怕經濟制裁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就為塔基·文圖里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多年以來他一直在向領袖兜售他的陰謀理論。

11月30日，這位耶穌會士受到庇護派遣，來到威尼斯宮商討盡快結束戰爭的可能性。他很快就跳轉到自己最為關心的那個話題。

“閣下有沒有讀過登在[法國]《每周評論》（La Revue hebdomadaire ）11月16日和11月30日那兩期上的文章：《誰想要打仗？埃塞俄比亞事件的幕后黑手是誰？》？”

“我讀過，而且讀得很用心。”

“那么您已經清楚這位匿名作者是怎么清楚地證明，共濟會和共產黨人以及布爾什維克黨人勾結在一起，建立了共同戰線，其目標是要擊敗法西斯，擊敗墨索里尼，給意大利帶來一場革命。在他們看來，想要在意大利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帝國，這樣一場革命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事實也確實如此。”

墨索里尼還沒來得及回答，塔基·文圖里便把他的理論全盤托出。

“閣下請相信我，我們的面前是一個可怕的陷阱，國際聯盟是受到猶太人和共濟會成員操縱的共謀犯。”

這位教宗特使接著又大談意圖摧毀領袖的猶太—共濟會—布爾什維克陰謀，而墨索里尼則聆聽著他的話語。等到他說完的時候，激動的獨裁者大喊說，英國和法國正引領著全世界與他為敵。他斷言說，這些國家想要發起一場歐洲大戰。  [[49]](#_49__ASV__AESI__pos__967__vol__2)

墨索里尼并沒有過多地提及猶太人，但他卻愈發用陰謀理論看待埃塞俄比亞戰爭的反對力量。兩周后，當他再度同塔基·文圖里會面時，反倒是他提起了國際陰謀的幽靈。領袖告訴耶穌會士，第三國際、共濟會和自由黨人組成了對抗意大利的統一戰線，他們的目標是“不惜任何代價地摧毀統治意大利的那個政權”。

“大家都對此深信不疑，沒人可以質疑它。”教宗特使如是回答。  [[50]](#_50__ASV__AESI__pos__967__vol__2)

[[1]](#filepos773676) 法國大使弗朗索瓦·夏爾——魯在1935年2月15日提交報告，表示達拉·托雷向他說起教宗擔心會發生入侵事件。夏爾——魯在當時認為墨索里尼不會這么魯莽地發起進攻。DDF, series 1, vol. 9, n.226.

[[2]](#filepos773946) 3月，墨索里尼將兩個師派遣到意屬索馬里蘭，他們在出發時接受了數位意大利樞機的祝福，法國駐梵蒂岡代辦在報告中寫道，這個事件引發了諸多評論。DDF, series 1, vol. 9, n. 400, Truelle à Laval.關于軍事建設，參見Del Boca 2010, pp. 90–92。

[[3]](#filepos774519) ACS, MCPG, b. 172, Zanetti, 25 giugno 1935.

[[4]](#filepos774786) Bosworth 2011, p. 171.

[[5]](#filepos775422) Tardini 1988, p.332; C. Wingfield, Annual Report 1934, January 12,1935, R 402/402/22,in Hachey 1972, pp. 287–288, sections 138–140.

[[6]](#filepos775652) ACS, MCPG, b. 172, Zanetti, 19 giugno 1935.

[[7]](#filepos776156) McCormick 1957, pp. 69–76.

[[8]](#filepos776680) DDF, series 1, vol. 11, n. 348, Charles- Roux à Laval,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4 juillet 1935.早幾個月的時候（2月），《羅馬觀察報》主編達拉·托雷曾告訴法國大使，教宗對于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亞的計劃有著很深的憂慮。DDF, series 1, vol. 9, n. 226, Charles- Roux à Laval, 15 février1935.代辦塔拉莫在6月末的報告中提及了《意大利未來報》的那篇文章，他認為該文反映了梵蒂岡對埃塞俄比亞的處境持有何種態度。DDI, series 8, vol. 1, n. 450,Talamo a Mussolini, 27 giugno 1935.

[[9]](#filepos777969) Ceci 2008, p. 297; Ceci 2010, p. 43.教宗對埃塞俄比亞抗意戰爭的立場在前后有很大轉變，Ceci 2010對此作出了非常出色的分析。

[[10]](#filepos778709) 一段時間之后，英國駐梵蒂岡大使在一份簡要的描述中這么談論皮扎爾多：“他為人友善且樂于提供幫助，但顯然操勞過度，且能力也算不上一流。” R5802/5802/22, FCRSE, pt. 14, p. 155, Osborne to Halifax, June 21, 1938.

[[11]](#filepos778999) 公教進行會全國主席齊里亞奇為了將這番言論造成的傷害降至最低，在那天清晨趕到塔拉莫住處，將這番講話的內容告訴了他。那一年早些時候，德·維基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塔拉莫便暫時擔任代理大使一職。

[[12]](#filepos780073) Tardini 1988, p. 385.

[[13]](#filepos782166) Tardini 1988, pp. 385–386。

[[14]](#filepos782598) 倫敦的《泰晤士報》尤其關注了教宗的如下話語，“侵略戰爭是一種進犯，是一場不正義的戰爭，它的恐怖令人無法言說”。《教宗論阿比西尼亞》，《泰晤士報》，1935年9月2日，第2版。同一天，《華盛頓郵報》在頭版刊登文章，題作《教宗向領袖發出請求，希望他能在戰爭一事上懸崖勒馬》，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這篇文章認為塔基·文圖里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將教宗的想法傳達給墨索里尼。第二天，該報又登出一則社論，談論了教宗對于和平的呼號，并將一句來源可疑的話歸功于塔基·文圖里。《教宗致國王》，WP, September 3, 1935, p. 8。

[[15]](#filepos783294) ASMAE, AISS, b. 56, fasc. 1, sf. 1b, Pignatti a Mussolini, 30 agosto 1935.

[[16]](#filepos784079) 韋迪耶的描述收于Papin 1977, p. 63。

[[17]](#filepos784341) Papin 1977, pp. 56, 62。

[[18]](#filepos784797) Bosworth 2002, pp. 304–305.

[[19]](#filepos785495) MAEI,vol.266,269–271,Charles-Roux à president du conseil, 17 septembre 1932. 然而教宗也有所不為，他不接見身穿黑衫或者軍裝的法西斯兒童，因為兒童身穿戎裝的景象令他感到厭惡。De Rossi dell’Arno 1954, p.46.

[[20]](#filepos786291) 《慶祝意大利“進軍羅馬”十周年紀念日》，OR, 3 novembre 1932, p. 1；討論參見MAEI,vol.266,294–297, Charles-Roux à president du conseil, 3 novembre 1932。這篇文章的背后還有一則有趣的故事。當國務卿請求該報主編朱塞佩·達拉·托雷（他是唯一一位敢于身穿非正式服裝拜見教宗的平信徒）撰寫這篇歌功頌德的文章時，他顯然拒絕了這一請求。Agostino 1991, p. 153.墨索里尼長久以來都認為達拉·托雷對他懷有敵意，而這種懷疑是很有根據的。夏爾——魯在獲取教宗言論的內幕消息方面特別倚仗達拉·托雷，而在埃塞俄比亞危機期間，達拉·托雷曾透露過他對博爾貢吉尼和塔基·文圖里的看法，教宗和墨索里尼之間的這兩位信使簡直是領袖那邊的人，他們總會將教宗的批評過濾掉，以此來取悅墨索里尼。DDF,series2,vol.1,n.107, Charles-Roux à Flandrin, minister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27 janvier 1936. 帕切利知道奧古斯都·奇里亞奇非常想討好法西斯政權，于是就拜托他來撰寫這篇文章。奇里亞奇照做了。終稿還按照庇護十一世的意思增添了很多內容。ASMAE, AISS, b. 21, fasc. 8, De Vecchi a Mussolini. 并不是教會的每一個人都認可這樣歌頌墨索里尼，持異議的還包括達拉·托雷在《羅馬觀察報》的一些同事。接下來還會怎么樣？他們問道。《羅馬觀察報》是否還會將教宗三重冕替換成法西斯標志？ASMAE, AISS, b. 21, f. 8, Città del Vaticano, 3 novembre 1932.

[[21]](#filepos786809) ASMAE, AISS, b. 56, fasc.1, sf. 1c, Pacelli a Mussolini, 14 settembre 1935.根據一位線人的報告，當英國對墨索里尼的戰爭計劃提出強烈反對時，教宗打算秘密地將塔基·文圖里派往英國，游說當地天主教徒，讓他們支持意大利政府。但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項秘密差事最后得到了執行。ACS, DAGR, b. 1320, informatore n. 52, Roma, 12 settembre 1935.

[[22]](#filepos787445) ASV, AESS, pos. 430a, fasc. 352, ff. 49, 20 settembre 1935.

[[23]](#filepos788200) ASV, AESI, pos. 967, vol. 1, ff. 156r–159r. 9月27日，當接見夏爾——魯時，教宗再度提起如果領袖按照他的計劃入侵埃塞俄比亞，他害怕災難即將降臨意大利和墨索里尼頭上。他告訴法國大使，他曾提議同墨索里尼進行秘密會晤，討論如何由他出面，幫助領袖免除這場戰爭，但是墨索里尼拒絕了。DDF, series1,vol.12,n.254,Charles-Roux à Laval, 27 septembre 1935.

[[24]](#filepos789587) 轉引自Milza 2000, p. 724。

[[25]](#filepos790045) ACS, CR, b. 68,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3 ottobre 1935.

[[26]](#filepos790552) DDF, series 1, vol. 12, n. 412, Charles-Roux à Laval, 10 octobre 1935 (footnote 1).

[[27]](#filepos791682) 帕切利打算交給國王的這封信，無論是信封還是內文，原件都收藏在梵蒂岡檔案館，而不是倫敦的皇家檔案館。這一事實本身就不言自明。這份梵蒂岡檔案附有一張手寫說明，“致英國國王的信，由帕切利樞機簽署，1931年10月3日。注：對方一開始接收了此信，但是后來卻由英國大使館退回”。ASV, AESI, pos. 967, vol. I, ff. 201r–208r. 在英國首相看來，教宗就外交問題直接同國王進行溝通有違外交禮儀。

[[28]](#filepos793311) Del Boca 2010, pp. 104–107.

[[29]](#filepos793665) Federico 2003, p. 590.

[[30]](#filepos794127) ACS, MCPG, b. 159, 1 febbraio 1935.德·維基卸任時受到了教宗的褒獎，教宗授予他金質勛章，并對他大加贊揚。CC 1935 I, pp. 423–424, 647.據一位線人表示，教宗很喜歡德·維基，也正是他要求梵蒂岡日報刊登一篇贊美這位卸任大使的文章。ACS, MCPG, b. 159, informatore, Roma, 5 febbraio 1935. 早在1932年，帕切利樞機就已經聽聞德·維基將要卸任，并開始猜測到底誰會接任他的職務。他明確表示德·維基的能力非常平庸。 MAEI, vol.266,250–254,Charles-Roux au president du conseil, 25 juillet 1932.

[[31]](#filepos794896) ASV, AESI, pos. 985, fasc. 658, ff. 23r–27r. 關于皮尼亞蒂的外交經驗，參見 Casella 2010, p. 185n1. 德·維基繼任人選的小道消息傳遍了羅馬城。政府里最為顯赫的幾個名字都曾被提及，從費代爾佐尼到阿爾弗雷多·羅科，再到墨索里尼的女婿加萊亞佐·齊亞諾。在任命皮尼亞蒂之前，墨索里尼曾經征求教宗的許可。教宗則聯系了圣座駐法國大使路易吉·馬廖內蒙席，大使表示這位伯爵是個不錯的人選，他聰明、謙遜、正直，是一名熱心的天主教徒和一位優秀的父親。ACS, MI, PP, b. 168, informatori, relazioni, 3 marzo, 22 marzo, 27 marzo.

[[32]](#filepos795433) 這位新任大使總結道，簡而言之，“圣父的言談表明他是一位積極正面的意大利人”。ASMAE, APSS, b. 25, fasc. 2, 13 ottobre 1935; Casella 2010, p. 189.

[[33]](#filepos796267) H. Montgomery, Annual Report 1935, January 9, 1936, R 217/217/22, in Hachey 1927, pp. 322–323, sections 161–164; MAESS, vol. 37, 188–189, Charles-Roux, télégramme, Affairesétrangères,17 décembre 1935.

[[34]](#filepos797232) Garzonio 1996; Rumi 1996, pp. 38–39; De Vecchi 1983, p. 219.

[[35]](#filepos797715) 這位線人警告說，這位大主教的行為是一種投機取巧，而不是理念使然，他還補充道：“我們最好不要太信任他，因為只有當法西斯黨對他有利時，他才會尊奉我們的理念。” ACS, MI, FP “Schuster,” informatore n. 52, Milano, 3 gennaio 1935.

[[36]](#filepos798478) Saresella 1990, p. 460.

[[37]](#filepos798739) Ceci 2010, pp. 86–87.

[[38]](#filepos799019) 轉引自Baudrillart 1996, pp. 193–194 (5 mai 1936)。

[[39]](#filepos799424) 在10月24日的會面中（意大利試圖阻止經濟制裁的外交活動都失敗了），墨索里尼告訴塔基·文圖里，教宗竟然希望法國能出面調停爭端，簡直是大錯特錯。領袖說，你告訴教宗，我們和法國人的友誼已經到頭了。唯有納粹德國才是意大利的朋友。墨索里尼補充道：“誰能想到，二十年前的朋友……如今卻成了敵人，而那個時候的敵人卻成了我們如今的朋友，未來的事情只有天主知道。” ASV, AESI, pos. 967, vol. 2, ff. 80r–80v, “Udienza col Capo del Governo,” 24 ottobre 1935, P.T.V.

[[40]](#filepos800227) DDI, series 8, vol. 2, n. 664, Pignatti a Mussolini, 19 novembre 1935.

[[41]](#filepos801284) Diggins 1972, pp. 279–282. 《紐約時報》這篇社論的發表日期是1937年10月。Diggins 1972, pp. 276–278, 290–291, 317.

[[42]](#filepos801671) 示威游行于11月10日舉行。Ceci 2012, p. 95; Diggins 1972, p. 107.

[[43]](#filepos802070) 紐約城美國意大利聯盟的意裔法西斯黨主席曾致信時任媒體和宣傳部副部長的迪諾·阿萊里，向他強調考夫林神父的作用有多么重要。盡管大多數美國人都反對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但是意裔美國人卻予以強力支持，并且他們與考夫林通力合作，使得羅斯福沒能通過制裁法案。當電影院播放戰爭的新聞節目時，每當墨索里尼出現在大熒幕上，人們揶揄譏諷，朝他吹口哨；每當大熒幕上出現埃塞俄比亞人，人們則雀躍歡呼，這些景象令他感到厭惡。ACS,MCPR, b. 21. 皮尼亞蒂在11月22日同帕切利會面時曾強調，將石油（英國代表和個別其他國家代表提議將其納入制裁范圍）從制裁行動中排除出去非常重要，以及阻止美國加入制裁行動也同樣重要。他再次要求帕切利調動圣座的外交網絡，為戰事提供助力。他指出教會可以在美國開展許多工作，并夸獎了考夫林神父的工作。帕切利向這位意大利大使保證，梵蒂岡正全力以赴地幫忙，并且補充道，考夫林“已經出言反對英國和制裁行動，沒有必要催促他把事情做過火”。ASV, AESS, b.430a, fasc. 362, f. 136.這番消息也在11月28日傳到媒體和宣傳部副部長的耳中，讓他知道考夫林起到了很有價值的作用，令美國天主教神職人員支持埃塞俄比亞戰爭。ACS, MCPR, b. 21, “Appunto per S.E. il Sottosegretario di stato.”意大利大使又在12月6日同帕切利會面，他告訴樞機自己已經聽聞考夫林神父在美國煽動天主教徒反對制裁行動，他對此表示非常滿意。ASV, AESS, pos. 430b, fasc. 362, 6. 145/146.有關考夫林的故事以及他同圣座的關系，參見Fogarty 2012。

[[44]](#filepos803248) 1935年，費城大主教多爾蒂樞機抱怨說考夫林“已經超出了教會的控制”。他補充道，考夫林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尤其是那群猶太出身或者信奉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烏合之眾心目中的英雄”。考慮到考夫林的反猶傾向，這番評價顯得非常奇怪。Fogarty 2012, pp. 108–110.本書對考夫林的描述部分基于意大利駐華盛頓大使館發給羅馬的一份報告。ASMAE, AISS, b. 33, “Oggetto: Padre Coughlin,” 22 ottobre 1936.

[[45]](#filepos803736) Luconi 2000, pp. 11–12.在意裔美國人群體中，支持埃塞俄比亞戰爭的態度非常普遍。1936年4月，意大利駐羅德島普羅維登斯的副領事身穿黑衫，發放了七百枚鐵質婚戒。那座城市收到的金質婚戒捐贈實在是太多了，這位副領事后來又準備了四百多枚用于發放。Ceci 2012, pp. 95–96.

[[46]](#filepos804795) 轉引自Franzinelli 1995, pp. 311–312。

[[47]](#filepos805380) De Felice 1974, p. 761.主教的這番話刊于1935年12月19日的《意大利人民報》。

[[48]](#filepos806233) De Rossi dell’Arno 1954, pp. 69–70.后一個月，文蒂米利亞（Ventimiglia）大主教在給他的教區婦女做演講時，認為“意大利的敵人，其偉大和前途的敵人”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人、共產黨、國際共濟會和英國新教”（pp. 105–108）。

[[49]](#filepos808202) ASV, AESI, pos. 967, vol. 2, 6. 187r–88v, Tacchi Venturi, “Relazione dell’udienza avutacol Capo del Governo,” 30 novembre 1935.倫佐·德·費利切（1981, p. 291n85）總結道，墨索里尼能夠認同一場“國際猶太”陰謀正針對他在埃塞俄比亞的戰事，這其中很可能有塔基·文圖里的功勞。

[[50]](#filepos808884) ASV, AESI, pos. 967, vol. 2, 6. 257r–260r, Tacchi Venturi, “Relazione dell’udienza avutacon S.E. Mussolini,” 14 dicembre 1935.

## 第十七章 共同的敵人

11月初，博洛尼亞大主教在本市巨大的中心教堂向一群婦女發表演講，言辭中夾雜了頌揚墨索里尼的諂媚之言：“他是意大利人民天佑的領導人，他是圣徒，是英雄，是奇才，是殖民開拓者，他有著獨特的直覺，在當下的歷史時刻超越一切，他想要感召諸位意大利天主教女性，命你們奔赴一項偉大的使命。”阿馬爾菲大主教的言論重述了全國各地主教都在言說的主題，他斥責制裁行動之惡，認為它是共濟會和安立甘教會的陰謀，并宣告領袖是摩西再世：“意大利在此世注定要成就偉業，我為此感到高興。意大利乃圣徒和英雄的故土。意大利與天主教會達成和解，并受到教宗降福。法西斯政府令意大利成為一個具備道德并且尊奉基督教律法的國家。”  [[1]](#_1__Zhuan_Yin_Zi_Franzinelli_199)

然而意大利神職人員對這場不義戰爭的熱忱卻受到了各國的譴責，教宗只能獨力應對這些批評。英國駐梵蒂岡大使休·蒙哥馬利（Hugh Montgomery）從各位主教付諸鉛字的煽動性演講中選出段落，用它們質問梵蒂岡并懇求庇護喝止這種行為。教宗回答說，他已經派人與這些言語冒犯的主教進行溝通，要求他們緩和演講的措辭。  [[2]](#_2__ASV__AESI__pos__967__vol__5)  然而無論是此類演講或是英國的抗議，都將繼續下去。

當時的英法兩國也在籌備一項提議，想要結束這場危機，而教宗對此抱有極大的希望。這一提案將分裂埃塞俄比亞，把意大利最想得到的部分領土直接割讓給它。12月中旬，由于這份提議的條款被媒體捅了出去，英法雙方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壓力，這份提議只好中途流產。英國外交部部長為此引咎辭職。  [[3]](#_3__Brendon_2000__p__426)

墨索里尼則堅稱自己不會做出任何讓步，誰也無法阻擋他攻陷埃塞俄比亞全境。  [[4]](#_4__ASV__ANI__pos__23__fasc__7)

11月下旬，領袖決定組織一個Giornata della Fede，字面意思即信念之日或者婚戒之日（fede既有信念的意思，也有婚戒的意思）。這個宣傳手法可謂聰明之極，因為它將令意大利民眾（尤其是意大利婦女）更為緊密地同戰事結合在一起。為了表明他們的愛國心以及對戰事的支持，意大利人要把自己的金婚戒捐贈給祖國。

在這個節日里，意大利主教需要敦促天主教徒上交他們的金婚戒，而且為這些捐贈人從國家換回來的鐵婚戒施以祝福。當各位主教得知自己的職責時，他們紛紛向梵蒂岡尋求指導意見。教宗并不希望讓意大利的高級神職人員如此公開地為戰事搖旗吶喊，尤其國外的天主教徒不斷地來信控訴，指責梵蒂岡支持法西斯政府的立場，令埃塞俄比亞生靈涂炭，然而他也不想惹怒墨索里尼。他擔心白紙黑字的通知文件會被泄露出去，于是決定派專人口頭傳達他的指令：“行事要小心謹慎……不要在埃塞俄比亞一事的對錯或正義與否上給出裁斷，最重要的是言辭用語要格外小心，不要冒犯另一邊，不要令他們感到不快。”  [[5]](#_5__ASV__AESI__pos__967__vol__5)

盡管有部分高階神職人員與教宗一樣對此感到不安，但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克制向法西斯政府獻媚的沖動。  [[6]](#_6__Bo_Luo_Ni_Ya_Da_Zhu_Jiao_Na)  即便收到教宗的通知，他們也會選擇性地無視。天主教媒體登滿了各種諂媚的文章，贊揚這場圣戰為野蠻人帶來了基督教和文明。許多教會要員（比如米蘭大主教和圣心天主教大學校長）都對戰爭表示支持，而教宗也從未在神職人員面前直接表露過對戰爭的疑慮，所以各地主教在各自教區的公報中敦促所有虔誠的天主教徒，為這一神圣事業捐出自己的婚戒。神父們甚至建立起教區委員會，確保教眾能夠盡可能地參與到這項事業中，而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他們也捐出了自己胸前的十字架。  [[7]](#_7__Ceci_2010__p__97_Man_Tuo_Wa)

在米蘭，舒斯特樞機在他的私人禮拜堂中親自為換回來的兩萬五千枚鐵戒指施以祝福。  [[8]](#_8__Jiao_Zong_Da_Yue_Hui_Dui_Shu)  墨西拿（Messina，西西里一個貧困的主教教區）大主教告訴手下的神父，他希望虔誠的天主教徒至少要捐獻三十克黃金。在這座島嶼的另一邊，蒙雷阿萊（Monreale）主教則要求神父熔化多年以來信徒奉獻的供品。在托斯卡納大區的格羅塞托省（Grosseto），一位教區神父征求主教的許可，想要熔化教堂樓頂的鐘，好為領袖和戰爭提供支援。  [[9]](#_9__Terhoeven_2006__pp__102__104)

12月18日終于迎來了信念之日，這個國家陷入了狂迷。  [[10]](#_10__Guo_Wang_He_Wang_Hou_Dai_To)  墨索里尼正在羅馬城外的蓬蒂尼亞（Pontinia），為這座新建小鎮的落成儀式發表演說。這些地方原先都是沼澤地，開發成城鎮全賴領袖的創舉。當地大主教在儀式之初發表了開幕詞：“噢，領袖！那些認為意大利人民會最終屈服的人不過是在自欺欺人……如今的意大利是法西斯，所有意大利人的心都同您一起搏動，而無論和平的勝利以及羅馬基督教文明的勝利需要我們做出怎樣的犧牲，整個國家都已經做好準備。”說完這些話，這位大主教取下了胸前的十字架和手指上的牧師戒指，將它們放入當日收集的獻禮中。  [[11]](#_11__Terhoeven_2006__pp__118_119)

自從教宗國陷落以來，天主教會從未同政府如此步調一致。而自從十字軍東征結束之后，它也從未在鼓勵天主教徒攻陷外域方面起到如此核心的作用。

戰爭的狂熱滋養了最為陰暗的陰謀理論，而神父和主教警醒信徒，那些國家之所以反對侵略，是因為他們不僅憎恨法西斯意大利，也憎恨羅馬天主教。  [[12]](#_12__Li_Ru__Du_Ling_Zhu_Jiao_Qu)

梵蒂岡也鼓勵這些觀點。圣誕節后的第二天，皮扎爾多蒙席告訴梵蒂岡駐加拿大領事，他正在駁斥那些反對埃塞俄比亞戰爭的意見。  [[13]](#_13__Chu_Yu_He_Mei_Guo_Xiang_Ton)  他解釋說，這些反對意見不僅針對教會也針對法西斯黨。他補充說：“對于一個像意大利這樣與圣座保持良好關系的偉大天主教國來說，這樣的仇視可謂自然而然。”這些言論攻擊的動機出自“教會敵人的仇視，他們希望通過打擊意大利，而給天主教會和圣座帶來打擊”。

這位領事在他的回答中指出，反對埃塞俄比亞的聲音在加拿大非常普遍。他寫道，雖然不幸的是，新教徒、共產黨人以及“那些深信民主原則的人”一直都反對法西斯黨，然而“正直的民眾以及那些更為冷靜的政治家都對法西斯黨達成的成就感到驚訝”。皮扎爾多敲響了教會神秘敵人的警鐘，他補充道，他會竭盡所能地傳布這些話語。  [[14]](#_14__ASV__AESI__pos__967__vol__5)

\* \* \* \* \*

在墨索里尼舉辦信念之日的當月，庇護十一世宣布了二十位新任樞機的任命情況。其中有十四人是意大利人。這一狀況引發了許多評論，許多觀察者稱，梵蒂岡國務院里幾乎每一位員工都是意大利人，而所有的教宗大使也都是意大利人。在德國，報端文章和政圈都認為教宗的樞機人選與法西斯政權對梵蒂岡日益深遠的影響力有關。一份德國報紙還悲嘆地提到德意兩國的巨大反差，意大利主教都狂熱地支持墨索里尼對埃塞俄比亞發動的侵略戰爭，而德國主教卻沒有對納粹政權展現出類似的心態。  [[15]](#_15__Lai_Zi_Yi_Da_Li_Zhu_Bai_Lin)

令大多數人感到吃驚的是，新任威斯敏斯特大主教阿瑟·欣斯利（Arthur Hinsley）并沒有從教宗手里接過樞機帽。兩個月前，這位大主教曾出言為教宗辯護，表示庇護無力阻止這場戰爭。“他是一位無助的可憐老者，”他解釋道，“只有一支小小的警備部隊用來自衛，用來保護梵蒂岡的無價珍寶，用來守衛這片方寸之國，保護他應得的獨立自主。”大主教的這番辯護之辭為教宗所不喜，此外他譴責法西斯政府是個殘暴專橫的政權（“時至今日還將專制理念奉若神明”）的話也惹怒了墨索里尼。教宗最終沒有將欣斯利晉升為樞機，人們認為他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他不想冒犯領袖。  [[16]](#_16__Montgomery__Annual_Report_1)

意大利政府非常欣喜地接受了教宗對教廷成員的任命。他不僅僅令意大利人再次占據多數，據警方的一位線人所說，“任何人都可以確切地指出，當選的十四名[意大利]樞機或多或少都與政府有曖昧關系”。  [[17]](#_17__ACS__MCPG__b__172__Roma__21)

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并非唯一一個受到漠視的教會人員。1月9日，教宗將塔基·文圖里招至面前，告訴他盡管自己想將他晉升為樞機，但是時機尚未成熟。教宗對這位垂頭喪氣的特使說道：“可憐的神父，總有一天你會戴上樞機帽！可是現在我確實無能為力。”考慮到當前微妙的國際形勢，如果他將自己和墨索里尼之間的特使任命為樞機，將有可能遭到有心人的過度解讀。教宗問道，英國人會作何感想？他告訴耶穌會士，當前最要緊的是讓他繼續行使特使的職責，而晉升樞機將使他不得不卸下這個職務。  [[18]](#_18__Ran_Er_Jiao_Zong_Mei_You_Ga)

在12月晉升樞機的那二十人中，便有常被指責喜好男風的卡米洛·卡恰，教宗的這位典禮長反倒認為，這一提拔還是來得太晚了。當教宗在1929年宣布新晉樞機名單而其中沒有他的名字時，卡恰非常憤怒。  [[19]](#_19__ACS__MI__PS__Polizia_Politi)  1930年10月，都靈的一份報紙稱，有傳言說他即將擔任這座城市的大主教。據梵蒂岡的一位警方線人稱，這些傳言“引發了許多流言蜚語”。  [[20]](#_20__ACS__MI__PS__Polizia_Politi)  1931年3月，另一位線人透露說，卡恰對教宗憲兵隊的長官非常生氣，因為他揭發卡恰近來同一位年輕神父過從甚密。教宗得知了這個消息，對此非常不高興。早些時候，這位線人曾表示過，卡恰之所以沒有因為同樣的原因，像德·桑佩爾蒙席那樣受到教宗的處罰，不過是因為他和教宗有著多年的交情。  [[21]](#_21__ACS__MI__PS__Polizia_Politi)

盡管卡恰流言纏身，但是關于他即將晉升為樞機的傳聞卻愈演愈烈。1933年，一輪新的指控又爆發了，其他梵蒂岡人士也站了出來，聲稱自己曾親眼見過卡恰跟男孩或青年男子干著有失體面的勾當。其中有一名出身黑色貴族（這些羅馬精英家族數十年來都堅守在教宗身邊，同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國作對）的伯爵，他說卡恰曾在梵蒂岡的自家公寓里一邊給兩位學生灌葡萄酒和烈酒，一邊調戲他們，結果被抓個正著。經過審問，這兩位還沒醒酒的男孩表示是卡恰將他們引誘到房間里，承諾會給他們一大筆錢。一位線人表示，羅馬的神職人員其實很反感教宗，認為他是個脾氣暴躁的獨裁者，如果他不顧忌卡恰好色成性的惡名而將卡恰晉升為樞機，那么他的聲望將會跌至谷底（至少這位線人這么認為）。  [[22]](#_22__ACS__MI__PS__Polizia_Politi)

1934年8月，教宗要求卡恰加入宗座代表團，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參加圣體大會，卡恰由此得到了一個明確的信息：教宗對他心有偏愛，他相信自己總有一天會晉升樞機。  [[23]](#_23__Gen_Ju_Yi_Wei_Xian_Ren_De_B)  然而就在同一時間，另一位警方線人對教宗的意圖提出了疑慮。卡恰的一位擁躉曾在拜見教宗的過程中替卡恰美言，贊揚他以教宗的名義做的那些善事。卡恰的這位友人表示，考慮到他日漸寬大的腰圍，他已經越來越難以保持這狂熱的步速，也許是時候該給予他獎賞了。教宗聽了有些惱怒，并沒有理睬這位來訪者的請求。“讓他少吃點就是了！”他低聲說道。  [[24]](#_24__ACS__MI__PS__Polizia_Politi)

然而教宗仍然對卡恰存有一份情誼，畢竟自孩提時起，他便在米蘭同卡恰相識，所以在最后關頭，他還是將卡恰納入了1935年新晉樞機的名單里。盡管那些針對卡恰的指控在梵蒂岡盡人皆知，但是它們似乎沒有阻礙他的新同仁熱情地接納他。英國駐圣座大使在1938年年中觀察到，“個頭矮胖的卡恰樞機和藹而又幽默，他也許是整個教廷最受歡迎的人物”。  [[25]](#_25__FRSCE__n__350__Osborne_to_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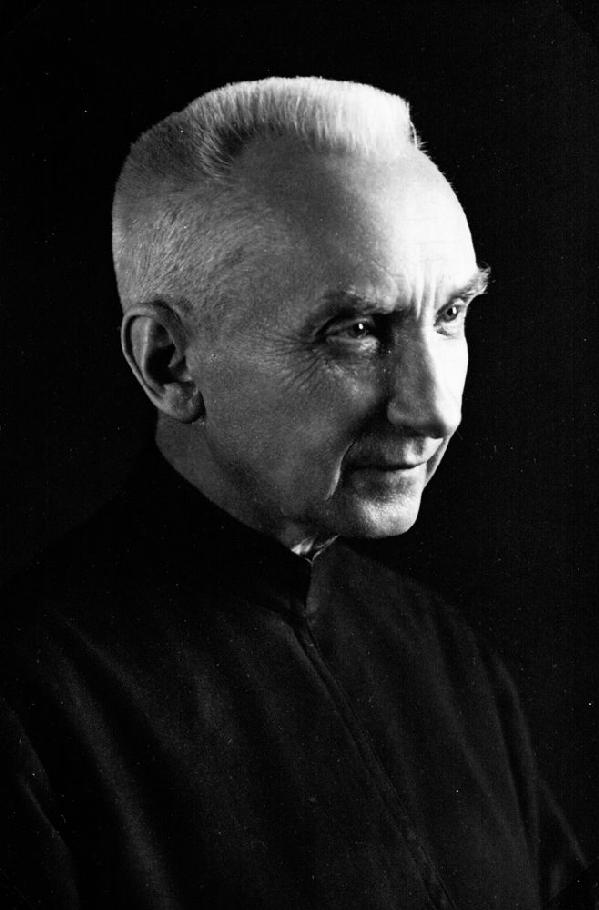
\* \* \* \* \*

埃塞俄比亞戰爭是否會影響到美國一方的態度，教宗的這層憂慮始終無法打消。1月4日，他重復了帕切利曾經提過的建議，希望領袖能夠在美國加強主戰宣傳。  [[26]](#_26__Jiao_Zong_Tong_Guo_Sheng_Zu)  墨索里尼讓教宗不要擔心，多虧了那位“愛爾蘭神父”（即通過廣播電臺布道的查爾斯·考夫林神父）“用對美國人特別奏效的美式手段和那些反對意見作斗爭”，意大利如今的處境已經大為改善。  [[27]](#_27__Mo_Suo_Li_Ni_Huan_Rang_Bo_E)  自從國際聯盟宣布對意大利實施制裁后，考夫林便通過每周日半小時的全國廣播節目對這一行為進行譴責。他在11月底向數百萬聽眾廣播道：“國際聯盟及其制裁行動的背后只有一種動機——每當英國的利益遭到威脅時，它就會出來行動。”  [[28]](#_28____Kao_Fu_Lin_Tong_Chi_Guo_J)

每當美國方面出現問題的時候，墨索里尼知道他可以向梵蒂岡人士尋求幫助。1936年初，極具影響力的美國耶穌會雜志《美國》（America ）發表了一篇批判戰爭的文章。  [[29]](#_29__Qiao_Zhi__Sai_Er_Di_Si__Geo)  領袖便派遣大使找耶穌會首腦談話，希望他出手相助。

耶穌會成立于16世紀中葉，被視作天主教會的知識分子團體，而庇護十一世也依從傳統，讓他們充當智囊團的角色。沃齊米日·萊多霍夫斯基出身波蘭貴族家庭，在1915年當選耶穌會總會長（他擔任這一職務直至過世，任期長達二十七年）。幼年時，他在奧地利王室擔任侍從。他的父親是一名伯爵，曾在奧地利軍隊擔任騎兵軍官。他父親的兄弟是天主教會的樞機，在教廷中聲名顯赫，并曾擔任傳信部部長。  [[30]](#_30____Ye_Su_Hui_Xin_Ren_Ling_Da)  萊多霍夫斯基的辦公室（耶穌會全球總部）實則是梵蒂岡的一個分舵。

20世紀初擔任德意志帝國總理的伯恩哈特·馮·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親王曾在他的回憶錄里談到萊多霍夫斯基：“總會長個頭中等，眼睛透露出不同尋常的智慧光芒，他的面容像智者般布滿皺紋、棱角分明，他舉止優雅，顯然是貴族出身。”當比洛于1924年在羅馬拜訪這位耶穌會領導人時，他對其房間的簡樸布置印象深刻，里面除了一尊圣母瑪利亞像和幾幅教宗肖像外別無其他裝飾物。他也很快得知為何歷任耶穌會總會長都不愿意接受樞機一職的委任：因為他們自身的職務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31]](#_31__Von_Bulow_2007__pp__279_280)



沃齊米日·萊多霍夫斯基，耶穌會總會長

在萊多霍夫斯基的主持下，耶穌會迅速擴張，不僅鞏固了自身在美洲的地位，還成倍增加了派往亞洲的傳教士。盡管他極其苦行且在某些方面有些專制，卻也是個具有幽默感的人。有一天，他最親密的一位共事者來到辦公室探訪他，正好撞見一位很胖的耶穌會士從他的辦公室出來。“你認識他嗎？”耶穌會總會長問道，“他就是B神父，我們最優秀的一分子。你知道他有多肥嗎？他坐下起碼要占三個人的位置。所以每次有官方儀式我都會派他去。因為媒體可以報道說：耶穌會派出了龐大的代表團。”  [[32]](#_32__Munoz_1942__pp__5_6)

這位耶穌會領導人對法西斯政權非常熱忱，并且他對此毫不掩飾。自從墨索里尼掌權以來，他便盡全力鏟除教會內部反對領袖的聲音。  [[33]](#_33__Qing_Du_Zhe_Men_Hui_Yi_Yi_X)

在1936年初的會面中，意大利大使告訴萊多霍夫斯基，墨索里尼希望他能解雇《美國》的反法西斯主編，并用親法西斯人選填補這個職位。萊多霍夫斯基立即答應了他的要求。皮尼亞蒂寫道：“總會長毫不猶豫，立即答應由我來做主，安排這份北美耶穌會雜志總負責人的人選。”很快，一位對法西斯事業非常熱心的新主編就已安排就緒。  [[34]](#_34__Yin_Wei_Mo_Suo_Li_Ni_De_Yao)

萊多霍夫斯基這么支持他的工作，皮尼亞蒂感到非常滿意，還表示意大利的敵人就是教會的敵人。萊多霍夫斯基則對此表示同意。他回答說，那些攻擊墨索里尼發動埃塞俄比亞戰爭的言論不過是“一個借口，國際猶太陰謀將從中獲利，他們的目的是要進一步向西方文明發起進攻”。  [[35]](#_35__Lai_Duo_Huo_Fu_Si_Ji_Huan_J)

\* \* \* \* \*

領袖正身處巨大的壓力之下。他后來告訴希特勒：“如果國際聯盟聽從英國外交部部長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的建議，將石油納入對意大利的制裁行動之中，那我就不得不在一周內撤出埃塞俄比亞。于我而言，這將是一場徹徹底底的災難。”  [[36]](#_36__De_Felice_1974__p__701)  意大利的經濟已經因為制裁行動和戰爭開支蒙受損失。教宗的首席金融顧問告訴他說，墨索里尼平靜的公開形象下隱藏著“嚴重的軀體抑郁癥狀”。  [[37]](#_37__Ventresca_2013__p__104)

在法西斯的宣傳中，這場戰爭將是一次短暫而勝利的行軍，一支歐洲的現代部隊將橫穿這片由持矛野人包圍的荒蕪鄉野；但是實際上，法西斯部隊卻一次又一次受挫。12月6日（此時離侵略戰打響已過去兩個月），當意大利人開始轟炸德塞（Dessie）鎮時，一位攝影師抓拍到一張照片，畫面上的埃塞俄比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一世正親自操縱機關槍，向頭頂飛過的意大利飛機開火。糟糕的是，這位攝影師還捕捉到意大利飛機轟炸當地美國醫院的畫面，建筑上的紅十字標志非常顯眼。當月晚些時候，埃塞俄比亞聚集起上萬兵力，暫時拖住了意大利軍隊繼續前進的步伐。1月初，意大利人行軍至坦賓（Tembien），全然不知有十萬多名埃塞俄比亞軍人部署在當地準備對他們進行伏擊。遇襲之后，黑衫軍（法西斯民兵）帶頭予以還擊，一天之內就有半數民兵與軍官陣亡。直到意大利飛機在最后關頭抵達，投下致命的毒氣彈，那些驚慌失措的幸存者才得以倉皇撤退。  [[38]](#_38__Mockler_2003__pp__74_85)

受到阻撓的意方攻勢能夠在1936年2月卷土重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們使用了被國際公約所禁止的武器。埃塞俄比亞并沒有空軍，所以當意大利飛機將燃燒彈丟向他們的村莊，將毒氣彈丟向逃亡的住民時，他們毫無反擊之力。“這種任務非常好玩，悲劇感十足卻又非常漂亮。”墨索里尼之子維托里奧這么描寫那些空襲，他和布魯諾以及埃達的丈夫加萊亞佐·齊亞諾都參加了空襲行動。當受毒氣攻擊的受害者照片被國外媒體披露出來時，意大利報紙堅稱這些奇形怪狀的埃塞俄比亞人都是麻風病患者。  [[39]](#_39__Brendon_2000__p__324__2Yue)

“墨索里尼真的是好運占盡，好運占盡。”庇護十一世觀察道。當時是1936年3月中旬，就在一周前，希特勒將德國部隊調往萊茵蘭，轉移了國際社會對埃塞俄比亞戰爭的關注。  [[40]](#_40__DDF__series_2__vol__1__n__4)  一系列戰事的勝利令領袖重新受到鼓舞，他明確指出戰爭將會在戰場上結束。意大利5月初占領了亞的斯亞貝巴（Addis Ababa），而在此前的幾周里，埃塞俄比亞一方的潰敗幾乎已變成意大利一方的種族屠殺。法西斯黨主席阿契爾·斯塔拉切的麾下有一支機動化部隊，他們所到之處，村莊皆被焚為平地。口干舌燥的傷者跌跌撞撞地來到湖邊飲水，卻因不知水里已經溶解了芥子氣，最后痛苦地死去。埃塞俄比亞一方的死亡人數就算沒有幾十萬人也起碼有幾萬人。  [[41]](#_41__Milza_2000__pp__726_727_Zui)

隨著意大利軍隊愈發逼近亞的斯亞貝巴，海爾·塞拉西一世意識到他已經徹底敗北。5月2日，他帶著隨從乘坐火車逃離了這座城市，這一舉動激怒了一些驕傲的國民。在他拋下的那座首都里，群龍無首的武士開始到處搜索槍支和錢財，洗劫了民居、商店和辦公場所。有些人試圖燒毀這座城市，因為他們覺得那至少好過被意大利人占領。歐洲人在領事館里擠作一團，可是連這些地方都開始遭到攻擊。這場混亂盡管令人膽寒，卻非常短暫。5月5日，巴多格里奧元帥率領兩千輛意大利車輛開進了城市，在前面開路的車輛上坐滿了意大利記者，他們的任務是前來記錄意大利勝利的時刻。  [[42]](#_42__Mockler_2003__pp__133_142)

第二天，塔基·文圖里給墨索里尼發來一封賀信。  [[43]](#_43__Na_Zhou_Wan_Xie_Shi_Hou__Xi)  他寫道：“閣下，在感謝天主賜予羅馬勝利與和平之后，請允許我向閣下致以最真摯熱情的喜悅之詞！天主向您施以援手，沒有在最困難、最不確定的時刻放棄您。所有虔誠的意大利天主教徒都誠心祈求天主繼續為您提供神助，確保勝利的果實真真確確便是凱旋宗座羅馬天主教國有權期望的勝利結果。”  [[44]](#_44__ACS__CR__b__68__Tacchi_Vent)

5月9日，十萬羅馬人聚集到威尼斯廣場，他們高舉法西斯旗幟，揮舞著手絹，目光都聚焦在墨索里尼的陽臺上。此外，還有數千人將周邊的街道擠得水泄不通。雷鳴般富有節奏的喊聲（“領—袖！領—袖！”）搖撼著四周古老的墻壁。

無論是在城鎮還是農村，無論多么偏遠或者人丁稀少，全國上下的教堂鐘聲都在召喚全體居民前往當地的中央廣場。擴音器發出噼啪的聲響，隨時準備播放墨索里尼的講話。在羅馬，領袖的宮殿里吹響三聲小號，但是外面幾乎沒有人聽到。他馬上就要現身，人們的期待所營造的緊張氣氛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最后，這位偉人大步走上陽臺，筆直站立、一動不動，他的雙手撐在大理石欄桿上，他挺著寬闊的肩膀，那張國字臉上表情鎮定，仿佛他是個由大理石打造的人物。領袖皺起眉頭，身軀微微后仰，舉起右臂行羅馬式直臂軍禮。人群中爆發出來的歡呼聲淹沒了整個廣場。直到此時，他才舒展面容，露出了慈祥的微笑，仿佛是要報答人群中滿溢的愛戴和信任。

“意大利，”領袖宣告，“終于成為帝國。”

人群再次歡聲雷動。一位親歷者稱，廣場就像是一座以天為穹頂的教堂。墨索里尼揮手致意，然后示意人群安靜下來，他還有話要說。

埃塞俄比亞人將臣服于意大利王國，他解釋道。意大利國王如今又增添了新的頭銜：埃塞俄比亞國王。“高舉你們的徽章、你們的手臂和你們的一顆紅心，”領袖高喊道，“向羅馬帝國致敬！在十五個世紀之后，帝國再現于羅馬的命運之山上。”

“你們配得上這份榮耀嗎？”他向人群發問道。

“配得上！”他們大聲咆哮道。

“你們的呼喊，”墨索里尼告訴他們，“就像是神圣的誓言，將你們和天主、和同胞聯系在一起，生死與共。向國王致敬！”這時候，他又舉臂行法西斯禮，而威尼斯廣場以及意大利各個城鎮中央廣場上的群眾都伸出手臂，發出喜悅的呼號聲。

第二天，數百萬意大利人在全國各地的大小教堂里舉行了特殊的感恩彌撒。  [[45]](#_45__Ojetti_1939__pp__116_120__M)

\* \* \* \* \*

戰爭的結束令庇護十一世總算松了口氣。他從頭到尾都不想打這場戰爭，而它也給梵蒂岡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然而國際局勢的重擔依然停留在他的肩頭不肯離去。他擔心這場戰爭令墨索里尼愈發投向希特勒的懷抱；他也擔心墨索里尼被非洲的勝利沖昏頭腦，轉而打起亞得里亞海的主意。教宗在6月初告訴法國代辦，領袖下一個目標很有可能是阿爾巴尼亞。  [[46]](#_46__DDF__series_2__vol__2__n__2)

教宗的身體也日漸衰弱。4月，他沒能在圣彼得大教堂參加復活節的彌撒活動。他已經放棄了日常的散步，只是偶爾乘坐那輛巨大的美國轎車繞著梵蒂岡花園兜兜圈。使徒宮安裝了電梯，教宗在房間和辦公室之間來往也不用上下樓梯了。  [[47]](#_47____Ba_Shi_Zhou_Sui_Lin_Jin)

墨索里尼幾乎大獲全勝，唯一令他煩惱的事情便是盡管戰爭已經結束，國際聯盟的制裁行動卻依然生效。他再度向梵蒂岡尋求幫助。  [[48]](#_48__ASMAE__APSS__b__31__Mussoli)  帕切利樞機想盡辦法幫忙。與英國大使會面時，他堅稱只有解除制裁行動才能給歐洲帶來和平  [[49]](#_49__ASV__AESS__pos__430b__fasc)  ；而在每周與歐洲其他各國大使的會面中，帕切利也始終重復這一觀點。教宗也出了一部分力，他告訴法國大使制裁行動再也沒有什么實際的用處。  [[50]](#_50__DDI__series_8__vol__4__n__7)  7月7日，國際聯盟通過投票終止了制裁行動。  [[51]](#_51__De_Felice_1974__pp__756_757)

有趣的是，意大利駐圣座大使博尼法喬·皮尼亞蒂認為墨索里尼對于教宗給予的支持過分感恩戴德了。他告訴領袖，教宗的這些行為不過是出于自利的動機。每一天，梵蒂岡的使者都在政府的部門里徘徊，依靠政府官員幫助他們完成使命；如果法西斯政權遭遇任何不測，那么教宗就會遭受無法承受的損失。

皮尼亞蒂進一步說道，誠然，意大利教會人士和梵蒂岡高層為戰事提供了全面且熱烈的支持，這對我們來說非常寶貴，但是“不要忘記，在埃塞俄比亞戰爭中，教宗迎戰的乃是猶太—共濟會—布爾什維克聯盟”，他們還有新教在背后支持。就算梵蒂岡支持墨索里尼的戰爭，他說道，那也是因為教會也在經歷自身的圣戰，和我們有著相同的敵人。  [[52]](#_52__DDI__series_8__vol__4__n__4)  由此看來，皮尼亞蒂也已經皈依塔基·文圖里的陰謀理論門下。

至少在墨索里尼自己看來，攻下埃塞俄比亞是一項偉大的成就。戰爭進行中的每一天，他都要緊跟戰報，移動辦公室那幅巨大地圖上的意大利旗幟，由此跟進意大利軍隊的行軍狀況。  [[53]](#_53__Navarra_2004__p__86)  在他上臺之前，大家都不把意大利當回事，如今，世界各國首腦一刻也不停歇地談論著領袖下一步會采取什么行動。主教和神父已經將金質十字架和珍貴的圣物都捐給了他。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給他頒發了最高軍功勛章薩伏依大十字勛章（the Grand Cross of the Order of Savoy）。國王還提出要將他立為親王，但是被他婉拒了。“陛下，我過去是墨索里尼，如今也只能是墨索里尼，”他這么告訴國王，“墨索里尼家族世世代代都是農民，而我對此感到格外驕傲。”  [[54]](#_54__Zhuan_Yin_Zi_De_Felice_1974)

瑪格麗塔·薩爾法蒂在一年前眺望威尼斯廣場時做出的預言已經得到徹底的應驗。她曾經的情人已經自負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對自身直覺的迷信程度已經徹底膨脹，他似乎認為在這座不朽之城里，教宗已經不是唯一一個永遠正確的人。在諂媚的斯塔拉切的推波助瀾之下，他很快就會將個人崇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他的雕塑、肖像畫和照片會布滿意大利的每一個角落，他的口號會用巨大的字母覆蓋在居民樓和谷倉的墻面上：“信仰、服從、戰斗”，“墨索里尼永遠正確”，“敵人越多，榮耀越高”。  [[55]](#_55__Du_Cai_Zhe_Ye_Zai_Bian_De_Y)  中學生開始背誦“領袖禱告詞”，感謝天主讓墨索里尼來到人世，“他是我在這個世上最敬愛的人”。這首禱告詞的結尾是一句誓言：“我謙卑地將我的生命獻給您，噢，領袖！”  [[56]](#_56__Galeotti_2000__pp__29_30)

從今往后，數十萬法西斯青年和民兵將在每周六下午（號稱“法西斯周六”）練習新的羅馬步（passo romano）。盡管墨索里尼堅稱它的原型是古羅馬軍團的行軍步伐，但是大家依然注意到它跟納粹德國的正步非常相似。薩爾法蒂在這方面的判斷也極為準確。墨索里尼正帶領意大利投向納粹德國的懷抱，這將是一場早已被人預言的災難。

[[1]](#filepos829838) 轉引自Franzinelli 1998, p. 137; Franzinelli 2008, p. 258。

[[2]](#filepos830409) ASV, AESI, pos. 967, vol. 5, f. 186r, “Memoria d’archivio,” 28 novembre 1935.

[[3]](#filepos831034) Brendon 2000, p. 426

[[4]](#filepos831285) ASV, ANI, pos. 23, fasc. 7, 6. 24r–27r, Borgongini a Pacelli, 18 dicembre 1935. 雙方會面發生在墨索里尼發表這番言論的前一天。

[[5]](#filepos832691) ASV, AESI, pos. 967, vol. 5, f. 201r, “Istruzioni per Monsignor Roveda da impartire verbalmente ai vescovi d’Italia,” 30 novembre 1935.

[[6]](#filepos832978) 博洛尼亞大主教納薩利·羅卡（Nasalli Rocca）樞機便是其中一位對此感到不安的人。“除了放棄我的金戒指令我不太高興以外，”他致信帕切利，“這件事還顯然沒有更改的余地，我只能就祝福一事提出我的疑問。”帕切利把納薩利的信帶到教宗面前，他說教區神父可以為戒指祝福，但是樞機應該避免這種事情。ASV, AESI, pos. 967, vol. 5, ff. 217r–218r.

[[7]](#filepos833743) Ceci 2010, p. 97.曼托瓦當地的報紙還刊登了主教的建議：“獻給祖國就是獻給天主！”公教進行會全國主席奧古斯托·奇里亞奇還大張旗鼓地將自己的金手表（這是公教進行會男性組織在其十周年紀念活動中送給他的）捐給了法西斯黨主席阿契爾·斯塔拉切。Terhoeven 2006, p. 102.更多的細節參見Terhoeven 2006 and Ceci 2010, pp.94–101。

[[8]](#filepos834003) 教宗大約會對舒斯特感到不滿，因為大主教不可以將圣所的圣物捐贈給國家，這種行為觸犯了禁忌，教宗認為這不符合教會應當采取的立場。據警方的一位線人所言，梵蒂岡支持從民眾處收集金戒指，而且“主教捐贈普通金制品也受到鼓勵……但是捐獻胸前十字架卻受到反對……因為它具有神圣的意味”。ACS, MCPG, b. 172, informatore, 11 dicembre 1935.

[[9]](#filepos834560) Terhoeven 2006, pp. 102, 104, 105; Ceci 2012, p. 92. 諾比利（2008, pp. 271, 275–276）也給出了一些例子，倫巴第大區也有幾位主教將金質圣物捐獻給國家。曾有一張紀念信念之日的明信片十分流行，上面畫著一雙手，其中一只手正從另一只手上取下婚戒，而上方的空中則飄著身穿長袍、蓄有胡須、留著長發的耶穌，頂部有一行文字：“為了一樁圣潔的事業。”Falasca-Zamponi 1997, fig. 20.

[[10]](#filepos834776) 國王和王后帶頭將金飾放在羅馬勝利紀念碑的無名烈士墳前。劇作家路易吉·皮蘭德婁（Luigi Pirandello）捐出了諾貝爾金質獎章，意大利其他文化名流也有樣學樣。Milza 2000, p. 731.

[[11]](#filepos835574) Terhoeven 2006, pp. 118–119. 為了給當天的捐獻儀式增添一些戲劇性效果，墨索里尼準備把《拉特蘭條約》簽訂當日教宗送給他的金質紀念獎章捐出來。但是當他們查驗這枚獎章時，卻發現它的材質實際上是一種廉價金屬，只是外面鍍了一層金而已。這個情報在羅馬的法西斯辦公室引發了恐慌，他們焦急地討論要不要將這一事實告訴墨索里尼。他們最后決定征求黨主席斯塔拉切的意見，而他顯然將此事告訴了領袖。Terhoeven 2006, p. 82.

[[12]](#filepos836149) 例如，都靈主教區周刊便發出警告，共濟會正同布爾什維克黨和新教徒合謀，“這一殘暴的聯盟要與意大利為敵，不僅要打倒意大利，還要打倒圣座和天主教會”。轉引自Reineri 1978, pp. 170–171。4月25日，皮扎爾多再次提醒皮尼亞蒂，“一場猶太—共濟會運動……以同樣的方式對抗天主教和法西斯”。ASMAE, AISS, b. 81, fasc. 1, sf. 1, Pignatti, “Congresso dei ‘Senza Dio’ in Praga.”

[[13]](#filepos836470) 出于和美國相同的原因（遭到國內占大多數的新教徒的反對），加拿大并未和梵蒂岡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因此也就沒有相應的教宗大使。

[[14]](#filepos837421) ASV, AESI, pos. 967, vol. 5, ff. 129r–131r, Pizzardo a Monsignor Andrea Cassulo, delegato apostolico, Ottawa, 26 dicembre 1935; ASV, AESI, pos. 967, vol. 5, ff. 132r–134r, Cassulo a Pizzardo, 11 gennaio 1936。皮扎爾多在2月1日將駐加拿大領事的報告展示給皮尼亞蒂，迫切地想要表明梵蒂岡在幕后做了多少工作，幫助墨索里尼贏得這場戰爭。他還提醒意大利大使，梵蒂岡早就給這位駐加拿大領事下達命令，要求加拿大“支持那些對我們有利的天主教徒運動”。當皮尼亞蒂向墨索里尼報告這次談話時，他急匆匆地表示，領袖可能會對另一件事情感興趣。渥太華的嘉布遣會領導人從埃塞俄比亞的同儕處收到一份報告，抱怨說他們試圖為意大利的侵略戰爭贏得支持，卻遭到“猶太人和共濟會的反意宣傳”的阻撓。DDI, series 8, vol. 3, n. 158, Pignatti a Mussolini, 1 febbraio 1936.在收到駐加拿大領事這份報告的不久后，梵蒂岡國務卿又從渥太華收到了另一份報告，指出當地又一樁針對意大利和教會的陰謀，然而其幕后人物卻令人感到驚訝。加拿大總理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從拉帕洛的某位E.龐德（E. Pound）處”收到一封信，告訴他“制裁行動的幕后人物是一個國際猶太人團體，他們想要由此引發一場歐洲大戰”。加拿大總理表示，在此之前，他從未考慮過猶太人在加拿大具有多大的影響力，但是獲取這份情報之后，他會謹慎地研究這個問題。根據這份梵蒂岡文件，他開始相信“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無論是在政府還是在公眾輿論中，猶太人都具有非常強大的影響力”。ASV, AESI, pos. 967, vol. 2, f. 396r, “Appunto,” Roma, 4 febbraio 1936.從加拿大總理的這份報告中，我們無法確知他有沒有意識到這位E.龐德就是著名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

[[15]](#filepos838299) 來自意大利駐柏林大使的報告，復本則由外交部轉發給意大利駐圣座大使館。ASMAE, APSS, b. 27, fasc. 1, 9 dicembre 1935.英國駐圣座大使也感到非常不滿。他在發給倫敦的報告中寫道：“這次的樞機任命所引發的一個后果在很多人看來都很遺憾……那便是它重新調整了教廷人員的國籍平衡，使得意大利大為受益。”他還補充道：“如果任何人還抱有殘余的希望，認為下一任教宗將會出自意大利國外，那么他的這份希望如今可以徹底打消了。”H. Montgomery, Annual Report 1935, January 9, 1936, R 217/217/22, in Hachey 1972, p. 322–323, sections 161–164.

[[16]](#filepos839212) Montgomery, Annual Report 1935, sections 161–164, 347; MAEI, vol. 267, 61–63, Charles- Roux à Flandrin, 14 mars 1936.在其談及二十名新任樞機的報告中，皮尼亞蒂也注意到威斯敏斯特大主教的缺席非常惹人眼目，并認為這是由于這位大主教對意大利戰事的批評以及對教宗的評頭論足為梵蒂岡所不喜。ASMAE, APSS, b. 25, Pignatti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esteri, “Concistoro,” telespresso n. 7748/26, 22 novembre 1935.羅馬教廷曾一度減少到只有四十九名樞機，在補充新鮮血液之后，離滿員人數七十人只差了一個人。

[[17]](#filepos839631) ACS, MCPG, b. 172, Roma, 21 novembre 1935.巴西政府派遣大使向帕切利提出抗議，表示巴西的天主教徒人數是美國的兩倍，而樞機中竟然連一個巴西人都沒有，卻有四個美國人。帕切利回答說，他不會接受政府的傳話要求，不會將其意見轉達給教宗，因為教宗“有權不容抗爭地保護他選擇樞機的權力和自由，因此不容許任何人在這一事宜上表示‘失望’或提出任何‘請求’，也不允許國家之間相互攀比”。ASV, AESS, pos. 430b, fasc.363, 6. 2/3, 3 gennaio 1936.在這一次的任命中，教宗利用龐大的人數，悄悄地將一個很久之前他就想要提拔卻又不想惹人耳目的人選塞了進去：卡恰·多米尼奧尼蒙席；早在教宗擔任米蘭大主教的時代，卡恰便是庇護的下屬，而這位助手也確確實實在他身旁服侍了十三年之久，這一次他終于戴上了樞機帽。

[[18]](#filepos840445) 然而教宗沒有告訴塔基·文圖里，萊多霍夫斯基曾勸阻教宗，讓他不要提拔這位特使。塔基·文圖里在梵蒂岡的影響力日漸增長，甚至威脅到這位耶穌會總會長，這令他十分惱火，他不能容許這位耶穌會同儕獲得如此崇高的地位。Martina 1996, pp. 103–108; 2003, pp. 271–272.

[[19]](#filepos840858)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35, Città del Vaticano, 26 novembre 1929.線人比切·普佩斯基聲稱在前一晚同卡恰談話時，直接聽到他出言抱怨。

[[20]](#filepos841156)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52, Città del Vaticano, 21 ottobre 1930.

[[21]](#filepos841668)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293, Città del Vaticano, 27 marzo 1931。卡恰將自己遭遇的坎坷怪罪到皮扎爾多頭上，認為是他向教宗揭發了自己的丑行。1931年夏天，當卡恰就公教進行會的領導事宜對皮扎爾多進行批評之后，他又遭遇了一連串的檢舉和揭發。皮扎爾多為了還擊卡恰，又抖落出一件他的陳年往事，卡恰顯然在性趣味上非常兼容并包（如果這次的揭發值得取信的話），他和城里的一位女店主育有一子。為了證實他的指控，皮扎爾多指出這個男孩的眼睛患有神經性痙攣，和卡恰一模一樣。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40, Cittàdel Vaticano, 30 agosto 1931.

[[22]](#filepos842740)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40, Roma, 12 settembre 1933.第二年，那位“梵蒂岡出名的線人”對教宗在羅馬愈發低落的聲望提出了證詞，他表示大家都認為教宗“很不近人情”，盡管教宗有時候知道某些高級教士身體有恙，卻從未表示過任何關心。ACS, MCPG, b. 158, luglio 1934.

[[23]](#filepos843108) 根據一位線人的報告，正是國務卿帕切利說服教宗提拔這位私生活混亂的蒙席。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40, Città del Vaticano, 12 agosto 1934.

[[24]](#filepos843700)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390, Milano, 15 ottobre 1934.

[[25]](#filepos844314) FRSCE, n. 350, Osborne to Halifax, June 21, 1938.

[[26]](#filepos844744) 教宗通過圣座駐意大利大使向墨索里尼提出了這個建議。皮尼亞蒂在12月28日致信墨索里尼，報告說自己最近一次去梵蒂岡國務院時，對方向他保證梵蒂岡正竭盡全力，鼓勵愛爾蘭和美國的天主教會游說民眾，為埃塞俄比亞戰爭中的意大利說好話。一位梵蒂岡官員（很有可能是皮扎爾多）表示，愛爾蘭天主教徒之所以在埃塞俄比亞戰爭中支持墨索里尼一方，是因為“英國新教徒的反戰宣傳，而他們覺得自己有必要站在相反的立場”。ASMAE, AISS, b. 56, Pignatti al ministro degli affair esteri,“Cattolici in Irlanda Stati Uniti e Canadà,”n.8048/126.

[[27]](#filepos845119) 墨索里尼還讓博爾貢吉尼告訴教宗，由于領袖破壞了共濟會的會所，并且與天主教會簽訂和平共處的條約，共濟會已經將他視作不共戴天的敵人。墨索里尼說道：“他們首先要對我進行報復打擊，然后他們才能對付教會。”但是“他們不會取得勝利”。SV, AESI, pos. 967, vol. 2, ff. 343r–346r, Borgongini, “Relazione dell’udienza avuta con S.E. Il Capo del Governo,” 3 gennaio 1936.

[[28]](#filepos845551) 《考夫林痛斥國際聯盟》，《拉丁頓每日新聞》，1935年11月25日，第1版。1935年11月中旬，美國意大利聯盟主席的一封信告知墨索里尼，考夫林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而且美國天主教徒在反對制裁行動方面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ACS, MCPR, b. 21, Casagrande di Villaviera, New York, a Dino Alfieri, 15 novembre 1935.

[[29]](#filepos845924) 喬治·賽爾迪斯（George Seldes）在1935年出版了墨索里尼傳記《紙糊的愷撒》（Sawdust Caesar ），對這位獨裁者提出了諸多批評，杰勒德·弗朗西斯·耶茨（Gerard Francis Yates）曾為這本書撰寫書評，他在結論處寫道：“無論是那些因為頭腦遲鈍的人，還是那些反感議會體制的喧囂而希望獨裁統治（法西斯抑或無產階級）能夠治愈國家病痛的人，都應該讀讀這本書。”《美國》54，n.16（January 25，1936），p. 382。

[[30]](#filepos846679) 《耶穌會新任領導人是個波蘭人》，NYT, February 12, 1915, p. 11; Pagano 2009, pp.401–402n。

[[31]](#filepos847575) Von Bülow 2007, pp. 279–280.耶穌會領導人手里掌握著非常大的權力，關于此事的另一處證據體現在如下事實：耶穌會總會長通常被稱作“黑教宗”，這一意象不僅僅指耶穌會簡樸的黑色著裝，還指兩者形象的反差（至少那些具有陰謀論傾向的人是這么想的）：一邊是圣潔的白教宗，一邊是詭計多端的黑教宗。

[[32]](#filepos848633) Muñoz 1942, pp. 5–6.

[[33]](#filepos848957) 請讀者們回憶一下，早在1922年10月，當《公教文明》主編恩里科·羅薩撰文攻擊法西斯的時候，萊多霍夫斯基就曾經向羅薩表達他的不滿。1929年夏天，在剛剛簽訂《拉特蘭條約》之后，教宗對墨索里尼非常惱火，這位耶穌會總會長便責怪羅薩，說是他為教宗的不滿情緒煽風點火。根據一位秘密警察的報告，他打發羅薩前往西班牙參加教會年會，好讓他不要待在羅馬礙事，并且讓教宗能夠平息他的怒火。ASMAE, AISS, b. 2, “Roma, 12 agosto 1929,” and “Roma, 7 agosto 1929.

[[34]](#filepos849549) 因為墨索里尼的要求而被解雇的人是耶穌會士威爾弗里德·帕森斯（Wilfrid Parsons, S.J.），他擔任這份耶穌會周刊主編已達十一年之久。他將查爾斯·考夫林視作眼中釘。接替帕森斯職務的人是耶穌會士弗朗西斯·塔爾博特（Francis Talbot, S.J.），此人既是考夫林的擁躉，又特別鼓吹法西斯。Gallagher 2012.

[[35]](#filepos850068) 萊多霍夫斯基還進一步發出警告，表示英國外交部部長安東尼·艾登受到猶太人的指使，尤其是羅斯柴爾德家族。ASMAE, AISS, b. 102. 附有皮尼亞蒂簽名的同一份報告的復本收于ASMAE, APSS, b. 30。1936年5月12日，世界天主教媒體展覽會在梵蒂岡召開；開幕式過后，皮尼亞蒂遇見了萊多霍夫斯基，后者的心情非常愉悅，因為教宗在他的演講中強調了共產主義的威脅。皮尼亞蒂在報告中寫道：“萊多霍夫斯基神父認為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的聯盟是當世之惡的源頭，并且對我們的文明造成了極大的威脅。”ASMAE, APSS, b. 33, fasc. 1, 13 maggio 1936.

[[36]](#filepos850612) De Felice 1974, p. 701.

[[37]](#filepos850922) Ventresca 2013, p. 104.

[[38]](#filepos852201) Mockler 2003, pp. 74–85.

[[39]](#filepos853012) Brendon 2000, p. 324. 2月7日，博爾貢吉尼與領袖會面時，發現他“心情不佳”，正對法國發火。是的，英國也是意大利的敵人，他說道，然而法國與他們積怨更深，因為法國曾背叛過他們。由于左翼在近期選舉中獲勝，法國的新一屆外交部“是那頭叫曼德爾（Mandel）的豬在他的共濟會會所里組建的，這家伙實際的名號是杰里波安·德·羅斯柴爾德（Jereboam de Rothschild），卻管自己叫曼德爾。他是個猶太人，把自己出賣給了英國，那也是意大利不共戴天的敵人”。領袖繼續咆哮道：“整個政府由十三名共濟會成員和三名猶太人組建。猶太共濟會——《錫安長老會紀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 ）早就記載了，‘甚至會令狗[天主教徒]墮落’——已經成功地將法國人都變成了白癡。”ASV, ANI, pos. 23, fasc. 8, 6. 4r–8r.

[[40]](#filepos853389) DDF, series 2, vol. 1, n. 447, Charles-Roux à Flandin, 17 mars 1936.

[[41]](#filepos854109) Milza 2000, pp. 726–727.最法西斯的法西斯黨人、號稱天主教會災難的羅伯托·法里納奇也達成了他的心愿，加入了意大利部署在埃塞俄比亞的空軍。他于2月抵達埃塞俄比亞，卻沒能在那里待上多久。在轟炸無力反擊的部落民眾的間隙，他跑到一個小湖邊釣魚。可是他又沒有漁具，于是他和他的戰友就決定用手榴彈炸魚。也許是在與戰友談笑的時候分了心，他手握手榴彈太久，結果它在手里爆炸了。法里納奇在幾周后回到了意大利，受到了英雄式的歡迎，換了條更順手的金屬義肢。政府則放話說，這位英勇的領導人是在一場軍事演習中受了傷。Fornari 1971, p. 161; Bottai 2001, p. 102.

[[42]](#filepos855024) Mockler 2003, pp. 133–142.

[[43]](#filepos855236) 那周晚些時候，夏爾——魯在報告中寫道，塔基·文圖里跟獨裁者是ami personnel（私交）。DDF, series 2, vol. 2, n. 185, Charles-Roux à Flandrin, 8 mai 1936.

[[44]](#filepos855753) ACS, CR, b. 68,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Roma, 6 maggio1936.

[[45]](#filepos858435) Ojetti 1939, pp. 116–120; Morgan 1941, pp. 188–191.

[[46]](#filepos859125) DDF, series 2, vol. 2, n. 287, Chambrun à Delbos, 10 juin 1936.

[[47]](#filepos859582) 《八十周歲臨近，教宗放棄所有體育鍛煉》，以及《梵蒂岡迎來多年以來最安靜的復活節》，BG, April 13, 1936, p. 2.

[[48]](#filepos859903) ASMAE, APSS, b. 31, Mussolini a Ambasciata presso la Santa Sede, Roma, telegramma in partenza, 14 maggio 1936.

[[49]](#filepos860141) ASV, AESS, pos. 430b, fasc. 363, f. 57, “Il Ministro d’Inghilterra,” 15 maggio 1936.

[[50]](#filepos860451) DDI, series 8, vol. 4, n. 78, Pignatti a Mussolini, 19 maggio 1936.皮尼亞蒂總結道：“我也會留意圣座的行動，確保（如果需要的話）它與總理的指示相一致。” DDF, series 2, vol. 2, n. 287, Chambrun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10 juin 1936.

[[51]](#filepos860625) De Felice 1974, pp. 756–757.

[[52]](#filepos861664) DDI, series 8, vol. 4, n. 40, Pignatti a Mussolini, 14 maggio 1936.

[[53]](#filepos862134) Navarra 2004, p. 86.

[[54]](#filepos862861) 轉引自De Felice 1974, p. 759。

[[55]](#filepos863673) 獨裁者也在變得愈發不容置疑。任何妨礙到他的人都會被消滅掉。領袖在1936年5月告訴一位國外記者，意大利人需要音樂和旗幟的激勵。“在聽從紀律，得到指引之前，群眾就像一群沒有組織、十分散漫的動物，”墨索里尼用起了他最喜歡的意象之一，“他們不需要知識，他們需要信仰，因為只有信仰能移動山巒……事實的真相在于，現代人向信仰臣服的傾向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轉引自De Felice 1974, p. 799。

[[56]](#filepos864025) Galeotti 2000, pp. 29–30.

## 第十八章 光榮之夢

當德國大使迭戈·馮·柏爾根（Diego von Bergen）于1936年初踏入教宗的書房時，他擔心這場會面會進行得很不愉快。對于庇護十一世來說，在新年接見各國大使是一項慣例。在分配給每個人的十分鐘里，他會送出祝福，對各國政府近期的作為提出贊揚或者譴責。結果是，柏爾根與教宗的會面比他擔心的更不愉快。

教宗不滿的事情有許多。1933年（希特勒剛剛上臺的時候），德國最大的天主教州巴伐利亞的首府慕尼黑，三分之二的學生在天主教區學校上學，可是到了1935年，這一數字已經腰斬，再過兩年，它將縮減至3%。  [[1]](#_1__Chiron_2006__p__371)

這些“所謂的對話”，柏爾根回憶道，“實際上是教宗的獨角戲，他認為別人對他毫無怨言的聆聽和畢恭畢敬的接受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教宗大聲呵斥、手舞足蹈，情緒變得越來越激動，他悲憤地控訴第三帝國迫害教會的種種行徑。柏爾根試圖插話的時候，憤怒的教宗便進一步抬高嗓音。分配給柏爾根的十分鐘早已過去，然而教宗繼續慷慨陳詞。“總有些人說天主教會注定要滅亡，”他警告這位大使，“但是最后滅亡的永遠都不是教會，而是他們。”說完這句話后，教宗按下了書桌上的電鈴，示意書房外的侍從把門打開，好讓這位大使離去。  [[2]](#_2__Zhuan_Yin_Zi_Pa_Qie_Li_De_Bi)

氣憤的柏爾根徑直來到帕切利樞機的辦公室表達自己的不滿。在他眼里，這位前任教宗駐德國大使是他的老朋友。他問道，庇護說過的這些話里，有多少應該傳達給他的上級？他指出，教宗嚴苛的話語肯定會激怒他們。帕切利建議他只在報告中點出教宗講話的主旨，不要提及那些過激的言論。

之后，柏爾根告訴德國外交部部長：“這次的事情再次證明帕切利樞機怎樣經常性地起到緩和作用，教宗這人太難對付、太難被影響，只有帕切利能夠從中調停。”他接著說，我們最好不要把教宗的氣話當真。墨索里尼和教宗有過長期的交鋒經驗，據說他曾建議：“不要為此激動。最佳的處理辦法就是隨便他，這位老紳士有什么想說的話，只管讓他說就是了。”  [[3]](#_3__DGFP__C_4b__n__482__Ambassad)

領袖跟希特勒越走越近，這一傾向令教宗十分憤怒。德國不斷壯大軍事力量，英法兩國卻完全袖手旁觀，這一點也令教宗不滿。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派遣軍隊進入了萊茵蘭（Rhineland）地區，而根據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這片處于法國、比利時和荷蘭交界處的地區應當去武裝化。德國部隊接到命令，一旦法國人出現反擊跡象就要立即撤退，但是法國人什么也沒做。教宗在接下來的那周告訴法國大使：“如果你們及時向該地區派出二十萬兵力，就對整個世界做出了重大貢獻。”  [[4]](#_4__DDF__series_2__vol__3__n__11)  然而，歐洲離戰爭更近了一步。

西班牙的政局動向也為德意雙方的合作提供了助力。1936年春天，西班牙左翼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5]](#_5__Xi_Ban_Ya_Di_Er_Gong_He_Guo)  在國會選舉中獲勝，由此引發了軍事叛變。長久以來，教會都與老派精英站在一起，如今則與那些叛變的軍官保持統一戰線，它很快就在這場叛變中成為眾矢之的。  [[6]](#_6__Zai_8Yue_Zhong_Xun_De_Ma_De)

早在五年前，當西班牙國王退位之時，這個國家就一直牽動著教宗的神經。1933年，教宗發表通諭，批評西班牙政府限制教會影響力的舉措  [[7]](#_7__Xi_Ban_Ya_Zheng_Fu_Cai_Qu_Le)  ，然而庇護實際上傾向于同政府中更為溫和的力量合作，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然而他的努力卻遭遇了兩大阻力，一方是政府中極端的反教會分子，另一方則是西班牙教會高層，后者反對向左翼分子做出任何妥協。  [[8]](#_8__Kent_1981__pp__140_141___Luo)

1936年7月爆發的內戰令西班牙人民陷入難以言說的苦難之中。七百名神父、修士和修女遇害。神父的耳朵被人割下，四處流通，仿佛它們是斗牛場上的戰利品。修女腐爛的遺骸被從墳墓里挖出來，暴尸于白日之下，其照片登上了法國的報紙。修道院變成了社會黨總部，宗教儀式遭到禁止，巴塞羅那幾乎所有教堂都被付之一炬。8月12日，帕切利樞機來到西班牙大使館提出抗議。  [[9]](#_9__Da_Shi_Sui_Ran_Cheng_Ren__Sh)

盡管西班牙叛軍領導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常被拿來同墨索里尼相比，但是領袖卻對他沒什么好感。在他看來，佛朗哥可算不上一個將軍，因為他像個懦夫一樣總是待在離前線很遠的地方。此外，西班牙軍隊的殘忍也令人瞠目結舌。墨索里尼評價道：“對他們來說，處死一千個人就好比吃一盤通心粉那樣稀松平常。”  [[10]](#_10__ASV__AESE__pos__889__fasc)

然而墨索里尼還是很快就同納粹黨人協商該以怎樣的方式幫助叛軍，不過他這么做的動機，與其說是因為同佛朗哥有著意識形態上的兄弟情義，倒不如說是為了限制法國左翼政府的國際影響力。10月，蘇俄的飛機、坦克和其他補給品開始陸續抵達，幫助西班牙政府渡過難關。意大利天主教媒體力勸墨索里尼派兵支援叛軍。  [[11]](#_11__De_Felice_1981__pp__358_389)  年底，他派遣了數千名黑衫民兵和軍人援助佛朗哥。  [[12]](#_12__De_Felice_1981__pp__390_391)

對于這場內戰，教宗不像墨索里尼那樣熱切關注。盡管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天主教暴行的見聞令他感到恐懼，然而他不愿支持與民選政府作對的叛軍。他也不愿意看到墨索里尼卷入這場內戰，因為它只會進一步將他推向希特勒的懷抱。  [[13]](#_13__10Yue__Ju_Sang_Er_You_Pi_Be)

\* \* \* \* \*

當教宗收到西班牙內戰的初步報告時，也從德國收到了一些令他不安的情報：納粹黨人計劃將數百名德國修士和修女送上法庭，罪名是性變態。在接下來的那一年里，這些引起公眾高度注意的審訊案件將會登上德國媒體的頭版頭條。一則頭條新聞宣稱《那些玷污青年的家伙身穿教士服》，另一則聲稱《修道院里窩藏沒有底線的墮落行為》。神父被指控的罪名有引誘由他們負責看管的兒童且與他們發生性行為，以及誘奸柔弱的女青年。更糟糕的是，德國當局舊事重提，再次指控耶穌會士，認為他們非法向海外轉移資金。  [[14]](#_14__Micheler_2005__pp__113_114)

壞消息不斷，教宗又聽聞墨索里尼將他的女婿加萊亞佐·齊亞諾派往柏林，就加強兩國關系與對方展開談話。齊亞諾在政府中節節高升，1935年（時年三十二歲）便升任媒體和宣傳部部長。次年，墨索里尼將齊亞諾任命為威望僅次于總理的外交部部長，震動了整個外交界。齊亞諾也漸漸（即便是無意識地）學會了岳父的習慣動作，然而他尖銳的鼻音卻無法重現領袖雄渾、斷斷續續的演講方式。羅馬人戲謔地將他稱作“小領袖”（“il Ducellino”）或是“女婿大元帥”[“generissimo”，這是一個由女婿（genero）和大元帥（generalissimo，意大利最高軍階）拼湊出來的詞]。一位美國外交官譏諷道：“女婿也跟著雞犬升天了。”齊亞諾畏懼權威、難當大局，還喜歡別人拍他馬屁，簡直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間。  [[15]](#_15__Ge_Lan_Di__1985__pp__410_41)  那年10月，也即西班牙內戰爆發三個月后，齊亞諾與第三帝國簽署了一項秘密合作協議，羅馬—柏林“軸心國”由此誕生。  [[16]](#_16__Rauscher_2004__p__220)

與此同時，新任美國駐意大利大使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抵達羅馬。在雙方初次會面中，齊亞諾給他留下了一個好印象——他和藹可親、笑口常開，并且英語極為流暢。然而菲利普斯很快就開始對年輕的意大利外交部部長產生疑慮。他寫道：“盡管他有點胖乎乎的，但整體外形特別小孩子氣。”  [[17]](#_17__Hou_Lai__Mei_Guo_Ji_Zhe_Tuo)  中等身材的齊亞諾有一張圓臉，留著“一頭光亮的黑發”，梳成“典型的意大利式”背頭。他毫不掩蓋自己的野心，卻“不具備任何道德標準和政治準則”。身為領袖的女婿，法西斯黨中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角色，齊亞諾對自己的地位頗為醉心。然而其他法西斯領導人都厭惡他，嫉恨他毫無功勞就高升，嫉恨他享受甜蜜生活和榮華富貴。令他們尤為憤怒的是，墨索里尼完全沒有征求他們的意見，就將他選作自己的政治接班人。  [[18]](#_18__Milza_2000__p__737_Ran_Er_F)

菲利普斯大使對墨索里尼有著與他人截然不同的印象。當他首次與領袖會面，進入那座“巨大、空曠、地面光潔的大廳”時，他看到遠方的桌旁坐著一位人物。“一位身材短小精壯、孔武有力的男人走上前來接見了我，”他回憶道，“徹底的禿頂似乎讓他的腦袋顯得更加龐大。”最令大使印象深刻的是領袖的雙眼，每當他表達看法時，這雙眼睛“仿佛會突然放大，眼白則凸出來”。他們用英語交談，墨索里尼近來的語言課程令他大有長進。菲利普斯后來還記錄道，當領袖身穿法西斯制服時，更像是一位發號施令的人物，可是在個別其他場合，當大使看到身著便裝的墨索里尼時，他覺得領袖更像是一位“壯實的農民”或“一位粗魯的顧客”。  [[19]](#_19__Phillips_1952__pp__189_191)

墨索里尼麾下的駐西班牙大使羅伯托·坎塔盧波（Roberto Cantalupo）于多月之后再次面見領袖，見到的是一位自埃塞俄比亞勝利后徹底改變了的人。他的身形顯得更為魁梧，脖頸更為粗壯，面龐也更為寬大；他的皮膚因為夏日海灘上的炙烤而泛著鮮紅色。齊亞諾站在他的身邊，他的每一句話都顯得不那么真切，仿佛是講給一群更為龐大的聽眾聽的。盡管坎塔盧波已和領袖相識多年，如今他卻顯得無比遙遠。在頗為尷尬的幾分鐘之后，坎塔盧波告退了，然而在他離開威尼斯宮前，齊亞諾追了上來。

“你覺得他現在如何？”齊亞諾問道。

“過去的他已經不在了，我覺得他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坎塔盧波回答道。

齊亞諾笑了笑。“你知道的，他品嘗了至高的榮耀，如今高高在上的他，眼里的我們都很渺小。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許我們最好就這么讓他待在奧林波斯山  [[20]](#_20__Zai_Xi_La_Shen_Hua_Zhong__A)  上，他在那里能夠成就偉業。至于我們這些人……我們會打理好底下世界的事務。”  [[21]](#_21__Zhuan_Yin_Zi_De_Felice_1981)

墨索里尼的一大心腹、法西斯黨領導人朱塞佩·博塔伊  [[22]](#_22__Yuan_Shu_Zai_Zhe_Li_Jiang_B)  從埃塞俄比亞凱旋之后也有類似的體會。“站在我面前的仿佛不再是個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尊雕像，”他在日記里寫道，“一尊堅若磐石的雕像，里面傳出冰冷的聲音。”  [[23]](#_23__Bottai_2001__pp__109_110)

當領袖最年幼的孩子，七歲的安娜·瑪麗亞感染脊髓灰質炎時，他曾因這份意外的打擊而短暫地失去他一貫的鎮靜。她在生與死的邊緣掙扎著，墨索里尼只能束手無策地守護在一旁。最終她病情好轉，但是后遺癥伴隨了她的余生。在她生病期間的一場媒體發布會上，當一位外國記者將一個送給她的娃娃交給墨索里尼時，他那出了名的假面一般的臉龐滾下了熱淚。  [[24]](#_24__Baratter_2008)

但是女兒的疾病完全沒有讓他變得軟弱。他鮮少采納他人的建議。接見部長和官員時，他堅持讓下屬快步走過巨大的辦公室，來到他的辦公桌前，行羅馬式直臂軍禮，然后將他要求的文件呈遞給他。他們不得擅自提出任何意見，并在回答領袖的提問之后須再次行軍禮、轉身、快步離去。  [[25]](#_25__Zhu_Sai_Pei__Ba_Si_Di_Ya_Ni)  如果沒惹得他發火就能告退，那算他們運氣不錯。在墨索里尼辦公室外等候的助理納瓦拉對領袖雷霆般的呵斥聲已經司空見慣。他生氣的時候會用拳頭砸桌子，雙腿猶如痙攣一般屈伸，腳后跟則在桌子底下的擱腳凳上刮擦。納瓦拉寫道，沒過多久，那個擱腳凳就徹底磨壞了。  [[26]](#_26__Navarra_2004__pp__64_65__97)

在墨索里尼看來，只要他下定決心，就沒有辦不成的事情。  [[27]](#_27__Zai_Yi_Da_Li__Dui_Ling_Xiu)  只要國人聽從他的命令，意大利就能夠成為世上最偉大的國家。盡管他做著光榮與凱旋之夢，但他也擔心意大利人天性孱弱，無法勝任他的軍事謀劃。在12月的法西斯大議會上，他略帶沉思地說道，總有一天他將不得不“把軍隊開進那不勒斯，將所有的吉他手、曼陀林琴師、小提琴師和街頭手風琴師都掃蕩干凈”。  [[28]](#_28__Bottai_2001__p__115__De_Fel)

墨索里尼愈發將日常事務交給下屬處理，不僅僅是因為他有更重大的事務需要處理，還因為他有了一位新情婦。他們于1936年墜入情網時，克拉拉·佩塔奇才二十四歲，而墨索里尼已經五十三歲了。她的家人住在一間寬敞的公寓中，離墨索里尼的托洛尼亞別墅不遠。她的父親是梵蒂岡的一位外科醫生，為各色蒙席、官員和教宗衛兵診療疾病。不到兩年前，她曾有一段婚姻，婚禮上有許多梵蒂岡要員現身，并且由加斯帕里樞機親自主持，然而這段婚姻卻沒能維系多久。

克拉拉是一位體態豐滿、富有生氣的女子，她有一雙綠色的眼眸，留著一頭卷發（為此她不得不每晚夾幾十個卷發夾子睡覺），牙齒細小，低沉的嗓音予人溫暖的感受。她指望著領袖的呼喚過活，每天下午被召至威尼斯宮幽會。為了盡量避免閑言碎語，她會搭乘出租車來到事先約定好的地點，一位駕駛偏三輪摩托車的警察會在那里等候，而她則迅速地跳進遮蔽嚴實的側車里。來到威尼斯宮門口，深受墨索里尼信任的助理昆托·納瓦拉會在那里接待她，將她護送到領袖專門為她預留的公寓里。進到公寓后，她便躺在黃道十二宮（這個房間因繪有金色圖案的天藍色穹頂而得名）的沙發上。在等待領袖的這段時間里（領袖通常在下午6點現身），她有許多打發時間的辦法：閱讀，聽唱片，給自己的衣服做設計，用日記把一本本筆記本填滿，用含情脈脈的細節講述她與偉人的每一次相遇。  [[29]](#_29__Jin_1938Nian__Ta_Jiu_Xie_Ma)  她的衣櫥里掛著十幾件色彩亮麗、飾邊繁復的連衣裙以及各色華麗的帽子。為她送茶水的納瓦拉偶爾也會過來陪她聊會兒天。  [[30]](#_30__Milza_2000__p__528__Monelli)



克拉拉·佩塔奇

盡管墨索里尼的情婦名單有一長串，克拉拉·佩塔奇對他而言卻是一種全新的經驗。其中的緣由不在于之前的情婦同他年齡相近，也同她們或驚艷或平庸的容貌無關，而是因為他在情感上對佩塔奇有著不同尋常的依賴。這倒不是說墨索里尼認為佩塔奇能同他平起平坐（領袖從未對她的觀點表現出哪怕一點點興趣），而她付梓出版的幾百頁日記里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除了她對領袖的熱愛以外，墨索里尼何時曾在乎過她的意見。但是他發現，自己的生活已經不能沒有這位迷人的年輕女郎，他既離不開她寵溺的熱愛，也離不開她方便他隨時泄欲的身體。當衰老的恐懼在他心頭肆虐時，佩塔奇令他重獲年輕的感受；此外，在女兒與死神擦身而過之后，以及在經歷過埃塞俄比亞戰爭的孤立無援后，她也幫助墨索里尼從重壓之下解脫出來，不用時刻扮演意大利超人的角色。  [[31]](#_31__Ci_Chu_De_Bu_Fen_Guan_Dian)

\* \* \* \* \*

《紐約時報》1936年10月1日的頭版上刊登了一條令人意外的消息：歐金尼奧·帕切利將于次日從那不勒斯出發前往紐約，對美國進行一次長期的訪問。在此之前，從未有哪位在梵蒂岡位高權重到如此地步的人訪問過美國。  [[32]](#_32__Mei_Guo_Jiao_Hui_De_Zhong_Y)  各種推測傳遍了全世界各國的首都，人們都好奇教宗為什么要派遣國務卿訪問美國。盡管梵蒂岡聲稱這場訪問純粹是“私人性質的”，但是沒有人把這番說辭當真。

大家的注意力都落在了電臺神父查爾斯·考夫林身上。1936年，正值富蘭克林·羅斯福為連任總統而參加競選的年份，考夫林對羅斯福的批評愈發尖酸刻薄，使得美國天主教群體產生了分歧，令梵蒂岡頗為難堪。《紐約時報》猜測，帕切利此次出人意料地訪問美國，是因為教宗試圖向羅斯福總統表明，自己同考夫林的言語攻擊沒有任何瓜葛。其他報紙則預測，帕切利會給這家尖酸刻薄的電臺畫上一個句號。至于羅馬方面，意大利駐圣座大使則對此次出訪另有解釋：帕切利是出門活動，想要以后接替庇護十一世的位置，他想通過此行贏得四位美國樞機的支持。  [[33]](#_33__A_Na_Er_Duo__Ke_Te_Xi____Ji)

負責此次訪問的是波士頓主教斯佩爾曼。兩人將旅行八千英里，中途停靠無數站點，從美國的一頭飛到另一頭去。帕切利被幾所天主教大學授予名譽學位，幾乎同美國的所有主教會面，并在從波士頓到加利福尼亞的一路上向大批神父和信徒發表演說。  [[34]](#_34__Shou_Yu_Pa_Qie_Li_Ming_Yu_X)

這次訪問的消息一經公布，各家媒體紛紛猜測樞機是否會和美國總統會面。考夫林神父通過名下的電臺節目警醒梵蒂岡國務卿，不要舉行這樣的會面，因為它將暗示梵蒂岡支持羅斯福總統連任。  [[35]](#_35__Kao_Fu_Lin_De_Zheng_Dang__Q)  節目播出之后，他的聽眾用義憤填膺的信件淹沒了華盛頓的宗座代表，用自己的話語對他提出警告。（由于梵蒂岡并未同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所以駐扎美國首都的并不是一位教宗大使，而是一位宗座代表。  [[36]](#_36__9Yue__Kao_Fu_Lin_Hu_Xu_Yong)  ）迫于這種輿論壓力，帕切利直到大選兩天之后，才同羅斯福會面。



帕切利樞機訪問紐約期間，1936年10月

他們的會面地點定在羅斯福位于紐約海德公園  [[37]](#_37__Ying_Guo_Zhu_Ming_De_Hai_De)  的宅邸。雙方會談的唯一記錄來自羅斯福多年之后出版的回憶錄。羅斯福表示，帕切利給自己留下的印象中，最為深刻的莫過于他非常強調美國面臨著共產主義的威脅。總統認為，他的口徑和考夫林神父非常相似。這位樞機不斷地重復道，“美國面前最嚴峻的危機在于它即將走上共產主義道路”。羅斯福反駁說，美國真正的危機在于法西斯意識形態的侵襲。

“總統先生，”帕切利樞機回答道，“您根本就不了解共產主義運動有多么可怕，它是我們應當面對的當務之急。”

“可是你根本就不了解美國民眾。”羅斯福總統回話道。  [[38]](#_38__Yue_Se_Fu__Ken_Ni_Di__Josep)

兩天后，帕切利在紐約港登上了“薩伏依伯爵號”遠洋輪船，返回家鄉。  [[39]](#_39__Gannon_1962__pp__106_116__F)

\* \* \* \* \*

10月的一個夜晚，帕切利樞機還遠在美國，教宗在房間里暈倒，摔倒時腦袋撞在了木質床柱上。這一事故預示了教宗堪憂的健康狀況。11月，教宗已經不再像過去那樣精力充沛，他接見公眾時，得靠幾位侍從用椅子把他抬出來。12月初，他的心臟顯現出虛弱的危急跡象，七十九歲的教宗只能夠臥床休息。  [[40]](#_40__ASMAE__APSS__b__36__Ciano_a)

教宗的靜脈曲張給他帶來嚴重的疼痛，他的侍從每天花一個小時幫他按摩雙腿也只能稍稍緩解疼痛的癥狀。他大部分時間都躺在床上，而醫生則每天過來探訪四次。  [[41]](#_41__Baudrillart_1996__p__364__6)  到了夜里，身體不適令他難以入睡，兩位來自米蘭的教宗副手便輪流陪侍在床邊。到現在，只有同帕切利樞機的例行會面還照常進行，國務卿來到教宗床前，向他報告每天發生的事情。  [[42]](#_42__Ta_Er_Di_Ni_Zai_Pa_Qie_Li_D)

教宗的病痛如此深重，帕切利要強行忍耐，才不至于在他面前抹淚。庇護常常逼迫醫生，要求他告訴自己病情要多久才能好轉。“我不希望你隱瞞真相。”他告訴那位緊張得說不出話的醫生，后者結結巴巴地表示自己也不能確定。教宗每天早上喝點牛奶，下午則一邊收聽古典音樂，一邊喝點清湯。隨著圣誕節的臨近，他堅持依據傳統，要在床頭為所有樞機降福。與此同時，他們也開始謹慎地討論繼任人選。自某個時間點后，教宗不再詢問自己是否能恢復健康，他只希望天主能夠允許他有尊嚴地死去。  [[43]](#_43__Wei_Ni_Ni__2004__pp__182_18)

為了解釋教宗的臥床不起，梵蒂岡給出過許多遮遮掩掩的故事版本，可是當新年到來，教宗依然沒有現身，關于他健康狀況堪憂的傳聞便再也揮之不去了。1937年1月初，《羅馬觀察報》的報道指出教宗罹患動脈硬化，血液循環不暢。據這份梵蒂岡報紙所言，教宗仍有康復的希望，但考慮到這一疾病的性質以及教宗的年紀，我們需要對此“特別謹慎”。  [[44]](#_44__CC_1937_I__pp__182_183__OR)

教宗的精氣神也越來越差。每天夜里，他的秘書會在他的要求下為他朗讀歷任教宗臨終時日的歷史記述。“是時候要回家了，”他疲憊地說道，“我們該收拾行囊了。”  [[45]](#_45__Confalonieri_1957__pp__349)  休息的時候，他便看著床對面的繪畫。畫里的人物是安德烈亞·阿韋利諾（Andrea Avellino），他是善終的守護圣徒。年高體虛、疼痛不堪的庇護對自己的無助非常惱火。過去，這位曾經強壯、自信、苛刻的教宗總是讓身邊人充滿畏懼，如今他迅速地消沉下去。然而正如庇護十一世曾經說過的，天主的安排總是奇怪而神秘。對教宗而言，最艱苦卓絕的戰役還沒有到來。

[[1]](#filepos890918) Chiron 2006, p. 371.

[[2]](#filepos891825) 轉引自帕切利的筆記，ASV, AESS, pos. 430a, fasc. 352, f. 81, 30 dicembre1935。關于電鈴，參見Charles-Roux 1947, p. 13。

[[3]](#filepos892870) DGFP, C 4b, n. 482, Ambassador Bergen to Foreign Minister Neurath, Rome, January 4, 1936.由于帕切利尤其不想惹怒希特勒，所以他總是很熱心地幫德國大使解決問題。至于其他人，他偶爾也會發火。1935年，荷蘭國家社會主義黨主席安東·米塞特（Anton Mussert）前來與帕切利會面；為了向梵蒂岡國務卿示好，他告訴帕切利有兩大力量在有效地阻止布爾什維克黨向歐洲進軍：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帕切利毫不客氣地予以反駁，他簡單粗暴地表示墨索里尼確實如此，然而他對希特勒卻不抱有類似的好感。后來，當帕切利重述這次談話時，他非常激動，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出來。DDI, series 8, vol. 4, n. 316, Pignatti a Ciano, 19 giugno 1936.

[[4]](#filepos893650) DDF, series 2, vol. 3, n. 114,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9 août 1936.

[[5]](#filepos893969) 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時期的一個左翼政治聯盟，具有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組織的性質。

[[6]](#filepos894299) 在8月中旬的馬德里，那些還沒有遭到洗劫或燒毀的教堂都被“紅軍”占領了。Canosa 2009, pp. 63–69.

[[7]](#filepos894626) 西班牙政府采取了諸多舉措，包括頒布新的法律對教會財產進行控制，將耶穌會士驅逐出境，并禁止宗教團體涉足公立教育領域。

[[8]](#filepos895022) Kent 1981, pp. 140–141.《羅馬觀察報》刊登過許多文章，對西班牙反教會運動的諸多方面表示悲嘆。

[[9]](#filepos895665) 大使雖然承認“事態有些失控”，但是他辯稱在很多情況下，反叛軍都藏身教堂和修道院內，而軍事叛變使得政府別無選擇，只能給平民提供用于自衛的武裝，由此造成了一些令樞機感到悲哀的局面。ASV, AESS, pos. 340b, fasc. 363, f. 102, appunti di Pacelli,12 agosto 1936. 另參見Brendon 2000, pp. 374–375。幾天后，帕切利從教宗駐馬德里大使處收到一份報告。所有教堂都停止運轉了，共和黨部隊占領了大主教的大本營（神學院）以及所有天主教報刊媒體。大主教已經躲到無人知曉的藏匿處，而神父也紛紛到親戚朋友家避難，他們不得不常常搬家，避免“落到紅軍的手里”。許多神父都被當作人民公敵而遭到屠戮。其他人則鋃鐺入獄。著名的耶穌圣心碑已然遭到玷污和破壞。還有一些私人住宅在秘密地舉行彌撒儀式，但是他們這么做冒著極大的風險。ASV, AESE, pos. 889, fasc. 263, ff. 30r–32r, Silvio Sericano, Madrid, 20 agosto 1936.

[[10]](#filepos896252) ASV, AESE, pos. 889, fasc. 264, ff. 74r–76r, Borgongini a Pacelli, 28 novembre 1936.

[[11]](#filepos896824) De Felice 1981, pp. 358–389.

[[12]](#filepos897008) De Felice 1981, pp. 390–391.

[[13]](#filepos897467) 10月，沮喪而又疲憊的教宗告訴夏爾——魯，墨索里尼在與英法兩國的戰爭邊緣游戲（譯注：通過將危險事件推向武裝沖突的邊緣而贏得戰略優勢的行為）中威脅要將意大利的命運和德國綁在一起，他認為這是在玩火自焚。MAESS, 38, 28–34,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2 octobre 1936.

[[14]](#filepos898378) Micheler 2005, pp. 113–114.憤怒的帕切利告訴意大利大使，如果耶穌會士因此走上法庭，將會在教會產生巨大反響，由此“撼動整個德國”。DDI, series 8, vol. 4, n. 613, Pignatti a Ciano, 24 luglio 1936.教宗希望墨索里尼能代表耶穌會介入調停。帕切利樞機剛剛同皮尼亞蒂會面，第二天又將他喊來，讓他傳達自己剛剛從教宗處得到的指示：墨索里尼切不可提到自己是受教宗所托。DDI, series 8, vol. 4, n. 636, Pignatti a Ciano, 27 luglio 1936.之后的那個月，意大利駐柏林大使在羅馬的指示下代表奧地利修女以及耶穌會士提出申訴，帕切利對此表示感謝。DDI, series 8, vol. 5, n. 150,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Cassinis, a Ciano, 2 ottobre 1936.

[[15]](#filepos899454) 格蘭迪（1985, pp. 410–411）寫道：齊亞諾“在德國人手里就是個可以隨便使喚的工具”。參見Innocenti 1992, pp. 14–16; Moseley 1999, pp. 4–9; Morgan 1941, p. 265; De Felice 1974, p. 804; Brendon 2000, p. 559。格蘭迪的評語要謹慎對待，畢竟他認為齊亞諾取代自己成了墨索里尼眼中的紅人。關于兩人之間的沖突，參見倫佐·德·費利切為齊亞諾（2002, p. xiv）日記撰寫的前言。

[[16]](#filepos899730) Rauscher 2004, p. 220.

[[17]](#filepos900279) 后來，美國記者托馬斯·摩根（1941, p. 265）對齊亞諾有過一番描述：“當他開始變胖的時候（這可是個危險的預兆，因為他父母的體重都相當可觀），他采用了領袖只吃魚禽和水果的飲食方案。”

[[18]](#filepos900961) Milza 2000, p. 737.然而菲利普斯（1952, p. 188）觀察到，齊亞諾實在難以服眾，因為“想讓他保持幾分鐘的注意力都非常困難”，他的眼睛時刻都在注意周圍有沒有美女。意大利駐德國大使的妻子伊麗莎白·翟錄第（Elisabetta Cerruti）對此有一番精彩的描述：“盡管他并不好看，就他的年齡來說太過肥胖，氣色也不健康，他卻有某種未經雕琢的英氣，認為女士對他全無抵抗之力……即便是最漂亮的女人都要公然追求他，互相爭風吃醋，只為他的一個笑顏。此類場景實在令人不忍直視。”轉引自Moseley 1999, p. 30。

[[19]](#filepos901963) Phillips 1952, pp. 189–191.

[[20]](#filepos903230) 在希臘神話中，奧林波斯山是眾神的居所。

[[21]](#filepos903456) 轉引自De Felice 1981, p. 273。

[[22]](#filepos903674) 原書在這里將博塔伊的名字誤寫為喬瓦尼（Giovanni）。

[[23]](#filepos904014) Bottai 2001, pp. 109–110.

[[24]](#filepos904640) Baratter 2008.

[[25]](#filepos905165) 朱塞佩·巴斯蒂亞尼尼（Giuseppe Bastianini）對這番儀式的生動描述轉引自De Felice 1981, p. 283。

[[26]](#filepos905643) Navarra 2004, pp. 64–65, 97.

[[27]](#filepos905868) 在意大利，對領袖的信仰開始同對耶穌基督的信仰形成抗衡的態勢。例如，阿斯科利皮切諾的法西斯政府在其雜志《戰吼》（Eja ，1936年8月22日）中建議：“永遠要心懷信仰。心懷你奉獻給墨索里尼的信仰，因為這份信仰非常神圣……經過領袖確認的均為真理。任何人不得妄議領袖的話語……在每天早上向天主念誦‘信經’之后，我們也要向墨索里尼念誦‘信經’。”轉引自Gentile 1993, p. 127。

[[28]](#filepos906399) Bottai 2001, p. 115; De Felice 1981, p. 267.

[[29]](#filepos908237) 僅1938年，她就寫滿了1 810頁活頁紙。她和墨索里尼通電話的記述非常詳細，故而當意大利國家檔案局的監察長審視這些文件時，他懷疑她曾經給電話安裝過錄音設備。Petacci 2010, p. 5; Festorazzi 2012, p. 308.

[[30]](#filepos908517) Milza 2000, p. 528; Monelli 1953, pp. 153–156; Petacci 2011, p. 423.

[[31]](#filepos909897) 此處的部分觀點最早見于德·費利切的著作（1981, p. 277）。

[[32]](#filepos910406) 美國教會的重要性越來越大，但是羅馬依然需要一些時間來適應這種變化，因為長久以來，圣座都將美國看作是一潭死水。幾十年前，美國教會同梵蒂岡的事務還不像那些歐洲國家一樣由國務院負責處理，而是由傳信部管轄，這個圣部下轄的區域主要是亞洲和非洲，教會在這些偏遠地區肩負著傳教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在當地扎根立足。然而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已經確立了自身的地位，它不僅是羅馬天主教的一個重要且繁榮的中心，同時還是圣座最大的經濟來源。Pollard 2012.

[[33]](#filepos911509) 阿納爾多·科特西，《教宗國務卿來訪；意圖如何在羅馬引起猜測》，NYT, October 1, 1936, p. 1；科特西，《據稱帕切利出于反共目的向美國尋求援助》，NYT, October 2, 1936, p. 1。關于此次訪問的動機有許多傳聞，而意大利駐華盛頓大使館將這些傳聞都報告給齊亞諾，提及連梵蒂岡宗座代表也非常吃驚、困惑，對此次訪問有些警覺。DDI, series 8, vol. 5, n. 151, L’Incaricato d’affari a Washington, Rossi Longhi, al ministro degli esteri, Ciano, 3 ottobre 1936；以及DDI, series 8, vol. 5, n. 160, Rossi Longhi a Ciano, 6 ottobre 1936。皮尼亞蒂推測帕切利有當教宗的野心，關于這方面的信息參見DDI, series 8, vol. 5, n. 170, Pignatti a Ciano, 7 ottobre 1936。1934年11月，帕切利曾代表教宗出席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國際圣體大會，他在那里吸引了大批民眾。回來的路上，他停靠巴西，用葡萄牙語在巴西國會和最高法院發表了演說。Blet 1996, p. 202.

[[34]](#filepos911986) 授予帕切利名譽學位的學校包括：喬治城大學（《帕切利推進世界和平，為多人祝福》，WP, October 23, 1936, p. 1），福坦莫大學，以及圣母大學（《教宗助手獲圣母大學名譽學位》，NYT, October 26, 1936, p. 18）。

[[35]](#filepos912388) 考夫林的政黨（全國社會正義聯盟）就有一名與羅斯福（這位神父則稱呼他為“富蘭克林·叛徒·羅斯福”）競選的候選人。Fogarty 2012, p. 110.

[[36]](#filepos912779) 9月，考夫林呼吁用“子彈”對付總統（后來遭遇輿論壓力，他為此道歉），并進而表示羅斯福是個親共的“獨裁者”。達萊西奧（2012, pp. 133–134）引用了兩封由奇科尼亞尼（Cicognani）寫給帕切利的信件，分別寫于10月9日和10日。

[[37]](#filepos913318) 英國著名的海德公園是皇家花園，而紐約的海德公園則是一個城鎮，也是羅斯福的出生地。

[[38]](#filepos914199) 約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一位天主教商業大亨，以及未來總統的父親）幫忙安排了這次會面。帕切利對共產主義威脅的憂慮很有可能因為他對西班牙內戰的關注而變得愈發強烈。羅斯福在海德公園的一場晚宴上向弗洛倫斯·克爾（Florence Kerr）講述了這次會面，轉引自Gallagher 2008, pp. 87–88。

[[39]](#filepos914442) Gannon 1962, pp. 106–116; Fogarty 2012, p. 115; and D’Alessio 2012, pp. 131–135均審視了帕切利的這趟美國之旅。帕斯科利娜修女曾在兩年前陪伴帕切利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這次她則陪他去了美國。然而出于禮節問題的考量，她此行乘坐了另一艘船，并且沒有在人前露面。Schad 2008, pp. 81–87.

[[40]](#filepos915062) ASMAE, APSS, b. 36, Ciano al ministero dell’interno, telespresso n. 691938, 7 dicembre 1936; Falconi 1967, p. 226; Confalonieri 1957, pp. 334–338.

[[41]](#filepos915425) Baudrillart 1996, p. 364 (6 décembre 1936).教宗的老朋友阿戈斯蒂諾·杰梅利親自給教宗做過心電圖后，便常常來探望他。Venini 2004, p. 201.據拉扎里尼（1937, pp. 142–143）記載，并沒有人從杰梅利神父口中聽聞，教宗對食物有任何怨言。但是杰梅利曾用米蘭方言問過教宗，是否需要他為教宗做一頓飯，教宗的雙眼里立即有了神采。據說杰梅利不僅是一位出色的醫生，還是一位妙手廚師。他在附近找了一間廚房，回來時手里端著一盤放了藏紅花，并且嚼勁十足的米蘭風味意大利燴飯。教宗一邊愉快地吃下這盤燴飯，一邊說道：“還是家鄉的菜肴最為可口。”

[[42]](#filepos915783) 塔爾迪尼在帕切利的教宗會面記錄頁邊寫下了這些病床前公事的情況。ASV, AESS, b. 560, fasc. 592, f. 16r, 9 dicembre 1937.

[[43]](#filepos916596) 韋尼尼（2004, pp. 182–187）和博德里亞（1996, pp. 364, 371, 378–379）都曾在日記中寫過這些事情。

[[44]](#filepos917207) CC 1937 I, pp. 182–183; OR, 4–5 gennaio 1937.英國大使記錄了梵蒂岡發布的所有早期健康狀況報告：D. G. Osborne, Annual Report 1936, January 1, 1937, R 57/57/22, in Hachey 1972, p. 365, section 101。

[[45]](#filepos917576) Confalonieri 1957, pp. 349–350.

# 第三部分 墨索里尼、希特勒與猶太人

## 第十九章 討伐希特勒

沒人料到，教宗選舉會議其實還離得很遠。各位樞機在暗中較量。美國記者花費大量金錢在梵蒂岡尋找眼線，想要第一時間獲取教宗的死訊。  [[1]](#_1__ACS__MCPG__b__172__ff__57_59)

墨索里尼的大使博尼法喬·皮尼亞蒂對各類幕后最新情況十分熟稔。他在報告里寫道，意大利的“教會高層與神職人員對領袖具有不容置疑的絕對信仰”，庇護十一世的繼任者“除非是個瘋子”，否則絕不會破壞教會與法西斯政府之間的良好關系。但在意大利國外，形勢就有所不同，他提醒道：第三帝國對天主教神職人員的“不道德審判”，令全世界的樞機都聯合起來反對納粹。此外，納粹還攻擊天主教區學校，近來關閉了幾家天主教日報社，這些行徑都令教會人士感到不滿。此外，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和對日耳曼血統的推崇，以及犧牲天主教青年團體來發展希特勒青年團，也讓雙方的關系越來越差。皮尼亞蒂擔心，樞機對希特勒懷有的敵意會影響他們對墨索里尼的態度。即便意大利籍樞機希望新任教宗能夠繼續支持梵蒂岡和墨索里尼的盟友關系，但那些非意大利籍樞機也許會嘗試推選一位疏遠法西斯黨的教宗。  [[2]](#_2__Yong_Pi_Ni_Ya_Di_De_Hua_Lai)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教宗開始從病痛中恢復過來。那些準備好行囊打算奔赴羅馬的樞機，如今只好把行囊都解開。盡管庇護再也享受不到健康的體魄，但他漸漸恢復到能夠承擔最重要的職責，能夠同教廷的各位負責人見面，并最后又得以接見公眾，盡管頻率已經較以往降低了許多。1937年3月下旬，博德里亞樞機幾個月來第一次見到教宗，他觀察到，教宗“在我看來變化很大，瘦了很多，面龐上更多皺紋，也顯得更為憔悴。他臉上的表情要比過去柔和”。

復活節那天，教宗突然回歸公眾的視野，他高坐在教宗御座上，侍從包圍在他身邊，列隊蜿蜒穿過人頭攢動的圣彼得大教堂。他面色虛弱、蒼白。許多人原以為再也見不到他，因此喜極而泣。當教宗穿過宛如巨大洞穴的大教堂時，他的雙眼也濕潤了。舉行過彌撒之后，侍從將他抬到外面的陽臺上，他看著圣彼得廣場上的人群，他們都在等候他的降福。博德里亞回憶道：“當這個時刻到來，教宗的聲音依然堅定、清澈。這個世界，這個悲傷的世界得到了祝福！”  [[3]](#_3__Zheng_Ru_Wang_Nian_Zai_Sheng)

幾天后，病愈的教宗第一次進入書房，他的雙眼禁不住又要流出熱淚。有好幾個難眠的夜晚，他都懷疑自己能否再次見到這個房間。在接下來的幾周里，他雙腿的疼痛將被橡皮襪和定期按摩部分緩解，教宗開始乘坐有兩根支柱的教宗御座，趕赴接見公眾的場合。至于在公寓里，他則使用輪椅。每當有短暫且寶貴的機會來到花園中，他會拄著拐杖一步一停地散步。現在，他每天的第一場會面安排在上午10點，接著在午餐后打一個長長的盹。每到周一，他會整天臥床休息，到了晚上，則用電臺音樂放松自己。  [[4]](#_4__Confalonieri_1957__pp__367_3)

\* \* \* \* \*

梵蒂岡與希特勒的關系幾乎每況愈下。對德國神父的審判其實早已注定了結局，它們引發的媒體報道聳人聽聞，而天主教學校里的學生數量也已經瀕臨消失的臨界值。然而梵蒂岡與墨索里尼的盟友關系依然牢固。在亞的斯亞貝巴被意大利部隊長驅直入后的幾個月里，意大利人的愛國自豪感無比膨脹。“墨索里尼的笑容猶如太陽神的閃現，”一位阿諛奉承的意大利記者寫道，“人們期待它、渴求它，是因為它帶來安康和生命。”  [[5]](#_5__Chu_Zi_A_Si_Wei_Luo__Ge_La_W)  意大利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報紙《意大利未來報》和梵蒂岡的《羅馬觀察報》也都熱切地支持政權。  [[6]](#_6__MAEI__vol__70__64_70__Charle)

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瓜葛幾乎沒有影響到梵蒂岡對他的支持，但是在意大利國外，獨裁者的光輝形象則逐漸黯淡。2月，意大利駐美國大使在報告中對這番變化表示擔憂：美國人逐漸認為，法西斯和納粹是同一枚極權主義硬幣的兩面，而美國人非常看不起納粹黨。  [[7]](#_7__Ta_Xie_Dao__Zai_Mei_Guo___Re)

然而墨索里尼依然享有意裔美國人的熱烈支持。因此，那些擁有大量意裔美國人群體的區域，其政客都不太愿意指責領袖。1937年，紐約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Fiorello La Guardia）告訴一個猶太群體，希特勒的雕像應該擺在世界博覽會的恐怖屋里；一年之后，他將元首稱作“可鄙的懦夫”。然而，即便意大利在1938年制定了反猶法案，拉瓜迪亞（他的意裔母親出身于一個猶太家庭）也不敢對領袖提出任何批評，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40年才結束，而那時的意大利已經入侵法國，并且與納粹結為盟友，進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  [[8]](#_8__Luconi_2004__p__159_Mi_Lan_D)

1937年初，一位德國記者來到威尼斯宮采訪墨索里尼。宮殿主人的座位位于世界地圖廳的盡頭，他的身后有一個巨大的大理石壁爐。領袖站起身來，身軀筆直，伸出右手行羅馬式直臂軍禮。他詢問自德國遠道而來的訪客，元首近來如何。“非常好。”這位記者回答道，并對墨索里尼旺盛的精力印象深刻。他那“形如愷撒的面龐”似乎顯得更為年輕，并且雙眼四周的皺紋也消失了。

領袖告訴記者，一場史詩般的戰爭即將打響。共產主義正威脅著歐洲的存亡。那些民主國家已經成為疫區，“被共產主義桿菌所感染”。歐洲已經迎來了歷史的轉折點。“這個時代屬于能人和強人，”墨索里尼解釋道，“民主政體猶如一盤散沙。我們擁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國家應該像一塊巖石，一座花崗巖山巒。”只有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能夠挽救歐洲于危急存亡之秋。  [[9]](#_9__Dui_Mo_Suo_Li_Ni_De_Cai_Fang)

\* \* \* \* \*

隨著教宗逐漸恢復體力，他開始要求墨索里尼幫自己對付希特勒，但他的希望注定要落空。墨索里尼告訴塔基·文圖里，當事情涉及宗教問題時，他既沒有辦法也沒有人脈去影響元首。在把這番答復轉達給教宗時，塔基·文圖里指出，領袖已經盡力而為。為了避免讓教宗對墨索里尼失望，他還迫切地補充道，“出于同樣的仁慈”，獨裁者答應了教宗的其他所有請求。他會審查教宗持有異議的一份報紙，并且沒收美國新教徒弟兄近來在意大利派發的所有宣傳手冊。  [[10]](#_10__ASV__AESI__pos__855__fasc)

1936年夏天，德國主教已經要求教宗準備一篇通諭，敦促納粹政府遵守它于1933年同教會簽訂的宗教事務協約。1937年初，教宗在病床上接見了德國的三位樞機與兩位主教，他們此行就是為了討論這一事宜。帕切利并不希望與希特勒正面對抗，他建議教宗不要用通諭的形式提出批評意見，而是應該給希特勒發去一封教宗牧函，內容最多只能透露給那些德國主教。然而教宗將帕切利的建議一腳踢開。他希望發布一篇通諭，令所有德國民眾，乃至全世界人民都能夠讀到。由此引發的結果非常具有戲劇性。1937年3月21日的棕枝主日，所有德國主教和神父都讀到了這篇題作《極度關切》（Mit brennender Sorge ）的通諭，無論是布道臺上的神職人員還是普通民眾，都從未聽過教宗對納粹政府發表如此公開的批評。  [[11]](#_11__Godman_2004__pp__133_154_Za)

“對[德國]教會審判案的長期關注給我們帶來了深切的焦慮，而事實的真相也愈發令我們感到驚訝，那些在內心和行動中都依然保持忠誠的人士對納粹政府的行徑也愈發惱怒。”這篇通諭的開頭如是寫道。教宗表示：“教會懷著誠摯的心同德國政府簽訂了宗教事務協約，然而任何人都必須承認，另一締約方竟擅自無視協約條款，扭曲其內涵，并最終將其近乎官方的違約行徑當作一種常規策略。這種行為應當受到譴責。”他為天主教區學校的淪陷感到悲痛，盡管它們理應受到協約條款的保護；他對種族崇拜和國家崇拜的行為表示譴責，認為它們是一種罪行，扭曲并濫用了“由天主規劃并創造的世界秩序”。他把矛頭對準那些試圖將基督教和種族崇拜混為一談的行徑：“只有極其膚淺的頭腦才會錯以為，這個世界存在國家之神和國家宗教的概念；也只有極其膚淺的頭腦才會將天主，這個宇宙的創造者，限定到單個人或是單個種族身上。”盡管教宗從頭到尾沒有對納粹指名道姓，但是他向那些“堅守基督徒職責、保衛天主權利、與咄咄逼人的異教信仰作斗爭的”神父和平信徒表示謝意，其中的指涉已經不言而喻。

盡管這篇通諭非常強硬，但它其實還可以更為嚴厲。幾個月來，羅馬宗教裁判所都在進行一項研究，它最終給出一份清單，羅列了教會眼里犯了嚴重錯誤的納粹基本教條，其中有好幾段顯然是直接引自希特勒的《我的奮斗》。

然而教宗擔心將納粹意識形態和基督教徹底對立起來會使希特勒宣布廢除宗教事務協約，所以他才決定采取相對間接的攻勢。支持他這么做的不僅有帕切利，還有慕尼黑（德國最重要的大主教區）大主教米夏埃爾·馮·法烏爾哈貝爾樞機。在整個起草過程中，耶穌會總會長萊多霍夫斯基盡其所能地阻止教宗直接譴責希特勒，他讓教宗“別在太過困難和敏感的問題上過分深究”。所以，“納粹”一詞從草稿中刪掉了；此外，它也沒有提及猶太人遭受的迫害。這篇通諭原本還附有一份清單，羅列了諸多受到教會譴責的錯誤，其中包括許多納粹基本教條，但是這份清單卻從未出過梵蒂岡。  [[12]](#_12__Li_Shi_Xue_Jia_Bi_De__Ge_De)

盡管這篇通諭的言辭已經大為緩和，希特勒依然大為惱火，不僅僅因為這等公開的譴責史無前例，還因為教宗沒有取得他的許可，就這般大肆散布這篇通諭。他命令警方關閉天主教出版機構，并派遣工作人員前往全國各地的主教區總部和修道院，沒收他們手中的文件。“我會讓天主教會品嘗羞辱的滋味，”他這么告訴一位來訪者，“我會開放保密的修道院檔案，讓其中不為大眾所知的污穢之事付梓出版！”  [[13]](#_13__Godman_2004__p__149__Fattor)  希特勒深信自己知道教會的弱點所在，他威脅要披露天主教神父牽涉性虐待的丑聞，并且迅速搜集定罪證據。當警方展開搜捕行動的消息傳出來之后，柏林主教和布雷斯勞大主教下令銷毀所有處理神父受控案件的文件，而教宗則號召所有德國主教向他們二人學習。  [[14]](#_14__Ao_Er_Sai_Ni_Ge_Zai_Xie_Gei)

教宗擔心意大利報紙不會將這篇通諭報道成要求德國遵守宗教事務協約的請求，而是將其夸張成譴責納粹的檄文，于是他告知領袖，他的意圖不是后者。  [[15]](#_15__Pi_Ni_Ya_Di_Chuan_Da_Le_Zhe)  而帕切利本人也迫切想要避免同納粹政府決裂，害怕這種結局會讓當地的教會組織失去防備的能力。  [[16]](#_16__Pi_Ni_Ya_Di_Tan_Ji_Ta_Jing)

5月，墨索里尼又向德國外交部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提起教宗一直關心的問題。墨索里尼告訴他，與教會的爭端正在影響第三帝國的聲譽。依據他自身的經驗，他建議納粹黨人允許公立學校設置宗教課程，他本人便借此獲得了巨大的利益。墨索里尼建議，“只要給高級神職人員一些蠅頭小利”（比方說免費火車票和稅務減免），就能贏得這些人的支持，“甚至令他們宣稱，那場發生在埃塞俄比亞的戰爭乃是一場圣戰”。  [[17]](#_17__DGFP__series_D__vol__1b__n)

領袖總是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給納粹高層領導人提供各種各樣的建議。1936年秋天，德國司法部部長訪問羅馬，向墨索里尼請教意大利何以同教會建立了如此良好的關系。墨索里尼吹噓說，在1931年一陣短暫的困難期后，他已經將梵蒂岡收編為自己的人馬。不過他建議：永遠都不要放松警惕。他解釋道，天主教會好比一只橡皮球，如果你不對它持續施壓，它就會恢復原初的形狀。  [[18]](#_18____Ling_Xiu_Yu_He_Er__Fu_Lan)

\* \* \* \* \*

1937年5月下旬的芝加哥，五百名神父聚集在當地的神學院，參加每年舉行四次的主教管區會議。  [[19]](#_19____Mang_De_Lai_En_Jiu_Jiao_H)  當大主教喬治·芒德萊恩起身發表講話時，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接下來的講話內容會輻射到芝加哥城外。然而事實是，他的話語將會引發轟動性的國際事件。  [[20]](#_20__Mang_De_Lai_En_Sheng_Yu_Niu)  芒德萊恩因納粹政府對教會的迫害而對其大加撻伐，他告訴諸位神父：“你們也許會感到疑惑，一個擁有六千萬智慧人民的國家，何以會出于恐懼和奴性，向一個外國人臣服，他明明是個只會開空頭支票的奧地利人，而且還做得笨手笨腳，加上幾個像戈培爾和戈林那樣的副手，他們對人民生活的每一個舉動都施行獨裁統治。”  [[21]](#_21__Mang_De_Lai_En_De_Zhe_Fan_J)

憤怒的德國政府要求梵蒂岡道歉。代表教宗作出答復的帕切利樞機拒絕了這一要求。他表示，梵蒂岡不可能會考慮道歉，除非德國政府以身作則，阻止德國報紙源源不斷對教會發動的攻擊。

柏林召回了德國駐圣座大使迭戈·馮·柏爾根。“圣座將會意識到，”他提醒道，“它在這件事情上的行為既難以預料且無法理解，如果不做出任何彌補，那么德國政府和教廷維系正常關系的必要條件將不復存在。事態發展到這等地步，責任將全部落在教廷身上。”  [[22]](#_22__DGFP__series_D__vol__1c__n)

如果說帕切利樞機在這場危機中起到了帶頭作用，那么部分原因在于此時的教宗仍然健康狀況不佳。日漸衰竭的心臟令他愈發孱弱，而哮喘也常常令他喘不過氣來，教宗再也沒有過去那么旺盛的精力了。一位來訪者表示，教宗仿佛“面龐上有一道永恒之光”。帕切利觀察道，庇護十一世的疾病令他“極度情緒化”。他在4月告訴一位樞機同儕，他見到虛弱的教宗時總是忍不住要哭泣。當下屬要求教宗采取行動時，庇護愈發頻繁地回答說，“那將會是繼任者的職責”。  [[23]](#_23__Pa_Qie_Li_Jiang_Zhe_Xie_Xia)

5月，教宗來到岡多菲堡休憩，那里安裝了擴音器，方便廣大聽眾聽到他微弱的聲音。八十周歲生日那天，他本該主持宗座科學院的落成典禮，卻在最后關頭取消了這個安排。  [[24]](#_24____Jiao_Zong_De_Sheng_Yin_To)

圣座與德國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引發了許多流言，有人認為生病的教宗可能很快就會將希特勒驅逐出教。  [[25]](#_25__Baudrillart_1996_p__536__21)  教宗對納粹黨人的厭惡還可能影響他對西班牙內戰的態度，因為他懷疑佛朗哥同希特勒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墨索里尼派遣人手和軍火幫助佛朗哥抵御“共產主義”，但是他抱怨道，雖然教宗曾在通諭中譴責共產主義，卻完全沒有對叛軍伸出援手。  [[26]](#_26__Mo_Suo_Li_Ni_Jiang_Zhe_Xie)  5月，佛朗哥與西班牙首席主教伊斯德羅·戈馬（Isdro Gomá）樞機進行會面，并告訴他獲得教宗的公開支持對自己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戈馬對此表示同意，并告知梵蒂岡國務卿西班牙各位主教將發表一封聯名信，宣布他們對佛朗哥的支持。帕切利敦促教宗將這份文件刊登在《宗座公報》（Acta Apostolicae Sedis ）上，納入梵蒂岡的官方立場，但是體弱的教宗拒絕了這一請求。他簡單明了地說：“樞機，這件事不行。”  [[27]](#_27__Fattorini_2007__p__95__1936)

對于意大利國外的天主教徒來說，圣座對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鼎力支持開始變得愈發令人不安。梵蒂岡在6月9日再次遭遇窘境，法國法西斯暴徒刺殺了卡洛·羅塞利（Carlo Rosselli，當時流亡海外的他是意大利最重要的反法西斯組織的創始人）。先是馬泰奧蒂和阿門多拉，如今又輪到羅塞利，墨索里尼的嘍啰已經殺害了三位杰出且道德高尚的反對派領導人。  [[28]](#_28__Qia_Luo__Luo_Sai_Li_De_Xion)

與此同時，塔基·文圖里也在不知疲倦地清除教會內部針對意大利獨裁者的批評意見。6月12日，大眾文化部  [[29]](#_29__Da_Zhong_Wen_Hua_Bu__1937)  部長迪諾·阿爾菲耶里（Dino Alfieri）要求他處理近期發生的狀況。英國最重要的天主教雜志近來刊登了一封公開信，對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發起猛攻。公開信作者是一位道明會修士，他表示英國法西斯分子聲稱獲得了梵蒂岡的支持，這一情況令他感到非常不安。他援引庇護十一世在1931年發表的通諭《我們不需要》，認為教宗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

獲知這一狀況之后，梵蒂岡副國務卿皮扎爾多蒙席起草了一封信，寄送給威斯敏斯特大主教（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天主教會領袖）。  [[30]](#_30___Zai_Luo_Ma__Ren_Men_Ren_We)  皮扎爾多抱怨道，英國雜志上那篇令人不快的文章“將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種族主義相提并論，仿佛它們都與天主教會關系密切，并且應當受到同樣的非難和譴責”。該文作者應當更加明確地將兩國政府區分開來。盡管教會曾譴責意大利出現“過度的國家社會主義傾向”，然而彼時的意大利公教進行會爭端很快就被解決了。“自那以后，”皮扎爾多在結尾寫道，“教會高層和意大利政府之間不僅再也沒有什么顯著的摩擦，甚至還常常進行成果豐碩的合作，這一點毫無疑問。”

皮扎爾多將這封信的草稿交給塔基·文圖里，后者返回時附上了一些建議，要求以更大的力度贊美法西斯政權。  [[31]](#_31__Ta_You_Qi_Yao_Qiu_Jia_Qiang)  他還建議將草稿的復本寄給道明會總會長，好讓他也增添些“恰當的提醒”。皮扎爾多遵從了所有修改意見后，才把信寄送出去。冒犯法西斯的作者因此受到了斥責，很快這本雜志上便發表了一篇令他顏面盡失的文章撤回公告。  [[32]](#_32__Na_Fen_Za_Zhi_Shi_Tian_Zhu)

\* \* \* \* \*

西班牙內戰給歐洲帶來了威脅，似乎要將整片大陸卷入更加巨大的戰爭沖突之中。8月，意大利潛水艇開始擊沉那些向受共和派控制的港口駛去的船只，而希特勒則加快了重整軍備  [[33]](#_33__Di_Yi_Ci_Shi_Jie_Da_Zhan_Ji)  的進度。盡管世界局勢愈發緊張，墨索里尼依然能每天都騰出時間，同他年輕的情婦克拉拉·佩塔奇會面，并間或同其他女人發展風流韻事。

在此之前，墨索里尼的許多情史細節都沒有被媒體所掌握，但是到了1937年初，這種狀況因為一位魅力十足的二十九歲法國記者發生了改變。在瑪格達·豐唐熱（Magda Fontanges）開槍打傷了法國駐意大利大使后，她的臭名傳遍了世界。她表示自己想要殺掉他，因為她認為是他害得自己同墨索里尼分手。當她走上法庭，世界各地的媒體都在刊登她與墨索里尼幽會的桃色新聞。豐唐熱后來在一家美國雜志刊登了由她親自撰寫的情色自述，題作《我是墨索里尼的情婦》。  [[34]](#_34__Jing_Shen_Zhuang_Kuang_Bu_N)  這篇聳人聽聞的文章分為三個部分，以令人屏息的細節講述了墨索里尼如何將她勾引到手。第二部分的開篇是一幅滿版的插圖，描繪了豐唐熱與墨索里尼擁吻的場景。該部分的題詞寫道：“他緊緊地將我擁入懷里，第一次吻上了我的嘴唇。我已然迷醉其中。”文章后面她還描寫了獨裁者位于威尼斯宮的愛巢，墨索里尼領著她穿過昏暗的房間向沙發走去。

“他再度抱住我，愈發攝住我的心魂，”她回憶道，“然后他被某種狂暴所席卷，突然變得野蠻，他說道：‘你已經了解我身為領袖的一面——如今你該了解我身為男人的一面了！’”

“他脫下外套，身穿運動衫的他顯得分外年輕。他的頭腦里已經只剩下本能，如餓虎一般向我撲來。我還沒來得及發出驚呼，就已經被他強壯的臂膀攫住。”  [[35]](#_35__Ma_Ge_Da__Feng_Tang_Re____W)

這起法國丑聞一石激起千層浪，國外媒體紛紛對領袖不知饜足的性需求進行報道。墨索里尼表示，這些報道過分夸大了事實。他告訴一位記者：“他們給我編排了那么多情婦，如果我要同她們所有人行茍且之事，那么我顯然就不是人了，而是一匹種馬。”兩年后，當逗弄一名女性時，他開玩笑說，他的肉體不允許他成為圣人。盡管他欲望很少（他基本上只吃水果和蔬菜，并且對金錢興趣寥寥），但女人是他的弱點，他也承認過，這份欲望總是會阻礙虔誠的渴望。

“在這個世界上，你又不是唯一一個這樣的人，”她指出，“我總是會想，當人老去的時候，道德高尚又有什么用處呢？”

“在羅馬涅，”墨索里尼答道，“我們有一句俗話……年輕時，把肉體奉獻給魔鬼，年老時，將骨頭奉獻給天主。”  [[36]](#_36__Zhuan_Yin_Zi_De_Felice_1981)

大眾情人的屬性在墨索里尼的個人崇拜中始終占有一席之地，而豐唐熱事件并沒有改變這一狀況。9月初，西西里島的沙灘上舉行節日慶典儀式，墨索里尼跟著樂隊的伴奏與當地女性共舞，她們有的年輕，有的已經老去，有的細瘦，有的肥胖，有的迷人，有的平庸。“在羅馬涅，舞蹈是一種宗教，”他說道，“它取代了天主教的地位。”

當墨索里尼隨著音樂搖擺時，他的秘書沖進舞池，手里攥著一張電報。部署在西西里島海岸以外的一艘意大利潛水艇剛剛發射魚雷，攻擊了一艘為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提供物資的蘇俄貨船。這起攻擊是近期執行的海域封鎖的一部分，本身就有可能引發波及更遠的歐陸戰爭。在查看過電報后，領袖又換了一位舞伴。當音樂結束時，他問道：“還有其他電報嗎？如果每在舞池里轉一圈，他們就宣布發射一枚魚雷，那么我就跳到永遠。”  [[37]](#_37__Dang_Di_Jiao_Qu_Shen_Fu_Tin)

[[1]](#filepos936147) ACS, MCPG, b. 172, ff. 57–59, 28 gennaio 1937.

[[2]](#filepos937381) 用皮尼亞蒂的話來說，“德國樞機、一大部分北美樞機和英國樞機，以及幾乎全部法國樞機都不會給認同法西斯政權的候選人投票”。DDI, series 8, vol. 6, n. 456.法國大使夏爾——魯在3月中旬發給巴黎的報告中回憶道，自從1931年因為公教進行會而發生的那場“短暫卻激烈”的沖突后，圣座與法西斯國的關系就一直很平穩，因為梵蒂岡官員“除了個別例外，幾乎都是意大利人”，而意大利神職人員幾乎萬眾一心地熱衷于支持墨索里尼。MAEI, vol. 267, 78–79, Charles-Roux à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9 mars 1937.在這份長篇報告中，夏爾——魯用很大一部分篇幅，談論了樞機團以及圣座行政人員和外交人員的國際化問題，希望梵蒂岡能從意大利人的壓倒性支配中解脫出來。關于德國的天主教媒體，參見Conway 1968, p. 171。

[[3]](#filepos938776) 正如往年在圣彼得大教堂舉行的復活節彌撒，駐梵蒂岡的各國大使幾乎全部到場，只有德國駐圣座大使因為抵制這一儀式而缺席。Baudrillart 1996, pp. 456, 464–465 (22 mars 1937; 28 mars 1937)；《教宗在圣彼得大教堂落淚》，BG, March 29, 1937, p. 1。

[[4]](#filepos939593) Confalonieri 1957, pp. 367–368; Venini 2004, pp. 203, 208–209; Chiron 2006, p. 414.

[[5]](#filepos940380) 出自阿斯維洛·格拉韋利（Asvero Gravelli），轉引自Bosworth 2002, p. 339。

[[6]](#filepos940626) MAEI, vol. 70, 64–70,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7 mars 1937.

[[7]](#filepos941118) 他寫道，在美國，“人們普遍對納粹黨懷有厭惡之情，而猶太人（他們在媒體、政壇以及金融業都占據了重要的地位）自然就對此加以利用”。DDI, series 8, vol. 6, n. 126, Suvich a Ciano, 4 febbraio 1937.

[[8]](#filepos941966) Luconi 2004, p. 159.米蘭大主教區（意大利最重要的大主教區）領袖舒斯特樞機的案例最能夠代表教會對法西斯政權強烈、高度的支持。舒斯特在想盡辦法煽動教眾支持埃塞俄比亞戰爭之后，又在次年培養同米蘭法西斯黨的密切關系。1937年1月，米蘭法西斯黨領袖以黨的名義給他頒發了一枚獎章，而當地民眾認為，本市的法西斯領導人在做出任何重大決定之前都會征求這位樞機的意見。ACS, MI, FP “Schuster,” Milano 7 gennaio 1937. 2月，在一場聽眾包含米蘭法西斯高層以及軍方領導人的演講中，舒斯特再一次稱贊墨索里尼是天主的使者，并將他比作君士坦丁大帝（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羅馬皇帝）。ACS, MI, FP “Schuster,” Milano, 27 febbraio 1937.

[[9]](#filepos943144) 對墨索里尼的采訪刊登在1937年1月19日的《人民觀察家報》頭版。美國駐德國大使威廉·多德（William Dodd）節選了部分文章，翻譯成英文發給國務卿，NARA, LM192, reel 6, January 23, 1937, no. 3265。

[[10]](#filepos943977) ASV, AESI, pos. 855, fasc. 551, ff. 38r–39v, Tacchi Venturi a Pio XI, 2 marzo 1937.

[[11]](#filepos945056) Godman 2004, pp. 133–154.在《極度關切》發表的一周前，教宗還發表了一篇譴責共產主義的通諭，即《贖世主》。

[[12]](#filepos947688) 歷史學家彼得·戈德曼（Peter Godman）寫道：為了同希特勒和平共處，“教宗絕不會采用宗教裁判所準備的版本，不對種族主義、人權以及相關問題作直接和詳細的批評。庇護十一世強調他希望‘與德國重新建立真正的和平關系’，于是他便在宗教事務協約的祭壇上犧牲掉了羅馬本該在1937年對納粹發起的總攻。Godman 2004, pp. 146–147.這篇通諭的官方英文和德文版譯文收于www.vatican.va。意大利文版譯文收于CC 1937 II, pp. 216–230。

[[13]](#filepos948375) Godman 2004, p. 149; Fattorini 2007, p. 132.

[[14]](#filepos948838) 奧爾塞尼戈在寫給帕切利的信中談及柏林主教和布雷斯勞大主教燒毀檔案的決定，而其他德國主教因此詢問是否應該照做，他回答說他們應該自行作出判斷。在奧爾塞尼戈來信的邊緣，帕切利寫下了一行字：“圣父認為這種回答太弱了……他指示，你應該回答說他們毫無疑問 應該燒毀所有可能引發問題的文件。”轉引自Fattorini 2011, pp. 123, 236n；強調符號為帕切利原文所有。

[[15]](#filepos949186) 皮尼亞蒂傳達了這一消息；他的記載沒有明示這段話由帕切利轉述，只是對此有所暗示：“圣座不希望意大利媒體在評論這篇通諭時強調它反映梵蒂岡反對納粹主義。”ASMAE, APSS, b. 35,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ppunto.”

[[16]](#filepos949433) 皮尼亞蒂談及他經常能夠見到的帕切利時，表示這位梵蒂岡國務卿“不想令雙方的關系破裂，并且近來十分振奮，因為他發現另一方也猶豫是否要將沖突推向更激烈的程度”。ASMAE, AISS, b. 67, fasc. 9, Pignatti a Ciano, “Le tre Encicliche Pasquali,” 1 aprile 1937.意大利代辦在次日寫給齊亞諾的報告中分析了德國方面對這篇通諭的反應。DDI, series 8, vol. 6, n. 388, Magistrati a Ciano, Berlino, 2 aprile 1937. 4月17日，齊亞諾在寫給意大利駐柏林大使的報告中，提及帕切利樞機不希望希特勒將這篇通諭看作是對納粹主義的討伐；他附上了皮尼亞蒂的報告復本，詳細記錄了皮尼亞蒂同帕切利的談話內容。齊亞諾評論道，德國各位主教給教宗施加壓力，令他準備了這篇通諭，而教宗在據此行動時“沒有充分考慮到可能引發的后果”。墨索里尼和他的女婿最擔心的后果便是，教宗對納粹黨人的譴責會令他們與第三帝國進一步結盟的計劃受到影響。但是他們仍然相信教宗是支持墨索里尼的，并且教宗會抵制那些國外教會人員的意見，這些人一直希望庇護能夠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放在一起批評。正如皮尼亞蒂所言：“我從一位權威人士處獲知，教宗身邊的一些顧問希望通諭能夠批判所有極權政府。然而庇護十一世排除了這些建言。” 在齊亞諾寄往柏林的信中，皮尼亞蒂的報告寫道：“國務卿樞機沒有特地要求閣下介入柏林的這一事件，但是他也沒有向我隱瞞他的愿望，圣座在這個時間段需要我們的幫助，避免雙方關系的破裂，并且令事情得到迅速的調解。”然后齊亞諾直截了當地告訴駐柏林大使：“我祈禱閣下能夠權衡這次機會，在國務卿樞機建議的范疇和意義內，在德國政府處開展一定行動。”ASMAE, APG, b. 38, Ciano a Regia Ambasciata, Berlino, telegramma in partenza n. 740, 7 aprile 1937.在《波士頓環球報》的報道中，領袖敦促希特勒不要因為這篇通諭而冒險同梵蒂岡斷絕關系；但是這則報道有一處奇怪的地方，因為是塔基·文圖里“將意大利總理的調停懇求傳達給希特勒”。《領袖出手調停納粹與梵蒂岡爭端》，BG, April 16, 1937, p. 11。舍諾（2005）提供了大量證據，表明帕切利樞機在這個階段“從未停止強調同一個信息”，即《極度關切》沒有譴責納粹國家或納粹黨的意味，并且“與德國政府尋求權宜之計仍然是圣座對德政策的主要目標”（p. 264）。4月30日，帕切利給柏爾根寄去一封長信，拒絕德國政府對這篇通諭做出具有敵意的解釋。DGFP, series D, vol. 1b, n. 649.

[[17]](#filepos950171) DGFP, series D, vol. 1b, n. 650, “Memorandum by the Foreign Minister, Baron von Neurath,” Rome, May 4, 1937.

[[18]](#filepos950824) 《領袖與赫爾·弗蘭克的對話，威尼斯宮》，1936年9月23日，轉引自Muggeridge 1948, pp. 47–48。

[[19]](#filepos951170) 《芒德萊恩就教會受到的沖擊對希特勒發起抨擊》，CDT, May 19, 1937, p. 7。

[[20]](#filepos951491) 芒德萊恩生于紐約，長于紐約，他的父親出身德國家庭，母親則是個愛爾蘭裔美國人。他在1914年被委任芝加哥大主教一職，時年僅僅四十二歲。他曾在1924年前往羅馬領受樞機帽，也曾因其他場合前往這座不朽之城。芒德萊恩與教宗十分熟絡，庇護對他源源不斷地從芝加哥帶來的經濟援助感到滿意。芒德萊恩還同富蘭克林·羅斯福有私交，自從羅斯福在1933年擔任美國總統起，芒德萊恩就公開對他表示支持。1934年，在前往羅馬的路上，芒德萊恩在海德公園拜訪了總統。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還會定期拜訪羅斯福。羅斯福認為，芒德萊恩（美國樞機中只有他位于美國東北部以外的地區）在他獲取天主教支持的事宜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Kantowicz 1983, pp. 220–236.

[[21]](#filepos952038) 芒德萊恩的這番講話內容由德國外交部傳達給德國駐圣座大使。DGFP, series D, vol. 1c, n. 652, 21 maggio 1937.帕切利要求芒德萊恩對講話內容做出解釋，后者致信梵蒂岡駐華盛頓宗座代表：“這一次，我實在被每天在媒體上重復的所謂發生在德國的道德審判案所激怒……所以我倉促地寫下了當時腦海里閃過的內容，然后把寫下的東西交給了諸位神父。”轉引自Trisco 2012, p. 159。這些審判案始于1935年，1936年因柏林奧運會而中斷，并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于1937年4月7日得以恢復；待到芒德萊恩發表講話內容的時候，這些審判案已經在德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數百名天主教神父以及宗教團體人士走上了審判席，被指控發生“不自然的性關系”或者誘奸兒童。報紙的頭版頭條對天主教神職人員和“那些身穿教士服、玷污青年的家伙”的“道德墮落”做出警示。神父和修士受到中傷，媒體表示他們利用職務之便，將兒童帶入“不自然的通奸關系”。考慮到德國政府一直都試圖終結天主教會對自身勢力范圍內教育和青年活動的控制，這場宣傳運動對于納粹來說具有重大的價值。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the German embassy to the Holy See, DGFP, series D, vol. 1b, n. 642, 7 aprile 1937; Trisco 2012, p. 153; Micheler 2005, pp. 113–114.歷史學家幾乎異口同聲地認為，這些審判案是納粹政府迫害天主教會的證據，也是納粹憎惡同性戀的證據。Micheler 2005, p. 113.納粹確然既迫害天主教會又憎惡同性戀，但是這些遭受指控的行徑到底有多少事實根據并沒有得到系統的研究。

[[22]](#filepos952815) DGFP, series D, vol. 1c, n. 655, Berg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Vatican, May 25, 1937; series D, vol. 1c, n. 657, Berg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Vatican, May 26, 1937; series D, vol. 1c, n. 658, Neurath to the German embassy to the Holy See, May 27, 1937。 在芒德萊恩樞機發表那番講話的兩周前，芝加哥的意大利總領事曾拜訪過他。在友善的談話中，大主教表達了“對領袖以及法西斯主義的欽慕，聲稱當今的意大利乃是一個教會能夠真正倚仗的國家”。在回答總領事的問題時，芒德萊恩承認部分美國天主教神父聽信了反法西斯的宣傳，但他保證這些人的數量并不多。ASMAE, APSS, b. 35, “Visita del R. Console Generale in Chicago al Cardinale Mundelein,” telespresso 215383, 8 maggio 1937.

[[23]](#filepos953581) 帕切利將這些想法告訴了法國樞機博德里亞。Bauldrillart 1996, p. 476 (7 avril 1937).

[[24]](#filepos953957) 《教宗的聲音同健康狀況一起下滑》，NYT, May 19, 1937, p. 9；《教宗在八十周歲生日遇挫》，NYT, June 1, 1937, p. 25。一位線人在談及教宗揮之不去的病情時，認為他“比平日更易怒、更陰沉”。ACS, MCPG, b. 172, fasc. 23, informatore, 15 maggio 1937.

[[25]](#filepos954242) Baudrillart 1996 p. 536 (21 juin 1937).

[[26]](#filepos954681) 墨索里尼將這些意見告訴了塔基·文圖里。ARSI, TV, b. 25, fasc. 1950, Tacchi Venturi a Pizzardo, 31 maggio 1937.

[[27]](#filepos955350) Fattorini 2007, p. 95. 1936年12月，帕切利代表梵蒂岡對佛朗哥表示支持，他希望大元帥能夠取得“迅速且全面的”勝利。Fattorini 2007, p. 96。

[[28]](#filepos955965) 卡洛·羅塞利的兄弟內洛（Nello）當時不巧正拜訪卡洛，因此也在襲擊中遇害。墨索里尼很有可能知曉并許可了這次刺殺行動，盡管我們目前尚未掌握任何證據。德·費利切（1981, pp. 420–421）在討論這起謀殺案時也承認墨索里尼很可能批準了此次行動，但他也提出，墨索里尼有可能在事后才獲知此事。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低。關于這三起刺殺案，參見Mack Smith 1983, p. 8。

[[29]](#filepos956252) 大眾文化部（1937—1944）是意大利政府的下屬部門，它的前身是媒體和宣傳秘書處，組建之初意在效仿納粹德國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

[[30]](#filepos957035) “在羅馬，人們認為[皮扎爾多所占據的]主導作用將會在教宗過世后結束。他盡管辦事勤懇，但是據他們說，無論是在天資抑或眼界上，他都不配擔任他的職務。”一位警方線人報告說，在病重的教宗前往岡多菲堡休憩期間，皮扎爾多才是梵蒂岡“真正的頭目”。ACS, MCPG, b. 172.

[[31]](#filepos957961) 他尤其要求加強結束語的贊美力度。皮扎爾多在談及梵蒂岡和法西斯政權在過去幾年間的摩擦時，應該去掉“顯著”一詞：雙方根本沒有發生任何摩擦，無論是顯著的或者不那么顯著的。他想要更改的第二處是將“[梵蒂岡和墨索里尼雙方]甚至還常常進行成果豐碩的合作”替換為“雙方高層已經將彼此成果豐碩的合作變成一種常態”。

[[32]](#filepos958376) 那份雜志是天主教周報《碑銘》（The Tablet ），而那篇文章的作者希拉里·卡彭特（Hilary Carpenter）神父是牛津黑衣修士修道院的道明會長老。ASV, AESS, pos. 555, fasc. 588, 3r, ff. 5r, 23r–43r.這份文件還包括卡彭特臣服于教會高層要求的回信，表示他會刊文撤回自己的反法西斯觀點。這位修士的文章撤回公告發表在8月7日的《碑銘》上。“教會高層告知我犯了如下錯誤，我不應將法西斯和納粹相提并論，仿佛二者應當受到同樣的譴責……自1931年的宗教事務協約以來[原文如此]，教會高層和意大利政府不僅再也沒有任何摩擦，并且在極大程度上達成了成果豐碩的合作，我原先學養不夠，未能領會上述觀點，懇求讀者諸君允許我在此予以更正。”轉引自Chadwick 1986, pp. 12–13。

[[33]](#filepos958832)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根據協約國提出的《凡爾賽條約》，德國僅保有一支規模極小的軍隊，且在裝備上有極為嚴格的限制。

[[34]](#filepos959776) 精神狀況不那么穩定，有時會突然發作的豐唐熱跟蹤法國駐意大利大使夏爾·德·尚布倫（Charles de Chambrun），一直來到巴黎北站。她在那里舉起一把左輪手槍，朝他開了兩槍。幸運的是，她的刺殺技術沒有其他手藝那么精練，只讓他受了輕傷。Tronel 2007; De Felice 1974, p. 303n1.

[[35]](#filepos960873) 瑪格達·豐唐熱，《我與墨索里尼的情事》（此處標題與正文中的標題不符，不知何故），《自由》，1940年8月17日，第二部分，第40頁。文章描寫的時間段是1936年4月。

[[36]](#filepos962014) 轉引自De Felice 1981, p. 276n41。1927年，墨索里尼在給姐姐的信中寫道，最近因為胃疼，他基本上只能吃流質食物，不過他進一步說道：“因為暴食的原罪從來都不是我的弱點，所以禁食對我來說無關緊要。”E. Mussolini 1957, p. 121.墨索里尼到底將多少肉體奉獻給魔鬼，他的各位傳記作者（盡管對性不敏感的作者可能會忽略這個問題）對此有所爭論。其中比較極端的有尼古拉斯·法雷爾（Nicholas Farrell），在他寫于2000年的傳記《墨索里尼：新生》（Mussolini: A New Life ，轉引自Baima Bollone 2007, pp. 118–119）中，他估計墨索里尼同五千名女性發生過性關系，即便他是一匹種馬，這個數字也已經非常高了。其他估算數字似乎看起來準確一些，杜伊利奧·蘇斯梅爾（Duilio Susmel，轉引自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 602n）統計出一百六十九位情婦。

[[37]](#filepos963208) 當地教區神父聽說這位貴客的來訪，連忙趕到海邊的節慶場地。墨索里尼見到這位身穿教士服的人，第一反應是覺得他會對舞會嗤之以鼻，于是便向他保證這些舞蹈無傷大雅。然而這位神父卻另有想法，他邀請墨索里尼參觀了他的教堂，并向他指出教堂的管風琴已經年久失修。慷慨的獨裁者遞給神父一大把鈔票，用于管風琴急需的維修，神父的臉上因此堆滿了笑容。Bottai 2001, pp. 119–120 (4 settembre 1937).

## 第二十章 領袖萬歲！

1937年8月，報紙開始報道墨索里尼訪問德國的計劃。  [[1]](#_1___Fan_Dui_Bai_Lin_Jiu_La_Long)  這將是一次舉足輕重的訪問。在9月下旬的五天里，希特勒會作陪領袖，周到地為他安排一系列游行、閱兵和視察，令墨索里尼感受納粹政府的強大以及德國人民對元首的熱愛。這次訪問的高潮發生在9月28日。那天，新奧林匹克運動場附近的一片場地聚集了八十萬人，在通向那片場地的道路上，兩位獨裁者受到近三百萬德國人的夾道歡迎，這些民眾從帝國各地搭乘巴士和火車來到此地。當兩位領導人在場地上現身時，人群歡聲雷動。希特勒極盡溢美之詞，稱贊墨索里尼是“稀世少有的天才，他們不為歷史所塑造，而是親自創造歷史”。后來，希特勒又稱呼他是“世界一流的政治家，任何人都無法望其項背”。  [[2]](#_2__Xi_Te_Le_Dui_Qi_Ya_Nuo_Fa_Bi)

希特勒做完熱情洋溢的介紹之后，墨索里尼拿出精心準備的德文講稿，起身開始講話。他宣稱，當法西斯意大利找到盟友，就會同它并肩前行，“一直到最后”。然而一場突降的傾盆大雨破壞了演講的效果，這位夸夸其談的大師只能對著濕透的講稿，勉強地念出上面模糊的字跡。人群根本聽不清他在講什么。  [[3]](#_3__Milza_2000__p__754)

一位目睹了這場活動的意大利人表示：“與希特勒的示威集會相比，意大利法西斯黨搞的那些活動就像是一幫人在亂跑亂叫。墨索里尼的演講實際上有點散漫，但是他懂得用夸張的方式包裝老生常談，用莊嚴的形式道出不言自明的真理。他向著無知的群眾講話，為他們代言，調動他的面部表情、肢體和雙眼，動作就像一個吹牛成性的人。希特勒永遠沉著冷靜，當墨索里尼現身時……他雙手搭在屁股上，看起來就像是馬戲團的老板。希特勒則與之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狀如一名使徒、一名政治家、一名宗教領袖。”  [[4]](#_4__Caviglia_2009__pp__204_205)

德國的排場給領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準備離開的時候，他在電話里告訴妻子雷切爾：“我在這里看到的一切簡直超乎想象。”  [[5]](#_5__Rauscher_2004__p__226)

盡管墨索里尼答應教宗幫他轉達怨言，可實際上領袖從未向希特勒提及這些事情。  [[6]](#_6__9Yue_17Ri__Pi_Ni_Ya_Di_Tong)  在諂媚的龐大公眾面前，在如此強力的軍備展示面前，他沒有辦法提起如此令人不快的話題。  [[7]](#_7___Ru_Guo_Sheng_Zuo_Xi_Wang_Mo)

墨索里尼發誓要接待希特勒來不朽之城做客，而且排場一定要超過他在德國受到的接待。博德里亞樞機在日記里寫道，他不確定衰弱的教宗會不會被這番場景活活氣死。  [[8]](#_8__Baudrillart_1996__pp__624_62)

對梵蒂岡而言，如何區分這兩個極權國家變得愈發重要。在墨索里尼訪問德國之后，《公教文明》立即刊登文章，對兩國做出區分。這份刊物認為，那些給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畫等號的人，“極大地冤枉了法西斯政權”。希特勒試圖將德國人民團結在一門全新的異端宗教名下，其口號乃是血統和國土的神圣性。墨索里尼則與之相反，他將意大利人民團結在天主教名下。兩者之間有著云泥之別。  [[9]](#_9__ASMAE__APSS__b__34__Pignatti)

領袖沒能向希特勒提出教會關心的問題，這件事情令教宗極為惱火，可是即便如此，當墨索里尼從德國歸來之后，庇護還是讓他幫忙對付元首。教宗表示，阻止希特勒進一步迫害教會，這件事本身也顧及了墨索里尼的利益。考慮到意大利與第三帝國的交往，納粹的反教會行徑勢必將玷污意大利法西斯黨的美名。  [[10]](#_10__Pi_Zha_Er_Duo_Jiang_Jiao_Zo)



墨索里尼（左）與希特勒，慕尼黑，1937年9月

還有別的跡象顯示，墨索里尼已經投靠納粹德國：12月，墨索里尼宣布意大利將退出國際聯盟，而希特勒在1933年上臺不久后就讓德國退出了聯盟。教宗對事態的發展愈發感到不安。此外，許多非意裔樞機認為教宗過于天真，竟然指望墨索里尼能夠居中調停，對希特勒施加影響，這也令庇護十分難堪。  [[11]](#_11__12Yue_Xia_Xun__Zheng_Zhi_Ji)  “領袖哪里能影響元首，”法國樞機歐仁·蒂斯朗評論道，“應該是元首影響領袖才對。”  [[12]](#_12__Di_Si_Lang_Zhe_Fan_Yan_Lun)  教宗在圣誕節向各位樞機發表講話時，也對德國教會受到的迫害表示悲痛。  [[13]](#_13__Zhe_Fan_Jiang_Hua_Ye_De_Dao)  庇護將這個信息傳達給所有有心聆聽的人。

庇護十一世自覺時日無多，然而天主命他繼續活下去，他相信這肯定是有理由的。“他孱弱的健康狀況，”法國大使觀察道，“不幸地每況愈下，他的智慧倒不曾減退，減退的只是身體的力量。”巴黎大主教讓·韋迪耶樞機在圣誕節前后見過教宗兩次。在第一次會面中，樞機高興地看到教宗生氣勃勃、注意力集中，然而在第二次會面中，教宗十分虛弱，幾乎沒法開口說話，也沒法瀏覽擺在他面前的文件。有時候，教宗十分警覺并且口齒清楚。其他時候，他則脆弱不堪、垂頭喪氣。然而，在那些無眠的夜里，他感到天主降臨到身邊，給他傳達了一條神圣的旨意，而他有責任在死前將它傳達出去。  [[14]](#_14__DDF__series_2__vol__7__n__3)

博德里亞樞機在日記中記錄了這番變化。“教宗依然神志清楚，但是他的意志力卻越來越游移不定。”法國樞機則認為，國務卿完全無法取代教宗行使其職責。“盡管帕切利樞機有許多出眾的品質，”他觀察道，“但是他既沒有堅定的心，也沒有強大的意志。”  [[15]](#_15__Baudrillart_1996__p__731__1)  當月晚些時候，博德里亞在電報里寫道：“如今這個政權已經彌漫起大難臨頭的氣息：秘密的陰謀詭計。”

墨索里尼也十分惱火。盡管他手里掌握著龐大的宣傳機器，但是煽動意大利人熱愛德國仍然是一樁難事。僅在二十年前，意大利人才同德國人打過一仗，此外納粹黨人總是喋喋不休地宣稱北歐人種有多么優越，這只會讓他的任務變得愈發艱難。而墨索里尼最不想看到的事情便是，由教宗出面告訴意大利人，希特勒乃是天主教會的敵人。

墨索里尼思索道，是時候施加一些壓力了。于是他通過圭多·布法里尼傳達了自己的意思。1923年，年僅二十八歲的布法里尼當選為比薩市市長，十年后，他晉升為墨索里尼麾下的內務部副部長。布法里尼膚色紅潤、眼神哀傷，他有一具肥胖的身軀，頭腦聰明狡詐，沒有任何道德原則。他不僅僅是一個吹牛大王，而且擅長威嚇他人，總是借機中飽私囊。  [[16]](#_16__De_Felice_1974__p__299__De)

12月30日，布法里尼喊來了教宗大使。他說，自己手里掌握的證據表明公教進行會團體再度涉足政治。他警告道，如果這種態勢繼續下去，必將招致暴力的公眾反響。大使被嚇得目瞪口呆，連忙否認了這種指控，卻沒有任何用處。  [[17]](#_17___Wo_Men_Chu_Yu_Tong_Ying_Fa)



墨索里尼主持新鎮圭多尼亞的落成儀式，當地主教與法西斯黨人一同行禮，1937年11月

獲知墨索里尼的新一輪威脅后，庇護十一世派遣大使前去游說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的答復唐突且無禮。他說，如果墨索里尼對梵蒂岡感到不滿，那只能是教宗在咎由自取，他明明知道領袖反感他對德國的不斷攻伐，然而他沒有一點停下來的意思。  [[18]](#_18__Qi_Ya_Nuo_Bu_Chong_Dao__Fan)

\* \* \* \* \*

不過，在意大利，鮮有人察覺到這些劍拔弩張的關系。大多數天主教神職人員依然認為墨索里尼是天主派來挽救這個國家的圣人，并且教區神父也常常同教區居民分享這種信念。



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宮宣布意大利退出國際聯盟，1937年12月

為了凸顯教會大眾對自己的支持，墨索里尼決定在威尼斯宮，為主教和神父組織一場盛大的集會。他聲稱這場慶典是為了給在“谷物之戰”  [[19]](#_19__Gu_Wu_Zhi_Zhan_Shi_Fa_Xi_Si)  中表現出色的神職人員頒發榮譽。由一名信仰天主教的法西斯期刊主編簽發的邀請函在12月中旬刊登了出來。通過參加1月9日的盛會，神父和主教將“令領袖這位帝國創始人深感榮幸，也由此為其增添基督教的意涵”。烏迪內（Udine）大主教朱塞佩·諾加拉（Giuseppe Nogara）將代表全體神職人員向領袖致辭。  [[20]](#_20__Yi_Feng_Hou_Xu_Xin_Jian__Yi)

梵蒂岡國務院被各地主教的信函所淹沒，他們紛紛詢問自己該怎么辦。一位托斯卡納主教寫道：“一份期刊這樣動員主教和神父向帝國創始人致敬，實在是一件顏面盡失的事情。”但是“我不想做唯一缺席的那個人”。  [[21]](#_21__ASV__AESI__pos__1044__fasc)

主教部秘書長拉法埃萊·羅西（Raffaele Rossi）樞機負責處理會對神職人員產生影響的事務，他選擇向國務卿尋求意見。帕切利回答說，他不認為教會會反對神職人員參加這種活動。然而，在收到帕切利的答復之前，羅西樞機又轉達了另一位主教就法西斯節日提出的問題，他還附上了自己的意見，認為神職人員不應當接受這份邀請。

這位樞機令帕切利陷入了難堪的處境，因為允許一位新聞工作者來召集意大利的這么多主教，必然是一件極不合適的事情。帕切利于是詢問了教宗的意見，而教宗也認為這樣一封邀請函“不應當被接受”。可是無論是教宗還是帕切利，都不想因此冒犯領袖。  [[22]](#_22__Zai_Zuo_Chu_Zui_Zhong_Jue_D)

接下來的兩周里，國務院可謂是一片混亂。  [[23]](#_23__12Yue_30Ri__You_Yi_Bo_Jiao)  意大利大使同塔爾迪尼蒙席（他頂替近來升職的皮扎爾多，成為非常教務部副部長）兜起了圈子。12月30日，塔爾迪尼告訴皮尼亞蒂，這場牽涉神職人員（尤其是主教）的公開集會令他感到不安。皮尼亞蒂回答說，如果蒙席希望他將這一意見傳達給墨索里尼，他應當將梵蒂岡的反對意見訴諸書面。幾天后，塔爾迪尼再次見到皮尼亞蒂，又向他重復了這一請求。皮尼亞蒂的回答則如出一轍。梵蒂岡自始至終沒有提出正式要求。塔爾迪尼起草了信件，但是教宗最終決定將它扣留了下來。  [[24]](#_24__ASV__AESI__pos__1044__fasc)

1938年1月9日周日早晨，兩千名神父和六十名主教排成莊嚴的隊列，行進在羅馬的街道上，而好奇的民眾和鐵桿法西斯分子則在道旁鼓掌致意。隊列前頭是身穿制服的憲兵、軍樂隊，以及身穿黑色教士服、高舉意大利國旗的神父護旗隊。法西斯黨主席阿契爾·斯塔拉切在威尼斯廣場的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紀念碑處等候他們的到來。他的身邊站著羅馬的法西斯黨頭領。兩人陪著諸位主教走上大理石階梯，他們將月桂花環放在無名烈士以及法西斯革命英雄的墓前。



谷物之戰慶祝活動現場的神職人員，1938年1月

儀式過后，隊伍又重新排列起來，向鄰近的威尼斯宮行去。他們經過墨索里尼辦公室外的陽臺，滿面笑容的領袖舉臂回應了眾人的法西斯禮。到了中午，他們將皇家大廳擠得水泄不通。在這個巨大的團體念誦過祈禱之后，領袖走進大廳，引發了大家的歡呼聲。諾加拉大主教站起身來，請求天主保佑這位對基督教貢獻良多的人。接著，一位教區神父大步來到前面，念誦起得到兩千名神父一致通過的發言稿：“意大利的神父祈求并繼續祈求天主保佑您，保佑您復興意大利并建立帝國的偉業，保佑法西斯政府。”他最后說道：“領袖萬歲！”神父和主教也集體高喊著“領袖！領袖！”令整個房間都為之震動。  [[25]](#_25__De_Rossi_dell_Arno_1954__pp)

意大利的報紙大肆報道了這一活動。都靈的《新聞報》（La Stampa ）為神職人員表現出來的對法西斯政府的熱愛而大唱贊歌：“法西斯的敵人也是教會的敵人。法西斯為之奮斗的理想也是天主教文明幾個世紀以來贊揚的理想。”德國媒體則另有角度，它將意大利神父和主教對法西斯政權的愛國支援，同“我們從德國神職人員那里體會的慘痛經驗”進行了比較。  [[26]](#_26__Zhe_Ju_Hua_Yin_Zi___Ren_Min)



墨索里尼發表講話，最右側是法西斯黨主席斯塔拉切

\* \* \* \* \*

墨索里尼愈發強烈地想要證明意大利的偉大，乃至失去了所有分寸。他落實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全世界展示這個國家的法西斯熱忱。這些措施從正步行軍一直到禁止寒暄時握手。這些改弦更張飽受嘲笑，它們的首席設計師是自1931年起擔任法西斯黨主席的阿契爾·斯塔拉切。斯塔拉切是低級趣味的大師  [[27]](#_27__Zhe_Ge_Cheng_Wei_Lai_Zi_Yin)  ，智力水平相當于陸軍訓練官，他沒有任何常識，在政治方面也缺乏任何城府，只知道全心全意地將墨索里尼供上神壇。這些年間，但凡有領袖公開露面的場合，忠實的斯塔拉切幾乎總是身穿制服，跟在墨索里尼身后一步之遙的位置，一頭黑發上涂抹了大量的潤發油。有一次，墨索里尼在解釋自己如何忍受他時笑著說：“斯塔拉切確實是我的比特犬。”斯特拉切聽聞這句評語時喜形于色。  [[28]](#_28__De_Felice_1974__pp__216_217)

這一路過來，教宗仍然在給墨索里尼施壓，要求他幫助自己抗衡希特勒，但是墨索里尼顯然希望緩和教宗和德國獨裁者之間劍拔弩張的關系：畢竟，如果教宗出言譴責納粹，并將希特勒驅逐出教，他就無法說服意大利人將自身命運和第三帝國綁縛在一起。

1938年3月，墨索里尼向教宗報告了自己近期努力的成果，他將納粹近來暫停公開審判天主教神職人員的舉措歸功到自己名下。在過去的兩年里，數百名神父和修士被關進監獄，其中許多人的罪名是誘奸男孩。這些“道德敗壞案”受到了媒體的大量關注。戈培爾曾在一次全國廣播節目講話中，指控“圣器收藏室已然成為妓院，而修道院則成了同性戀骯臟的溫床”。  [[29]](#_29__Conway_1968__pp__158_159__J)  教宗對墨索里尼的幫助表示感謝并補充道，如果墨索里尼希望梵蒂岡和第三帝國恢復正常關系，他就必須說服希特勒，允許天主教學校和公教進行會團體在德國自由運作。  [[30]](#_30__San_Fen_You_Pi_Ni_Ya_Di_Fa)

意大利神職人員和教宗一樣，對希特勒無甚好感，然而他們對墨索里尼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們最大的憂慮在于，在這個愈發不確定的世界里，可能會有什么事件威脅到墨索里尼的統治。有一天，羅馬樞機副主教馬爾凱蒂·塞爾瓦加尼（Marchetti Selvaggiani）在圣彼得廣場散步時，將這一想法告訴了皮扎爾多樞機。“如果墨索里尼失勢，”他說著指了指近旁的街燈，“你就會看到我被掛到路燈上。”  [[31]](#_31__DDI__series_8__vol__8__n__1)

[[1]](#filepos985086) “反對柏林就拉攏不了羅馬，反對羅馬也拉攏不了柏林！”領袖宣稱道（Rauscher 2004, p. 224）。他出訪德國時重申了這句話。DGFP, series C, vol. 6b, n. 568, Hassell to Weizsäcker, October 7, 1937.

[[2]](#filepos986011) 希特勒對齊亞諾發表這番言論的日期是10月24日。Kershaw 2000, p. 25.

[[3]](#filepos986565) Milza 2000, p. 754.

[[4]](#filepos987392) Caviglia 2009, pp. 204–205.

[[5]](#filepos987709) Rauscher 2004, p. 226.

[[6]](#filepos987963) 9月17日，皮尼亞蒂同帕切利樞機會面，后者要求大使敦促墨索里尼，讓希特勒改進德國政府同天主教會的關系。ASMAE, APG, b. 47, Pignatti a Ciano, “S. Sede e Reich,” 17 settembre 1937.這番談話內容泄露了出來，成了9月23日《芝加哥每日論壇報》第二版的頭條：《領袖將代表教宗同希特勒協商教會沖突問題》。

[[7]](#filepos988200) “如果圣座希望墨索里尼的這趟德國之旅也能為教會謀得好處，那么梵蒂岡最好打消這個念頭，因為墨索里尼對我方與梵蒂岡的關系問題閉口不談。”DGFP, series D, vol. 1d, n. 682.

[[8]](#filepos988568) Baudrillart 1996, pp. 624–625 (1 octobre 1937).

[[9]](#filepos989242) ASMAE, APSS, b. 34, Pignatti a regio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telespresso, 4 ottobre 1937.皮尼亞蒂引自M.巴爾貝拉（M. Barbera）發表在CC, quaderno 2095上的文章。教宗依舊同墨索里尼保持良好的關系。雙方開展了許多合作，其中一個跡象便是圣彼得廣場外一個龐大建設項目的開工。一年前，墨索里尼宣布用這個項目紀念《拉特蘭條約》，它將把臺伯河和圣彼得大教堂之間兩條窄街上人口稠密的建筑、街道和教堂統統拆毀，代之以寬闊的大道，名叫和解大道。建設項目在獲得教宗首肯之后才得以開工，而墨索里尼從德國返回后不久，教宗還親自視察了項目。Insolera 1976, pp. 130–131; Painter 2005, pp. 68–70.

[[10]](#filepos989799) 皮扎爾多將教宗的意思轉達給意大利代辦，而后者在轉達給齊亞諾時還補充了另外一個顧慮：“意大利將面臨如下風險，以后選出來的教宗在脾氣上可能會跟拉蒂教宗很不一樣。”DDI, series 8, vol. 7, n. 424, Venturini a Ciano, 12 ottobre 1937.齊亞諾命人將自己的指示寄送給意大利駐德國大使。ASMAE, APG, “S. Sede Reich e Fascismo,” 14 ottobre 1937.

[[11]](#filepos990595) 12月下旬，正值教宗每年接見各國大使的日子，皮尼亞蒂在教宗辦公室外等候時告訴夏爾——魯，教宗依然對墨索里尼貿然訪問柏林感到“憤怒”。DDF, series 2, vol. 7, n. 393, Charles-Roux à Delbos, 29 décembre 1937.

[[12]](#filepos990829) 蒂斯朗這番言論的聽眾乃是法國大使。DDF, series 2, vol. 7, n. 393,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9 décembre 1937.

[[13]](#filepos991043) 這番講話也得到了意大利媒體的報道。教宗駐意大利大使的檔案中有一張剪報：《庇護十一世對教廷的講話》，剪自1937年12月25日的《羅馬人報》，ASV, ANI, b. 24, fasc. 14, f. 20r。幾天后，當教宗接見意大利大使時，盡管他好像更加消瘦，頭腦卻依然敏銳如初，在他們短短五分鐘的圣誕問候中，庇護還是找出機會告訴他，“你沒法指望從德國那里獲得任何好處”。ASMAE, AISS, b. 115, Pignatti a Ciano, 28 dicembre 1937.

[[14]](#filepos992038) DDF, series 2, vol. 7, n. 374, Charles-Roux à Delbos, 20 décembre 1937; Baudrillart 1996, p. 703 (28 décembre 1937).

[[15]](#filepos992530) Baudrillart 1996, p. 731 (17 janvier 1938).西班牙大使透露了德國外交辦公室負責人恩斯特·馮·魏茨澤克的觀點：“帕切利完全無法制衡庇護十一世，因為他完全沒有意志力和個性。”Rhodes 1974, pp. 222–223.

[[16]](#filepos993759) De Felice 1974, p. 299; De Felice 1981, p. 280; Deakin 2000; Innocenti 1992, p. 169.

[[17]](#filepos994207) “我們處于同英法開戰的前夕，”布法里尼告訴他，“政府必須確保國家的團結。因此政府不能容忍年輕的天主教徒到處去說意大利同德國的結盟是違反自然的。”ASV, ANI, pos. 24, fasc.14, ff. 6r–11r. Borgongini a Pacelli, 31 dicembre 1937.

[[18]](#filepos994989) 齊亞諾補充道，梵蒂岡和法國政府（自1936年起，法國政府就落入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民陣線的手里）的關系似乎在回暖，這種跡象也令墨索里尼感到不快；法國在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意大利眼里都是難以和解的仇敵。齊亞諾告訴大使，在西班牙，德國的飛機和軍人與意大利人并肩作戰，“為天主教會抵御紅色西班牙”，而后者的武裝來自法國政府。博爾貢吉尼在回答中向齊亞諾指出，意大利政府在1929年同教會簽訂的條約為政府帶來了“大量好處，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亞戰爭中，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意大利人的國際聲望”。齊亞諾沒有反駁他，并答應第二天同領袖談談，看看能夠做些什么。博爾貢吉尼提出，如果他直接去見領袖有所助益的話，他很愿意去，但是齊亞諾反對這個意見。齊亞諾和博爾貢吉尼都明白，墨索里尼覺得和塔基·文圖里打交道更有利可圖，然而兩人都沒有提及這一層面。ASV, ANI, pos. 24, fasc. 14, ff. 53r–58r., Borgongini a Pacelli, 4 gennaio 1938.

[[19]](#filepos995927) 谷物之戰是法西斯意大利時期的一項農業經濟政策，旨在使意大利能夠自給自足，此時這項政策已經實施了十幾年。

[[20]](#filepos996443) 一封后續信件（一周后發出）對諸位神父提出警告，如果他們拒絕參加，他們的缺席將被“誤解”。這兩封信的抬頭都是“糧食和農場神父全國競賽”，收于梵蒂岡檔案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2, ff. 60r–61r and 48r–48v。

[[21]](#filepos996878) 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2, f. 45r, Francesco Niccoli, vescovo di Colle, a Mons. Domenico Tardini, Sostituito per gli Affari Ordinari, Segreteria di Stato, 16 dicembre 1937.

[[22]](#filepos997832) 在做出最終決定之前，教宗還要先聯絡烏迪內大主教，因為邀請函宣稱他將擔任這場活動的主要發言人；教宗想知道他為何答應扮演如此顯眼的角色。帕切利將教宗的要求轉達給羅西，并補充道，在過去的幾年里，各地主教始終都在參加這類活動，這沒有任何問題。羅西樞機與帕切利之間的通信收于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2, ff. 52r, 56r, 57r, 63r–64r。“新聞是真的，”大主教諾加拉答復道，但是“在我答應參加并發表講話之前，我聯系了皮扎爾多蒙席（如今已是樞機）”——皮扎爾多在前一個月剛剛晉升樞機——“他說自己已經詢問過圣父，并征得圣父的同意”。諾加拉有點擔心地補充道：“我希望這不會帶來任何復雜的意味。”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2, p. 70r。皮扎爾多大概是征求過教宗的許可，教宗也予以許可，大概那幾天他確實是這么認為的，然后就忘得一干二凈。

[[23]](#filepos998036) 12月30日，又一波焦慮的主教來信征求意見，于是教宗告知羅西樞機，那些從新聞工作者處收到邀請函的主教“無需接受邀請”。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3, f. 4r.

[[24]](#filepos998791) 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3, ff. 16r–17r, “Appunto,” 30 dicembre 1937，留有鉛筆字跡評論：“原先準備寄給意大利大使，然后決定扣留下來。”意大利大使相信教宗得知羅西樞機反對主教參加那場法西斯儀式后，一定會否決他的建議。在呈交給齊亞諾的同一份報告中，皮尼亞蒂重申了他的觀點，他認為庇護十一世是梵蒂岡中最“意大利的”人。對于法西斯黨以及政府官員來說，“意大利的”就意味著支持墨索里尼。不僅教宗本人不曾阻止神職人員參加這場集會，并且那些從地方省督手里接過邀請函的神職人員，也被告知不能拒絕它。一位西西里的主教抱怨說，他明明同谷物之戰沒有絲毫關系，卻還是收到了邀請，他還可憐地補充道，“我連一把土地丈量尺都沒有”。盡管如此，他寫道，“考慮到他們反復再三地邀請，我有責任接受它，并趕赴羅馬出席集會”。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3, p. 31r., vescovo di Agrigento, 30 dicembre 1937。

[[25]](#filepos1000642) De Rossi dell’Arno 1954, pp. 138–143.英國駐圣座大使觀察道：“墨索里尼抓住機會，將天主教旗幟插在了法西斯旗桿上。”FCRSE, part XIII, p. 11, Osborne to Eden, January 12, 1938, R 495/495/2. 威尼斯宮集會的三天后，教宗主持集會，接待了為此趕來羅馬的神父和主教。這件事令教宗極為難堪。因為發給神父和主教的原版邀請函表示會安排教宗接待他們，然而實際上當時根本沒有這樣的安排。教宗就此事咨詢了主教部，后者通過其秘書長羅西樞機建議教宗不要出面接待這群人，因為他們擔心這般接納墨索里尼的慶祝儀式，會給教會在海外帶來負面影響。但是教宗忽略了這個建議，并決定對神職人員的這次行為表示支持，而他明白這樣的行動會令墨索里尼高興。ASMAE, AISS, b. 115, Pignatti a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15 gennaio 1938.他祝福了這些神父，對他們出色的教區工作提出表揚，并稱贊了《拉特蘭條約》所帶來的一切好處。CC 1938 I, pp. 277–279.

[[26]](#filepos1001271) 這句話引自《人民觀察家報》，收于梵蒂岡檔案ASV, AESI, pos. 1044, fasc. 723, f. 56r；意大利駐柏林大使將同樣的話寄給意大利外交部和大眾文化部。ASMAE, APG, b. 47, 11 gennaio 1938.《新聞報》的話摘自p. 53r。

[[27]](#filepos1002153) 這個稱謂來自因諾琴蒂（1992, p. 93），前外交部部長、法西斯政府要員迪諾·格蘭迪（1985, p. 360）也對斯塔拉切做出了精妙的描寫：“智力不足，顯然文化全無，無法區分重要的事情和那些流于表面的（甚至有害的）事情，他助長了對墨索里尼的瘋狂崇拜，并且每天早晨向墨索里尼做簡報時，都會像著了迷一樣全神貫注聆聽領袖的那些長篇大論。

[[28]](#filepos1002784) De Felice 1974, pp. 216–217; Innocenti 1992, pp. 94–95; Petacci 2011, p. 37.

[[29]](#filepos1003787) Conway 1968, pp. 158–159; Johnson 1999, pp. 212–214.

[[30]](#filepos1004127) 三份由皮尼亞蒂發給齊亞諾，再轉發給意大利駐柏林大使的電報記錄了這次會面。ASMAE, APG, b. 46, Ciano, “Questione religiosa Germania-Vaticano,” telespresso n. 210989, 26 marzo 1938.

[[31]](#filepos1004795) DDI, series 8, vol. 8, n. 130, Pignatti a Ciano, 10 febbraio 1938.

## 第二十一章 希特勒訪問羅馬

1938年3月12日清晨，德國軍隊穿過邊界進入奧地利。第二天，得意洋洋的希特勒宣布該國成為第三帝國的一個州。3月14日，他抵達維也納，迎接他的是大面積慶祝活動和響亮的教堂鐘聲。  [[1]](#_1__DDF__series_2__vol__8__n__42)  《紐約時報》的頭條標題是《維也納民眾羞辱猶太人：猶太家庭被迫清掃街道》，其社論評述道：“一個曾經與命運抗爭過的小國家自昨天起正式消亡。”倫敦《泰晤士報》的頭條則畫面感更強：《強奸奧地利》。  [[2]](#_2__NYT__March_16__1938__p__8)  第二天，希特勒同維也納大主教、奧地利天主教領袖特奧多爾·因尼策（Theodor Innitzer）樞機進行了會面。樞機聲稱：“信徒以及具有靈魂的人都應當無條件地支持偉大的德國與元首，因為天命必將保佑與布爾什維克信仰所做的歷史斗爭，保佑為德國人民的生命安危、為工作和面包、為帝國的力量與榮耀、為德意志民族的統一而付出的艱苦奮斗。”因尼策命令麾下神父在所有教堂中宣讀這一聲明，而這份聲明的復本（加上他最后親筆題寫的一句話：“向希特勒致敬！”）貼遍了維也納和奧地利全國上下的墻壁。  [[3]](#_3__Charles_Roux_1947__p__122__P)

納粹黨人安排在次月進行全民公投，以令他們的統治地位合法化，而奧地利的主教紛紛加入因尼策的行列，令這份聲明在奧地利所有的布道臺上得到宣講。他們告訴奧地利天主教徒：“我們欣然承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國家與經濟重建領域，以及社會方針方面有著出色的業績，并正做著出色的工作。”他們繼續說：“我們還深信，通過納粹運動的舉措，我們將避免秉持無神論、極具破壞性的布爾什維克危險。”他們敦促信徒投贊成票，讓奧地利加入到第三帝國的麾下。  [[4]](#_4__CC_1938_II__p__189)

希特勒接管奧地利，給墨索里尼的威望造成了重大打擊，因為長久以來，領袖都支持奧地利在意大利的影響下獨立自主。而他也同許多意大利人一樣，對北部邊疆突然出現一個強大且具有侵略性的德國感到不快。  [[5]](#_5__Mo_Suo_Li_Ni_Yi_Kai_Shi_Rang)  幾個月前，當他訪問德國的時候，納粹領導人曾向他承諾，他們對奧地利采取任何行動之前一定會征求他的許可。  [[6]](#_6__Mo_Suo_Li_Ni_Fang_Wen_De_Guo)  然而這所謂的征求許可，不過是在入侵兩天前由希特勒發來一封信函，將德國方面即將采取的行動告訴墨索里尼。  [[7]](#_7__Lamb_1997__pp__206_207)

墨索里尼竟然這么溫順地接受了納粹對奧地利的接管，這令庇護十一世感到震驚、心寒和難堪。他說道：“我感到非常難過，不僅僅是作為教宗，更是作為一名意大利人。”至于維也納大主教，教宗對他也十分氣憤。“他們給他什么文件，他就簽署什么文件，無論他們想要什么……然后他還沒有任何征兆地表示‘向希特勒致敬！’”薩爾茨堡（Salzburg）大主教和格拉茨（Graz）大主教也很快唯因尼策馬首是瞻。教宗就奧地利人民的性格缺陷說了一些刻薄的話，并且悲嘆道，很不幸的是，當地的神職人員也具有這些性格缺陷。  [[8]](#_8__Bo_De_Li_Ya_Jiang_Zi_Ji_Tong)

4月1日晚，梵蒂岡的電臺節目嚴厲批判了奧地利主教對納粹侵略行為的支持。第二天，梵蒂岡日報又對這番批評進行了補充，認為這些主教的聲明并沒有得到梵蒂岡的首肯。帕切利在與意大利大使的會面中，表示因尼策樞機的行為令教會難堪。通常在緊張狀況下也能鎮靜自若的帕切利，如今顯得憤怒異常。他表示，不幸的是，他的工作常常要求他對付一些“缺乏品格的人”。  [[9]](#_9__DDI__series_8__vol__8__n__43)

可是后來，當帕切利同德國大使進行談話時，他的用語卻更為謹慎。柏爾根對梵蒂岡電臺播放的“不合時宜的內容”提出抗議。帕切利則試圖說服他，這些電臺言論“并不是官方立場，甚至不是半官方立場，它們沒有得到梵蒂岡的授意，教宗與這些言論沒有半點瓜葛”。在這番言論里，帕切利將推諉自己毫不知情的原則演繹到極致，而德國大使則清楚他不過是在撒謊。梵蒂岡電臺是教宗底下的一個項目，教宗還專門請來諾貝爾獎得主伽利爾摩·馬可尼  [[10]](#_10__Yi_Da_Li_Gong_Cheng_Shi__Zh)  （Guglielmo Marconi）幫忙設計這座電臺。有了馬可尼的助力，教宗在1931年開通了這座電臺，這樣一來他半小時的拉丁文演講得以傳播至大西洋兩岸。  [[11]](#_11___Zhu_Tian_Na__Ling_Ting_Wo)

德國大使認為，帕切利應該是他的盟友。“樞機自信地補充道，”柏爾根在發給柏林的報告中寫道，“在發生這次令人不快的意外后，他會試著給梵蒂岡電臺施加一些控制。樞機反復重申，他迫切地希望能夠同德國和平共處。”  [[12]](#_12__DGFP__series_D__vol__1d__n)

教宗傳喚因尼策來梵蒂岡會面。維也納大主教表示自己會在4月5日下午抵達，但必須在第二日清晨離開，因為他同希特勒有約，而他不想錯失那場約見。  [[13]](#_13__Bo_De_Li_Ya_Shu_Ji_Xiang_Ji)  教宗怒不可遏，他傳話表示，他絕不能容忍自己的日程由一位樞機來安排，因尼策返回奧地利的時間，必須得到教宗的首肯。  [[14]](#_14__Zai_Ta_Men_Deng_Hou_Shu_Ji)

會面中，庇護告訴因尼策，他的行為有辱教會名譽，命令他撤回那份歌頌新政府的聲明。于是撤回聲明的開頭如是寫道：“奧地利主教在3月18日做出的莊重聲明，其意圖顯然不是對不符合天主律法的事物表示贊同，也不是對不符合天主教會自由和權利的事物表示贊同。”它強調奧地利與梵蒂岡的宗教事務協約必須得到尊重，奧地利兒童必須享有接受天主教教育的自由。德國大使在報告里寫道：“因尼策樞機寫下這樣的文本顯然受到了強迫，此等行為只能被稱為勒索。”柏爾根寫道，因尼策“做出了最大的抵抗，卻只能爭取到一點點妥協”。第二天，這位大主教的聲明登上了《羅馬觀察報》。  [[15]](#_15__Bai_Er_Gen_Zong_Jie_Dao___Z)



維也納大主教特奧多爾·因尼策樞機在納粹全民公投中投出自己的一票，1938年4月10日

庇護對墨索里尼十分生氣，領袖明明承諾要保護奧地利的獨立自主，卻對納粹的接管袖手旁觀。教宗告訴他的老朋友歐仁·蒂斯朗：“領袖已經失去理智了。”

“至圣的圣父，”法國樞機回應道，“我認為他在訪問柏林時就已失去了理智。”

“比那還要早得多。”教宗回答道。  [[16]](#_16__DDF__series_2__vol__9__n__1)

法國人愈發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視作一對狼狽為奸的同黨，他們同屬一類極權政府，威脅著世界的和平。教宗對意大利獨裁者的支持使得法國人對他的怒火愈演愈烈，也使他受到了許多尖刻的批評。博德里亞樞機在日記里寫道：“一方面，極端主義報紙譴責他沒能擔負起道德使命，卻向法西斯俯首投降。另一方面，有些人也考慮過，他應該臨時搬到別的什么地方（不能是阿維尼翁），這樣就不至于被意大利玩弄于股掌之間（或者成為它的共犯）。”他總結道：“帕切利樞機該多么尷尬！庇護十一世任期的尾聲竟如此慘淡！”  [[17]](#_17__Baudrillart_1996__p__809__3)

\* \* \* \* \*

納粹接管奧地利，令墨索里尼感覺自己被利用了。很久以前,他就發誓要阻止德國入侵奧地利，如今受辱的他喊來塔基·文圖里，告訴他是時候該終結希特勒統治世界的夢想了。他提醒道，折中的辦法不會有任何效用，希望納粹能夠和平地退出政治舞臺，則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想法。驚天大事必將發生，而且很快就要來到。

到底誰能夠對此采取行動？領袖告訴目瞪口呆的耶穌會士，唯一能夠阻止希特勒的人就是教宗。只要將希特勒驅逐出教，他就能孤立元首，挫敗納粹黨人。  [[18]](#_18__Mo_Suo_Li_Ni_Ye_Yi_Shi_Dao)

他的提議實在是聳人聽聞，塔基·文圖里絕不會將其付諸書面。他要求立即面見教宗，并將墨索里尼的言論告訴了庇護。  [[19]](#_19__Fan_Di_Gang_Yu_2006Nian_Kai)  墨索里尼是個反復無常的人，并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傾向于采取這樣大膽的行動，對此心知肚明的教宗也就從未認真考慮聽從這一建言。

有趣的是，梵蒂岡官方確實曾經考慮要將希特勒驅逐出教，盡管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教宗對此事知情。那是在1932年1月，希特勒上臺的前一年。將他驅逐出教的根據既不是他的異端意識形態，也不是他煽動種族仇恨的行徑，而是因為他曾經見證過一場受到教會反對的婚禮。那個月，德國教會的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意大利駐德國大使，希特勒得罪了天主教會，惹了大麻煩。希特勒的助手約瑟夫·戈培爾剛剛舉行了婚禮，而希特勒則擔任了這場婚禮的見證人。戈培爾和希特勒都是天主教徒，然而戈培爾的妻子不僅曾經離婚，還是個新教徒，而這場婚禮的主持人也是一位新教牧師。這位德國高級教士報告說，對于這樣的罪孽，教會正討論是否要將其驅逐出教。就算德國教會決定要將其驅逐出教，這一決議最終也遭到了梵蒂岡的否決。  [[20]](#_20__ASMAE__APSS__b__39__ministe)

\* \* \* \* \*

墨索里尼很快就冷靜下來，并告訴自己德國接管奧地利是大勢所趨、不可避免。墨索里尼多番考量，德國的示威反而令他更加堅定了要與納粹保持盟友關系的決心。現如今，他愈發不希望教宗出言討伐希特勒，甚至擔心教宗會令意大利人與德國盟友反目成仇。元首訪問羅馬的日程已近在眼前，領袖特別擔心在最后關頭遭遇慘敗。

隨著元首即將訪問羅馬的新聞愈發頻繁地見諸報端，人們也愈發關心希特勒是否會去拜見教宗。  [[21]](#_21__1Yue_Zhong_Xun__Pa_Qie_Li_S)  盡管庇護看不起希特勒，但是從原則上來說，他并不會拒絕接見元首。德國擁有大量天主教人口，并且德國政府與梵蒂岡有著正式的外交關系。但是教宗也明白，讓希特勒出現在梵蒂岡，會讓許多國外人士感到不快。這樣做肯定會激怒法國人，而從美國發回的報告則提醒他，美國人也同樣會因此大為惱火。  [[22]](#_22__ASMAE__AISS__b__87__Pignatt)

領袖一開始希望，希特勒與庇護十一世的歷史性會面，會成為元首這趟不朽之城勝利之旅的亮點所在。  [[23]](#_23__Zai_Xi_Te_Le_Lai_Fang_Zhi_Q)  他擔心如果希特勒來到羅馬卻刻意回避梵蒂岡，那么將會有數百萬意大利人深受冒犯。近年來，凡是同圣座有著正式外交關系的國家領導人，只要訪問羅馬就必定會前去拜見教宗。  [[24]](#_24__Fa_Guo_Da_Shi_Shen_Xin__Ru)

盡管庇護對近在眼前的訪問感到不快，墨索里尼卻依然可以倚仗他來做出一些安排。羅馬的神學院里住了許多外國人（《拉特蘭條約》賦予他們治外法權），墨索里尼擔心他們會替梵蒂岡發聲譴責希特勒。3月26日，齊亞諾聯絡了帕切利樞機，希望得到教宗的幫助。法西斯政府希望將全部反納粹的外國人都找出來，并在訪問期間對他們進行監視，要完成這項工作，宗座警力的配合至關重要。一周后，帕切利對此做出答復：“國務院秘書處對此十分關切，因此榮幸地告知[意大利]大使館，圣父愿意賜予貴方希望獲得的權限。”于是意大利警方便可以聯絡梵蒂岡警方，做好監視事宜的安排。  [[25]](#_25__ASMAE__APSS__b__39__Ciano_a)



墨索里尼主持新建筑盧切大樓的落成儀式，身旁是彼得羅·塔基·文圖里神父和阿契爾·斯塔拉切，1937年11月10日

盡管教宗希望同墨索里尼保持密切的關系，但是元首此次來訪，竟然安排了如此高規格的慶典儀式，還是令庇護感到非常不滿。他告訴意大利大使，低調的訪問更合乎情理。政府準備的活動怎么能“將希特勒先生推上神壇？這個人是基督和教會當今最大的敵人”。他已經向天主禱告，讓祂提早收回他的靈魂，好不必忍受這令人不快的場景。教宗一邊同皮尼亞蒂談話，一邊思索著這番景象，幾乎郁悶得說不出話來。他深愛的這個國家實在不應當承受這樣的屈辱。  [[26]](#_26__ASMAE__APSS__b__39__Pignatt)

元首抵達羅馬的三天前，教宗離開梵蒂岡前往岡多菲堡避暑。他下令梵蒂岡的幾家博物館在希特勒訪問期間閉館，并指示希特勒沿途城市的主教不要參加元首的接待活動。面對教宗的抗議，政府只好放棄原先的計劃，不再架設巨大的聚光燈照亮圣彼得大教堂。  [[27]](#_27__Pa_Qie_Li_Yu_Pi_Ni_Ya_Di_De)  《羅馬觀察報》刊登了教宗離開梵蒂岡的消息，但否認它與元首的來訪有任何關系。  [[28]](#_28__ASMAE__AISS__b__87__Pignatt)

至于教宗，這趟岡多菲堡之旅對他而言喜憂參半。無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這都是一段艱難的時光，教宗感到這將是他在阿爾巴諾山度過的最后一個夏天。他在抵達岡多菲堡后舉行了一些不大尋常的接見儀式，從中或許可以讀出他的一些思緒。祝福過聚集到廣場上迎接他到來的人群之后，教宗邀請下屬參加了一場小型慶祝儀式。在繪滿壁畫的大廳里，所有蒙席都加入到談話中，教宗下令給每個人倒上威末酒  [[29]](#_29__Ye_Cheng_Wei_Mei_Si_Jiu_Huo)  。  [[30]](#_30__Confalonieri_1957__p__372)

\* \* \* \* \*

5月3日晚，希特勒抵達羅馬火車站，隨行的有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約瑟夫·戈培爾、魯道夫·赫斯（Rudolf Hess）、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其他納粹領導人和外交官，一群身穿軍裝、十分嘈雜的德國記者，以及避過公眾耳目的元首情人愛娃·布勞恩（Eva Braun）。  [[31]](#_31__Rauscher_2004__p__241)  由于希特勒是德國最高領導人，所以按照外交禮儀，接待他的應當是國王而不是墨索里尼。元首步下火車，這個時刻已經在領袖腦海中盤桓了好幾個月，他卻只能站在一旁當個配角，生著悶氣。希特勒也非常驚訝，迎接他的竟然不是被自己贊譽為羅馬皇帝的墨索里尼，而是個頭矮小、留著一把白色髭須的國王。

國王和元首一起乘坐華麗的馬車，穿過人頭攢動的街道；意大利士兵排成兩列面朝人群，將他們擋在木柵欄后面。探照燈點亮了羅馬古老的歷史遺跡。煙霧從巨大的羅馬瓷瓶中升騰而起，瓷瓶里裝滿了燃燒的鎂粉，為古羅馬廣場的遺跡和帕拉蒂諾山帶來了一種超脫塵世的質感。

賓客和主人抵達宏偉的王室居所奎里納爾宮。但是雙方的會面并不愉快。國王向他的小圈子透露道，他認為希特勒是個道德低下的癮君子。而希特勒想知道為什么接待他的不是他那位法西斯盟友，他還認為皇宮“陰郁且令人不適，猶如一個古董商店”。元首的老朋友約瑟夫·戈培爾在見到王座時評論說，那應當是墨索里尼的位子。至于那個人，他指著國王低聲道，他的五短身材實在是配不上寶座。  [[32]](#_32__Milza_2000__p__759__Gallagh)

次日，當教宗在岡多菲堡向數百對新婚夫婦發表講話時，他悲嘆道，“令人傷心的事情”正在羅馬城里上演，那里出現了“另一枚十字架，那并不是耶穌的十字架”。“很明顯，”皮尼亞蒂觀察道，“教宗想要發泄情緒，如果考慮到他的脾氣，你可以說他這輪發火還算是溫和。但他就不能適可而止嗎？”他自問自答說：“我懷疑他不會。”  [[33]](#_33__DDI__series_8__vol__9__n__5)

墨索里尼籌備了好幾個月，確保法西斯意大利給希特勒留下深刻的印象。除開羅馬，他們還會前往那不勒斯和佛羅倫薩。希特勒抵達每一座城市的日期，都會成為該市的法定節日。每一座城市都搭建了凱旋門，并裝飾以別致的燈飾。橫幅和旗幟四處飄揚。  [[34]](#_34__Jin_Qi__Fo_Lang_Ge_De_Bu_Du)

在羅馬的幾處圣所舉辦各種儀式之后，這支大部隊移師那不勒斯。整個隊伍在國王的護送下，一路大張旗鼓地向碼頭行去，而墨索里尼則在“加富爾號”戰艦上等候他們，準備進行為期一天的海軍演習，然后在晚上觀賞歌劇。對于元首而言，這段旅程最糟糕的時刻就出現在那個晚上。歌劇結束之后，他身穿晚禮服，同身穿全套皇室禮服的國王來到室外，檢視一支儀仗隊。當舉起右臂行納粹禮時，他慌忙用左手抓住背心，試圖壓住翹起的禮服后擺。在他的副手看來，他的這番模樣就像是一位慌張的餐廳領班。  [[35]](#_35__Xi_Te_Le_Jiang_Ta_Gan_Ga_De)

在返回羅馬參加為期三天的軍事演習、歌劇、接待以及演說之后，這支大部隊又前往佛羅倫薩，為這次訪問畫上一個句號。為了迎接希特勒，佛羅倫薩城內建筑的屋頂和窗戶上懸掛了超過十萬面（意大利和納粹的）橫幅和旗幟；到處都是鮮花般的彩飾。新安裝的燈具令這座城市比從前亮了兩倍。街道兩旁簇擁著一萬八千名法西斯民兵，三個步兵團，來自佛羅倫薩和羅馬的數百名警察，以及從全國各地召集而來的一千五百名憲兵。在過去的三周里，警察檢查了所有搭乘汽車來到這座城市的旅人的文件。但凡忠誠度存疑的人，都會被預先拘捕。據美國總領事所言，“許多猶太人都在訪問期間離開了佛羅倫薩，要么是被強迫，要么是‘被建議’，要么就是他們自己覺得這是明智之舉”。  [[36]](#_36__Mei_Guo_Ling_Shi_Huan_Bu_Ch)



墨索里尼、希特勒、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1938年5月

希特勒在前，墨索里尼在后，他們分別乘坐轎車以凱旋的姿態穿過飾滿卐字符號的城市街道。在壯觀的領主廣場  [[37]](#_37__Ling_Zhu_Guang_Chang_Shi_Yi)  上，龐大的人群向兩位獨裁者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然后希特勒非要讓不情不愿的領袖帶他游覽了烏菲茲美術館。  [[38]](#_38__Mo_Suo_Li_Ni_Shi_Yi_Ge_Wan)  最后在火車站，當希特勒準備動身返程時，兩人溫情地告別。領袖宣稱：“如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離間我們。”元首的眼中噙滿了淚水。  [[39]](#_39__Ciano_2002__p__89)

意大利人對于元首的來訪到底抱有多大的熱忱，這一問題尚有爭議。美國駐羅馬大使威廉·菲利普斯認為，墨索里尼受到德國民眾的熱烈歡迎，而“迎接希特勒的歡呼聲則有點不溫不火”。不過他總結道，墨索里尼達成了他的目標，因為希特勒對這次訪問感到滿意，并且對羅馬的歷史遺跡印象深刻。  [[40]](#_40__NARA__LM192__reel_5__Willia)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數十萬歡欣鼓舞的意大利人面前宣布他們對彼此國家的崇敬之情，教宗對此火冒三丈。在訪問的幾天后，他告訴法國大使夏爾——魯，最令他惱火的是領袖本人，墨索里尼對希特勒的贊頌達到如此無以復加的程度，這是意大利向元首臣服的最新明證。  [[41]](#_41__DDF__series_2__vol__9__n__3)  《羅馬觀察家》盡可能地忽略了這次訪問。《公教文明》用一段陰郁的話結束了它冷冰冰的描述：官方慶祝儀式的夸張與宏大無法掩飾天主教信徒的失望之情，一個擁有兩千七百萬天主教徒的國家，當其領導人訪問羅馬，卻沒有向“猶如父親一樣受到這幾千萬天主教徒愛戴的人、他們靈魂的至高神父、被尊奉為耶穌基督代理人的人致以他的敬意”。在《公教文明》看來，這樣做的結果導致了“一個巨大的缺陷”，令這次訪問大為失色。  [[42]](#_42__CC_1938_II__pp__376_377)

然而這種觀點在天主教神職人員間并不普遍。很多人不顧教宗的警告，無法抑制對兩位獨裁者勝利游行的熱忱。在奧爾泰（Orte）主教管區連接羅馬和佛羅倫薩的鐵路沿線，教區神父積極參加了慶祝活動，他們拿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獲得的軍功勛章，用它們裝點了自己黑色的教士服。奧爾泰主教深知當地方濟各會成員篤信法西斯主義，于是警告他們不要參加慶祝活動。然而在希特勒路過的當天，他們把整個修道院都插滿了意大利旗幟和納粹旗幟，甚至用卐字符號裝點了鐘樓。更糟糕的是，修道士安排教會學校的數百名兒童站在鐵路沿線，當火車經過時，修道士帶領著孩子們一邊奔跑一邊歡呼：“墨索里尼萬歲！希特勒萬歲！”  [[43]](#_43__ASV__AESG__pos__735__fasc)

[[1]](#filepos1019749) DDF, series 2, vol. 8, n. 422, Puaux, ministre de France à Vienne, à Paul-Boncour, ministre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14 mars 1938.

[[2]](#filepos1020145) NYT, March 16, 1938, p. 8; 《奧地利滅亡了》，NYT, March 14, 1938, p. 14; Times, March 15, 1938, p. 14。

[[3]](#filepos1020937) Charles-Roux 1947, p. 122; Passelecq and Suchecky 1997, pp. 50–51. Chiron 2006, p. 448.

[[4]](#filepos1021710) CC 1938 II, p. 189.

[[5]](#filepos1022135) 墨索里尼一開始讓部長通知意大利媒體，只對這次入侵做最低限度的報道。主編被告知“不要惹人耳目”。但是第二天，也就是3月12日，隨著墨索里尼漸漸適應了新局勢，他決定以最大的程度對其加以利用，并且幫助意大利民眾適應新的態勢。所以，3月12日的指令是這么寫的：“新聞報道應當客觀，對事務的新情況表示認可。”Tranfaglia 2005, p. 248.

[[6]](#filepos1022399) 墨索里尼訪問德國后歸來，曾就此向國王做過報告。DDI, series 8, vol. 7, n. 393, 4 ottobre 1937. 1937年，帕切利和皮扎爾多都曾向法國大使確認，墨索里尼絕不會情愿讓希特勒接管奧地利，然而大使卻對此不那么確定。DDF, series 2, vol. 5, n. 232, Charles-Roux à Delbos, 8 avril 1937，以及DDF, series 2, vol. 5, n. 297, Charles-Roux à Delbos, 17 avril 1937。

[[7]](#filepos1022663) Lamb 1997, pp. 206–207.

[[8]](#filepos1023505) 博德里亞將自己同教宗的談話報告給夏爾——魯。DDF, series 2, vol. 9, n. 209, Charles-Roux à Georges Bonne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0 avril 1938. 另參見Charles-Roux 1947, p. 121。

[[9]](#filepos1024148) DDI, series 8, vol. 8, n. 437, Pignatti a Ciano, 2 aprile 1938.

[[10]](#filepos1024893) 意大利工程師，專門從事無線電設備的研制和改進；19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11]](#filepos1025200) “諸天哪，聆聽我要說的話，”教宗在梵蒂岡電臺的第一次節目中宣告，“讓大地側耳聽我嘴里的話。諸國哪，聆聽這些事情，世界的全部住民，側耳傾聽。”Confalonieri 1957, pp. 147–149; Agostino 1991, pp. 66–67.

[[12]](#filepos1025647) DGFP, series D, vol. 1d, n. 700, Berg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pril 4, 1938.

[[13]](#filepos1025994) 博德里亞樞機向教宗報告說，因尼策急忙要趕回維也納的原因是為了同希特勒約見。DDF, series 2, vol. 9, n. 209, Charles-Roux à Georges Bonnet,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0 avril 1938.

[[14]](#filepos1026274) 在他們等候樞機的到來時，教宗告訴帕切利，如果大主教以引退相逼，庇護就會接受他的辭呈。Durand 2010.

[[15]](#filepos1027210) 柏爾根總結道：“這件事情也表明，教宗已然完全放任自己，現在的他完全被自己對德國的病態憤怒所控制。”DGFP, series D, vol. 1d, n. 702, Bergen to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April 6, 1938.這份撤回聲明的德語原版于4月7日發表在《羅馬觀察報》上；其意大利語版則于次日刊登：《奧地利主教的聲明》，OR, 8 aprile 1938, p. 1。

[[16]](#filepos1028090) DDF, series 2, vol. 9, n. 125, Rivière, chargé d’affaires de France à Rome Saint-Siège, à Paul-Boncour, 6 avril 1938.

[[17]](#filepos1028936) Baudrillart 1996, p. 809 (3 avril 1938).維也納大主教在不愉快的羅馬之行后匆忙趕回家，參加4月10日的全民公投。不曾悔改也不愿意屈服的他帶領大家來到投票站，舉起手臂行納粹禮，并將自己支持將奧地利納入德意志帝國的選票投入了票箱。即便虛弱的教宗對納粹領土上的高級教士有任何控制能力，這種能力也在不斷減退。ASMAE, APSS, b. 39,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 R. Ambasciata S. Sede, “Il plebiscito del 10 aprile,” telespresso n. 217705, 23 maggio 1938.到4月底，新政府（受到了樞機和主教的熱情支持）下令將奧地利的猶太老師和學生逐出學校，將猶太醫生從醫院里解雇，吊銷猶太律師的營業資格，解雇新聞報紙的猶太主編，趕走猶太工廠主，開除劇院里的猶太導演和演員。猶太人名下商店的前窗上都張貼了“猶太商店”的標識。如果有天主教顧客膽敢無視這種警告，他們將被迫在后背掛一張寫有“我是雅利安豬”的標牌。意大利駐維也納總領事在4月26日將這一情況報告給齊亞諾。DDI, series 8, vol. 9, n. 10.

[[18]](#filepos1029816) 墨索里尼也意識到，教宗可能會忌憚這樣的舉措，因為他擔心破壞納粹政府會削弱反共的力量，此外他也承認，將希特勒驅逐出教，會令某些教會的敵人歡欣鼓舞。然而，他補充道：“然而這些理由絲毫不能減損這一行動的必要性。”

[[19]](#filepos1030121) 梵蒂岡于2006年開放了庇護十一世檔案，才使得關于這次對話的唯一記載得到曝光，我們在其中找到了帕切利樞機就這次會見所做的手寫記錄。ASV, AESS, pos. 430a, fasc. 355, f. 41, 10 aprile 1938.

[[20]](#filepos1031415) ASMAE, APSS, b. 39,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Roma, a R. Ambasciata presso S. Sede, “Contrasti fra Hitler e Vaticano,” telespresso n. 200305, 5 gennaio 1932.

[[21]](#filepos1032229) 1月中旬，帕切利樞機告訴法國大使，目前為止，梵蒂岡并未從德國政府收到任何會面請求。考慮到雙方之間緊張的關系，他認為對方可能不會提出這種請求。在另一次談話中，塔爾迪尼告訴夏爾——魯，如果希特勒要求得到教宗的接見，他認為教宗不會拒絕接見他。DDF, series 2, vol. 8a, n. 5,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18 janvier 1938. 1月下旬，皮尼亞蒂也重復了這種觀點：如果希特勒要求拜見教宗，梵蒂岡肯定會予以安排，不會有任何為難之處。ASMAE, AISS, b. 87, “Riservato,” unsigned typed report, 24 gennaio 1938.德國駐圣座大使柏爾根在報告中寫道，帕切利曾試探希特勒是否會前來拜見教宗；想要得到教宗的接見，只要“雙方達成共識，并由希特勒發表聲明，予以天主教徒和天主教會公平的對待”。柏爾根表示：“教宗肯定希望能接見元首。”但是“盡管他們多番試探”，他在報告里寫道，“我還是根據上頭的指示予以應答，并沒有讓他們疑心這場會面完全不可能發生”。DGFP, series D, vol. 1, n. 708, Bergen to Weizsäcker, May 18, 1938.后來，他又報告說，教宗期望希特勒能夠來拜見他，“并且一直堅持這份希望到最后時刻”。DGFP, series D, vol. 1, n. 708, Bergen to Weizsäcker, May 23, 1938, n. 710。

[[22]](#filepos1032749) ASMAE, AISS, b. 87, Pignatti a Regio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Germania e Santa Sede,” 21 gennaio 1938.

[[23]](#filepos1033031) 在希特勒來訪之前的最后幾周，教宗仍舊時不時地敦促領袖代表教會同希特勒協商調停解決的方案。3月16日，帕切利致信墨索里尼，告訴他教宗因為“您與德國總理希特勒先生的調解行動，以及您出手阻止宗教迫害政策在德國進一步蔓延”，而向您表示謝意。帕切利進一步說道，考慮到希特勒的來訪已經近在眼前，教宗尤其感激墨索里尼在這個時刻仍然能出面干預。ASMAE, APG, b. 46, Pacelli a Mussolini, 16 marzo 1938.帕切利這封信的手寫稿附有一定修改意見，收于ASV, AESG pos. 735, fasc. 353, f. 4r。塔基·文圖里告訴墨索里尼，當教宗聽聞墨索里尼會竭盡全力確保宗教迫害（即對天主教會的迫害）不會在奧地利重演時，他“contentissimo”（“大喜過望”）。ACS, CR, b. 68, n. 028790, 17 marzo 1938.

[[24]](#filepos1033383) 法國大使深信，如果希特勒希望得到接見，教宗就會接受這樣的請求。他的觀察指出：“對于圣座來說，有一個層面的考慮超過了其他所有層面，即納粹政府中的極端分子始終在尋找梵蒂岡與德國交惡的機會，圣座絕不能給他們這樣的借口，使得雙方的關系進一步惡化。”DDF, series 2, vol. 8, n. 41, Charles-Roux à Delbos,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26 janvier 1938.盡管墨索里尼希望希特勒能與庇護十一世會面（仿佛他能確保這一過程會進展順利），但是元首卻極不希望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德國外交部則極其狼狽地試圖解釋希特勒為什么不打算遵照傳統拜見教宗。2月中旬，新任德國外交部部長里賓特洛甫提出了一個也許派得上用場的借口：希特勒是接受意大利國王的邀請訪問羅馬，他認為“元首不應當借此機會，去一處不屬于意大利的領土，訪問另一個主權國家”。他提議，當他們使用這個借口的時候，不要使用其他人提供的另一個理由：即他們實際上并沒有從教宗那里收到邀請。“我們不建議指出目前為止我們并沒有收到任何邀請，畢竟這種借口有風險，梵蒂岡有可能因此向我們發出邀請。”DGFP, series D, vol. 1d, n. 691, “Memorandum,”，由馬肯森簽署，基于他同里賓特洛甫的對話，1938年2月14日。

[[25]](#filepos1034309) ASMAE, APSS, b. 39, Ciano a Pignatti, “Viaggio in Italia di S.E. il Cancelliere Hitler,” 26 marzo 1938, and Pignatti a Ciano, “Viaggio in Italia del Fuehrer,” 2 aprile 1938.

[[26]](#filepos1035407) ASMAE, APSS, b. 39, Pignatti a Ciano, telegramma n. 2022, 7 aprile 1938.教宗以及國務卿迫切地想要意大利的各位樞機明白，如果希特勒訪問羅馬期間沒能與教宗會面，那不是因為教宗拒絕接見他，而是因為希特勒從未提出會面的請求。希特勒抵達羅馬當天，帕切利帶著這個目的給各位樞機發去了一份消息，并隨信附了一份博爾貢吉尼的報告復本，內容是教宗大使在5月初與布法里尼的會面，表示教宗愿意接見希特勒。ASV, AESG, pos. 735, fasc. 353, ff. 26r–27r, “Circa l’omissione di una visita del Cancelliere del Reich Germanico al Santo Padre,” marked “Sub secreto pontificio,” 3 maggio 1937.盡管教宗愿意接見希特勒，但他也明確表示，只有希特勒表達出愿意遵守由他簽署的宗教事務協約的意思，庇護才會同意接見他。

[[27]](#filepos1035896) 帕切利與皮尼亞蒂的會面記錄，1938年3月25日，收于Casella 2010, pp. 210–211。

[[28]](#filepos1036122) ASMAE, AISS, b. 87, Pignatti a Ciano, 28 aprile 1938; CC 1938 II, p. 368.

[[29]](#filepos1036812) 也稱味美思酒或苦艾酒，是一種使用各種干料調制的加強葡萄酒。最初于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在意大利和法國出現。

[[30]](#filepos1036930) Confalonieri 1957, p. 372.

[[31]](#filepos1037544) Rauscher 2004, p. 241.

[[32]](#filepos1039027) Milza 2000, p. 759; Gallagher 2008, p. 71; Cerruti 1953, p. 240.美國駐意大利大使對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更為寬容，他認為國王是“一個瘦小、腿短的男人，一臉心煩意亂的表情，嘴上是豎立的髭須，盡管他其貌不揚，身上卻透露出威嚴感”。Phillips 1952, p. 192.齊亞諾（2002, pp. 86, 88–89）在日記里透露了希特勒對國王的個人觀點。齊亞諾抱怨說，國王在元首訪問過程中“一無是處，只會制造麻煩”。美國大使后來多次講述了一個傳遍羅馬城的故事（并對其真實性做出保證）：當希特勒初抵奎里納爾宮并看到自己的房間時，他詢問為自己鋪床的是一位男侍從還是一位女侍從。當他聽聞鋪床的是一位男侍從時，他堅持要求找一位女性為他重新鋪床。他絕不會在男人鋪的床上睡覺。Phillips 1952, p. 214.

[[33]](#filepos1039624) DDI, series 8, vol. 9, n. 53, Pignatti a Ciano, 5 maggio 1938.

[[34]](#filepos1040107) 近期，佛朗哥的部隊在西班牙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并在上一個月使得西班牙第二共和國一分為二，由此進一步增添了希特勒來訪的勝利氛圍。引人注目的是，恰恰是在希特勒訪問羅馬的期間，圣座正式宣布指派教宗大使，出使佛朗哥政府，而佛朗哥也在不久后派遣大使出使梵蒂岡。Kent 1986, p. 457.墨索里尼派遣軍隊幫助佛朗哥作戰的決議使得意大利犧牲了四千人。De Felice 1981, p. 465.

[[35]](#filepos1040929) 希特勒將他尷尬的處境怪罪到里賓特洛甫頭上，后者則開除了納粹的禮儀長。Kershaw 2000, p. 98.

[[36]](#filepos1041985) 美國領事還補充道，發給四位女性的晚宴邀請函被撤回，因為她們“有猶太血統，或者與猶太人交往甚密”。然而，其中一名女性“對此做出了強烈抗議，證明自己并不是猶太人[原文如此]，于是政府便不再要求她回避晚宴”。NARA, LM192, reel 5, John Putnam, U.S. consul general, Florence, to William Phillips, May 21, 1938.

[[37]](#filepos1042554) 領主廣場是意大利佛羅倫薩舊宮前的“L”形廣場，得名于舊宮。這里是佛羅倫薩共和國起源與歷史的焦點，至今仍享有該市政治中心的名聲。

[[38]](#filepos1042822) 墨索里尼是一個完全不喜歡逛博物館的人，他曾經在1922年表示，自己這輩子從來沒去過博物館。Boswell 2011, p. 201.

[[39]](#filepos1043117) Ciano 2002, p. 89.

[[40]](#filepos1043659) NARA, LM192, reel 5, William Phillips, U.S. ambassador, Rome,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Rome, “Hitler’s Visit to Italy,” 12 page report plus attachments, May 13, 1938.美國駐佛羅倫薩領事描述過在佛羅倫薩舉辦的慶祝活動，“Memorandum of Visit of Their Excellencies Adolf Hitler and Benito Mussolini, May 9, 1938,” May 18, 1938, appendix to report of John Putnam, consul general, 轉引自本章注釋34。英國的外交評估報告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FCRSE, pt. 14, R 4789/43/22, p. 93, Earl of Perth to Viscount Halifax, May 9, 1938。

[[41]](#filepos1044163) DDF, series 2, vol. 9, n. 346, Charles-Roux à Georges Bonnet, 15 mai 1938.

[[42]](#filepos1044857) CC 1938 II, pp. 376–377.

[[43]](#filepos1045842) ASV, AESG, pos. 735, fasc. 353, ff. 59r–60r, Il delegato vescovile, Curia ecclesiastica generale di Orte, alla segreteria di stato, Vaticano, 15 maggio 1938.

## 第二十二章 驚人的任務

1938年6月，時年五十八歲的美國耶穌會神父約翰·拉法奇（John Lafarge）訪問羅馬，他頗為詫異地從庇護十一世處收到消息，要求在岡多菲堡同他會面。

抵達教宗的避暑別墅之后，拉法奇被帶到中庭，教宗剛剛散完步回來。他的白色手杖擺在他身后的窗臺上。教宗告訴拉法奇，他想要跟神父談一樁種族主義的問題。教宗之所以唯獨挑選了他，是因為他最近的一本著作《跨種族正義》（Interracial Justice ）是庇護在這一話題上讀過的最上乘之作。

盡管拉法奇在梵蒂岡幾乎無籍籍名，但他在美國教會算得上是一位知識分子。他生于羅得島的紐波特（Newport），父親是一位杰出的畫家，母親則是本杰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后裔。拉法奇于1901年畢業于哈佛大學，并在四年后晉鐸。此后，他在馬里蘭州執牧師一職達十五年之久，其信徒主要是非裔美國人群體。1926年，他加入了《美國》雜志的編輯部，并于1934年成立了天主教跨種族委員會（Catholic Interracial Council），旨在幫助不同種族增進彼此的理解。三年后，他出版了那本引起教宗注意的專著。  [[1]](#_1__Jiao_Zong_Da_Gai_Shi_Tong_Gu)

當他們促膝長談時，庇護十一世委托給這位美國神父一項令人震驚的任務。他需要秘密起草一篇通諭，內容涉及教宗眼中最炙手可熱的話題：種族主義與反猶主義。希特勒上個月對羅馬進行的訪問還橫亙在他的腦海中，盡管教宗早在1937年就發表通諭譴責納粹獨尊日耳曼民族，但是他認為現如今這些言辭已遠遠不夠。當得知這位恰當的人選到訪羅馬時，他就開始醞釀一篇新的通諭。庇護告訴這位惶惑的美國人，他此行是受到了天主的派遣。

拉法奇提出了自己的擔心，他害怕不能勝任這個任務。但是教宗堅稱：“你只需把自己當作教宗，把你想說的話說出來即可。”接著他大致描述了自己想要談論的話題，并且交代了一些拉法奇應當謹記的指導原則。

教宗進一步說道：“其實在跟你談話之前，我應當先向萊多霍夫斯基神父提起這一事宜，但我想應當沒什么問題。”

然而，教宗的這番話其實并不坦誠，因為他知道耶穌會總會長并不會贊同他的觀點。教宗還將此事瞞過了帕切利樞機和全體國務院人員，此中深意更是不言自明。此外，他也沒有咨詢任何梵蒂岡的機構，而通常教宗通諭是由這些機構的專家撰寫的。

萊多霍夫斯基在周日面見教宗。當他得知教宗交給美國耶穌會士的任務后，他用英語說道：“教宗瘋了。”  [[2]](#_2__Wo_Men_Cong_Yi_Fen_Wen_Jian)

次日，萊多霍夫斯基召見了拉法奇。萊多霍夫斯基利用了這位美國人的焦慮情緒（“我真的受了驚嚇……圣彼得的巖石砸中了我的腦袋。”拉法奇向一位朋友透露道），建議派兩位更有經驗的耶穌會士協助他。

幾天后，拉法奇與這些同仁同行，一起抵達了巴黎。那年夏天，他們一直在籌備這篇后來題作《統一的人類》（Humani generis unitas ）的通諭。如果說教宗選擇拉法奇，是因為他在美國卓有成效地開展了反種族主義的工作，那么萊多霍夫斯基選擇那兩位同仁——分別是四十六歲的德國人古斯塔夫·貢德拉赫（Gustav Gundlach）和六十九歲的法國耶穌會士古斯塔夫·德比夸（Gustave Desbuquois）——則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緣由。萊多霍夫斯基認為猶太人是教會和歐洲文明的敵人，他會盡一切努力，阻止教宗抵擋當今橫掃歐洲的反猶大潮。貢德拉赫和德比夸都有起草教宗通諭的經驗，并且與梵蒂岡的關系更為密切。他們將負責約束拉法奇，畢竟后者深切地感到自己經驗不足。

古斯塔夫·貢德拉赫是羅馬宗座額我略大學的道德哲學系教授，也是耶穌會在猶太事宜上最重要的專家之一。1930年，他為權威的德國天主教神學百科全書《神學與教會詞典》（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 ）編寫了反猶主義的條目。貢德拉赫在這個條目中對兩種反猶主義進行了區分。第一種反猶主義有悖教會的教導，“只因猶太人在種族和民族方面的外族特性”而反對他們。第二種反猶主義則得到教會的支持，“因為猶太人口過度且有害的影響”而反對他們。  [[3]](#_3__Ta_Xie_Dao__Di_Yi_Zhong_Fan)

9月，三人完成初稿并寄給萊多霍夫斯基，以為他會直接將其寄給教宗，但是萊多霍夫斯基實際上將“閹割版本”寄給了恩里科·羅薩。十年前，教宗找人幫忙解釋解散“以色列之友”的原因時，找的正是如今擔任《公教文明》主管的羅薩。但現如今，庇護對猶太人的態度已經變得和羅薩大不相同。教宗找來拉法奇，正是要避過羅薩，可如今，這份通諭的初稿卻擺在了羅薩的書桌上。

盡管教宗在猶太問題上徹底改變了他的看法，但是羅薩主管的那份期刊依然大肆刊登著散播反猶流毒的文章，而庇護對此沒有做出任何管束。當時，希特勒對德國猶太人施行恐怖統治，奧地利、匈牙利、波蘭以及其他歐洲國家也紛紛引入了限制猶太人權利的法案，這份期刊（其內容在出版前須獲得梵蒂岡國務院的許可）也敦促意大利采取這種法案。1937年5月，《公教文明》刊登了一篇評論，表彰了“著名的英國天主教作家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一位臭名昭著的反猶分子）”所寫的《猶太問題與復國運動》。這篇評論開宗明義：“猶太人的支配欲以及他們在革命運動中的人數優勢，已經令他們成為破壞分子，這一事實我們有目共睹。”這份刊物以贊同的口吻表示，貝洛克將猶太人比作“一種侵入有機生命體、造成刺激和反應的異物”。耶穌會期刊的這篇文章深得喬瓦尼·普雷齊奧西（Giovanni Preziosi，著名的法西斯分子，曾經是一位神父）的賞識。長久以來，他都在向墨索里尼爭取發動反猶運動，保護意大利免受猶太人的威脅。他曾滔滔不絕地講道，《公教文明》的這篇文章“非常完美，我希望將它呈現給所有意大利人，他們被猶太黃金蒙蔽了雙眼，否認猶太危機的真實存在”。  [[4]](#_4__Zhuan_Yin_Zi_Starr_1939__p)

這份期刊滿腔熱情地支持貝洛克提出的主張，認為政府應該對猶太人進行種族隔離，將他們與廣大的基督徒人口分隔開來。  [[5]](#_5__Zhe_Fen_Ye_Su_Hui_Qi_Kan_Hou)  它控訴道，猶太人正施展“兩面手法”，控制住高端金融和共產主義，試圖煽動革命，“將全世界都收歸至猶太人的統治之下”。因為統治世界的欲望刻在了猶太人的天性里，他們永遠都不會忠于自己居住的國度。這也是他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支持共濟會和國際聯盟的原因。簡而言之，這份受到梵蒂岡監督的期刊寫道，猶太人誓要讓基督徒淪為他們的奴仆。  [[6]](#_6____You_Tai_Wen_Ti_Yu_Fu_Guo_Y)

在墨索里尼即將討伐意大利猶太人（他們將在7月受到制裁）的那幾個月里，《公教文明》用大量文章警醒人們注意猶太威脅以及引入反猶舉措的必要性，為反猶運動鋪好了道路。這份期刊還大肆贊揚了近期出版的一系列反猶著作。1938年2月，《公教文明》的一篇文章糾正了《以色列的面具之下》作者吉諾·索托基耶薩（Gino Sottochiesa，據稱他具有“堅定的天主教信仰”）的錯誤印象，后者認為《公教文明》在應對猶太威脅時，始終呼吁“寬容，幫助猶太人皈依基督教”；實際上，這份期刊長久以來一直敦促政府采取對付猶太人的保護性措施。  [[7]](#_7__CC_1938_I__p__460_Ci_Yue)

《公教文明》絕不形單影只。在反猶運動發起前的那幾個月里，許多意大利天主教媒體都敦促政府采取行動。《教士之友》（L’Amico del clero ）的影響力尤為巨大，因為它是意大利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全國協會的官方出版物，這一組織的成員包含兩萬名神父。

1938年春，納扎雷諾·奧蘭迪（Nazareno Orlandi）蒙席的文章《猶太人也入侵了意大利》，也同樣在開篇否認了自己的反猶傾向：“我們不是反猶分子，基督徒絕不會是反猶分子。”蒙席繼續解釋道，盡管我們必須拒斥納粹以血統純潔論為根據的反猶“種族主義”，但是“防御性的反猶主義”不僅具有合法性，而且在抵擋“猶太人入侵政治、經濟、新聞、影院、道德以及所有公共生活領域時”是非常必要的。多虧了政府的警覺性，意大利的狀況不像其他地方那么糟糕，“但是毫無疑問，我們手頭一些執掌大局的職位仍然落到了猶太人手里，他們只要抓住機會，可能就會將他們在其他國家施行的惡移植到我們國家來”。盡管我們手頭資料有限，無法確切知道在那幾個月里，數百萬參加周日彌撒的意大利人到底從布道壇上習得了什么樣的觀點，盡管這方面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但如果神父沒有將這番可怕的警示重新包裝并兜售給他們，那么這結論就會令我們大為驚訝。  [[8]](#_8__Ao_Lan_Di_Meng_Xi_De_Wen_Zha)

7月中旬，當拉法奇及其同仁在巴黎秘密起草通諭時，《公教文明》又刊登了一篇熱情洋溢的長文，談論匈牙利最近制定的反猶法律。這份期刊解釋道：“盡管匈牙利猶太人并沒有任何機構負責系統地組織集體活動，但是該民族出于本能且遏制不住的團結就足以使他們奔赴共同的事業，實行他們統治世界的顛覆性渴望。”匈牙利天主教徒的反猶主義并非“粗鄙盲信”的行為，更不是“種族主義”，而是“一種保衛民族傳統、保衛真正的自由、保衛匈牙利人民獨立自主的運動”。  [[9]](#_9__Ma_Li_Ao__Ba_Er_Bei_La____Xi)

\* \* \* \* \*

7月14日，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日報》（意大利最重要的報紙之一）上發表了一份種族聲明，發起了意大利的反猶運動。這篇在墨索里尼指導下撰寫的《種族科學家宣言》（Manifesto of Racial Scientists）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其作者是一位年方二十五歲、無人知曉的人類學家圭多·蘭德拉（Guido Landra），但文章得到了許多意大利學者的簽名，有的聲名顯赫，有的默默無聞。  [[10]](#_10__Maiocchi_2003__Bottai_2001)  該文提出了法西斯政府的新版種族理論。它表示，意大利人的“祖先是雅利安人，其文明屬于雅利安文明”，“純潔的意大利種族確確實實存在”。它甚至令人難堪地宣布，意大利人是時候“坦言自己是種族主義者了，這屆政府目前為止所做的一切，本質上都是種族主義行為”。它一邊解釋道，“意大利的種族主義問題應該僅僅從生物學的角度去看待”，一邊又語無倫次地補充，“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意大利將把德國的種族主義納入自身的理論體系”。  [[11]](#_11__Zai_7Yue_18Ri_De_Yi_Chang_W)

墨索里尼為什么要對意大利猶太人發起進攻，歷史學家們對此爭論不休。多年以來，猶太女人瑪格麗塔·薩爾法蒂一直都是受他信任的參謀兼情人。  [[12]](#_12__Cannistraro_and_Sullivan_19)  墨索里尼的好幾位家庭醫生也是猶太人，并且在宣布“種族運動”之后，他還不得不另找了一位牙醫。  [[13]](#_13__Festorazzi_2010__p__96__Nav)  況且，此前他也從未將納粹的種族優越性當真。1932年，在接受埃米爾·路德維希的采訪時，他曾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我絕不相信當今的世界上存在什么純潔的種族。”  [[14]](#_14__Ludwig_1933__pp__69_70_Zai)

對于許多歷史學家而言，墨索里尼發起運動的時機（希特勒訪問羅馬的兩個月后）絕非偶然事件。他們認為，希特勒在訪問期間告訴墨索里尼，如果領袖真的想要令雙方更為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他就應該排除兩國之間最為顯著的區別，即向猶太人宣戰。時任意大利駐英國大使的迪諾·格蘭迪對此做出了描述。在這番重構中，希特勒還試圖拉攏墨索里尼，加入對抗天主教會的戰斗，領袖拒絕了這一要求，但同意跟從納粹黨發動反猶運動。  [[15]](#_15__Grandi_1985__pp__443_444_Ra)

我們有理由質疑格蘭迪的描述，尤其是因為這本書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當時的格蘭迪（他從來不贊成意大利同納粹結盟）急于將法西斯做過的壞事都怪罪到納粹頭上，但這并不意味著墨索里尼發動反猶運動的時機和希特勒的訪問就沒有關系。墨索里尼急于討好納粹領導人，他定然認為將矛頭對準意大利猶太人，最能討德國人開心。  [[16]](#_16__Xu_Duo_Zhu_Zuo_Tan_Tao_Guo)

《公教文明》7月末轉載了《種族科學家宣言》，并欣慰地接受了其中關于意大利人的種族主義應當具有“強烈的意大利特色”的言論。然而這份期刊仍然有所擔憂，它擔心這份宣言的主張有所含糊。有些人也許會認為它支持血統崇拜，這是納粹秉持的觀念，與天主教會關于人具有普遍性的教導相悖。此外，宣言還稱“猶太人不屬于意大利民族”，這份期刊對此不置可否。  [[17]](#_17__CC_1938_III__pp__275_278)  《羅馬觀察報》在報道這一新聞時引用了其中的詞句，但沒有對其提出任何批評。與此同時，許多報紙都部分或全文轉載了《公教文明》一位筆桿子于7月17日發表的一篇文章，集體對宣言做出了正面評價。  [[18]](#_18__Zhe_Wei___Gong_Jiao_Wen_Min)  意大利最大的天主教日報《意大利未來報》便是其中之一。四天后，該報主編雷蒙多·曼齊尼（Raimondo Manzini）刊文表達了他對“意大利種族主義”的支持。此后，曼齊尼還將擔任《羅馬觀察報》主編達十八年之久。  [[19]](#_19____Fa_Xi_Si_Zhu_Yi_Yu_Zhong)

7月14日晚7點15分，宣言僅僅發表一個小時之后，納粹黨報紙《人民觀察家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 ）的羅馬記者便將這一激動人心的消息發回德國。“發布這番種族問題宣言后，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在這一方面緊密聯合。從今往后，”這位德國記者激動地說道，“一億四千萬人將持有相同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觀）。”  [[20]](#_20__Zheng_Fu_De_Qie_Ting_Qi_Bu)  次日，德國報紙以高度贊許的口吻報道了這一新聞，它們相信意大利很快就會效仿納粹的榜樣，頒布本國的反猶法案。  [[21]](#_21__De_Guo_Mei_Ti_Dui_Yi_Da_Li)

在大量幕后工作之后，反猶運動來勢洶洶。墨索里尼對其密切關注，并將這項任務交代給負責政府宣傳的大眾文化部。那些贊同法西斯觀念的大學教授，都受邀為這一運動背書。圖書館開始整理種族主義文獻，而一份包含兩萬張種族主義照片的檔案也在緊鑼密鼓的規劃之中。政府召集了一群法西斯學者，撰文談論不同種族的實質，意在籠絡廣大民眾。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舉措便是創辦了一份全新的配圖通俗雜志，這份叫作《捍衛種族》（La difesa della razza ）的雜志大肆宣揚了種族主義理論。  [[22]](#_22__ACS__MCPG__b__151__ministro)

墨索里尼也許總算聽取了各位教宗信使（尤其是塔基·文圖里神父）反復提出的警示，才放手對付危險的猶太威脅，但是教宗本人并沒有任何擔心猶太威脅的表現，納粹黨人的威脅才是他的心頭大患。

領袖這般迎合德國的種族主義，有理由擔心教宗會反對他，但也有理由相信，他有辦法讓教宗對此緘口不言。他認為，如果他能堅定自身立場，并且讓意大利的種族主義區別于納粹，那么教宗最終會做出讓步。種族宣言里的文字游戲便是出于這番緣由，墨索里尼試圖讓法西斯種族主義與納粹種族主義涇渭分明。此外，這種差異性之所以對墨索里尼而言非常重要，還因為他最憎恨別人說他模仿希特勒。

墨索里尼同樣明白，雖則教宗反對德國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但對于限制猶太人權利的國家政策，他的態度就沒有那么鮮明了。事實上，領袖也確實在利用教會對猶太威脅的警示，激發大眾支持他的反猶運動。

最關鍵的是，墨索里尼清楚教宗很依賴他，得靠他為教會爭取福利。其中一些福利（比如讓墨索里尼代表教會對希特勒施加影響）關涉重大，其他福利（例如依靠政府禁止那些教宗認為冒犯教會的圖書出版）盡管相對次要，卻仍然舉足輕重。當時的一個案例仍然令教宗感覺歷歷在目。

5月下旬，庇護得知，切薩雷·波吉亞（Cesare Borgia）的新版傳記將以廉價的多卷插圖本形式在報刊亭面世。當時的梵蒂岡并不希望深究波吉亞的話題。波吉亞生于1475年，十八歲便晉升樞機，其父乃是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波吉亞在二十多歲時放棄了樞機帽，成為了軍事領袖。他與妻子育有兩個孩子，并同其他女人生下了許多私生子女。  [[23]](#_23__You_Qu_De_Shi__Dang_Ai_Mi_E)  教宗帶話給齊亞諾，要求將這一傳記全部銷毀。  [[24]](#_24__Jiao_Zong_Tong_Guo_Pa_Qie_L)



加萊亞佐·齊亞諾

墨索里尼的女婿于是對這本由報亭寄售的圖書下了禁令。政府只允許傳記以單卷本的形式出版發行，其厚重的形式將大幅度減少潛在讀者的數量。  [[25]](#_25__ASV__ANI__pos__47__fasc__2)  但是梵蒂岡很快便獲知，盡管齊亞諾已經下達一紙禁令，但本書的通俗多卷本依然在售。在教宗的指示下，博爾貢吉尼大使于6月13日再度約見了齊亞諾。

發現自己的禁令不過是一紙空文時，齊亞諾怒不可遏，他拿起電話打給大眾文化部的二把手（一把手當時正因公出差）。

“里佐利（Angelo Rizzoli，傳記出版商），”齊亞諾告訴他，“是你能想象的最反意大利、最反法西斯、最反天主教的人。”他控訴道，這本書“不過是聳人聽聞的無端猜測，出自猶太人的陰謀”。博爾貢吉尼早先已經向齊亞諾指出，這本傳記的作者古斯塔夫·薩切爾多特（Gustave Sacerdote）就是猶太人。里佐利必須被教訓一頓。“制服他，用你的膝蓋頂住他的喉嚨，”齊亞諾指示道，“用耳光扇得他找不著北，讓他永遠都忘不了這頓教訓。”  [[26]](#_26__ASV__ANI__pos__47__fasc__2)

這次會面一周后，齊亞諾通知大使，不僅切薩雷·波爾吉的通俗多卷本傳記已經被禁，整本書都已經被封停。又過了一周，帕切利樞機去信表達了謝意。  [[27]](#_27__Pa_Qie_Li_Zai_Ji_Gei_Bo_Er)

\* \* \* \* \*

在阿契爾·斯塔拉切的高壓手段下，墨索里尼的反猶運動全面展現了政府的鐵腕。6月30日至7月2日，獨裁者主持了一場高調的運動會，旨在展示法西斯黨領導層的剛強與大無畏精神。各省黨魁應召來到羅馬，參加了一系列“競賽”。這些競賽或滑稽（肥碩的法西斯首領嘗試跳過木馬）或危險（他們還要跳過一排排豎立的刺刀）。美國大使描述了這場怪異的盛會，提及墨索里尼觀看“兩名參賽選手在刺刀陣上落敗，導致了令人不適的后果”。意大利報紙的新聞都配上了一副阿契爾·斯塔拉切的照片，畫面上英勇的他帶頭跳過了火圈。  [[28]](#_28__NARA__M1423__reel_1__n__991)

當時，墨索里尼遭遇了一樁令他不快的私事，多少分散了他對意大利霸業的規劃。克拉拉·佩塔奇變得越來越容易吃醋。她的疑心有著非常確鑿的理由，因為即便在她暫住威尼斯宮公寓的那段時間里，墨索里尼依然同一些老情人幽會。佩塔奇大發脾氣；為了安撫她，墨索里尼每天要給她打好多個電話。7月的多數日子里，他每天要在上午九十點鐘同她偷偷溜到奧斯蒂亞的海灘游玩，并在下午三四點鐘返回。  [[29]](#_29__Petacci_2010__pp__131__370)

這段時間里，領袖安排女婿來處理種族主義運動所引發的余波。7月20日，他派遣意大利大使皮尼亞蒂去梵蒂岡試探教宗的反應，因為僅僅兩天前，教宗向一群修女發表講話時，又一次悲嘆“過分的民族主義”。

皮尼亞蒂詢問帕切利樞機：“教宗是否真的要采取行動，與皇室政府規劃的反猶運動相抗衡？”

帕切利對此不置可否：他表示自己并未聽到教宗有反對這一事宜的安排。帕切利本人不會反對反猶運動。

那么當教宗談及“過分的民族主義”時，他到底有何指涉？皮尼亞蒂問道。他指出，人們會認為，這樣的評論是在批判新近的種族政策。

帕切利立即向他保證，教宗絕對沒有這樣的意圖，他的這番話主要是針對國外的天主教徒，提醒他們與本國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保持距離。

皮尼亞蒂表示，天主教教條必須承認不同種族的存在。

帕切利樞機跟他繞起了圈子。他表示，教會法規對此非常明確：受洗之人即是天主教徒。無論墨索里尼采取怎樣的反猶政策，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必須將斗爭對象局限于那些真正的猶太人。  [[30]](#_30__Pa_Qie_Li_You_Qi_Gao_Su_Pi)

六天后，皮尼亞蒂前往岡多菲堡拜見教宗，直接與他討論種族運動的問題。教宗盡管顯得更為瘦削，但已恢復了大半體力。他仍然穿著橡皮襪，用來遏制腿部的疼痛，但已經不再需要每日按摩了。每天上午，他的私人醫生會驅車從羅馬趕來，為他檢查身體狀況，但醫生覺得已經不需要像去年夏天那樣，夜夜守候在教宗身邊。長壽的希望破滅之后，如今的教宗只想死在辦公桌上。  [[31]](#_31__ASMAE__APSS__b__40__Pignatt)

皮尼亞蒂對這次會面十分滿意。他溫和地向教宗提出異議，表示庇護不應該用“過分的民族主義”這一措辭，因為它會遭人誤解。而教宗的回答與帕切利如出一轍：他指的并不是意大利。

教宗也有事要抱怨。他收到了許多令人不安的報告，這些報告表明，意大利政府給意大利北非地區的新教徒以特權待遇。他告訴皮尼亞蒂，此舉不僅有害于天主教會，也有害于意大利，因為這些新教徒都是英國安插在北非的特務。  [[32]](#_32__DDI__series_8__vol__9__n__3)  此外，公教進行會近來被控涉足政治，教宗對此也表示了關心。“我每天都向天主禱告，”教宗說道，“祈求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對公教進行會下手。”他進一步說道：“只要放過公教進行會，教宗什么都答應你們。”  [[33]](#_33__DDI__series_8__vol__9__n__3)

會面一周后，教宗不顧皮尼亞蒂的警告，又對“過分的民族主義”發起了口頭攻擊。在向羅馬宗座傳信大學（Colleg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Faith）的兩百名學生發表講話時，他將批判又推進了一步。他告訴所有學生，人類只有一個種族；進而，他又說出了一番會激怒墨索里尼的話：“也許人們會問，意大利怎么會如此不幸，竟然想要模仿德國。”  [[34]](#_34___La_parola_del_Sommo_Pontef)

然而這還不是教宗這番講話的最強音，他把它留給了心愛的公教進行會。“我警告你，”教宗明顯是在對墨索里尼說話，“不要討伐公教進行會，我這么祈求是為了你好，因為討伐公教進行會就是討伐教宗，而討伐教宗的人必將滅亡。”

這番演講徹底激怒了墨索里尼，最令他生氣的莫過于指控他對希特勒亦步亦趨。領袖于是下達一條命令，任何意大利報紙都不得刊登教宗的演講。  [[35]](#_35__ASV__AESI__pos__1054__fasc)  齊亞諾告訴博爾貢吉尼大使，如果教宗繼續發動這樣的攻擊，將令雙方的關系徹底破裂。“我向博爾貢吉尼明確了我的意思，”齊亞諾回憶道，“我解釋了我方種族主義的承諾與目標。”大使又一次試圖替教宗的言論開脫。庇護只是想確保意大利種族主義能夠嚴守恰當的界限。齊亞諾對此感到滿意：“在我看來，博爾貢吉尼與我們達成了共識。并且他透露，自己便具有非常強烈的反猶傾向。”  [[36]](#_36__Ciano_2002__p__113__July_30)

7月31日，意大利大使前來與帕切利樞機會面，對教宗最近的發言提出抗議。教宗不可以繼續這樣批評政府，領袖希望教會能繼續與政府維持富有成效的合作關系。帕切利承諾會將墨索里尼的關切轉達給教宗。皮尼亞蒂認為帕切利是自己這邊的盟友，但他懷疑教宗不會理會這些建議。  [[37]](#_37__ASMAE__AISS__b__115__Pignat)



博尼法喬·皮尼亞蒂大使（右）與加萊亞佐·齊亞諾，1939年5月

“有時候，合作是非常困難的。”后來，當帕切利解釋自己同庇護十一世的關系時，這么告訴巴黎大主教韋迪耶樞機。教宗聽不進任何人的建議，即便那個人是國務卿（至少在帕切利看來是這樣）。“可憐了我深情款款的天性，”帕切利透露道，“但我也明白他對我是有愛的，這種想法予以我安慰。”后來他又給韋迪耶舉了一個例子，說明兩者之間的關系有時會多么緊張。有一次，他被這種感受所吞沒，毫無意識并且“近乎大力地”用拳頭敲起了教宗的書桌。他沒法繼續擔任國務卿了，他告訴教宗。“這份工作令我不滿，我承受的實在太多了。”

“教宗冷冷地看著我，然后緩慢地說了那幾句我永遠無法忘懷的話語，”帕切利回憶道，“‘我們眼前只有一項任務，那就是你和我，一起施行善的事業！’”帕切利深受感動：“多么高尚的回答！我精神的孱弱令我羞愧難當，我跪倒在教宗的足邊，請求他的原諒。圣父深情款款地將我扶起來，并且擁抱了我。”“這是多么感人的場景！”韋迪耶一邊在腦海中構建場景，一邊感慨道，“多么溫馨的畫面！”  [[38]](#_38__Zhuan_Yin_Zi_Papin_1977__p)

皮尼亞蒂擔心教宗會阻礙反猶運動的進行，他轉而尋求另一個人的幫助。8月4日，他來到南部的索倫托（Sorrento）半島，萊多霍夫斯基神父正在一處耶穌會士住所養病。“我前去會見耶穌會總會長，”皮尼亞蒂后來解釋道，“因為在過去……他從不向我隱瞞他對猶太人的刻骨仇恨，他認為猶太人是困擾歐洲的所有邪惡的根源。”

大使發現萊多霍夫斯基對猶太問題有著清醒的認識，并且非常贊同皮尼亞蒂的事業。他表示，“羅薩神父曾告訴我，教宗對此一無所知”，他的病痛奪走了他的思考能力，“盡管非常可怕，但事實就是如此”。教宗生病期間，他曾向天主禱告，讓祂收回他的靈魂，然而“天主并沒有回應他的祈禱，由此引發的結果便是，教會如今正經歷一場深重的危機”。庇護“沒有理性，也不會聽從任何理性的建議”。帕切利樞機已經不知所措了，“教宗不再像過去那樣，還能聽得進他的建言。他有很多計劃都背著帕切利，而且也不再提前告知他的演講內容”。

萊多霍夫斯基表示，教宗身邊的人都在擔驚受怕，要是教宗的病情進一步惡化，真不知道還會發生什么事情。  [[39]](#_39___Gen_Ju_Wo_De_Ji_Yi___Lai_D)  他敦促大使展開行動，不要讓教會與法西斯政權的良好關系成為教宗胡言亂語的犧牲品。

皮尼亞蒂說道，他們無法忽視教宗的胡言亂語，因為國外媒體（尤其是法國媒體）都在利用他的話語，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都在傾聽這些話語，“卻不知道這位所有信徒的神父已經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教宗的話語“使得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仇視意大利的狂潮，使得我國無論在道德上還是物質上都遭受了損害”。

萊多霍夫斯基表示贊同。危機已經若隱若現。在請求大使為他保密之后，他透露道：“危機已然如此深重，我們必須找出解決方案。”  [[40]](#_40__ASMAE__Gab__b__1186__Pignat)

耶穌會總會長腦海里的“解決方案”到底是什么，我們并不清楚。但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會竭盡所能地阻止教宗批評法西斯種族政策，阻止他冒犯納粹黨，也阻止他給予猶太人任何希望。

[[1]](#filepos1066425) 教宗大概是通過《公教文明》的書評獲知了它的內容：M.巴爾貝拉，《“種族”之間的正義》，CC 1937 IV, pp. 531–538。1932年，《羅馬觀察報》也曾刊登一篇文章，談到拉法奇在《美國》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內容是共產黨人試圖向非裔美國人拋出橄欖枝：《成為共產主義黑人？》，OR, 5 giugno 1932, p. 4。有關他家庭的詳細信息參見Eisner 2013。

[[2]](#filepos1068185) 我們從一份文件中得知了耶穌會總會長的反應，收于未經整理的《公教文明》檔案，轉引自Sale 2009, p. 37。

[[3]](#filepos1070167) 他寫道，第一種反猶主義不符合基督教教義，因為它基于種族有別的觀念。與之相反的是，“第二種反猶主義用道德和法律的手段反對猶太人口在經濟、政治、舞臺、影院、媒體、科學和藝術領域造成真正有害的影響，這種反猶主義是得到容許的”。貢德拉赫認為，最危險的就是那些吸納了自由主義思想的猶太人，“因為他們大多有道德虛無主義的傾向，切斷了任何民族與宗教的紐帶，他們通過世界富豪財團和國際共產主義運作活動，由此將那些被祖國放逐的猶太人的陰暗品質釋放出來”。仁慈的教會一向反對對猶太人進行不公的迫害，但長久以來也支持那些保護歐洲免受猶太人有害的經濟影響和知識影響的舉措。英語譯文收于Passelecq and Suchecky 1997, pp. 47–49。本文有關拉法奇與教宗以及萊多霍夫斯基會面的描述便是基于帕斯萊克和蘇凱奇的出色研究。另參見Eisner 2013。

[[4]](#filepos1072302) 轉引自Starr 1939, p. 118。5月27日，都靈的《新聞報》也刊登了一篇反猶文章，提醒人們注意猶太人帶來的威脅，它從貝洛克的著作中引用了同樣的文字：《數量與金錢》，《新聞報》，1937年5月27日，第1版。

[[5]](#filepos1072610) 這份耶穌會期刊后來還討論了一本近期出版的重要圖書：《以色列，它的過去，它的將來》（Israel, son passé, son avenir ），作者是著名的荷蘭天主教徒赫爾曼·德·弗里斯（Herrmann De Vries）。在被放逐之后，德·弗里斯寫道，猶太人已經經歷了五個歷史時期，不斷重復著他們既往的歷史，被一個國家掃地出門，逃離到另一個國家去。一開始，猶太人受到歡迎；然后人們對他們只剩下忍耐。在第三個歷史時期，他們變得十分富有，激發了人們的嫉妒心理。這使得大眾都要出來反對他們，也就導向了第五個歷史時期：人們試圖消滅他們，或者將他們徹底趕走。

[[6]](#filepos1073198) 《猶太問題與復國運動》，CC 1937 II, pp. 418–431。

[[7]](#filepos1074064) CC 1938 I, p. 460.次月，《公教文明》再度重復了它的警示，認為猶太人有統治世界的意圖。它將古往今來的猶太教做了比對，早期猶太教曾催生了基督教，而當今的猶太教“實際上是一門爛到骨子里的宗教”。它告訴讀者，“對金錢和統治世界政治的致命狂熱……是使得猶太教成為騷亂的源泉，并永遠威脅著世界的真正深層原因”。防御性舉措十分有必要。最佳路徑便是遵從歷任教宗的傳統辦法，將寬容與“謹慎且適當的舉措（即適用于我們時代的種族隔離形式）結合起來”。次月，這份刊物又提醒讀者，“每一次，猶太人都是自招禍殃，他們太過頻繁地濫用權力，憎恨耶穌、基督教以及他的天主教會，人們對他們的厭惡再正當不過了”。《非天主教徒論“現代種族理論”》，CC 1938 III, pp. 62–71，引自p. 68。

[[8]](#filepos1075743) 奧蘭迪蒙席的文章《猶太人也入侵了意大利》（《教士之友》，vol. 20, no. 3, 1938）主要轉引自Miccoli 1988, p. 866。

[[9]](#filepos1076523) 馬里奧·巴爾貝拉，《匈牙利猶太問題》，CC 1938 III, pp. 146–153。1938年4月12日，教宗駐布達佩斯大使就新法律一事，給帕切利發來了一份報告；這一新法律規定猶太人在金融、商業以及專業領域只能占有固定的份額。有一件事情令他十分擔憂，他寫道，那些在1919年之后受洗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以及他們一出生就受洗的孩子，也受到了和普通猶太人一樣的對待。大學學生協會（匈牙利的天主教大學學生幾乎都屬于這個團體）還在次要法規上補充了一個條款，它“并不會無條件地將受洗的猶太人及其后代看作是匈牙利人”。5月初，帕切利在給這位大使的回信中表示自己對此也十分擔憂：“普羅大眾似乎認為，1919年之后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用心不誠，這一現象在我看來十分奇怪且武斷，與匈牙利人民的寬宏大量形成了強烈反差。”帕切利最后寫道：“我們尤其希望，在保護馬扎爾民族正當利益的同時，政府不應當墮落到對猶太人動用如此過分的措施，在同樣的情況下，匈牙利天主教徒則在這一事宜上表現出理性的節制。”ASV, AESU, b. 77, fasc. 57, ff. 6r–9v, Angelo Rotta, nunzio, a Pacelli, Budapest, 12 aprile 1938；ASV, AESU, b. 77, fasc. 57, ff. 10r–10v, Pacelli a Rotta, 8 maggio 1938。

[[10]](#filepos1077225) Maiocchi 2003; Bottai 2001, p. 125; Gillette 2001, 2002a, 2002b.

[[11]](#filepos1077943) 在7月18日的一場外交晚宴上，博塔伊（2001, p. 125）向墨索里尼提起了宣言的話題，后者大發感慨地解釋道：“總有人說我們這個誕生過但丁（Dante）、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拉斐爾（Raffaello）、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的種族，祖先是非洲人，這種話我已經受夠了。”

[[12]](#filepos1078284) Cannistraro and Sullivan 1993, pp. 218–219.最杰出的墨索里尼法語傳記作者認為，墨索里尼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轉變觀念，支持由年輕的退伍軍人發動民族主義革命，薩爾法蒂乃是背后影響力最大的人。當他剛剛擔任意大利總理時，她令墨索里尼相信自己將成為意大利的第二位愷撒大帝。Milza 2000, pp. 257, 354. 關于薩爾法蒂對墨索里尼的影響，另參見Urso 2003。

[[13]](#filepos1078534) Festorazzi 2010, p. 96; Navarra 2004, p. 68.

[[14]](#filepos1078871) Ludwig 1933, pp. 69–70.在墨索里尼于1937年9月訪問德國，并且與元首的盟友關系更加堅固之后，意大利猶太人開始擔心，他可能會模仿希特勒的反猶運動。許多猶太人給齊亞諾寄去了言辭激動的請求信，后者則寫道，德國人從來沒有向他提出過同樣的問題。“我也不認為在意大利發動反猶運動能夠給我們帶來好處。意大利并不存在猶太問題。他們人數稀少，而且除了個別例外，他們都是善良的人。”Ciano 2002, p. 32.遲至1938年2月，墨索里尼仍然給意大利外交部部長寫過字條，否認政府在策劃反猶運動。DDI, series 8, vol. 8, n. 162, “Nota n. 14 dell’informazione diplomatica,” 16 febbraio 1938.

[[15]](#filepos1079596) Grandi 1985, pp. 443–444.然而勞舍爾（2004, p. 225）斷言，早在1937年，當墨索里尼訪問德國時，他就告訴希特勒，自己打算在意大利引入反猶措施。

[[16]](#filepos1080190) 許多著作探討過墨索里尼為何在1938年發動反猶運動的問題。法布雷（2005）認為，墨索里尼是個從一而終的反猶分子。然而德·費利切（1981, pp. 312–313）認為，墨索里尼從來都不是一個反猶分子；只因埃塞爾比亞戰爭，他才終于相信一場針對他的國際猶太陰謀正在醞釀之中。于是他就走上了反猶政客的道路。關于其他觀點，參見Israel 2010, pp. 159–170; Matard Bonucci 2008; and Vivarelli 2009, p. 748。

[[17]](#filepos1080830) CC 1938 III, pp. 275–278.

[[18]](#filepos1081215) 這位《公教文明》的筆桿子是安杰洛·布魯庫萊里（Angelo Brucculeri）神父。許多天主教出版物都轉載了布魯庫萊里贊美新種族政策的文章，其中便有威尼斯主教管區的《宗教周刊》（La Settimana religiosa ）。Perin 2011, pp. 200–201.

[[19]](#filepos1081612) 《法西斯主義與種族問題》，OR, 16 luglio 1938, p. 2。關于布魯庫萊里的文章，參見Miccoli 1988, p. 871。曼齊尼在1960年至1978年間擔任《羅馬觀察報》主編；De Cesaris 2010, p. 139。羅馬天主教對反猶主義的接納引發了熱烈的爭論。許多人試圖在教會以宗教為基礎的“反猶主義”和以種族為基礎、并導致種族屠殺的“反猶主義”之間劃出一條分明的界限；我在Kertzer 2001中涉及了這一爭論。《公教文明》以及其他天主教媒體在那些年間通常將猶太人稱作一個“種族”。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1938年復活節的主教信中，威尼斯大主教阿德奧達托·喬瓦尼·皮亞扎樞機便將猶太人稱作是一個“種族”，這一集體應當為謀害耶穌負責。他聲稱，被詛咒的猶太人只能在世界上流浪，“他們涉身最陰暗的派系之中，從共濟會到布爾什維克黨”。轉引自Perin 2011, pp. 216–217。

[[20]](#filepos1082193) 政府的竊聽器捕捉到這段通話內容。ACS, MCPG, b. 166, wiretap n. 5102, Roma, 14 luglio 1938. 對話采用的語言是德語。

[[21]](#filepos1082464) 德國媒體對意大利種族運動予以熱情的報道，其中幾例被收入報告，送到了圣座的辦公桌上，參見ASMAE, AISS, b. 102, “Servizio speciale,” Monaco, 15 luglio 1938。

[[22]](#filepos1083267) ACS, MCPG, b. 151, ministro di cultura popolare a Mussolini, 19 luglio 1938.

[[23]](#filepos1085427) 有趣的是，當埃米爾·路德維希在1933年近距離見到墨索里尼時，他認為領袖與波吉亞十分相像：“現在他面對著我坐在桌子對面。傭兵隊長切薩雷·波吉亞（這位羅馬涅英雄，我曾刻畫過他在羅馬宮殿里的形象）仿佛起死回生，盡管身穿一套深色日常西裝，打著黑色的領帶。Ludwig 1933, p. 23.

[[24]](#filepos1085605) 教宗通過帕切利向博爾貢吉尼傳達了這一指令。波吉亞教宗曾是梵蒂岡嚴格審查的話題。1934年，教宗得知一部名為《卡特琳娜·斯福爾扎》（Caterina Sforza ）的戲劇描繪了亞歷山大六世的所有墮落行為，并即將于4月在羅馬上演，于是他派遣塔基·文圖里阻止這部劇的上演。政府讓劇作者將第一幕徹底刪除，并大幅修改了其他冒犯教會的內容。ASV, AESI, pos. 855, fasc. 549, ff. 4r–24r.

[[25]](#filepos1086160) ASV, ANI, pos. 47, fasc. 2, ff. 124r–129r.

[[26]](#filepos1087281) ASV, ANI, pos. 47, fasc. 2, ff. 132r–134r, Tacchi Venturi a Tardini, 15 giugno 1938。

[[27]](#filepos1087628) 帕切利在寄給博爾貢吉尼的信中，表示自己聽聞這一消息非常高興。ASV, ANI, pos. 47, fasc. 2, ff. 135r–136r, Pacelli a Borgongini, 22 giugno 1938.公教進行會繼續在向警方報告為教會所不喜的圖書、雜志、戲劇和電影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一全國組織給主教管區的道德秘書處發放了詳細的指示，指導他們組織線人網絡，確保那些冒犯教會的作品無法逃過警方的注意。ASV, AESI, pos. 773, fasc. 356, ff. 104r–115r.至于出版商里佐利則幸存了下來，創立了一個集出版與書店于一體的帝國，并在戰后繼續同梵蒂岡作對。1960年，它出品了一部由費德里科·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執導的電影《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 ），受到了《羅馬觀察報》的指摘，一開始還在意大利受到審查。

[[28]](#filepos1088554) NARA, M1423, reel 1, n. 991, William Phillip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Physical Fitness Tests for High Fascist Party Officials,” July 7, 1938.

[[29]](#filepos1089238) Petacci 2010, pp. 131, 370.

[[30]](#filepos1090801) 帕切利尤其告訴皮尼亞蒂，如果一位天主教徒與一位從猶太教皈依天主教的信徒結婚，他們的婚姻不應受到阻攔。帕切利有理由擔心這方面的問題，因為1935年的《紐倫堡法案》便在德國出臺了這樣的規定。帕切利引述了宗教事務協約的條款，它規定教會婚姻與民事婚姻一樣有效，他還提醒齊亞諾，“教會法規認可受洗雙方婚姻的合法性（教會法規1012），而無須考慮任何其他因素”。ASMAE, AISS, b. 102, Pignatti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20 luglio 1938.

[[31]](#filepos1091449) ASMAE, APSS, b. 40, Pignatti, “Notizie sulla salute del Pontefice,” telespresso n. 1818/678, 11 luglio 1938.普奇關于教宗健康狀況的描述基于他同杰梅利神父的談話，后者近來拜訪過教宗。

[[32]](#filepos1092177) DDI, series 8, vol. 9, n. 336, Pignatti a Ciano, 26 luglio 1938.

[[33]](#filepos1092577) DDI, series 8, vol. 9, n. 337, Pignatti a Ciano, 26 luglio 1938。

[[34]](#filepos1093174) “La parola del Sommo Pontefice Pio XI agli alunni del Collegio di Propaganda Fide,” OR, 20 luglio 1938, p. 1, republished in CC 1938 III, pp. 371–376.

[[35]](#filepos1093857)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2, f. 19r.

[[36]](#filepos1094494) Ciano 2002, p. 113 (July 30, 1938).博爾貢吉尼告訴意大利駐圣座大使，教會從來都反對跨種族婚姻，認為“混血兒結合了兩個種族的缺點”。至于反猶運動，教宗并不擔心政府以后會對付真正的猶太人，卻擔心意大利可能會遵從德國的做法，不加任何區別地把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也僅當作猶太人來對待。皮尼亞蒂沒有做出直接回應，只是向教宗大使保證，意大利的種族運動與納粹德國不同。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8, ff. 46r–48r, Borgongini a Pacelli, 2 agosto 1938.次日，博爾貢吉尼將這一對話直接轉述給教宗。

[[37]](#filepos1095013) ASMAE, AISS, b. 115, Pignatti a Ciano, 31 luglio 1938.

[[38]](#filepos1096735) 轉引自Papin 1977, p. 62。

[[39]](#filepos1098252) “根據我的記憶，”萊多霍夫斯基寫道，“從來沒有哪位教宗像他這樣失去理性。”ASMAE, Gab. b. 1186, Pignatti a Ciano, 5 agosto 1938.

[[40]](#filepos1099139) ASMAE, Gab. b. 1186, Pignatti a Ciano, 5 agosto 1938.

## 第二十三章 秘密協議

1938年7月，四萬名奧地利猶太人被集合起來，關進了“保護性監禁區”。法國重申要保衛捷克斯洛伐克，不允許德國進犯分毫。德國人的回應方式則是班師法國邊境，很快舉行了一場全面的軍事動員。

8月初，在這輪奔向戰爭的恐怖事態中，意大利政府根據其種族宣言，頒布了一系列種族法案。第一條法案禁止所有出生在國外的猶太人在意大利上學。《公教文明》將這一措施告知其讀者，并且刊登了政府的反猶理論（與這份刊物對猶太威脅的警示非常相似）：猶太人永遠不會忠于他居住的國家，因為他們只忠于其他猶太人；猶太人是布爾什維克黨和共濟會背后的黑手；盡管意大利猶太人只占了總人口的千分之一，但他們占據了許多重要的崗位。這種情況絕不能被容忍。  [[1]](#_1__CC_1938_III__pp__377_378)

1938年8月4日，教宗召來了喬瓦尼·蒙蒂尼。幾年前，為了討墨索里尼開心，他曾解除蒙蒂尼公教進行會大學組織國家司鐸的職務，但是在1937年下半年，他決定重新啟用蒙蒂尼，并將他任命為帕切利手下的副國務卿。這個決定令蒙蒂尼踏上了康莊大道，并在二十五年后登基圣彼得寶座。現下，庇護希望他能起草一封寫給墨索里尼的信，向他表明教宗在猶太和公教進行會這兩件事情上的立場。

次日，蒙蒂尼將草稿送給庇護，教宗仔細地審查了稿件。它寫道，只要事關猶太問題，教宗便無意干涉政府“采取恰當措施，保護合法權益的職責”；但是他希望墨索里尼不會逾越基督教博愛之心所能容忍的界限。至于公教進行會的問題，教宗反對法西斯黨以開除黨籍的方式威脅公教進行會成員。他堅稱，公教進行會只秉持宗教目標，這與其成員身兼法西斯黨籍并不沖突。

帕切利樞機再度勸說教宗不要寄出這封信件，以免惹怒墨索里尼，于是，塔基·文圖里前去會見領袖，親自將教宗的想法告訴了獨裁者。  [[2]](#_2__ASV__AESI__pos__1007c__fasc)

教宗近來對公教進行會生出擔憂，緣于他從東北部城市貝加莫收到了一份報告：當地法西斯分子攻擊了一個公教進行會俱樂部。當帕切利樞機向皮尼亞蒂轉達這一怨言時，大使那邊也是怒火沖天。梵蒂岡還指望怎么樣呢？教宗對種族運動的批評激怒了法西斯激進分子，此后還可能發生更為惡劣的暴力事件。  [[3]](#_3__Pa_Qie_Li_Xiang_Yao_Ping_Xi)

法西斯媒體控訴皮扎爾多，認為是他說服教宗對種族主義提出譴責，對此非常憤怒的皮扎爾多在兩天后會見了意大利大使。皮扎爾多向皮尼亞蒂保證，自己從未向教宗提起這一事宜。然后他們的對話跳轉到公教進行會上，氣氛立馬變得劍拔弩張，于是皮尼亞蒂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如果該組織能夠廢止正式成員的組織結構，那么此舉將極大地緩解雙方的緊張關系。皮扎爾多對此不置可否，他表示這樣的事情，決定權在教宗手里。大使懷疑皮扎爾多將鼓勵教宗繼續保護這個組織，不過他知道應該去哪里尋求幫助。“帕切利樞機與皮扎爾多樞機交惡的事情眾所周知，而且他也不喜歡公教進行會如今的組織形式，”皮尼亞蒂在這番會面的報告中寫道，“那么在這件事情上，我會爭取讓他成為我的盟友。”  [[4]](#_4__Chu_Zi_Pi_Ni_Ya_Di_8Yue_8Ri)

那周，《公教文明》還刊登了一篇拍政府馬屁的文章，進一步證明教宗愈發受到孤立。  [[5]](#_5__Gai_Wen_Xiang_Xi_Di_Yin_Yong)  皮尼亞蒂對此感到滿意。他告訴齊亞諾，當事關反猶運動時，耶穌會明顯站在墨索里尼這邊，不過他也提醒道：意大利的報紙最好停止鼓吹這一事實，耶穌會絕不愿意落得反對教宗的口實。  [[6]](#_6__Pi_Ni_Ya_Di_Jian_Yi__Dang_Ye)

當齊亞諾告訴墨索里尼，他無法預測教宗接下來可能發表什么言論時，領袖的心情變得更加憂郁。“我不會低估他的力量，”他說道，“但他也不應當低估我的實力。”難道七年前的公教進行會戰役，還沒有給教宗帶來足夠的教訓嗎？“只要我一聲令下，”墨索里尼警告道，“就足以釋放這個國家所有的反教會力量。”  [[7]](#_7__Ran_Er_Qi_Ya_Nuo_Ze_Geng_Wei)

那個最法西斯的法西斯黨人羅伯特·法里納奇，一如既往地特別愿意幫墨索里尼給教宗施壓。在總部設于克雷莫納的《法西斯政府報》（Il Regime fascista ）上，他對庇護十一世批評種族運動的言論提出了譴責。  [[8]](#_8__Fa_Li_Na_Qi_Kong_Su_Dao__Na)

克雷莫納主教急于替教宗辯護，于是給法里納奇寄去一封長信。他解釋說，教宗無意批評法西斯政府的種族項目。他所譴責的“種族主義”，指的是納粹采納的異端意識形態。“而當某些天主教作家聲稱意大利公教進行會原則上無法接受種族主義時，他們所指的也是德國種族主義。他們并不是在談論意大利種族主義。” 教宗的批評絕非意在攻擊以下觀點，即法西斯政府保護意大利種族的健全，免受猶太人的威脅。如果人們受到誤導，以為教宗和教會反對種族運動，那無疑是因為“反法西斯人士和猶太人希望歪曲教宗的用意，好為他們的反法西斯事業服務”。  [[9]](#_9__ASV__AESI__pos__1060__fasc)

法里納奇則在報紙中作出回應。他解釋道，墨索里尼發動反猶運動，完全是遵從教會的教導：“猶太人團結在一個組織有序的國際機構周圍，滿世界宣布他們乃是反法西斯人士，因此他們也是反意大利和反天主教人士。如果教宗有親猶太人的弱點，那么我們就必須承認，歷任教宗才是法西斯先驅，指導我們如何處理種族問題。甚至在今天，我都能明確地告訴你，在這一問題上，好些樞機并不贊同教宗和《羅馬觀察報》的觀點。”  [[10]](#_10__ASV__AESI__pos__1060__fasc)

當法里納奇為雙方的不和煽風點火時，教宗又要求塔基·文圖里出面，在雙方之間達成一樁協議，令這場風波像早先的公教進行會危機一樣和平解決。耶穌會士在8月8日面見領袖，他隨身帶著一份文件，上面記錄了教宗的想法。在同獨裁者溝通過教宗的觀點之后，他大聲朗讀了這份文件，并將它留給了墨索里尼。

這份文件表示，兩起“非常嚴峻”的事件令教宗心煩意亂。第一起乃是公教進行會如今陷入了一種“痛苦”境地。意大利媒體上充斥著針對這個組織的中傷與誹謗；在一些地區，不僅組織領導人，連普通成員都有受襲之虞。許多區域的法西斯黨人接到命令，如果他們還想留在法西斯黨，就必須放棄公教進行會的會員身份。教宗對文圖里說道，告訴墨索里尼，“我們曾經經歷1931年7月那些焦灼的日子，七年后，我們會像當年那樣，將你[塔基·文圖里]當作我們全權信任的代表，派到他身邊，他知道如何同你達成理解，也會明白那個派遣你的人”。如果墨索里尼覺得直接會面有助益，教宗補充道，自己會親自同他會面，尋求解決方案。

這份文件羅列的第二起“痛苦”事件與“猶太問題”有關。庇護說：“我們承認，采取恰當的措施保護合法的權益乃是國家政府的職責，而我們無意對其進行干涉。”但是教宗覺得自己有責任訴諸墨索里尼“作為基督徒的使命感”，并提醒他“避免任何不人道、不符合基督教教義的措施”。他又轉而談論起那些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以及在教會的許可下同天主教徒結成連理的猶太人。他提醒墨索里尼，根據宗教事務協約，僅憑教會法規就足以確保這些婚姻的合法性，他不得以任何形式侵犯這一權利。

最后，教宗回憶起教會的往昔歲月，那時的教宗在他們統治的領域里“謹慎地控制住以色列的孩子，并對他們的惡行采取防御性措施”，但是他們永遠都不會虐待猶太人。教宗認為，即便復活節周五的嚴厲禱文認為猶太人“背信棄義”，但他也從未忘記，救世主耶穌基督有著猶太人的血統。  [[11]](#_11__Fa_Bu_Lei__2012__pp__109_11)

會面中，塔基·文圖里將所有問題都與墨索里尼一一討論，并將領袖對各種請求的回應悉數轉達給教宗。8月12日，周五晚間，塔基·文圖里又遵從教宗的安排，帶著一份文件回到領袖身邊。這一次，耶穌會士先將教宗的文件交給墨索里尼瀏覽，然后才開始討論。在上一輪會面中，墨索里尼表示只要公教進行會的活動能嚴格限制在雙方協商一致的范圍內，他便無意針對它，教宗對這一結果非常滿意，“而貴方表示希望在處理猶太問題時秉持克制與理性的精神”也令教宗十分振奮。這句文字之后，庇護的文件便拋開了猶太話題，主要討論他最為關心的公教進行會問題。教宗希望雙方能夠重新達成一致，令公教進行會爭議得到和平解決，然而在此之前，墨索里尼必須先做三件事：撤除貝加莫的反教會法西斯黨首領的職務；恢復公教進行會成員被剝奪的法西斯黨黨籍；為那些因參加公教進行會活動而被開除的公務員復職。

“噢，領袖，沒有這些前提條件，”塔基·文圖里代表教宗告訴墨索里尼，“我認為我們的和平談判不僅將給我帶來極大的難處，而且也很難達到1931年8月那樣令雙方滿意的結果。”他最后提醒墨索里尼，教會的支持對獨裁者來說是多么重要，“至少體現在幫助意大利贏得了埃塞俄比亞戰爭”。梵蒂岡對法西斯政權的支持至關重要，教宗特使據理力爭，以至于“全世界所有塵世或地獄的反法西斯力量”都不惜一切代價要阻絕這一聯盟。  [[12]](#_12__ASV__AESI__pos__1007c__fasc)

至此，離新種族主義條款的宣布已經過去近一個月。全世界的猶太人都緊張地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他們仍然希望意大利的反猶姿態不過是紙上談兵，不會帶來多大的實際效果。意大利的四萬六千名猶太人主要居住在北部和中部城市。最大的猶太人群體位于羅馬，約有一萬一千人，米蘭位居第二，有近七千人，第三是東北部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接近五千人。猶太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平均水準；半數意大利人都是農民，而猶太人則鮮少耕種土地。不過意大利猶太人遠遠沒有達到共同富裕。盡管人口調查顯示最普遍的猶太人職業是“商業”，但是這既包含貧寒的街頭小販，也包括富足的商人。羅馬的猶太人并不富裕，許多猶太人都倚仗族人的施舍過活。  [[13]](#_13__Sarfatti_2006__pp__19_41__S)

然而這些或貧窮或富足的猶太人并不幸運，因為墨索里尼非常較真地要把種族條文付諸行動。不過他也明白，反猶運動完全出乎多數意大利人的預料，要讓他們對運動產生熱情并不容易，如果教宗公開反對它，將極大地挫傷這場運動。

教宗的耶穌會特使于次日交給帕切利樞機一份長達三頁的打印文稿，其標題如是寫道：《為了解決近幾周的紛爭，為了重建圣座與意大利政府之間的和諧關系，墨索里尼閣下與耶穌會士塔基·文圖里神父于1938年8月16日愉快地就三個問題達成一致》。此文稿內容乃是墨索里尼口述，并由塔基·文圖里記錄下來的，這份協議的條款密切地回應了教宗在上周給領袖提出的三點要求。

在這份協議的三條條款中，第一條處理了猶太問題，第二條則事關公教進行會。條款二保證公教進行會有權不受干擾并全面地開展其活動，而那些被剝奪法西斯黨籍的公教進行會成員也將恢復他們的黨籍。在第三條中，墨索里尼答應了教宗的要求，撤掉了貝加莫的法西斯黨頭目。

在塔基·文圖里神父與墨索里尼達成的協議中，猶太人的問題在第一條中得到詳細解釋，其標題為《種族主義與猶太問題》。墨索里尼對新的反猶法案做出承諾，其嚴苛程度不會超過歷任教宗幾個世紀以來限制猶太人的程度，事實上，歷任教宗在教宗國內落實的部分限制條款將被排除在外。這條條款寫道：

對于猶太人，政府承諾不重新啟用身份標識帽（無論什么顏色），也不會劃分猶太區，更不會沒收他們的財產。簡而言之，我們確保猶太人受到的對待，不會差于多個世紀以來歷任教宗給予他們的待遇，無論是在不朽之城抑或是其他臨時的住所。

這一條款實現了《公教文明》的耶穌會士的夢想，它既是塔基·文圖里的夢想，也是耶穌會總會長的夢想。猶太人終于受到了諸般限制，而這么做的目標是保護基督教社會免受其惡劣影響。幾十年來，梵蒂岡這份非官方期刊一直在敦促歐洲各國政府采取這類限制措施。

既然墨索里尼作出承諾，他給猶太人施加的限制會局限于教會支持的限度之內，那么作為交換，圣座也答應不再對即將落實的種族法案提出批判，所以這一部分的第三段和最后一段規定：

“既然如此[即我方已承諾將對猶太人的限制局限于教宗國的限度之內]，尊貴的政府首腦強烈希望天主教媒體、神父以及天主教發言人能夠杜絕在公眾場合討論這一話題。圣尊以及神圣教宗本人并不缺乏私下的渠道同墨索里尼達成直接的相互理解，也不缺乏渠道向他提供最適于解決這些敏感問題的恰當方法。”  [[14]](#_14__ASV__AESI__pos__1054__fasc)

塔基·文圖里對此感到滿意。這份協議令人回想起往昔。1931年，教宗和墨索里尼也曾這般相互要挾，并且雙方關系離徹底破解也僅有一步之遙。在其他人紛紛失敗之后，他應召與墨索里尼協商和平解決方案，并代表教宗簽字。這一次，法西斯對公教進行會的威脅再次得到化解。

同一周，梵蒂岡的日報刊登文章，認為政府有必要對猶太人采取行動。《羅馬觀察報》回顧了過去的幾個世紀，歷任教宗為了保護基督徒，紛紛采取限制猶太人權利的措施。在一段很快便被意大利各家報紙紛紛轉載的文字里，《羅馬觀察報》解釋道，盡管歷任教宗在處理猶太人事務時總是表現出憐憫，但是這一姿態不應被誤解：

然而我們必須直言，這不意味著猶太人可以濫用基督教國家的熱情好客。除去保護性措施，還應當有對應的限制令和妨礙令。世俗統治者在這一方面與教會達成共識……基督徒不得強迫猶太人皈依天主教，不得干擾猶太教堂、猶太安息日以及猶太節日；相應的，猶太人也不得擔任公職（包括政府和軍隊），并且這一禁令也適用于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的子女。預防措施還涉及專業活動、教育以及貿易領域。  [[15]](#_15____You_Tai_Ren_Yu_Fan_Di_Gan)

由此，這份梵蒂岡報紙為墨索里尼三周后實施的反猶法案繪制了一幅藍圖。

8月18日周四上午，塔基·文圖里來到岡多菲堡，將這份協議呈給教宗過目。他明白自己必須非常小心地應對教宗，因為教宗的怒火在任一瞬間都有可能爆發。不過耶穌會士也明白，只要有足夠的耐心與時間，他總能想辦法贏得教宗的支持，或至少確保他不會反對。

事實證明，耶穌會士有充足的理由擔心教宗會發火。塔爾迪尼在11點多進入教宗書房，立即就注意到雙方的火藥味。有什么地方出了問題，但他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東西不對勁。

在返回梵蒂岡的路上，塔基·文圖里將協議出示給塔爾迪尼，并告訴他教宗對三條處理猶太問題條款的第一條不滿意。“Quidquid recipitur pro modum recipientis recipitur．”塔基·文圖里說道。這句出自中世紀神學的話,翻譯過來便是：“人的感知基于人的感知方式。”耶穌會士抱怨道，教宗總是以陰暗的視角看待事物。協議毫不諱言地談及歷任教宗對待猶太人的方式，他顯然對此非常不滿。盡管在與領袖的前期溝通中，他在猶太問題上表達了完全相同的觀點，但教宗不希望墨索里尼之后的做法與自己前輩的行為有任何瓜葛。  [[16]](#_16__Fa_Bu_Lei__2012__p__119_Dui)

雖然庇護十一世大為光火，塔基·文圖里還是告訴塔爾迪尼，他希望教宗能冷靜下來，想明白這份協議其實對教會有好處。在教宗辦公室外的等候室里，他已經讓皮扎爾多樞機看過協議的初稿，他希望皮扎爾多也能出手相助，說服教宗接受這份協議。  [[17]](#_17__ASV__AESI__pos__1007c__fasc)

無論是墨索里尼，抑或教宗身邊的人，都非常希望雙方能達成這份協議。法國大使夏爾——魯在給總理的信中寫道，關于種族運動的爭議漸漸平息了下來，公教進行會是如今僅存的爭議問題。大使寫道：“意大利政府處理反猶主義的手法非常老練，使得梵蒂岡只能對該問題緘口不言。”意大利的報紙上有許多文章詳述歷任教宗如何在他們短暫的任期內歧視猶太人。8月17日，多家報紙轉載了《羅馬觀察報》于該周初刊登的文章，題作《歷任教宗給予猶太人的對待》（“How the Popes Treated the Jews”）。  [[18]](#_18__MAEI__vol__267__94__Charles)  在墨索里尼與塔基·文圖里起草協議的當天，大眾文化部部長迪諾·阿爾菲耶里召集了羅馬多家報紙的負責人和意大利其他城市報紙駐扎羅馬的記者，想要傳達如下信息：低調處理政府與梵蒂岡的爭論，因為“一切爭端似乎都得到了解決”。  [[19]](#_19__MAEI__vol__267__97__Charles)

那些與梵蒂岡保持密切關系的記者之間流傳著一則消息：塔基·文圖里和墨索里尼已經快要達成交易了。法西斯黨主席阿契爾·斯塔拉切和公教進行會主席蘭貝托·維尼奧利（Lamberto Vignoli）進行了會面，進一步探討協約的第二條和第三條。  [[20]](#_20__MAEI__vol__267__102_103__Ch)

8月20日，《紐約時報》在頭版刊登了雙方討價還價的新聞。“梵蒂岡曾因公教進行會（意大利媒體在近幾周指控該組織對種族理念抱持敵意）事宜與法西斯黨劍拔弩張，隨著法西斯黨主席阿契爾·斯塔拉切和意大利公教進行會主席蘭貝托·維尼奧利宣布雙方達成和解，這一緊張關系得到緩解，使雙方重新回到1931年9月和平共處的條約基礎上。”《紐約時報》記者隱約得知了這份協議的核心內容。為了讓墨索里尼放過公教進行會，梵蒂岡將會與政府即將展開的反猶行動保持一致：“墨索里尼與塔基·文圖里神父進行談話后，公教進行會承諾不再開展任何可以被解讀為對種族政策持有敵意的活動。作為回報，法西斯黨則保證不對任何同時兼有公教進行會成員身份的黨員采取報復措施。”  [[21]](#_21____Jiao_Zong_Yu_Fa_Xi_Si_Dan)

8月21日，羅馬的《信使報》（Il Messaggero ）刊登了一篇題作《黨與公教進行會確認達成協議》（“Accords Confirmed Between Party and Catholic Action”）的文章，以該報視角講述了這份協約的內容。它在報道中提及了斯塔拉切和維尼奧利的會面以及雙方達成的協議，并準確地描述了墨索里尼就公教進行會問題同塔基·文圖里達成的共識：只要嚴格遵守1931年的協約條款，并將其活動約束在宗教領域內，那么它（公教進行會）就有權不受干擾地運作組織與活動。不過意大利報紙與美國報紙有所區別，前者并未提及墨索里尼希望從教宗處獲得的回報。

教宗推遲了梵蒂岡宣布雙方協議的時機，希望墨索里尼能進一步保證那些被開除法西斯黨籍的公教進行會成員確確實實重獲黨員身份。塔基·文圖里又與墨索里尼進行了幾輪會面，教宗才最終感到滿意。梵蒂岡日報在8月25日刊登了協議的消息。公教進行會的爭端得到了解決。不過，文章并沒有提及梵蒂岡為此付出的代價，即支持墨索里尼的反猶運動。  [[22]](#_22____Guan_Yu_Yi_Da_Li_Gong_Jia)

在眾多顧問的游說下，教宗漸漸接納了由塔基·文圖里與墨索里尼敲定的這樁交易，但是墨索里尼改投希特勒的懷抱以及他那些反基督教的種族意識形態，仍然令教宗感到不滿。當世界各國的媒體紛紛刊登雙方達成協議的消息時，教宗卻在私下里表達了他的憤怒。教宗跟國務卿說道，讓塔基·文圖里告訴墨索里尼，如果他的目標是殺害圣父，那么他現在使用的方法非常有效。接著教宗又危言恐嚇，在他死之前，他會“讓全世界都知道，天主教會和圣父在意大利遭受了怎樣的虐待”。  [[23]](#_23__ASV__AESS__pos__430__fasc)

在公眾場合，教宗的言論更為審慎，但是他的話語中還是透露出些許怒意未消的意味。在岡多菲堡的宗座傳信大學向學生發表講話時，教宗再度提起“過分的民族主義”這一話題。皮尼亞蒂的得力助手卡洛·費恰·迪·科薩托（Carlo Fecia di Cossato）向上級報告了這一消息（皮尼亞蒂大概在度假休息），認為教宗曾經在7月28日在這些學生面前批評了墨索里尼的新種族政策，如今又向他們發表講話，這絕非巧合。然而這一次，教宗的演講更為謹慎。這位外交官表示，教宗因為言論受到了批評，于是在“紅酒中摻了一點水”。教宗表示，“公正、節制的民族主義有其應得的地位，并且與所有美德相聯系”，但是也有一種不健康的形式，即“過分的民族主義”；在教宗眼里，這種意識形態是一道“真正的詛咒”。科薩托對教宗演講的主旨感到滿意：“我能很清楚地看出，教宗希望借這次演講，緩和7月28日的演講造成的惡劣影響。”  [[24]](#_24__ASMAE__AISS__b__102__Cossat)

對任何形式的批評都很敏感的墨索里尼則沒有科薩托那么滿意。  [[25]](#_25__Ta_Han_Lai_Ta_Ji__Wen_Tu_Li)  他告訴齊亞諾：“其實大家對我有所誤解，我是個很有耐心的人。而且，任何人最好不要逼我失去這份耐心，否則我會大發雷霆，破壞眼前的一切事物。如果教宗繼續這樣大放厥詞，我會鏟除意大利人的宗教情結，你還沒來得及做出反應，我就會讓所有意大利人變成反教會人士。”如果教宗以為意大利人對他的信仰勝過了對領袖的信仰，那么他就大錯特錯了。“梵蒂岡城里的那些人，”他告訴女婿，“不僅遲鈍，而且僵化。宗教信仰已經窮途末路：人們不再愿意信仰一個只談苦難的神明。”他多少有點瀆神地說道：“如果哪個神明對科爾索大道  [[26]](#_26__Ji_Weng_Bei_Tuo_Yi_Shi_Da_D)  巡警的私生活感興趣，那我可看不上這種神明。”

教宗身邊的人都在努力令庇護改變態度，而臺伯河對岸，齊亞諾也在努力平息岳父的怒火。“在當前困頓的國際形勢下，”他在8月22日的日記里寫道，“與教會發生沖突只會令雙方兩敗俱傷。”  [[27]](#_27__Ciano_2002__pp__117_118_Jin)

意大利報紙進一步給教宗施加壓力，在它們持續不斷的報道中，法西斯的反猶運動不過是將教會長久以來針對猶太人的諄諄教導付諸實踐。《意大利日報》（種族聲明正是在這份報紙上首發）8月24日的一篇文章追述了十年前的一樁往事，“以色列之友”因違反教會有關猶太人“背信棄義”的教導，而招致教宗的解散令。臭名昭著的反猶報紙《臺伯河報》（Il Tevere ）則用同樣的標題《教會與猶太人》（“The Church and the Jews”）報道了這則故事。幾家報紙紛紛使用同一標題，表明政府是安排這些報道的幕后黑手。“在所有的時代，”這份報紙寫道，“歷任教宗在猶太人的活動范圍四周樹起籬笆，像防瘟疫一樣防著他們。”歷任教宗“意圖保護子民，不受猶太人惡德的影響”，他們采取的反猶措施遠比法西斯政府正在制定的嚴厲。在羅列了幾十條呼吁教眾警惕猶太威脅的教會法規后，這篇報道最后寫道：“意大利種族要凈化自身，永遠不要被這種背信棄義的異族所玷污。”  [[28]](#_28__Jian_Bao_Shou_Yu_ASV__AESI)

教宗派出博爾貢吉尼大使，與齊亞諾商談這一愈發緊張的局勢。齊亞諾在日記中描述了這場發生在8月下旬的會面：

博爾貢吉尼——杜卡在教宗的命令下，前來商討協議的宣布事宜。至少在當前，它能夠結束黨和公教進行會之間的紛爭。經我稍稍慫恿，他就滔滔不絕地談起教宗。他說教宗的性格非常糟糕，不僅大權獨攬而且傲慢無禮。梵蒂岡所有人都害怕他，甚至博爾貢吉尼本人在進入教宗書房時都會發抖。他對每個人都十分倨傲，即便貴為樞機也不能例外。比方說帕切利樞機，當教宗將他召來時，他必須像個小秘書一樣抄下庇護的所有指示。現在他又恢復了健康。每天吃煮熟的水果和一點點肉。他還適量地喝一點紅酒，并在公園里進行足量的運動。他如今已經八十二歲高齡，卻依然事無巨細地運作著教會的整個行政機構。  [[29]](#_29__Ciano_2002__p__119_Dang_Nia)

如今的意大利政府正在鼓動一場大規模的反猶宣傳運動，主要倚仗一份新創的半月刊《捍衛種族》。  [[30]](#_30__Qi_Fu_Ze_Ren_Ta_Lai_Xi_Ao)  這份刊物充斥著偽造的照片和古怪的插圖，記錄了猶太人和非洲人的墮落歷程。第一期雜志刊登了一張人臉，其碩大無朋的鼻子耷拉在臉上，抵住了肥碩的嘴唇。這幅人像下方有一行標簽：“典型的猶太人照片，清楚地展現出這一種族的面部特征。”  [[31]](#_31__Gui_Duo__Lan_De_La____Yi_Da)  這本雜志對猶太威脅的描繪，與受到梵蒂岡認可的《公教文明》如出一轍，不過這份雜志找來的作者都有著受人尊敬的學術頭銜，為那些嘩眾取寵的偽科學言論增加了可信度。  [[32]](#_32__Ling_Ren_Yi_Han_De_Shi__Di)  比如，這份雜志表示，猶太人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背后的黑手；《塔木德》教導他們仇視所有基督徒，總有一天要統治基督徒；他們永遠都不會對自己居住的國家效忠；他們秘密謀劃著要推翻教會和法西斯黨。第一期《捍衛種族》有這樣一篇新聞特寫，題作《〈公教文明〉五十年論戰》（“Fifty Years of Polemics in La Civiltà Cattolica ”），在結尾處寫道：“教會的教條與意大利表現出來的種族主義并行不悖。”  [[33]](#_33__Zheng_Fu_Yao_Qiu_Suo_You_Da)

皮尼亞蒂在8月下旬避暑歸來，聽聞教宗近來發表的講話于法西斯黨無礙，心里松了一口氣。盡管庇護十一世曾提起種族主義的話題，而意大利大使并不反對他的講話內容，然而皮尼亞蒂還是非常緊張。他告訴齊亞諾：“我們最希望的是教宗能緘口不言。他這人酷愛高談闊論……總是令人擔心會出現最糟糕的情況。”  [[34]](#_34__ASMAE__AISS__b__102__Pignat)

[[1]](#filepos1119549) CC 1938 III, pp. 377–378.

[[2]](#filepos1120949) ASV, AESI, pos. 1007c, fasc. 695, ff. 70r–75r, “Progetto di una lettera del S. Padre a Mussolini circa Ebrei e Azione Cattolica,” agosto 1938.

[[3]](#filepos1121500) 帕切利想要平息皮尼亞蒂的怒火，便告訴他教宗剛剛派塔基·文圖里給墨索里尼送去一封信。盡管該信對近期公教進行會遭受的暴力表示悲痛，但它依然滿懷尊敬，“表達了對領袖的贊美與崇敬之情”。ASMAE, AISS, b. 102, Pignatti a Ciano, 6 agosto 1938.

[[4]](#filepos1122579) 出自皮尼亞蒂8月8日的報告，轉引自Casella 2010, pp. 268–269。

[[5]](#filepos1122839) 該文詳細地引用了墨索里尼為反猶運動辯護的說辭，甚至包括如下言論：“認為法西斯是在模仿某人或某事，這種觀念荒謬透頂……沒有人可以質疑，如今發動法西斯種族主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了。”該刊對墨索里尼的話語沒有做出任何評價。CC 1938 III, pp. 376–378.

[[6]](#filepos1123202) 皮尼亞蒂建議，當耶穌會能夠“執行他們最擅長的秘密行動時”，便能達成最好的效果。ASMAE, AISS, b. 102, Pignatti a Ciano, 7 agosto 1938.

[[7]](#filepos1123771) 然而齊亞諾則更為樂觀，他相信教宗身邊的人正逐漸令他明白事理。“至于種族的事宜，教宗如今已經明白這件事的問題所在，他已經開始繳械投降了。”Ciano 2002, p. 113.

[[8]](#filepos1124197) 法里納奇控訴道，那個說服教宗批評種族運動的人是皮扎爾多樞機。8月3日，法里納奇致信墨索里尼，再度提起了這一控訴。他在信的最后向墨索里尼提問：“親愛的總理，教宗的母親真的是猶太人嗎？”他還補充道：“如果此事不假，那簡直就是個笑話！”ACS, CR, b. 44, Roberto Farinacci, direttore, Il Regime fascista, Cremona, a Mussolini, 3 agosto 1938.法里納奇大概是從德國媒體那里，引述了教宗是猶太人的控訴，當時這種論調在德國廣為傳布。

[[9]](#filepos1125088) ASV, AESI, pos. 1060, fasc. 749, ff. 14r–21r, Monsignor Giovanni Cazzani, vescovo di Cremona, a Farinacci, 17 agosto 1938.

[[10]](#filepos1125804) ASV, AESI, pos. 1060, fasc. 749, ff. 22r–26r, Farinacci a Cazzani, 18 agosto 1938.

[[11]](#filepos1128349) 法布雷（2012, pp. 109–110）近期出版并分析了這份文件，該文件收于塔基·文圖里的檔案中。ARSI, TV, f. 2143

[[12]](#filepos1130192) ASV, AESI, pos. 1007c, fasc. 695, ff. 37r–39r, “Nota da me presentato al Duce la sera di venerdì 12 Agosto,” Tacchi Venturi, 12 agosto 1938.

[[13]](#filepos1131219) Sarfatti 2006, pp. 19–41; Sarfatti 2005, pp. 67–68.截至1938年，意大利境內的猶太人約有21%是其他國家的難民，為了躲避迫害才來到意大利。

[[14]](#filepos1134563)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0, ff. 40r–41r.早在梵蒂岡庇護十一世檔案開放的許多年前，耶穌會士安杰洛·馬丁尼（Angelo Martini）神父就獲準訪問了這些文檔，并向外界指出這份文件的存在。盡管他引用了文本（Martini 1963），但他給出的背景知識很少，并判斷“它太過泛泛而談，基本上不可取信”。當米科利（1988, pp. 847–848）談及馬丁尼的發現以及他的評判時，這批檔案仍未公開，但是他認為這份文件十分重要，并反對馬丁尼弱化其重要性的觀點。直到2006年，當梵蒂岡檔案館開放這部分文檔，以及與其相關的資料后，其顯而易見的重要性才為人們所知。德·切薩里斯（2010, pp. 160–161）認為，這份文件的起草人必然是墨索里尼，或者是他在政府中的親信，而不是塔基·文圖里，或者任何梵蒂岡人士。我認為，這種觀點試圖拉開教宗及梵蒂岡與這份提案之間的距離，它并不能令人信服。這份文件直截了當地向我們表明，早在雙方起草協議之前，教宗已經向墨索里尼提出了許多方案。

[[15]](#filepos1136263) 《猶太人與梵蒂岡》，OR, 14 agosto 1938, p. 2。我使用的英語譯文來自美國大使，梵蒂岡似乎決定不再反對意大利的種族運動，這一事實令他扼腕嘆息。NARA, M1423, reel 12, Ambassador William Phillip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Progress of Racial Movement in Italy,” August 19, 1938.美國國務卿曾與意大利大使寫信交流教宗對意大利反猶運動的反應，關于這些信件的分析，參見Kertzer and Visani 2012。

[[16]](#filepos1137777) 法布雷（2012, p. 119）對8月16日的協議做了最為詳盡的研究，他為教宗發火所推測的原因與我的結論相同。

[[17]](#filepos1138253) ASV, AESI, pos. 1007c, fasc. 695, ff. 41r–42r，手寫未署名的三頁備忘，18 agosto 2011。當月晚些時候，塔爾迪尼與法國大使館人員談論教會就公教進行會與政府發生的沖突時，他認為墨索里尼無可指責。他表示犯錯的是法西斯黨“左翼”，尤其是當主席的阿契爾·斯塔拉切。MAEI, vol. 267, 126, Charles-Roux à Bonnet, 29 août 1938.

[[18]](#filepos1139060) MAEI, vol. 267, 94, Charles-Roux, 17 août 1938；以及MAEI, vol. 95–96, 18 août 1938。

[[19]](#filepos1139491) MAEI, vol. 267, 97, Charles-Roux, 18 août 1938.部長還補充道，他們不必顧慮傳信部的言論，因為這些人并不代表梵蒂岡在種族運動上的立場；他們不過是年老的教宗一時心情不佳所導致的產物。Tranfaglia 2005, p. 151.

[[20]](#filepos1139951) MAEI, vol. 267, 102–103, Charles-Roux, 20 août 1938.

[[21]](#filepos1141006) 《教宗與法西斯黨人就公教進行會達成新協議》NYT, August 21, 1938, p. 1。當天，《洛杉磯時報》也刊登了一則類似的消息，開頭寫道：“通過七十七歲的耶穌會神父彼得羅·塔基·文圖里的居中調停，墨索里尼總理與教宗庇護十一世再度在天主教會與法西斯黨之間的分歧上達成共識。《教宗與領袖再次共筑和平》，LAT, August 21, 1938, p. 2。

[[22]](#filepos1142366) 《關于意大利公教進行會與國家法西斯黨的關系》，OR, 25 agosto 1938, p. 1。《信使報》的剪報收于AESI, pos. 1007c, fasc. 695, f. 64r。教宗與法西斯政府的最后一輪協商，記錄于科薩托的報告中。ASMAE, AISS, b. 102, Cossato, 23 agosto 1938；以及ASMAE, AISS, b. 102, Cossato, 24 agosto 1938。

[[23]](#filepos1143153) ASV, AESS, pos. 430, fasc. 355, f. 70, 27 agosto 1938.

[[24]](#filepos1144396) ASMAE, AISS, b. 102, Cossato, 22 agosto 1938.

[[25]](#filepos1144627) 他喊來塔基·文圖里，要他轉告教宗自己有多么生氣。墨索里尼與耶穌會士的會面記錄在他的日程表上，時間為8月22日晚7點30分。ACS, CO, b. 3136.

[[26]](#filepos1145468) 即翁貝托一世大道（Corso Umberto I），意大利羅馬古城中心區的一條主要街道，北起人民廣場，南至威尼斯廣場。

[[27]](#filepos1145936) Ciano 2002, pp. 117–118.近期，墨索里尼引入了一道新要求，政府雇員在工作期間必須穿制服，此事引發了不少怨言。在被告知下層的不滿時，他回答道：“給我記住，教士之所以是教士，就是因為他穿了教士袍！”Bottai 1989, p. 131.

[[28]](#filepos1147251) 剪報收于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8, ff. 19r, 20r。

[[29]](#filepos1148548) Ciano 2002, p. 119.當年教宗實際上是八十一歲。

[[30]](#filepos1148737) 其負責人塔萊西奧·因泰蘭迪（Talesio Interlandi）由墨索里尼親自任命，多年以來他都建議領袖學習希特勒的榜樣，對意大利猶太人發起反猶運動。

[[31]](#filepos1149182) 圭多·蘭德拉，《意大利的種族觀》，《捍衛種族》，第1期（1938），p.10。

[[32]](#filepos1149528) 令人遺憾的是，第一期的許多作者（包括上文引用的那篇駭人聽聞的文章）都是意大利的人類學家。

[[33]](#filepos1150191) 政府要求所有大學的圖書館都征訂《捍衛種族》，并呼吁所有教授都仔細研讀它、將其內容分享給學生。意大利的各家報紙也受命轉載它的文章，并將其故事材料用在自身的報道中。《〈公教文明〉五十年論戰》，《捍衛種族》，第1期，1938年8月5日，pp. 31–33。另參見Mughini 1991, pp. 145–146. Israel 2010, pp. 203–204; Cassata 2008, p. 116; Tranfaglia 2005, p. 152。

[[34]](#filepos1150756) ASMAE, AISS, b. 102, Pignatti a Ciano, 29 agosto 1938.

## 第二十四章 種族法案

9月1日，意大利政府宣布，但凡生于海外的猶太人，只要是在1919年后入籍意大利，就將被政府收回其公民身份。它還命令所有非本國公民的猶太人在六個月內離境。次日，所有猶太教師（從小學一直到大學）都遭到了解雇，因為基督徒兒童不可以接受猶太人的教導。猶太兒童也不得進入任何學校學習。猶太人遭到各大藝術、文學和科學學會的驅逐。“種族法案”規定，但凡父母屬于“猶太種族”的人都是猶太人，與他們是否尊奉猶太教沒有關系。

《公教文明》對這些新頒布的法案沒有提出任何異議，這一點都不令人吃驚，因為自1880年以來，它就一直呼吁政府采取這些措施。然而這份刊物也迫切地想要劃分界限，表明自己的反猶運動和基于血統的反猶運動不同。在它看來，猶太人給意大利造成的威脅，根源并不在于他們的生理特征，而在于他們的行為。  [[1]](#_1___Ge_Jia_Bao_Zhi_Du_Zai_Yin_S)  這份雜志之所以呼吁政府對猶太威脅采取行動，“其動機完全在于為基督徒搭建合法的防線，”——此處，該文以贊許的姿態引用了先前一篇文章——“‘抵御眾多民族中的那個異族，盡管它生活在眾多民族之間，卻是它們不共戴天的敵人’”。  [[2]](#_2__CC_1938_III__pp__559_561)

在反猶運動早期，法西斯媒體大量引用這份梵蒂岡非官方刊物的內容，為種族法案煽風點火，獲取大眾的支持，而梵蒂岡則找來這份刊物的幕后靈魂人物恩里科·羅薩來厘清這一問題。他的文章《猶太問題與〈公教文明〉》（“The Jewish Question and Civiltà Cattolica ”）盡管沒有反對新頒布的反猶法案，卻反對那些為了給自己搖旗吶喊而歪曲該刊物用意（雖則該刊物推薦政府限制猶太人的權利，但其原理和血統論不同）的人。

羅薩神父宣稱，世事已經證明了這份刊物的先知智慧：賦予猶太人以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不僅對基督教社會來說是一種災難，對猶太人自己也是。賦予他們平等權利反倒為他們招致了普遍的仇視，因為他們只會利用這新獲的自由，為自己積累異端的權力和財富，迫害天主教會，并且壓迫基督徒。  [[3]](#_3__En_Li_Ke__Luo_Sa____You_Tai)

許多近乎恐慌的意大利猶太人趕忙奔向教區神父，要求他們為自己施洗。在接下來的三年里，十分之一的意大利猶太人將會宣布放棄自己的信仰。博洛尼亞的一千名猶太人中，僅在1938年8月和9月受洗的就有五十人之多，他們這么做乃是不顧一切要躲避迫害。  [[4]](#_4__Matard_Bonucci_2008__p__309)  法西斯反猶運動踏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從理論轉變為實際迫害，然而這個國家的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卻幾乎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僅有極少數神父在個別案例中表達了批評意見，而墨索里尼則直接將其報告給帕切利樞機，這些不安分的神父就會得到管教。9月1日便有這樣一樁案例，帕切利接到報告，在米蘭北部靠近科莫湖的一個偏遠村莊，有一位神父對種族運動提出了批評意見。阿布拉莫·毛里（Abramo Mauri）住在教會的一家療養院里，試圖從神經衰弱中恢復過來。當地的修女邀請他在小禮拜堂中主持一場彌撒。一個周日，他在彌撒中抱怨道：“他們已經開始給這些滿臉鼻涕的三歲小孩灌輸一種錯誤的自豪感。”在場的當地法西斯領導人非常憤怒，因為他非常確定地認為神父是在影射法西斯青年團體。更糟糕的是，這位神父進而還批評了種族運動，并預測它將導致戰爭。  [[5]](#_5__ASV__AESI__pos__985__fasc__6)



墨索里尼與法西斯青年團體的孩子們，1938年

帕切利樞機要求科莫主教對此事進行調查。  [[6]](#_6__Pa_Qie_Li_Huan_Zhi_Xin_Shu_S)  在一番探究之后，主教向帕切利保證，這位神父針對“滿臉鼻涕的小孩”的言論遭到了誤解。他表示，這些話實際上指的是被溺愛的母親所慣壞的兒童。但是主教無法解釋神父為什么要批評種族運動，因此他只能命令毛里永遠不得在教堂中布道。  [[7]](#_7__ASV__AESI__pos__985__fasc__6)

\* \* \* \* \*

與此同時，歐洲也在一步步跨入戰爭的泥潭。9月1日，希特勒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將使用德語的蘇臺德地區（Sudetenland）割讓給第三帝國。法國則開始動員其部隊。

在羅馬，在一邊旁觀的美國大使威廉·菲利普斯愈發感到擔憂。墨索里尼于7月發表的種族宣言震驚了美國，并引起美國國務院的警惕，因為這是墨索里尼試圖讓意大利與納粹德國共命運的最新跡象。在菲利普斯眼里，沒有多少人能夠阻止這一災難的發生，而其中最有可能的便是教宗。7月20日，當教宗發表演講，批評領袖模仿希特勒的猴急樣時，他曾興奮地向華盛頓發送報告，可是一個月之后，當讀到《羅馬觀察報》上支持限制猶太人的文章時，他知道他的希望落空了。然而，他還沒有徹底放棄，也許教宗是受了什么人的擺布。

當9月初宣布最新的種族法案并將猶太兒童與教師都逐出學校時，菲利普斯要求面見梵蒂岡國務院中唯一一位美國神父，約瑟夫·赫爾利（Joseph Hurley）。過去兩人曾多次會面，由于美國沒有正式的駐梵蒂岡大使，菲利普斯便倚仗赫爾利來獲知梵蒂岡內部發生的大小事情。  [[8]](#_8__Gallagher_2008__pp__72_73_Qi)

當天晚上，兩人在美國領事館會面，大使二話不說就直奔主題。新頒布的反猶法案令他和美國政府都驚駭不已。他們不僅自己已出離憤怒，還會引導美國民眾反對意大利政府。在菲利普斯看來，反猶運動只是局部，反映的是一個更為龐大且令人擔憂的整體局勢。墨索里尼身邊都是溜須拍馬之徒，他拒絕會見那些可能給他帶來不同觀點的外國使節，并逐漸失去了現實感。如果事態進一步惡化，菲利普斯告訴赫爾利，“梵蒂岡也許有辦法，通過審慎地介入意大利政府，來避免全面戰爭的災難發生”。  [[9]](#_9__Fei_Li_Pu_Si_Huan_Shen_Xin)

菲利普斯提議，如果教宗能夠出言譴責新頒布的種族法案，那么作為回報，美國民眾會對他好感大增，由此“解除新教派別對梵蒂岡的反對意見”。美國政府則由此可以跟梵蒂岡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幾十年以來，圣座都試圖從美國獲得這種認可，但迄今的美國政治局勢都令這一計劃難以實現。在美國人口中占據多數的新教徒持有反天主教偏見，此外，他們認為梵蒂岡其實是個宗教組織，而非一個主權國家，所有這些因素都妨礙著雙方的努力。  [[10]](#_10__ASV__AESI_pos__1054__fasc)  次日，赫爾利將菲利普斯的意見轉達給了帕切利。

三天后，庇護十一世接見了比利時天主教電臺的員工。美國大使的建議還清晰地印刻在他的腦海里，他決定拋開顧問的意見，聽從自己內心的主見。當他拾起最新的種族運動話題時，他的聲音充盈著情感，淚水涌上他的眼眶。“每一次，當我讀到‘我們的父亞伯拉罕的犧牲’時，”教宗說道，他所指的是神父在彌撒時使用的一句祝福，“我都深深地受到觸動。”他的聲音開始顫抖。“基督徒絕不可能參加反猶運動。我們承認人人都有自衛的權利，有權采取必要的行動，來保衛自身合法的權益，然而我們不能認可反猶主義。在精神上，我們都是猶太人。”  [[11]](#_11__Sale_2009__pp__88_89__Fatto)

這番話正是萊多霍夫斯基、塔基·文圖里、博爾貢吉尼以及帕切利最怕聽到的言論。他們想方設法地限制這番話造成的破壞。當《羅馬觀察報》刊登教宗的講話時，該報完全沒有提及教宗關于猶太人的沉痛之言。  [[12]](#_12__Fan_Di_Gang_Zhi_Yong_Yi_Dua)  教宗講話的次日，一份警方情報報告清晰地顯示出，個別天主教徒注意到梵蒂岡日報不尋常的沉默。這份報告寫道：“許多天主教徒完全贊同教宗最近替猶太人說的話，卻不知道如何解釋梵蒂岡日報的沉默。它是唯一一份不受意大利政府審查的報紙，卻沒有在部長會議的決定后回應這一話題。他們認為這一沉默十分古怪。”  [[13]](#_13__ACS__MCPG__b__164___Notizia)

帕切利和副國務卿多梅尼科·塔爾迪尼到底如何讓梵蒂岡日報忽略教宗的爆炸性言論，這一問題如今仍然是一個謎。這幾個月中，帕切利應當保留了他與教宗會面的記錄，然而奇怪的是，這些記錄的大部分內容都不包含在向研究人員開放的梵蒂岡機密檔案中。

\* \* \* \* \*

墨索里尼認為，意大利是個軟弱的民族。他必須要讓人們強大起來。10月初，在通過附加種族法案的法西斯大議會上，他解釋道：“我有責任苛責意大利人。我知道在某些角落里，有一些好逸惡勞的人，但他們不過是這個民族的邊緣人群。我們會把他們剔除掉。”  [[14]](#_14__Bottai_2001__p__137__7_otto)

在許多意大利人眼里，墨索里尼具有許多神明般的品質，但是在崇拜的感情之外他們對他也有一些恐懼。法西斯文化研究院的兩位會員離開總部時，撞見了年老的看門人，其中一位開玩笑地用手指著另一位，并跟糊里糊涂的看門人說：“你看到那個人了嗎？他是個長生不老的人。”

“你是什么意思？”老人回答道，“沒有人長生不老！”

“啊！我明白了！所以你認為墨索里尼也總有一死！”

“我可沒這么說！”害怕的看門人抗辯道。  [[15]](#_15__Bottai_2001__p__133__8_sett)

大約在同一時間，外交部部長齊亞諾接待了一位訪客，希特勒常派他給墨索里尼傳信，此人便是黑森親王菲利普（Prince Philipp of Hesse）。當年早些時候，正是黑森親王親手帶來希特勒的信函，將納粹德國即將入侵奧地利的消息告知墨索里尼。黑森親王乃德意志皇帝的嫡孫，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曾孫，自1930年便加入了納粹黨。他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德國貴族支持納粹黨的事業。當天抵達齊亞諾辦公室的時候，他顯然十分難堪。他解釋說，自己此行是為了一件私事。1925年，黑森親王迎娶了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的女兒，他的岳母海倫王后要求他代表王室向領袖說情。他們希望種族法案能夠對他們的猶太醫生網開一面。齊亞諾在日記里寫道：“看來王后對驅逐令動了肝火，而且國王雖然信任醫生，卻不敢跟領袖提出這個要求，所以只能倚仗我來友好地出面調停。”看到這位焦慮的德國人如此低聲下氣，齊亞諾高興地笑了。如果他向元首提及黑森親王的請求，希特勒會有什么反應？他大聲說出自己的疑惑，而黑森親王的臉上迅速失去了血色。  [[16]](#_16__Ciano_2002__p__124__Septemb)

9月初，庇護十一世讓塔基·文圖里起草一封寫給墨索里尼的信，要求將受洗的猶太人排除在種族法案之外。教宗同意了初稿，并補充了一些內容。他指示耶穌會特使，要告訴墨索里尼，意大利的種族法案很有可能“招致全世界猶太人的報復行動”。  [[17]](#_17__ASV__AESI__pos__1054__fasc)  幾天后，塔基·文圖里給墨索里尼帶去的教宗信函則言辭更為尖刻。教宗表示，作為一名意大利人，“他眼見著意大利整個審慎明辨的歷史都被遺忘，反而向德國的反猶浪潮開啟大門，感到真切的難過”。  [[18]](#_18__Jiao_Zong_Bu_Chong_Dao__Jia)

然而，當第一批種族法案得到公布時，最令教宗感到難過，也最令教宗身邊的人感到不安的，便是這些法案不僅影響了意大利的猶太人，而且也適用于從猶太教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

9月20日，當塔基·文圖里拜見過教宗之后，他像往常那樣準備了一份文件，向墨索里尼傳達教宗的意愿。他寫道，那些展現出特殊美德（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服役）的猶太人，并不在新法案管轄的范圍內，教宗對這一例外感到欣慰，但他想知道為什么那些“與猶太教堂劃清界限，要求受洗的”猶太人不能被網開一面。教會“希望每一個人都痛恨猶太人的背信棄義，并且抵制猶太教的迷信，讓他們的孩子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些”。教宗特使補充道，那些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處境尤其危險，因為除了種族法案以外，他們的族人也對他們避之不及，認為他們都是叛徒。

塔基·文圖里認為，墨索里尼一方面為那些服役的猶太人網開一面，一方面卻不饒恕那些投身天主教的猶太人，這種做法完全是說不通的。前者的美德“并不如后者偉大，因為只有棄絕曾經的盲目與過錯的劣根，一名猶太人才能變成真正的基督徒”。  [[19]](#_19__ASV__AESI__pos__1054__fasc)

在政府發布種族法案之后，大量猶太教徒和已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向意大利各地的主教尋求幫助，但是主教也不確定教宗期望他們如何回應，于是便用雪花般的信函轟炸了梵蒂岡，希望得到上級的指導。9月下旬，在一封具有代表性的信函中，都靈大主教談及了這點。要是他們以為能夠得到幫助，那么他們就錯了。他在信中報告道：“我必須像往常那樣克制自己，告訴他們保持冷靜，等候進一步的規定，要相信政府，諸如此類。”但是，即便他能打發掉猶太人，那些拋棄猶太教的天主教徒也受到了猶太人的對待，他仍覺得自己無法以同樣的方式面對他們。他寫下這封信，正是出于這番緣由。

塔爾迪尼在回信中表示，自己已經將大主教的信轉達給教宗，并承諾一定會提請政府注意都靈大主教提及的案例。他讓塔基·文圖里著手處理這個問題。  [[20]](#_20__ASV__AESI__pos__1054__fasc)

意大利猶太人的孤立感變得愈發強烈。時年十九歲的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是都靈大學的一名學生，他在作品中回憶起種族法案頒布的最初幾個月：“我的基督徒同學都很有禮貌。他們和學校的教授從來不用敵意的話語或姿態針對我，但是我感到自己與他們愈發疏離……他們和我交換的每一個眼神都伴隨著少許盡管微小但能夠察覺到的畏縮與懷疑。你們是怎么看我的？我對你們來說算是什么？就像半年前你們當中那位不做彌撒的同胞一樣，還是只是一個猶太人？”  [[21]](#_21__Pu_Li_Mo__Lai_Wei____Zhou_Q)

一位猶太女性在9月的日記中描寫了整個家庭的處境。她的丈夫是一位科學家，他感到非常沮喪：他近來收到一封信，里面退回了他投給雜志的一篇文稿。他的妻子記載道：“編輯連同稿件退回的，還有一些令人難堪的話，‘這篇文章沒辦法刊登了，非常遺憾’，諸如此類。然后他打開了下一封信。‘科學院院長根據最近收到的相關指示，建議將他的名字從會員的名單中刪除’……令人害怕的空虛感再次侵入他的體內，橫掃他的心靈。突然間，他第一次發現，活下去的唯一真正的理由已經被剝奪掉了。”  [[22]](#_22__Yin_Zi_Xi_Er_Wei_Ya__Long_B)

在另一戶猶太家庭，一位小女孩拒絕離開自己的房間，不想再吃任何東西。那本該是她上學的第一天，但是她沒有辦法與其他女孩子分享這一喜悅，因為她是個猶太人。母親在日記里寫道，她心煩意亂地進入女兒的房間，“她的心已經提到了嗓子眼”。她這樣描述那個場景：“年輕人的眼淚總是難以抹干……房間顯得特別安靜、空曠。然后我看到了她，橫躺在床上，陷入了睡眠。她的臉頰依舊濕潤，她的手里依然攥著手帕，她的疑問依舊在這個沉寂的房間回響。”  [[23]](#_23__Nidam_Orvieto_2005_pp__162)

\* \* \* \* \*

3月吞并奧地利之后，納粹黨人如今威脅要拿下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地區。9月12日，希特勒在紐倫堡的一次演講中發誓，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主動奉上這片土地，那么德國將用武力奪取它。  [[24]](#_24__Lamb_1997__p__221)  恐慌在歐洲散布開來。9月下旬，六十萬人因為擔心德國即將入侵而逃離巴黎。

在這番瘋狂的混亂中，領袖抓住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邀請他出席慕尼黑的一場和平會議，幫助調解蘇臺德地區的爭議。

法國、英國、德國以及意大利的領導人于9月20日抵達會議地點。壯實的墨索里尼身穿貼身軍裝，下巴前伸，面部表情宛若愷撒，各種舉動仿佛他（而不是希特勒）才是地主。同樣身穿軍裝的齊亞諾則跟在岳父身邊。張伯倫身穿一套華麗的西裝，眉毛濃密，面部輪廓俊朗，雙手因風濕病而蜷曲著，整個形象猶如英國郵票上的貴族外交官。穿著西裝的希特勒則十分拘束，臉色有點蒼白，老是動來動去。他不通外語，所以只能依靠墨索里尼，因為在所有政府首腦中只有他幫德國人說話。  [[25]](#_25__Fa_Guo_Zhu_Bai_Lin_Da_Shi_A)

一張會議的照片顯示，墨索里尼身穿淺色軍服，頭頂剃得干干凈凈，面帶威脅地看著張伯倫，而后者則身穿深色西裝和高領襯衫，似乎努力想要說服墨索里尼。對墨索里尼來說，這位打雨傘的英國首相，代表著法西斯政府試圖打敗的陳舊價值觀念。“我可不想在我周圍看到雨傘，”他曾經說過，“雨傘是資本主義的殘骸，是教宗士兵揮舞的武器。打傘的人可沒法建立帝國。”  [[26]](#_26__Lamb_1997__figs__12_13__Nav)

當領袖在慕尼黑談判時，教宗來到梵蒂岡電臺，在節目中祈求世界和平。他使用的語言并非拉丁語，而是意大利語，因為他迫切想讓民眾消化他的意圖。當向“所有天主教徒以及整個宇宙”發表講話時，他的雙眼已經因為淚水而紅腫。“在我們的世界上，有數百萬人活在戰爭、史無前例的屠殺以及家園淪為廢墟的恐懼中，”他在廣播中說道，“我們都有一顆父親的心，能夠體會那么多孩子的擔心和恐懼，我們邀請主教、神父、宗教團體成員，以及所有信徒加入我們的行列，以最堅持、最具有希望的心，祈禱正義與仁慈能夠維護和平。”  [[27]](#_27____Dang_Shu_Bai_Wan_Ren)

回到慕尼黑的會議，墨索里尼推出了他的和平方案，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推出了希特勒的和平方案，并將其占為己有。會議的結果允許德國占領蘇臺德地區。英法兩國政府這一丟臉的綏靖行為，換來希特勒答應不再進一步擴張。此次會議并沒有邀請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卻將這個國家一分為二。

墨索里尼返回意大利時受到了英雄凱旋般的歡迎。在火車鐵軌兩旁的田野里，農夫雙膝跪地，迎接這位給歐洲帶來和平的偉人。此時離種族法案的宣布已經過去一個月，而這件事不過是眾多證明墨索里尼依然受大眾歡迎的跡象之一。  [[28]](#_28__Milza_2000__pp__762_763__Ra)  至于希特勒，他的戰爭要等到次年才會正式打響，但是他從這場和平會議里面獲知了一個重要的信息。1939年8月，當準備派兵攻打波蘭時，他告訴手下的幾位將軍：“我們的敵人都是些小蠕蟲。我在慕尼黑見識過他們的德性。”  [[29]](#_29__Kershaw_2000__p__123)

米蘭的舒斯特樞機便是一個極力為墨索里尼歌功頌德的人。在一封熱情洋溢的公開信中，他聲稱“意大利之所以自豪，是因為領袖為和平做出了如此寶貴的貢獻”。他建議建造一座新的教堂，獻給墨索里尼在和平一事上取得的成功。聽聞這位大主教的提議后，教宗破口大罵。“簡直是一場災難！”他朝塔爾迪尼大呼小叫，“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原以為他不至于蠢到這個程度！”  [[30]](#_30__ASV__AESS__pos__560__fasc)

回國幾天后，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大議會上處理了幾個反對種族法案的“頑固分子”。他堅稱這個國家的反法西斯殘黨都是猶太人。領袖被教宗的批評刺痛，認為庇護十一世是“對天主教會的未來貽害最大的一任教宗”。  [[31]](#_31__Bottai_2001__p__136_Bo_Ta_Y)



米蘭大主教伊爾德方索·舒斯特樞機（右）與墨索里尼

在會議結束后不久，領袖自負地告訴克拉拉·佩塔奇，教宗簡直是一場“災難”。“如今，只有我們，也只有我還支持這個教會……而他卻做出這么無恥的事情，就好比在說我們都是猶太人。”領袖已然陷入了狂怒的情緒。“你都不知道他們造成了多大的麻煩，”他告訴克拉拉，盡管后者對這件事不感興趣，“他令所有天主教徒感到失望，他總是發表一些用心險惡、令人震驚的演講。總而言之，他作惡多端。”領袖繼續一邊思索一邊說道，歷史上被稱為庇護的教宗都伴隨著不幸的事件，他們都帶來了災難。庇護六世和庇護七世被拿破侖趕出了羅馬城；庇護九世丟掉了羅馬和教宗國；庇護十世眼看著整個歐洲爆發戰爭。“他正在失去整個世界，如今他還冒險毀滅他在意大利擁有的一切。啊，真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他最后說道，身為一名天主教徒，“我不得不說，想要找出一位比他更差的教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2]](#_32__Zhuan_Yin_Zi_Petacci_2010)

法西斯大議會通過了種族法案，《公教文明》則將其連同官方的解釋全文刊登，不作任何評論。政府聲稱：“猶太因素領導著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因此我們急需進一步對付他們的措施。法西斯黨絕對容不下猶太人黨員；他們不得擁有或管理雇員超過一百人的企業；他們不得擁有五十公頃以上的土地；他們不得在意大利軍隊服役。政府將很快公布其他措施，在專業領域對他們進行限制。政府將為猶太人建造特殊的中學，以補充現已得到批準的猶太人小學。  [[33]](#_33__CC_1938_IV__pp__269_271)

教宗對種族法案發表的新一輪見解令齊亞諾十分擔憂，但是當他得知一切仍將相安無事時，又松了口氣。意大利駐梵蒂岡代辦告訴他，只要新頒布的法案不把那些從猶太教皈依天主教的教徒當成猶太人，圣座就不會提出任何反對意見。梵蒂岡還強調政府不應當違反宗教事務協約的規定：其條款清楚無誤地規定，但凡教會許可的婚姻關系，國家必須予以認可。這位意大利外交官告訴齊亞諾：“大議會的種族公告中，教會反對的只有這一條而已。”  [[34]](#_34__DDI__series_8__vol__10__n)

新種族法案發布當天，多梅尼科·塔爾迪尼留有一份筆記，確證了對教宗立場的這番解讀。“今天晚上，在圣父的授意下，”他寫道，“《羅馬觀察報》將刊登一篇短文，表達一些關切，并希望未來的法案能夠打消我方的疑慮。”  [[35]](#_35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在教宗眼里，新頒布的種族法案是一項更為龐大且令人心憂的謀劃的縮影。墨索里尼并不打算建立一個懺悔的國度，也不希望法西斯黨被天主教價值觀滲透，實際上他想要另立門戶，建設法西斯黨自己的宗教。9月中旬，庇護十一世在接見一群法國工會成員時，道出了自己的關切。庇護十一世說，有些人認為一切都應當屬于國家，他們愿意接受國家的極權統治。這樣的觀點太過荒謬。“如果世上應當有一個極權政府，”他對他們說，“其極權統治具有事實基礎和正當性，那么這個政府只能是教會，因為所有人都完全歸屬于教會。”  [[36]](#_36__Zhuan_Yin_Zi_Guasco_2010__p)

教宗甚至開始質疑，他是否應該繼續支持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權。盡管他的脫稿講話依然令法西斯官員以及梵蒂岡顧問提心吊膽，但是他對具體反猶措施的反對聲音依然相對克制。教宗身邊的人顯然不反對這些措施。意大利代辦卡洛·費恰·迪·科薩托將梵蒂岡高層官員的看法透露給墨索里尼和齊亞諾，他們認為近來的種族法案，“總體上而言并沒有在梵蒂岡引起反對聲”，唯一的反對意見在于，種族法案侵犯了教會對合法婚姻的界定權利。“我從國務院非常事務部代部長蒙蒂尼蒙席那里確證了這些觀點，尤其是圣座最關心的（盡管不是唯一關心的）改宗猶太人的婚姻問題。”

科薩托還就耶穌會士的問題補充了一條，呼應了皮尼亞蒂早先的建言。他解釋道：“盡管其學說原理與我們有所不同，但耶穌會士向來都是堅定的反猶人士。”但鑒于他們不允許自己在臺面上與教宗意見相左，科薩托建議道，最好讓耶穌會在不引人注目的前提下妖魔化猶太人，因為“無論在暗處，還是在實際層面，他們都曾是我們最好的盟友，未來也許可能還是我們最好的盟友”。  [[37]](#_37__DDI__series_8__vol__10__n)

同一天晚上，科薩托會見了羅薩神父，后者論“猶太問題”的最新文章剛剛在《公教文明》上登載。羅薩告訴他，自己這篇文章得到了梵蒂岡的授意，“目的是打消讀者可能持有的錯誤印象，錯以為耶穌會總是全面支持法西斯政府采取的種族措施”。不過同羅薩談話之后，科薩托又打消了自身的疑慮，他告訴齊亞諾：“直到今天，耶穌會士仍然具有鮮明且根本的反猶信念。”  [[38]](#_38__ASMAE__AISS__b__102__l_inca)

\* \* \* \* \*

在參加10月初法西斯大議會前不久，齊亞諾喊來了教宗大使，向他展示自己從近期一場圣體大會處收到的報告。博爾貢吉尼在紙頁上看到了墨索里尼標志性的彩鉛記號。好些與會神父發表了批評意見，令獨裁者非常不滿，其中有一則令他格外生氣。那位神父警醒道：“天主必將懲罰德意志人民，以及所有踏上他們道路的人。”齊亞諾表示，雖然領袖不想和教會發生沖突，但是教宗必須明白一件事情，除非他能封住這些神父的嘴，否則政府將被迫采取行動。

大使向齊亞諾保證：“如果再出現言語不節制的情況，我們必將最先提醒神職演講者注意他們身上的責任。”然而教宗并不贊同大使這番怯懦的觀點。幾天后，當庇護獲知這些神父“不節制”的言論時，他驚呼：“Benissimo！Giustissimo！”（“太棒了！說得太對了！”）他還補充道：“得有人站出來說這樣的話！”

在同一場會面中，博爾貢吉尼還向齊亞諾轉達了教宗的請求，希望墨索里尼能代表教會與希特勒協商。教宗心痛地得知，納粹對教會的迫害也延伸至奧地利和蘇臺德地區。“很明顯，除了總理閣下以外，再也沒有人能對希特勒施加影響，”大使告訴齊亞諾，“我懇請您告訴墨索里尼閣下，只有他能夠讓元首停止迫害行動。”

然后，博爾貢吉尼又轉向了貝加莫法西斯黨頭目的問題。他的這番話有著獨特的價值，因為它們指向墨索里尼在8月中旬與教會達成的秘密協議，墨索里尼通過在公教進行會利益問題上的讓步，換取教宗認可意大利的種族法案。“我要求部長[齊亞諾]處理好貝加莫的事情，”大使后來向帕切利報告說，“因為他的上級已經承諾在9月底撤除此人的職務，但他如今依舊在職。”  [[39]](#_39__ASV__ANI__pos__24__fasc__14)

墨索里尼意識到自己還沒有兌現全部的承諾，于是他召來了塔基·文圖里。他表示，貝加莫一事已經耽擱了太久太久，用他繪聲繪色的語言來說，就是久得已經長出了“la barba troppo lunga”（“一大把胡子”）。  [[40]](#_40__Tacchi_Venturi_a_Monsignor)  他會立即撤除這位地方法西斯頭目的職務，與此同時，他希望教宗能夠開除貝加莫公教進行會委員會的四名成員，因為他們曾經是人民黨活動分子。  [[41]](#_41__Ta_Ji__Wen_Tu_Li_Yi_Tu_Wei)

當庇護十一世得知領袖的訴求時，表現得非常驚訝，原來有這樣過往的人依舊藏身于公教進行會的領導層。他原以為他們已經全部被肅清了。  [[42]](#_42__ASV__AESS__pos__560__fasc)  教宗立即下令開除這四名成員，反倒令塔爾迪尼頗為訝異。10月14日，貝加莫的報紙刊登了四位委員會成員辭職以及貝加莫法西斯黨頭目被撤職的新聞報道。  [[43]](#_43__ASV__AESI__pos__1060__pos)

教宗的情緒起伏依舊劇烈，這與他的健康狀況也有所關聯。他時而抑郁或暴怒，消停后會有幾天顯得相對溫柔。10月初，當他讓塔爾迪尼寫信處理一樁米蘭修道院的事宜時，教宗開起了玩笑：“修士之事！有句俗話說得很對，‘那些身穿白罩衣頭戴兜帽的家伙，從來說不出什么好話！’”  [[44]](#_44__Chu_Zi_Ta_Er_Di_Ni_De_Bi_Ji)  幾天后，他命下屬在維也納物色一名年輕神父，讓他記錄當地發生的事情，并向梵蒂岡提交秘密報告。他口吐妙語：“如果我還年輕，我可是很樂意接受這樣的差事！”  [[45]](#_45__ASV__AESS__pos__560__fasc)

但是教宗的情緒也可能急轉直下。當塔爾迪尼向他報告貝加莫新任法西斯黨頭目已經拍馬上任時，他補充說自己希望當地的情況能有所改善。“如果他們再收走一張[法西斯黨]黨員證，”教宗的回答中又顯露出過去暴躁的脾氣，“我會積極介入此事！我會讓它變成丑聞！我會讓全世界都知道！收走黨員證就意味著收走面包。”他越講越激動：“我會給法西斯好看！人的年齡可不是虛長的！老家伙總是能倚老賣老，我打算好好利用這一點！”  [[46]](#_46__ASV__AESS__pos__560__fasc)

如果說病弱的教宗對墨索里尼感到不滿，那么他對本國同胞也同樣不抱信心。10月中旬，當教宗與塔爾迪尼談及新頒布的種族法案時，教宗說道：“意大利人不過是一群綿羊。”然后他進一步說道：“在這一點上，我們倒不必對墨索里尼感恩戴德。”  [[47]](#_47__ASV__AESS__pos__560__fasc)

[[1]](#filepos1164275) “各家報紙都在引述《公教文明》，因為它在當今的反猶運動中占據了顯著的位置，尤其是它在1890年發表的三篇文章，”這份刊物的耶穌會作者寫道，“說實話，我們必須明白的一點是，這場富有活力的運動（由猶太人的侵略和傲慢所引發）不能歸功于‘明白如何用法西斯的手段解決種族問題’……《法西斯政府報》（8月28日）就是這么一套說辭。”CC 1938 III, pp. 559–561.

[[2]](#filepos1164713) CC 1938 III, pp. 559–561.

[[3]](#filepos1165846) 恩里科·羅薩，《猶太問題與〈公教文明〉》，CC 1938 IV, pp. 3–16。

[[4]](#filepos1166331) Matard-Bonucci 2008, p. 309; Onofri 1989, p. 153.

[[5]](#filepos1167475) 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47r, “Appunto,” 1 settembre 1938.

[[6]](#filepos1167929) 帕切利還致信舒斯特樞機（他是米蘭大主教，對科莫主教有管轄權），以及毛里上頭的都靈大主教。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49r, Pacelli al Cardinale Schuster, 2 settembre 1938.

[[7]](#filepos1168367) 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53r, Alessandro Macchi, vescovo di Como, 15 settembre 1938；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54r, Sac. A. Negrini, Como, 15 settembre 1938。在后來的一份報告中，帕切利得知了這樁事件的始末。原來這位法西斯黨領導人在阿普里卡擁有一家旅館，并且一直跟住在隔壁的修女有沖突。在這份描述中，這位法西斯領導人夸大了毛里的說辭，目的在于讓那些修女難堪。ASV, AESI, pos. 985, fasc. 671, f. 60r, “Circa l’incidente sollevato in occasione del discorso tenuto in Aprica.”

[[8]](#filepos1169919) Gallagher 2008, pp. 72–73.請讀者諸君回憶，美國并不承認梵蒂岡是個主權國家，所以也就沒有跟梵蒂岡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

[[9]](#filepos1170725) 菲利普斯還深信，墨索里尼既不了解美國，也不明白美國的重要性。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復述了一封羅斯福總統在1938年9月15日寄給他的信件，羅斯福在信中向他透露了自己的觀點。羅斯福表示，墨索里尼及其身邊的人對美利堅合眾國的無知，令他想起了幺子約翰尼同意大利財政部部長的一番對話。當部長建議總統訪問墨索里尼時，羅斯福之子則建議也許領袖也可以來華盛頓訪問他的父親。部長的表情似乎有點古怪，“約翰尼便非常禮貌地告訴他，美國的人口是意大利的三倍，資源則是意大利的十倍，把整個意大利裝進得克薩斯州都綽綽有余”。Phillips 1952, p. 219.

[[10]](#filepos1171462)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1, ff. 8r–10r, “Appunto,” Hurley, 3 settembre 1938.

[[11]](#filepos1172413) Sale 2009, pp. 88–89; Fattorini 2012, p. 390.教宗在這段話里提及一個國家擁有自衛的權利，其具體意涵參見Kertzer 2001, pp. 279–280。教宗呼吁抵制種族法案的當天，電臺神父查爾斯·考夫林致信墨索里尼，表示自己愿意提供幫助。考夫林邀請墨索里尼為他的雜志《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 ）撰寫一篇文章，這份雜志的讀者有數百萬人，領袖的文章可以“厘清”他“對猶太人的態度”。考夫林最后寫道：“祝天主保佑閣下安康，祈禱意大利帝國在您的帶領下粉碎共產主義。”墨索里尼最后決定不寫這篇文章。ACS, MCPR, b. 3, Coughlin a Mussolini, 6 settembre 1938; ACS, MCPR, b. 3, stampa estera, telegramma n. 16848 a R. Ambasciata d’Italia, Washington, 18 ottobre 1938.

[[12]](#filepos1172838) 梵蒂岡只用一段話報道了這次接見，完全沒有提及關于種族或反猶主義的講話。《圣父贊揚了比利時青年的朝圣之旅》，OR, 9 settembre 1938, p. 1。

[[13]](#filepos1173382) ACS, MCPG, b. 164, “Notizia fiduciaria,” Roma, 7 settembre 1938.

[[14]](#filepos1174323) Bottai 2001, p. 137 (7 ottobre 1938).

[[15]](#filepos1175142) Bottai 2001, p. 133 (8 settembre 1938)。

[[16]](#filepos1176540) Ciano 2002, p. 124 (September 10, 1938); Lamb 1997, pp. 206–207.兩天后，國王為了醫生的事情，直接找內務部副部長布法里尼·圭多談話。國王對種族法案的懦弱默許再次暴露無遺。國王非常不安，因為好些軍功卓著的猶太軍官聯系到他，對新近的反猶運動提出抗議。當布法里尼告訴他，法案規定對這類人網開一面時，國王回答說，“總理[墨索里尼]這般區別對待，承認這些猶太人對祖國的忠心可圈可點，令我感到十分高興”。他進一步說道：“我確信總理強大的洞察力、深刻的直覺力和豪氣的慷慨必然會導向這樣的作為。”轉引自De Felice 1981, p. 492。

[[17]](#filepos1177014)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 48r, 6 settembre 1938, Consegnato dal P. Tacchi Venturi perriferire al S. Padre, 6 settembre 1938;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 46r, 7 settembre 1938, Segreteria di Stato di Sua Santità, 7 settembre 1938。

[[18]](#filepos1177398) 教宗補充道，教會總是教導教徒，基督徒和猶太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而亞伯拉罕則是所有人的祖先。教宗的這些指令是通過帕切利樞機傳達的。本信內容由帕切利手寫，收于他與教宗的會面記錄中，但沒有同其他國務卿記錄放在一起。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 45r, “Udienza del 9 settembre 1938.”容納這些談話記錄的梵蒂岡文件名透露了很多信息。盡管教宗對這個問題的想法會有所不同，但是帕切利麾下的國務院則重點明確：“給塔基·文圖里神父的指導意見，用于同政府首腦商談種族問題。有關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問題。”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 40r, settembre 1938.就在塔基·文圖里與墨索里尼商討種族法案的同一天，皮尼亞蒂也會見了帕切利。他們討論的問題是：法西斯黨為那些有工薪階層女孩參加的公共舞會提供資助，教宗已經多次就此提出怨言。ASMAE, APSS, b. 42, Pignatti a Starace, 10 settembre 1938.

[[19]](#filepos1178930)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27, ff. 41r, 43r, 20 settembre 1938.

[[20]](#filepos1180096)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2, ff. 48r–48v, Cardinal Fossati, arcivescovo di Torino, a Domenico Tardini, 28 settembre 1938; 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2, f. 49r, Tardini a Fossati, 1 ottobre 1938; Tardini a Tacchi Venturi, 1 ottobre 1938。

[[21]](#filepos1180864) 普里莫·萊維，《周期表》，轉引自Cavarocchi and Minerbi 1999, p. 483。

[[22]](#filepos1181681) 引自西爾維婭·隆布羅索（Sylvia Lombroso）的日記，Nidam-Orvieto 2005，p. 162。

[[23]](#filepos1182446) Nidam-Orvieto 2005，pp. 162–163。

[[24]](#filepos1182917) Lamb 1997, p. 221.

[[25]](#filepos1184051) 法國駐柏林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André François-Poncet）對這次會議留有一份極佳的描述。轉引自De Felice (1981, p. 528)。愛德華·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則是法國出席這次會議的代表。

[[26]](#filepos1184696) Lamb 1997, figs. 12–13; Navarra 2004, p. 38.英國人盡管打傘，卻依然建立了一個相當巨大的帝國，不過納瓦拉認為最好不要提及此事。

[[27]](#filepos1185557) 《當數百萬人》，1938年9月29日，http://www.vatican.va/holy\_father/pius\_xi/speeches/documents/hf\_p-xi\_spe\_19380929\_mentre-milioni\_it.html。庇護十一世對慕尼黑協議并不滿意。他向夏爾——魯抱怨說，法國人沒有給捷克斯洛伐克足夠的支持，而且英法兩國沒讓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坐上談判桌，就將其領土割讓給德國，這簡直太過無恥。9月30日接見兩位意大利議員時，教宗發表了自己的這番觀點，并傳到了墨索里尼耳里。領袖大發雷霆。他怒道，教宗顯然還在自討苦吃。MAESS, vol. 38, 209–210, Charles-Roux, 5 octobre 1938.

[[28]](#filepos1186429) Milza 2000, pp. 762–763, Rauscher 2004, pp. 261–264; Grandi 1985, pp. 452–453; De Felice 1981, p. 530.近來有許多著作挑戰了固有觀念，認為種族法案并沒有在意大利受到排擠，也并未導致政權支持率的下降：Rigano 2008; Pavan 2010; Israel 2010。米科利（2004, p. 25）否認種族法案降低了意大利天主教徒對墨索里尼的支持率，而是將這一支持率的下降時機定在1942年，當時正值戰事開始惡化。

[[29]](#filepos1186843) Kershaw 2000, p. 123.

[[30]](#filepos1187494)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98v, Tardini, diario, 2 ottobre 1938.許多神父都稱贊墨索里尼是天主派來拯救意大利和歐洲的人物，而舒斯特不過是這眾人中的一位。最令人反胃的一篇頌詞來自坎波巴索大教堂大司祭，他在10月7日的布道中將墨索里尼稱為新的摩西。Piccardi 1995, pp. 218–220.

[[31]](#filepos1187929) Bottai 2001, p. 136.博塔伊的日記記錄下墨索里尼的話語，并對種族法案表示強烈的支持。

[[32]](#filepos1189444) 轉引自Petacci 2010, p. 421。

[[33]](#filepos1190197) CC 1938 IV, pp. 269–271.

[[34]](#filepos1190935) DDI, series 8, vol. 10, n. 238,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Fecia di Cossat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Ciano, 7 ottobre 1938.

[[35]](#filepos1191384)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0r, 12r, 7 ottobre 1938.

[[36]](#filepos1192237) 轉引自Guasco 2010, pp. 94–95。

[[37]](#filepos1193691) DDI, series 8, vol. 10, n. 252,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Fecia di Cossat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Ciano, 10 ottobre 1938.

[[38]](#filepos1194336) ASMAE, AISS, b. 102,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Fecia di Cossato, al ministro degli affari esteri, Ciano, 11 ottobre 1938.早先，科薩托也提交過許多報告，表明耶穌會強烈支持政府的反猶運動，科薩托在此提及了他在8月5日和17日提交的報告。這些日期非常重要，因為正是在這幾周內，墨索里尼制定了第一批反猶法案，并迫切地希望教會明確支持他的反猶運動。

[[39]](#filepos1196593) ASV, ANI, pos. 24, fasc. 14, ff. 160r–163r, Borgongini a Pacelli, 10 ottobre 1938.梵蒂岡國務院的文件中有一張日期為1938年10月7日的紙條，同樣指向了墨索里尼與塔基·文圖里在8月17日達成的秘密協議，并認為它已經生效。ASV, AESI, pos. 1060, fasc. 747, f. 6r.

[[40]](#filepos1197015) Tacchi Venturi a Monsignor A. Bernareggi, vescovo di Bergamo, 11 ottobre 1938, published in Presenti 1979, p. 562.

[[41]](#filepos1197325) 塔基·文圖里意圖為領袖美言，于是在次日告知教宗：“他用一副非常抱歉的神情告訴我這些話，他對這個問題耽擱了這么久表示抱歉，并希望以最大的善意重新解決這個問題。”ASV, AESI, pos. 1060, fasc. 747, f. 4r, Tacchi Venturi a Pio XI, 11 ottobre 1938.

[[42]](#filepos1197658)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07r, 10 ottobre 1938.教宗對塔爾迪尼下達指令，要求他盡快宣布開除貝加莫法西斯黨頭目以及公教進行會委員會成員的消息。當塔爾迪尼建議把日期選在15日周六時，教宗回答說：“不行，太遲了！況且那是周末。把兩件事都安排在14日周五。”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f. 107v–108r, 11 ottobre 1938.貝加莫這四名優秀而又受人尊敬的公教進行會委員會成員遭到開除，令貝加莫主教非常不滿。塔基·文圖里在安撫他時告訴他，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這些人應當愿意盡最大的努力為公教進行會謀求好處。他補充道：“我還認為，稍稍調整黨衛軍（這里他使用了法西斯術語）人選，不會給機構造成傷害。”Tacchi Venturi a Monsignor A. Bernareggi, vescovo di Bergamo, 11 ottobre 1938, in Presenti 1979, p. 562.

[[43]](#filepos1197978) ASV, AESI, pos. 1060, pos. 747, f. 17r, l’incaricato d’affari presso la Santa Sede, Conte Carlo Fecia di Cossato, consigliere dell’ambasciata d’Italia presso la Santa Sede, a Domenico Tardini, 12 ottobre 1938;ASV, AESI, pos. 1060, pos. 747, 18r–19r, Tardini a Fecia di Cossato, 13 ottobre 1938;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08v, 12 ottobre 1938。

[[44]](#filepos1198505) 出自塔爾迪尼的筆記。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06r, Tardini, 9 ottobre 1938.教宗的話語采取了意譯的手法，英語譯文感謝萊斯莉·里瓦（Lesley Riva），意大利原文是：“Roba da frati! È proprio vero che: cappuccio e cotta sempre borbotta!”

[[45]](#filepos1198842)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09r, 14 ottobre 1938.

[[46]](#filepos1199573)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12r, 15 ottobre 1938。

[[47]](#filepos1200049)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14r, 16 ottobre 1938。

##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戰役

那個曾經幫助教宗秘密起草種族主義通諭的古斯塔夫·貢德拉赫，如今已經回到了羅馬，但他并不開心。9月，他與兩位同仁將草稿交給了萊多霍夫斯基，以為耶穌會總會長會直接將它轉給教宗。《種族科學家宣言》的刊登以及第一批種族法案的宣布，令他們堅信教宗想要盡快看到他們的初稿。然而，貢德拉赫卻得知，耶穌會總會長將草稿的“刪節版本”寄給了恩里科·羅薩神父，于是他急忙通知美國同仁，并讓他將這一切告訴教宗。“你原本希望這份文件可以不經他人之手，這一希望如今落空了，”他告訴拉法奇，“你對老板（萊多霍夫斯基的代號）的忠誠沒有獲得回報。事實上，你對老板的忠誠可能阻礙了你對費希爾先生（他們給庇護十一世起的有趣代號）的忠誠，最終會讓你受到斥責。”他最后說道：“與此事無關的人士，可能會認為費希爾先生直接將任務托付給你，而你做的這一切，無論是行動拖拉還是出于策略或外交的緣由，都是對這項任務的蓄意破壞。”  [[1]](#_1__Passelcq_and_Suchecky_1997)

\* \* \* \* \*

希特勒在意大利的勝利之旅令許多美國人對領袖的印象大打折扣。如今，意大利又落實了種族法案，墨索里尼在美國的名聲已然跌至谷底。意大利駐美國大使館發給羅馬的長篇報告記錄了這個跌落的過程。“眾所周知，美國天主教徒（始自教會高層，其中芝加哥大主教芒德萊恩樞機最具有代表性）從一開始就對納粹官方的反天主教姿態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反基督教姿態持有敵意，其怒火也是愈燃愈烈。”大使館在報告里寫道，種族法案的落實以及近期的意大利公教進行會紛爭，“使得美國人更加擔心意大利教會的未來，因為對于洞察力有限的公眾而言，意大利教會對法西斯和納粹一視同仁……在公眾眼里，兩者都是不太受歡迎的極權政府”。  [[2]](#_2__ASMAE__APSS__b__39__fasc__1)

法西斯政府和美國政府之間的關系也在迅速惡化。意大利各家報紙無意嘗試改善局面，并指控美國受到了猶太人的主宰。他們列出了一份幾乎全部是猶太人的名單，聲稱它很有可能是下一屆的美國內閣名單，總統由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擔任，副總統則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3]](#_3__Ba_Lu_Ke_Ceng_Shi_Yi_Wei_Hua)  ，列昂·托洛茨基則被列為國防部部長——他既不是美國人，也不住在這個國家的事實似乎并沒有給這份名單的遐想造成什么阻礙。  [[4]](#_4__Mei_Guo_Da_Shi_Jiang_Zhe_Yi)

\* \* \* \* \*

墨索里尼規劃的新婚姻法也令庇護十一世感到心煩意亂，因為它將禁止受洗的猶太人同其他天主教徒結成連理。他要求大使準備一份正式的意見書。  [[5]](#_5__ASV__AESS__pos__560__fasc__5)  教宗在腦海里構想的是一篇表達天主教原則的陳詞，但博爾貢吉尼認為它應當包含更多的內容。梵蒂岡需要給種族法案的起草提供指引，這樣它才不會與教會的教導相抵牾。大使說：“我們必須提議一條出路。否則政府……憑自己可沒辦法找到出路。然后，一場大斷裂毫無疑問將會發生。”  [[6]](#_6__Ting_Dao_Bo_Er_Gong_Ji_Ni_Zh)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教宗大使會盡一切可能防止這場大斷裂的發生。

博爾貢吉尼的初稿敦促政府在制定新法律時不要忽視“宗教因素”。“政府有必要將一般的猶太人和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區別開來，因為這些胸懷勇氣和英雄主義的人已然同自身的民族根源徹底決裂。”  [[7]](#_7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為了讓自己的提議更好被墨索里尼接受，他還偏離主題，表示梵蒂岡實則支持種族法案的抱負。“當然了，無論是出于道德的原因抑或健康的原因，[天主教會]會訴諸所有可以利用的手段，反對白人與黑人的聯姻以及任何不同種族之間的結合。  [[8]](#_8__Ta_Er_Di_Ni_Zai_Ci_Chu_Yong)  由此便可避免混血兒的誕生，他們會將兩個種族的缺點集合到自己身上。”但是，“教會也不能將勸阻之舉變成絕對的禁令”。

博爾貢吉尼給出了兩個妥協方案。不符合種族法案的婚姻關系，可以通過國王的權力而得到豁免。或者換一個方案，新的法案可以增加一個條款，對于那些與法案相沖突，卻受到宗教事務協約第三十四條（宗教婚姻具有民事效力）管轄的婚姻關系，只要得到教宗的審定和許可，便可以被法案所接受。  [[9]](#_9__Bo_Er_Gong_Ji_Ni_Ji_Yu_Yao_D)

教宗召來了塔爾迪尼和塔基·文圖里，對往后的策略進行商討。塔爾迪尼提及，但凡批評種族主義文章都遭到了政府的禁止，即便只批評德國種族政策也不能幸免。“但是這一切根本就是恥辱！”教宗說道，“我以意大利人而不是教宗的身份感到無地自容！意大利人民已經成為一群愚蠢的綿羊。我要大聲說出我的意見，不懼怕任何后果。宗教事務協約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但是它絕沒有我的良知重要……這些人全部都變成了法里納奇。無論是作為教宗，還是一名意大利人，我都感到徹頭徹尾的失望！”

可是當風暴（這是塔爾迪尼形容教宗發怒的用語）過去之后，執著的塔基·文圖里不合時宜地拿出了一張教宗的照片，要求他簽名題獻給墨索里尼的兒子布魯諾（他將在幾天之后舉行婚禮）。教宗說道：“我可沒興趣在墨索里尼的姓氏下簽上我的名字！”但他最后還是給那張照片簽名了，而塔基·文圖里也一早就預料到了這個結局。  [[10]](#_10__You_Guan_Ci_Ci_Shang_Tao__T)

事情談妥之后，庇護十一世和耶穌會士開始追憶往昔。塔爾迪尼回憶道：“兩人都已經老了，一位八十二歲，另一位七十七歲，卻依然矍鑠而睿智。”他們旁征博引《舊約》和《新約》的典故，為舊相識的軼事開懷大笑，其中好多人已經與世長辭。  [[11]](#_11__ASV__AESI__pos__560__fasc)  這種輕松的玩笑話是教宗很少與他人分享的。

那天晚些時候，塔爾迪尼、塔基·文圖里和博爾貢吉尼相聚在多梅尼科·約里奧（Domenico Jorio）樞機的公寓里。  [[12]](#_12__Li_Yi_Ji_Sheng_Shi_Bu_Mi_Sh)  作為禮儀及圣事部部長，約里奧負責管轄婚姻章程。教宗要求他們從僵局中求得出路，于是他們想出了一個方案，并得到了教宗的首肯。教宗大使與塔基·文圖里將嘗試說服政府官員，他們絕不愿意“在明顯有出路可走的情況下，為了個別鮮見的[跨族婚姻]案例”而令圣座與政府的關系破裂。他們會取得擬定法案的復本，“并嘗試給出恰當的修改建議”。  [[13]](#_13__A_Er_Fu_Lei_Duo__Ao_Ta_Wei)

可是當塔基·文圖里提出同墨索里尼會面時，領袖拒絕了這一要求，讓他把想說的話付諸文字即可。  [[14]](#_14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因此，耶穌會士便給領袖寄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聲稱天主教會長久以來一直都反對混合婚姻。它們“非常稀少，之所以得到容忍，完全是因為人們的良知”。他向墨索里尼保證，為了同領袖達成和解，教宗愿意再退一步：“圣父愿意做出承諾，這類婚姻將進一步減少，并且必須得到教宗的直接審批才可以締結。”

塔基·文圖里如此不顧一切地試圖達成交易，不僅讓教宗直接參與到了種族運動之中，并且掩蓋了一處關鍵的區別：它不僅對教會至關重要，而且也是梵蒂岡在種族法案一事上的核心爭議。教宗提出反對意見，并不是因為墨索里尼禁止了教會眼里的“混合婚姻”（即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之間的異教通婚），而是因為他禁止了教會內部的異族通婚，即婚姻一方曾是猶太教徒，或者有一位猶太家長。

這位耶穌會士還用他信函的最后一頁為領袖歌功頌德。在信的末尾，他將自己形容作“一個熱愛您和祖國的人，一個自覺無法背叛您和法西斯黨（我的這番話絕無任何夸大之詞）的人”。  [[15]](#_15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但是這一提議沒能打動墨索里尼。令人生畏的內務部副部長圭多·布法里尼將如下消息傳達給他們：領袖絕不會允許教宗給混合婚姻網開一面；他也絕不會讓國王批閱這樣的請求。  [[16]](#_16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 \* \* \* \*

10月下旬，領袖在羅馬接見了納粹外交部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里賓特洛甫此行是為了說服墨索里尼，德意日三國簽訂軍事協定的時機已然成熟。  [[17]](#_17__Na_Cui_Dang_Ceng_Dan_Xin_Xu)  盡管里賓特洛甫好話說盡，但他依然感覺到，墨索里尼對簽署這樣正式的軍事聯姻仍抱有疑慮；于是里賓特洛甫向他保證，有了德國的相助，總有一天，整個地中海將成為意大利的內海。不過有趣的是，在這場會面中，墨索里尼話語中的刺耳音符都同教會和教宗有關。他告訴德國外交部部長，納粹對天主教會發動接連不斷的攻勢，對三方簽訂軍事協定造成了重大的阻礙，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簽訂協定，會令法西斯黨失去意大利民眾的支持。他建議在簽訂這份協定之前，德國政府應當想方設法與天主教會和解。墨索里尼表示，如果德國人在這方面與我們達成共識，那么與納粹的結盟“將會大受歡迎”。教會與德國之間的沖突也將不復存在。他說道，自己近來同教宗的關系也非常緊張，他擔心教宗會出面譴責這一協定，而那將置意大利天主教徒于“非常尷尬的境地”。  [[18]](#_18__Yin_Zi_Qi_Ya_Nuo_De_Wai_Jia)

齊亞諾在日記中以冷冰冰的措辭描繪了自己與馮·里賓特洛甫在羅馬大酒店舉行的會面。“他已經對戰爭如癡如醉，”他寫道，“他想打仗，一場屬于他的戰爭。他并沒有一個打仗的大體計劃，也從沒有談及過它。他不將任何國家樹立為敵人，也不顯露任何目標，然而他想在三四年內發動戰爭。”當齊亞諾就軍事聯盟一事與里賓特洛甫進行磋商時，墨索里尼示意他應當推遲這一盟約的公布時間，“尤其是因為天主教人群具有強烈的反德情緒”。  [[19]](#_19__Zhuan_Yin_Zi_Ciano_2002__14)

意大利的反猶運動在海外吸引了大量的負面關注，考慮到梵蒂岡與法西斯政權的密切關系，教宗認為自己也處境不佳。塔爾迪尼警醒教宗，不要試圖同墨索里尼合作制定一份雙方都能接受的反猶法案文本。因為這樣的合作會打開批評的泄洪閘，令大家指控梵蒂岡在反猶運動中與意大利政府相互勾結。他建議，教會最好把這一切留給政府去做。假設墨索里尼一意孤行，那么梵蒂岡可以一邊譴責其條款違反了宗教事務協約第三十四條，一邊從受到影響的婚姻關系極為稀少的事實中求得安慰。他告訴教宗，最重要的是，宗教事務協約的其余部分依然生效。  [[20]](#_20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教宗一開始同意了他的建議，但是其他人都勸說他與獨裁者進行合作，這番壓力使他無法聽從塔爾迪尼的建議。  [[21]](#_21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10月29日，教宗避暑宅邸門前的廣場上聚集起人群，他們希望能在庇護十一世離開時得到他的降福。那是一個寒冷的刮風天，冰冷的雨水混雜著冰雹和雪花，將信徒們驅趕到鄰近商店的屋檐下。當雨夾雪停止時，教宗出現在宅邸的小陽臺上，人們又急匆匆地趕回廣場。這將是他最后一次在岡多菲堡現身。  [[22]](#_22__CC_1938_IV__pp__371_372__Co)

一個月前，帕切利樞機依然按照慣例前往瑞士度假，令各國駐梵蒂岡使節頗為吃驚。  [[23]](#_23__MAESS__vol__38__196_197__Ch)  10月30日周日早晨，他搭乘夜車回到羅馬，并徑直從火車站來到教宗的辦公室。  [[24]](#_24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已經到場的塔基·文圖里報告了法案一事的最新進展。教宗同意讓他做最后的努力，與墨索里尼磋商尋求一個友好的解決方案。  [[25]](#_25__Ta_Er_Di_Ni_Zai_Dang_Tian_D)

為了同領袖搭上線，耶穌會士給布法里尼送去了一張字條。字條寫道，天主教會向來都支持政府，但是如果政府不打算與梵蒂岡達成共識，便頒布新的種族法案，將會給這一關系造成巨大傷害，圣父對此感到十分痛心。它將給“操著各種語言、流著各族血脈的反法西斯人士帶來無上的喜悅”。教宗相信，雙方仍有充足的時間對新婚姻法進行協商，找出“令雙方都滿意的”措辭。  [[26]](#_26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盡管庇護身體不適，但在接下來的幾周里，他多次接見塔基·文圖里、帕切利和塔爾迪尼，為進入最后階段的白熱化協商提供指導意見。11月2日，他們終于獲得了法案的草案復本，在教宗的命令下，那個曾經在約里奧樞機的公寓召開會議的小團體再次碰頭商議。

這份草案的第一條規定：“任何其他種族不得與意大利雅利安公民締結婚姻關系。”為了安撫梵蒂岡，墨索里尼添加了第七條，列舉了可以網開一面的婚姻關系：僅允許如下例外情況，即將死亡或設立嫡嗣。  [[27]](#_27__ASV__ANI__pos__9__fasc__5)

塔爾迪尼搬出早先就向教宗提過的建議：梵蒂岡應該以官方的姿態反對新法案背后的種族主義原則，并讓全世界知道，梵蒂岡同這份法案的起草沒有任何關系。

然而，其他人都對塔爾迪尼的懇求提出反對意見。教宗大使博爾貢吉尼擔心這么做會令梵蒂岡與政府決裂，他提出的建議是：由己方宣布新法案與宗教事務協約相沖突，但如果該法案得以施行，那么己方則不要公開反對。這樣，他們便得以繼續在幕后游說，尋求他們想要得到的條款變更。  [[28]](#_28__Ta_Ji__Wen_Tu_Li_Huan_Gao_S)

后來，塔爾迪尼在報告中寫下當天的進展：“教宗大使的主要關切顯然是避免讓圣座與意大利政府發生沖突。既然圣座的任何聲明或者抗議（無論措辭多么緩和）都有可能被國內外（尤其是國外）反法西斯政敵所利用，方便他們在教會與政府之間挑起沖突，那么教宗大使只能設法對法案進行恰當的修改，使得圣座無需提出任何形式的抗議。”

博爾貢吉尼回憶起法西斯大議會在10月6日做出的聲明：混合婚姻所生子女如果信奉其他宗教（即天主教），那么法律將不會視其為猶太人。如果梵蒂岡能夠說服政府，將這一條款加入新法案，那么它將大幅減少受新法案影響的天主教徒夫婦。教宗大使認為，這足以讓圣座允許新法案生效而無需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但是教宗沒有答應，因為依據這樣的條款，那些從猶太教皈依的天主教徒依舊被視作猶太人。他堅持要求新法案將與天主教徒結婚的改宗猶太人也列入例外情況。  [[29]](#_29__Ta_Er_Di_Ni_Guan_Cha_Dao)

塔基·文圖里將修改方案帶給布法里尼，不過他其實明白，教宗的提議不可能得到獨裁者的首肯。在塔基·文圖里的旁觀下，布法里尼一邊閱讀修訂文本，一邊搖著頭。他表示自己不會將其呈送給領袖，因為這只會讓局勢變得更糟糕。

同一天晚上，塔基·文圖里收到了婚姻法的最終文本。他發現，早先文本包含的少數例外情況也被悉數刪除。  [[30]](#_30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墨索里尼顯然想打一個賭，盡管教宗多番威脅，但是到了最后關頭，他賭他并不愿意同法西斯政府決裂。

[[1]](#filepos1219447) Passelcq and Suchecky 1997, p. 69.

[[2]](#filepos1220522) ASMAE, APSS, b. 39, fasc. 1, Cosmelli, R. Ambasciata Washington, a Ciano, “Stati Uniti e Cattolicesimo,” 20 ottobre 1938. Discussed further in Kertzer and Visani 2012.

[[3]](#filepos1221061) 巴魯克曾是一位華爾街大亨，當時的他是一名慈善家，以及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智囊團”成員。

[[4]](#filepos1221348) 美國大使將這一情報報告給華盛頓，并且補充說特里雅斯特的警察阻止當地民眾慶祝哥倫布日（譯注：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個周一，紀念哥倫布在1492年首次登上美國大陸）。他懷疑他們是從羅馬接到命令，原因在于他們認為哥倫布是個猶太人，也體現出美國對種族法案的抗議令墨索里尼感到不快。NARA, M1423, reel 12, Phillip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ti-Jewish measures in Italy,” n. 1120, October 21, 1938.

[[5]](#filepos1221763) 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 117r, Tardini notes, 19 ottobre 1938.塔爾迪尼寫道：“官方的備忘錄十分必要，這樣能確保留下證據，證明圣座曾經警告意大利政府，考慮新法案可能帶來的后果。”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15r, Tardini appunti, 19 ottobre 1938.

[[6]](#filepos1222261) 聽到博爾貢吉尼這番評論的人是塔爾迪尼。ASV, AESS pos. 560, fasc. 592, ff. 119r–119v, Tardini appunti, 20 ottobre 1938.

[[7]](#filepos1222764)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0r–21r, Borgongini, Nunziatura Apostolica d’Italia, “Progetto di appunto,” n. 6480, n.d.

[[8]](#filepos1223230) 塔爾迪尼在此處用鉛筆在“不同”之前加上了“過分”一詞。

[[9]](#filepos1223940) 博爾貢吉尼急于要達成這份協議。他進一步說道，如果兩種方案都被政府拒絕，那么在新法案宣布之前，梵蒂岡和政府必須以其他方式達成一致。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2r–23r, Borgongini, Nunziatura Apostolica d’Italia, “Progetto di appunto,” n. 6481, undated.

[[10]](#filepos1225222) 有關此次商討，塔爾迪尼留下了兩份略有不同的描述。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36r, 23 ottobre 1938; AESS, pos. 560, fasc. 592, ff. 123v–125r, 23 ottobre 1938.

[[11]](#filepos1225696) ASV, AESI, pos. 560, fasc. 592, f. 125v, 23 ottobre 1938.

[[12]](#filepos1226047) 禮儀及圣事部秘書長弗朗切斯科·布拉奇（Francesco Bracci）蒙席也在場。

[[13]](#filepos1226631) 阿爾弗雷多·奧塔維亞尼蒙席（他擔任替補國務卿直至1935年，然后成為羅馬宗教裁判所的顧問）也出席了這次商討。與會人員決定，他們應當與政府溝通三個問題：其一，混合婚姻（無論是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還是兩個不同種族的天主教徒之間）是少數情況，“至于未來該怎么辦，圣父已經安排了審定的日程”；其二，政府應當承認這些少數的婚姻關系，必要時應當運用王室的豁免權；其三，在任何情況下，政府都應當承認，如果當局懲罰那些出于良知而舉行這類婚禮的人，那么它將嚴重冒犯宗教情感（當教宗審閱至此處時，他還補充了“和自然法”四個字）。ASV, AESI, pos. 1063, fasc.755, f. 40r, Tardini appunti, 23 ottobre 1938，附有他對當天會議的詳細記錄：41r–45r。關于教宗對這一方案的首肯，參見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49r–50r, Tardini appunti, 24 ottobre 1938。

[[14]](#filepos1226909)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53r, Tardini appunti, 25 ottobre 1938.

[[15]](#filepos1228272)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56r–59r,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26 ottobre 1938。

[[16]](#filepos1228655)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61r–64r, Adunanza presso l’E.mo Sig. Cardinale Jorio, 27 ottobre 1938。次日，當受到教宗的接見時，塔爾迪尼拿出了一份數據，表明雙方探討所涉及的都是極少數案例。他告訴教宗，在去年，意大利超過377 000對新婚夫婦中，僅有61對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的婚姻需要得到教會的許可。此外，也鮮少有婚姻涉及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72r, Tardini appunti, 28 ottobre 1938。

[[17]](#filepos1229080) 納粹黨曾擔心宣布這樣的軍事協定可能會在美國造成負面影響，但是現如今，這位德國外交部部長已經不再有類似的顧慮，因為近期的蘇臺德危機表明，美國的孤立主義者具有非常強大的勢力。他唯一的顧慮便是，宣布這樣的軍事協定可能會引發美國猶太人的怒火，但是“猶太人在美國發起的針對德國和意大利的宣傳攻勢只在東部非常強勢，越往西則攻勢越弱。然而在外交政策上占據主導地位的卻是美國的西部地區。DGFP, series D, vol. 4, n. 400,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Reich foreign minister, Herr von Ribbentrop, and the Italian foreign minister, Count Ciano,” Rome, October 28, 1938.

[[18]](#filepos1230215) 引自齊亞諾的外交文件，《領袖與第三帝國外交部部長馮·里賓特洛甫的談話，齊亞諾伯爵也在場，羅馬，1938年10月28日》，載Muggeridge 1948, pp. 242–246。

[[19]](#filepos1230952) 轉引自Ciano 2002, 148–149。

[[20]](#filepos1231831)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71r–83r, Tardini, “Appunto per l’Ufficio. Letto al Santo Padre,” 29 ottobre 1938.

[[21]](#filepos1232125)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 76r–76v, Tardini appunti, 29 ottobre 1938.

[[22]](#filepos1232672) CC 1938 IV, pp. 371–372; Confalonieri 1957, p. 379.

[[23]](#filepos1232930) MAESS, vol. 38, 196–197, Charles-Roux, 27 septembre 1938.

[[24]](#filepos1233148)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88r–89v, 30 ottobre 1938.

[[25]](#filepos1233430) 塔爾迪尼在當天的觀察里記載道，塔基·文圖里“盡管與墨索里尼頻繁會面，卻依然驚嘆于他的良好品質，并始終對他持有深切的好感”。如今墨索里尼卻拒絕與他會面，這位耶穌會士已然坐立不安。塔爾迪尼實際上是在稍后的時日里寫下了當天的見聞，這也給我們的解讀帶來了困難。他進一步說道：“盡管他多番嘗試[同領袖見面]，墨索里尼卻貌似不再信任P.T.V[彼得羅·塔基·文圖里]。之后領袖還會偶爾接見他，但是頻率很低，并且態度總是冷冰冰的。到最后墨索里尼徹底拒絕與他見面了。”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29r–129v, 31 ottobre 1938.

[[26]](#filepos1234078)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30r–131r, 31 ottobre 1938.塔基·文圖里關于這次會面的記錄收于ARSI, TV, b. 28, fasc. 2159, “Promemoria da me letto a S. E. Buffarini il 31 ottobre 1938.”在墨索里尼和梵蒂岡陷入僵局的過程中，德國外交檔案中的一頁資料記錄下一個令人驚異的小插曲。11月1日，當墨索里尼和里賓特洛甫搭乘火車前往維羅納時，領袖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要求：外交部部長能不能想辦法改善德國與德國天主教會的關系。他透露道，因為新近頒布的種族政策，意大利政府與梵蒂岡的關系變得十分緊張，但他又迫切地希望改善軸心國與天主教會的關系。由于他著重強調了這一點，里賓特洛甫便命令外交部準備一份報告，看看該如何改善德國與梵蒂岡的關系。墨索里尼的要求還達到了另一個效果：里賓特洛甫決定讓柏爾根留在羅馬，繼續擔任駐圣座大使。幾個月來，帕切利都擔心德國會安排一個強硬的納粹黨人來接替柏爾根。DGFP, series D, vol. 4, n. 468, “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Woermann, Vienna, November 3, 1938.

[[27]](#filepos1234874) 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40r–141r, “Provvedimenti per la tutela della razza italiana.”

[[28]](#filepos1235644) 塔基·文圖里還告訴他們，圣禮部傳達給意大利天主教徒的婚姻指示也應重新修訂。在他提出的新版指示中，當婚姻關系被新頒布的種族法案所明令禁止時，神父不得為雙方舉行宗教婚禮，除非其中牽涉“嚴肅的良知理由”。但是塔基·文圖里并沒有給出最后一句話的確切含義。所有在場人士都表示贊同。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39r–141r, “Adunanza presso l’E.mo sig. Card. Jorio,” 2 novembre 1938.

[[29]](#filepos1236935) 塔爾迪尼觀察道：“很顯然，如果補充了這樣的內容，就表明政府完全接受了圣座的原則，也就意味著宗教觀念將高于種族觀念。”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49r–150v, Tardini appunti, 3 novembre 1938.

[[30]](#filepos1237564)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62r–164r, “Relazione del colloquio avuto con S.E. Buffarini il 3 novembre 1938,” Tacchi Venturi;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171r, Tardini appunti, 4 novembre 1938。

## 第二十六章 相信國王

墨索里尼竟然這般厚顏無恥地違反了令雙方都大為受益的宗教事務協約，不敢相信的教宗于是致信墨索里尼，警告其所作所為有多么愚蠢。

“致最親愛的孩子”，教宗在信的開頭寫道。他并沒有提及新法案的第一條，盡管它規定“任何其他種族不得與意大利雅利安公民締結婚姻關系”。他反倒對第七條提出異議，認為它顯然違背了宗教事務協約的條款（教會許可的婚姻具有民事效力）。教宗告訴領袖：“只要將上述條款的文本……替換成我們提供給你共事者的版本，這樣一道“傷口”就可以被輕易規避掉，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發現你沒有接受那些修訂。”教宗隨信附上了他對第七條的修改，而就在一天前，它曾被布法里尼憤怒地拒絕。它將允許兩名天主教徒締結婚姻，全然不論他們的“種族”。  [[1]](#_1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在近乎窮途末路之時，塔基·文圖里給獨裁者寄來了一封私人的懇求信，試圖在動搖其意志方面做最后的努力。這么多年來，他一直服侍領袖，而且始終都忠心耿耿，對領袖敬愛有加，他乞求墨索里尼接受教宗的要求。  [[2]](#_2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墨索里尼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教宗在最后關頭提出的要求，并告訴他，次日上午頒布的法律將不會做出任何更改。這番斷然回絕令教宗怒不可遏，他決定上訴國王。除了儀式信函外，庇護從未給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寫過信。如今他要求國王“用無上的權威介入此事，取得我們無法……與您的總理達成的共識” 。教宗提醒國王，1929年的條約是以他的名義莊嚴簽署的，并且婚姻法的草案與條約條款背道而馳。他還隨信附上了經過修改的第七條。  [[3]](#_3__Zai_Jiao_Zong_De_Yao_Qiu_Xia)

幾年后，當意大利熬過了這場災難性的戰爭，意大利人將舉行一場全民公投，決定是否保留王室。他們紛紛攻擊國王，責怪他沒有勇敢地與獨裁者相抗衡。回顧歷史，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最懦弱也最恥辱的舉動，便是同意實行墨索里尼提交的所有種族法案。當猶太人被逐出學校和職場、受到國家的污蔑并被奪去了生計時，國王卻依舊簽署了那些由墨索里尼在每周兩次的會面中帶到奎里納爾宮的法案。更糟糕的是，國王并不贊同納粹黨人對雅利安民族的神化，也不認可墨索里尼打造的意大利變種，他只是缺乏勇氣同領袖正面交鋒。

11月7日，國王給教宗的答復反映出了同樣的懦弱。  [[4]](#_4__Ji_Nian_Hou__Ceng_Dan_Ren_Yi)  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感謝教宗的來信，并表示已將復本抄送給墨索里尼，希望能夠得出解決方案，“調和雙方不同的觀點”。全信到此為止。  [[5]](#_5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墨索里尼則再次通知教宗，表示自己不會答應他的要求，因為如果照辦的話，將會破壞新婚姻法的整體意圖。  [[6]](#_6__Mo_Suo_Li_Ni_Tong_Guo_Bu_Fa)

那周早些時候，齊亞諾與德國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以及希特勒麾下的規劃部部長進行了會面。盡管墨索里尼的女婿對納粹黨很是迷戀，不過這位花花公子認為許多納粹領導人都非常粗魯，他在日記中予以戈林生動的描述：“他沒有穿軍裝，全身一套昂貴的亮灰色西服。他打領帶的方式非常老土，上面還別了一枚紅寶石別針。手指上也戴著幾顆巨大的紅寶石。他的翻領上是一只鑲嵌寶石的巨大納粹鷹。他和艾爾·卡彭（Al Capone）  [[7]](#_7__Mei_Guo_Hei_Shou_Dang_Cheng)  略有相似之處。”

事后，齊亞諾向岳父詳細報告了同戈林的協商情況，并談及教宗向國王求助的事情。“我不認為，”齊亞諾觀察道，“領袖的決心有所動搖。”  [[8]](#_8__Ciano_2002__pp__151_152)

當天，齊亞諾也參加了美國駐羅馬大使館舉辦的一場午餐聚會。這場聚會的貴賓不是別人，正是來訪梵蒂岡的芝加哥大主教芒德萊恩樞機。羅斯福總統曾在去年批評希特勒，由此引發了一場風波，為了顯示自己與芒德萊恩的團結一致，他便在樞機動身出發前在白宮為他舉行了一場餞別會。總統還給菲利普斯大使下達命令，在大主教逗留意大利期間，必須盡一切可能展現美國對大主教的支持。  [[9]](#_9__Fogarty_1996__p__562_Luo_Si)

教宗大使也出席了這場午餐聚會，他注意到齊亞諾后，便穿過人群來到他身邊。新婚姻法已經排上了明天的部長會議日程，而齊亞諾十分擔憂。墨索里尼對這件事動了肝火，使得如今的條款比早期版本更為激進。齊亞諾思忖，如果新法律令梵蒂岡不再支持法西斯政府，那將是一場災難。

“教宗會采取什么行動？”齊亞諾問博爾貢吉尼。

“我不清楚，因為教宗對所有人都守口如瓶，”教宗大使回答道，“不過他肯定會搞出點大動靜。”

“這大動靜是指外交抗議，還是公開抗議？”齊亞諾焦急地問道。

博爾貢吉尼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但既然齊亞諾是外交部部長，教宗大使建議他出面調停以挽救《拉特蘭條約》。

“可是我們現在還能拿出什么提議呢？無論是圣父還是政府首腦都已經牽涉其中。像我這樣的外交部部長和你這樣的教宗大使根本什么都做不了。”

博爾貢吉尼認為并沒有為時過晚，齊亞諾可以提議組建雙邊委員會，專門研究此事的解決方案。當齊亞諾提問該如何說服領袖時，教宗大使再次強調，政府需要做出讓步的婚姻案例其實是很少的。談到最后，博爾貢吉尼認為，只要能避免與梵蒂岡進入危機，齊亞諾就愿意做任何事情。  [[10]](#_10__Zai_Shuang_Fang_Jie_Shu_Tan)

那一天是1938年11月9日，而當天的夜晚史稱Kristallnacht，即納粹德國的“碎玻璃之夜”。由于一位德國外交官在法國被一位波蘭猶太青年難民刺殺，殘暴的納粹黨人便以此為借口，燒毀猶太教堂，洗劫猶太商店，抓捕猶太人，并毆打他們。大量猶太人被殺害，上萬人遭到逮捕，還有很多人被送去集中營。數百座猶太教堂被燒成平地，數千家猶太商店被劫掠一空。在此次暴力事件之后，德國政府宣布猶太人不得經營商店及其他產業，不得進入劇院或音樂廳，而他們余下的財產將被沒收并轉交給基督徒。數百名猶太人含恨自殺。意大利駐德國大使給齊亞諾發來一份長篇報告，詳細地講述了這些可怕的細節。教宗駐柏林大使也給帕切利寄來一份冗長的報告。  [[11]](#_11__ASMAE__APG__b__46__R__Ambas)

意大利的天主教媒體并沒有對降臨到德國猶太人頭上的恐怖事件做多少報道。威尼斯的主教管區周刊將其所有的尖酸刻薄，都指向了那名射殺納粹外交官的猶太青年：“這名猶太人冷酷地用他的左輪手槍瞄準……他的心靈已經裝滿了深刻的仇恨、宿怨和敵意。”它還進一步認為：“我們坦言無法理解這樣的事件，即一個人怎么能經過預先的謀劃，殺害一名溫和且默默無聞的政府工作人員。”至于受到德國政府支持的猶太大屠殺和大破壞，這份主教管區周刊則只字未提。  [[12]](#_12__Perin_2011__p__207)

當德國猶太教堂被付之一炬、德國猶太人紛紛被抓捕時，塔基·文圖里神父躺在床上夜不能寐。他知道墨索里尼的部長會議將于次日召開，他正搜腸刮肚地想法子阻止兩位首腦的關系破裂。他從床上起身，打開燈，起草了一封寫給領袖的信函。

他寫道，“我所提議的變更保全了法律的基本原則”，即意大利人乃是雅利安人，而猶太人則不是，“它只是為一些例外留出了余地”。塔基·文圖里再次辯稱，例外的情況非常稀少。“如果考慮到意大利微小的猶太公民數量，以及猶太人（即便皈依天主教）和基督徒對相互締結婚姻的厭惡，我敢說配偶雙方都信仰天主教的跨族婚姻不會超過一百對。”這位平日足智多謀的耶穌會士，竟然會在半夜里起床，只為了重復他早已多次向領袖提出的論據，這足以表明他的絕望之情有多么深重。  [[13]](#_13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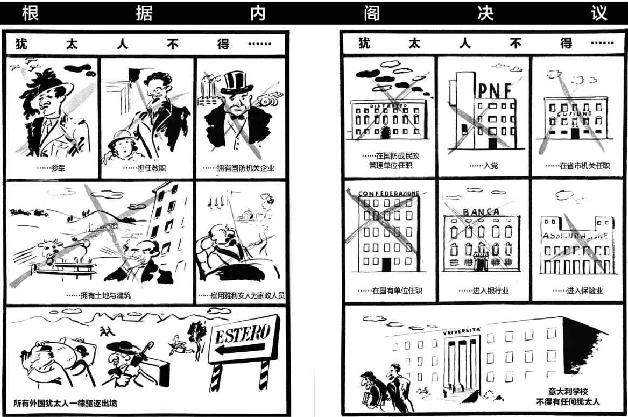
與此同時，羅伯托·法里納奇高興地發現自己又成了梵蒂岡的眼中釘，他通過煽動大眾對反猶法案的支持來為領袖提供助力。在他的宣傳中，新頒措施的根基深植于羅馬天主教會的教導之中。去年夏天，他曾在手下的報紙上刊登了一系列反猶文章，并引用《公教文明》的內容為運動辯護，其中一篇就題作《給天主教徒的天主教義課》（“A Lesson in Catholicism for Catholics”）。11月7日，經過大量宣傳之后，他在米蘭做了一場題為“教會與猶太人”的講座，大量引用了《新約》的內容，表明法西斯反猶措施的真正源頭來自天主教會。他悲嘆道，不幸的是，教宗近來的言論表明他正在偏離這一核心的教會教導。他質問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使得當今的教會官方如此親猶而不是反猶？……共產黨人、共濟會以及民主派人士，他們都是教會不共戴天的敵人，為什么到如今，他們都轉而贊美教會，并紛紛向它施以援手？”他的答案簡單明了：“他們是要用教會來反對法西斯。”

《法西斯政府報》整版報道了法里納奇的演講，輔以一張三欄的歷史活頁，標題取作《數世紀以來大公會議與教宗的反猶傾向》（“The Dispositions of the Councils and the Popes Against the Jews Through the Centuries”）。  [[14]](#_14__Fornari_1971__pp__185_186)  許多報紙都報道了這次演講。最先發表《種族科學家宣言》的《意大利日報》用一句話概括了這次演講的中心思想：“尊貴的法里納奇在熱烈的掌聲中發表了結語，他表示信仰天主教的法西斯黨人絕不可能拋棄反猶的良知，因為它是教會在兩千年的歷程中凝練出來的。”  [[15]](#_15____Fa_Li_Na_Qi_Yan_Jiang_Zho)

11月10日，政府的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反猶法案。領袖焦慮地等候著，擔心教宗真的會履行他的威脅。盡管庇護多番恫嚇，但是墨索里尼并不愿意與教會為敵。教會各級（從教宗到教區神父）的支持對他意義重大。況且現如今，他已經有了更大的野心，失去教會的支持將令他損失慘重。  [[16]](#_16__DDI__series_8__vol__10__n)

不過，如果說領袖的擔心程度有限的話，那是因為在教宗頻頻發難以及雙方激烈磋商和政策博弈的這幾周里，無論是庇護十一世、耶穌會特使、梵蒂岡國務卿，還是教宗大使，都沒有對這份旨在剝奪猶太人意大利公民身份權利的反猶法案進行總體上的譴責。梵蒂岡并不反對將猶太兒童和教師逐出學校，也不反對將猶太教授逐出大學。當政府把猶太人當作危害意大利社會的害蟲時，無論是帕切利還是教宗的兩位使者（正式的教宗大使以及非正式的耶穌會士）都從未提出過反對意見。如果有人想要尋求梵蒂岡人士（包括那些不知如何應對，因此尋求官方指導的教區神父和主教）對這一迫害運動的態度，他都將得到一個明確無誤的答案：國家只是終于正視了多數意大利天主教媒體（從主教區周報到大型日報）、《羅馬觀察報》以及《公教文明》會定期重復的警告。

近期公開的梵蒂岡秘密檔案使得一份報告重見天日。這份報告清楚地表明，在教會看來，塔基·文圖里在8月16日與墨索里尼協商達成的協議（只要政府給予公教進行會以優惠待遇，圣座就承諾不批評種族法案）依然有效。這份報告由國務院在11月初籌備，記錄了梵蒂岡與法西斯政府在反猶運動上達成的交易。報告的開頭記錄了庇護十一世在7月28日對“過分的民族主義”提出的譴責。第二部分的標題是“墨索里尼與塔基·文圖里的協議（1938年8月16日）”。這一部分寫道，“其間，圣座指導塔基·文圖里神父達成協議。塔基·文圖里神父成功完成任務。1938年8月16日協議包含三點”，并進而概括描述了每一點。  [[17]](#_17__Zhe_Fen_Dang_An_De_Zuo_Zhe)



《捍衛種族》展示的種族法案，1938年11月20日

墨索里尼認為雙方的聯盟給圣座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對方絕不愿意破壞這一盟約。多年以來，梵蒂岡正是憑借政府這座靠山，才能查抄冒犯教會的圖書和雜志，才能阻止新教徒傳教，才能推行教會的女性正派標準。墨索里尼畢竟是“天主派來的圣人”，他確保每一個法西斯青年團體都配備了神父，用意大利人的稅收報銷了教會的支出，還在所有國家盛事中為天主教神職人員頒發榮譽。

婚姻法通過的第二天，帕切利樞機就給世界各地的教宗大使發去了機密電報，如果墨索里尼查看過這封電報，他就會明白自己賭贏了。帕切利通知他們，政府頒布的新法案禁止天主教徒締結跨種族婚姻，顯然違反了宗教事務協約。教宗大使該如何領會這一法令，他們應該怎樣回答別人的問詢？帕切利盡全力弱化了其中牽涉的爭議：“應當注意的是，違反宗教事務協約的案例數量非常有限……也就幾十例，而意大利每年舉行的宗教婚禮超過三十萬場，它們將繼續舉行，并且按照常規登記。  [[18]](#_18__ASV__AESI__pos__1063__fasc)

梵蒂岡官方呈交給意大利政府的抗議信軟弱極了。教宗決定不發表任何意見。盡管他多番恐嚇，但是說到底，他不愿意讓這場爭議破壞法西斯政府與教會之間的互惠關系。教宗命令帕切利起草這封信函，這封信的收信人不是國王，甚至不是墨索里尼或齊亞諾，而是意大利大使皮尼亞蒂。

這封信首先表明，新婚姻法違反了宗教事務協約的第三十四條。帕切利先表示教會歡迎任何種族，接著卻試圖弱化教會對政府種族理論的抗議聲。他寫道，教會對種族混合的擔憂也由來已久。“教會始終扮演了慈母的角色，”這位未來的教宗解釋道，“通常會建議子女規避那些可能帶來缺陷后代的婚姻，因此在神權的限度內，教會傾向于支持世俗權威，來達成這一良善的目標。”但是在教會的勸阻下，兩位異族天主教徒依然堅持要締結婚姻關系時，教會無法拒絕為他們舉行這一圣禮。

帕切利的表述采納了法西斯（以及納粹）的觀點，即認為猶太人是個自成一體的民族。政府認為意大利天主教徒和猶太人的“種族混合”可能帶來有害的生理后果，而帕切利完全沒有試圖矯正這一錯誤觀念，只是試圖弱化新法案將會產生的負面影響。他寫道，與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結婚的天主教徒極其稀少，“無論天主教徒抑或猶太人都普遍厭惡與其他種族的人通婚，而他們也對這種情況的稀少程度感到滿意”。

國務卿在信的末尾寫道，教會有必要就政府違背宗教事務協約一事表示抗議，他對此感到遺憾，但他的結語依然走向了積極的一面。他希望政府能夠做出必要的適當調整，來修補與教會的和諧關系。  [[19]](#_19__ASV__ANI__pos__9__fasc__5)

所謂的公開抗議刊登在11月15日的《羅馬觀察報》上，這篇頭版文字的標題輕描淡寫，就叫作《關于新法令》（“Regarding a New Decree-Law”）。帕切利在刊登前仔細審讀了這篇文章。塔爾迪尼記載道：“他希望呈現的是一種冷靜、安詳的口吻，談及了諸多復雜的原因，認為法案在未來仍有改善的可能，最終給雙方的沖突畫上句號。”  [[20]](#_20__Zhuan_Zai_Yu_Sale_2009__p)  這篇文章的文字與帕切利在正式抗議信中的用語如出一轍。文章在最后仍然希望雙方能夠達成共識，處理“受到影響的稀少案例”。  [[21]](#_21____Guan_Yu_Xin_Fa_Ling_____O)

但是，這番輕描淡寫的公開抗議背后卻有一個戲劇性的故事。當天上午10點20分，方臉的非常教務部部長塔爾迪尼蒙席收到了一條緊急消息：庇護十一世要求立即同他見面，并需他攜帶《羅馬觀察報》那篇文章的底稿材料。塔爾迪尼心有惴惴，趕忙拿起文件趕赴教宗的辦公室。他回憶道：“見到教宗時，我發現他滿臉通紅、神情激動。”教宗的手里拿著一份當天的報紙。

教宗問道，為什么這篇文章缺少了最為重要的一個部分，明明前一天他才審閱并批準了那一部分內容？教宗希望這篇文章能包含他寫給墨索里尼和國王的信函，他尤其想突出國王的回信。庇護十一世堅稱，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的回信很明確，他讓墨索里尼回應教宗的關切，對婚姻法進行修改。教宗想讓全世界知道，墨索里尼漠視了王室的要求。

塔爾迪尼試圖讓庇護冷靜下來。他表示，教宗確實告訴過他們要刊登這些信件，但他肯定已經忘記，帕切利樞機在昨天晚上已經說服他不要這么做。帕切利認為，公開外交信函通常需要得到另一方的許可，而且令人尷尬的是，教宗看重的國王回信實際上語義含糊，到最后不會有任何效用，刊登這封回信只會讓全世界知道國王“一文不值”。帕切利不愿意刊登國王的回信，實際上還有另一個原因：它會讓人們注意到墨索里尼甚至都懶得回信，這將令領袖陷入不利的境地。當帕切利提出這一點時，教宗開口打斷了他：“外交禮節豈能同極大的惡行相提并論！”但是帕切利毫不畏懼地堅持了他的立場。他堅稱凸顯墨索里尼在回信一事上的失禮，可能會招致政府的報復行為。

盡管塔爾迪尼提醒庇護十一世回想昨晚發生的那段對話，但這并沒有澆滅教宗的怒火。塔爾迪尼曾向旁人表示，曾經細致入微的教宗近來變得愈發健忘。他之所以對《羅馬觀察報》的這篇文章火冒三丈，正是因為他已經完全把昨晚與國務卿的談話拋到了腦后。當塔爾迪尼提及，帕切利希望墨索里尼能有所行動，好減輕新法案的負面影響時，教宗再次怒上眉梢。“可是，到底是誰給了你們這些奢望？”教宗思忖，如果這些奢望還有根據的話，那也只能是因為國王要求墨索里尼采取行動，但他們恰恰把文章中的這一要求刪掉了。

談話進行到此，帕切利樞機也加入進來，教宗對他發動了猛攻。庇護表示，他們對這篇文章的任意刪改令他不適。帕切利對教宗的健康表示關心，因為近來他一直狀況不佳，睡眠不好，但這種轉移教宗注意力的伎倆并不能奏效。

教宗問道：“這篇文章是誰寫的？”

塔爾迪尼回答道：“是我，圣父。”

庇護答道：“我一點都不喜歡這篇文章。”

帕切利樞機不愿意袖手旁觀，讓塔爾迪尼獨自承受指責，于是插話道：“圣父，我審讀了那篇文章，所有的責任由我來承擔。”

這時候的教宗已經稍稍冷靜下來，不過他堅持要求他們做出彌補，在下一期《羅馬觀察報》上刊登國王的回信，但帕切利和塔爾迪尼都不愿意這么做。于是塔爾迪尼找來了塔基·文圖里，他有可能說服教宗，讓他改變主意。耶穌會士匆忙趕來梵蒂岡。

塔基·文圖里以愉悅的口吻告訴庇護，他已經跟墨索里尼的親信談過了，那天《羅馬觀察報》克制的口吻給領袖留下了極好的印象。可是耶穌會士錯了，這個消息并不能取悅教宗。教宗打斷了他的話：“難怪我會這么不高興！就今天晚上，我要安排他們刊登一篇全新的新聞稿！”塔基·文圖里大為驚慌，但是他的懇求沒能讓教宗回心轉意。  [[22]](#_22__Ci_Ri__Bi_Hu_Shi_Yi_Shi_Xia)  不過在教宗發泄完怒火之后，帕切利樞機及其同仁再一次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羅馬觀察報》從未刊登過國王的回信。  [[23]](#_23__Pa_Qie_Li_Dao_Di_Shi_Deng_D)

當時的意大利人認為梵蒂岡支持法西斯的反猶運動。盡管這種想法情有可原，但至少有一位重要的意大利高級神職人員發表了反對意見。他的反對聲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為米蘭大主教伊爾德方索·舒斯特樞機一度是墨索里尼最公開、最熱切的擁躉。僅僅在一年前，法國駐圣座大使還在報告中寫道，舒斯特“對法西斯理念的同情眾所周知”，他在法西斯神秘主義學校發表講話時，稱贊墨索里尼建立了一座新的天主教羅馬帝國。  [[24]](#_24__Charles_Roux__27_fevrier_19)  1930年，大主教曾收到一封聯名信，米蘭的三百名天主教徒斥責他不加批評地接納法西斯觀點，這件事情發生之后，政府當局要求他上交簽名人的名單。  [[25]](#_25__ASMAE__AISS__b__5__fasc__1)  1937年9月，一位警方線人在報告里寫道，舒斯特不太可能接替病弱的庇護十一世，他遭到意大利國外許多樞機的反對，他們認為舒斯特與法西斯政府走得太近。  [[26]](#_26__ASMAE__APSS__n__314682__Min)

但是在11月13日周日，在米蘭主教座堂發表講話時，舒斯特做了一件在梵蒂岡無人敢做的事情：他譴責意大利的種族法案是新異端意識形態的產物，并認為教會永遠無法接受它們。“在宗教和祖國之間建立和諧關系的企圖，只能淪為無用之功。法西斯國家正在自造的倫理體系，與宗教觀念沒有半點關系。”他進而對墨索里尼提出指控，認為他像奴隸一樣對希特勒亦步亦趨，而他接納的種族意識形態則有著異端的日耳曼根源。

僅僅因為這一場講話，舒斯特從米蘭法西斯黨的寵兒變成了法西斯黨領導層眼中的頭號敵人。直到1951年，米蘭的主教管區刊物才終于刊登了他的講話內容，但是，在演講兩天后的11月15日，天主教報紙《意大利報》（L’Italia ）就對其進行報道，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也令許多人感到驚訝。米蘭的一位警方線人在報告中寫道，大主教發出警告，在未來的某一天，納粹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將把矛頭指向意大利人民，這尤其令許多人膽寒。線人寫道：“在這個問題上，舒斯特樞機表現出來的恐懼心理在意大利北部非常盛行。”  [[27]](#_27__Ferrari_1982__p__590__ACS)

盡管帕切利致信政府，對婚姻法提出抗議，政府卻沒有做出任何回應。11月22日，也即法案正式公布的三天后，帕切利又給皮尼亞蒂發去一封簡短的信；他在信中表示，梵蒂岡要求的例外情況沒有被包含在新婚姻法中，他對此感到失望。  [[28]](#_28__ASV__ANI__pos__9__fasc__5)  一周后，皮尼亞蒂回信表示，盡管政府試圖解決雙方在新法案文本上的分歧，并且愿意包含一些例外情況，但是梵蒂岡卻只會要求政府承認所有天主教徒（不管他們的種族）之間的婚姻關系，不愿意做出任何讓步。法西斯政府沒有辦法做出這樣單方面的讓步。皮尼亞蒂指出，梵蒂岡之前承認國家對種族問題的關切具有“良好的道德基礎”，并建言政府“禁止那些容易誕下缺陷子女的婚姻”。  [[29]](#_29__ASV__ANI__pos__9__fasc__5)

如果說梵蒂岡對種族法案的抗議非常有限且不為公眾所知的話，那來自美國的譴責聲浪則與之完全相反。考慮到意大利人與美國的緊密關系，墨索里尼擔心他們可能會受其擺布。法西斯媒體迅速予以回擊。報紙解釋道，美國批判種族法案，是因為他們的政府和媒體都掌控在猶太人手中。

羅馬的一家報紙控訴說，猶太人已經“扼住了這個國家的咽喉”。它聲稱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七十五個政府職位中，有五十二個被猶太人所占據，他們還控制著美國75%的工業項目。報紙報道說：“這股盛行于英國、法國和蘇俄的神秘力量已經在華盛頓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反法西斯運動和民主人士的謀劃（它們是猶太人和共濟會的同義詞）正是在華盛頓協調行動的。”它指控羅斯福總統“本質上就是個猶太人”，他是“全世界猶太人的教宗”，報紙質問意大利人，何時才能意識到這個可怕的真相。  [[30]](#_30__Zhe_Fen_Bao_Zhi_Shi___Yi_Da)

與此同時，梵蒂岡的氛圍也變得愈發不確定。國際形勢迅速惡化，而教宗的健康狀況也一日不如一日。11月25日，教宗突發心臟病。盡管他再度康復過來，但大家都覺得他肯定活不久了。  [[31]](#_31__Confalonieri_1957__p__379)

\* \* \* \* \*

在梵蒂岡，帕切利樞機仍然是墨索里尼最強大的盟友。舒斯特大主教的言語攻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皮尼亞蒂擔心其他人也會跟從他的腳步，于是面見梵蒂岡國務卿，要求他給意大利所有主教下達書面指示，告訴他們不得批評反猶運動。

在意大利大使看來，帕切利雖然贊同他的意見，卻沒有著急允諾。皮尼亞蒂寫道：“樞機認為，口頭傳達我所提出的建議會很方便，但付諸書面就會變得很困難。”大使知道他可以給帕切利施壓，于是接著游說。“到最后，”皮尼亞蒂告訴齊亞諾，“國務卿告訴我，類似的安排已經在羅馬主教管區實行了。此外，他會記下我的要求，研究出最恰當的辦法，將它下達到意大利其他主教管區。”  [[32]](#_32__DDI__series_8__vol__10__n)

有跡象顯示，種族法案有可能傷害了意大利人民對政府的熱愛之情，這令墨索里尼十分憂慮。從擁有大量猶太公民的城市發回的警方報告顯示，當地彌漫著嚴重的不滿情緒。根據一位米蘭警方線人的觀察，有些人全盤接受了反猶宣傳，“但是絕大多數人認為許多措施太過夸張，并將罪責歸給政府首腦和法西斯大議會，認為他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決議，是由于德國將反猶列為羅馬—柏林軸心國的必要條件”。實施這些措施的法西斯黨人在剝奪猶太人的職務之后任人唯親，這樣的狀況令很多人感到心寒，此外，他們還用低廉的價格買下了猶太人的財產。  [[33]](#_33__ACS__MI__DAGR__b__B7_G___81)

意大利猶太人丟掉了工作和財產，他們的孩子被逐出學校，陷入了絕望的境地。過去友好的天主教鄰居如今面色緊張，不愿意跟他們打招呼。納粹計劃建立集中營的消息也傳得滿天飛。猶太人自殺事件成倍增長。著名編輯和詩人安杰洛·福爾米吉尼（Angelo Formiggini）在給同事的信中寫道，盡管他是一名優秀的意大利人，但他沒法面對這接連不斷的迫害。在寫給妻子（并不是猶太人）的信中，他解釋道，只有他的死亡能夠令她免遭虐待。寄出這些信件之后，他爬了一百九十級階梯，登上了摩德納（Modena）中心廣場的中世紀塔，縱身跳了下去。他殘缺的軀體在四周的鵝卵石上淌出了一池血水。

“他死得像一個猶太人，”黨主席阿契爾·斯塔拉切在聽聞這個消息時譏諷道，“摳門到為了節省一枚子彈，從高塔上跳了下來。”  [[34]](#_34__ACS__MI__DAGR__b__B7_G___81)

[[1]](#filepos1251179)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77r–178r, Pio XI a Mussolini, 4 novembre 1938.

[[2]](#filepos1251612)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80r–181r,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4 novembre 1938。為了顯示出教宗和領袖之間的密切關系，塔基·文圖里還補充說，教宗本打算按照條約的規定，直接寫信給國王，但是考慮到領袖為教會所做的一切，他決定給墨索里尼一個機會，把事情都解決好。

[[3]](#filepos1252350) 在教宗的要求下，寄給國王和墨索里尼的信件都由帕切利起草。給國王的這封公開信收于DDI, series 8, vol. 10, n. 360, “Sua Santità Pio XI a Re Vittorio Emanuele III,” 5 novembre 1938；帕切利的手寫原稿（附有修改）則收于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184r–184v。

[[4]](#filepos1253301) 幾年后，曾擔任意大利外交部部長并于當時擔任意大利駐英國大使的迪諾·格蘭迪，回顧了國王與領袖之間的關系。他觀察道：“二十年來，國王和墨索里尼眼中的對方猶如擊劍場上的兩名對手，兩人都舉著劍。”盡管格蘭迪捕捉到雙方戒備的狀態，但是他的描述沒能突出雙方不平等的關系：國王一直都害怕令領袖不滿。盡管他們的背景和脾氣千差萬別，盡管國王卑躬屈膝，但是兩人都身處深刻的孤獨之中，出人意料地惺惺相惜，并且對本國人民感到失望。De Felice 1981, pp. 14–15.

[[5]](#filepos1253603)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 186r.

[[6]](#filepos1253861) 墨索里尼通過布法里尼轉達了他的意思。ASV, ANI, pos. 9, fasc. 5, f. 141r, Buffarini a Tacchi Venturi, 7 novembre 1938.

[[7]](#filepos1254578) 美國黑手黨成員，曾是芝加哥犯罪集團的首領，為查理·盧西安諾（Charles Luciano）的重要盟友。

[[8]](#filepos1254937) Ciano 2002, pp. 151–152.

[[9]](#filepos1255602) Fogarty 1996, p. 562.羅斯福還命令部署在法國海域的美國海軍艦隊將旗艦派往那不勒斯，協助舉辦款待芒德萊恩的儀式，而菲利普斯也參加了這艘旗艦上由一名海軍少將主持的午餐聚會。“在這個特殊的時刻，當宗教迫害愈演愈烈，連意大利都不能幸免時，”羅斯福告訴菲利普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將具有重大的意義，不僅意大利人會明白，而且我認為它們必將帶來正面的效果。”Phillips 1952, pp. 222–223.

[[10]](#filepos1257320) 在雙方結束談話之前，本次聚會的貴賓也加入了他們的談話之中。芒德萊恩樞機告訴齊亞諾，他希望敦促政府兌現對圣座的承諾，他的這番話代表了所有美國天主教徒的心聲，“以及許多美國非天主教徒的心聲”。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00r–202v, Borgongini a Pacelli, 9 novembre 1938.

[[11]](#filepos1258333) ASMAE, APG, b. 46, R. Ambasciata, Berlino, a Regio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Reazioni anti-Semite in Germania,” 26 novembre 1938.教宗大使切薩雷·奧爾塞尼戈也就此次屠戮給梵蒂岡發去了一份詳細報告，但沒有任何記錄顯示圣座曾就此事提出譴責和抗議。Wolf 2010, pp. 205–206.此次暴力事件得到《公教文明》的報道：CC 1938 IV, pp. 476–478。

[[12]](#filepos1259104) Perin 2011, p. 207.

[[13]](#filepos1260250)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03r–204r, Tacchi Venturi a Mussolini, 10 novembre 1938.

[[14]](#filepos1261858) Fornari 1971, pp. 185–186; Il Regime fascista, 8 novembre 1938, p. 3.

[[15]](#filepos1262330) 《法里納奇演講中的教會與猶太人》，《意大利日報》，1938年11月9日。

[[16]](#filepos1262853) DDI, series 8, vol. 10, n. 390, Pignatti a Ciano, 12 novembre 1938.

[[17]](#filepos1264850) 這份檔案的作者可能是塔爾迪尼，檔案名是《圣座就種族問題采取的行動》。ASV, AESI, pos. 1054, fasc. 738, ff. 34r–39r.文檔并沒有標注日期，但是它提及了1938年9月21日的一樁事件，因此不可能寫于9月下旬之前。此外，在梵蒂岡秘密檔案里，排在它前面的文檔日期是1938年11月4日的，這表明它可能寫于11月上半月。

[[18]](#filepos1266539) 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212r–213r, Pacelli, telegramma per Parigi, San Sabastiano, Londra, 11 novembre 1938.

[[19]](#filepos1268615) 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62r–166r, Pacelli a Pignatti, 13 novembre 1938. 次日，帕切利給教廷的諸位樞機送去了報告，向他們說明了當前的情況，并附上了幾份文件，包括塔基·文圖里寄給墨索里尼的兩封諂媚信件、新法案的文本、教宗寫給墨索里尼和國王的信件（建議對新法案草案第7條的措辭進行修改）、國王的回復，以及帕切利于11月13日寫給皮尼亞蒂的抗議信。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43r–161r.

[[20]](#filepos1269197) 轉載于Sale 2009, p. 286

[[21]](#filepos1269486) 《關于新法令》，OR, 14–15 novembre 1938, p. 1。11月16日，英國駐意大利大使達西·奧斯本（D’Arcy Osborne）對教宗發表的抗議進行了分析，并將其寄給倫敦的哈利法克斯（Halifax）子爵。他先是概括了《羅馬觀察報》的文章，以及它就政府違背宗教事務協約一事提出的抗議，然后表示“這份抗議會帶來怎樣的后果將是一個有趣的話題，因為它將表明墨索里尼先生到底是更重視法西斯極端分子和納粹同盟的觀點和影響力，還是更重視意大利天主教徒的觀點和影響力。我懷疑政府的回應不會考慮梵蒂岡意見本身的價值，而是出于純粹功利的目的。如果順從法西斯原則和納粹實踐的考量沒有占得上風，我將會又驚又喜”。FCRSE, pt. 16, October to December 1938, n. 58.

[[22]](#filepos1273889) 次日，庇護十一世向塔爾迪尼談起了他同老耶穌會士的對話：“昨天，塔基·文圖里神父來到梵蒂岡，只是為了告訴我那篇文章給政府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不過我讓他吃了頓苦頭！”

[[23]](#filepos1274160) 帕切利到底是等到教宗把這件事給忘了（考慮到他日漸衰退的記憶力），還是說服了教宗，讓他明白這么做并不明智，我們已經無法從塔爾迪尼的描述中獲知，而這份描述是我們進入這番談話的唯一入口。塔爾迪尼簡單地寫道，帕切利“成功地阻止了它”。塔爾迪尼這份關于1938年11月15日的描述寫于稍晚的時日，收于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321r–321v, 329r。

[[24]](#filepos1274873) Charles-Roux, 27 février 1937，轉引自LaCroix-Riz 1994, p. 55。

[[25]](#filepos1275187) ASMAE, AISS, b. 5, fasc. 1, sf. 5, “Lettera aperta a S. E. il Cardinale Schuster Arcivescovo di Milano,” marzo 1930. 關于這一事件的更多細節，參見ACS, MI, FP “Schuster”。

[[26]](#filepos1275511) ASMAE, APSS, n. 314682,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ppunto per la Dir. Gen. A.E.M. Uff. V,” 1 settembre 1937.

[[27]](#filepos1276950) Ferrari 1982, p. 590. ACS, MI, FP “Schuster,” informatore n. 553, 27 novembre 1938.這位線人在報告里寫道，舒斯特樞機的言語鞭撻之所以震驚了米蘭城，是因為“人們普遍相信，這位樞機……完全同法西斯黨站在一起，因此也會遵從政府的種族政策”。ACS, MI, FP “Schuster,” informatore n. 553, 30 novembre 1938。另參見ACS, MI, FP “Schuster,” informatore n. 37, 2 dicembre 1938。

[[28]](#filepos1277407) 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68r–169r, Pacelli a Pignatti, 22 novembre 1938.

[[29]](#filepos1278041) ASV, ANI, pos. 9, fasc. 5, ff. 170r–171r, Pignatti a Pacelli, 29 novembre 1938。

[[30]](#filepos1279261) 這份報紙是《意大利人民報》。同一天，米蘭那份享有聲望的《晚郵報》聲稱，羅斯福在美國已經漸漸不得人心了，并預測說“那些傾向于美國中立原則或者反對白宮被背信棄義的猶太人主宰的人士很快就要站起來反對他了”。兩篇報紙文章都由里德轉自NARA, M1423, reel 1, Edward L. Reed, chargé d’affaires ad interim, Rome, to secretary of state, Washington, n. 1184, December 2, 1938。

[[31]](#filepos1279652) Confalonieri 1957, p. 379.

[[32]](#filepos1280736) DDI, series 8, vol. 10, n. 510, Pignatti a Ciano, 6 dicembre 1938.

[[33]](#filepos1281615) ACS, MI, DAGR, b. B7-G, #81980-3, Milano, 4 dicembre 1938.

[[34]](#filepos1282751) ACS, MI, DAGR, b. B7-G, #81984-5, Milano, 5 dicembre 1938; Israel 2011, p. 62; Matard-Bonucci 2008, p. 293.

## 第二十七章 死得正好

十六年來，墨索里尼一直培育著他與梵蒂岡的合作關系，可是現在，他卻讓狂妄自大、對第三帝國的迷醉以及戰無不勝的錯覺干擾了自己的政治判斷。教宗感到自己被人利用了，但是他的身體愈發孱弱，他明白自己大限將至。

教廷樞機也開始產生不滿情緒，因為一方面意大利的宗教事務協約遭到了破壞，另一方面德國教會也不斷地遭到迫害。皮尼亞蒂在12月中旬告訴齊亞諾：“我方針對種族問題，尤其是針對猶太人的態度在羅馬教廷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現如今，教廷大部分人已不再對法西斯黨抱有好感。”各位樞機擔心墨索里尼可能會效仿希特勒，發起運動鉗制教會在意大利的影響力。

意大利獨裁者依舊目中無人。在庇護看來，他在面對教宗時完全缺乏應有的尊重。希望破滅之后，教宗擔心自己的所作所為對不住天主交付給他的神圣囑托。作為一名意大利人，他曾經被愛國情懷遮蔽了判斷力，而現在他發誓要利用余下的有限時間，盡全力彌補自己的過錯。

聽聞教宗的最新決心之后，皮尼亞蒂變得警覺起來。在寫給齊亞諾的報告中，他用下劃線強調指出：“教宗威脅要在死前做點事情，他會讓意大利長久地銘記他。”他提醒道，在即將到來的《拉特蘭條約》十周年慶祝儀式上，庇護十一世可能會對“法西斯主義發動徹底的譴責”。  [[1]](#_1__DDI__series_8__vol__10__n__5)

墨索里尼在聽聞這一警告時大為光火。庇護怎么還不快點死？難道他沒有意識到領袖為他做了多少事情么？意大利人早就對教會的權勢抱有怨念。正是他，墨索里尼，才讓那些批評教會的人受到遏制。如果教宗要玩這場游戲，那么他會奉陪到底，因為他知道該如何“激發人民的反教會情感”。教會早就走上了衰落的道路，就是因為他花力氣推上一把，才暫時收住了頹勢。如果說意大利人依舊出席彌撒，那完全是因為領袖要求他們參加。在這樣生了一通氣之后，獨裁者最終平靜下來，并且不情愿地（毫無疑問是在齊亞諾的鼓勵下）承認，現在這個關頭，可不能讓教宗呼吁天主教徒背棄他。他需要想方設法，防止雙方關系破裂。  [[2]](#_2__Ciano_2002__pp__165_166)

12月中旬，一位到訪羅馬的法國主教拜見了教宗，卻發現他傷心、氣餒、焦躁不安，仍舊抱怨著墨索里尼沒有就婚姻法一事給他回信。庇護告訴這位法國高級教士：“你還年輕，你的一生中還將看到許多恐怖的事情，它們的恐怖程度將遠遠超過之前的幾個世紀。”  [[3]](#_3__Baudrillart_1996__pp__902_90)

圣誕節前一天，樞機們來到梵蒂岡，團聚到教宗身邊，接受他每年一度的降福。帕切利、塔爾迪尼以及庇護的其他隨從都緊張不已，因為通常情況下他都會把演講稿提前發給國務院，但這一次卻沒有。

教宗坐在圣彼得寶座上，顫抖的手中攥著手寫的紙稿。講話的開頭十分溫暖。他提醒諸位主教，2月11日將是宗教事務協約的十周年紀念日，我們應當向“最高貴的君主以及他蓋世無雙的總理表達謝意，他們配得上這樣的贊美，因為他們為重要且有益的事業戴上了善果和喜人成就的皇冠”。

但是在夸贊墨索里尼之后，他舊事重提，再度說出了幾個月前激怒領袖的話語：“近來，耶穌十字架的敵人在羅馬被封圣。”他進而認為，卐字符號拜訪不朽之城，同宗教事務協約近期受到的違背以及公教進行會成員受到的迫害有關聯。  [[4]](#_4____Sheng_Fu_De_Hua_Yu_____OR)

憂心忡忡的帕切利樞機試圖說服教宗，把那段冒犯納粹德國的卐字符號言論從公開版中刪除。他認為，這段話同教宗的主要觀點毫不相干，因為他談論的是意大利，而不是德國。但是庇護清楚自己在發表什么樣的言論，他要提醒意大利人留心納粹黨人。塔爾迪尼回憶道，帕切利的懇求完全是一番徒勞：“教宗沒有動搖。”《羅馬觀察報》在次日全文刊登了他的講話。  [[5]](#_5__Pa_Qie_Li_Wei_Le_Shuo_Fu_Jia)

墨索里尼再度發火，他認為教宗的言論是對羅馬—柏林軸心的又一輪攻擊。  [[6]](#_6__Zai_Yi_Chang_Hui_Mian_Zhong)  即將來臨的《拉特蘭條約》周年慶很顯然要成為雙方最后的較量。教宗認為擺在墨索里尼面前的只有兩個選項：他可以借用那一天向全世界證明他依然信守協約的約定；或者他可以冷落教宗，向梵蒂岡宣戰。教宗大使急于緩和雙方劍拔弩張的關系，提議讓領袖在紀念日當天拜訪庇護十一世，但是獨裁者拒絕了這個建議。他已經朝貢過一次。這樣的事不會發生第二次。  [[7]](#_7__Ciano_2002__p__171___January)

領袖核心集團的成員則擔心墨索里尼已經與現實脫節了。他有時會明確承認教會支持的重要性，甚至批評希特勒與教會作對的舉措，但他也變得越來越魯莽。那年年末，他來到羅馬涅的海邊寓所，思索接下來的幾個月需要做出的重大決策。法國駐意大利大使的描述準確地捕捉了那個場景：“獨裁者的那些好友，他的那些至交……最先確認他愈發將自己包圍在無法穿透的謎團中，他不再是曾經的他，他已經變了個人，不再接見任何人。如今，也許除了齊亞諾以外，再也沒人知道他準備做些什么，以及打算實現什么樣的目標。”  [[8]](#_8__Francois_Bonnet__December_31)

\* \* \* \* \*

領袖與克拉拉·佩塔奇的風流韻事也愈發成為旁人譏諷的話題，他卻不愿意放棄她。兩個月前，曾經服侍過他的一位女仆前來向他求助。他給了她點錢，但是在離開前，她略顯膽怯地問他知不知道整個羅馬都在說他些什么。他不情愿地讓她只管開口。“他們說，”她告訴他，“您現在包養的那位年輕情婦是梵蒂岡一位大人物的女兒。”

“不過是尋常的捕風捉影，完全是空談。”這么回答的領袖其實并不高興。在過去幾年里，他有過很多情婦，但從來不擔心人們關于她們的閑言碎語會有損他的聲名。實際上，他認為她們有助于提升他的形象。但是，通過這種方式和梵蒂岡扯上關系，卻令他很不是滋味。  [[9]](#_9__Petacci_2010__pp__445_446)

墨索里尼在元旦回到辦公室，并于上午9點15分給克拉拉打了一通電話，下午2點15分之前又給她打了三通電話，表示自己已經準備同她團聚。當她抵達那個昏暗的房間時，他正坐在扶手椅上，身邊只留了一盞小燈。他已經睡著了。當他醒來時，他讓她坐在他膝蓋上，然后做愛。他穿衣服時吃了一個橘子，晚上7點30分返回辦公室。他在一大堆文件面前坐下，一邊翻閱一邊口吐各種貶損之辭：“這些法國豬！聽聽這個……簡直是蠢貨！”他來回踱步，心情因為這些文件變得很糟糕，他告訴克拉拉自己有多么討厭她，他常常這么做，并且緊接著就用愛的宣言將她淹沒。“我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人，”他說道，“我有過許多女人，不過她們就像是一扇扇旋轉門。”他告訴克拉拉，自己現在沒有過去那么放蕩了，只跟另外兩個女人還保持關系，那兩個女人她都認識，羅米爾達·魯斯皮（Romilda Ruspi）和艾麗斯·帕洛泰利（Alice Pallottelli），并且只是因為她們給他生過孩子。他承認自己曾經愛過瑪格麗塔·薩爾法蒂，但那份愛只維系了幾年時間，并且他也常常對她不忠。他們打開了留聲機，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把克拉拉的毛皮大衣蓋在身上。“我的腦袋靠在他的胸膛上，他緊緊擁抱著我，非常溫柔地愛撫著我，”克拉拉在日記里寫道，“但他總是有點心不在焉。”  [[10]](#_10__Petacci_2011__pp__21_35)

次日，領袖喊來了齊亞諾和皮尼亞蒂，同他們討論最近的事態發展。他仍然琢磨著教宗的話語，庇護在圣誕節講話中稱他是“蓋世無雙的總理”。他確信教宗在諷刺他，把他當成傻瓜。“我們不想制造沖突，”他告訴這兩人，“但我們也不會回避沖突，真要對抗起來，我們將喚醒所有沉睡的反教會敵意。”皮尼亞蒂擔心墨索里尼的怒意會導致可怕的后果，于是出言為教宗辯護；齊亞諾也認為冒險與教會作對乃是瘋狂之舉。但是墨索里尼想要施壓，于是準備了一紙言辭尖刻的警告，安排大使交給梵蒂岡國務卿。  [[11]](#_11__Ciano_2002__p__172___Januar)

次日，皮尼亞蒂將領袖的警告信交給帕切利。樞機堅稱“蓋世無雙的總理”乃是情真意切的贊美，墨索里尼為意大利和教會做了這么多善事，教宗不過是想要表達自己的欣賞之情。皮尼亞蒂回答說，政府與圣座的關系正處在危險的斷裂邊緣，他警告道，如果教會不謹慎行事，將給自己帶來麻煩。  [[12]](#_12__DDI__series_8__vol__11__n)

過去的幾個月對教宗而言非常痛苦，他曾經夢想將意大利變成懺悔的國度，在這個國度里，極權政府的機器將為教會所用，但如今他發現自己的夢想太過天真。他確實前無古人，做到了許多現代教宗做不到的事情：讓政府將教會的意愿強加于人民身上。如今天主教神職人員在許多國家機構（從學校到政治資助的青年團體）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在此之前，這些機構都是他們觸碰不到的。但是，婚姻法所引發的拉鋸戰已經清楚地表明，只要是墨索里尼認為對政府至關重要的事情，他必然會大權獨攬，不會讓教宗幫他做決定。

倫敦《每日郵報》（Daily Mail ）駐羅馬記者發布了一則報道，稱庇護十一世正打算秘密召見樞機，對種族主義發起強有力的譴責。有傳言稱，教宗也在籌備一篇秘密通諭，目的如出一轍。帕切利樞機否認了這些報道，卻告訴意大利大使，教宗曾警告說，他“還有更多話要說，到了他這個年紀，他已經什么都不怕了”。在向齊亞諾轉述教宗的話語時，皮尼亞蒂焦慮地回想起庇護曾經說過的豪言壯語：“他要在死前做點事情，他會讓意大利長久地銘記他。”  [[13]](#_13__DDI__series_8__vol__11__n)

\* \* \* \* \*

教宗對種族主義的批評給其他教會領導人松了綁，他們也有可能會提出自己的批評意見。米蘭的舒斯特樞機便是最不消停的案例。其他高級教士也可能會學習他的榜樣，這種可能性令墨索里尼和他的助手們感到憂慮。  [[14]](#_14__Zai_Yi_Da_Li_De_Shu_Ji_He_Z)

羅伯托·法里納奇帶頭對舒斯特發起攻擊，他在《法西斯政府報》上刊文質疑，一位曾經的“超級法西斯黨人”怎么就突然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法里納奇認為，這種轉變肯定同天主教會沒有任何關系，因為與猶太人作戰的法西斯主義是在“同基督教的敵人作斗爭，那些猶太人曾經冒犯和侮辱了基督”。  [[15]](#_15__Xia_Er_____Lu_Zai_1938Nian)  法里納奇于是向極具權勢的圣心天主教大學校長求助。按照計劃，杰梅利神父將在博洛尼亞做一場大型的公開演講。

離演講日期還有兩天，法里納奇致信墨索里尼，告訴領袖他近來說動克雷莫納主教喬瓦尼·卡扎尼（Giovanni Cazzani）在布道中發表支持反猶運動的言論。他還進一步說道：“我希望能說服杰梅利神父，讓他在博洛尼亞也做一場類似的演講。”

一周后，《羅馬觀察報》登載了克雷莫納主教的布道詞，這篇文章以梵蒂岡的立場支持了反猶法案。報紙編輯在引語中解釋，意大利的所有主教在對待猶太人一事上達成了共識，他們的觀點與教宗和諧一致。

卡扎尼主教警醒道：“德國人的種族觀點太過夸大，其信條與天啟真理相違背。”但是，納粹反猶運動的出發點存在謬誤，并不意味著意大利的種族法案就不正當。納粹的種族主義涉嫌夸大，是因為它把天主教徒也納為迫害對象。主教說道：“教會始終認為，與猶太人（只要他們信奉猶太教）同住對天主教徒的信仰與平靜非常危險。出于這個原因，教會法規和紀律中有一種古老而悠久的傳統，旨在限制猶太人在基督教群體中的行動和影響力，限制他們同天主教徒的接觸，孤立猶太人，不允許他們操持任何可能主宰或影響基督徒精神、教育和習俗的職業或行業。”他堅稱教會遭到了不公正的指控，教會從未反對過反猶法案。教會譴責的乃是“德國過分的種族主義”，它“從來不會譴責以政治手段保衛種族繁榮與完整性的舉措，也不會譴責以司法手段提醒人們注意本國過度且有害的猶太影響的考量”。  [[16]](#_16__Zhu_Jiao_Guan_Yu_You_Tai_Re)

1月9日，杰梅利神父來到博洛尼亞，參加當地紀念一位14世紀外科醫生的慶祝活動。這位外科醫生并非猶太人，但是在杰梅利神父講話的末尾，他牽強地將話題轉到猶太人身上。他告訴臺下那些卓有成就的聽眾：今天的意大利人民“最深重的苦難，來自教會與國家之間的沖突，這都是由于猶太—共濟會陰謀，旨在將宗教貶作私人事務”。多虧了羅馬當局的決心，意大利人民“才得以在血脈、宗教、語言、習俗、希冀和理想上達成一致”。與此同時，“那個作出錯誤決定的民族，他們招致的可怕判決將得到執行，他們將在全世界流浪。他們無法求得家鄉的安逸，這可怕罪惡的后果將永遠跟隨他們，直至天涯海角”。  [[17]](#_17__Bocci_2003__pp__501_505_Fa)

博洛尼亞的《意大利未來報》是意大利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報紙，它用大量的版面報道了杰梅利的講話。從這場講話中我們得知，“樞機和主教無時無刻不在同異邦的種族主義作斗爭，但它們都與意大利的種族政策無涉”。一周后，這份報紙再度提起這場講話，它告訴讀者“杰梅利神父的演講和卡扎尼蒙席的布道詞……是對天主教教條權威且莊重的闡釋，教會從上到下，以及永遠不會犯錯的至高無上的教宗，都在主張并教導這些內容”。  [[18]](#_18__MAEI__vol__267__158_159__Ch)

\* \* \* \* \*

多年以來，教宗對教會實行著鐵腕統治，但如今日漸虛弱的他顯現出失控的頹勢。身邊的人不斷地阻撓他，不讓他阻止意大利追隨納粹德國的腳步。當庇護讀到杰梅利的講話稿時，他崩潰得哭了起來，他把帕切利趕了出去，好讓自己一個人待著。  [[19]](#_19__ACS__MI__FP__Gemelli___info)  而在同一周，梵蒂岡報紙還刊登了克雷莫納主教的布道詞，贊許地為種族法案提供辯護。  [[20]](#_20__Zai_1939Nian_Chu____Gong_Ji)  雖然杰梅利的講話令庇護失望，但他們兩人的密切關系似乎沒有受到影響。教宗依然給予他特殊的通行許可，并在1月22日接見了他。  [[21]](#_21__Venini_2004__p__251_Wei_Ni)  對于那些發覺法西斯國和梵蒂岡存有爭執的意大利人來說，雙方爭議的焦點并非反猶法案（因為梵蒂岡也認可這些觀念），而是墨索里尼與納粹種族意識形態曖昧不明的關系，正是這種意識形態違背了教會的教條及其普世的訴求。

教宗自認命不久矣，所以即將到來的《拉特蘭條約》十周年紀念日將是他向全體主教（其中三分之二都由他委任）發表講話的最后機會。  [[22]](#_22__Riccardi_1996__p__536__Yi_D)  他感到自己肩負著神圣責任，于全世界面臨的所有危險中，于基督教價值觀面臨的所有脅迫中，將天主的意志傳達給諸位主教。

教宗很想知道，當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發表演講時，墨索里尼會不會在場。帕切利樞機表示自己并不清楚，但認為領袖不太可能在場。“如果他不打算慶祝十周年紀念日，”教宗回答道，“那么我就自己來慶祝。”  [[23]](#_23__Pa_Qie_Li_Jiang_Zhe_Fan_Dui)

梵蒂岡彌漫著一種確定無疑的感受，一個時代即將終結了。歷經十七年后，一任新的教宗應當快要誕生。流言在歐洲各國不脛而走。法國報紙報道說，虛弱的教宗對墨索里尼非常憤怒，想要離開意大利，奔赴法國，他現在正在掂量到底是阿維尼翁好，還是楓丹白露更適宜。倫敦的《每日郵報》以及多家電臺則宣布，當教宗把天主教世界交代給繼任者后，計劃在仲夏搬到岡多菲堡，用最后的遺言譴責這個時代的所有過錯。梵蒂岡報紙《羅馬觀察報》刊登了一篇題作《神話故事》（“Cronache della Befana”）的文章，譏諷了這些流言，并報道說教宗“健康狀況極佳”。  [[24]](#_24__Mo_Suo_Li_Ni_Hen_Zai_Yi_Jia)

墨索里尼還在生教宗的氣，因為后者在圣誕節致辭中對意大利公教進行會受到的迫害提出抗議，而外國媒體則引用這些話語，大肆宣揚教宗對政府的不滿之情。  [[25]](#_25____Niu_Yue_Shi_Bao____Zai_Sh)  意大利大使將領袖表達的不滿報告給帕切利樞機。帕切利回答說，沒人能夠阻止教宗發表激進的言論。“圣父易怒的性情簡直一天比一天嚴重，”大使在給齊亞諾的報告里寫道，“使其共事者的工作變得極其困難。”

據皮尼亞蒂所言，教宗認定政府在迫害公教進行會團體。他著眼于一些微小的事件，然后把它們變成了嚴重的問題。最近會見塔爾迪尼時，教宗詢問了公教進行會的近期新聞，當塔爾迪尼回答近期沒有重大的事件發生時，教宗大發雷霆。他把一疊信件甩在倒霉的塔爾迪尼面前，大吼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好好讀讀他們都給我寫了什么。”

皮尼亞蒂告訴齊亞諾：“只要現任教宗不退位，恐怕我們就沒什么好事可以期待。”他進一步說道，庇護十一世患有“病理性大腦刺激”，這種疾病隨著年歲的增加而愈發嚴重。

教宗死后，事態可能會得到改善，但是國家不能聽憑命運的擺布。政府應當與意大利各位樞機謹慎合作。他建議：“在未來的樞機團里，應當有一大批樞機能夠權威地確證，法西斯政府依然忠于協議以及協議背后的精神內涵。關于混合婚姻的法案不過是小事一樁，完全是因為教宗陰晴不定的性情才被搞大。”  [[26]](#_26__DDI__series_8__vol__11__n)

墨索里尼則面臨兩難的抉擇。他擔心這場紀念活動將是梵蒂岡的奢華作秀，所有的注意力都將集中在教宗身上；但是這份條約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大成就，不參與這場紀念活動等于向別國示弱，仿佛教會已經不再支持他了。  [[27]](#_27__19Ri__Bo_Er_Gong_Ji_Ni_Xun)

墨索里尼傳話給帕切利樞機，他愿意討論慶祝儀式的組織形式。他提出了一系列以他為中心的活動，跟他日常主持的法西斯慶祝活動如出一轍。他和教宗將分別發表講話，互致賀詞，然后舉行彌撒儀式。墨索里尼想把彌撒儀式安排在羅馬運動場，這個場所正是為了向他致敬而興建的。他絕不踏足圣彼得大教堂。他還希望舉辦宴會，招待前來羅馬的意大利主教。

次日，帕切利將領袖的提議傳達給教宗，即他希望能讓世人認為這場慶祝活動是由圣座和意大利王國合辦的。但是教宗再次發了火，怒斥墨索里尼沒有就婚姻法問題給他回信。然后，回到墨索里尼有關慶祝活動的提案時，教宗表示他可以接受雙方互致賀詞，但不允許主教參加威尼斯宮的宴會。邀請他們前來羅馬的人是他，而不是墨索里尼。如果墨索里尼想在羅馬其他地方主持一場彌撒，那么它將和教宗沒有任何瓜葛。

教宗愈思索墨索里尼的提案，就愈發心煩意亂。兩天后，他告訴帕切利，自己改變了主意，不愿意同墨索里尼互致賀詞。他表示《拉特蘭條約》是以國王的名義簽署的，如果慶祝活動需要這樣的安排，那么與教宗互致賀詞的應該是國王，而不是領袖。  [[28]](#_28__Zhe_Xie_Shi_Jian_Ji_Lu_Zai)

\* \* \* \* \*

七個月前，教宗曾秘密地將拉法奇神父召至岡多菲堡，命他起草一篇批判種族主義與反猶主義的通諭，但時至今日，他依然沒有收到任何稿件。教宗明白自己已經無法對助手們保密，于是把這事告訴了塔爾迪尼，要他去找萊多霍夫斯基，看看這位美國耶穌會士的任務到底完成得怎么樣了。

幾個月前，當萊多霍夫斯基將通諭初稿寄給羅薩時，他隨稿件附上了一張便條：“我給閣下送上拉法奇神父的稿件，祈禱您能親自審閱，并告訴我……這份稿件現下的形式能否作為初稿呈送給圣父。”萊多霍夫斯基很快就自問自答地寫道：“我對此表示深切的懷疑！”到最后，羅薩也沒有完成他的修改工作。  [[29]](#_29__Sale_2009__p__45)  11月26日周六晚，這位《公教文明》前主編在書桌前突發心臟病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30]](#_30__Wo_Men_Bing_Bu_Qing_Chu_Chu)

此時，萊多霍夫斯基依然沒有把這份通諭初稿呈送給教宗。1月，當他極不情愿地將它交給教宗時，他隨稿附上了一封信件。他竟然認為這篇通諭的主題是“民族主義”，而不是種族主義，更不可能是反猶主義。萊多霍夫斯基告訴教宗：“在羅薩神父和我看來，這份稿件的提綱跟圣父的要求不符。”羅薩神父試圖重新擬出一份提綱，但是在完成之前便匆匆過世。至于羅薩過世后，他自己對這份材料做了怎樣的處理，萊多霍夫斯基并沒有做任何解釋，但他表示只要教宗需要，他愿意提供協助，撰寫出一個更合意的版本。  [[31]](#_31__Sale_2009__pp__45_47_Sa_Lai)

不知何故，關于這篇譴責種族主義的秘密通諭的消息泄露了出來，引發了墨索里尼及其幕僚的擔憂。1月下旬，一位警方線人發來一份長篇報告，揭發一位高級教士批判納粹種族主義及其意大利效仿物。這位威尼斯大主教（報告稱他為長老）近來在主顯節上發表布道，并且將其刊登在《羅馬觀察報》上。喬瓦尼·皮亞扎（Giovanni Piazza）樞機表示，“過分地贊揚某些種族”永遠都是不正當的，既沒有科學根基，也違背教會的教導。  [[32]](#_32____Wei_Ni_Si_Da_Zhu_Jiao_Bu)

線人提醒，越來越多的高級教士發出反對種族主義的聲音，“考慮到這些發言人的權威地位、民眾之間廣泛的天主教會情感以及天主教媒體（其發行量不斷增大，各個社會階層都大面積地閱讀它們）強大的宣傳能力，他們將成為一股強大的涌流，給公眾輿論帶來可觀的影響”。  [[33]](#_33__ASMAE__AISS__b__102___Notiz)

皮尼亞蒂在評論這起事件時表示，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己方所造就的。如果不是法西斯媒體熱情地贊揚皮亞扎樞機早先贊許反猶法案的觀點，他也許就不會出言譴責種族主義。大主教感到自己有必要“澄清”他的觀點。皮尼亞蒂認為“任何高級教士，哪怕他職位再高，也不敢反對教宗，因為他知道只要自己逾越了界限，就會徹底被打倒”。如今只剩下一個希望，“只有一任新的教宗（我已經在過去反復提及這一點）才能另辟蹊徑，與種族問題達成和解”。  [[34]](#_34__DDI__series_8__vol__11__n)

教宗開始準備他的演講，或者說是系列演講，因為他打算將慶祝活動延長至兩天（2月11日至12日）。在11日周六，他將會在政府高官和外交要員的見證下，與諸位主教慶祝《拉特蘭條約》十周年紀念日。次日上午，聆聽他講話的聽眾將僅僅包括主教和其他高級神職人員。  [[35]](#_35__ASV__AESS__pos__576__fasc)

齊亞諾非常焦躁，害怕教宗會發表駭人的演講。“十周年慶祝活動的氛圍變得非常陰郁”，他在日記里寫道。  [[36]](#_36__Ciano_2002__p__184__Februar)

墨索里尼也予以強硬的回應。他告訴帕切利，除非教宗保證不借此機會批評政府，否則任何政府官員都不得參加慶祝活動。  [[37]](#_37__Mo_Suo_Li_Ni_Tong_Guo_Pi_Ni)

教宗一方也在不斷施壓。他讓帕切利警告領袖：如果國家領導人抵制周年慶祝活動，將會震動意大利全國人民。他警告墨索里尼，如果政府最高層不出席慶祝活動，那么他將不得不在講話中談及這一缺席。

帕切利樞機將教宗新一輪的威脅轉達給皮尼亞蒂，并補充道，領袖沒有就婚姻法一事給教宗回信，教宗仍然在生這個氣。惱怒的皮尼亞蒂提醒他說，國王寫給教宗的回信是由墨索里尼口述的，所以領袖認為自己已經回過信了。他警告帕切利，如果教宗打算利用周年儀式批評政府，“意大利教會將面臨德國教會類似的處境”。  [[38]](#_38__ASV__AESS__pos__576__fasc)

皮尼亞蒂希望雙方能各退一步。他知道自己沒法讓墨索里尼出席圣彼得大教堂的教宗演講，但如果齊亞諾出席，可能就足以避免教宗發表任何真正破壞雙方關系的言論。  [[39]](#_39__Pi_Ni_Ya_Di_Jian_Yi_Qi_Ya_N)

領袖好戰的氣焰越來越盛，他相信戰爭已經近在咫尺，而意大利（以及他個人）的偉業將很快在血腥的戰場上得到實現。在法西斯大議會的一場會議中（同一天，帕切利與皮尼亞蒂商討政府該派誰來出席周年儀式），墨索里尼公布了他最新的口號：“向海洋進軍！”他告訴各位同仁，意大利困囿于地中海“監獄”里，必須獲得公海的入海口。他的第一個目標是科西嘉島（Corsica），如果為了奪取這個島嶼必須和法國開展，那么他已經準備就緒。僅僅在一周前，佛朗哥的部隊在意大利人的幫助下占領了巴塞羅那（最后一個落入他們手中的西班牙大城市）。歐洲的版圖即將被徹底改寫。  [[40]](#_40__Bottai_1989__p__141)

領袖答應讓齊亞諾代表自己出席圣彼得大教堂的周年慶祝活動，王儲皮埃蒙特親王則代表王室出席。  [[41]](#_41__ASV__AESS__pos__576__fasc)  隨后，意大利所有報紙都報道了這場即將在周末舉行的盛大慶祝活動，并預告意大利外交部部長和親王都將出席。

隨著盛會的迫近，教宗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他的心律不齊，原本便不通暢的血液循環變得愈發阻塞，甚至發起燒來。1月30日晚，他開始起草周六的講話稿。31日，巴黎大主教讓·韋迪耶樞機前來看望他時，被他虛弱的外表震驚。“那副形象真令人難過，”他回憶道，“老教宗的身軀已經是一座廢墟。他變得更瘦了，面龐塌縮下去，滿是皺紋。”但教宗的頭腦依舊清醒，聲音也依舊清晰。他語速很快，仿佛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卻還有很多話沒講。  [[42]](#_42__Papin_1977__p__49)

次日清晨，曾是圖書館館長的庇護謹慎地查看了書桌抽屜里的文件，確保一切都井井有條。在完成上午的接見后，他又開始朗讀講話稿。他非常投入，以至助手不得不求他停下來午休一下，因為當時已經是下午3點鐘，但是他仍沒法放下稿子，眼里噙著淚水，大聲地朗讀著。最后，他將稿子交給孔法洛涅里蒙席，由他在打字機上打出來。在去往樓上公寓的電梯里，他遇見了自己的看護福斯蒂諾（Faustino）神父，他蒼白的臉色和虛弱的身體令神父大為驚慌。福斯蒂諾幫庇護把了把脈搏，驚恐地發現教宗的心率已經跌到每分鐘四十下。  [[43]](#_43__Confalonieri_1957__pp__385)

當教宗臥床不起時，帕切利給他帶來了齊亞諾和親王將參加慶祝儀式的好消息。近幾周來，教宗反復說道：“于我而言，墨索里尼是個多么粗野無禮、背信棄義的人吶！”  [[44]](#_44__Ta_Er_Di_Ni_Ji_Lu_Le_Jiao_Z)  現在，他總算感受到些許平靜。

帕切利樞機勸說教宗推遲慶祝儀式，等他恢復體力再辦不遲，可是教宗明白自己剩下的時間已經很短了。2月7日，他給《羅馬觀察報》口述了一則新聞，開頭是“圣父身體狀況良好”。那天晚些時候，帕切利又勸說病痛難忍的教宗推遲慶祝儀式，庇護回答說：“可今天上午，我們不是宣布過教宗身體狀況良好么？”  [[45]](#_45__ASV__AESS__pos__576__fasc)

次日，教宗的大限仿佛隨時都會到來。他的呼吸開始變得費力，服了很多藥，心率卻依然不齊。但他沒有忘記那場對他意義重大的演講，要求由帕切利代為朗讀。樞機提出了幾條微小的建議。稿件被送去梵蒂岡印刷廠，打算將復印件分發給諸位主教。  [[46]](#_46__Fattorini_2007__p__213)

每周五，德·羅馬尼斯（De Romanis）蒙席都會前來聽取教宗的告解，但這一周，膽小的蒙席周三就來到了教宗的床前。教宗先是告訴他，他肯定出了差錯。當羞赧而結巴的蒙席怎么也解釋不清楚他為什么提早兩天出現時，教宗突然明白了他來訪的緣由。“我明白了，”教宗說道，“幫我告解吧。”

2月9日周四，庇護十一世覺得自己好了一點，他再次詢問慶祝活動的講話稿是否已經印好，隨時可以發放給主教。  [[47]](#_47__Venini_2004__p__254)  他躺在床上，同兩位自米蘭時期起就一直服侍他的助手一起念誦了玫瑰經。接著，他要求他們念誦那篇他孩提時學會的禱告：

耶穌，約瑟夫和瑪利亞，我把心和靈魂都交予你們，

耶穌，約瑟夫和瑪利亞，在最后的時刻陪伴著我，

耶穌，約瑟夫和瑪利亞，望我的靈魂能安詳地與你們會合。

當天晚上，皮尼亞蒂把教宗病危的消息告訴了齊亞諾，而后者則把消息轉達給了墨索里尼，領袖只是聳了聳肩。齊亞諾顧慮重重。如果周年慶祝儀式還沒結束，教宗就匆匆過世，那么由此產生的“教宗選舉會議將對我方目的保有極大的敵意”。度過憂心忡忡的幾周后，他終于相信梵蒂岡在圣彼得大教堂舉行的宏大儀式將有助于緩解雙方的緊張關系，它將向意大利天主教徒展示，圣座與法西斯政府之間的關系依然情比金堅，但是如果慶祝儀式忽然取消，“我們可能會遭遇糟糕的意外情況”。  [[48]](#_48__Ciano_2002__p__187__Februar)

當晚，臥倒在床的教宗病情加重，臨終儀式也再度搬了出來。2月10日周五凌晨，他必須依靠氧氣罩才能夠維持呼吸。凌晨4點，帕切利樞機和其他住在近旁的人員收到緊急通知，趕忙過來參加這悲傷的最后時刻。他們一邊哭泣，一邊央求教宗做最后的祝福。庇護用盡全身力氣才睜開雙眼，但是他虛弱的身體已經沒法吐出清晰的話語，他喃喃地說了幾個詞，停下來，又說了幾個詞。大部分人都聽不清他的話語，但是靠得最近的人后來表示，他最先說的是“天主保佑你們，我的孩子”，然后用更微弱的氣息說“愿人世和平”。  [[49]](#_49__Qia_Mi_Er__Qian_Fa_La____Ji)

凌晨5點31分，堅忍的教宗咽下了最后一口氣。根據傳統，教宗名譽侍從帕切利樞機將負責核實這一死訊。他跪倒在床前，揭開了覆蓋在教宗臉上的面紗，一邊大聲地用他的洗禮名阿契爾呼喚他，一邊用銀錘輕輕地叩著他的額頭。教宗一動都不動。帕切利根據儀式宣布道：“教宗真的走了。”他褪下了教宗冰冷手指上的漁人權戒  [[50]](#_50__Mei_Wei_Jiao_Zong_Du_Hui_Yo)  。  [[51]](#_51____Jiao_Zong_Guo_Shi_______T)

這場周年慶祝儀式對教宗而言無比重要，它寄托了齊亞諾的諸多希望，卻令墨索里尼感到害怕。此時，參加儀式的意大利各地主教都已經趕到羅馬。教宗的書桌上放著一個文件夾，里面是拉法奇神父起草的通諭：《統一的人類》。這篇通諭認為，一名虔誠的基督徒不應當抱持種族主義觀念，它要求各國立即停止對猶太人的迫害。庇護十一世熱切地希望這份聲明能夠公之于眾，但是那些依然留存人世的下屬卻要將它同教宗一起埋葬。  [[52]](#_52__Xi_Long__2006__463_464_Jian)

[[1]](#filepos1296884) DDI, series 8, vol. 10, n. 539, Pignatti a Ciano, 12 dicembre 1938. 這句話在原文中有下劃線。

[[2]](#filepos1297864) Ciano 2002, pp. 165–166.

[[3]](#filepos1298357) Baudrillart 1996, pp. 902–903.

[[4]](#filepos1299524) 《圣父的話語》，OR, 25 dicembre 1938, p. 1。

[[5]](#filepos1300156) 帕切利為了說服教宗，還向蒙蒂尼尋求幫助。ASV, AESI, pos. 1063, fasc. 755, ff. 479r–479v, Tardini appunti, 24 dicembre 1938.

[[6]](#filepos1300401) 在一場會面中，齊亞諾透露了領袖發怒的內情，而博爾貢吉尼則為教宗辯護。教宗大使將近期的緊張關系歸咎于墨索里尼對納粹主義的全盤接受，政府近期通過禁止混合婚姻而違反宗教事務條約的行徑，其動機令人無法理解。他認為，教宗向樞機發表的那番寬宏大量的演講，意在修復雙方都想要維系的和諧關系。現在輪到墨索里尼邁出屬于他的那一步了。ASV, ANI, pos. 24, fasc. 5, ff. 2r–6r, Borgongini to Pacelli, 28 dicembre 1938.

[[7]](#filepos1301001) Ciano 2002, p. 171 ( January 1, 1939).

[[8]](#filepos1301846) François-Bonnet, December 31, 1938, 轉引自De Felice 1981, pp. 571–572。

[[9]](#filepos1302898) Petacci 2010, pp. 445–446.

[[10]](#filepos1304583) Petacci 2011, pp. 21–35.

[[11]](#filepos1305408) Ciano 2002, p. 172 ( January 2, 1939).

[[12]](#filepos1305945) DDI, series 8, vol. 11, n. 6, Pignatti a Ciano, 3 gennaio 1939.同樣是在1月3日，齊亞諾與墨索里尼會見了美國大使，商討一份由羅斯福總統發來的提議。在這封日期標注為12月7日的信函中，羅斯福表示，歐洲有大量的猶太人背井離鄉、無家可歸，他要求領袖幫忙處理這一人道危機。羅斯福提議由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亞辟出一個猶太難民區。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pp. 858–859, “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Chief of the Italian Government (Mussolini),” December 7, 1938;以及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pp. 859–860, “Memorandum Elaborating the Points Referred to in President Roosevelt’s Letter to the Chief of the Italian Government, December 7, 1938”。墨索里尼回答說，基于意大利政府在猶太問題上的態度，他沒法考慮扮演這樣的角色，不過他半開玩笑地告訴菲利普斯大使，美國擁有大片領土，他質問美國為什么不劃出一個區域，接納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DGFP, series D, vol. 4, n. 424, ambassador in Italy to foreign ministry, January 4, 1939; NARA, M1423, reel 1, Edward Reed, Rome,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6, 1939, no. 1238; DDI, series 8, vol. 11, n. 47, Vitetti ai Direttori Generali degli Affari Transoceanici, Roma, 11 gennaio 1939.

[[13]](#filepos1307432) DDI, series 8, vol. 11, n. 26, Pignatti a Ciano, 7 gennaio 1939; ASMAE, AISS, b. 95, fasc. 1, sf. 1, Pignatti, 7 gennaio 1939.

[[14]](#filepos1307938) 在意大利的樞機和主教中，以批評政府種族法案而出名的要數舒斯特樞機，可即便是他，也仍然相信法西斯政府本質上是善良的，雷納托·莫羅（2005, pp. 51–55）對此提出了頗具洞見的分析。舒斯特認為，出問題的只是個別黨內趨勢，它要將異端的納粹意識形態引入意大利法西斯主義。

[[15]](#filepos1308483) 夏爾——魯在1938年12月31日給法國外交部部長發去一份報告，引用了前一天的報紙文字。MAEI, vol. 267, 152–153.

[[16]](#filepos1310503) 主教關于猶太人的講話分為兩個部分，刊登在梵蒂岡的日報上：《克雷莫納主教布道詞：〈教會與猶太人〉》，OR, 15 gennaio 1939, p. 2；《克雷莫納主教布道詞：〈為何要控訴教會〉》，16–17 gennaio 1939, p. 2。《羅馬觀察報》在刊登主教的四旬齋布道詞時，對其言辭進行了弱化處理，刪去了如下語句：“教會從來沒有為保護猶太人和猶太教而說過任何話，做過任何事。”關于這些文字更改的討論，參見Binchy 1970, pp. 622–623，以及Bocchini Camaiani 1989, pp. 62–63。加利納（1979, pp. 523–524）引用了克雷莫納省督于1月8日就布道詞一事發給布法里尼的一部分報告，認為這一布道詞強烈支持法西斯的反猶運動。

[[17]](#filepos1311467) Bocci 2003, pp. 501–505.法里納奇想到讓極具影響力的杰梅利出面，證明教會強烈支持反猶運動，這一想法并不出人意料。杰梅利在博洛尼亞的講話核心內容，都來自他在圣心天主教大學1938—1939學年開學典禮上發表的講話。他不僅將“猶太—共濟會陰謀”當作敵人來炮轟，而且對墨索里尼的贊頌也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必須構筑新的意大利，構筑墨索里尼時代的意大利，這些‘墨索里尼手下的年輕人’敢于放下書本，拿起步槍，為他們的祖國沖鋒陷陣。”此文刊登在杰梅利主管的期刊《生活與思考》（Vita e pensiero ），15, n.1, pp. 5–12, 1939，討論參見Bocchini Camaiani 1989, p. 48n14。杰梅利對于猶太人的看法同《公教文明》以及耶穌會總會長極其一致。自從建立圣心天主教大學起，他時不時地就猶太問題大發陳詞。就在博洛尼亞演講的幾個月前，他在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中談及，所謂西方民主不過是“猶太—共濟會”陰謀的障眼法。Bocci 2003, p. 523n14. 杰梅利是個討人厭的家伙，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他憑借一己之力創辦了圣心天主教大學，為之抗爭，為之戰斗，并且將它當作是自己的封地。在這番事業中，他得到了教宗和法西斯當局的強力支持。他曾在1931年告訴聽眾：“我有許多缺點，對此我不會否認。我很暴力，會欺侮別人，有時候很糊涂。”他繼續說道，但是天主明白讓人們的缺點為祂所用。“必須要有像我這樣的人，乃至一位暴君，才能創辦一所大學。” Cosmacini 1985, p. 203. 杰梅利慷慨激昂的反猶演講非常及時地給法里納奇幫了大忙，因為后者正試圖證明，政府的反猶法案與教會的教導協調一致。然而杰梅利的講話可能有著非常卑劣的動機，因為有證據表明，他希望通過履行法里納奇的意愿，獲得意大利學會（意大利最負名望的榮譽學會）主席一職。若果真如此，那么法里納奇至少嘗試去兌現他的承諾。3月19日，他敦促墨索里尼將杰梅利聘為意大利學會主席。法里納奇深信杰梅利很快就會晉升為樞機，所以他告訴領袖，如果我們能將臥底安插到離新教宗如此接近的位置，將為我們帶來極大的便利。ACS, CR, b. 44, n. 033912, Farinacci a Mussolini, 19 marzo 1939.墨索里尼回答說“時機尚未成熟”，所以沒有做出這一委任。而杰梅利也沒有成為樞機。關于這一事件的討論，參見Bocci 2003, pp. 506–508。

[[18]](#filepos1312196) MAEI, vol. 267, 158–159, Charles-Roux à Georges Bonnet, 19 janvier 1939.

[[19]](#filepos1312741) ACS, MI, FP “Gemelli,” informatore n. 390 (=Arrigo Pozzi), “Gli umori del nuovo papa verso padre Gemelli. Una scena pietosa con Pio XI,” Milano, 10 marzo 1939.

[[20]](#filepos1312973) 在1939年初，《公教文明》還刊登了一篇文章，再度指控共濟會成員是基督教文明的大敵，他們的盟友是“四海一家的猶太人，這些人不會效忠于任何國家”。安東尼奧·梅西內奧，《世界國際主義與國家身份》，CC 1939 I, pp. 7–20, 轉引自Vian 2011, pp. 131–132。

[[21]](#filepos1313262) Venini 2004, p. 251.韋尼尼沒有提及教宗與杰梅利之間有任何摩擦。

[[22]](#filepos1313892) Riccardi 1996, p. 536. 意大利共有二百七十四個主教管區，受到主教或者大主教的管轄。

[[23]](#filepos1314486) 帕切利將這番對話告訴了皮尼亞蒂，后者直接向齊亞諾做了報告，并要求雙方進行會面和商討。ASMAE, AISS, b. 101, fasc. 1, Pignatti a Ciano, 11 gennaio 1939.

[[24]](#filepos1315380) 墨索里尼很在意教宗是否對意大利政府感到不滿，對此心知肚明的蒙蒂尼蒙席給皮尼亞蒂送去了這一期的梵蒂岡報紙。但是皮尼亞蒂并不滿意，告訴他這個話題不應該用幽默的形式處理掉。梵蒂岡應該發布正式聲明，否認這些流言的真實性。ASMAE, APSS, b. 44, fasc. 2, Pignatti a Ciano, 11 gennaio 1939. 1月11日至14日，英國首相和外交部長訪問羅馬，使得齊亞諾和墨索里尼無法分心旁騖。DBFP, 1919–1939, series 3, vol. 3, n. 500, pp. 517–530, R 431/1/22, “Conversations between British and Italian Ministers, Rome, January 11–14, 1939,” and n. 502, pp. 531–540, R 546/1/22, “The Earl of Perth (Rome) to Viscount Halifax (Received January 23),” January 19, 1939.兩位英國來訪者在1月13日與教宗進行了簡短的會晤。張伯倫表示教宗“健康狀況相當良好”。《英國政治家與教宗進行會晤》，NYT, January 14, 1939, p. 5。

[[25]](#filepos1315737) 《紐約時報》在圣誕節當天刊登了一篇題為《庇護十一世譴責法西斯敵對行為，披露諸多內情》的文章（December 25, 1938, p. 1）。這篇文章并不完全準確，因為美國、法國和英國的報紙都急于為教宗打造一副與種族法案和法西斯政權不共戴天的形象，所以刪去了教宗在抗議中做出的一些區分。

[[26]](#filepos1317325) DDI, series 8, vol. 11, n. 56, Pignatti a Ciano, 14 gennaio 1939.

[[27]](#filepos1317763) 19日，博爾貢吉尼詢問墨索里尼的內務部副部長布法里尼，政府打算如何慶祝十周年紀念日。這位法西斯高官厲聲說道：“考慮到如今的事態，我們憑什么要慶祝？”可是當教宗大使指出，早在十年前，雙方的和解給意大利人民帶來多么強烈的喜悅，他們必將期待一場盛大的紀念儀式時，布法里尼承認道：“是的，是的，你說得對，我們是得搞點活動。”ASV, ANI, pos. 24, fasc. 14, ff. 174r–177r, Borgongini a Pacelli, 19 gennaio 1939.

[[28]](#filepos1319336) 這些事件記錄在塔爾迪尼的描述中：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f. 15r–15v, 17r。

[[29]](#filepos1320378) Sale 2009, p. 45.

[[30]](#filepos1320605) 我們并不清楚初稿（以及羅薩在過去的幾周內所做的修改）如何回到萊多霍夫斯基手里。羅薩神父很有可能將這個秘密告訴了接替他的雜志主編，當他過世后，此人便立即把材料收集起來，交給了萊多霍夫斯基。如果事實并非如此，那么在聽聞羅薩的死訊時，耶穌會總會長定然是傳令將這份稿件帶回到他身邊。

[[31]](#filepos1321440) Sale 2009, pp. 45–47.薩萊神父在其2009年的專著中首先指出了這封通信的存在，但他為萊多霍夫斯基和羅薩辯護，認為他們沒有阻止教宗發布譴責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通諭。他認為（Sale 2009, p. 47）他們覺得這份初稿的問題主要在于拉法奇對教宗通諭的特定文風不熟，因此沒有采用恰當的措辭形式。他們在意的主要問題竟然是文風，這種說法令人難以置信。

[[32]](#filepos1322154) 《威尼斯大主教布道詞》，OR, 19 gennaio 1939, p. 2。

[[33]](#filepos1322667) ASMAE, AISS, b. 102, “Notizia fiduciaria,” Roma, 19 gennaio 1939.

[[34]](#filepos1323429) DDI, series 8, vol. 11, n. 102, Pignatti a Bastianini, 24 gennaio 1939.

[[35]](#filepos1323931)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f. 22r–23v, Tardini appunti, 22 gennaio and 1 febbraio 1939.

[[36]](#filepos1324222) Ciano 2002, p. 184 (February 1, 1939).

[[37]](#filepos1324531) 墨索里尼通過皮尼亞蒂轉達了他的意見。ASMAE, AISS, b. 101, Pignatti a Ciano, n. 414/133, 3 febbraio 1939.帕切利對此次會面的描述收于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19r, 3 febbario 1939。

[[38]](#filepos1325409)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20r, 4 febbraio 1939.

[[39]](#filepos1325778) 皮尼亞蒂建議齊亞諾：“如果在你到場的情況下，教宗依然聽憑自己的壞脾氣發作，那么即便教宗發表了粗魯的回應，整個天主教世界，以及所有頭腦正常的人都會明白，政府在這一事件上是正確的。”ASMAE, AISS, b. 101, Pignatti a Ciano, n. 439/144, 4 febbraio 1939.

[[40]](#filepos1326700) Bottai 1989, p. 141.

[[41]](#filepos1326979)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21r, 6 febbario 1939.夏爾——魯在2月8日發給巴黎的報告中回顧了派遣齊亞諾出席活動的決定。MAEI, vol. 267, 165–166.

[[42]](#filepos1327871) Papin 1977, p. 49.

[[43]](#filepos1328723) Confalonieri 1957, pp. 385–386.

[[44]](#filepos1329095) 塔爾迪尼記錄了教宗的話語。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102r.

[[45]](#filepos1329700)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102r.

[[46]](#filepos1330177) Fattorini 2007, p. 213.

[[47]](#filepos1330895) Venini 2004, p. 254.

[[48]](#filepos1332314) Ciano 2002, p. 187 (February 9, 1939).

[[49]](#filepos1333155) 卡米爾·錢法拉，《教宗庇護在梵蒂岡過世，享年八十一歲，多位樞機守在床前》，NYT, February 10, 1939, p. 1。這類關于教宗遺言的二手報告自然是極其不可靠。

[[50]](#filepos1333734) 每位教宗都會用黃金鑄一枚新權戒，代表他至高的地位。

[[51]](#filepos1333852) 《教宗過世》，《泰晤士報》，February 11, 1939, p. 12。

[[52]](#filepos1334572) 希龍（2006, 463–464）講述了教宗的臨終場面。

## 第二十八章 烏云消散

盡管法國大使多次拜見庇護十一世，但他從未見過教宗的私人寓所。如今離教宗去世已經過去幾個小時，他來到宗座宮殿的頂樓，加入了哀悼的人群。他進到一個寬敞的高頂房間，思忖著，墻上這些亂七八糟、毫不協調的二流藝術品破壞了這個房間的宏偉景象。“其中一幅頗具異域風情的刺繡作品格調庸俗”，大概是來自修女的供奉，其他樣式各異的物品裝點了余下的墻面，都是世界各地的代表團送給教宗的禮物。

在賓客留名簿上簽過字后，夏爾——魯穿過狹窄的走廊，向教宗的臥室走去。教宗的遺體擺放在鐵架床上，身上套著一件白色修士袍，頭頂的紅絨帽一直戴到耳邊。他的腦袋枕在一個簡樸的枕頭上，胸前擺著一個十字架，手里則放著念珠。法國大使觀察道：“生命已經拋棄了他，只余下這具可憐的軀體。”他的臉龐已經徹底改變，“一副被人蹂躪過的敗容”。床的四個角上都點著巨大的蠟燭，兩側各站著一位貴族衛兵，手里緊握著佩劍。

當夏爾——魯回到接待廳時，眼前的景象令他驚愕。其他等候輪崗的貴族衛兵正三三兩兩地同高級教士和平信徒官員閑聊。他們講話的聲音很高，臉上沒有任何悲傷或肅穆的神色。  [[1]](#_1__Charles_Roux_1947__pp__243_2)



帕切利樞機陪同加萊亞佐·齊亞諾，與庇護十一世的遺體告別，1939年2月10日

齊亞諾在2月10日的日記里寫道：“教宗死了。領袖對這個消息完全無動于衷。”那天下午，齊亞諾來到梵蒂岡吊唁。帕切利樞機接待了他，并將他一路送到西斯廷教堂。教宗瘦弱的遺體也剛剛抵達那里。它被擺在一個高高的平臺上，上方穹頂覆蓋著米開朗基羅的壁畫。從下往上望，齊亞諾只能看見教宗的白色便鞋和修士袍的邊沿。齊亞諾回憶道，當他們步回庭院時，帕切利“向我談起了國家與教會的關系，他的臉上掛著愉悅又充滿希望的表情”。  [[2]](#_2__Ciano_2002__p__188__February)

墨索里尼心里依舊憤憤不平，而當他自戀情緒高漲的時候，助手必須對他進行臉部按摩才能令他展現出哀悼的神色。梵蒂岡希望領袖能夠參加當天在西斯廷教堂舉行的守靈儀式，但是他并沒有現身。一位吊唁者在日記里記錄了他的缺席：“今天，國王在晚上7點左右前來同遺體告別。墨索里尼卻沒有來，也許是因為他不屑于這么做；又或許是因為他不想因此惹怒希特勒。”  [[3]](#_3__Caviglia_2009__p__227__10_fe)

皮尼亞蒂和齊亞諾對當前的局勢思索良多。盡管墨索里尼有時聲稱，自己對即將到來的教宗選舉會議毫不關心，但是他們兩人卻明白選舉結果至關重要，下一任教宗應當是一位愿意和他們合作的人。他們的擔心已經成為一場揮之不去的夢魘，新任教宗的所作所為可能會讓意大利天主教徒站出來反對他們。  [[4]](#_4__Zai_Guo_Qu_De_Ji_Zhou_Li__Pi)

盡管領袖對教宗選舉會議的結果興趣寥寥，但依然有一些消息令他感到擔心。在清理教宗房間的過程中，梵蒂岡官員在他桌上發現了一份秘密檔案。他們立即將文檔交給了帕切利樞機。2月12日，墨索里尼要求齊亞諾調查文檔的內容。齊亞諾將這一任務轉交給皮尼亞蒂，自己則趁著這異常溫暖、陽光明媚的二月天，前往高爾夫球俱樂部消遣。  [[5]](#_5__Ciano_2002__p__189__February)  墨索里尼也有自己的安排。當天下午4點30分，克拉拉·佩塔奇帶著一些三明治和一束紫羅蘭，來到了他們位于威尼斯宮的寓所，她驚訝地發現，她的情人已經事先抵達，正坐在扶手椅里瀏覽著文件。她懷疑墨索里尼比她先到，是為了確保現場沒留下他近來偷腥的罪證。領袖說道：“過來吻我，坐到我的膝頭上。”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里，信徒在梵蒂岡排隊同教宗的遺體告別，而他們則行了兩輪云雨之事。  [[6]](#_6__Petacci_2011__pp__52_53__12)

當領袖這般忙碌之時，皮尼亞蒂正在路上，他要前去會見教宗大使博爾貢吉尼，一方面詢問教宗留下的那份秘密檔案，另一方面則要詢問一份令他憂心的報告。一家國外報紙報道說，當意大利主教于周六（教宗過世次日）上午聚集在梵蒂岡時，他們每人都收到了一份譴責法西斯的秘密文檔。教宗留下遺愿，如果自己挨不到演講當日，沒法親口向他們講述，這份演講稿就要分發給他們。博爾貢吉尼向這位意大利大使保證，這則消息絕對是子虛烏有，因為當天上午，他就跟主教們待在一起。他猜測道，之所以有這一傳言，可能是因為諸位主教離開梵蒂岡時，每人手上都拿著一個大信封。教宗在臨終時曾下令，給每位主教分發一千里拉，好報銷他們的旅途費用，并在信中向他們發出倡議，回家后以周年紀念的名義舉行一場彌撒。那些記者看到的信封里裝的實際上就是這些東西。  [[7]](#_7__ASV__ANI__pos__1__fasc__7__f)

如今我們無法清楚獲知，教宗將要譴責法西斯的傳言，是否跟教宗打算發表批判種族主義的秘密通諭的消息遭到泄露有關。所有跡象都表明，盡管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的結果令拉法奇神父和貢德拉赫感到不滿，但是他們信守了保密的承諾，而萊多霍夫斯基和羅薩顯然也不愿意讓外人獲知教宗的這項計劃。庇護十一世在過世前三周才收到通諭文稿，他并沒有機會將它發布出來。

得知墨索里尼的心頭大患后，帕切利迅速地行動起來。2月15日，他給教宗的秘書下達命令，將教宗準備演講稿時寫下的所有材料都收集起來。他還給梵蒂岡印刷廠下達指令，銷毀它印出來的所有演講稿復印件（庇護原本打算把它們分發給諸位主教）。印廠副主任向帕切利保證，他會親自將它們銷毀，連“一個逗號都不留”。齊亞諾害怕教宗的演講稿可能泄露出去，而帕切利從得知此事到把事情全部辦妥，只花了兩天時間。他還收走了萊多霍夫斯基在三周前給教宗發來的材料（即后來才為人所知的譴責種族主義的秘密通諭），好確保外人對此一無所知。

只要帕切利還活在人世，那么教宗在過世前最后幾天耗費心力準備的講話內容就永遠無法得見天日。直到時間流逝了整整二十年，等到帕切利過世四個月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才發布了這份演說的節選內容。但是他依然刪除了那些批評法西斯政府的段落，大約是為了保護帕切利，因為他懷疑帕切利為了不惹怒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將這份演講稿雪藏了。直到梵蒂岡在2006年開放了庇護十一世執政期間的檔案，完整版本才得以公之于眾。

這份演講稿對法西斯政府提出的批評其實并不十分尖銳，但是讓它傳入意大利主教耳中，然后被全世界的人閱讀到，依然會令領袖感到不快。教宗抱怨說，有人試圖阻礙或者誤導他的演講，他提醒諸位主教，在與政府“所謂的高層”談話時要保持警惕。“要小心，最親愛的信基督兄弟，不要忘記我們周圍有很多密探和線人（我們最好管他們叫間諜），他們或出于自愿，或領受使命，要偷聽你的話語來對你進行譴責，其實他們完全沒有明白你們的話語，甚至做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解。”他進而哀嘆，“某些偽天主教徒認為自己發現兩位主教乃至主教與教宗之間存在分歧，而因此沾沾自喜”。然后他要求，當主教不希望自己的話語落入旁人耳中時，他一定不能使用電話，因為他們很可能被竊聽了。（教宗曾自豪地表示：“這么多年來，我從未使用過電話，哪怕一次都沒有。”）

庇護十一世簡短地為遭受迫害的德國教會感到悲痛，并痛斥了否認這一現象的人。他的結束語表明了他最想傳達給諸位主教的信息：他期望有一天，“所有人、所有國家、所有種族都能齊聚一堂，在真正的信仰中合為一體，他們身上流淌著同樣的血液，都來自偉大的人類大家庭”。  [[8]](#_8__Fa_Tuo_Li_Ni_Zai_Ta_Zao_Xian)

除了周六的講話稿外，帕切利記錄到，教宗還為周日的講話做過準備。盡管這些記錄的原文沒有找到，但是塔爾迪尼看到過這些材料并且留下了描述。教宗這番講話的要點中，有三點會令領袖不滿：公教進行會；德國的宗教處境；“禁止雅利安人與非雅利安人通婚給宗教事務協約帶來的傷害”。  [[9]](#_9__ASV__AESS__pos__576__fasc__6)

墨索里尼永遠都不會知道，下令壓下教宗生前最后幾項工作的人是帕切利。他所聽聞的版本是，樞機團的一場特別會議認為演講稿對墨索里尼抱有敵意，因此決定將它埋葬。皮尼亞蒂在報告中寫道：各位樞機（至少是占據多數的意大利樞機）如今希望將選票投給一位對法西斯政府持有和解意向的候選人。  [[10]](#_10__ASMAE__AISS__b__101__Pignat)

墨索里尼倒是希望皮尼亞蒂的觀察是正確的，但他依然有擔心的理由。對于最有可能的繼任人選，各種猜測五花八門，有人猜是魁北克大主教讓·維爾納夫（Jean Villeneuve，據說他是最有可能的非意裔人選），也有人猜是近來與墨索里尼作對的舒斯特樞機。《波士頓環球報》登載了舒斯特樞機和威尼斯大主教喬瓦尼·皮亞扎樞機的照片，認為他們是最有可能的人選。  [[11]](#_11____Ji_Ren_Jiao_Zong_De_Ji_We)  《紐約時報》認為皮亞扎最有可能接掌圣彼得寶座，并按照當選可能性的順序羅列了其他八位樞機，歐金尼奧·帕切利位于這張清單的末尾。他沒有教區經驗（其他樞機都曾經管理過主教教區），并且梵蒂岡自古便有一種傳統，教宗人選不宜從國務卿和教宗名譽侍從中選擇，而帕切利同時擔任了這兩個職務。  [[12]](#_12____Jiu_Da_Hou_Xuan_Ren_____N)

盡管許多局外人都認為帕切利當選的可能性很渺茫，但是墨索里尼從警方線人處收到的報告則顯示，帕切利一直在這場競爭中占據先機。據稱，庇護十一世認為國務卿是最有資格繼承寶座的人。確實，墨索里尼也被告知，教宗數次派遣帕切利出國（法國、南非、美國以及其他地區）訪問，好令他贏得當地大主教的支持。對于領袖而言，這些都是好消息。一年前，曾有一份警方線人報告稱，帕切利是一個“擁有內在美德的人，一個出色的意大利人，政府的真誠摯友”。它進一步提出了一些建議：出于這個原因，“與我們為善的梵蒂岡人士熱切地希望政府能展現出應有的智慧，尤其是在這個關頭，我們應當完全杜絕（哪怕是很牽強的）擁護帕切利樞機的姿態”。  [[13]](#_13__ACS__MCPG__b__169__Roma__16)

在教宗死后的這段時間里，類似的報告紛至沓來。一位警方線人同安杰洛·多爾奇（Angelo Dolci，曾任教宗大使）談話后，發現多爾奇也認為帕切利是最有可能繼任的人選。“多爾奇是位優秀的意大利人，他不僅支持法西斯，還特別崇拜領袖，”這位線人在報告里寫道，“他始終堅信，如果帕切利成為教宗，必將成為法西斯政府的摯友。”佛羅倫薩大主教達拉·科斯塔樞機也有不小的當選幾率，人們認為他能夠施行奇跡，因此將他看作是圣人。如果這兩人獲得高票，那么教宗選舉會議將很快得出結果；如果他們都沒有占據優勢，那么選舉會議將曠日持久。  [[14]](#_14__ACS__MCPG__b__170__Roma__24)

政府將教宗葬禮的日期定為法定節日，給學校、辦公室和劇院都放了假。墨索里尼不情不愿地同國王、王后以及其他政府高官前往羅馬的圣安德烈大教堂，參加了追思彌撒。  [[15]](#_15__ASV__ANI__pos__1__fasc__7)

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領導人有一種奇妙的感受，仿佛一覺醒來，某種長年以來一直折磨他們的惱人恨事奇跡般地消失了。帕切利的雷厲風行可以從許多方面看出來。在梵蒂岡和意大利天主教媒體獻給庇護十一世的筆墨海洋中，幾乎沒有一個字提及他與政府之間的沖突，甚至連他同希特勒和納粹黨人的沖突都不見蹤影。意大利報紙很快就領會了其中的含義。在他們對庇護十一世任職生涯的大規模報道中，首要關注的是他與政府達成的和解，即便教宗曾經批評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如今這些話語也都被故意遺忘了。  [[16]](#_16__Fa_Tuo_Li_Ni__2007__pp__221)

教宗過世當日，皮尼亞蒂向外交部提交了一份名單，上面是所有參加教宗選舉會議的樞機以及他們的年齡，最老的是八十八歲的皮尼亞泰利·迪·貝爾蒙特（Pignatelli di Belmonte）樞機，最小的有年僅五十五歲的蒂斯朗樞機。六十二名樞機團成員中，有三十四人是意大利人。  [[17]](#_17__Wei_Ju_Di_Er_De_Fa_Guo_Yuan)

2月18日，樞機齊聚羅馬，德國駐圣座大使迭戈·馮·柏爾根前去找意大利同儕談話。他急于要向皮尼亞蒂透露帕切利樞機近來同他的談話：希特勒的悼念信令樞機深受感動，要求柏爾根向元首轉達自己的感謝之情以及整個樞機團的謝意。帕切利還想告訴希特勒，他希望第三帝國和圣座之間有達成和解的可能性。這一消息令納粹政府滿意。

“大使告訴我說，”皮尼亞蒂描述道，“如果教宗選舉會議的結果花落帕切利樞機頭上，那么他將會想盡一些辦法同德國和解，而且他有很大可能取得成功。”

為了幫助雙方達成各自的使命，這位意大利大使給柏爾根提供了一些建議。他認為，只要德國政府逐漸改善雙方的外交氛圍，第三帝國與梵蒂岡的關系就可以得到修復。德國報紙應當首先減少對梵蒂岡的批評。諸位樞機都密切注意外國媒體的言論，抱持敵意的文章只會令雙方的關系進一步惡化。  [[18]](#_18__Na_Cui_Bao_Zhi_Jin_Lai_Kan)

皮尼亞蒂還敦促德國大使，盡一切努力讓四位德國樞機對即將到來的教宗選舉會議持和解態度。他警示道，如果他們宣揚要對納粹政府發動圣戰，“那么一切就都輸掉了”。關鍵在于，納粹政府要向其他樞機傳達如下信息，教會依然有可能與納粹德國達成相互理解。柏爾根表示，他會立即給柏林發電報，要求他們終止在媒體上的論戰，至于德國樞機的問題，他表示自己非常樂觀。  [[19]](#_19__Bai_Er_Gen_Zhi_Suo_Yi_Le_Gu)

對于意大利大使而言，德國樞機在教宗選舉會議如何表現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不能完全交給柏爾根去解決。2月21日，他拜訪萊多霍夫斯基，向他尋求幫助，耶穌會總會長表示自己會盡可能地幫忙。  [[20]](#_20__ASMAE__AISS__b__95__Pignatt)

隨著教宗選舉會議的迫近，皮尼亞蒂再度同德國大使館核對信息，同柏爾根的副手弗里茨·門斯豪森（Fritz Menshausen）進行了交談。皮尼亞蒂在報告中指出，這位德國使節“反復堅持推舉帕切利為教宗，并讓泰代斯基尼（Federico Tedeschini，前教宗駐西班牙大使）擔任國務卿。對德國來說，這將是最好的方案，并且很有可能會緩和第三帝國與圣座之間的關系”。  [[21]](#_21__ASMAE__AISS__b__95__Pignatt)

皮尼亞蒂奔忙不休地拜訪各位意大利樞機，試圖說服他們，選擇一位與法西斯政府為善且不公開譴責納粹黨人的教宗將是明智之舉。德國樞機已然支持帕切利，如果再拉攏法國樞機，他相信余下的非意大利裔樞機也會從善如流。至于意大利樞機則情況有別。他們對帕切利吹毛求疵，認為他“性格有缺陷，太容易受人影響，并且有時會犯下錯誤，這是軟弱之人的通病”。皮尼亞蒂將這些觀點轉達給齊亞諾，并補充道：“在我看來，這些看法都很有根據。”  [[22]](#_22__ASMAE__AISS__b__95__Pignatt)

博德里亞樞機坐上從巴黎出發的火車，于2月20日抵達羅馬。他深深地愛戴庇護十一世，因此當聽到有這么多同仁批評他時，心里非常惱怒。這位法國樞機觀察道：“在這個國家，一個人這么快就從神壇上跌落下來。”抵達兩天后，他前去拜見了帕切利樞機，后者經過一番猶豫，談起了在即將來臨的教宗選舉會議中自己當選的可能性。博德里亞預言道：“到最后，他會傾向于調停與和解。”  [[23]](#_23__Baudrillart_1996__pp__963_9)

法國樞機中拒不合作的人主要是歐仁·蒂斯朗，他認為帕切利對德國人太過諂媚，他心目中更合適的人選是前教宗駐法國大使路易吉·馬廖內（Luigi Maglione）。諸位法國樞機討論了這一事宜，并達成了妥協：由帕切利坐擁圣彼得寶座，由馬廖內擔任國務卿。蒂斯朗前去拜訪了帕切利，后者顯然不知道蒂斯朗對他有所保留，竟然毫不隱瞞地透露了自己的緊張之情。他認為教廷的意大利樞機對他沒有好感，不會給他投票。“我還不如準備好護照，選舉結束后直接動身去瑞士”，帕切利指的是他通常度假的地方。

蒂斯朗寬慰他說：“法國樞機是你堅強的后盾，無論如何，他們已經做出了一致決定，而且如果你計劃將馬廖內任命為國務卿的話，他們的決心會更加堅定。”

“我向你們保證”，帕切利回答道，雙方就此達成協議。  [[24]](#_24__Zhe_Fan_Dui_Hua_Lai_Zi_Wei)

\* \* \* \* \*

“偉大的日子已經來臨。”那一天是3月1日，周三，教宗選舉會議即將開始。博德里亞在上午5點半起床，主持過彌撒之后便奔赴羅馬。他同其他樞機一起更衣，然后一同行至保祿小堂，在這里舉行過彌撒后，將會安排一場“極其緩慢、無聊的” 幾乎誰也聽不懂的拉丁文布道。當天晚上，最后三位樞機——波士頓大主教威廉·奧康奈爾、里約熱內盧大主教塞巴斯蒂昂·勒梅（Sebastião Leme）以及布宜諾斯艾利斯大主教圣地亞哥·科佩略（Santiago Copello）——也都紛紛抵達，他們的輪船于當天上午停靠在那不勒斯。  [[25]](#_25__You_Liang_Wei_Shu_Ji_Jian_K)

當其他樞機都擠在使徒宮的小房間里時，作為教宗名譽侍從的帕切利樞機則有權待在自己的公寓里，因為那間寓所正好位于會議限制的活動區域內。其他樞機都一同用餐，而帕切利則獨自用餐。  [[26]](#_26__Ventresca_2013__p__136)

次日上午，樞機們排隊進入西斯廷教堂，一些年老的樞機步履艱難。每個人都找到自己的指定席位，前面各有一張加蓋的桌子，在教堂里面對面排成兩行。現如今，局勢已經非常明朗，要么庇護十一世的繼承人歐金尼奧·帕切利迅速勝出，要么他的對手成功阻止他當選，然后選舉會議將持續數日。

會議先抓鬮選出三位樞機，他們將負責計票。沉默籠罩著教堂，而諸位樞機則用鋼筆吸足墨水，在紙條上寫下了自己的選擇。他們一個個從座位上起身，排成一條長隊。每一位樞機走到祭壇前時，都會跪倒在地，念誦一段禱告詞，然后用拉丁文發誓，再把折疊好的選票放到祭壇上。

在第一輪投票中，帕切利獲得三十二票，剛剛超過六十二位在場樞機的半數。佛羅倫薩大主教達拉·科斯塔獲得了九票，前教宗駐法國大使馬廖內獲得了七票。帕切利想要達到三分之二的得票率，還須拉到十票。歷史上的熱門人選常常在獲得多數選票后，因為最后無法拉到足夠的選票而慘敗。曾有老話說，“召開會議時以為要成為教宗的人，最后還只是個樞機”，這番話不是沒有歷史根據的。

樞機們又一次坐到桌前，在紙上寫下他們的選擇，然后把紙條折好。他們又一次排成長隊，遵循著古老的儀式，將他們的選票交到祭壇處。這一次，帕切利多得了八票，但還是不夠。于是，選票里又得混入潮濕的稻草，在壁爐里燒出黑煙，升騰到使徒宮的上空。上午的兩輪投票已經結束。教宗還沒有選出來。樞機們都休憩，去享用午餐了。

午餐過后，樞機們再度聚頭，進行第三輪投票，結果令那些希望挫敗帕切利的人大失所望。只有十四名樞機依然在負隅頑抗。擔任了國務卿并服侍庇護十一世九年之后，歐金尼奧·帕切利收獲了四十八票，超過了會議要求的三分之二選票，并且還多出了六票。那一天也是他六十三歲的生日。  [[27]](#_27__Xu_Duo_Jiao_Zong_Xin_Fu_Du)

在樞機團向全世界宣布新任教宗的誕生前，他首先要正式接受這一結果。高大枯瘦又莊嚴虔誠的帕切利渾身顫抖，但是根據博德里亞的觀察，“他沒法假裝做出拒絕這一職務的姿態，因為他已經渴求了很久很久”。樞機執事卡米洛·卡恰·多米尼奧尼踏步走出了房間，來到圣彼得大教堂的陽臺上，向激動的人群發表講話，而自從白煙升起，下面的人就死死地盯著這道陽臺門。他高聲吟道：“教宗誕生。”十五分鐘后，新任教宗將出現在陽臺上，祝福底下狂熱的群眾。他取名號為庇護十二世，不僅是為了紀念那個他服侍多年的人，還為了紀念庇護九世和庇護十世，他們都是守護教會傳統的英雄。  [[28]](#_28__Baudrillart_1996__pp__973_9)

當天晚上，皮尼亞蒂將這一消息傳達給齊亞諾。他認為帕切利之所以能夠成功當選，是因為他向同仁們證明，作為國務卿的他能夠忠誠地執行教宗的指令，并且能夠以和衷共濟的姿態處理好與德國和意大利的關系。  [[29]](#_29__DDI__series_8__vol__11__n)

在從華沙回國的路上，齊亞諾收到了這個好消息。在日記中，他回憶起教宗過世當天，他同帕切利進行的對話：“他是個傾向于調停的人，與此同時，他似乎能夠改善教會與德國的關系。實際上，在此前一日，皮尼亞蒂就表示德國人傾向于讓這位樞機當選。”次日下午回到羅馬后，齊亞諾前去面見墨索里尼，領袖也對帕切利的當選感到滿意。他告訴齊亞諾，自己會幫新任教宗出謀劃策，讓他更為有效地管理教會。墨索里尼給媒體下達指令，讓其發聲贊美新任教宗，這條命令寫道：“以贊同的口吻報道新任教宗的當選，回憶他的敬虔、修養以及豐富的從政經驗。”  [[30]](#_30__Ciano_2002__pp__195_196__Ma)

當選僅僅四十八小時，帕切利教宗就在3月5日上午召見了德國大使。庇護十二世急于向納粹政府保證，他會在雙方之間達成新的理解，完全有別于過去的時代。他先告訴柏爾根，多年出使柏林和慕尼黑的經歷，令他對德國人民有著特殊的親切感，接著他進入了主題。他明白不同的國家選擇不同的政府形式，而教宗不應當擅自評判他國所采納的政體。他提醒柏爾根，他們兩人已經交好達三十年之久，他希望這一關系不會出現變故。  [[31]](#_31__Bi_Hu_Shi_Er_Shi_Huan_Ti_Xi)

盡管柏爾根對此感到滿意，卻一反常態地提醒納粹政府，這一樂觀前景并不現實。他在三天后致信德國外交辦公室：“不僅梵蒂岡密切關注我國媒體對新任教宗的態度，意大利方面也是如此，不過他們對我們的報道非常滿意。”他給庇護十二世送去了好幾份刊物，上面都有報道他當選消息的正面新聞，希望借此說服教宗結束《羅馬觀察報》的反納粹口徑。但是他依然提醒外交部注意：“自從上任教宗過世，雙方的緊張關系已確定無疑地得到緩解，這使得有些人士產生了過分樂觀的心理，希望能夠盡早地解決德國和梵蒂岡之間的分歧。”為了避免“過分樂觀的期望”，且得以“克服大量的困難”，他建議“除去善意之外，還需要耐心與時間”。  [[32]](#_32__DGFP__series_D__vol__4__n)



新任教宗庇護十二世降福圣彼得廣場上的群眾，1939年3月。教宗的左側是卡恰·多米尼奧尼樞機。

一周后（3月12日），四萬人擁向圣彼得廣場，目睹新任教宗的加冕儀式。一列莊嚴的隊伍開進了廣場，其中有兩千名身穿華袍的高級教士和各路貴賓（其中有不少人身穿外交官服或軍裝）。一列身穿禮服、手持閃亮長戟的瑞士侍衛隊在前方帶路，后面跟著一長排來自各個宗教團體的代表、數百位主教，以及身穿紅色教士袍、外披白色和金色罩衫的樞機。最后出現的是形象莊嚴的新任教宗，他頭戴裝點著璀璨寶石的主教法冠，被幾名身穿紅色法蘭絨制服的轎夫抬在寶座上。他的身后是兩名高級教士，手持巨大的鴕鳥羽毛扇，并輕柔地扇動著。再后面則是貴族衛隊和瑞士侍衛隊，這些衛隊的指揮官都穿著閃亮的銀色鎧甲，頭上戴著羽毛頭盔。  [[33]](#_33__Morgan_1944__pp__159_160)

只有卡恰·多米尼奧尼樞機擁有將教宗三重冕戴在帕切利頭上的殊榮。梵蒂岡和法西斯警察似乎通過某種方法，掩蓋了這位樞機的一連串孌童指控。意大利警方文檔中的最新記錄距今并不遙遠。前一年8月，當一位警察在羅馬搭乘公交車時，被一位跑腿小男孩手上的幾盒外國香煙吸引了注意力。疑心的他發現這些香煙上并沒有蓋意大利的稅收章。當他詢問這個男孩這些走私香煙都是哪里來的時候，男孩回答說是梵蒂岡某位大人物給他的。警察進一步施壓，男孩便說出了卡恰樞機的名字。當警察致電樞機核對男孩的說辭時，卡恰表示這番描述屬實，并要求警察放過這個男孩。這位警方線人總結道：“卡恰·多米尼奧尼似乎很享受孌童的惡名，他們還說，他給男孩送香煙的理由顯而易見。”  [[34]](#_34__ACS__MI__PS__Polizia_Politi)

當約瑟夫·肯尼迪（羅斯福總統派去參加加冕儀式的私人特使）站在身穿軍裝的齊亞諾身邊，走過圣彼得大教堂的走道時，他注意到身邊彌漫著另一種性趣味。他后來評論道：“我這輩子可從沒見過這么自大浮夸的蠢貨。”當齊亞諾經過大教堂時，他不斷地行法西斯禮，步履趾高氣揚，仿佛“要同教宗分享這一榮耀”。在向加冕儀式致敬的茶會上，齊亞諾始終都在調戲富有魅力的女性，并且在晚宴上“都沒法跟人說上五分鐘話”，因為主辦方為了邀請他過來，專門找了兩三位女孩，他一直擔心這幾個女孩子會跑出他的視線。鑒于對齊亞諾的觀察以及對墨索里尼性癖的耳聞，肯尼迪“可以放心地離開了，我認為我們可以派遣十幾位歌舞女郎出使羅馬，她們要比一幫外交官和一隊飛機管用多了”。  [[35]](#_35__NARA__M1423__reel_2__Joseph)

\* \* \* \* \*

3月15日，也即教宗加冕三天后，德國軍隊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余下領土。次日，希特勒在布拉格宣布，該國已經成為德國的受保護國。  [[36]](#_36__Di_Nuo__Ge_Lan_Di__1985__p)  誰也無法否認，歐洲即將迎來另一場可怕的戰爭。

元首在布拉格發表勝利講話次日，齊亞諾與新任教宗進行了初次會晤，并且滿意地發現他一點都沒有改變，還是那個“親切、謙恭、仁慈的人”。庇護十二世對德國的處境表示關切，他告訴齊亞諾，自己計劃對第三帝國采取更為調和的外交策略，希望能夠改善梵蒂岡與柏林的關系。他表示，如果這些舉措取得成功，那么納粹政府也應當盡到自身的責任。這番姿態令齊亞諾歡欣鼓舞，他表示墨索里尼一定會出面說服希特勒，讓他同教會合作。至于梵蒂岡與意大利政府近日發生的爭端，齊亞諾寫道，新任教宗“宣稱自己對此非常樂觀”。他承諾撤除皮扎爾多樞機公教進行會國家司鐸的職務，并將組建一個大主教委員會，負責指導公教進行會的運作。墨索里尼一直都想撤掉皮扎爾多，但是庇護十一世從來都不答應這一要求。

近期，梵蒂岡曾詢問意大利主教，他們主教管區的公教進行會團體是否仍然與地方政府或法西斯黨官員保持著緊張的關系。在庇護十一世過世后的幾周里，各地的答復紛紛抵達。除了米蘭（舒斯特樞機表示當地存在困難）以外，整體情況非常好。幾乎所有主教管區都表示雙方關系極佳。新任教宗也以身作則，給達拉·托雷下達指令，要求《羅馬觀察報》不得刊登任何可能“惹惱”意大利或德國政府的文章。無論是墨索里尼還是其他人，都希望回到過去快樂的歲月，那時梵蒂岡與法西斯政府的合作親密無間，如今的事態令大家感到似乎所有烏云都消散了。  [[37]](#_37__Ciano_2002__pp__203_204__Ma)

[[1]](#filepos1355560) Charles-Roux 1947, pp. 243–244.

[[2]](#filepos1356592) Ciano 2002, p. 188 (February 10, 1939).教宗極具戲劇性的死亡時間激發了許多陰謀理論，因為這恰恰是在他向意大利主教發表講話的前一天，而墨索里尼擔心庇護會對他提出譴責。在這番猜測中，最核心的人物是克拉拉·佩塔奇的父親弗朗切斯科（Francesco），一位梵蒂岡的資深外科醫生。出于各種原因，弗朗切斯科很有可能受到了脅迫（不僅是因為克拉拉，還有可能是因為她的兄長，此人利用家族同墨索里尼的關系，陷入了一系列存疑的經濟糾紛中）。這一陰謀理論的擁躉注意到，教宗的私人醫生阿明塔·米拉尼（Aminta Milani）在教宗臨終那幾天生病臥床，他們認為老佩塔奇可能利用職務的便利，趕在教宗于《拉特蘭條約》十周年紀念日發表那番令法西斯黨人忌憚的講話前，將病重的他送去見了天主。在1972年的頭版上，《泰晤士報》在報道中寫道，蒂斯朗樞機曾經告訴關系密切的同事，他認為教宗遭到謀殺，并懷疑佩塔奇便是元兇。此外，據說那個為教宗整理遺容的人也是佩塔奇，所以他得以移除所有投毒的跡象，這成了控訴他的進一步證據。《教宗1939年遇害理論的證據》，《泰晤士報》，June 23, 1972, p. 1。2005年，意大利歷史學家彼得羅·梅洛格拉尼（Piero Melograni）重新提起了這個理論。安東尼奧·卡廖蒂，《疑點重重的庇護十一世死因。領袖將要背負起罪名》，《晚郵報》，11 luglio 2005, p. 25。盡管教宗死亡的時機為這樁事情本身帶來了疑點，但是目前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死于任何非自然原因。但這種故事實在太過轟動，所以它依然反復出現，近來主要由毛羅·蘇托拉（Mauro Suttora）所推動。《庇護十一世是否被克拉拉的父親所謀殺？》，《晚郵報》，17 maggio 2012。

[[3]](#filepos1357231) Caviglia 2009, p. 227 (10 febbraio 1939).

[[4]](#filepos1357779) 在過去的幾周里，皮尼亞蒂建議政府不要助長樞機之間反法西斯勢力的氣焰。可即便是在教宗病危期間，法西斯黨主席阿契爾·斯塔拉切依然要求政府發起新一輪的抗議：個別公教進行會團體依然涉嫌組織政治活動。教宗過世次日，皮尼亞蒂致信斯塔拉切，告訴他不要在這個關頭找梵蒂岡的麻煩。在教宗缺位的情況下，圣座事務將由樞機團來決定，而下一任教宗也將由這幫人投票選出。很顯然，即便狂熱如斯塔拉切，也認同了大使的辦事邏輯，并在當晚發來電報，表示自己明白了。ASMAE, APSS, b. 42, Pignatti a Starace, 11 febbraio 1939, n. 545; ASMAE, APSS, b. 42, Pignatti a Ciano, 12 febbraio 1939, n. 553。

[[5]](#filepos1358375) Ciano 2002, p. 189 (February 12, 1939).

[[6]](#filepos1359025) Petacci 2011, pp. 52–53 (12 febbraio 1939).

[[7]](#filepos1360203) ASV, ANI, pos. 1, fasc. 7, ff. 7r–9r, Borgongini a Monsignor Vincenzo Santoro, segretario del Sacro Collegio, 13 febbraio 1939.溫琴佐·桑托羅（Vincenzo Santoro）在兩天后確認，諸位主教并沒有收到任何秘密文檔。ASV, ANI, pos. 1, fasc. 7, f. 10r, Santoro a Borgongini, 15 febbraio 1939。皮尼亞蒂也向帕切利求證了這一傳言，并得到了同樣的否定答案。ASMAE, AISS, b. 101, Pignatti a Ciano, 13 febbraio 1939, n. 557.

[[8]](#filepos1363704) 法托里尼在她早先的著作（2007, pp. 240–244）中發布了這番演講后，又在后來的著作（2011, pp. 210–215）中提供了全文的英文譯文。她分析了帕切利雪藏這份演講稿的決定，參見英文版pp. 187–193。文檔收于ASV, AESS, pos. 576, fasc. 606, ff. 147r–153r。

[[9]](#filepos1364240) 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 165r, appunto Tardini, “Materiale preparato da S.S. Pio XI per l’adunanza del 12 febbraio 1939,” 12 gennaio 1941.

[[10]](#filepos1364788) ASMAE, AISS, b. 101, Pignatti a Esteri-Gabinetto, 22 febbraio 1939, n. 23.

[[11]](#filepos1365416) 《繼任教宗的幾位候選人》，BG, February 11, 1939, p. 3。《洛杉磯時報》認為帕切利和舒斯特最有可能接掌教宗的職務。《可能成為教宗繼任者的意大利人》，LAT, February 11, 1939, p. 1。

[[12]](#filepos1365938) 《九大候選人》，NYT, February 12, 1939, p. 43。次日，《紐約時報》（《五位樞機可能在教宗選舉中獲勝》，February 13, 1939, p. 1）又深挖了這一話題，認為“教廷將候選人推上教宗寶座的可能性很低”，并進一步認為：“如果說下一任教宗碰巧從他們之中誕生，那么可能性最大的是馬西米（Massimi）樞機和泰代斯基尼樞機。”《泰晤士報》則認為，新任教宗最有可能是一名意大利人，但可能會從那些“不涉足政治”的人中誕生。此外，教宗不可能出自教廷，而是從地方大主教中產生。《教宗選舉》，《泰晤士報》，March 1, 1939, p. 15。

[[13]](#filepos1366964) ACS, MCPG, b. 169, Roma, 16 febbraio 1937.

[[14]](#filepos1367847) ACS, MCPG, b. 170, Roma, 24 febbraio 1938. 關于達拉·科斯塔施行奇跡的能力，參見韋迪耶樞機的評論，收于Papin 1977, pp. 53–54。

[[15]](#filepos1368222) ASV, ANI, pos. 1, fasc. 7, Borgongini a Santoro, 16 febbraio 1939; ASV, ANI, pos. 1, f. 15r, Cardinal Belmonte a Borgongini, 18 febbraio 1939。

[[16]](#filepos1369053) 法托里尼（2007, pp. 221–222）也指出了這一點。

[[17]](#filepos1369556) 位居第二的法國遠遠落在后面，僅有六名樞機。德國有四名；西班牙和美國各有三名；其他所有國家最多只有一名樞機，而在這些人當中，只有四人來自歐洲以外的地區：一名加拿大人，一名阿根廷人，一名巴西人和一名敘利亞人。樞機團的權柄明顯集中于羅馬：二十四名樞機生活在此地，而這些人（只有歐仁·蒂斯朗不是意大利人）都處于梵蒂岡權力的中心，在教廷中持有重要的職務。ASMAE, AISS, b. 95, 10 febbraio 1939; Annuario Pontificio 1940, pp. 71–72.庇護十一世提拔了七十七名樞機，其中十四名來自梵蒂岡的外交系統，還有二十名則來自教廷。余下的大部分都是大主教管區的地方大主教，而這些地區的大主教通常都會成為樞機。教宗選舉會議召開時，并不是所有樞機都在世。阿戈斯蒂諾（1991, pp. 29–30）認為住在羅馬的樞機有二十七名，但我在本書中使用的數據（二十四名）來自我對1940年年鑒收錄的住址的統計。

[[18]](#filepos1370812) 納粹報紙近來刊登的一系列批評文章令蒙蒂尼蒙席感到不快，他決定要安排《羅馬觀察報》登載文章對它們進行批駁。但是當皮尼亞蒂向帕切利樞機提出抗議時，后者出手阻止了這一文字的登載。柏爾根聽從了皮尼亞蒂的建議，這一點可以從當天晚些時候他發給德國外交部的電報上看出來，他報告了這番對話，并要求德國媒體避免批評近來過世的教宗，以及那些能夠為他們所用的樞機。DGFP, series D, vol. 4, n. 470, Bergen to foreign ministry, February 18, 1939.

[[19]](#filepos1371463) 柏爾根之所以樂觀，一大原因在于，自庇護十一世過世之后，他發現梵蒂岡的合作態度更加鮮明。許多樞機都明確表示，他們希望能同第三帝國達成協議。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a Ciano, 18 febbraio 1939；也刊于DDI, series 8, vol. 11, n. 197。皮尼亞蒂就這場談話發給齊亞諾的報告也抄送給墨索里尼。

[[20]](#filepos1371874) 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21 febbraio 1939.

[[21]](#filepos1372493) 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a Ciano, 25 febbraio 1939。

[[22]](#filepos1373243) 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a Ciano, 26 febbraio 1939。2月28日，皮尼亞蒂與德國大使會面，相互比對了手頭的記錄。近期，有兩位德國樞機向柏爾根保證，他們會對教宗選舉會議抱持和解的態度。而帕切利近來與其中一位德國主教談話時，曾“明確無誤地表達了自己”與意大利和德國政府的“和解意圖”。皮尼亞蒂又問及，納粹政府怎么看待帕切利當選教宗。柏爾根回答說，他已經告知德國外交部，自己強烈地偏向于帕切利，“并且沒有收到任何與之相反的指示”。他從這一點推出，德國政府看好這位前國務卿。意大利大使則透露了自己的顧慮，也即意大利樞機在教宗選舉會議中的可能表現。他表示自己拜訪了許多位，但他們都不特別喜歡帕切利。ASMAE, AISS, b. 95, Pignatti a Ciano, 27 febbraio 1939.

[[23]](#filepos1373906) Baudrillart 1996, pp. 963–965, 968 (20 février, 22 février, 24 février 1939).

[[24]](#filepos1375074) 這番對話來自韋迪耶的描述，收于Papin 1977, pp. 56–57。

[[25]](#filepos1375969) 有兩位樞機健康狀況不佳，沒能來到西斯廷教堂，于是他們就待在梵蒂岡臥室中投出他們的選票。關于北美和南美樞機的抵達，參見《輪船即將起航》，NYT, February 11, 1939, p. 1；卡米爾·錢法拉，《六十二位樞機就位，梵蒂岡大門關閉，教宗選舉會議開始投票決選教宗》，NYT, March 2, 1939, p. 1。

[[26]](#filepos1376371) Ventresca 2013, p. 136.

[[27]](#filepos1378764) 許多教宗心腹都證實過，庇護十一世希望帕切利能接替他擔任教宗。其中便有帕切利本人，在選舉會議結束不久后，他向韋迪耶樞機透露：“庇護十一世曾兩次告訴我，‘你接替我的位置’。我認為我應該提出異議，但是圣父諷刺地說道：‘我們都知道我們在說什么。’新任教宗接著又告訴韋迪耶，他認為教宗派他出國訪問，是為了幫助他贏得選舉。Papin 1977, p. 62.

[[28]](#filepos1379701) Baudrillart 1996, pp. 973–976 (1 mars, 2 mars 1939); NARA, M1423, reel 2, Phillips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report n. 1316, March 3, 1939.

[[29]](#filepos1380130) DDI, series 8, vol. 11, n. 240, Pignatti a Ciano, 2 marzo 1939.

[[30]](#filepos1381027) Ciano 2002, pp. 195–196 (March 2 and 3, 1939); Tranfaglia 2005, p. 159.

[[31]](#filepos1381743) 庇護十二世還提醒柏爾根，他曾在去年布達佩斯的圣體大會上做過如下發言：帕切利用德語說道，“當一個國家遭遇緊急事態，為了克服困難而招致世俗紛爭，或改弦更張，適應新的政體時，教會不應當偏袒任何一方。”DGFP, series D, vol. 4, n. 472, Bergen to foreign ministry, March 5, 1939.

[[32]](#filepos1382748) DGFP, series D, vol. 4, n. 473, Bergen to foreign ministry, March 8, 1939.

[[33]](#filepos1384067) Morgan 1944, pp. 159–160.

[[34]](#filepos1385128) ACS, MI, PS, Polizia Politica, b. 210, informatore n. 52, Roma, 15 agosto 1938.在半年后的一份報告中，571號線人補充了另一條指控：“在梵蒂岡圈子里，最出名的孌童者是皮扎爾多樞機和卡恰·多米尼奧尼樞機。據說皮扎爾多和來自特拉斯泰韋雷的幾位小伙子交往甚密。”ACS, MI, FP, FP “Pizzardo,” 20 febbraio 1939.就我所知，這是唯一一位對皮扎爾多樞機提出孌童指控的線人，所以它應當是沒有根據的。

[[35]](#filepos1386201) NARA, M1423, reel 2, Joseph Kennedy, London, to U.S. secretary of state [Cordell Hull], March 17, 1939.美國駐意大利大使威廉·菲利普斯在回憶錄中記載到，每年冬天他都會專門設宴款待齊亞諾和他的妻子埃達·墨索里尼。菲利普斯（1952, p. 218）回憶道，盡管有那么多最高外交官在場，齊亞諾的注意力卻完全落在了受邀的年輕美女身上，“完全不關心在場的大使、大使夫人或者其他意大利貴賓”。

[[36]](#filepos1386602) 迪諾·格蘭迪（1985, p. 459）寫道：“在這關鍵的幾年里，所有的‘事件’中就屬這一件最為關鍵。”

[[37]](#filepos1388544) Ciano 2002, pp. 203–204 (March18, 1939); Chenaux 2005, p. 273; De Cesaris 2010, pp. 251–253; Casella 2010, p. 290.次月，夏爾——魯在報告中寫到了新任教宗撤銷皮扎爾多職務以及設立大主教委員會的決定，他觀察到，羅馬人認為教宗的這一舉措是“為了向法西斯政權示好”。MAEI, vol. 267, 172–173, Charles-Roux à Bonnet, 13 avril 1939.各地主教關于法西斯當局和公教進行會團體之間關系的報告收于ASV, AESS, pos. 576, fasc. 607, ff. 179r–190v。

## 第二十九章 奔向災難

4月7日是耶穌受難日，墨索里尼派遣意大利部隊闖入了阿爾巴尼亞境內。迫于國際壓力，新任教宗本該譴責這一侵略行為，他卻對此保持沉默。一位杰出的法國天主教知識分子抱怨道：“他竟然對這個血腥的耶穌受難日只字不提。”  [[1]](#_1__Emmanuel_Mounier__Zhuan_Yin)  梵蒂岡的新氛圍令意大利駐圣座大使十分寬慰。皮尼亞蒂在兩周后告訴齊亞諾：“如今已經非常明確，庇護十二世為人類吁求的和平，并不是羅斯福的和平，而是領袖的和平。”  [[2]](#_2__ASMAE__APSS__b__42__Pignatti)

兩任教宗差距甚大，那些與他們熟識的人對此心知肚明。美國記者托馬斯·摩根不僅在羅馬旅居多年，而且曾頻繁地同兩位教宗見面，他認為兩人在性情上可謂截然相反。庇護十一世“目中無人，居高臨下，堅定不妥協，且好與人爭論”，他的繼任者則“循循善誘、言辭動人，愿意用調解和安慰打動別人”。或者如法國大使夏爾——魯所說，一位米蘭的登山客被羅馬的中產階級所取代；一位心直口快的人被一位謹慎的外交官所取代。  [[3]](#_3__Morgan_1941__pp__241_242__Ch)

新任教宗嘗試彌補庇護十一世給德國人造成的傷害，這一點令納粹政府感到滿意。德國外交辦公室負責人恩斯特·馮·魏茨澤克（Ernst von Weizsäcker，他即將接替柏爾根擔任德國駐圣座大使）在回憶錄里寫道，“如果沖動而又精力旺盛的庇護十一世再多活些時日，那么第三帝國和教廷很可能已經關系破裂”。  [[4]](#_4__Fattorini_2007__p__ix)  不過事實卻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那天，教宗駐柏林大使給元首送去了新任教宗的誠摯祝福。德國上下的教堂都敲鐘慶祝。當帕切利教宗熱情地恭喜佛朗哥及其同胞奪取西班牙的壯舉時，德國報紙對他的這番表態大加褒獎。這些報紙特別指出，教宗在共產主義和民主之間畫了等號。意大利駐柏林大使在呈交給齊亞諾的報告里寫道，新任教宗的上任正逢最恰切的時機。全世界都在譴責納粹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也許“這是第三帝國第一次需要教會的支持，需要它不出聲反對”。  [[5]](#_5__ASMAE__APSS__b__42__Minister)

5月，教宗會見了朱塞佩·博塔伊，他不僅是意大利教育部部長，而且是墨索里尼的一大心腹。盡管辦公室還是庇護十一世使用的那一間，它的變化卻令博塔伊印象深刻。在庇護十一世任期之初，他的辦公室猶如斯巴達人一般簡樸，但是隨著教宗年歲的增長，辦公室里的紀念品和常用參考書越積越多。在博塔伊的描述里，年老的庇護十一世被“雜七雜八的家具、裝飾品、小擺件、文件、報紙、圖書”包圍在中間。庇護十二世則與此相反，坐擁一片“細致的秩序和整潔”。他的書桌上只有一些不可或缺的物件。與話多易怒、確信天主在指引自己行動的庇護十一世相比，這位繼任者最顯著的特色便是，他全身散發出一種靜穆感以及能夠勝任工作的專業素養。  [[6]](#_6__Bottai_2001__p__148__19_magg)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墨索里尼愈發確信，一個嶄新的幸福時代已然來臨。在眾多紛至沓來的好消息中，教宗又在7月向墨索里尼通告了自己的決定，要重新和右翼組織“法蘭西行動”建立關系。其首領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一個法西斯主義擁護者，以及法國最激進的反猶分子）給庇護十二世發來了請求信，而帕切利在回信中一改庇護十一世于1926年下達的禁令，允許天主教徒加入這一組織。這一舉措不僅激怒了法國政府，還惹惱了法國許多極具影響力的神職人員。  [[7]](#_7__Da_Liang_Wen_Xian_Ji_Zai_Le)



教宗庇護十二世，1939年3月

皮尼亞蒂在報告中寫道，庇護十二世不僅僅是一位保守派，而且“骨子里贊同貴族階層的觀點，我幾乎可以說，這就是他的弱點”。羅馬貴族非常欣慰。帕切利的前任出身平凡，不僅不尊重羅馬貴族，多年來還一直在削減他們的特權。帕切利則出身黑色貴族，他很快就恢復了他們曾經擁有的特權。  [[8]](#_8__ASMAE__APSS__b__44__Pignatti)

新任教宗的改弦更張令墨索里尼歡欣鼓舞，而這一點還得到了教宗駐瑞士大使的確證。這位教宗大使剛剛返回羅馬，皮尼亞蒂就同他進行了詳談。教宗大使表示，梵蒂岡的氛圍已然“徹底改變”，仿佛“吹入了一股新鮮空氣”。圣父“對法西斯主義表現出極大的認同，并且對領袖懷著誠摯的崇拜之情”。他深信通過重組意大利的公教進行會，可以移除教會與政府之間一項主要障礙。至于德國，新任教宗迫不及待地想要在雙方之間達成共識。  [[9]](#_9__Bi_Hu_Shi_Er_Shi_Huan_Gao_Su)

教會內部的許多人士也對風氣的改變感到滿意。在被固執、好戰的庇護十一世統治多年之后，他們終于在與庇護十二世的接觸中體會到一種輕松的感受。與庇護十一世的冗長獨白不一樣，新任教宗總是留心傾聽訪客的話語，從來不會忘記他們告訴他的話。在用餐方面，新任教宗延續了庇護十一世的傳統，總是獨自用餐。帕切利的膳食甚至比前任更為簡樸，并且在用餐時，他喜歡觀賞餐廳鳥籠里上下跳躍的金絲雀。庇護十一世從不愿意跟來訪的小團體合影，認為這有損他的尊嚴，但是庇護十二世總是熱情地允諾這種請求；此外，他也不像庇護十一世那樣排斥電話。“你好，我是帕切利”，當弗朗西斯·斯佩爾曼被委任為紐約大主教時，新任教宗打來的這通電話令他嚇了一跳。  [[10]](#_10__Papin_1977__p__67)

經歷過拉蒂教宗生前最后幾個月的劍拔弩張，教會—法西斯政府的所有要素都漸漸回歸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1940年4月在羅馬一座大教堂舉行的儀式。在神父的指導下，國家的法西斯女孩協會長久以來都組織各類宣傳活動，試圖把圣凱瑟琳立為意大利的守護圣徒。帕切利成為教宗不久后，這些女孩終于得償所愿，為了慶祝這個新立的國家法定節日，負責監督這個法西斯女孩協會的主教特地為此主持了一場彌撒。兩千名女孩每人手里拿著一朵白玫瑰，一個接著一個地將玫瑰放在教會的祭壇邊。  [[11]](#_11__Parsons_2008__p__92)

但是，羅馬正常的生活樂趣即將被戰爭的現實所驅趕。1939年9月1日清晨，德國軍隊入侵波蘭。許多天主教神父被他們或關押或謀害，但是教宗只是籠統地呼吁和平與弟兄情誼。他不想站在納粹的對立面，尤其當納粹有很高勝算的時候。  [[12]](#_12__Ventresca_2013__pp__153_154)  兩天后，英國和法國對德宣戰。次月，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監管下，德國軍隊開始將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人送到波蘭的集中營。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種族大屠殺已然開始。

1940年春，德國軍隊所到之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墨索里尼急于從納粹的勝利分一杯羹，于是在6月10日對英法宣戰。他匆忙地將意大利部隊派至法國南部，好趕在德國軍隊占領全境之前拿下這片土地。士氣高漲的意大利人以為戰爭很快就會結束。塔基·文圖里預測它將在圣誕節前打完。  [[13]](#_13__ACS__MI__DAGRA__b__1320__Ro)

意大利猶太人生活在絕望之中，他們被丑化成國家公敵，數千人下崗，他們的孩子也被趕出了學校。政府依然主要依賴天主教會的意象，引述它的文本來支撐反猶運動，并且仍主要通過雙月刊《捍衛種族》來傳播反猶情緒。該雜志的大部分內容都直接摘抄了天主教的反猶材料，1939年4月的那一期尤為典型，上面刊登了一篇題為《〈塔木德〉里的基督和基督徒》（“Christ and Christians in Talmud”）和另一篇《法國的天主教徒和猶太人》（“Catholics and Jews in France”）。類似《羅馬的永世敵人》（“The Eternal Enemies of Rome”）這些文章，告訴讀者，教會為了保護天主教徒免受猶太人的掠奪，一直把后者當作二等公民。法國大革命不僅是圣座的敵人，也是《捍衛種族》的敵人，它既是自由黨人造成的惡果，也是共濟會和猶太人的陰謀。  [[14]](#_14__Sa_Er_Wa_Tuo_Lei__Ke_Si_Tan)

墨索里尼又開始利用塔基·文圖里神父。新任教宗加冕的兩周后，領袖召來耶穌會士，希望他幫忙傳達如下信息，即墨索里尼希望教宗能指導西班牙天主教神職人員，以更強烈的姿態支持佛朗哥。  [[15]](#_15__4Yue_1Ri__Ye_Ji_Mo_Suo_Li_N)  他希望教宗能指點克羅地亞神父，讓他們鼓勵信徒支持意大利，而不是德國；他還要求教宗動員拉美的天主教神父，與當地的親美情緒作斗爭。  [[16]](#_16__ARSI__TV__b__28__fasc__2228)

與此同時，受梵蒂岡監督的《公教文明》也在搖旗吶喊，敦促天主教徒支持種族法案。1940年11月，雜志刊文褒獎了一本政府讀物，該書不僅解讀了意大利版的種族主義，還認為它相較于德國的種族主義更為優越。意大利的運動忠實地遵從天主教會的教導，而德國則立基于可疑的生物理論。當羅馬大學前校長（一位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致信梵蒂岡對該文提出抗議時，塔爾迪尼蒙席在回信中為該文作了辯護。  [[17]](#_17__Antonio_Messineo__in_CC_194)

\* \* \* \* \*

意大利軍隊的命運很快就證明，墨索里尼的虛張聲勢有多么空洞。意大利軍人裝備寒酸、缺乏訓練、指揮不力，在戰場上幾乎一無是處。最具代表性的事例莫過于意大利宣戰三周后，法西斯頭號飛行員伊塔洛·巴爾博在利比亞的意大利機場降落時，誤被己方炮兵部隊擊落。

先是入侵阿爾巴尼亞，接著攻打希臘，然后又同德國人在北非和東部蘇俄前線會師，意大利人每一次都只能依靠德國人來救援。1942年秋，北非的意大利部隊和德國友軍在盟軍的進攻下撤退。那年冬天，二十萬意大利部隊在東部前線與德國人并肩作戰，卻陷入了慘烈的斯大林格勒戰役。近半數軍人陣亡或被俘。形勢已經改變，軸心國的敗相變得越來越明顯。意大利人在戰爭伊始時的熱情已經消散。1943年7月初，盟軍登錄西西里島，意大利人幾乎沒有做太多抵抗。7月19日，一千九百架盟軍飛機轟炸羅馬，它們瞄準軍事目標，卻炸死了數千平民。

7月24日周六，法西斯大議會召開了最后一次會議。墨索里尼像往常那樣，坐在世界地圖廳盡頭的書桌后，從他兩側排開的長桌邊則坐著意大利法西斯黨的諸位權貴。會議在下午3點左右開始，傲慢的墨索里尼先是激動地發表了一番長篇大論，將近來的軍事失利怪罪到無能的將軍頭上，他尤其嘲笑了西西里人，竟然把盟軍當作救星。

衣冠楚楚、蓄有山羊胡須的迪諾·格蘭迪就坐在領袖身邊；作為政府中的有識之士，他起身發表了一番領袖聞所未聞的講話。格蘭迪宣稱，這個國家如今陷入如此悲催的境地，墨索里尼要承擔全部的責任。“自從意大利跟隨德國的腳步，”先是出任墨索里尼的外交部部長，然后被派去英國擔任大使的格蘭迪說道，“墨索里尼就背叛了意大利人民。”他控訴道，墨索里尼“將我們卷入了一場違背榮譽、違背意大利人民利益和感情的戰爭”。

格蘭迪呼吁彈劾墨索里尼，重新引入議會民主制。目瞪口呆的領袖被這番話動搖了自信，他雖然試圖打斷格蘭迪的講話，氣勢卻變得越來越弱。然后，格蘭迪轉身直面墨索里尼：“你以為意大利人民還依然愛戴你么？自從你把意大利托付給德國的那天起，你就失去了人民的敬仰。你以為自己是名軍人：可自從你戴上指揮官肩章的那天起，意大利就走向了衰亡。幾十萬母親在哭喊：墨索里尼害死了我的兒子！”

長桌邊上的一些大議會成員又驚又怒，起身咒罵格蘭迪，其中一人喊道：“你這個賣國賊，你要為此付出你的項上人頭！”那些贊同格蘭迪的人則思忖是否要支持他的主張，這將意味著彈劾墨索里尼，將意大利軍隊的控制權交還給國王，恢復原先的憲法秩序。他們急切地想要知道，如果投票支持格蘭迪將會面臨什么樣的命運。

時間過得飛快，一下子就過了午夜，來到了1943年7月25日。在數小時的激烈爭論之后，他們終于要進行這一決定命運的投票。盡管擔心自己見不到明天的太陽，但是二十七名大議會成員中仍有十九人贊成彈劾墨索里尼。當他們離開房間時，法西斯民兵并沒有現身阻攔他們，他們松了一口氣，也可能有一點驚訝。

墨索里尼也動身回家，他雖然憤憤不平，但自信會得到國王的支持。那天晚些時候，他打算面見國王，告訴他事情的進展，但他的妻子雷切爾試圖阻止他。她并不信任國王。如今的局勢已經明朗，墨索里尼已成為戰敗的一方，懦弱的國王一定會將所有過錯都拋給他，想盡一切辦法推卸責任，雖則這場災難里也有他重要的一筆。雷切爾的直覺是正確的。國王下令逮捕了墨索里尼，并將埃塞俄比亞戰爭的功臣彼得羅·巴多格里奧將軍任命為緊急政府的首腦。

接下來的幾周可謂一片混亂。那個統治意大利長達二十多年的政府倒臺了，但接下來的形勢還不甚明朗。國王和其他意大利領導人急于擺脫希特勒的控制，但仍有數千名意大利軍人正在東歐與納粹友軍并肩作戰，西西里島和意大利半島其他區域也部署著納粹的軍隊，想要同德國人撇清關系絕非易事。

塔基·文圖里從中看到了機遇。8月10日，在混亂不堪的羅馬，他致信馬廖內樞機，提醒他盡管政府認為改宗的猶太人仍然是猶太人，但是梵蒂岡曾為他們奮力爭取。不過令人驚訝的是，他到現在仍在為墨索里尼美言。他寫道，墨索里尼認為，種族法案令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陷入了“痛苦”的境地。他聲稱，早在1941年7月，領袖就在籌備新的法案以緩解這一問題，如果不是突然爆發了戰爭，這一法案早就得到實施了。

他還告訴馬廖內，耶穌會特使在內務部有許多門路，這些內務部官員愿意響應梵蒂岡的要求，采納后者呼吁已久的改變。他希望教宗能夠許可他向政府提出三條要求。第一條，要求政府將混合家庭（即包含改宗猶太人的家庭）視作“完整的雅利安家庭”。第二條，要求政府將1938年1月1日前皈依天主教且在之后受洗的猶太人視作基督徒。第三條，要求政府認可猶太出身的天主教徒與普通天主教徒的婚姻關系。  [[18]](#_18__ADSS__vol__9__1974__n__289)  8月18日，馬廖內在回信中表示，庇護十二世許可了這一行為。  [[19]](#_19__ADSS__vol__9__1974__n__296)

之后，塔基·文圖里會見了內務部部長，向他提出了己方的要求。  [[20]](#_20__ARSI__TV__36__n__2660__Tacc)  后來他給馬廖內提交的一份報告為我們披露了頗多內情，這份報告顯示，他所提出的要求也局限于教宗許可的內容。他還非常謹慎，并未要求政府取締種族法案，在遞交給國務卿樞機的報告中，他就此寫道：“根據天主教會的原則和傳統，部分條款應當廢除，但它也確實包含其他值得批準的條款。”  [[21]](#_21__ADSS__vol__9__1974__n__317)

即使在墨索里尼被捕之后，羅馬的政治形勢陷入一片混亂，但是無論是狡猾的塔基·文圖里或政治經驗豐富的馬廖內樞機，還是庇護十二世本人，竟然都沒有意識到己方長期支持的反猶法案已經難以為繼，這一對國際形勢的遲鈍令我們感到吃驚。

9月8日，國王宣布他將同盟軍簽訂停戰協議。擔心德國軍隊的進逼，他同巴多格里奧極不體面地逃往南方，來到受盟軍控制的亞得里亞海城市布林迪西（Brindisi），將群龍無首的意大利軍隊拋在了身后，沒有給他們留下任何指示。早在墨索里尼倒臺的那一刻起，希特勒就為這一天做好了準備，他派遣軍隊迅速沖進意大利半島。充滿戲劇意味的是，德國軍隊救出了身陷囹圄的墨索里尼，并將他立為意大利社會共和國的傀儡首腦，首都定在北方的薩羅（Salo）。一場血腥的內戰打響了，盟軍不斷向北推進，穿過了一片又一片修羅場。

9月10日，納粹部隊抵達羅馬，并且攻下了這座城市。德軍的一項首要任務便是抓捕意大利猶太人，并將他們送到北方的死亡營。當月晚些時候，代表意大利的巴多格里奧元帥和代表盟軍的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在英國的一艘海軍戰艦上簽署協約，使得意大利加入了盟軍的行列。在艾森豪威爾堅持的諸多條款中，有一條要求意大利政府廢除種族法案，并釋放仍然關押在意大利集中營里的猶太人。  [[22]](#_22__Caretti_2010__pp__148_149)

10月16日上午，納粹軍隊包圍了羅馬古老的猶太區，并一家家地搜捕猶太人。當時留守羅馬的猶太人約有七千名，盡管大部分都成功逃脫，一部分躲藏在城市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里，卻仍然有一千零十五個人被捕并關押在梵蒂岡附近的一棟建筑里，等候命運的安排。

馬廖內樞機收到警報后急忙聯絡了德國大使恩斯特·馮·魏茨澤克，替被關押的猶太人求情。國務卿表示，僅僅因為某人屬于特定的人群而遭受如此磨難，令圣父于心不忍。

德國大使問道：“如果這一事態繼續下去，圣座會采取什么行動？”

馬廖內回答道：“圣座并不希望陷入不得不提出反對意見的境地。”

魏茨澤克說道，在過去的四年里，他一直欣賞梵蒂岡的態度，它在處理與交戰雙方的關系時，總是積極地“保持完美的平衡”。他問道，梵蒂岡擁有這么優秀的履歷，難道這一次真的要將它同德國的關系置于危險之中？大使明確表示，他直接受命于希特勒，國務卿難道真的希望他向政府報告，因為德國驅逐羅馬猶太人的行為，梵蒂岡打算發起抗議？

馬廖內記載了這番令人不安的談話：“我記得自己試圖喚醒他的人道本能，來調停這一事件。我由他自己去判斷，是否該向政府提及我們這番友好的談話。”他接著告訴納粹大使：“在這場可怕的戰爭中，我認為圣座一向非常謹慎，不希望德國民眾認為，教會的希冀和所作所為與德國的利益背道而馳。”

“與此同時，我必須重申，”馬廖內樞機這么告訴德國大使，“閣下曾告訴我，會想方設法幫助可憐的猶太人。我為此向您表示感謝。至于余下的事項，我尊重您的判斷。如果您認為不提及我們這番談話更為合宜，那就這樣罷。”  [[23]](#_23__ADSS__vol__9__n__368__Cardi)

在鄰近的那棟關押猶太人的建筑里，擔驚受怕的母親正試圖安撫啼哭的孩童。兩天后，德國人會把他們趕上火車，送往奧斯維辛。這一千多人中只有十六人幸存下來。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納粹占領的意大利境內還會有七千名猶太人被捕，而那些忠于墨索里尼與薩羅共和國的意大利人則是這一行動的幫兇。從1938年第一批反猶法案的公布到七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有約六千名意大利猶太人為了獲得教會的保護，為了避免降臨到他們同胞身上的厄運，而改宗皈依了基督教。而納粹部隊及其意大利友軍將總共七千五百名意大利猶太人送往了奧斯維辛，能夠活下來的寥寥無幾。  [[24]](#_24__Gilbert_1985__pp__622_623)

[[1]](#filepos1405746) Emmanuel Mounier, 轉引自Ventresca 2013, p. 149。

[[2]](#filepos1406094) ASMAE, APSS, b. 42, Pignatti a Ciano, 21 aprile 1939.

[[3]](#filepos1406815) Morgan 1941, pp. 241–242; Chadwick 1986, p. 56.

[[4]](#filepos1407364) Fattorini 2007, p. ix.

[[5]](#filepos1408120) ASMAE, APSS, b. 42,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a Pignatti, 26 aprile 1939.與此同時，齊亞諾的辦公室也從意大利駐慕尼黑領事處收到一份報告，講述了當地媒體對新任教宗的態度大為改變的情況。領事在報告里寫道，在此之前，德國媒體對帕切利持有疑慮，認為他與那些在他出使慕尼黑和柏林時結實的中央黨老領導層走得太近，并且對教會昔日的輝煌懷念不已。在那個年代，教會在巴伐利亞擁有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影響力。在如今的媒體眼中，教宗上任后的首批行動帶來了積極的曙光。ASMAE, APSS, b. 42, “Atteggiamento nazionalsocialista nei confronti del nuovo Pontefice,” Munich, 27 aprile 1939.

[[6]](#filepos1409136) Bottai 2001, p. 148 (19 maggio 1939).

[[7]](#filepos1409907) 大量文獻記載了教宗與“法蘭西行動”抗衡的歷史。普雷沃塔（2001）對此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斯帕多利尼（1972, pp. 291–296）則引用了加斯帕里對這番抗衡的講述。

[[8]](#filepos1410675) ASMAE, APSS, b. 44, Pignatti a Ciano, 17 luglio 1939.

[[9]](#filepos1411406) 庇護十二世還告訴教宗大使，當他擔任國務卿的時候，曾竭盡全力不讓庇護十一世在希特勒訪問羅馬期間，抱怨羅馬城到處都是卐字符號，但是沒有起到任何作用。ASMAE, APSS, b. 43, Tamaro, R. Legazione d’Italia, Berna, al R. Ministero degli Esteri, telespresso n. 3461/1236, 21 luglio 1939.

[[10]](#filepos1412451) Papin 1977, p. 67.

[[11]](#filepos1413260) Parsons 2008, p. 92.

[[12]](#filepos1413716) Ventresca 2013, pp. 153–154, 166.

[[13]](#filepos1414494) ACS, MI, DAGRA, b. 1320, Roma, 11 novembre 1940.

[[14]](#filepos1415605) 薩爾瓦托雷·科斯坦扎，《羅馬的永世敵人》，《捍衛種族》2:16 (20 giugno 1939), p. 30；馬里奧·德·巴尼，《〈塔木德〉里的基督和基督徒》，《捍衛種族》2:14 (20 maggio 1939), pp. 8–9；卡洛·巴爾杜齊，《法國的天主教徒和猶太人》，《捍衛種族》2:14 (20 maggio 1939), pp. 26–27；Cassata 2008, p. 127。

[[15]](#filepos1416009) 4月1日（也即墨索里尼提出要求的四天后），教宗庇護十二世給佛朗哥將軍發去了一份祝賀電報。“把我們的心向天主高舉，我們同閣下一樣，為天主教西班牙取得的可喜勝利感到高興。”新任教宗在電報的最后降福佛朗哥和西班牙人民。Franzinelli 1998, p. 173.兩周后，教宗又向西班牙人民發表了電臺講話：“我們懷著巨大的喜悅向你們發表講話，最親愛的天主教西班牙的孩子們，你們在如此巨大的苦難中表現出如此虔誠的信仰和仁慈，天主將勝利的皇冠戴在你們頭上，并予以你們和平的禮物，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祝賀。”Fattorini 2007, p. 104.

[[16]](#filepos1416313) ARSI, TV, b. 28, fasc. 2228, Tacchi Venturi a Luigi Maglione, 28 marzo 1939.意大利大使在11月中旬同新任教宗會面后，也表達了他對帕切利當選的喜悅和滿意之情。他告訴齊亞諾，教宗“說過，我們國家令他非常滿意。他贊揚了意大利人的虔誠精神、高尚道德和勤勉苦干，強調自己對一切都感到滿意”。Casella 2010, p. 343.

[[17]](#filepos1417000) Antonio Messineo, in CC 1940 IV, pp. 216–219.這封來自喬治·德爾·韋基奧（Giorgio Del Vecchio）的抗議信和塔爾迪尼的回信收于該雜志的檔案，相關討論參見Sale 2009, p. 149。

[[18]](#filepos1423109) ADSS, vol. 9, 1974, n. 289, Tacchi Venturi au Cardinal Maglione, 10 août 1943.

[[19]](#filepos1423305) ADSS, vol. 9, 1974, n. 296, Cardinal Maglione au Père Tacchi Venturi, 18 août 1943.

[[20]](#filepos1423538) ARSI, TV, 36, n. 2660, Tacchi Venturi a Umberto Ricci, 24 agosto 1943. 這封信還刊于DSS vol. 9, annex to n. 317。

[[21]](#filepos1424049) ADSS, vol. 9, 1974, n. 317, Tacchi Venturi au Cardinal Maglione, 29 août 1943.

[[22]](#filepos1425836) Caretti 2010, pp. 148–149.

[[23]](#filepos1428097) ADSS, vol. 9, n. 368, Cardinal Maglione, notes, Vatican, 16 octobre 1943.

[[24]](#filepos1429013) Gilbert 1985, pp. 622–623; http://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5189. 戰爭時期的意大利猶太人包括三萬五千名本土意大利猶太人和近期從納粹控制區域逃難而來的一萬名猶太人。1938年至1943年間，意大利猶太人皈依天主教的估計數字來自“意大利猶太人04：種族大屠殺時期1938—1945”，在線《猶太百科全書》，http://www.geschichteinchronologie.ch/eu/it/EncJud-juden-in-Italien04-holocaust1938-1945-ENGL.html。

后記

當猶太人被帶去波蘭赴死時，墨索里尼的第一任駐梵蒂岡大使切薩雷·德·維基則藏身于慈幼會神父的庇護之下，自從政府于1943年倒臺后，他們便收容了他。在最后一屆大議會上，德·維基給墨索里尼投了反對票，從此便生活在恐懼之中，不僅害怕即將到來的盟軍，也害怕從北方南下的納粹黨人。戰爭結束后，當幸存的法西斯領導人紛紛走上審判席，他卻逃過了抓捕，依然受到慈幼會神父的包庇。神父們擔心這位逃亡者會暴露形跡，于是為他辦理了巴拉圭的護照，并將他送上了駛往阿根廷的輪船。他一直受庇于當地的慈幼會神父，直到1949年的特赦令使他得以重返家鄉。十年后，他在羅馬逝世。  [[1]](#_1__Santarelli_1991__Romersa_198)

自從墨索里尼在1943年被捕之后，加萊亞佐·齊亞諾發覺自己地位不穩。大街小巷里擠滿了喜氣洋洋的人群，他們相互擁抱，撕碎領袖的照片，一起歡慶法西斯政府的倒臺。他們將發起災難性戰爭的罪名平分給墨索里尼與齊亞諾。一邊是南下的德國人，另一邊是從西西里向北進軍的盟軍，贊成彈劾岳父的他不確定自己落在哪一方手里下場會好一些。

齊亞諾和妻子埃達·墨索里尼前往梵蒂岡尋求庇護，但他們的請求遭到了拒絕。由于這一時期的梵蒂岡檔案尚未公開，所以我們并不清楚梵蒂岡是否慎重考慮過這一事宜。  [[2]](#_2__Zai_Zui_Hou_De_Ji_Ge_Yue_Li)  8月27日，齊亞諾一家避開了意大利警方的盤查，登上了一班飛機，他們原以為會降落在西班牙的安全場所，結果卻來到了德國。幾周后，齊亞諾被派去意大利北部的維羅納，此地下轄于薩羅共和國，即納粹為墨索里尼設置的傀儡政府。當他發現機場里接待他的是幾位法西斯民兵時，似乎沒有太過訝異。他們將他塞進一輛汽車，送到附近的一座監獄，同其他大議會成員關在一起，他們都在那場命運攸關的會議上給墨索里尼投了反對票。

1944年1月11日上午，在簡短的審判之后，齊亞諾與其他共同被告乘車來到了維羅納附近的一個軍事靶場。兩天前，他的妻子、墨索里尼的女兒埃達穿過了瑞士邊境。動身之前，她分別給父親和希特勒寄去了最后通牒，告知對方如果他們不放過她丈夫，那么她將出版齊亞諾的秘密日記。她表示，這份日記所披露的真相將令領袖和元首難堪。當面朝瑞士邊境行走在一片開闊的土地上時，她把日記綁在腰間，時刻準備著被德國士兵捉拿。

埃達的最后通牒并沒有救下丈夫。在靶場上，齊亞諾和他的同黨踏過結著白霜的土地，然后被強行摁在一排搖晃的木質折疊椅上，他們反身坐著，面對著墻壁。他的身邊坐著埃米利奧·德·博諾將軍，這位七十二歲的老人曾經統領意大利的武裝部隊，下巴留著標志性的山羊胡子。將軍身穿黑色西裝，頭戴一頂黑帽，落座時雙腿分開，雙手則被綁在身后。兩人要求直面行刑官，但都遭到了拒絕。齊亞諾背部中了五槍，但依然沒有斷氣。他躺倒在地上，但雙腿仍然尷尬地跨坐在椅子上，大聲地求救。行刑隊的指揮官沖到他的身旁，從槍套里拔出手槍，朝“小領袖”的腦袋上又開了一槍。目睹這一場景的德國外交官表示：“這一幕仿佛是在宰豬。”  [[3]](#_3__Moseley_1999__pp__176_247)

雷切爾從來都不喜歡這位女婿，并且認為這是他應得的下場，但是墨索里尼和他的妻子不同，他從未因為齊亞諾的慘死而感到快慰。也許是因為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大限也不遠了，并且下場之凄慘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1945年4月中旬，盟軍突破了博洛尼亞南部的山區。他們不斷向北挺近，而殘余的德國部隊只能節節敗退。4月24日，隨著盟軍腳步的逼近，威尼斯、熱那亞、米蘭三地都爆發了民眾叛亂。墨索里尼過去一周都待在米蘭。4月25日，舒斯特樞機主持會議，邀請了領袖和中央抵抗委員會的代表，希望令雙方避免訴諸血腥的屠殺。墨索里尼得知，德國人正瞞著他同抵抗軍進行協商，他評論道：“他們始終把我們當仆人使喚。”墨索里尼面色慘白、氣色消沉，仿佛已經能夠預見自己的死亡，他要求抵抗軍保障法西斯同胞及其家人的安全，但是抵抗軍領導人斷然拒絕了這一請求，表示己方只接受無條件投降。墨索里尼要求再寬限一個小時。他明白自己可能要走上“人民法庭”，于是決定逃跑。

通過雷切爾的描述，我們得知墨索里尼抵達了科莫湖西南角的科莫鎮，停下來給她寫了一封信。他隨身帶著一支粗壯的藍鉛筆。“親愛的雷切爾。如今的我已經抵達了人生的最后階段，翻到了我這本書的最后一頁。也許我們再也無法見面……我希望你能原諒我對你做過的所有壞事，我并不是有意為之。可是你知道的，你是我唯一真正愛過的女人。”

次日凌晨3點，他與其他法西斯領導人一道在一個車隊的護送下駛向北方，卻沒有下定決心，到底是穿過瑞士邊境逃逸，還是在意大利阿爾卑斯山尋找藏身處。天氣非常糟糕，他們希望能得到增援，于是暫歇在湖邊的一個小鎮，墨索里尼外出在雨中散步，陪在他身邊的是前來與他會合的女兒埃萊娜·庫爾蒂。克拉拉·佩塔奇追著她的愛人出來，卻發現他與一位迷人的紅發女郎沿湖散步，她大發脾氣，傷到了自己的膝蓋。

27日清晨，一支達兩百人的德國分遣隊途經此地。墨索里尼及其黨衛軍認為，加入這支分遣隊是他們最好的機會。墨索里尼換上了德國軍裝，拉上了女兒和克拉拉·佩塔奇，坐進了一輛裝甲車直奔邊境。他們沒開多遠，就被一支游擊隊攔下。盡管德國人的數量遠遠大于他們的敵人，卻再也沒有勇氣戰斗，提出要進行和談。六小時后，他們達成了一樁協議。游擊隊不予阻撓，任由德國人穿過邊境，條件是他們要檢查車輛，看看里面有沒有藏匿意大利人。盡管墨索里尼穿著德國軍裝，戴著深色眼鏡，他還是被認出來并遭到逮捕，其他法西斯同胞也一樣落了網。

地方游擊隊首領被他抓獲的俘虜所震驚，急忙向米蘭的抵抗軍總部打了報告，要求獲得指示。日薄西山的墨索里尼則僅僅要求同克拉拉道別，直到此時，游擊隊成員才知道俘虜中還有她。克拉拉堅守在情人身邊，要同他共赴厄運，兩人在近旁的一處農舍共度了最后一個無眠的夜晚。與此同時，米蘭也下達了指示。次日上午，兩位俘虜被塞進汽車，沿著科莫湖被送到了離此地不遠的梅澤格拉（Mezzegra）。他們停在一座不大不小的別墅前，被喊下車，站在一堵墻跟前。天下著雨，克拉拉仍然穿著毛皮大衣，正在哭哭啼啼。“我跟隨你走到了最后，你快樂嗎？”她問道。墨索里尼沒有回答，他也許根本就沒有聽到她說了什么，無動于衷地認了命。當游擊隊瞄準兩人時，克拉拉掙扎著擋在墨索里尼身前，盡最后一次徒勞的努力，要保護她的愛人。

次日上午，游擊隊將兩人的尸首裝進卡車，運送至米蘭。領袖及其情婦連同其他十五名命運相似的法西斯領導人被暴尸于洛雷托廣場。去年8月，德國人也曾經擊斃十五名被俘的游擊隊員，并將他們的尸體陳列在同樣的廣場上，報復盟軍的轟炸以及抵抗軍的突襲。此舉正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長達二十三年的法西斯統治突然結束了，這座城市擺脫了德國軍隊和黨衛軍的控制。于狂熱與憤怒之中，越聚越多的民眾將復仇的恨意傾瀉在這些尸體上，吐痰、咒罵、棍擊、拳打腳踢。一位女性對墨索里尼的尸體開了五槍，她說這是為她的五個兒子報仇，他們都是因他而死。

為了不讓狂熱的民眾過分破壞尸體，游擊隊員將它們搬到廣場一側的加油站，一個個頭朝下地吊到腳手架上。腦髓從墨索里尼腦袋上的傷口里滲出來，滴到地上。他的身邊吊著克拉拉·佩塔奇，她一直喚他“貝尼”。一位顧慮體面的人士用一條繩子將她的裙子綁在腿上，這樣即便她倒吊著，裙子也不至于蓋住她的頭。  [[4]](#_4__Mo_Suo_Li_Ni_Zui_Hou_De_Ji_R)

多年以來，阿契爾·斯塔拉切都是墨索里尼個人崇拜的舞臺監督，如今的他也吊在墨索里尼身邊。近些年來，這是他離領袖最近的一次。1939年秋，墨索里尼撤除了斯塔拉切黨主席的職務，他認為面對即將爆發的戰爭，法西斯黨人需要不同的領導人。1945年春，領袖面前這條曾經驕傲的比特犬身無分文，在米蘭過著無人問津的生活，每天穿著便裝和破爛的便鞋在街頭游蕩。抵抗軍解放米蘭之后，一群游擊隊員還是認出了他，雖然他無意的喬裝要比墨索里尼更為完整。那天，他只接受了二十分鐘的審判就被槍決了，尸體被吊上了洛雷托廣場加油站的腳手架。  [[5]](#_5__Innocenti_1992__pp__116_117)

墨索里尼那長期受苦卻依然好勝的妻子雷切爾以及兩個最年幼的孩子則被盟軍抓獲，關在了那不勒斯灣的伊斯基亞島（Ischia）上。后來，她將回到普雷達皮奧小鎮，這是她與貝尼托初識的地方。經過多年的努力，她終于在1957年將他的遺體爭取回來，埋在了他出生的地方。和丈夫不同，她一直活到了老年，死于1979年。

直到最后，羅伯托·法里納奇都是忠誠的法西斯黨人，他在1943年7月墨索里尼被罷黜的當天逃離羅馬，飛赴慕尼黑。他被徑直帶到希特勒的總部，在先見過里賓特洛甫之后見到了元首。當墨索里尼被立為北部薩羅共和國的首腦后，法里納奇回到了他在克雷莫納的封地，仍然認為納粹會取得勝利。1945年4月下旬，當盟軍部隊作勢要攻入城市時，他和一小批下屬趕忙鉆進汽車，溜之大吉。當他們試圖突破米蘭北部的一處路障時，遭遇了射擊。司機被射殺，法里納奇被抓獲。游擊隊將俘虜帶到鄰近的一座小鎮，很快把他送上了“人民法庭”。審判只持續了一個小時，他被判處死刑。

在行刑的小鎮廣場上，他要求給他指派一名神父，后者聆聽了他的告解并寬恕了他的罪孽。他們要蒙住他的雙眼，讓他面對墻壁，對他背后開槍，但是法里納奇誓死抵抗。在游擊隊的狂毆之下，他屈服了。可是當行刑隊打算扣動扳機時，法里納奇突然轉過身來，舉起手臂行法西斯禮，高喊“意大利萬歲！”，隨即胸膛被子彈擊穿。他們沒有著急收拾尸體，給路人足夠的時間對它吐痰和拳打腳踢。配槍的人對著這具最法西斯的法西斯黨人的尸體射擊泄憤。  [[6]](#_6__Pardini_2007__pp__439__455_4)

與教宗大使和塔基·文圖里頻繁會面的圭多·布法里尼，一直到最后都深得領袖的信任。在那場命運攸關的法西斯大議會上，他是給墨索里尼投贊成票的少數派，當巴多格里奧的新政府組建之后，他遭到了逮捕，但隨即又被德國人釋放。來到薩羅之后，他成了意大利傀儡政府的內務部部長，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圍捕猶太人。1945年4月25日，他也身在米蘭，并且和墨索里尼一樣想要穿越瑞士邊境，抓獲他的游擊隊將他送到米蘭接受審判，他比領袖多活了三天，行刑隊在4月31日取走了他的性命。  [[7]](#_7__Innocenti_1992__pp__169_170)

墨索里尼被槍決的時候，彼得羅·塔基·文圖里神父已經年高八十三歲，此時的他決定重新埋頭寫書。1951年，耶穌會史的最后一卷面世，此時離這套經典著作第一卷的出版已經過去了四十一年。當他在1956年3月過世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刊登了簡短的訃告。兩家媒體都認為是他促成了《拉特蘭條約》的簽訂，但是在幫助庇護十一世和墨索里尼進行磋商的人當中，他只能居功第二。  [[8]](#_8__NYT__March_19__1956__p__31)

登上圣彼得寶座之后，庇護十二世決定留任弗蘭切斯科·博爾貢吉尼，讓這位虔誠而不諳世事的神父繼續擔任教宗大使。他在這個崗位上堅持到了戰后，直到1953年，也就是他過世的前一年，才被教宗任命為樞機。

阿戈斯蒂諾·杰梅利神父在1939年發表的反猶演講獲得了法里納奇的高度贊揚，作為圣心天主教大學的創始人和校長，后來他繼續巴結國內的當權者。  [[9]](#_9__Jie_Mei_Li_Dao_Nian_Jiao_Zon)  戰爭結束之后，意大利當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制裁那些具有影響力的法西斯主義者，如果他們的職務具有相當的社會影響力，則一律予以撤職。  [[10]](#_10__Bocci_2003__p__505)  1933年，杰梅利的兩位學生曾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而杰梅利向警方舉報了他們的行為，當他面臨多項類似的指控時，作為校長的他被停了職，等候進一步的聽證。

次年，第二屆委員會繼續開展第一屆的工作，該屆委員會的主席正是任教于圣心天主教大學文學系的埃齊奧·弗蘭切斯基尼（Ezio Franceschini）教授。新一屆的委員會赦免了杰梅利，并允許他重新擔任校長。此后，杰梅利將弗蘭切斯基尼任命為文學院院長，并最終成為這所大學的校長。  [[11]](#_11__Xuan_Miao_De_Shi__Wei_Yuan)  如今，杰梅利在羅馬依舊享有殊榮，這座城市最好的天主教醫院和一座火車站都是以他命名的。

國王的遭遇則相對凄慘。1939年8月下旬，美國駐羅馬大使從羅斯福總統處收到緊急指示：向國王傳達總統的個人吁求，希望他能盡一切可能避免意大利參戰。當時，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正在皮埃蒙特的山間度假，菲利普斯于是搭乘火車前往都靈。當大使的座駕抵達偏遠的營地時，國王穿著尋常鄉下人的衣服以及一頂棕色軟帽等候著他。他陪大使來到一座小木屋，菲利普斯傳達了羅斯福在最后關頭提出的吁求。

當大使說話的時候，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保持著沉默。當他說完，國王開始講話了。他解釋道，自己不過是個立憲君主。“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做的也只是將這一請求傳達給政府。”菲利普斯非常失望。兩人之間升起一陣厚重的沉默。美國大使不知道還能說些什么，于是詢問國王釣魚收獲可好，國王的臉上馬上浮現出笑容。他驕傲地說道，自己已經釣到七百條鮭魚，但按照慣例，他會在這個營地一直待著，直到釣到一千條為止。大使表示這個世界恐怕要陷入恐怖的戰爭，國王是否會返回羅馬，埃馬努埃萊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計劃前往比薩附近的農場，并進一步說道，“你知道的，我討厭宮殿”。  [[12]](#_12__Phillips_1952__pp__231_233)

1939年4月，意大利攻陷了毫無防備的阿爾巴尼亞，國王又增添了阿爾巴尼亞國王的頭銜，可是當意大利部隊接連失利之時，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卻想盡辦法撇除自己的責任。戰爭結束之時，他與法西斯政府的密切關系令他聲名掃地，國王宣布退位，妄想把王位留給兒子翁貝托。1946年，意大利舉行了全民公投，驅逐了意大利王室。戰后的意大利將以共和國為政體。

庇護十二世的命運與國王截然不同，他逃過了所有指責，沒有人將意大利的受難怪罪到他頭上。事實上，許多人為他打造了一幅與法西斯政府為敵的英雄形象。所謂的“庇護保衛戰”  [[13]](#_13__Ventresca_2013)  （即有關庇護十二世的激烈討論）主要關注他與希特勒的關系，而不是他與墨索里尼的關系。當納粹黨人及其同謀（其中許多人都自認為是天主教徒）屠戮歐洲的猶太人時，庇護是否要為沒有出聲討伐大屠殺而承擔責任？約翰·康韋爾（John Cornwell）曾撰寫了一部具有爭議性的作品，將庇護十二世稱作“希特勒的教宗”，這部作品引發了熱議，也可能導致了一些誤解，帕切利是否真是如此？  [[14]](#_14__Cornwell_1999)  批評他的人指控他是個懦夫，背叛了教宗作為先知的責任；而為他辯護的人則認為，他是猶太人的摯友。

有趣的是，迄今為止學界都鮮少關注，在走向戰爭的那幾年里，歐金尼奧·帕切利在意大利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他與法西斯政府有著怎樣的關系？當年老而易怒的庇護十一世打算破壞梵蒂岡與法西斯政府的合作關系時，他是否出手阻攔這種情況的發生？

庇護十二世于1958年過世。他的繼任者若望二十三世召開了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徹底改變了教會的路線：猶太人不再被妖魔化；教會鼓勵不同宗教之間達成理解，而不再予以蔑視；教會贊同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不再對其進行攻擊。

本書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讀什么書或者想獲得更多免費電子書請加小編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編也和結交一些喜歡讀書的朋友 或者關注小編個人微信公眾號名稱：幸福的味道 為了方便書友朋友找書和看書，小編自己做了一個電子書下載網站，網站的名稱為：周讀 網址：[www.ireadweek.com](http://www.ireadweek.com)

[[1]](#filepos1437536) Santarelli 1991; Romersa 1983, pp. 269–273.

[[2]](#filepos1438397) 在最后的幾個月里，齊亞諾擔任了意大利駐圣座大使的職務。

[[3]](#filepos1440578) Moseley 1999, pp. 176–247.

[[4]](#filepos1446026) 墨索里尼最后的幾日催生了大量的文獻。我的描述大體上基于米爾扎（2000, pp. 935–947）和博斯沃思（2002, pp. 410–412）。根據相關研究，墨索里尼從科莫鎮寫給妻子的信很有可能是雷切爾杜撰的。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參見Luzzatto 1998。

[[5]](#filepos1446908) Innocenti 1992, pp. 116–117.

[[6]](#filepos1448905) Pardini 2007, pp. 439, 455–459; Festorazzi 2004, pp. 260–261.

[[7]](#filepos1449698) Innocenti 1992, pp. 169–170.

[[8]](#filepos1450367) NYT, March 19, 1956, p. 31.《華盛頓郵報》（March 19, 1956, p. 26）報道說，盡管這位耶穌會士死時無籍籍名，但正是他“策劃了1929年的《拉特蘭條約》”。

[[9]](#filepos1451019) 杰梅利悼念教宗的文章刊登在他名下的雜志《生活與思考》上，可以說是庇護十一世悼文中法西斯色彩最濃厚的一篇。尤其令人不快的是，這篇訃告的結尾并沒有贊美那位它理應悼念的人，而是贊美了墨索里尼，并回顧了“意大利天主教徒虧欠這位無可比擬之人的感激之情，在庇護十一世眼里他是天主派來與自己相會的人”。Ranfagni 1975, p. 216.考夫林神父同杰梅利不謀而合，也在庇護十一世死后，為他打造了一副極度親法西斯的形象。《考夫林神父宣傳，庇護十一世從紅軍手里救下了西方文明》，BG, February 12, 1939, p. 8；《考夫林認為教宗是歐洲的救星》，NYT, February 13, 1939, p. 2。當盟軍部隊在1944年6月將德國人趕出了羅馬，并且一路向北挺進時，杰梅利神父和其他類似的人都不顧一切地試圖說服勝利方，自己從來都不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7月，當與多梅尼科·里戈尼（Domennico Rigoni，一位他在墨索里尼上臺前就交往的舊相識）聊天時，他道出了自己即將用于人前的說辭：如果他曾經討好過墨索里尼和其他法西斯領導人，那只是因為他為了保護圣心天主教大學而被迫如此；他實際上是個反法西斯人士，一位基督教民主黨人士，里戈尼阻止他說：“沒用的，我的朋友，你就是個法西斯主義者，你怎么否認都沒有用。”ACS, MI, FP “Gemelli,” Milano, 10 luglio 1944.

[[10]](#filepos1451331) Bocci 2003, p. 505.

[[11]](#filepos1452062) 玄妙的是，委員會處理杰梅利問題的文件都丟失了。關于杰梅利在戰后試圖保住自己職位的努力，以及梵蒂岡給予他的支持，參見Parola 2003。

[[12]](#filepos1453711) Phillips 1952, pp. 231–233.

[[13]](#filepos1454612) Ventresca 2013.

[[14]](#filepos1455243) Cornwell 1999.

作者按

按照通常的說法，羅馬天主教會英勇地同意大利法西斯黨作斗爭。兩任教宗都反對獨裁，因為它剝奪了人民的權利。教會的平信徒組織意大利公教進行會是制衡政府的中堅力量。在這一粉飾太平的敘述中，法西斯于1938年頒布的“種族法案”引發了梵蒂岡的憤然抗議，教會譴責政府給予猶太人不人道的待遇。

不幸的是，正如讀者在本書中看到的，這種說法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法西斯政府得以掌權并維護其統治地位，梵蒂岡起了核心作用。意大利公教進行會與法西斯當局親密合作，延伸了警察鎮壓民眾的觸手。政府將猶太人當作二等公民，教會不僅沒有提出反對意見，還為墨索里尼采取嚴苛措施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根據。正如本書所示，梵蒂岡與墨索里尼達成了秘密協議，并沒有對意大利臭名昭著的反猶“種族法案”提出任何批評，而是作為交換讓公教進行會受到優待。盡管本書羅列了諸多證據，但是這在意大利幾乎不為公眾所知，我相信許多人定然會否認這一事實。領袖及其下屬倚仗教宗身邊的人，控制庇護十一世對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日益加深的疑慮，這一事實太令教會難堪，這其中固然有許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制衡庇護十一世的核心人物乃是歐金尼奧·帕切利樞機，也就是那個接掌圣彼得寶座的人。在今天，對于教會因循守舊的人士而言，確保帕切利（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圣徒形象可謂是至關重要的使命。

2006年，梵蒂岡開放了涵蓋這一戲劇性時期的檔案，這些年月的全部故事終于可以得到講述，它們是那么豐富而跌宕起伏，包含那么多出人意料的史料。帕切利樞機每天記錄著他與教宗的會面情形，還有數萬份其他檔案為我們照亮了這段歷史，這些資料如今都可以在梵蒂岡秘密檔案中找到。其他新近開放的關于這段時期的教會檔案也包含了許多珍貴的資料，比如耶穌會總部的檔案。我們正是在那里找到了關于彼得羅·塔基·文圖里神父的大量文件，為我們揭示了這位教宗—墨索里尼特使的隱藏身份。

盡管教會檔案幫助我們取得了許多珍貴的洞見，但是它所講述的故事并不完整，還有許多內容需要從法西斯政府的記錄中挖掘出來。幸虧我們掌握了這些文件，任何其他歷史記錄都不可能對梵蒂岡的密謀有如此生動的描述，也不可能對其丑聞有這么形象的記載。這份厚重的法西斯警方檔案記錄了諸多人物的丑行，其中一位乃是教宗的門徒，盡管受到一系列孌童指控，卻依舊一路晉升至樞機。也正是這份警方檔案令我們獲知，塔基·文圖里神父原來多次遭遇詭異的暗殺，以及他拼命想要保守的一個秘密。所有這些都歸功于法西斯政府廣布的間諜網絡，線人發回的報告裝滿了政府的那許多檔案盒，暴露了教會高層的權力斗爭，這是任何梵蒂岡檔案都不會予以記錄的。它令我們得以窺見教宗調查所披露的諸多難堪之事，而正式文件至今仍然安全地鎖在梵蒂岡的“個人”檔案之中，不為大眾所知。

為了撰寫這本書，我整整做了七年檔案研究，在這個過程中，我從所有這些資源中搜羅出兩萬五千頁檔案，并將它們匯編成電子文檔。我還研讀了數千頁出版資料，包括意大利、法國、英國、美國和德國的外交函件、日記和回憶錄。這項工作鮮少沉悶，因為我常常為自己的發現感到震驚。將來自不同檔案的文件交織在一起，用以解決成型已久的謎團是一項并不輕松的挑戰，但我沉醉其中。

本書兩位超群的主角之間有著令人詫異的共謀關系，其復雜程度遠遠超出我原先的設想。墨索里尼和教宗有許多分歧，事實上他們的分歧在許多方面可謂無法調和，但是他們也有許多共同點。他們都有火爆的脾氣，一旦受人擺布，兩人都會火冒三丈。他們都要求下屬無條件地服從自己，那些可憐的人往往雙膝顫抖，生怕招惹兩位主子生氣。到最后，他們都對另一方徹底失望，卻害怕如果解除盟約，可能會招致可怕的后果。

這么說來，這些書頁記錄了兩位巨人的故事，他們于同一年在羅馬掌權，而他們的合作關系改變了20世紀的歷史走向。虔誠、學究氣且派頭十足的庇護十一世將大部分的成年時光都撲在老舊的手稿上，他渴望回到中世紀，那時候的教會手握無可置疑的真理。墨索里尼則是新時代的信徒，他慣于煽動烏合之眾，不僅是個欺凌弱小的惡霸，還發自肺腑地反對教會。正如本書讀者了解到的，他們的這段關系并沒有善終。庇護十一世一度贊揚墨索里尼是天主派來的人，臨終時卻感到自己慘遭領袖利用。墨索里尼并不比教宗更高興，他曾告訴法西斯大議會的成員，教宗這人對他而言簡直是一場災難。

致謝

2002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授權開放了庇護十一世執政時期的檔案，也正是這一年，我決定撰寫本書。2003年，關于梵蒂岡與德國外交關系的材料向學者開放，三年后，庇護十一世執政時期的檔案全面公開。這一時期充滿了戲劇元素，梵蒂岡在許多重大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何種角色，這一問題引發了諸多熱烈的爭議，而我也難以拒絕擺在我面前的這一挑戰。

我把2004年至2005年的學術休假安排在意大利，也由此開始一心撲在這項研究上。盡管彼時，涉及教宗與法西斯政府關系的教會檔案的主體仍未公開，但是另一方（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檔案已經公之于眾。我梳理了意大利的檔案，主要包括國家中央檔案館和意大利外交部的檔案。三年后，梵蒂岡和其他地區的教會檔案向公眾開放，許多新的原始資料和新的洞見變得唾手可得。

如今，我在這本書上已經花去十年時間，也在很多地方欠下了人情。我虧欠最多的是亞歷山德羅·維薩尼。他基本上從項目一開始就與我共事，我們肩并肩地研讀了意國檔案的函件和回憶文字，然后又一頭鉆進卷帙浩繁的教會檔案。維薩尼擁有這段歷史時期的博士學位，不僅為我帶來了出色的檔案研究技能，還對這個涉及大西洋兩岸的項目投入了極大的熱忱，他的熱情感染了我。

此外，我也非常幸運，在布朗大學擁有一批天資聰穎的研究助理（既有博士生，也有碩士生），為本書的研究提供了助力。在這些人當中，我要感謝斯蒂芬·馬特、西蒙娜·波利安德里、哈里·卡斯丹、安迪·牛頓和莫妮卡·法基尼。我還要感謝安妮——克萊爾·伊尼亞斯，在巴黎期間，她幫助我完成了法國外交部的檔案工作。我還須感謝為我的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的布朗大學在校職工：馬蒂爾德·安德雷德、凱瑟琳·漢尼、凱瑟琳·格里馬爾迪和瑪喬麗·薩格魯。此外，我還須感謝布朗大學為保羅·杜比教職提供了研究經費。

2011年至2012年的學術休假，我來到法國和意大利，當地的同仁和機構為我提供了許多幫助，使我能更好地寫作本書，也令整個過程更加愉悅。我要特別感謝若望二十三世在博洛尼亞組建的宗教科學基金會，及其董事阿爾貝托·梅洛尼；感謝洛克菲勒基金會研究中心，及其常駐董事皮拉爾·帕拉奇亞；感謝羅馬的美國學會，及其董事克里斯·切倫扎和主席阿黛爾·查特菲爾德——泰勒；感謝巴黎高等師范學校的吉勒·佩庫。

許多同仁極其友好地解答了我的疑問，并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幫助。在這些人當中，我尤其想要感謝布朗大學意大利研究院的同事馬西莫·里瓦，因為我常常拿各種事情勞煩他，比如意大利文學史的問題，意大利方言和文學文本的英譯等。在其他提供幫助的朋友和同事中，我要感謝阿爾貝托·梅洛尼、埃米利奧·真蒂萊、伊夫林·林肯、萊斯利·里瓦、羅納爾多·馬丁內斯、查爾斯·加拉格爾、S.J.、羅伯特·馬里克斯、約翰·A.戴維斯、喬瓦尼·皮佐魯索、馬泰奧·圣菲利波、雷達·本斯邁亞、達格瑪·赫爾佐格、露西婭·波齊和阿爾貝托·瓜斯科。

我要特別感謝毛羅·卡納利，他是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史的世界級頂尖專家，幫助我梳理了國家中央檔案館的資料，并同我討論了那個時期的意大利歷史。我還要感謝博尼法喬·皮尼亞蒂，他是20世紀30年代意大利駐圣座大使的孫子，他允許我從他們家的檔案中取用一張大使的照片。

我的好友兼著作代理人溫迪·施特羅特曼值得我特別向她表示感謝。她對圖書和出版的深刻理解、她的文字判斷力以及她的強力支持對我意義重大。我還有幸由蘭登書屋的戴維·埃貝爾霍夫擔任此書編輯。他本身便是一位兼具才氣和成就的作家，這對編輯來說非常難能可貴，戴維敏銳的文字眼光，以及他對本書具有重要價值的肯定，都給我提供了很大助益。他令本書更為出色。我還要感謝戴維的助理凱特琳·麥克納，感謝聰穎的她在編輯方面所做的努力。我還感謝蘭登書屋給予的其他支持，并尤其要感謝丹尼斯·安布羅斯、米歇爾·賈絲明、蘇珊·卡米爾、邁克爾·金泰爾和包田拉尼，感謝他們所做的一切。

最后，我要感謝我的妻子蘇珊·達娜·科澤，這么多年來，她與本書朝夕相處，與我分享了旅居意大利的喜悅。她始終提醒我不要忘記寫作的目標，一本書不僅要寫給專家看，還要讓那些對歷史所知不多的大眾也有閱讀的興趣。如果足夠幸運的話，她參加的某個讀書會也許會讀它。

注釋

檔案資料與縮寫

（以下縮寫均用于尾注）

檔案資料

ACDF：信理部檔案，梵蒂岡

S.O. 羅馬宗教裁判所

ACS：國家中央檔案館，羅馬

MCPG　大眾文化部，內閣

MCPR　大眾文化部，報告

MI　內務部，公共安全總局

DAGR　公共安全總局，綜合與機密事務處

DAGRA　公共安全總局，綜合與機密事務處—年度

FP　公共安全總局，政治警察處，個人檔案

PS　公共安全總局

PP　公共安全總局，政治警察處，“事件”

SPD　領袖私人秘書

CO　領袖私人秘書，日常通信

CR　領袖私人秘書，機密通信

CV　領袖私人秘書，“文件袋”

ARSI：耶穌會檔案，羅馬

TV　塔基·文圖里文檔

ASMAE：歷史檔案，外交部，羅馬

APG　政治事務，1931—1945，德國

APIN　政治事務，1919—1930，意大利

APSS　政治事務，1931—1945，圣座

APNSS　政治事務，1919—1930，圣座

AISS　意大利駐圣座大使館

Gab.　內閣

ASV：梵蒂岡機密檔案，梵蒂岡城

ANI　駐意大利教宗大使檔案

AESE　國務院，非常教務部，西班牙

AESG　國務院，非常教務部，德國

AESI　國務院，非常教務部，意大利

AESS　國務院，非常教務部，神職人員

AESU　國務院，非常教務部，匈牙利

法國外交部，巴黎

MAEI　外交部，政治與商業事務處，意大利

MAESS　外交部，政治與商業事務處，圣座

NARA：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科利奇帕克，馬里蘭州 　　　(所有檔案都取自國家檔案館微縮膠片出版系列)

LM142　美國國務院中央機密文件，意大利，外交事務，1940—1944

LM192　美國國務院中央機密文件，德國，外交事務，1930—1939

M530　美國國務院意大利與其他國家政治關系記錄，1910—1929

M561　美國國務院教宗國國內事務記錄，1910—1929

M563　美國國務院教宗國與其他國家政治關系記錄，1910—1929

M1423　美國國務院意大利國內事務記錄，1930—1939

已經出版的外交文件

DBFP　英國外交政策文件

DDF　法國外交文件

DDI　意大利外交文件

DGFP　德國外交政策文件

FCRSE　南歐事務文書，英國外交部

其他縮寫

ADSS　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圣座法令與文件

BG　《波士頓環球報》

CC　《公教文明》

CDT　《芝加哥每日論壇報》

LAT　《洛杉磯時報》

NYT　《紐約時報》

OR　《羅馬觀察報》

PNF　國家法西斯黨

PPI　意大利人民黨

WP　《華盛頓郵報》

參考文獻

（對當時報紙、雜志和期刊的所有引用都已在尾注中完整列出）

Agostino, Marc. 1991. Le pape Pie XI et l’opinion (1922–1939). Rome: 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Alvarez, David. 2002. Spies in the Vatican: Espionage and Intrigue from Napoleon to the Holocaust .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Amal, Oscar L. 1985. Ambivalent Alliance: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Action Française , 1899–1939.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Annuario Pontificio per l’anno 1940 . 1940. Vatican City: Tipografia Vaticana.

Aradi, Zsolt. 1958. Pius XI, the Pope and the Man . New York: Hanover House.

Aubert, Roger. 2000. “Le Cardinal Mercier aux conclaves de 1914 et de 1922.” Bulletin de la Classe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 11:165–236.

Baima Bollone, Pierluigi. 2007. La psicologia di Mussolini . Milan: Mondadori.

Baratter, Lorenzo. 2008. Anna Maria Mussolini: L’ultima figlia del Duce . Milan: Mursia.

Baudrillart, Alfred. 1996. Les carnets du cardinal Baudrillart (20 novembre 1935–11 avril 1939). Edited by Paul Christophe.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 2003. Les carnets du cardinal Baudrillart (26 décembre 1928–12 février 1932). Edited by Paul Christophe. Paris: Éditions du Cerf.

Baxa, Paul. 2006. “A Pagan Landscape: Pope Pius XI, Fascism, and the Struggle over the Roman Cityscape.” Journal of the Canadi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7:107–124.

Bedeschi, Lorenzo. 1973. Don Minzoni il prete ucciso dai fascisti. Milan: Bompiani.

Bendiscioli, Mario. 1982. “Paolo VI (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 In Dizionario storico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Italia ,vol.2. Edited by Francesco Tranello and Giorgio Campanini, pp. 2:448–453. Milan: Marietti.

Beyens, Eugène-Napoléon. 1934. Quatre ans à Rome, 1921–1926; fin du pontificat de Benoît XV—Pie XI—les débuts du fascisme . Paris: Plon.

Biffi, Monica. 1997. Mons. Cesare Orsenigo nunzio apostolico in Germania (1930–1946). Milan: NED.

Binchy, David A. 1970. Church and State in Fascist Italy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occa, Dario. 2012. “Casa Passarge: Gramsci a Roma (1924–1926).” Nuova storia contemporanea 26 (1): 17–36.

Blet, Pierre. 1996. “Le Cardinal Pacelli, secrétaire d’état de Pie XI.”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197–213.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Bocchini Camaiani, Bruna. 1989. “Chiesa cattolica italiana e leggi razziali.” Qualestoria 17:1:43–66.

Bocci, Maria. 2003. Agostino Gemelli rettore e francescano: Chiesa, regime, democrazia. Brescia: Morcelliana.

Bosworth, R. J. B. 2002. Mussolini . London: Arnold.

——. 2011. Whispering City: Modern Rome and its Histor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ottai, Giuseppe. 1949. Vent’anni e un giorno. Milan: Garzanti.

——. 2001. Diario: 1935–1944 . Edited by Giordano Bruno Guerri. Milan: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

Bouthillon, Fabrice. 1996. “D’une théologie à l’autre: Pie XI et le Christ-Roi.”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293–303.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Brendon, Piers. 2000. The Dark Valley: A Panorama of the 1930s. New York: Knopf.

Bressan, Edoardo. 1980. “Mito di uno stato cattolico e realtà del regime: Per una lettura dell’Osservatore romano alla vigilia della Conciliazione.” Nuova rivista storica 64:81–128.

Calimani, Riccardo. 2007. Storia del pregiudizio contro gli ebrei. Milan: Mondadori.

Canali, Mauro. 2004a. Le spie del regime . Bologna: Il Mulino.

——. 2004b. Il delitto Matteoti . Bologna: Il Mulino.

Cannistraro, Philip V., and Brian R. Sullivan. 1993. Il Duce’s Other Woman . New York: Morrow.

Canosa, Romano. 2009. Pacelli: Guerra civile spagnola e nazismo . Rome: Sapere 2000.

Caracciolo, Nicola. 1982. Tutti gli uomini del Duce . Milan: Mondadori.

Caretti, Paolo. 2010. “Il corpus delle leggi razziali.” In A settant’anni dalle leggi razziali. Edited by Daniele Menozzi and Andrea Mariuzzo, pp. 117–157. Rome: Carocci.

Carnahan, Ann. 1949. The Vatican: Behind the Scenes in the Holy City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Casella, Mario. 1996. “Pio XI e l’Azione Cattolica Italiana.”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605-40.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 2000. “La crisi del 1938 fra stato e chiesa nella documentazione dell’archivio storico diplomatico del ministero degli affari esteri.” Rivista di storia della chiesa in Italia 54:1:91–186.

——. 2005. Stato e chiesa in Italia dalla conciliazione alla riconciliazione (1929–1931) . Galatina: Congedo Editore.

——. 2009. Gli ambasciatori d’Italia presso la Santa Sede dal 1929 al 1943 . Galatina: Congedo Editore.

Cassata, Francesco. 2008. “La Difesa della razza”: Politica, ideologia e immagine del razzismo fascista . Turin: Einaudi.

Casula, Carlo F. 1988. Domenico Tardini (1888–1961): L’azione della Santa Sede nella crisi fra le due guerre . Rome: Studium.

Caviglia, Enrico. 2009. I dittatori, le guerre e il piccolo re: Diario 1925–1945. Edited by Pier Paolo Cervone. Milan: Mursia.

Ceci, Lucia. 2008. “ ‘Il Fascismo manda l’Italia in rovina’: Le note inedite di monsignor Domenico Tardini (23 settembre–13 dicembre 1935).”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20:294–346.

——. 2010. Il papa non deve parlare: Chiesa, fascismo e guerra d’Etiopia . Rome: Laterza.

——. 2012. “The First Steps of ‘Parallel Diplomacy’: The Vatican and the U.S. in the Italo Ethiopian War (1935–1936).” In Pius XI and America .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pp. 87–106. Berlin: LIT Verlag.

Centerwall, Bror. 1926. “An Audience with the Pope.” Living Age (May 22), pp. 408–411.

Cerruti, Elisabetta. 1953. Ambassador’s Wife . New York: Macmillan.

Chadwick, Owen. 1986. Britain and the Vatica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line, Nadine-Josette. 1996. “La spiritualité de Pie XI.”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159–170.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Charles-Roux, François. 1947. Huit ans au Vatican, 1932–1940 . Paris: Flammarion.

Chenaux, Philippe. 2005. “Il cardinale Pacelli e la questione del nazismo dopo l’enciclica ‘Mit brennender Sorge’ (1937).” Annali del Istituto storico italo-germanico in Trento 31:261–277.

Chiron, Yves. 2006. Pio XI: Il papa dei patti lateranensi e dell’opposizione ai totalitarismi. Cinisello Balsamo: Edizioni Paoline.

Ciano, Galeazzo. 1980. Diario 1937–1943. Edited by Renzo De Felice. Milan: Rizzoli.

——. 2002. Diary 1937–1943. Translated by R. L. Miller and U. Coletti-Perucca. Coedited by S. G. Pugliese. New York: Enigma Books.

Coco, Giovanni. 2009. “L’anno terribile del caridinale Pacelli ”Archivum historiae pontificiae 47:143–276.

Confalonieri, Carlo. 1957. Pio XI visto da vicino . 3rd ed. Milan: Edizioni Paoline.

——. 1969. “Pio XI intimo.” In Pio XI nel trentesimo della morte (1939–1969): Raccolta di studi e di memorie . Edited by Carlo Colombo, Ernesto Basadonna, Antonio Rimoldi, and Virginio Rovera, pp. 21–58. Milan: Opera diocesana per la preservazione e diffusione della fede.

——. 1993. Pio XI visto da vicino . Cinisello Balsamo: Edizioni Paoline.

Conti, Fulvio. 2005. “Adriano Lemmi.”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64:345–348.

——. 2006. “Massoneria e sfera pubblica nell’Italia liberale, 1859–1914.” In Storia d’Italia, Annali 21, La Massoneria . Edited by Gian Mario Cazzaniga, pp. 579–610. Turin: Einaudi.

Conway, John S. 1968. The Nazi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es 1933–1945 . New York: Basic.

Coppa, Frank J. 1999. “Mussolini and the Concordat of 1929.” In Controversial Concordats. Edited by Frank J. Coppa, pp. 81–119.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 2011. The Policies and Politics of Pope Pius XII: Between Diplomacy and Morality. New York: Peter Lang.

Cosmacini, Giorgio. 1985. Gemelli: Il Machiavelli di Dio. Milan: Rizzoli.

D’Alessio, Giulia. 2012.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Vatican (1936–1939).” In Pius XI and America.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pp. 129–154. Berlin: LIT Verlag.

De Begnac, Yvon. 1990. Taccuini Mussoliniani. Edited by Francesco Perfetti. Preface by Renzo De Felice. Bologna: Mulino.

De Cesaris, Valerio. 2010. Vaticano, razzismo e questione razziale. Milan: Guerini.

De Felice, Renzo. 1966. Mussolini il fascista. Turin: Einaudi.

——. 1968. Mussolini il fascista: L’organizzazione dello stato fascista, 1925–1929. Turin: Einaudi.

——. 1974. Mussolini il duce: Gli anni del consenso, 1929–1936. Turin: Einaudi.

——. 1981. Mussolini il duce: Lo stato totalitario, 1936–1940. Turin: Einaudi.

——. 1995. Mussolini il fascista: L’organizzazione dello stato fascista, 1925–1929 , 2nd ed. Turin: Einaudi.

——. 2010. Mussolini il rivoluzionario, 1883–1910. Milan: Mondadori.

De Gasperi, Maria Romana. 2004. De Gasperi: Ritratto di uno statista. Milan: Mondadori.

De Grazia, Victoria. 1992. How Fascism Ruled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e Rosa, Gabriele. 1958. Storia del Partito popolare. Bari: Laterza.

——. 1959. “Una lettera inedita di Cardinale Gasparri sul Partito Popolare.” Analisi e prospettive 1:568–573.

De Rosa, Giuseppe. 1999. La Civiltà Cattolica: 150 anni al servizio della Chiesa, 1850–1999 . Rome: La Civiltà Cattolica.

De Rossi dell’Arno, Giulio. 1954. Pio XI e Mussolini. Rome: Corso.

De Vecchi, Cesare M. 1983. Il Quadrumviro scomodo: Il vero Mussolini nelle memorie del più monarchico dei fascisti. Edited by L. Romersa. Milan: Mursia.

——. 1998. Tra papa, duce e re: Il conflitto tra Chiesa cattolica e Stato fascista nel diario 1930–1931 del primo ambasciatore del Regno d’Italia presso la Santa Sede. Rome: Jouvence.

Deakin, F. W. 2000 [1962]. The Brutal Friendship: Mussolini, Hitler and the Fall of Italian Fascism. London: Phoenix Press.

Deffayet, Laurence. 2010. “Pie XI et la condemnation des Amis d’Israël (1928).” In Pie XI et la France . Edited by Jacques Prévotat, pp. 87–102.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Del Boca, Angelo. 2010. La Guerra d’Etiopia . Milan: Longanesi.

Diggins, John. P. 1972. Mussolini and Fascism: The View from America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uce, Alessandro. 2006. La Santa Sede e la questione ebraica (1933–1945) . Rome: Edizioni Studium.

Durand, Jean-Dominique. 2010. “Lo stile di governo di Pio XI.” In La sollecitudine ecclesiale di Pio XI . Edited by Cosimo Semararo, pp. 44–60. Vatican Cit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o.

Ebner, Michael R. 2011. Ordinary Violence in Mussolini’s Ital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sner, Peter. 2013. The Pope’s Last Crusade . New York: Morrow.

Fabre, Giorgio. 2005. Mussolini razzista: Dal socialismo al fascismo: La formazione di un antisemita . Milan: Garzanti.

——. 2012. “Un ‘accordo felicemente conchiuso.’ ” Quaderni di storia 76:83–154.

Falasca-Zamponi, Simonetta. 1997. Fascist Specta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alconi, Carlo. 1967. I papi del XX secolo . Milan: Feltrinelli.

Fattorini, Emma. 2007. Pio XI, Hitler e Mussolini, la solitudine di un papa . Turin: Einaudi.

——. 2011. Hitler, Mussolini and the Vatican: Pope Pius XI and the Speech that Was Never Made . Translated by Carl Ipse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2012. “The Repudiations of Totalitarianisms by the Late Pius XI.” In Pius XI and America.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pp. 379–396. Berlin: LIT Verlag.

Federico, Giovanni. 2003. “Sanzioni.” In Dizionario del fascismo. Edited by Victoria de Grazia and Sergio Luzzatto, pp. 2:590–592. Turin: Einaudi.

Ferrari, Ada. 1982. “Ildefonso Schuster.” In Dizionario storico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Italia. Edited by Francesco Traniello and Giorgio Campanini, pp. 2:586–591. Milan: Marietti.

Ferrari, Francesco L. 1957. L’Azione Cattolica e il “regime.” Florence: Parenti.

Festorazzi, Roberto. 2004. Farinacci, l’antiduce . Rome: Il Minotauro.

——. 2010. Margherita Sarfatti. Costabissara: Colla.

——. 2012. Clara Petacci. Bologna: Minerva.

Fiorentino, Carlo M. 1999. All’ombra di Pietro: La Chiesa cattolica e lo spionaggio fascista in Vaticano, 1929–1939 . Florence: Le Lettere.

Fogarty, Gerald P. 1996. “Pius XI and the episcop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549–564.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 2012. “The case of Charles Coughlin: The view from Rome.” In Pius XI and America .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pp. 107–128. Berlin: LIT Verlag.

Fonzi, Fausto. 1979. “Il colloquio tra Pio XI e Jacini il 25 marzo 1929.” In Chiesa e società dal IV secolo ai nostri giorni: Studi storici in onore del P. Ilarino da Milano, pp. 2:651–679. Rome: Herder.

Fornari, Harry. 1971. Mussolini’s Gadfly: Roberto Farinacci. Nashville, Tenn.: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Franzinelli, Mimmo. 1995. Stellette, croce e fascio littorio: L’assistenza religiosa a militari, balilla e camicie nere (1919–1939). Milan: F. Angeli.

——. 1998. Il clero del duce/il duce del clero: Il consenso ecclesiastico nelle lettere a Mussolini (1922–1945) . Ragusa: La Fiacciola.

——. 2000. I tentacoli dell’Ovra. Turin: Bollati Boringhieri.

——. 2008. “Il clero italiano e la ‘grande mobilitazione.’ ” In L’impero fascista: Italia e Etiopia (1935–1941). Edited by Riccardo Bottoni, pp. 251–266. Bologna: Il Mulino.

Franzinelli, Mimmo, and Emanuele Marino. 2003. Il duce proibito: Le fotografie di Mussolini che gli italiani non hanno mai visto. Milan: Mondadori.

Galeotti, Carlo. 2000. Mussolini ha sempre ragione: I decaloghi del fascismo. Milan: Garzanti.

Gallagher, Charles R. 2008. Vatican Secret Diplomacy: Joseph P. Hurley and Pope Pius XII.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Gallina, Giuseppe. 1979. “Il vescovo di Cremona Giovanni Cazzani e il suo atteggiamento di fronte al fascismo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Pio XI.” In Chiesa, Azione Cattolica e Fascismo n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Pio XI (1922–1939). Edited by Paolo Pec- orari, pp. 505–525. Milan: Vita e Pensiero.

Gannon, Robert I. 1962. The Cardinal Spellman Story.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Garzonio, Marco. 1996. Schuster. Casale Monferrato: Piemme.

Gentile, Emilio. 1993. Il Culto del Littorio. Rome: Laterza.

——. 1995. La via italiana al totalitarismo: Il partito e lo stato nel regime fascista. Rome: La Nuova Italia Scientifica.

——. 2002. Fascismo, storia e interpretazione. Rome: Laterza.

——. 2010. Contro Cesare: Cristianesimo e totalitarianismo nell’epoca dei fascismi. Milan: Feltrinelli.

Gibelli, Antonio. 2003. “Opera nazionale ballila.” In Dizionario del fascismo . Edited by Victoria de Grazia and Sergio Luzza,vol. 2–71. Turin: Einaudi.

Gilbert, Martin. 1985. The Holocaust: A History of the Jews of Europ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Henry Holt.

Gillette, Aaron. 2001. “The Origins of the ‘Manifesto of Racial Scientists.’”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6:305–323.

——. 2002a. Racial Theories in Fascist Italy. London: Routledge.

——. 2002b. “Guido Landra and the Office of Racial Studies in Fascist Italy.”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16:357–375.

Godman, Peter. 2004. Hitler and the Vatican. New York: Free Press.

Goetz, Helmut. 2000. (German orig., 1993). Il giuramento rifiutato: I docenti universitari e il regime fascista . Translated by Loredana Melissari. Milan: La Nuova Italia.

Grandi, Dino. 1985. Il mio paese: Ricordi autobiografici. Edited by Renzo De Felice. Bologna: Il Mulino.

Guasco, Alberto. 2010. “Un termine e le sue declinazioni: Chiesa cattolica e totalitarismi tra bibliografia e ricerca.” In Pius XI: Keywords. Edited by Alberto Guasco and Raffaella Perin, pp. 91–106. Berlin: LIT Verlag.

——. 2013 “Tra segreteria di stato e regime fascista: Mons. Francesco Borgongini Duca e la nunziatura in Italia.” In Le gouvernement pontifical sous Pie XI: Pratiques romaines et gestion de l’universel. Edited by Laura Pettinaroli. In preparation.

Hachey, Theodore. 1972. Anglo-Vatican Relations, 1914–1939: Confidential Annual Reports of the British Ministers to the Holy See. Boston: G. K. Hall.

Herf, Jeffrey. 2006. The Jewish Enemy: Nazi Propaganda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the Holocau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ermet, Guy. 1996. “Pie XI, la République espagnole e la guerre d’Espagne.”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499-527.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Hibbert, Christopher. 2008. Mussolini: The Rise and Fall of Il Duce.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Hilaire, Yves-Marie. 1996. “Le Saint-Siège et la France, 1923–1939: Charles-Roux, un ambassadeur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765-773.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Ignesti, Giuseppe. 2004. “Jacini, Stefano.”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61:767–779.

Innocenti, Marco. 1992. I gerarchi del fascismo: Storia del ventennio attraverso gli uomini del Duce . Milan: Mursia.

Insolera, Italo. 1976. Roma moderna. Turin: Einaudi.

Israel, Giorgio. 2010. Il fascismo e la razza: La scienza italiana e le politiche razziali del regime . Bologna: Il Mulino.

Johnson, Eric A. 1999. Nazi Terror: The Gestapo, Jews, and Ordinary Germ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Kantowicz, Edward R. 1983. Corporation Sole: Cardinal Mundelein and Chicago Catholicis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Kent, Peter C. 1981. The Pope and the Duce: The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Lateran Agreements. London: Macmillan.

——. 1986. “The Vatican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16:441–464.

Kershaw, Ian. 1999. Hitler: 1889–1936 Hubris. New York: Norton.

——. 2000. Hitler: 1936–1945 Nemesis. New York: Norton.

Kertzer, David I. 1988.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2001. The Popes Against the Jews: The Vatican’s Role in the Rise of Modern Anti-semit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2004. Prisoner of the Vatic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Kertzer, David I., and Alessandro Visani. 2012.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ly See and Italy’s Racial Laws.” In Pius XI and America .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pp. 327–341. Berlin: LIT Verlag.

Lacroix-Riz, Annie. 1994. “Le rôle du Vatican dans la colonisation de l’Afrique (1920–1938): De la romanisation des missions à la conquête de l’Ethiopi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41:29–81.

Lamb, Richard. 1997. Mussolini and the British . London: John Murray.

Lazzarini, Luigi. 1937. Pio XI. Sesto San Giovanni: Edizioni Barion.

Ledóchowski, Włodzimierz. 1945. Selected Writings of Father Ledóchowski. Chicago: American Assistancy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Levillain, Philippe. 1996.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1857–1939).”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5–13.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Loiseau, Charles. 1960. “Ma mission auprès du Vatican (1914–1918).” 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 74:2: 100–115.

Luconi, Stefano. 2000. La “diplomazia parallela”: Il regime fascista e la mobilitazione politica degli italo-americani. Milan: Angeli.

——. 2004. “Fascist Antisemitism and Jewish-Italian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ewish Archives Journal 56:151–177.

Ludwig, Emil. 1933. Talks with Mussolini. Boston: Little Brown.

Luzzatto, Sergio. 1998. Il corpo del duce . Turin: Einaudi.

——. 2010. Padre Pio: Miracles and Politics in a Secular Age. Translated by Frederika Randall. New York: Henry Holt.

Lyttleton, Adrian. 1987. The Seizure of Power: Fascism in Italy 1919–1929 . 2n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ck Smith, Denis. 1982. Mussolini . New York: Vintage.

——. 1983. “Mussolini cent’ anni dopo: quale eredità?” In Mussolini, il Duce: Quattrocento immagini della vita di un uomo e di vent’anni di storia italiana. Edited by Denis Mack Smith, pp. 5–10. Milan: Gruppo Editoriale Fabbri.

MacKinnon, Albert G. 1927. Things Seen in Rome. London: Seeley, Service & Co.

Maiocchi, Roberto. 2003. “Manifesto degli Scienziati razzisti.” In Dizionario del fascism , vol. 2. Edited by Victoria de Grazia and Sergio Luzzattvol. 2–88. Turin: Einaudi.

Malgeri, F. 1994. “Chiesa cattolica e regime fascista.” Italia contemporanea 194:53–63.

Margiotta Broglio, F. 1966. Italia e Santa Sede dalla grande guerra alla Conciliazione: Aspetti politici e giuridici. Bari: Laterza.

Martin, Jacques. 1996. “Témoignage sur le pontificat de Pie XI.”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Martina, Giacomo. 1978. La Chiesa nell’età dell’assolutismo, del liberalismo, del totalitarismo, vol. 4, La chiesa nell’età del totaritarismo. Brescia: Morcelliana.

——. 1996. “La mancata nomina cardinalizia del P. Tacchi Venturi. Relazione dell’interessato.” Archivi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29:101–109.

——. 2003. 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esù in Italia (1814–1983). Brescia: Morcelliana.

Martini, Angelo. 1960a. “Gli accordi per l’Azione Cattolica del 2 settembre 1931.” Civiltà cattolica I, pp. 574–591.

——. 1960b. “Pietro Gasparri Cardinale della Conciliazione.” Civiltà cattolica I, pp. 113–131.

——. 1963. “L’ultima battaglia di Pio XI.” In Studi sulla questione romana e la conciliazione. Edited by Angelo Martini. Rome: Cinque Lune.

Maryks, Robert A. 2011. Pouring Jewish Water into Fascist Wine. Leiden: Brill.

——. 2012. “The Jesuit Pietro Tacchi Venturi and Mussolini’s Racial Laws.” In Pius XI and America.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Berlin: LIT Verlag.

Matard-Bonucci, Marie-Anne. 2008. (French orig. 2007.) L’Italia fascista e la persecuzione degli ebrei. Translation by Andrea De Ritis. Bologna: Il Mulino.

McCormick, Anne. 1957. Vatican Journal 1921–1954.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Miccoli, Giovanni. 1973. “La Chiesa e il fascismo.” In Fascismo e società italiana. Edited by Guido Quazza, pp. 185-208. Turin: Einaudi.

——. 1988. “Santa sede e chiesa italiana di fronte alle leggi antiebraiche del 1938.” Studi Storici 29:821–902.

——. 2004. “Chiesa cattolica e totalitarismi.” In La Chiesa cattolica e il totalitarismo. Edited by Vincenzo Ferrone, pp. 1–26. Florence: Olschki.

Micheler, Stefan. 2005. “Homophobic Propaganda and the Denunciation of Same-Sex-Desiring Men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In Sexuality and German Fascism. Edited by Dagmar Herzog, pp. 95–130. New York and Oxford: Berghahn.

Milza, Pierre. 2000. (French orig. 1999.) Mussolini. Translated by Gian Carlo Brioschi and Filippo Scarpelli. Rome: Carocci.

Mockler, Anthony. 2003 [1984]. Haile Selassie’s War. New York: Olive Branch Press.

Molony, John N. 1977.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Catholicism in Italy: Partito Popolare 1919–1926. London: Croom Helm.

Monelli, Paolo. 1953. Mussolini: An Intimate Lif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Morgan, Thomas B. 1939. A Reporter at the Papal Court: A Narrative of the Reign of Pope Pius XI.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1941. Spurs on the Boot: Italy Under her Master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1944. The Listening Post: Eighteen Years on Vatican Hill. New York: Putnam.

Moro, Renato. 1981. “Azione Cattolica, clero e laicato di fronte al fascismo.” In Storia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Italia. Edited by Francesco Malgeri, pp. 87–378. Rome: Poligono.

——. 2003. “Cattolicesimo e italianità. Antiprotestantismo e antisemitismo nell’Italia cattolica.” In La Chiesa e l’Italia. Edited by A. Acerbi, pp. 307–339. Milan: Vita e Pensiero.

——. 2005. “Religione del trascendente e religioni politiche: Il cattolicesimo italiano di fronte alla sacralizzazione fascista della politica.” Mondo contemporaneo 1:9–67.

——. 2008. “Le chiese e la modernità totalitaria.” In Le religioni e il mondo moderno, vol. 1, Cristianesimo. Edited by Giovanni Filoramo and Daniele Menozzi, pp. 418-51. Turin: Einaudi.

Morozzo della Rocca, Roberto. 1996. “Achille Ratti e la Polonia.”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95–122.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Moseley, Ray. 1999. Mussolini’s Shadow: The Double Life of Count Galeazzo Ciano.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otti, Lucia. 2003. “Mussolini, Rachele.” In Dizionario del fascismo. Edited by Victoria de Grazia and Sergio Luzzatto, pp. 197–200. Turin: Einaudi.

Muggeridge, Malcolm, ed. 1948. Ciano’s Diplomatic Papers. London: Odhams Press.

Mughini, Giampiero. 1991. A Via della Mercede c’era un razzista: pittori e srittori in camicia nera ... lo strano “caso” di Telesio Interlandi. Milan. Rizzoli.

Muñoz, Antonio. 1942. “Ricordo del padre Ledóchowski.” L’Urbe 7 (11–12): 2–7.

Mussolini, Benito. 1929. Gli Accordi del Laterano. Rome: Libreria del Littorio.

Mussolini, Edvige. 1957. Mio fratello Benito. Firenze: La Fenice.

Mussolini, Rachele. 1974. Mussolini: An Intimate Biography by His Widow, as told to Albert Zarca. New York: Morrow.

Mussolini, Romano. 2006 [2004]. My Father, il Duce. San Diego: Kales Press.

Nardelli, Fabio. 1996. I periodici cattolici bolognesi e gli ebrei durante il periodo fascista. Tesi, Università di Bologna, Facoltà di Scienze Politiche (relatore: Mauro Pesce).

Navarra, Quinto. 2004 [1946]. Memorie del cameriere di Mussolini. Naples: L’ancora del mediterraneo.

Nenovsky, Nikolay,Giovanni Pavanelli, and Kalina Dimitrova. 2007. “Exchange Rate Control in Italy and Bulgaria in the Interwar Period: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Paper no. 13,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South-Eastern European Monetary History Network.

Nidam-Orvieto, Iael. 2005. “The Impact of Anti-Jewish Legislation on Everyday Life and the Response of Italian Jews, 1938–1943.” In Jews in Italy Under Fascist and Nazi Rule, 1922–1945. Edited by Joshua D. Zimmerman, pp. 158–18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bili, Elena. 2008. “Vescovi lombardi e consenso alla guerra: il cardinale Schuster.” In L’impero fascista: Italia e Etiopia (1935–1941). Edited by Riccardo Bottoni, pp. 267–285. Bologna: Il Mulino.

Noel, Gerald. 2008. Pius XII: The Hound of Hitler. London: Continuum.

Onofri, Nazario Sauro. 1989. Ebrei e fascismo a Bologna. Crespellano (BO): Grafica Lavino.

O’Shea, Paul. 2011. A Cross Too Heavy: Pope Pius XII and the Jews of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Ojetti, Ugo. 1939. Cose viste 1934–1938, vol. 7. Milan: Mondadori.

Orlando, Vittorio Emanuele. 1937. Rome v/s Rome: “A Chapter on My War Memoirs.” Translated by Clarence Beardslee. New York: Vanni.

Ottaviani, Alfredo. 1969. “Pio XI e i suoi Segretari di Stato.” In Pio XI nel trentesimo della morte (1939–1969): Raccolta di studi e di memorie. Edited by Carlo Colombo, Ernesto Basa- donna, Antonio Rimoldi, and Virginio Rovera, pp. 491–508. Milan: Opera diocesana per la preservazione e diffusione della fede.

Pacelli, Francesco. 1959. Diario della Conciliazione: Con verbali ed appendice di documenti. Edited by Michele Maccarrone. Vatican Cit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o.

Pagano, Sergio. 2009. “Dalla porpora al chiostro. L’inflessibilità di Pio XI verso il cardinale Louis Billot.” In La Papauté contemporaine, XIXe–XXe siècles—Il Papato contemporaneo, secoli XIX–XX: Hommage au chanoine Roger Aubert. Edited by Roger Aubert, Jean-Pierre Delville, Marko Jacˇov, Luc Courtois, Françoise Rosart, and Guy Zelis, pp. 395–410. Louvain-la-Neuve-Leuven: Collège Érasme.

——. 2010. “Presentazione.” In I «Fogli di Udienza» del Cardinale Eugenio Pacelli Segretario di Stato. Edited by Marcel Chappin, Giovanni Coco, and Sergio Pagano, pp. xi–xxv. Vatican City: 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

Painter, Borden. 2005. Mussolini’s Rome: Rebuilding the Eternal C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apin, Chanoine. 1977. Le dernier étage du Vatican: Témoignage de Pie XI à Paul VI. Paris: Albatross.

Pardini, Giuseppe. 2007. Roberto Farinacci ovvero della rivoluzione fascista. Florence: Le Lettere.

Parola, Alessandro. 2003. “Epurare l’Università Cattolica? Il processo per filofascismo a carico di Agostino Gemelli.” Passato e presente 21/60: 81–91.

Parsons, Gerald. 2008. “A National Saint in a Fascist State: Catherine of Siena ca. 1922–1943.” Journal of Religious History 32:76–95.

Passelecq, Georges, and Bernard Suchecky. 1997. The Hidden Encyclical of Pius XI.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Pavan, Ilaria. 2010. “Fascismo, antisemitismo, razzismo. Un dibattito aperto.” In A settant’anni dalle leggi razziali. Edited by Daniele Menozzi and Andrea Mariuzzo, pp. 31–52. Rome: Carocci.

Pease, Neal. 2009. Rome’s Most Faithful Daughte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Independent Poland, 1914–1939.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Perin, Raffaella. 2010. “Pregiudizio antiebraico e antiprotestante: Alcuni riflessi sull’atteggiamento della chiesa verso il fascismo.” In Pius XI: Keywords. Edited by Alberto Guasco and Raffaella Perin, pp. 147–162. Berlin: LIT Verlag.

——. 2011. “La Chiesa veneta e le minoranze religiose (1918–1939).” In Chiesa cattolica e minoranze in Italia nella prima metà del Novecento. Edited by Raffaella Perin, pp. 133–223. Rome: Viella.

Petacci, Clara. 2010. Mussolini segreto: Diari 1932–1938. Edited by Mauro Suttora. Milan: Biblioteca Universale Rizzoli.

——. 2011. Verso il disastro: Mussolini in guerra: Diari 1939–1940. Milan: izzoli.

Phillips, William. 1952. Ventures in Diplomacy . Boston: Beacon.

Picardi, Luigi. 1995. Cattolici e fascismo nel Molise (1922–1943). Rome: Studium.

Pincus, Benjamin. 1988. The Jew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rri, Pietro. 1960. “Per una storia del Card. Pietro Gasparri.” In Il cardinale Pietro Gasparri. Edited by L. Fiorelli, pp. 31–61. Rome: Pontificia Università Lateranense.

Pizzuti, G. M. 1992. “Da Benedetto XV a Pio XI. Il Conclave del febbraio 1922 nel suo signifi- cato politico-religioso e nei suoi riflessi sulla storia d’Europa del ventesimo secolo.” Humanitas 47:99–115.

Poggi, Gianfranco. 1967. Catholic Action in Italy: The Sociology of a Sponsored Organiz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ollard, John F. 1985. The Vatican and Italian Fascism, 1929–19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 The Unknown Pope: Benedict XV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London: Wellington House.

——. 2012. “American Catholics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Vatican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Peter’s Pence Payments (1935–1938).” In Pius XI and America.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pp. 195–208. Berlin: LIT Verlag.

Potter, Olave. 1925. The Colour of Rome. With illustrations by Yoshio Markino.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Presenti, Antonio. 1979. “I contrasti tra il fascismo e la Chiesa nella diocesi di Bergamo negli anni 1937–1938.” In Chiesa. Azione Cattolica e Fascismo nell’Italia settentrionale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Pio Xi (1922–1939): Atti del quinto convegno di storia della chiesa, Torreglia, 25–27 marzo 1977. Edited by Paolo Pecorari, pp. 535–563. Milan: Vita e Pensiero.

Prévotat, Jacques. 2001. Les catholiques et l’Action Française: Histoire d’une condamnation 1899–1939. Paris: Fayard.

Puricelli, Carlo. 1996. “Le radici brianzole di Pio XI.”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 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25–52.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afanelli, Leda. 1975. Una donna e Mussolini. Milan: Rizzoli.

Ranfagni, Paolo. 1975. I clerico-fascisti: Le riviste dell’Università cattolica negli anni del regime. Florence: Cooperativa editrice universitaria.

Ratti, Achille. 1923. Climbs on Alpine Peaks. Translated by J. Eat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Rauscher, Walter. 2004. (German orig. 2001.) Hitler e Mussolini. Translated by Loredana Battaglia and Maria Elena Benemerito. Rome: Newton and Compton.

Reese, Thomas J. 1996. Inside the Vatican: The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ineri, Mariangiola. 1978. Cattolici e fascismo a Torino 1925–1943. Milan: Feltrinelli.

Rhodes, Anthony. 1974. 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Riccardi, Andrea. 1982. “Tardini, Domenico.” In Dizionario storico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Italia, 1860–1980. Edited by Francesco Traniello and Giorgio Campani, vol. 3. Casale Monferrato: Marieti.

——. 1996. “Pio XI e l’ episcopato italiano.”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529–548.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igano, Gabriele. 2008. “Note sull’ antisemitismo in Italia prima del 1938.” Storiografia 12:215–267.

Roberti, Francesco. 1960. “Il Cardinal Pietro Gasparri—L’uomo—Il sacerdote—Il diplomatico—Il giurista.” In Miscellanea in memoriam Petri Card. Gasparri, pp. 5–43. Rome: Pontificia Universitas Lateranensis.

Rochat, Giorgio. 1990. Regime fascista e chiese evangeliche: Direttive e articolazioni del controllo e della repressione. Turin: Claudiana.

Rogari, Sandro. 1977. La Santa Sede e fascismo dall’Aventino ai Patti lateranensi. Bologna: Forni.

Romersa, Luigi. 1983. “Premessa” and “Conclusione.” In Cesare De Vecchi, Il Quadrumviro scomodo. Edited by Luigi Romersa, pp. 5–13, 265–273. Milan: Mursia.

Rumi, Giorgio, and Angelo Majo. 1996. Il cardinal Schuster e il suo tempo. 2nd ed. Milan: Massimo-NED.

Ruysschaert, José. 1996. “Pie XI, un bibliothécaire devenu pape et resté bibliothecaire.”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245–253.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Sale, Giovanni. 2007. Fascismo e Vaticano prima della Conciliazione. Milan: Jaca Books.

——. 2009. Le leggi razziali in Italia e il Vaticano. Milan: Jaca Books.

Salvatorelli, Luigi. 1939. Pio XI e la sua eredità pontificale. Turin: Einaudi.

Santarelli, Enzo. 1991. “De Vecchi, Cesare Maria.”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39:522–531.

Saresella, Daniela. 1990. “Le riviste cattoliche italiane di fronte alla guerra d’Etiopia.” Rivista di storia contemporanea 19:447–464.

Sarfatti, Michele. 2005. La Shoah in Italia: La persecuzione degli ebrei sotto il fascismo. Turin: Einaudi.

Scaduto, Mario. 1956. “Il P. Pietro Tacchi Venturi, 1861–1956.” Civiltà cattolica II, pp. 47–57.

Schad, Martha. 2008. La signora del Sacro Palazzo: Suor Pascalina e Pio XII. Cinisello Balsamo: San Paolo.

Scoppola, Pietro. 1976. La Chiesa e il fascismo: Documenti e interpretazioni. Bari: Editori Lat- erza.

——. 1966. “La Chiesa e il fascismo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Pio XI.” In Coscienza religiosa e democrazia nell’Italia contemporanea. Edited by Pietro Scoppola, pp. 362–418. Bologna: Il Mulino.

Seldes, George. 1935. Sawdust Caesar: The Untold History of Mussolini and Fascism. New York: Harper.

Spadolini, Giovanni, ed. 1972. Il card. Gasparri e la questione romana, con brani delle memorie inedite. Florence: Le Monnier.

Spini, Giorgio. 2007. Italia di Mussolini e protestanti. Preface by Carlo Azeglio Ciampi. Edited by Stefano Gagliano. Turin: Claudiana.

Starr, Joshua. 1939. “Italy’s Antisemites.” Jewish Social Studies 1:105–124.

Steigmann-Gall, Richard. 2003.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urzo, Luigi. 1926. Italy and Fascism. Translated by Barbara Carter. New York: Harcourt.

Talbot, George. 2007. Censorship in Fascist Italy, 1922–194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Tardini, Domenico. 1988. “Diario Inedito (1933–1936).” In Domenico Tardini, 1888–1961: L’azione della Santa Sede nella crisi fra le due guerre. Edited by Carlo Felice Casula, pp. 291–390. Rome: Studium.

Terhoeven, Petra. 2006. Oro alla patria: Donne, guerra e propaganda nella giornata della fede fascista. Bologna: Il Mulino.

Tisserant, Eugène. 1939. “Pius XI as Librarian.” Library Quarterly 9:389–403.

Tornielli, Andrea. 2007. Pio XII: Eugenio Pacelli, un uomo sul trono di Pietro. Milan: Mondadori.

Toschi, Umberto. 1931. “The Vatican City Stat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Politic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view 21:529–538.

Tramontin, Silvio. 1982. “Pietro Tacchi-Venturi.” In Dizionario storico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Italia. Edited by Francesco Tranello and Giorgio Canpanini, pp. 31–33. Milan: Marietti.

Tranfaglia, Nicola. 2005. La stampa del regime 1932–1943: Le veline del Minculpop per orientare l’informazione. Milan: Bompiani.

Trisco, Robert. 2012. “The Holy See and Cardinal Mundelein’s Insult of Hitler (1937).” In Pius XI and America.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pp. 155–194. Berlin: LIT Verlag.

Tronel, Jacky. 2007. “Magda Fontages, maîtresse du Duce, écrouée à Mauzac (Dordogne).” Arkheia, Revue d’histoire , pp. 17–18.

Turi, Gabriele. 2002. Il mecenate, il filosofo e il gesuita. Bologna: Il Mulino.

Urso, Simona. 2003. Margherita Sarfatti: Da mito del dux al mito americano. Venice: Marsilio.

Vavasseur-Desperriers, Jean. 1996. “La presse française à l’avant-veille du Conclave (24–28 janvier 1922).”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125–145.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Vecchio, Giorgio. 1996. “Achille Ratti, il movimento cattolico, lo stato liberale.” In Achille Ratti pape Pie XI: Actes du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Rome 15–18 mars 1989. Edited by Philippe Levillain, pp. 69–88. Rome: École française de Rome.

Venini, Diego. 2004. Venini, collaboratore di Pio il Grande: Diari 1923–1939. Edited by Franco Cajani. Milan: GR Edizioni.

Ventresca, Robert A. 2012.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Pius XI, Eugenio Pacelli, and Italian Fascism from the Ethiopian Crisis to the Racial Laws.” In Pius XI and America. Edited by David Kertzer, Charles Gallagher, and Alberto Melloni, pp. 285–302. Berlin: LIT Verlag.

——. 2013. Soldier of Christ: The Life of Pope Pius XI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 sity Press.

Verucci, Guido. 1988. La Chiesa nella società contemporanea. Bari: Laterza.

Vian, Giovanni. 2011. “La Santa Sede e la massoneria durante il pontificato di Pio XI.” In Chiesa cattolica e minoranze in Italia nella prima metà del Novecento. Edited by Raffaella Perin, pp. 105–132. Rome: Viella.

Vivarelli, Roberto. 2009. “Le leggi razziali nella storia del fascismo italiano.”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121:738–772.

Von Bülow, Bernhard. 2007. Memoirs of Prince Von Bulow . Edited by Geoffrey Dunlop. Wilmington, Ohio: Frazer Press.

Wilk, Stanislaus, ed. 1995–2000. Achille Ratti (1918–1921), Acta Nuntiaturae Polonae. Tomus 57, vols. 1–6.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Polonicum.

Wolf, Hubert. 2010. The Pope and the Devil. Translated by Kenneth Kronenber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olff, Richard J. 1985. “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 and Italian Politics, 1897–1933: The Early Life of Pope Paul VI.”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71:228–247.

Zambarbieri, Annibale. 1982a. “Buonaiuti, Ernesto.” In Dizionario storico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Italia 1860–1980. Edited by Francesco Traniello and Giorgio CampaniMilan: Marietti.

——. 1982b. “Colombo, Luigi.” In Dizionario storico del movimento cattolico in Italia 1860–1980. Edited by Francesco Traniello and Giorgio Campanini, pp. 2:112–117. Milan: Marietti.

本書由微信公眾號【Kindle圖書共享】（ID:DZSGX8）制作分享， 掃一掃下方二維碼關注我們，免費下載更多優質Kindle電子圖書。  與兩千萬書友一起，享受閱讀帶來的美好體驗。 （本書僅供個人學習之用，請勿用于商業用途。如果閱讀后覺得好，請購買正版書籍！）